

20世纪俄罗斯

档案文件

新经济政策
是怎样被断送的

(一)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

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
（五卷本）

- 第一卷 1928年4月6—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二卷 1928年7月4—1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三卷 1928年11月16—2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四卷 1929年4月16—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五卷 1929年11月10—1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一卷

1928年4月6—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б) 1928—1929 г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атерик»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Фонд Александра Н. Яковлева), 2000.

© Данилов В. П., Муравьева Н. В., Сидоров Н. А., Хлевнюк О. В.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введения, примечания.

本书中文版版权取得俄罗斯国际民主基金会授权,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字:01-2007-0782号

责任编辑:魏 华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马 杰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一)/[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李方仲
宋锦海 李永庆 译 李方仲 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2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主编)

ISBN 978-7-01-006355-3

I. 新… II. ①雅… ②李… ③宋… ④李… III. 经济政策-研究-俄罗斯
IV. F1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5110 号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一)

XIN JINGJI ZHENGCE SHI ZENYANG BEI DUANSONG DE

[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李方仲 宋锦海 李永庆 译 李方仲 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6.5

字数:66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355-3 定价:8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内部发行)

ISBN 978-7-01-006355-3



9 787010 063553 >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主编

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编辑委员会：

A. H. 雅科夫列夫（主任）

E. T. 盖达尔, B. П. 科兹洛夫, B. A. 马尔丁诺夫,
C. B. 米罗年科, B. П. 纳乌莫夫, E. M. 普里马科夫,
A. H. 萨哈罗夫, Г. H. 谢沃斯季亚诺夫, H. Г. 托米林娜,
C. A. 菲拉托夫, A. O. 丘巴良, A. A. 雅科夫列夫

本卷编辑出版委员会：

В. П. 丹尼洛夫 О. В. 赫列夫纽克 А. Ю. 瓦特林 (以上为主编)

М. С. 阿斯塔霍娃 Г. В. 戈尔斯卡娅 И. М. 扎科莫尔基娜
Е. Е. 基里洛娃 Л. П. 科舍廖娃 В. С. 列瓦诺维奇
Л. Н. 马拉申科 Н. В. 穆拉维约娃 Л. А. 罗戈娃娅
Н. А. 西多罗夫

李方仲 宋锦海 李永庆 译
李方仲 校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翻译出版委员会：

主任：李铁映

副主任：戴秉国、李慎明、李静杰（常务）

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钊贤	王钢华	乌传袞	冯育民	李方仲	李京洲
李慎明	李静杰	汪宁	郇中建	张达楠	赵永穆
赵仲元	赵国顺	徐葵	黄书元	鲁桓	戴秉国
魏华	藏乐安				

卷首语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是迄今为止，俄罗斯整理出版的规模最大的历史文献集。收录的大部分文献，都是首次对外公布，内容贯穿俄罗斯20世纪特别是整个苏联时期的历史，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史料价值极高。

2001年春，我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同志向我建议翻译出版此书，我表示赞成，并担任了翻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六载寒暑一挥间，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人民出版社及翻译出版委员会的同志，为本书的按期译成出版，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的译者，多为我国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正是他们经年的认真严谨工作，才使我们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了解这部文献的内容。在此，我对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崇高的敬意！

苏联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史；是人类第一次探索、寻求自身解放，实现人民国家的历史；是人类的极为宝贵的经验、史诗。人类这部遗产必须记取，并深入反复研究。

十月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响亮的一声号角，洞开了人类的眼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当然，这个历史探索是充满曲折、艰难、复杂，甚至严重的挫折或一时的失败。苏联在建立后69年解体了，倒下去了，但历史永存、精神永存！道不亡，理不失，历史将按自己的规律、道路走下去。潺潺细流，终将千回万转夺路归大海，这是自然律！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研究历史资料，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抬高一寸，不贬低一分，不涂抹一笔，不杜撰一字。只有这样，才能继承这笔精神遗产，把苏联史作为当代史来研究。

中国是史学大国,《史记》、《资治通鉴》等都是其经典著作。这些史学巨著为中华民族的传承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和脉络渊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目的都是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发展的伟大探索。在这一历史探索过程中,汲取人类的历史遗产,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是必须的,也是走向未来的历史起点。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善学善为者史存焉!

史料是人类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基础。这部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文献集,将为我国对俄罗斯特别是苏联历史的研究提供大量新鲜史料。但是,任何史料都会因编者的立场观点而存在局限性和倾向性,因此,在使用这些文献资料时,要对之加以分析和鉴别。

我建议这部史学巨著的翻译出版工作进行下去。

斯为馨香以祝之!



2007年9月30日

总 序

1928—1929 年的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全会速记记录： 结合时代的历史原始资料

这次出版的 1928—1929 年举行的所有 5 次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一个问题,即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传统上称为“新经济政策”的现象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在党的会议上决定其命运的政策,而且是一种特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既不同于原先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战时动员体制,也不同于后来在新经济政策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体制。

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国内战争持续了 7 年,从 1914 年夏天到 1921 年春天,在这之后,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事实上是国家摆脱经济崩溃惟一可能的条件。

俄罗斯不可避免地把战争的所有重担转移到了农民经济的身上——动员劳动能力最旺盛的男子参军,向国家提供食品(实际上是无偿的,所以也就是导致破产的)。从战争一开始,这两件事就都落到了农民的肩上。1916 年末,沙皇政府不得不采用了粮食征集制,也就是把国家对粮食的需求摊派给各个农户,作为无论实际条件如何都必须承担的贡献。虽然最初粮食的征集规模只限于满足军队的需要,但是征集时也需要有“粮食军”。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不仅保留了粮食征集制,而且在 1917 年 3 月就已经推行了对粮食的国家垄断。布尔什维克企图按照“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着手组织社会的活动,从而使得征集制带有了普遍性——它已经从粮食征集变成了由“食品大军”进行的食物征集。

征集制从农民那里拿走了他生产的所有“剩余”产品,保证了社会能半饥半饱地生存,但是同时也就无望走出食品危机了。征集制否认农民有支配自己劳

动果实的权利,也就堵塞了提高农业生产的条件,不可避免地引起农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典型的状况是,农民要求取消粮食征集制在1920—1921年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公式:“我就给这么多,然后就该我做主了。”(后话先说,要指出的是,1927年末至1928年初斯大林的“紧急状态”就是从否定种粮食的农民对他们生产的产品拥有所有权开始的。)

起初,新经济政策被理解为是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自发性的让步”,而且只限于地方的商品交换,但是很快大多数领导人就承认了必须“根本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而且要让国家相应地通过居民的自主合作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社会体制。合作制成为了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列宁写道,“不应该让合作社去适应新经济政策,而应该让新经济政策去适应合作社。”¹

对于全国,尤其是对于农村来说,由于战争的破坏和1921—1922年的饥荒,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复杂了。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顿河和乌克兰,农村里的饥荒持续到了1923年和1924年。就全国来说,应该承认,只是在1925—1927年,农村才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没有了强制性的粮食征集和饥饿。但是即便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从1921年春天开始的,那也不能不承认,要让新经济政策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和囊括全部的经济体制,这段时间也太短了。就是这样短的时期,也已经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新经济政策是有能力通过发展市场关系把国家一切现有的生产力动员起来,保障整个经济的高涨。

新经济政策首先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恢复。考虑到小农经济已经奄奄一息,牲畜作为基本的役力有很大损失,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靠天吃饭,这个进程不可能是很迅速的和全面铺开的。同时工业、交通受到了破坏,必须恢复,还要重新振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都需要大量资金,也只能在世界市场上用粮食、木材和原料进行交换来获得这些资金。

刚一有了可能,(在1923年)粮食的出口就恢复了,而且这马上就成为进一步为工业积累投资的主要来源。由于这个缘故,就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粮食收购问题也仍然是农村和国家关系体系中的中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领导制定的计划往往超出现实的出口可能。在1925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有许多议论,按Л. Б. 加米涅夫的说法就是“老乡调整了”我们,也就是说,从1925年的收成中收购粮食的计划有各种失算。这些计划显然过高了:“给我们矫正了2亿普特”。结果对工业的投资从11亿卢布降到了7亿—8亿卢布,——“整个速度不得不降下来”。²怎么办呢?修正了计划,但是

既没有改变整个经济政策,也没有改变在农村征集粮食的制度。1926年有了比较高的收成,保障了扩大粮食出口和工业的增长“速度”。

但是,事情还不仅是要调整计划适应现实的条件。追究了中央统计局的责任——责怪的不是夸大而是缩小了生产的可能条件,从而也就缩小了国家收购粮食的条件。1925年12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中央统计局平衡粮食饲料的工作”,党的最高领导狠批了П. И. 波波夫的活动,他是著名的地方统计官员,从1918年起就在领导中央统计局。И. В. 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们定了调子。通过的决议说,“中央统计局及其领导人波波夫同志在编制粮食饲料平衡表时犯有重大错误,无论是断定商品粮食的多少,还是粮食的余富和不足,或者断定农民各基本阶层的经济关系,这个平衡表都不足以为凭”。П. И. 波波夫和斯大林直接争吵起来,他坚持说,粮食生产达到的指标并不高,富农没有大量的粮食储备,于是当天就被撤销了中央统计局的领导职务。³

我们是有意提到1925年12月撤换中央统计局领导人这个情节的,因为从这时开始,这个局就完全为政治所左右了,提供的都是它认为合适的信息,其中也包括在断送新经济政策中起了不小作用的信息。两年之后,出现了1927—1928农业年度的粮食饲料平衡表,它大大夸大了农民的粮食储备,而且成为了“非常”粮食收购的依据。

本卷公布了联共(布)中央(1928年)四月全会的材料,我们在它的导言里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任何经济统计指标,无论是真是假,都不可能为政治领导的行动做出解释,更不可能成为对它的辩解。在1927—1928年的具体情况下,无论如何估量农民的粮食储备,评价他们是不是合理使用了粮食,都绝不可能得出必然的结论,说是应该放弃新经济政策或者建立官僚主义专制。至今还被指责是“左倾激进主义”的联合反对派和Л. Д. 托洛茨基一起,也曾向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建议,说是应该采取措施利用积存起来的储备,但是要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它也是从中央统计局的这个粮食饲料平衡表出发,认为合理的做法是,以借债的形式^①,“保障从富裕的富农阶层,也就是大体上10%的农户那里,由在1926—1927年已经达到的8亿—9亿普特并且大部分集中在农民上层手里的实物粮食储备中,征收不少于1.5亿普特”的粮食⁴。也曾有人建议把这些粮食运到国外市场上去,采购工业设备,从而加速工业化进程,逐渐地随着新企业的投产,将产品用于满足农村需求,这样来逐渐偿还强制性的

^① 斜体是作者标记的,下同。——译者注

借债。

从1927年秋开始,农村局势戏剧性地展开了,粮食因素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借助统计上的夸大建立起来的粮食充裕的神话应该能让政权当局相信,有可能得到这样数量的粮食,最终保证为加速工业化和巩固国防等等解决资金问题……

同时,斯大林领导层应该能让党和国家的上层相信,必须落实这些条件并且采用一切手段从农民那里拿到足够数量的粮食,解决“例行的任务”。“外部危险”和“战争的直接威胁”都能成为久经考验的理由,为这种政策效劳。苏联和英国以及中国的相互关系中发生过冲突,但绝没有包含军事威胁的成分,可是在1927年却被没有任何限度地利用了,当然是为了证明,不仅在推行粮食征集制时,而且在更大程度为了把政权集中在斯大林的手里和消灭任何反对派,都必须采取“非常措施”⁵。

人们已经普遍不满,斯大林领导层不得不放弃加剧战争心理的做法,但是它的“痕迹”却不可能在短期内自行消失——国家对1914—1920年的战争灾难还记忆犹新。从1927年12月最后几天到1928年1月初出现的“粮食收购战线”上的“紧急状况”达到了意外的炽热程度,立刻就让人想起了不久前的宣传运动并且影响到农民的所作所为。正像1928年1月7日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发给所有区委的关于粮食收购问题的电报中所证实的,“农民确信近期内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这是推行粮食收购的一大障碍……必须想方设法加强动员工作和在若干年内连续进行其他方面的准备,让农民树立起信心,认识到在最近的将来,只要加强国家的经济威力,就完全可以指望进行和平建设。必须停止赤裸裸地宣传战争危险和各种进犯随时可能来临的做法”⁶。

我们面对的是斯大林领导层(而且遗憾的是,不仅是斯大林领导层)的典型做法:为解决一时任务而人为制造了一种局面,结果是它成为了达到真正重要目标的障碍。解决矛盾靠的是对千百万人的暴力。上面引用的电报是由С.И.瑟尔佐夫签发的,他是一个不惜采用暴力的人,但是同时他又能够做到把在解决最主要的任务时人为地增加困难的政策称为“不聪明的”政策。他成为了还在1930年就已经组建起来的第三个反斯大林的反对派首领,这不是偶然的。

联合反对派被开除出党也被推迟到了1927年10月的中央和中央监委全会和12月党的十五大时(首先是由于布哈林集团的抵制),这也约束了斯大林的追求。斯大林没有能在1927年按照他计划的规模开展大规模的迫害。他没有敢马上就改变粮食收购政策。早在收购运动一开始时就已经清楚了,中央统计

局的专家委员会确定的粮食总产量是43.5亿普特——“比去年多2500万普特”。当然,4种主要作物——黑麦、小麦、大麦和燕麦的价格,从1926—1927年度的每普特85—90戈比提高到了1927—1928年度的90—95戈比。⁷实际上9月份价格就降低了3%—5%,有些地方还更低。

这里指出的粮食价格政策中的摇摆反映出了1927年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斗争,这是需要特别研究的,因为正是在当时,新经济政策何去何从已经有了疑问。1927年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要求在各种作物和地区之间确定“更适应的价格”,事实上导致了降低价格,这事实上是要撤销粮食价格问题。在这个决定中,特别有意思的有两点:一点是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建议,经过Я.Э.鲁祖塔克和А.И.米高扬的校改后,它们应该变成政治局的决议;还有一点是建立“审议商业人民委员部收购原料和粮食权力”的委员会,在那里起主要作用的又是鲁祖塔克和米高扬。⁸这些文件还需要继续查找。

总的来说,几乎到12月底,粮食收购领域里的斯大林政策的特点是,决定和行动都是预备性的和隐蔽的。鲁祖塔克和米高扬根据政治局9月15日的委托准备的《关于1927—1928年度粮食收购决议草案》,直到11月24日(经过了13次会议之后!)才列入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决定非常短——“推迟”。在后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11月30日),决定依然如此……⁹以后还要开联共(布)十五大,斯大林没有敢于着手进行在9月就已经确定的那些行动。在代表大会上(1927年12月2—19日),斯大林领导层伪善地扮演了维护新经济政策、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角色。代表大会开除的不仅有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而且还有反对派的所有积极活动的人,这次胜利使得斯大林能够放手开始断送新经济政策和大刀阔斧地用命令迫害的办法解决全部社会和经济问题了。在20年代,还可以把它们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也还可以把它们和新的战争威胁联系在一起,因为斯大林主义这种现象本身还没有足够完整和独立地暴露出来。但是,这里的相似是形式上的,而且可以归结为国家粮食收购的征集制,就像已经提到过的,这种办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了。斯大林的迫害体系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更大的广泛性,实际上是包罗万象的,特别是在农村,因为国家人力和物资资源的基本部分都集中在了那里。

1927年12月22日,在十五大上选出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做出了决定:“定于明天,12月23日上午11点举行政治局非例行会议,讨论粮食收购和粮食出口问题”。¹⁰这次政治局会议(附件2)成立了委员会,要通过交换意见制定《关于粮食收购的决议草案》,《中央给地方党组织的……指令

草案》，还要确定“派往地方”的粮食收购全权代表的组成。¹¹12月24日通过了所有上述文件。但是1928年1月5日和14日出现了同样是关于粮食收购问题的新指令，把国家推向了“紧急状况”的道路。所有上述指令以及与之配套的基本文件今天都已经发表了。¹²所以，我们也就可以只限于评述一下这些文件中的主要一个——1928年1月5日政治局通过并于1月6日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由斯大林签发的指令的内容和调子的特点了。

在这个指令中，摆在首位的是纯粹行政性的要求：“地方组织的工作速度缓慢得不能容忍，还在处于冬眠状态，基层机构还没有动起来……政权和党的杠杆还没有启动……农民共产党员、苏维埃和合作社积极分子没有把自己所有余粮都卖出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也没有把所有商品粮都运出来。所有这些正像已经证实的那样，证明地方组织忘记了‘对党和无产阶级承担的基本义务’”。指令要求“在一个星期的期限内做到粮食收购的决定性转折……而且无论是提出什么借口或者拿节日做理由，中央都将认为是在粗暴违反党的纪律”。

规定地方上的党组织要“坚决完成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年度和月度任务”，它的所有“日常指令、不得迟缓”，“……最严格地准确按时完成”。为了“从农村汲取货币积累”，建议“规定期限，让农民最大限度地加速向国库支付所有的一切……争取提前交付所有的付款……依据捐献的法律快速确定对地方的额外征税”等等。最后，“在征收各种付款的欠款时要立即采取严厉的惩罚，首先是对富农（这也就是说不是只对富农！——作者注）。需要对富农和破坏农业价格的投机分子采取特别的镇压措施”。接着就是要求“立即动员”党组织“所有优秀力量”；对各级组织“领导人规定个人责任”，“立即清除他们中间那些显然对争取成功无能为力的人”……指令在末尾严厉警告说，“如果拖延完成这个指令和在一个星期的期限内(!)不能取得实际成果，坚决扭转粮食收购状况，中央可能就不得不更换目前的党组织领导人了”。¹³

这第一个纯粹斯大林式的关于粮食收购的指令事实上阐述了一种全新的对待农民、断送新经济政策和在农村广泛采用镇压手段的纲领。1928年1月，针对粮食收购实施了1926年通过的俄联邦刑事法典的镇压条款：针对私人收购人投机的第107条；针对“基层机构纵容投机者”的第105条；针对在征收税款和其他付款时交付不足的人的第60条。第107条针对的是投机倒把的人；从1928年1月起，这一条就开始对“粮食持有者”也适用了，其中包括拒绝按明显压低的价格向收购部门交出粮食的农民生产者。对107条的新解释并没有必要的法律说明和限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实际采用时做过宽的解释和限制，产生

了大量的“过火现象”。

党内刚刚才保护了新经济政策免受“左倾分子”的侵犯,对农民态度的这样急剧转变不可能不引起异议。1月14日又向地方上发出了斯大林的指令,要求“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粮食收购任务,也就是要不惜采用任何强制手段。这里也就把对农村的新政策(对新经济政策来说的新政策)的实质说清楚了:“共产党员中有许多人想,不能触动收购者和富农,因为这样会把中农吓跑。这是一些共产党员头脑中的所有腐朽思想中最腐朽的思想了。情况正好相反。为了恢复我们的价格政策和取得重大的转折,现在就应该打击收购者和富农,应该逮捕投机者、富农和破坏市场及政策的人。只有在这样的政策下,中农才能明白……投机者和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把自己的命运和投机者、富农的命运联在一起是危险的,他,中农,应该在工人阶级面前履行同盟者的义务。”¹⁴

如我们所见,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富农不仅是粮食的持有者,而且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提出了要和他斗争的任务。1928年的粮食收购事实上开始了对富农的剥夺。最高领导成员作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的粮食收购全权代表到地方上去,是在农村展开并从1928年初进入了“非常状态”阶段的悲剧历史上特殊的一页。在这些出差的过程中,斯大林和他最亲近的支持者向地方上的领导干部讲授了如何采用命令迫害的方法。

要想搞清楚将要到来的新时代和新的活动形式,有一个原则具有特殊意义,它是在斯大林在西伯利亚逗留期间通过的一个主要决定中表述出来的:“*在粮食收购战线上组织施压是党和苏维埃组织的突击任务,而施压本身要一直继续到收购任务的彻底完成*”¹⁵(斜体是作者所加——作者注)。

随着1928年2月1日通过这个提法,官方的语言,更不要说是党的宣传了,便有了一个固定的说法,叫做“粮食收购战线”,它准确地确定了国家和农民新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在完成上面下达的例行任务,也就是被统称为“过火行为”的所有一切时,把直接的恣意横行和暴力引进地方党的和苏维埃组织的实际活动中。1928年初,首先是在粮食收购的实际活动中,出现了一种说法,叫做“宁肯过头,不要不够”,它很快就成为了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口头禅。

著名的1928年2月13日《致联共(布)所有组织的指令》称,“展开了的粮食收购运动已经取得了初步的决定性胜利”。这个指令有一个要求:“*要毫不放松地继续强化粮食收购运动并争取不惜一切地*(斜体是作者所加——作者)完成年度粮食收购计划。不惜一切地也就是说要不顾一切其他的任何考虑,在所有被称之为‘过火和歪曲’的情况面前也不止步。”这个要求把指令中的各个

“限制性”的规定,“坚决消除过火和扭曲的做法……”等等,都一笔勾销了。在中央的指令中写入了“在征购运动过程中”要进行清洗的要求;“从他们中间把异己分子和混进来的分子赶出去,用经受住了考验的党的工作人员和经过检验的非党工作人员取代他们”¹⁶,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对地方上的党和苏维埃以及合作组织施加的压力。

讲到这里,新经济政策被断送的这段时期召开的联共(布)各次重要的全会之前的种种情况也就可以算是说完了。好像以后新经济政策何去何从是属于党的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至少是中央全会职权范围内的事了。可是,实际上,断送新经济政策是从总书记和一小撮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做出的决定开始的,并没有党的高层机构的任何决定。斯大林的个人专政开始形成了。

考虑到政治成分在消灭新经济政策和确立新的斯大林模式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公布的联共(布)中央的各次全会的材料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正是在1928—1929年的各次全会上,新的方针从政治上得到了巩固,确立了И. В. 斯大林的政权,他打败了政治局里的对手——被称之为“右倾”首领的А. И. 李可夫、Н. И. 布哈林、М. П. 托姆斯基。

这个根本转折被斯大林称之为“伟大的转折”,而历史学家们则称它是“斯大林自上而下革命”的开始,它对我们国家的命运起了很大的作用。历史学家们通过研究国家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具体事实,试图回答一个重大的问题:斯大林的这个胜利有多大的必然性,国家的发展有没有其他可以采用的方案?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在两种极端的立场范围内展开的——一种立场是斯大林的胜利不可避免,另一种立场是存在着现实的“布哈林的”替代方案。这些争论再次证实了,进一步研究这一整套十分复杂的问题非常重要,研究新经济政策特别重要。¹⁷

大部分最著名的专著是在档案公布前写成的,主要的依据是已经公布的材料。这种情况并没有降低它们的学术意义,但是可以说现在有了可能在新的档案基础上富有成效地把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公布档案材料的积极过程应该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出版的材料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联共(布)各次全会的速记记录,特别是20年代的速记记录,是研究政治历史的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由于除个别情况外,在党的其他领导机关——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都没有做过速记,所以全会上的争论就成为为数不多的文献资料了,可以重现党的各个不同领导人的立场和政权最高层的斗争过程。由于这个原因,中央全会速记记录总是引起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长年以来,能够看

到的只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速记记录片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按涉及的情节公布了以真正的速记记录为基础的个别发言,积极讨论了出版全会文件多卷集的计划。正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这些计划一直没有能得以实现,只是现在才逐渐地落实下来。

全会速记记录不仅是很有价值的科学文献资料,而且作为历史读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在许多情况下是扣人心弦的,由于具有戏剧性的和炽热的感情而引人入胜。读起来恰巧对于我们又是一次“转折”,真正的转折,十分有教益。

* * *

本卷是 1928—1929 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丛书的首卷。丛书共分五卷:

1928 年 4 月 6—11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1928 年 7 月 4—12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1928 年 11 月 16—24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1929 年 4 月 16—23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1929 年 11 月 10—17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这里发表的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是一部相当复杂的文献资料。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速记记录的准备和加工经过了多道手续,结果是我们掌握着好几个版本:1)最原始的速记记录,是根据“话声”记录的,然后再解译出来;2)发言人修改过的速记记录;3)准备散发给党的各个组织的速记报告,是中央机关里的编辑委员会对作者提供的稿件进行了补充修改的稿子。¹⁸

既然从技术上难以恢复所有 3 种样式的速记记录,在准备公布时就出现了问题:以哪一种样式作基础?

最近这些年采用的公布全会速记记录办法,既有纯粹的速记报告,也有没有经过修改的速记记录,同时注明加入的修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理想的做法是使用原始的、没有经过修改的速记记录作基础。¹⁹该版本的编撰人认为,出版这种类型的文件采用一种办法不合适,因为各个不同时期的速记记录(这种速记已经进行了 70 年)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成的性质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公布 1928—1929 年的全会时,选择了速记报告,也就是最终形式的速记记录,作为基础。这样选择有几个原因。

第一,事前看到速记记录的时候,就这个时期的各次全会来说,原始的、根据

话声做的速记记录,由于有许多语法和意思方面的错误,许多地方是一些不连贯的、弄不明白的文字。而且常常不可能确定,速记记录上不清楚的地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发言的情况(许多发言的人文化水平低,而且又是即兴发言),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原因引起的,例如听不清楚(原始的速记记录上不断会遇到注有“听不清楚”的空白)和速记员水平不高。看来这类原因都有。无论如何说,不能公布这样没有修改过的速记记录。发言人自己做出的也正是这样的修改,使得文字起码是可以看得懂的。

第二,通过对各种不同样式的文字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第二种(有作者修改的速记记录)和第三种(速记报告)样式之间实际上没有区别。这样,我们如果选择速记报告作为公布的基础,就有可能同时公布两种样式的速记记录了。同时,中央机关的编辑人员所做的不多的编辑修改就很容易在每页的注释里说明了。

就1928—1929年的各次全会的情况看,作者对原始速记记录所做的修改很大,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完全把它恢复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并列发表两种文稿。但是,既然作者的修改基本上是修辞性的和语法上的,也就没有必要完全考虑它了。同时,意思上的修改,也就是将文字写完或者删除有实质意义的段落,要全部考虑进去。新写进去的文字用加重号标明,删除的段落放在括号里恢复,作者在修改速记记录时强调的字特别区分出来。中括号表明的是编撰者加入的文字。

编撰者认为,通过这样的工作,做到了相当对应地恢复所有3种样式的速记记录。

作为出版基础的速记报告是单独成册印出散发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每册都包括全会日程上的一个问题的材料。每一册在报告和讨论的速记记录后面,印有全会会议记录的节选和与该问题有关的附件。因为这次出版时所有各册都并在一起,编撰者对速记报告的材料做了一些调整安排。在报告和讨论速记记录后,按全会日程的所有各项内容的速记记录之后公布了全会会议的总记录(相应地,按各项做出的节选就不再公布了),然后是按记录规定的次序的所有决议,最后是速记报告的所有附件。

除附件外,编撰者在“补充材料”栏目下列入了新的材料。一般来说,这是补充全会速记记录的档案文件,对于评价全会本身和20世纪20年代末的党内斗争具有实质意义。

这次出版发行依据的是《历史文献出版规则》(莫斯科1990年版)。在最大

限度地保存原始资料的所有特点的同时,在一系列情况下,根据现行的正字法校正的文字和明显的笔误没有再加以说明。

这次出版的参考资料有导言,从总的方面评价这段时期,也描述了在全会上讨论的最重大事件;有对全会上提到的具体事实的注释;有人物简介和文中提到的姓名查询表;还有缩写词表。^①

В. П. 丹尼洛夫

^① 译文省略了姓名查询表和缩写词表。——译者注

注 释

- 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325页。
- 2 见《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25年12月18—31日)》,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263—264页以及第39、326—327、491页。
- 3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1627号案卷,第1—2张。
- 4 同上,第56号全宗,2号目录,52号案卷,34张。
- 5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详见B. П. 丹尼洛夫的导言:《农村悲剧的根源和开始》。——《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1927年5月—1929年11月,莫斯科1999年版,第21—27页。
- 6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120号案卷,第47张。
- 7 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1927年5月—1929年11月,莫斯科1999年版,第22—26页。
- 8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51号案卷,第3—4张。
- 9 同上,第661号案卷,第2张;662号案卷,第3张。
- 10 同上,第664号案卷,第3张。
- 11 同上,第665号案卷,第1张。
- 12 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1927年5月—1929年11月,莫斯科1999年版,第111—114、136—137、147—150页。
- 13 同上书,第136—137页。
- 14 同上书,第147页。
- 15 同上书,第37—38页。
- 16 同上书,第41页。
- 17 其中最重要的研究著作见:《新经济政策。理论和实践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Iewin M. *Russian Peasants and the Soviet Power*. London. 1968; Carr E. H. and Davies R. W. *Foundation of a Planned Economy. 1926—1929*. Vol. 1. London. 1969; Tucker 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879—1929*. New York - London. 1973(莫斯科1990年俄文版); Cohen S.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88—1938*. New York. 1973(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 Ю. А. 波利亚科夫著:《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和农民》,莫斯科1967年版; B. П. 达尼洛夫著:《集体农庄前的苏联农村:居民、土地利用、经济》,莫斯科1977年版; B. П. 达尼洛夫的另一部著作:《苏维埃集体农庄前的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莫斯科1979年版; Davies R. W. *The Socialist Offensive: The Collectivisa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 1929—1930*. Cambridge (Mass.) - London. 1980; 布哈林著:《人、政治家和学者》,莫斯科

1990年版;Ю. 戈兰德著:《摧毁了新经济政策的危机》,莫斯科1991年版(莫斯科1998年第2版); *From Tsarism to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thaca-New York. 1991; Gregory P. *Before Command* Princeton. 1994等。

18 详见 A. H. 阿尔季佐夫、O. B. 纳乌莫夫:《公布联共(布)——苏共中央全会文件的几个问题》。《近代史和现代史》,1998年第4期,第68—70页。

19 同上书,第75页。

序

1928年四月全会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4月联席全会是1927年12月十五大选出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无论后来的那些年代里对代表大会写了些什么(众所周知,在斯大林的正式历史学里,它被称之为“农业集体化”代表大会),它的主要决定涉及的是党内问题。十五大宣布,成为反对派和宣传它的观点就不能再呆在党内,正式肯定了И. В. 斯大林、В. М. 莫洛托夫、Н. И. 布哈林、А. И. 李可夫及其拥护者对以П. Д. 托洛茨基、Г. Е. 季诺维也夫、Л. Б. 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的胜利。在代表大会上,一大批积极的反对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并很快就遭到了迫害。但是在党的领导的最高层里,争夺政权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被从莫斯科赶出去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首领预言,很快就会在政治局里发生胜利者之间的冲突。做出这样的预测的确是有根据的。第一,反对派不可能不知道,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曾抵制把他们开除出党,也知道,斯大林集团和后来的“右倾分子”之间的政治分歧在十五大之前就已经开始了¹。第二,布哈林在十五大前夕发表的演说《向富农进攻》当然反映了党内的情绪,但是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要展开这场“进攻”不如说是要把它保持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是“和中农站在一起的进攻”,带有严格的“和平—经济性质”的。这里所说的是更有效地调整农村中的社会阶级关系,旨在限制富农阶层的增长(是在“还可能有绝对增长”的情况下)²。布哈林对问题的提法和代表大会的决定都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要在一两个月之后就按照斯大林的办法采取“非常措施”——用暴力从富农也从中农那里,有时也从贫农那里夺取粮食,不惜进行逮捕和没收财产。

1927—1928年冬季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不可能不导致在总的政治方针上和如何实施上发生冲突。关于粮食收购的前几个决定是在1927年12月到1928

年1月初通过的(见本书B. П. 丹尼洛夫的总序《1928—1929年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各次全会速记稿:结合时代的历史原始资料》),没有在政治局里引起冲突。但是表面上的统一并没有保持多久。有关著作早就确定的一种看法认为,苏维埃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到各地出差的过程中,地方上的领导人得到了一系列指示,正是有了这些指示,集体通过的政治局决定的口气变得更加强硬得多了³。

当然,并不是所有高级全权代表都适合扮演斯大林主义学校的教师爷角色。H. A. 乌格拉诺夫就是一个。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和莫斯科市委书记,被派到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出差。一到目的地,他就着手研究粮食市场总的形势,而不是完成组织立即“扭转”粮食收购进程的任务。在出差的总结报告中,乌格拉诺夫把“粮食收购进程不顺利”的原因归结为这样一些情况:“收成状况参差不齐”,“运到农村的工业商品不足、不及时”,“8、9月通过的关于提高收购的粮食标准的决定是错误的,……致使粮食的收购价格实际上降低了”。除此之外,乌格拉诺夫非但没有强行催促农民向国家上缴粮食,而且还建议采用一种截然相反的做法——组织地方上的粮食基金,“以把农民现有的收购粮食的趋势纳入计划和变得秩序井然,保障未来的播种能有种子”⁴。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副部长M. И. 弗鲁姆金的报告也客观分析了粮食收购危机的经济因素以及该通过怎样的途径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克服危机。在1928年1月上半月,他曾是党中央和劳动国防委员会驻乌拉尔的全权代表。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造成粮食收购过程不够令人满意的基本原因是价格和工业品”。那里的情况表明,“对捐献和公债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这涉及到的“不仅是富农,而且还有所有中农”。他建议把对乌拉尔的粮食收购计划从4100万普特降低到现实的3900万普特(莫洛托夫火速赶往乌拉尔的一项“特别的突击任务”,就是要争取“对粮食收购这件事有一个相应的态度”,首先是要把收购计划扩大到4400万普特)⁵。后面各卷的材料表明,乌格拉诺夫和弗鲁姆金后来被宣布是最极端的“右倾分子”。

我们所知道的斯大林和后来的“右翼分子”之间由于粮食收购计划发生冲突的最初材料,是和制定1928年2月13日的中央指令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收购政策的任务和方法问题的讨论,在斯大林从西伯利亚之行回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月20日,A. И. 李可夫任主席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就通过了1—3月征购粮食2.5亿普特的计划,实际上意味着大大削减了年计划(从7.8亿普特降到6.5亿普特)。“为制定加强征购的专门措施”,后来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李可夫

任主席,成员包括瞿鲁巴、索柯里尼柯夫、布留哈诺夫、沙因曼、米高扬和 A. П. 斯米尔诺夫。这个委员会里只有一个人是代表斯大林集团的——米高扬,委托给它的任务是“不迟于2月15日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同时,也认为有必要在3月上半月听取国家计委和联盟商业人民委员部《关于1928—1929年度粮食运动的准备情况》的报告,建议“专门深入研究加强刺激提供粮食和收购粮食的办法问题”。1月26日,劳动和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⁶,这本身就证明了,党的上层对紧急状态的态度是动摇的。

2月2日,也就是还在斯大林回来之前,准备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日程上本来有“关于粮食收购”一项⁷。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审议被推迟到了有斯大林参加的下一次即2月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在记录上,“关于粮食收购”是第一项,注明了参见2月2日的会议和“第二次提出”。从记录上看,可以认为2月9日的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大范围的会议;出席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而且还有许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监委委员⁸。会议的材料里保存了 H. И. 布哈林的一个字条,请求“不参加政治局会议”,因为“7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开会”,而他“还有些东西需要准备”。李可夫的意见是“同意,但在预算之后”。看来是在考虑了这个意见之后,同意了请求⁹(“关于预算”一项在会议记录上是第2项)。

正如大家知道的,政治局会议的记录没有记载争论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看看2月9日通过的决定:

“成立由李可夫、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布哈林组成的委员会。

“责成委员会在星期六(2月11日)之前结束制定与粮食收购有关的日常指令的工作并在一个半星期之后向政治局提交在考虑到这次运动的基础上准备下一次运动的指令。

“由李可夫同志召集委员会会议”¹⁰。

2月9日政治局决定对委员会任务的表述是和上面提到的劳动和国防委员会1月20日的决议直接相呼应的。决定的文字显然是李可夫建议的,所以也是责成他负责召集委员会开会。但是委员会的组成情况预先就已经基本上决定了文件的内容是斯大林式的,对紧急状态的评价会有些保留,也会有一些限制紧急状态的具体建议。

委员会的资料中保存了一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文字,是斯大林准备的,有用铅笔修改和添加的地方,大多数是斯大林的笔迹,从所有情况判断,是在委员会讨论过程中做的。在可能是其他人提供的材料中,完整保存下来的,有一个布哈

林写的纸条,能保存下来只是因为在那个纸条上斯大林写了“继续”的字样,这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布哈林的声明。我们现在把这段文字全部摘录下来,因为这段文字直接写进了布哈林和斯大林“共同编写”的独特的指令里了,而且主要的是,它直接涉及到了新经济政策。为了把文字的作者区分开来,我们用斜体表示布哈林写的那几行:“有议论说我们好像要取消新经济政策,采用粮食征集制,剥夺富农,等等,这是反革命的胡言乱语,必须与之进行坚决斗争。新经济政策是经济政策的基础,而且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依然如此。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在国家保留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调节商业的权利和可能的条件下的商品流通和允许保留资本主义。没有这一点,新经济政策就会简直是意味着恢复资本主义,这是那些信口开河地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反革命所不想搞明白的。”¹¹

斯大林的草案(或者是斯大林集团的草案)赞成“那些中央指令中反映出来并在已经展开的收购运动中有所表现的非常措施”。这句话出现了一个新的结尾:“……其中的大部分可能只是对本收购年份仍然有效”。看来争论动了肝火,甚至前置词写错了都没有改正过来(“在”写成了“对”)¹²。

草案包括的一个指示说“……在推行指令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一系列的……歪曲和过火行为……”列举这些现象时甚至增加了这样一些“过火行为”,如“滥逮捕,非法没收余粮,等等”。委员会还添上了一个要求:“所有这些现象应坚决消除”。¹³

我们最后要指出一个具体的补充,它对粮食收购的实际做法和农村局势产生了严重影响。这就是禁止对“商品粮”储备少于2000普特的农户采用第107条。我们现在把指令的相应条款摘录下来,用斜体标出在李可夫和布哈林坚持下做出的补充:

“4. 继续对富农,确实掌握了剩余商品粮的大户施压,完全根据苏维埃法制施加这种压力(其中包括在实际做法上对掌握商品余粮2000普特及超过2000普特的个别残暴分子采用俄联邦刑事法典第107条和乌克兰法典的相应条款),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得用这些或类似措施触及中农”¹⁴。

我们还看到了莫洛托夫的直接证据,说明在斯大林的指令中加上这个限制是被迫做出的。这是促成3—4月份紧急状态有所减弱的因素之一,因为第一,它限制了使用第107条;第二,它符合地方工作人员基本群众的情绪。

李可夫委员会的工作于2月13日结束,根据政治局的材料,没有提出任何建议。没有人提起委托在一个半星期之后提交一份对未来的粮食收购的指令草案。

如果说2月13日关于制定指令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和后来的“右派”发生冲突的间接(虽然也是有说服力的)证据的话,那么在3个星期之后,他们之间就发生了一次更充分地通过文件反映出来的冲突。

1928年3月7日,为了确定1927—1928年的工业财政计划,A.И.李可夫把相应的建议提交给了政治局批准,这些建议受到了莫洛托夫的批评(他的背后是斯大林)。莫洛托夫批评说,计划草案提出的冶金企业的建设速度不够快。恼火的李可夫当时在会上就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了一个条子:“最近有一系列迹象表明,政治局的大多数人对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不满。今天爆发的分歧针对的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关于今年工业计划的决议问题。从这一切应该得出结论。只有在重大的基本问题上人民委员会及劳动国防委员会的领导和政治局的意见没有分歧的情况下,工作才能进行下去。我不能再继续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工作了。建议这样来分配力量,以便在最近的全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上进行必要的人员调整,把我派到乌拉尔去。”第一个回答的是莫洛托夫:“我认为李可夫同志提出的问题是根本不正确的。我认为没有人能够提出撤换李可夫同志的问题,因为这显然是荒谬的,而且无疑是不合情理的。就是在我的脑子里也从来没有过这样荒唐的想法,因为李可夫同志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比任何人都更好。但是我认为自己的发言无疑是合法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可能放弃在政治局里发言和严厉批评各人民委员部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的权利。分歧不在于基本问题上(在这方面是需要有统一思想的),而是在个别的、虽然是重大的具体问题上。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李可夫同志对整个问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布哈林没有直接支持李可夫,但是提出了一个程序问题:“我认为关于工业以及其他一些这样的问题最好事先(也就是在事先审议政治局的日程时——作者注)列入日程。不然我们就日程进行的争论会是各种(相对来说的)无稽之谈了,却不能防止出现今天这样的场面。我自己不能说在大众场合不搞争斗,但是我认为,更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基本投入,而不是根据总产量来计算工业化及其速度(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不只一次了)。”斯大林的回答是有意和解的:“我赞成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意见。错误在于没有在政治局开会之前先通气。”¹⁵

但是李可夫又写了一个条子:“随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我写的不是这个。我写的是我不再在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工作了,而且要这样做:1. 不参加最近召开的全会,2. 向全会的所有成员散发我的声明,3. 全会召开后我不

再到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来了。”这一次首先答话的是斯大林：“应该这样来办：我们大家应该聚一下，稍喝上一点，谈谈心。这样也就能解决所有误会了。否则，我宁肯同意调整政治局而不是在人民委员会里做什么变动。”布哈林也劝李可夫撤回最后通牒：“当然，不可能提出什么辞职的问题。在这方面应该更慎重些。应该谈谈了！”莫洛托夫简单地表示了支持：“该谈谈了！”“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谈谈，”斯大林总结说。但是李可夫还在坚持：“（我）看来已经证明了我是不会拿这些东西开玩笑的，而且在这以前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¹⁶

现在还不清楚，什么时候和怎样说服了李可夫撤回自己的声明。但是这个明显是由斯大林挑起的冲突显现了1928年初政治局的力量布局。

在讨论控制数字的时候，莫洛托夫和站在他身后的斯大林是主张强行搞工业化的政策的，这个政策在不久以后就成为了政治局内分裂的主要点之一。李可夫对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是信心十足的，他的最后通牒迫使斯大林不得不迂回和寻找妥协性的解决办法。政治局成立的委员会工作了很长时间，形成自己（不利于李可夫）的建议已经是在5月了，也就是在李可夫威胁着要提出自己辞职问题的四月全会之后。布哈林表示担心，说“我不能说自己在大众场合不搞争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和反对派进行的斗争最后结束后才过了几个月时间就处于进攻者的地位，这在政治上是最不利的。在政治局里和在进了中央的党的干部中间，普遍的情绪是期望“领导统一”和害怕分裂，随之而来的是可能发生的干部大换班。

这些情绪影响到了党和国家的上层在例行的中央全会召开前的表现，最初（2月16日）定于3月25日召开这次全会，但是后来（3月13日）又推到了4月5日。¹⁷在2月9—13日委员会工作期间，反对实行紧急状态的做法就已经可以看出来，随着全会的日趋接近，活动变得更加积极了，而且越来越明确地具有了法律形式。3月28日，俄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向地方下发了题为《关于粮食收购案件的司法处理》的秘密公文，其中解释说，“罚款应该严格考虑该农户的经济实力。作为一种社会保护措施，它应该是很能起作用的，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导致农户的破产（斜体是作者加的——作者）。此外还提出了，“已经没收的农户财产”——家庭用品，靠自己的力量从事耕种所必需的“牲畜和农具”——“应该归还”。在“与从事农活有关的”财产范围内，这个要求甚至也适用于“农村中的富农阶层”。¹⁸3月31日，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方机关下发了该总局系统中的主要局之一——秘密行动局——的公文《关于对苏维埃机构

在农村推行大规模运动时歪曲阶级路线的情况采取措施》。那里指出，“许多下层苏维埃机关曾采取了不正确的、往往带有专横性质的行动（殴打、动用武器威胁、驱逐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进行逮捕，等等），采用暴力逼迫缴出粮食和借债。”建议“特别注意所有类似的情况”和“追究犯有上述非法行为的人员的责任”，直至“在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实行逮捕。¹⁹

当然，这些公文能通过是受了春播季节临近、春播工作必须加以保障的影响。但是出现这些公文这个事实表明，农户实际上破产的规模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中央全会虽还没有准备取消新经济政策，但已经不能不谈到这个问题了。减轻对农民的压力应该能形成一种观念，那就是紧急状态作为一个插曲已经成为往事了。

上述公文是怎样通过并散发出去的，暂时还不清楚。但是从一切情况判断，由于中央全会日益临近，斯大林没有敢阻挠这些“反紧急状态”文件的出台。但是他也不打算放弃1月开始的紧急收购政策。3月26日，政治局通过征求意见，也就是说没有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粮食收购的决定》，这应该是对党和国家的上层的一个提醒。这个文件是斯大林起草的，它说：“通过斯大林同志商米高扬同志后提出的建议：西伯利亚应当完成原先确定的为中央征购6000万普特粮食的年度计划，不得对这个计划有任何加码或压缩。”²⁰原则上不能认为这个决议已经通过了，因为名单里列出的该参加表决的18个人中，真正参加表决的只有6个人，其中包括斯大林本人。征求意见是从18点15分到19点通过电话进行的。散发出去的摘录收件人是斯大林的手笔写上去的：“送米高扬和瑟尔佐夫（密码）”。²¹到全会召开之前剩下的这段时间，当然什么也干不成了，但是要干成的事不仅仅是赶时间。问题在另一方面：粮食收购通常应该是在4月初之前，也就是在基本的粮食产区开始春播时，就结束的，而3月26日的决议把征购粮食的期限延长到了计划任务完成时为止。下面就可以看到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这样提及计划的做法是仅限于对西伯利亚，还是以某种形式也向其他地区提出了类似要求，我们还不知道）。

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而且当时党的领导人中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在全会上就粮食收购问题发言，这表现出一方面斯大林集团没有把握，另一方面布哈林和李可夫也不愿意“当众打起来”。从形式上说，是不是在这一点上有什么协议，并不清楚，但是在表面上，双方都宁肯听听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也就是地方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以及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领导人的意见。“民主集中制”的体制是让集体领导的成员在通过决定之前自由发表意见的，甚至在

这种体制下,四月全会上进行的讨论本可以导致制定出一个摆脱粮食收购危机的积极规划的。但是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组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于斯大林了。有独立见解的活动家在这两个委员会里剩下的不多了,而且这在就粮食收购问题所做的发言里有了特别明显的表现,而这是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 1928 年 4 月 6—11 日联席全会工作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全会工作是从 A. И. 米高扬题为《今年的粮食收购和组织明年的粮食收购运动》的报告开始的。这个报告的特点是故意拖长,对其他问题(如工人工资的变化情况)做了烦琐的说明,把本来凑不到一起的评价和决定机械地放在了一起(就像 2 月 13 日的指令一样)。速记记录记下的会场上第一句插话是“你把我们搞糊涂了,米高扬!”,这并不是偶然的。既然报告和讨论都已经全部发表了,该文就不必对它们进行详细分析了。我们就只分析一下报告中决定了讨论进程的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论述,以及全会通过的决定。

报告起始的前提是:“今年收购的困难并不是像某些同志所想的那样,与我们的粮食太少,收成不好有关”。这是需要专门做些评论的。为了“论证”1927 年秋通过的“粮食收购计划是正确的”,米高扬又援引了 1927—1928 年度的谷类饲料平衡表,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证明了。我们在 A. И. 李可夫秘书处的档案里找到了一份“不准公开”的中央统计局的出版物《1927—1928 农业年度苏联谷类饲料预计平衡表》(莫斯科,1927 年)。在速记报告的《补充材料》中,列出了这个平衡表中的各个平衡表格(见补充材料 1)。中央统计局的出版物中有一个“解释说明……”其中指出了是用估算的办法得出的粮食饲料平衡表的大体数据的。这个说明提到了通过平衡表的情况,它反映出专家委员会的态度有很大摇摆,曾企图重新修改这个平衡表,也有来自上面的强大压力的明显痕迹。²²在对待农户中根本无法统计的、“看不见的粮食储藏”上,尤其是这样。这样也就可以随意在统计上进行夸大了。

A. И. 米高扬在 1926 年 8 月取代了 Л. Б. 加米涅夫担任苏联对内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他是积极参与了“统计作业”的人物之一。商业人民委员部在 1926 年 11 月 26 日提交了一份有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签字的报告,里面说到,根据《中央统计局最新的平衡表》,在收购年份开始时的看不见的粮食储藏是 1.987 亿普特。²³在收购结束之后,对这种粮食储藏的估计已经是 4.237 亿普特了。这样就在 1926—1927 年度里把农户中“看不见的粮食储藏”夸大到 7.208 亿普特了,而到了 1927—1928 年度则到了 8.964 普特(见补充材料 1)。

并不奇怪,实际上领导了粮食收购工作的人们没有接受统计上的神话,也没

有接受建立在这种神话基础上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国家支配的粮食要有 7.4 亿普特(比 1926—1927 年度多 0.5 亿普特),从中出口 1.95 亿普特(比 1927—1928 年度多 0.2 亿普特)。甚至米高扬在 1927 年 10 月 3 日的商业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上也承认:“……可能我们收不上来 7 亿普特的粮食,但是提供少于 6.6 亿—6.7 亿普特是不行的。”直接负责粮食收购的贸易副人民委员 И. Я. 魏采尔提出了比较现实的建议,把计划任务降低到 6.1 亿普特,但是被米高扬坚决驳回了:“如果你不能对中央统计局的数字提出异议,你就没有根据削减粮食计划。”²⁴好像当时商业人民委员部的人员还不能想象可能放弃新经济政策和采用“非常措施”,但是已经不敢对中央统计局向他们提供的谷类饲料平衡表提出争议了。而且很快,1927 年 10 月 24 日,在同—个苏联贸易人民委员的报告里,粮食收购的年度计划就已经确定为 7.8 亿普特了。²⁵

在统计上动的手脚有什么实在的意义,是后来在总结非常粮食收购活动时才显露出来的。П. И. 波波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他在 1928 年 11 月 9 日苏联中央统计局局务会议上做的《1927—1928 年度苏联国民经济行情》的报告中说:“……关于我们对看不见的粮食储藏的了解。这些看不见的粮食储藏是在去年采用非常多的措施的证据之一。1927—1928 年度我们确定的粮食储藏有 8.96 亿—9 亿。这样,我们在进入新的经济年份时,就是用储藏 9 亿做文章的,于是我们的整个经济计划就是依据这种情况制订的。但是,一方面是收购,另一方面是农业税,都提出了检查这些储藏的问题,而且正像你们知道的,第 107 条表明,这些储藏并不存在。于是专家委员会便着手修改(1927—1928 年的谷类饲料平衡表——作者注),根据平衡表的计算结果,去年储藏不是 9 亿,而是 5.29 亿,不是 8.96 亿而是 5.29 亿,而今年是 5.61 亿。这样,我们了解到的关于粮食产品的情况,对于储藏来说,完全是假设的,而且是完全夸大的了——夸大了 3.5 亿(普特)(更确切地说是 3.67 亿——作者注),当然这不可能有助于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路线。而且这并不意味着我是在放马后炮。我以前也说过这些情况。我从 1926 年起就不断地在专家委员会里说到过食品总产量和储藏的夸大情况。”²⁶

中央统计局档案库保存有供 1928 年 8 月 28 日专家委员会向苏联人民委员会提交报告时使用的材料,也证实了 П. И. 波波夫列举的数据(是 5.287 普特,不是 8.964 普特),但是解释得非常不充分:“产量多算了 1.42 亿普特,老百姓用做牲口饲料的耗费少算了 1.70 亿普特”²⁷。从什么地方又拿出来了 0.55 亿—0.56 亿普特(得出 8.96 亿普特的总量),并没有提到。

到1928年4月时,谷类饲料的平衡表完全不符合实际状况已经显而易见了,但是斯大林集团没有其他的理由再为紧急状态辩解了,于是米高扬在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不得不搪塞说:“当然,它们(平衡表的数字——作者注)并不完全准确,但是我们没有更准确的数字了。虽然绝对数字上可能有错误,这些数据正确地表现了变化的动态,因为一些年来它们多少是经过了实践的检查的。”而专家们(像П. И. 波波夫这样的)说的是另外的数字,“变化的动态”实际上的表现是,在最丰收的1926年以后,国家非常缺乏粮食。

斯大林式的活动家们从不会为逻辑而感到为难,所以在米高扬的报告里我们可以找到将因果关系倒置的情况:“今年的粮食总收成比去年少……用今年收成构成的储备要比去年少……所以我们认为,今年可以收购的不是比去年少些,而是多些。农民的贮备很难统计……”(从“不准公开”的谷类饲料平衡表上可以知道,甚至被夸大的储备按农村人口平均也要少6普特,这只能满足1/4的年消费量²⁸,也就是说勉强能达到需要的最低标准。)

在讨论时,并非出于偶然,在前面发言的人中间有B. П. 米柳亭,当时的中央统计局的负责人,他实际上是做了一个政治声明,用自己的权威重申了紧急收购粮食的政策,其中也包括了“看不见的粮食储备”在统计上的夸大:“……从经济意义上说没有发生过粮食收购上的过火情况,农民在进入新的经济年度时比去年有更多的粮食储备。这就是对明年的粮食收购来说我们非常珍惜的结论。”更有甚者,在谈到“收购办法”的时候,米柳亭批评了关于粮食收购报告的决议草案,说其中“整整一章说的是地方上对我们政策的歪曲”。而必须做的是该“完全明确和清楚地强调……党无疑拯救了我们的经济局势……否则我们在1月就要面临必须从国外进口粮食的局面了。”

一切是多么简单呀!9月采取了行动,事实上降低了粮食价格,一下子就改变了收购状况,米高扬在自己的报告里虽然是轻描淡写地,但还是提到了,说是“遗憾的是……调整……看来不是很成功的”,而米柳亭却是只字未提。但是当时,在1927年9月的时候,米柳亭对与谷类饲料平衡表有关的统计数字排列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安。档案里保存了米柳亭1927年9月3日《给联共(布)中央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便条,这个字条是因为“中央统计局根据8月的材料结束了谷类饲料平衡表”而写的。下面写到了“它的内容和由此产生的基本结论”。这种计算方法的内容基本上是和专家委员会提交的“预计平衡表”相吻合的。当然,从1927年的收成中得来的“农村储备积累”估计是1.43亿普特,不是另一种方案中的1.56亿—1.87亿普特(见补充材料1)。对于如何评价“统计局势”

来说,米柳亭的便条中主要的东西不是关于平衡表内容的信息本身,而是对实际状况做出了不安的评价,说到了必须要对这种状况做出解释。B. П. 米柳亭向中央写道,“从这些数据出发,不能不得出结论,我们在今年的粮食市场上将会有极其严重的困难”。同时,中央统计局的这位负责人不单是警告说将会有“困难”,而且还坚持要在最高层通过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由于今年的谷类饲料平衡表和粮食收购运动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有某些政治问题,适宜的做法是在政治局里听取有关它们的报告。”²⁹

中央统计局负责人关于谷类饲料平衡表的报告没有提交到政治局。而且也没有请 B. П. 米柳亭出席 1927 年 9 月 15 日的政治局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扩大粮食收购计划、继续出口小麦、实际降低价格等等决定。³⁰ B. П. 米柳亭的考虑没有被听取,而在四月全会上,他的发言不得不就像是不久前他根本不曾觉得有必要向政治局报告让他感到不安的问题一样。

不过, B. П. 米柳亭在全会上的发言无论是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在那里他不得不听到相当强烈的回答。刚刚上任的农业人民委员 H. A. 库比亚克对粮食生产的过高评价不能平心静气了:“米柳亭同志声明说,今年农村储备的粮食比去年多。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在许多地区征收的是原来储藏的粮食……我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拿那些已经被生活推翻的数字说来说去完全是危险和有害的……当然,农村是有粮食储备,我们没有把所有的都拿走,但是剩下的绝不会比原来的多,因为即便是剩下的多,我们也会根据第 107 条收走的,因为……粮食收购计划还没有完成呢。”

(在这套书的后面一些卷里,我们将能找到更多的对 1927—1928 年度粮食饲料平衡表更为消极的评价。)

米高扬的报告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 1928 年 4 月的主要文件,我们回到这个报告上来时,要指出和如何评价粮食收购的实践和前景有关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由于不是完全有把握能得到全会无条件的支持,在对农村发生的情况,首先是对“粮食收购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做出解释时,典型的做法是模棱两可。其中属于“第一类”情况的是所谓的“非常性的措施”,报告人算做这一类的是“采用第 107 条和广泛动员党的力量”:“在困难没有完全排除时不得不采取”它们。属于第二类的是“正常的,但是是用非常的办法推行的”措施:捐献、农民公债和“从城市里投放商品”。这些措施之所以具有特殊性,是“由局势造成的——在很短的期限内要用公债和捐献的办法提取大量的钱财”。最后,第三类措施——“扭曲和过火,这些措施在实际做法中是有的,但是没有包括到

中央委员会一系列建议里来。不过它们是产生于我们制造出来的**局势**的,是这种局势的任务产生的,是巨大压力的局势产生的。”“过火和扭曲”是怎么出现的,报告描写得相当准确。承认了“完全令人气愤的、我们正在排除而且也是应该排除的实际情况”。但是同时也指出了“在具有这样压力的局势下,那些事实也就不那么令人气愤了。”不希望它们出现只是因为它们带有了“普遍性(!),有可能会发生重大的政治危险”。

1928年4月,斯大林式的领导还没有胆敢对“过火和扭曲”的发生完全说谎,而是把全部责任推到地方工作人员的身上,而在他们中间又是推到直接执行任务的人身上,就像后来斯大林在著名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1930年3月)所做的一样。米高扬承认了“过火和扭曲”是来自上面的压力的结果,但是不是把必须对它们进行“坚决斗争”和必须改正政策联系在一起,而是和“农民心理”的特点联系在一起了。他解释说,“我们应该和过火行为和歪曲做坚决斗争,因为农民对坏事总是喜欢了解得越多越好,而且久久不会忘记它们。”原来所有的过错都在于遭受暴力的那些人的心理,而不是“过火和扭曲”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暴力本身。

联系到这一点,一段关于法庭和整个司法作用的对话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

“米高扬: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由于‘农民心理’——作者注)北高加索委员会决定对两个前所未闻的令人发指的事件采取了坚决措施,直至对两名工作人员采取了最严厉的惩罚措施是正确的。

“柯秀尔:这不是北高加索委员会决定的,是法院决定的。

“米高扬:当然是法院决定的,但是法院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所有极其重要的问题都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决定。

“臧声:克雷连柯会怎么说呢?

“米高扬:他会不说话,因为他已经是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不可能维护法庭对党的独立。”

“过火和扭曲”受到谴责仅仅是因为它们在“广为传播之后,使得我们和农民的基本群众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和“应该比以前更坚决地进行和富农的斗争……”的要求结合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在农村采用暴力的方针至少要保持到能够“安排好正常的收购过程”时才能停止。

当然,正是由于粮食收购的紧急和“过火”情况的发生,出现新经济政策命运的问题就不是偶然的了。根据米高扬的说法,“农村中的富农分子……他们在城里的应声虫,而有时甚至是一些党员……说:‘中央取消了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没有了’，你们搞的不是粮食收购，而是粮食挖掘，不是贸易，而是征集制，不是和富农斗争，而是让富农破产，等等。”普通党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对在农村使用暴力提出了抗议，对他们已经开始在党内进行迫害了，但是报告人把对非常状态的批评以及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命运问题和“富农”及其“应声虫”联在一起，也就排除了提出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米高扬的报告里实际上找到了第一个正式证明：通过粮食收购可以“大规模地检查和清理我们的工作人员，把阶级异己分子和堕落的人们赶出去。中央监察委员会也在继续清理，但是我应该说，粮食收购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夺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饭碗……我们只是通过全党的触角才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认为有数千人已经被开除出党和受到了惩罚。这是收购工作非常重要的结果。”可以证明米高扬的这种说法的，是乌拉尔州的材料，1928年1月莫洛托夫在那里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就有1157名地方工作人员被解除了工作，其中有许多人被开除出党并送上了法庭。³¹我们希望米高扬的证词将能唤起在地方档案馆工作的研究人员拿出属于迫害开始阶段的那些材料来。

关于新经济政策实质和它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位置的争论是在四月全会之后展开的，主要参加争论的人是布哈林和斯大林。但是在米高扬的报告里已经有了对新经济政策解释的轮廓。那里说到，国家走的是“新经济政策路线，……农民也将沿着这个路线和我们一起前进”。但是“新经济政策也规定了要取消新经济政策”，因为它提供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它的使命本来该是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接着就声明了“问题只是要限制这个新经济政策的比例，要限制新经济政策的调节措施和使其服从于无产阶级国家，让分散的农民经济和私人资本就范。”

米高扬是在自己反驳自己，因为让农户服从于国家正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特征，这也就意味着放弃了保障他们能在市场条件下得到有机的发展和实行合作制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在四月全会上没有进行过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辩论。它是在后来的几次中央全会上才成为了中心问题的。1928年4月6—7日在讨论米高扬报告时，发言的人只限于谈粮食收购这个题目了，而且几乎完全是实际的工作（还有些就是像米柳亭那样的政治声明了）。

在解释粮食收购到1928年4月1日时的结果和最后完成这些收购任务时，米高扬的报告也有同样的两重性。通报说，粮食市场受到了破坏（像报告人说的，这是“由于私人成分收缩了”，实际上主要是由于农民停止了在城市市场上出售粮食），在新的一年里，国家收购中用于国内消费的粮食要增加1.2亿普

特,于是全会面临的事实是,需要继续执行紧急状态——要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乌克兰应该成为榜样,1928年1—2月莫洛托夫在那里教授了该如何推行紧急状态的一课。³²我们来引用米高扬报告速记稿中的一段,它表明了在全会上这个主要的问题是怎样提出的:

“米高扬:党在乌克兰所做的努力将能保证那里的收购过程不仅能完成粮食收购计划,而且能够有些超额地完成这个计划。乌克兰的组织为此承担了责任。他们承担了有些超额地完成计划的责任。

喊声(来自乌克兰人的坐席):根本不是这样。

米高扬:至少乌克兰贸易人民委员切尔诺夫同志承担了这样的义务、这样的责任,并且通知说,乌克兰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了这个计划。中央这方面通过了决议,要专门鼓励乌克兰人……。

卡冈诺维奇:现在什么鼓励也没有得到。

米高扬:这件事正在准备中。”

下面就是一些地区的名单了,一些是“很难,但是在大大加紧的情况下有可能把失去的补上来”(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一些是有完不成计划的危险”(乌拉尔);最后还有的是“未必能完成全年计划”(巴什基尔,鞑靼和伏尔加河流域)。对所有粮食收购地区主要的要求是保持和甚至要加强紧急状态:“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大,我们应该更紧张地工作,从4月到7月*要征集到比去年多得多。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又要面临粮食收购的危机了。”

就是这样,一直到报告结束时,提出的要求还是在粮食收购上“要有革命的纪律”,但突然好像转到了一个内容相反的结论:“在这次全会上,我们应该在经济和组织方面准备好,在新的运动中不至于采用非常措施,因为不能再像今年这样收购粮食了;收购它的不是收购单位了,而是整个党,每个党的委员会……都成了收粮司令部。这当然很好,但是我们不可能长久地这样生活,这可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持续2、3、4个月,也许还要继续5个月。”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在做了肯定的同时又做了否定,从一切情况看,也只有报告人能有这种本事。主要的和多次重复的要求就是要继续按非常的方式收购粮食,直至完成农村无法承受的计划——包括要持续到7月份,也就是还有3个月——跨进新的收购年度一个月(我们看到的是,还不

* 通过检查由米高扬签字的速记记录确认,说的就是7月³³,虽然按照已经形成的传统,7月该开始从新收成中收购粮食了。——编者注

能排除要用5个月的时间)……

对米高扬的报告的讨论都是些具体的补充和解释,甚至在紧急状态被无条件地否定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例如,П. П. 波斯特舍夫就声明说“完完全全同意米高扬同志的意见、要继续像今年我们这样地收购粮食当然是不行的……”但是自己又没有提出任何建议。В. Я. 丘巴尔的发言很带有批评性,说到“粮食收购进行的环境……会助长反苏维埃情绪^①的发展,而且我对这一点的看法是悲观的……我们应该再施加压力,应该再在乌克兰收购0.21亿(普特)。商业人民委员部给我们下达了4月份计划,是0.15亿普特,也就是到年底还剩下的那0.21亿普特中的一部分。完全是一个发疯的计划,因为当农民在播种的时候,是不能去触动他,让他把粮食运出来出售的……”另外一些参加讨论的人也是按这样的精神发言的,但是谁也没有敢超过提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谁也没有提出“关于总路线”的问题。

1928年4月11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的《关于今年的粮食收购和组织1928—1929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的决议》是非常一般性的和抽象的。保存在档案里的“经莫洛托夫、布哈林、米高扬同志修改和补充”的决议草案³⁴(这个草案实际上全会没有修改就通过了)可以说是一个妥协的文件,同时既赞同了采取非常措施,包括采用第107条,又谴责了过火行为,包括“没收余粮(完全不按照司法手续地运用第107条)”。宣布了“在加强粮食收购工作方面保证了极大的胜利”,同时又让“各级党组织注意”4—6月(而不是米高扬报告里说的4—7月)“为了完成计划,还要比上两个年度同期收购更多的粮食和油料”,他们还应该“毫不放松地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收购运动”。这些要求的调子变得缓和了,这完全不符合斯大林领导集团的心态。

四月全会就当时的主要问题做出了妥协性的决定,这和党的上层真实的状况是格格不入的,拴住了对立方面,特别是当时在管理机构里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方面的手脚。随着全会工作的结束,看来“不当众打架”的协议也就失效了。4月11日举行了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而4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布哈林在列宁格勒,就都在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做了关于这次全会工作结果的报告。两个报告都在《真理报》上于4月18和19日接连发表了,然后都出了单行本。本卷的《补充材料》把它们都重新全部复制发表了。所以,只限于最简短地评述一下这些报告内容里的主要几点也就可以了。

^① “情绪”一词在速记记录原文中为“组织”。——译者注

照斯大林的看法,对粮食收购危机的解释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已经成长和强健起来的富农在反对苏维埃政权,而“沙赫特案件”(第一次对“破坏分子”的审判)证明了技术知识分子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他们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用斯大林的观点看,所有困难都不过是敌人造成的。“我们有国内敌人,也有国外敌人。同志们,这一点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斯大林对国内发生的事所做的概括结论就是这样表述的。与此相适应的克服困难的手段便是无情地消灭“阶级敌人”,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富农。新经济政策是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正在形成的国民经济制度,但斯大林的报告根本就没有提到这样的话题(见补充材料3)。

布哈林在分析同样现象时把重点放在了政权工作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上:“我们知道,经济影响的一些最大杠杆掌握在我们手中,只要我们将来不犯大错误,占有这些杠杆就会使我们在国内关系方面是不可战胜的。富农首先是当它能利用我们的错误的时候才是一支危险的力量。”他认为,1928年冬季的教训就在于它弄清了管理社会的缺点——也就是“我们自身”的缺点。由此而来的就是两种不同的抉择了:在与富农作斗争中采用暴力的斯大林路线(如果他们没有,就借助于非常措施和“沙赫特”那样的“事件”把他们制造出来);完全和依仗行政手段和主观意志的方法相对立的是布哈林的路线,那就是要完善党和国家的工作,根据主客观条件成熟的程度,在保留和完善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

布哈林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对于他来说,阶级斗争仍然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个因素,但是他看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经济”基础,看到了社会的调节必须通过经济:“通过经济形式,通过市场,通过商品量,通过对这些商品量的调节,通过对这些商品量的占有,通过生产关系以及通过市场关系……”(见补充材料4)。这也就是作为国家政策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两种根本不同的立场第一次得到了公开的阐述,但这并没有被引申到修改党和国家的政策。相反,斯大林的讲话成了发动新一轮“紧急状态”的思想根据,它更具有破坏性,在春耕时节引起了农民抗议的急剧增长,同时也更加剧了党内斗争。4月19日政治局做出制定新指令的决定,要求地方组织“增加收购任务”和召开地方代表会议制定“措施计划”。³⁵

4月24日,中央召开了“关于在1927—1928年度第四季度加强粮食收购”问题的地方领导人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是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议的速记记录已经公布了,其中首先确定了中央对地方当局提出的要求。例如,伏尔加河沿

岸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主席发言的结尾是这样说的：

“库尔茨：我应该说……120万普特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410万普特的粮食收购任务……我们认为30万普特是我们从我们的农民那里能够挤出来的最高极限了。

“莫洛托夫：只有30万吗？要是知道这样，我就不让你发言了。

“库尔茨：我有责任在这里声明，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可悲的。

“莫洛托夫：你说的话不能不交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了，你怎么才拿了计划的四分之一！”

“库尔茨：如果完成计划的惟一出路是把所有人的讲话都交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那么看来也得把我的讲话交到中央检监察委员会去了。

“莫洛托夫：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大家，而是你。”

我们也引用一下А. И. 米高扬在结尾时对所有与会者所说的典型的、带有威胁的话：

“你们要记住，如果不改正的话，就不能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了。要知道，已经明确确定了，粮食是有的……如果我们用软措施拿不到，那就只能是采用更严厉的措施了。”

说到在农村又要施加“压力”时，地方领导人说了不少话，说到不可避免会出现过火行为，特别是对粮食储备低于标准的1800普特的农户，甚至对储备在700—800普特以下的农户，也就是说对中农农户，都要动用第107条了。对于过火行为，B. M. 莫洛托夫在结束语里有这样的议论：“至于说到中央派了很多人去检查过火行为，不能说这种情况很多……我们不可能去扩大107条的使用范围。相反，我们公布了决定，可以对有2000普特储备的农户采用第107条。但是我不记得有过中央为违反这一条追究过哪怕一个地方机关。”莫洛托夫对自己关于过火的议论补充了以下的说明：“我们绝对反对的只有一个措施——那就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抬高价格”。³⁶所以，所有其他的措施都是可以允许的，甚至如果在官方语言里它们被称做是“过火和扭曲”。

政治局1928年4月25日通过的《关于加强粮食收购的指令》实质上是重复了1月的那些指令的论据和要求。“有破坏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危险”的责任落到了地方组织的身上，那里“不愿搞动员的情绪有所孳生，不是无条件地进行必不可少的消除过火行为，而是完全放弃了对农村上层施加压力的措施”等等。仍然是指示要“无条件地、毫不延误地推行”从“准确地完成5—6月份的月度征购计划开始的”指令，“动员党的力量”；“加强对富农和私有者的压力”，等等。³⁷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消除由“沙赫特案件”暴露出来的缺点的实际措施的报告。⁴³3月9日,受政治局的委托,李可夫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全会上讲了话,通报了“顿巴斯沙赫特区的反革命阴谋”。按研究人员的意见,李可夫的讲话特点是有一定的节制性⁴⁴。奥尔忠尼启则最后的声明也证明了李可夫的担心:“李可夫同志在‘沙赫特案件’时非常坚决地反对中央委员会当时提出的关于建立自己的技术干部的方针。我记得,他来参加政治局会议,带来了一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中关于专家的语录并开始证明,我们建议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没有资产阶级的专家是不行的,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等等。”⁴⁵

李可夫是什么时候在政治局发表了这些声明的,还不能准确知道。可能是在4月6日审议全会决议的时候,当时李可夫就像他在全会上的报告里表达的,“我从政治局取得了就决议草案其中一个章节阐述两个观点的权利,这就是与红色专家以及高等院校有关的章节”。但是不能排除李可夫在以前也表示过某些怀疑,他的(还有什么人的)立场迫使斯大林要有些迂回。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1928年3月13日,也就是在报纸上公布了最高法院公诉人的通告,其中就像是已经准确确定的事实一样,说到了揭发出一个“以破坏组织和破坏石煤工业为目的的反革命组织”的当天,政治局通过了决定,把全会推迟到4月5日召开并派中央委员会全权代表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到顿巴斯去。给他们提出的任务是熟悉当地的情况并为政治局的“沙赫特案件”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材料。特别要指出的一个情况是,这个决定的措辞是斯大林写的,表决是通过询问进行的。⁴⁶

如果斯大林和李可夫之间的确在“沙赫特案件”上存在一定分歧的话,那么委员会的组成是有利于斯大林的,——莫洛托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是站在他这边的人。李可夫确实可以寄希望于托姆斯基。但是这些希望(如果有过的话)并没有能实现。托姆斯基更大的可能不是在向斯大林送秋波,而是由于自己个人的信念,主张要再搞一场运动。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3月29日刚刚从顿巴斯回来的托姆斯基和伏罗希洛夫看来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纸条。

“伏罗希洛夫:你一个人来的?去了哪些区,简单说两句你的印象。”

“托姆斯基:我兜了一圈:在沙赫特区去了两个矿井,下到了井下;到了鲁克斯克,阿尔切夫斯克,卡基耶夫卡——也下井了,去了制苯的工厂。到处都在骗我们!工程师在欺骗,经营人员在欺骗,都在欺骗。我们的建设计划是法国人认准的,只有工人们在运煤和相信我们。”

“伏罗希洛夫:米沙!说实在的,在开庭审理时我们不会陷到“沙赫特案件”

里去吗？在这个案子里，地方上的工作人员没有做得过火了吗，特别是边疆区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

“托姆斯基：在沙赫特案件上以及在整个煤矿案件上没有这样的危险，因为情况是清楚的，主要人物都承认了。我的意见是，不妨再关押几十个共产党员。”⁴⁷

伏罗希洛夫的怀疑让我们可以推测，他也可能会要求向顿巴斯派去专门的检查组和在这个问题上和李可夫构成统一战线（间接可以证明这种推断的还有一个事实，就是3月15日伏罗希洛夫也被列入了政治局关于“沙赫特案件”的委员会成员）。托姆斯基的回答可以部分地解释正在展开新的政治运动的苏维埃领导的情绪。

工业，特别是它的煤炭部门处境不好。令人发指的无人经营的状况让人怀疑国家新的主人是不是有能力有效地管理经济。严峻的生活条件，生产上频繁发生的、伴随着重大人员伤亡的事故，都在加剧社会的紧张气氛和反政府情绪的增长。1928年初，粮食供应断档越来越多，由于当局企图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降低单价和提高标准，强制性地发放所谓的“工业化公债”等等，越来越加剧了这种状况。企业的反应是抗议行动越来越多——从递交集体抗议书和“消极怠工”到罢工。大量失业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严重因素。莫斯科知道工人中间传播着反政府的情绪，联共（布）中央新闻部的通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⁴⁸

国家领导没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和向那些按托姆斯基的说法是“运煤和相信”的工人们提供起码可以忍受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但是，把那些好像是对工人的灾难有罪的、臆想中的“敌人”抛出去任人宰割并不复杂。与此同时，无疑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工人和专家们之间总是存在着紧张的冲突。但是，如果说新经济政策宣布了要关心专家和与所谓的“敌视非党内专家”现象作斗争的话，那么现在就是事实上开了“绿灯”，让工人不仅可以从精神上侮辱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而且可以从肉体上进行镇压和施暴。

这里公布的全会速记稿反映出了苏维埃领导人对“沙赫特案件”的心态，表明了由于客观的困难和当局昏庸的政策，在工业上产生了工人们的所有灾难，而他们打算要把责任都推到“有害分子”的身上。农村里的粮食收购失败了，政府宣布说，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是富农怠工的结果，而上述这些打算则是农村新政策的一种写照。

在全会上审议“沙赫特案件”的基础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制造的侦查材料和到事件发生地点出差的莫洛托夫、托姆斯基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正像

李可夫说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得到了所有这些文件和全会的决议草案。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里,四月全会本身的卷宗没有保存李可夫提到的那些材料。至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材料,从一切情况判断,是3月根据政治局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南部煤炭工业区的经济反革命》呼吁书(见补充材料2)一起散发的那些文件。托姆斯基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稿没有能找到。莫洛托夫正像他自己在全会上声明的,事先没有提交自己的报告,事实上是在全会上发言时把这个报告公布于众的。

在四月全会上讨论“沙赫特案件”给党的领导提供了一个理由来宣布“排斥”老专家和加紧用“无产阶级的干部”取代他们的方针。但是在全会上,这些问题没有引起实质性的分歧。就日程第二项做主旨报告的李可夫表示完全相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及莫洛托夫、托姆斯基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调查,甚至批评了那些“认定对这个事件有人为‘夸大’”的“同志们”。同时不能不指出,李可夫持一定的审慎态度,还有就是他引证了列宁的话(看来就是奥尔忠尼启则提到的那些),号召不要再“重新审议党对专家们的原则态度和使用他们的方法”(未查到原文)。莫洛托夫的发言却可以看成是在隐蔽地和李可夫争论。莫洛托夫也从列宁的著作里收集了语录,为必须改变对专家的态度找到理论基础——从利用他们的“资产阶级”方法(高薪、奖金,等等)转向“无产阶级”方法(“全民登记和监督”、降服和吸引专家)。

既然在这个时期莫洛托夫是斯大林最坚决和忠实的拥戴者,而且往往说的是斯大林自己不想当众说的话,那么就可以断定,莫洛托夫的发言里需要的那些语录和论据是斯大林提供的,斯大林在自己的发言里宣布了“沙赫特案件”是“经济反革命”,“西欧^①反苏资本主义组织的经济干涉”,是取代“军事、政治干涉”的。

斯大林和李可夫(托姆斯基是支持后者的)之间的公开争论在全会上只是发生在一个相对局部的问题上:对几个高等技术学校的管理是不是要从工业人民委员部转到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斯大林支持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人,建议作为实验,把2—3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他们管理。在李可夫的压力下,全会决定把这个问题转到专门成立的委员会再进一步讨论。但是在后来的七月全会上就已经决定把一大批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了。

^① 原文如此。速记记录中是“西方”。——译者注

相对次要的关于高等技术院校问题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既说明了四月全会本身的意义,也说明了1928年春天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已经尖锐化的国内局势要求做出一定的决定,但是苏维埃最高领导在兜圈子。四月全会只是记录了这个时期的关键问题,没有去触动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性。在谴责非常措施的同时,决定了必须完成粮食收购的年度计划,这就需要在4—6月极大地提高收购的速度。警告说不能允许搞“敌视党外专家”并声明要继续执行和“资产阶级专家”合作的政策,但又号召提高警惕和寻找还没有揭发出来的“危害分子”,结果是前者被搞得没有任何价值了。政治局委员们感觉到了日益加剧的矛盾,都在盯着局势的发展,担心过早地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从而充当了破坏“统一”的角色。基本的政治事件是在以后才发生的。

В. П. 丹尼洛夫, О. В. 赫列夫纽克

注 释

- 1 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1927年5月—1929年11月,莫斯科1999年版,第26、28、100—102页。
- 2 见《布哈林选集》,莫斯科1988年版,第323—340页等处。
- 3 Taniuchi Yuzuru. Decision-making on the Ural-Siberian Method. Soviet History. 1917—1953. Essays in Honour of R. W. Davies. London-New York. 1995. p. 78—103; И. П. 伊孔尼科娃、А. П. 乌格罗瓦托夫著:《斯大林进攻农民的演习》,载《苏共历史问题》,1991年第1期,第68—81页等。
- 4 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1927年5月—1929年11月,莫斯科1999年版,第34页。
- 5 同上书,第165—167页,187—190页。
- 6 同上书,第192页。
- 7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71号案卷,第1张。
- 8 同上,第163号目录,714号案卷,第1、6张。
- 9 同上,第7张。
- 10 同上,第9张。
- 1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3号目录,715号案卷,第53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5—16页。
- 12 同上,第54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5页。
- 13 同上,第54—55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6—17页。
- 14 同上,第55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7—19页。
- 15 《苏联领导通信集(1928—1941)》,莫斯科1999年版,第15—16页。
- 16 同上书,第23—24页。
- 17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3号目录,715号案卷,第41—42张;720号案卷,第38张。
- 18 《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1927年5月—1929年11月,莫斯科1999年版,第228—230页。
- 19 同上书,第230—231页。
- 20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3号目录,722号案卷,第49张。
- 21 同上。
- 2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46号全宗,55号目录,1618号案卷,第142—143张。
- 23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2号案卷,第13张。

- 24 《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1927年5月—1929年11月,莫斯科1999年版,第93—94页。
- 25 同上书,第99页。
- 26 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1562号全宗,1号目录,533号案卷,第24—25张。
- 27 同上,第1562号全宗,72号目录,187号案卷,第2—3张。
- 2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46号全宗,55号目录,1618号案卷,第162张。
- 29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2号全宗,2号目录,1453号案卷,第42—43张。
- 30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3号目录,661号案卷,第1、5、22张;《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1927年5月—1929年11月,莫斯科1999年版,第88页。
- 31 见Г. А. 利莫诺夫著:《1927—1928年乌拉尔的党组织为争取克服粮食收购中的困难而斗争》,载《乌拉尔工学院著作集》第86号,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57年版,第106页。
- 32 见B. M. 莫洛托夫1928年1月25日向联共(布)中央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做的《关于就粮食收购问题到乌克兰、乌拉尔和巴什基尔出差的报告》——《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1927年5月—1929年11月,莫斯科1999年版,第172—192页。
- 33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39号案卷,第30、86张。
- 34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38号案卷,第16—21张背面。
- 35 《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1927年5月—1929年11月,莫斯科1999年版,第236页。
- 36 同上书,第1卷,第237、250、256、259、260页。
- 37 同上书,第261—262页。
- 38 同上书,第270—272页。
- 39 详见C. A. 基思利钦著:《沙赫特案件。斯大林对苏联科技知识分子迫害的开始》,顿河上的罗斯托夫1993年版;H. 库罗米雅著:《沙赫特案件》,载《东南欧追踪》1997年4/2,第41—42页。
- 40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6号案卷,第36张。
- 4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6号案卷,第37—38张。
- 42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1782号案卷,第6—8张。
- 43 同上,第2张。
- 44 C. A. 基思利钦著:《沙赫特案件》,第26—27页。
- 45 《K. Г. 奥尔忠尼启则言论集》第2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231页。
- 46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3号目录,720号案卷,第38张。
- 47 《苏联领导通信集(1928—1941)》,莫斯科1999年版,第28页。
- 48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85号目录,307、311号案卷。

目 录

总序 1928—1929 年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速记记录: 结合时代的历史原始资料·····	B. П. 丹尼洛夫(1)
序 1928 年四月全会·····	B. П. 丹尼洛夫, O. B. 赫列夫纽克(1)
1928 年 4 月 6—11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 速记报告 ·····	(1)
第一次会议·····	(4)
第二次会议·····	(49)
第三次会议·····	(100)
第四次会议·····	(146)
第五次会议·····	(189)
第六次会议·····	(225)
第七次会议·····	(279)
第八次会议·····	(322)
附 件 ·····	(333)
1. 1928 年 4 月 6—11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记录№2·····	(333)
2. 关于今年的粮食收购和组织 1928—1929 年度的粮食 收购运动 1928 年 4 月 11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根据米高扬同志的报告一致	

通过的决议	(338)
3. 1928 年政治局和中央全会工作计划 1928 年 4 月 11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 全会批准	(345)
4. 沙赫特案件和与经济建设的缺点作斗争的实际任务 1928 年 4 月 11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联系全会根据李可夫同志的报告一致通过的 决议	(347)
5. 米高扬同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 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报告《今年的粮食收购和组织 明年的粮食收购运动》图表	(356)
6.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主席团	(364)
补充材料	(366)
1. 苏联 1925—1926、1926—1927 农业年度粮食作物 平衡表和 1927—1928 农业年度粮食作物预计平衡表	(366)
2. 关于南部煤炭工业区的经济反革命	(370)
3. Н. В. 斯大林 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	(439)
4. Н. И. 布哈林 粮食收购工作和沙赫特案件的教训 与党为落实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四月联席全会结论承担的任务	(458)
注 释	(481)
人物简介	(499)

绝 密

按密件存放
用后归还
禁止复制

1928年4月6—11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速 记 报 告

第一期

原编号No2700c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28年4月6—11日
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
会 议 程

1. 今年的粮食收购和组织明年的粮食收购运动
(米高扬同志)
2. 政治局消除由“沙赫特案件”发现的缺点采取实际措施委员会的报告
(李可夫同志)
3. 政治局和中央全会工作计划
(莫洛托夫同志)

第一次会议

4月6日晚间

鲁祖塔克：同志们，建议全会会议开会。有没有反对意见？

喊声：没有。

鲁祖塔克：建议由李可夫同志主持这次全会。有没有反对意见？

喊声：没有。

主席（李可夫）：同志们，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建议这次全会联席举行。有没有反对意见？

喊声：没有。

主席：建议通过。日程大家都知道了吗？

斯克雷普尼克：我建议日程加上一项，即“苏联土地安排和土地使用的基本原则”。这是重中之重的首要问题。这是一个应该确定和更正我们在联盟的所有组成部分的土地政策路线的问题。当然必须而且希望能在全会上提出和讨论并在全会上通过。当然，政治局打算在例会的讨论中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一次例会上通过。但是，在苏维埃机关里的任何讨论都不能代替党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上对这个问题的检查。政治局通过的草案¹对存在的对应关系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所以就更有必要提出来在中央全会上讨论。这是需要在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讨论并得到裁定的草案。它规定了新的条款，认为随着联盟的建立，加盟共和国对土地的所有权利都要转移给苏联。

喊声：对。

斯克雷普尼克：我不是说对还是不对。这是一个新的条款，需要中央全会详细讨论。这是一个需要得到中央全会裁定的条款。因为这个草案用这种新的提法确定了要把加盟共和国从苏联宪法第3条保障了主权的大国变成「阳痿的」大国in potentia，人们甚至会说是**有气无力**的大国。（笑声）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不

能绕过的,我认为,既然政治局的这些建议改变了此前党内通过的那些建议,那就一定和必须把这个问题拿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讨论。

李可夫:同志们,政治局基本上批准了土地安排和土地使用的草案。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政治局决定在最近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上做关于草案的首次通报和进行第一次讨论,以便让它能够得到广泛的讨论,而批准这个草案推迟到秋天进行,中央全会还有时间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觉得,适当的做法是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在下次全会上,当大家都了解草案并知道我们要谈什么的时候,提出自己的建议来。

斯克雷普尼克:我不反对这样做,我同意。

李可夫: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撤回了自己的建议。

斯克雷普尼克:您自己提出了这个建议,可是说是斯克雷普尼克提出的。我同意您的建议。

李可夫:[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没有讨论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涉及的问题的材料。是不是把它列入联席全会的日程呢?]既然已经决定把这个问题推迟到秋天,我建议取消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关于在这次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建议,建议他在下一次全会我们决定时提出来。现在表决:谁同意斯克雷普尼克的建议?谁同意我的建议?通过。

请米高扬同志就第一项目程发言。

今年的粮食收购和组织明年的粮食收购运动

米高扬:在报告今年粮食收购的基本问题和为保障明年的收购运动需要采取的措施之前,我想说的是,今年收购的困难并不像某些同志所想的那样,与我们的粮食太少、收成不好有关。为了排除今年的这个因素和论证中央和苏维埃机关通过的粮食收购计划²是正确的,我想举出一些粮食饲料平衡表的数字来³。当然,它们并不完全准确,但是我们没有更准确的数字了。虽然绝对数字上可能有错误,这些数据正确地表现了变化的动态,因为一些年来它们多少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

今年的粮食总收成比去年少1.2亿普特,比前年多1.1亿普特。这是第3年的收成,在这些年里,农民有了积累,从这种情况出发,我们认为,农民需要用今年收成构成的储备要比去年少。去年大体上有3亿普特左右用于了农民的储备,我们认为,今年用得要少些。所以我们认为,今年可以收购的不是比去年少

些,而是多些。农民的储备很难统计。既然我们对国家的储备都不大了解,那就难于了解农民的储备了。但是专家们得出的数据说明,这些储备到去年农业年度初时是4.23亿普特,而到今年年初时是7.2亿普特,增加了3亿。这样就是6亿—7亿普特,专家们认为大体上相当于战前储备的标准了。当然,这些储备的多少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因素:如果有特别好的推销条件,如果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刺激把粮食抛向市场,或者有能够迫使农民减少自己储备的征税,储备就有可能减少。如果所有这些条件都没有,那就会相反,储备就会增加。一句话,这个量是变化的,因为我们在有保险性质的储备外,还有商业投机性质的储备,为期待更好的销售行情而构成的储备。

虽然有第三个丰收年⁴,虽然农民有了相当多的粮食储备,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还是特别注意了粮食经济问题,这是正确的⁵。这是由于我们处于十月革命后的第11个年头。在整个经济总的恢复到了超出战前水平的情况下,粮食的出口和战前的7亿普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去年是1.24亿普特,而甚至在1923—1924年度我们的出口还是1.64亿普特呢,也就是说在后来的这些年份里,我们粮食的出口甚至落后于1923—1924年度。另一方面,如果说到粮食的播种面积,那它是战前的92.2%,而同时的技术作物和集约作物的播种面积则是战前的130%。我们的粮食生产明显落后于所有农业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

在接下来谈到这个收购年度的上半年收购不成功的原因时,应该指出的是,在这半年里,我们的粮食收购有过很大的摇摆:在前一个季度,7月至9月,收购是在高于去年的水平上进行的,而在后一个季度,10月至12月,急剧下降了,只达到了去年水平的一半,这也就意味着粮食收购有了危机。

基本原因是什么呢?在研究这些原因时,我们这里有时分出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或者是提出经济的原因和“机构的”原因。我认为,这样区分原因未必是正确的,也未必是可能的,因为许多称之为客观的东西是取决于主观的——取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政策和领导。例如,如果我们在当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改变个别的社会经济成分的对应关系,那客观形成的经济行情就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了。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原因也分成“机构的”和经济的了。当然,如果对“机构”的理解不仅是收购机构,而且还有整个经营机构,再把党的机构也加上,那么,需要把大多数原因都算是机构的原因,机构的错误,就是绝对正确的了,因为经营机构和党的机构有能力在行情上做这种或那种改变,让行情朝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向发展。但是所有这些对原因的区分都带有很大的假定性。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确认,如果我们能及时从经济领导和在组织上

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这些困难中的三分之二我们是能够排除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分析这些原因上来,从今天的运动中汲取一系列教训,改正我们的经济工作,避免出现那些当然会让党和苏维埃政权以及全体工人阶级付出高昂代价的困难。我们应该避免再度出现这些困难,如果不能完全做到,也不该让它们变得像如今这个运动表现得那样尖锐。

引起粮食收购危机的全部原因,我看可以用下面这个简短的表述来说明:我们面临的是经济的个别成分之间的极度失衡,它在市场上有了十分清晰的表现,而且在国家和合作社经营机构的纵容下,被已经成长起来的富农和私营者利用了。[当我们谈到收购在第一和第二季度为什么出现了这样激烈的变化的时候,富农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有,他们甚至可能比一年前更有力量了,甚至不是可能,而是就是如此,但是为什么私营者和富农的影响在这方面的打击会更强烈呢?正是因为我们有了经营环境的特殊条件,要是我们能够及时地改变这些条件,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状态就会轻松多了。]还有,不能忘记的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时刻,决定各个阶级具体的对应关系的,不仅仅是每一个阶级拥有的那些现有的和潜在的力量,而且还有它们中间的每一个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地运用自己的力量进行周旋。任何错误,甚至是强大一方的错误,都会使它减色,让敌对阶级的处境变得轻松些。如果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粮食收购发生危机的时期,就应该确认,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运作得不怎么好,而富农和新经济政策中出现的分子结成了联盟,周旋得要好了。虽然富农和私营者总的具有的力量比我们要小得多,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在农村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富农更加成长了。他们虽然在政治上是相对软弱的,但是在农村中有很大的经济权威。

为了搞清楚困难的性质,应该看清楚造成收购危机的市场失衡背景。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经济上衔接的基本渠道是交换领域(对农业施加影响的其他杠杆,像贷款,订购⁶等等,暂时还只起辅助作用,我们暂且不提)。

如果我们拿出这个农业年度上半年,也就是从7月1日到1月1日的城乡购买力总额来,就可以看到以下的差别:在第一季度,也就是从7月1日到10月1日,城乡的购买力总额增长了12.6%。而在第二季度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7%。同时,我们向城乡市场提供的工业品,按价值计算只比前一年增加了

⁶ 这里用黑体表明的是在修改速记记录时作者画出的强调标志。下同。——编者注

2.5%，第二季度是4.5%。当然，产品的物量增长了12%以上，但是考虑到对工业品的价格做了下调⁷。产品价值上的增长是微不足道的。这样，我们看到的就是城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有了很大的增长，而价值上表现出来的工业产品的增长却落后了。为了保持市场的平衡，我们应该增加工业产品，让它既能满足现有的需求增长，也能满足由于降价而产生的那种增长。我们没有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在秋天出现的商品紧缺变得十分尖锐了，比需求和供应在一年之内的对应关系出现的情况还要更加严重，因为从一年的时间断面上看，情况要好得多。例如，虽然绝对数字不能说是很准，但是能够表现出变化的情况来，——如果说在1926—1927农业年度的第一季度需求超出供应大体上是1亿卢布的话，那么在今年的第一季度，根据德沃莱茨基同志领导的商业人民委员部专家们的计算，这种对应关系就是3亿多卢布了。在今年的第二季度是1.67亿卢布，而在去年是1.25亿卢布。结果得到的是：如果说在去年的上半年，工业品的总缺口是2.19亿—2.20亿卢布的话，那么今年就是4.7亿—5亿卢布了，也就是说，缺额增加了一倍，比去年增加了2.5亿卢布。如果注意到不是所有的商品都能互相替代的话，那么有些商品我们缺少的就更多了。当我们在开始总结今年春天之前得到的平衡状况时，看到原来在供需关系有了很大改善的同时，有的商品我们有剩余，而另一些商品我们却奇缺。而且这种紧缺商品的严重缺乏已经表现为1.2亿卢布了。〔如果市场上有这些紧缺的商品，市场就可以平衡了。〕我们不可能像背剧本上的台词一样说，每一个具体的季节我们都能做到供需完全平衡。商品缺乏还有些年将与我们的经济增长并存，有些时候或者还会变得尖锐，或者有所减弱，没有一个国家能经受得住我们国家这样的情况，居民完成了所有支付后的全部收入都要用在工业品上，没有足够的钱用于储蓄，哪怕是季节性的储蓄也好。在战前，农民在购买商品时，不是把所有的钱都花掉的，而是把一部分放在钱罐子里和储蓄所里。比方说在美国，有20%的国民收入是用于积累的。我们没有系统的储蓄，这对我们的打击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在个别的季节里。〔当然，我们不能满足整个需求，我们也就不能在将来的每一个尖锐的季节时刻，特别是在秋天，让需求和供应对应起来。这是说的需求的增长和供应的落后。接下来，如果我们谈到这是怎么引起的，那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工业得不到很快的补偿。特别是在秋天和春天做不到这一点。〕如果说卢布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作为交换工具的牢固地位的话，那么，它还没有成为公认积累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发展货币储蓄的问题是我们的经营政策的基本问题之一。还应该强调的是，我们在对农村的上层征税方面明显落后了。这是我们的经济政

策的基本失算之一。而且我们对应该征收的各种支付征收得并不好。

在研究粮食收购落后的原因时,应该记住,农民经营技术作物、集约作物和牲畜产品上得到的收入有强劲的增长。这种增长是由于商品产品的总量在增加,也由于一些这样的产品的价格提高了。问题在于,去年由于1925—1926年度的价格政策,经济的原料部门处于危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高了个别原料产品的价格,为的是鼓励生产这样的产品并投入市场。由于同时降低了粮食价格,结果是粮食和农业的粮食产品价格之间出现了很大、不利于粮食的差距。这种状况保障了我们在发展工业的原料基地和收购原料上取得很大胜利,但也减弱了对农民首先向市场上投放粮食的刺激。

如果我们看看材料,在农业年度的前半年来,从绝对和相对数字上说,农民从粮食和其他产品上得到了多少,就可以得到下面的景象。如果说在1924—1925年度(歉收的年份),向计划的收购单位出售农业产品收入中,粮食占了37%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1925—1926年度是45%,在1926—1927年度是53%,而在今年的上半年则只有37%,也就是和歉收的1924—1925年度达到了同样的比例。在这些比较中,采用的都是战前的价格,没有考虑季节性的价格浮动。

集约作物和畜产增长这个事实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标志,但是当它和粮食收购以及生产基地的大大落后联系在一起时,这就为我们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困难。

畜产品在农民收入(即向计划收购单位出售的所得)中所起的作用从去年同期的12%增长到了17%。技术作物则从去年同期的25%提高到了37%,也就是说,这些产品数量的增长是非常积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使得工业的增长有了一个基础,但是同时它也为粮食制造了一个不利的局面,对销售粮食的刺激作用变得很小了。

如果我们看看所有农业产品的价格指数,那么在1927—1928年度的上半年,我们所有的指数是:以战前的价格为100,粮食作物的价格指数就是113.4,技术作物和畜产品为149.6,农业的总指数为132。如果按年统计,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年畜产品*和技术作物的价格指数在提高,而粮食的价格指数在下降,而且这后一个指数每年的变化相对很小。

为确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衔接的经济基础,工业品和农产品物价的对应

* 原文如此。——编者注

关系有着重大意义。虽然今年有行情上的困难,但是剪刀差在接近,也就是说局势比去年要好。在图表1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来(见附件1^①,图表1)。从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物价有摇摆——1926年工业品的物价是上升的,只是在去年,从第三季度起,才做到了让工业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虽然商品匮乏加剧了,我们今年还是把工业商品的价格维持在了一个水平上,没有摇摆,而在1925—1926年度时,由于商品匮乏,价格是急剧攀升的。农业价格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更多的是和季节有关。这样,在全年过程中,剪刀差一直是在接近,这是前一年所没有的。这也就是甚至一些强硬的措施在我们的那些有时也打击了中农的收购实践中没有引起,也不可能引起尖锐的政治上的复杂情况的根本原因,因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的,而我们的困难的根源在于整个国际和国内的局势,而且是在我国的生产力,其中包括了首先是我们的工业和它的基本建设飞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

就拿经过斟酌的粮食平均价格来说吧。如果说在1926年的中央六月全会上规定了对所有的粮食作物的全联盟平均价格掌握在了85—90戈比/普特的话,那么去年4月我们的价格是80戈比/普特,今年是85戈比,也就是说没有高出平均价格的最低标准。但是平均价格是很少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各个地区和作物之间有很大的差距,结果是由于一个地区在总的收购中占有的比重不同,甚至在地方上的价格完全稳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平均价格上的变化。为了得出各种作物的地区价格差异的概念,我引用一个各种作物和各个地区的最高和最低价格的例子。我们在1925—1926年度的燕麦的最高价格(以1普特多少戈比计算),在中央黑土州是112戈比,而去年同样是在中央黑土州,最高价却是79戈比。今年最高价格是78戈比,而战前是76戈比。另一方面,在西伯利亚(价格最低的边疆区),1926年是64戈比/普特,1927年是56戈比,今年是59戈比,而战前是51戈比。

如果说到燕麦的地区差价,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的差距,我们就可以看到,1925—1926年度的差距是48戈比,去年是23戈比,今年是19戈比,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缩小各个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从经济上论证各个年份的这种差异是非常难的:由于对各个地区的经济特点的研究不够,常常是正在形成的对应关系不能得到应有的经济论证。于是我们不得不在去年提出任务,要对各种作物和地区的价格之间的对应关系做出某些调整,以便能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确定它们

① 原文如此。应为附件5。——译者注

之间比较正确的对应关系。

小麦也是同样情况。1925—1926年度的最高价格在巴什基尔,是169戈比,最低价格在西伯利亚,是93戈比。去年最高价格在乌克兰,是111戈比,最低价格是西伯利亚的88戈比;今年最高价格是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122戈比,最低的是西伯利亚的87戈比;而在战前,乌克兰的价格是95戈比,西伯利亚是71戈比。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各个地区小麦价格的差距是不一样的:1925—1926年度是76戈比,去年是23戈比,今年是25戈比。我应该再说一遍的是,很难说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根据的,因为从经济上论证价格差距的所有尝试都没有成功。不得不在实践中经常检查各个地区的价格和改正错误。[遗憾的是,我没有说到质量,因为我们为质量采用了专门的加价,单独的加价。实际上根据质量有另外的价格。

臧声:你们怎么收取加价?

米高扬:通过扣款。

卡冈诺维奇:这是提价的做法?

米高扬:如果不转个弯子的话,有的时候走任何一条路也到不了你想去的地方。]我应该说的是,遗憾的是,我们在去年进行的调整看来不是很成功的。这是动摇了工作人员和农民对物价政策不变的信心的一個因素。[至于总的经济形势,我要说:我们的市场经济局势是困难的。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和生产力总体增长的背景下,发生了季节性的急剧尖锐化。我们所有的是,总的来说城乡经济之间的关系有了改善,在一定的时间段里市场有局部脱钩,这段时间的工资得到了改善。]既然价格政策直接涉及工资,我认为需要向全会出示下一个图表(见附件1^①,图表2)。图表的上线表明了货币体现的月工资的变化状况,而下线表示的是根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材料得出的实际工资的变化状况。我们采用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數據,是因为它们更可靠(笑声),说它可靠,是因为不可能指控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这里有什么夸大的地方。

遗憾的是,从11月开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不再计算工人的商品卢布了⁸,所以最近这些月没有实际工资变化状况的数据。表现实际工资变化的曲线出现的剧烈起伏甚至在工资稳定的情况下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月的工作日天数有所不同,而这里取的是月工资。起点是1925年的9月。当时的月工资体现为现实的商品卢布,是53卢布的面值10卢布的纸卢布和30卢布的预算卢

^① 原文如此。应为附件5。——译者注

布——为了简化,我就不引戈比数了。我们到了1926年1月1日时,就有了商品卢布和纸币卢布之间的很大差距了——53.9%,也就是说,10卢布面值的纸币一个卢布的所值是战前商品卢布的53.9戈比。二月的差距就更是特别大了。11月时的差距就达到了54.6%。如果拿来和1926年春天相比,这个百分比就是56了。

[托姆斯基:52。

米高扬:是的,52。]

米高扬:也就是说卢布的价值更下跌了。这就是所谓的工人卢布价值的下跌。这不完全符合[10卢布的纸卢布的情况,因为其他商品是在另外的条件下计算进去的]10卢布面值的纸卢布的价值,因为在计算工人卢布的时候,算进去的是一组商品,而在计算10卢布面值的纸卢布的价值时,采用的是另一组种类更多的商品。

臧声:你把我们搞糊涂了,米高扬!

米高扬:我们有些夸大了工人卢布的价值。如果按卢布价值现在相当于1926年1月1日时的价值计算的话,那么在两年里,我们把这个时候在实际价值下跌的情况下恢复起来的名义工资提高到了1928年1月的水平,而不是1925年秋的价值水平。这样,我们在这两年里是把工资提高了31.7%。

托姆斯基:正确,如果有黄油的话,那就非常好了。

米高扬:托姆斯基说得对,[没有黄油也说得对]甚至价格很好的话,商品也并不总是足够的,而这是对工人收支预算的一个打击。

托姆斯基:如果有黄油和黍子的话,那就一切都好了。

[米高扬:如果不提有可能影响到个别时刻的行情摇摆的话,但是总的情形还不会因为这些行情上的摇摆而变化。

托姆斯基:而蛋、黄油在哪里呢?]

米高扬:同志们,这就是在粮食收购领域里发生的那些困难的大体上的经济背景。如果说到由于我们的收购机关狭义上的机构活动出现的错误和困难,那么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没有应有的纪律,我们的组织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躲避价格政策,为破坏价格利用和滥用以质量抬价和压价⁹的做法,还有我们机构中的各种其他摩擦,这都削弱了我们对私人市场和富农的抵御能力,使得私人和富农更容易影响市场和行情;我们的机构犯下的错误和闪失加剧了市场的困难,形成了为富农制造打压粮食气氛的土壤,散布了提高粮价的期望,这样,市场行情就失去了把粮食大量投向市场的刺激力。这就是为什么农民会采取等待的立

场,这种立场是由局势造成的,它也决定了粮食是有的,但是就是不把粮食运出来。

我们面临的局势有什么威胁,我们避免了什么和怎样才能走出粮食收购的危机呢?先来看看几个能够说明我们的收购工作的数字。我想所有中央委员都知道中央的一个最重要的提法,一个最重要的、决定了一切的事实,那就是到今年的1月1日时,我们收购的粮食比去年少了1.28亿普特,而计划是要比去年多的。今年的计划是要收购6.75亿普特粮食,不是去年实际征收到的6.43亿,如果再算上油料种子,这个计划就将达到7.50亿普特,而不是去年征收到的6.83亿普特。

由于采取了我下面要讲到的党和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措施,我们在4月1日时有了以下的变化。而且为了更清楚些,我应该说,4月1日的数字部分包括了以前我们没有包括到计划收购的通报里的一些数据,例如,西伯利亚边疆区农业、信贷和合作联合组织联盟等的部分收购。虽然这些数据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但这些变化很少能改变最后的结果。今年到4月1日时,我们所有的收购是6.399亿普特,凑个整数就是6.40亿普特,而去年同期是6.17亿普特。如果单计算油料种子,我们收购的是0.68亿,而去年是0.38亿,也就是说比去年多了0.3亿普特。如果单计算粮食的话,那么在对西伯利亚的收购再做了某些重新结算之后,我们比去年少收购了700万,如果没有再做重新结算,我们和去年的收购相比缺少的粮食是0.22亿普特(详见附件5,图表3^①)。

托姆斯基:为什么要重新结算呢?

米高扬:因为西伯利亚组织的报告里得出的是一笔糊涂账,为了把这笔糊涂账改正过来,我们重新计算了所有的收购。[就是把西伯利亚的所有开销都算在我们自己头上,这也给我们增加不了一公担的粮食,但是结算中算进去了。比去年少了0.22亿。]

如果按作物来算,我们可以看到,到4月1日时,在9个月里收购的大麦比去年多0.24亿普特,小麦减少了0.20亿普特,燕麦减少了0.18亿,其他作物增加了600万普特。

联系到粮食收购的危机,我们有哪些困难呢?第一,最尖锐的是对工人地区的供应,没有了它就不可能保障工业的正常工作和基本的工人中心的正常生活。这不仅是一种威胁,而且在许多地方大量的供应已经中断,让工人群众感到了不

^① 原文无此注释,系译者所加。——译者注

安[对局势是有影响的]。

第二,非常重要的是对那些我们宣传过不要种粮食而要种棉花和亚麻的原料地区的供应。我们答应过要向他们[迅速]廉价供应足够的粮食,而实际上[没有这样做]我们面临的状况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有破坏棉花和亚麻播种的危险,明年将会对工业有很强烈的打击。

第三,我们[有很大的困难]面临着破坏森林采伐的威胁,这些采伐对于保障国家今年要广泛展开的整个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还有就是对木材出口的威胁,它能提供大约一亿卢布的外汇,[会使原料和外汇计划和国家建设计划得不到足够的供应]。接着我们还遇到了工业的一个部门,它作为工业的一个部门并没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的预算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酒精工业。我们规定了要向酒精工业提供600万普特玉米,而且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由于为酒精工厂收购土豆的情况不好,就必须能拿出0.13亿普特玉米来维持酒精工业。而这意味着什么呢?预算里写上了伏特加酒的消费税收是6亿卢布。我们有可能要失去这笔钱的一半。啤酒工业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勉强才摆脱了这个威胁。

[啤酒工业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危机,而酒精工业也同时面临着很大的威胁],我就不说我们大大压缩了的出口了¹⁰,而出口的意义你们是清楚的,因为所有进口的原料和设备都要用我们从出口得来的钱购买。

工业的增长需要大量的原料。我们大约要花费4亿卢布进口原料,而我们的出口落后。如果我们[大约增加出口]在今年通过极大的努力能把整个出口(不算粮食)扩大到1.5亿卢布,那么[今年我们暂时是从原料作物获利的]我们从粮食作物得到的只有0.37亿卢布,比去年减少了1.7亿卢布。当然我说的去年是总数,而现在我们只有今年8个月的数字。这就是为什么改正粮食收购的情况很重要了,因为这个领域里的危机肯定有变成整个国民经济危机的危险。如果不能把它限制在局部,不能得到改正,它就会打击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以及我们政策和政治生活的所有领域。这就是为什么面临着这些可能会出现威胁,如果不能做到扭转局势的话,中央委员会就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把损失弥补上,保障规定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够实现¹¹。1925—1926年度,我们是通过收缩基本建设和削减工业产品走出粮食收购危机的。今年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要走出危机但不暂停我们的基本建设,也不降低速度,不减少工业产品。这是非常困难的任務,需要花费巨大的力量。我们在减少出口的同时,不得不扩大从国外进口原料和设备来保障我们工业增长的基础,这可以帮助我们

付明年的粮食收购。但是这种冒险的周旋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不受到惩罚,那就是如果现在就采取一切措施,在明年能够用扩大出口来补上,而这样消极地年复一年地保持平衡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

我现在来谈谈今年8个月的粮食消耗结果。如果拿8个月粮食消耗的数据来看,要是全年都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就能看到还将会面临怎样的困难了。8个月里,在收购少了0.22亿普特的情况下,我们用于出口的粮食比去年减少了1.1亿普特。但是我们有了去年没有的新开销,这就是种子贷款的开支,大约是0.15亿—0.20亿普特,军事部门比去年增加了少量的开支——大约是300万普特,中亚和外高加索的原料地区这段时间的开销是0.44亿普特,比去年的0.31亿增加了0.13亿;全年比去年增加了0.18亿普特。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工业区的开销比去年增加了0.60亿普特,而总的来说,我们比去年增加了1.2亿的开销。这些数字让我们感到不安,它们不能让我们放心和想到我们在粮食收购中已经取得了可以高枕无忧的成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面临着完成第三季度计划的巨大任务,应该说,这个计划特别是对某些地区来说,主要是对那些此前在粮食收购上落后了的地区来说,是一个紧张的计划。许多地区面临着完全完不成粮食收购计划的威胁。有一些地区未必能够把他们过去在粮食收购中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相反,某些地区将能超额完成计划。其中乌克兰、沃罗涅日省、奥尔洛夫省和库尔斯克省总的将能比年计划超额完成0.14亿—0.15亿普特。党在乌克兰所做的努力将能保证那里的收购过程不仅能完成粮食收购计划,而且能够有些超额地完成这个计划。乌克兰的组织为此承担了责任。他们承担了有些超额地完成计划的责任。

*臧声(来自乌克兰人的坐席):*根本不是这样。

米高扬:至少乌克兰贸易人民委员切尔诺夫同志承担了这样的义务、这样的责任,并且通知说,乌克兰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了这个计划。中央这方面通过了决议,要专门鼓励乌克兰人并拨款500万卢布给乌克兰购买拖拉机¹²。

卡冈诺维奇:现在什么鼓励也没有得到。

米高扬:这件事正在准备中。我重复一遍,有一些地区将能有某些超额地完成计划。北高加索很难补上已经失去的,但是在做了极大努力的情况下,北高加索将能够完成计划。至于西伯利亚人,他们将全部完成自己的计划。他们现在怪罪的是我们对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¹³这是对的——我们是对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是我想,同志们,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必须要得到粮食,更何况这里是条件的,而且我们还有时间在这里进行紧张的收购。我想,西伯利亚人是

能够完成季度计划和年度计划的,当然如果是紧张工作的话。我们在乌拉尔的情况就更加紧张了,那里有完不成计划的危险。巴什基尔、鞑靼斯坦和伏尔加河流域有很大困难,它们未必能完成整个全年计划。一些所谓的消费省——图拉省,梁赞省也有困难。我的感觉是,在这里即便是把所有力气都使出来,我们也完不成计划。应该承认,在这里许多东西已经丧失了。但是需要起码是最大限度地把失去的补回来。

如果看看正在转运的、由国家掌握的剩余,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情况。我们在1925—1926年度的10月在车厢和仓库里、在路途上的剩余部分是0.72亿普特,而在去年是0.84亿,今年是0.97亿普特。可是在11月就已经是0.62亿普特了,也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最起码的剩余了,这样的剩余是不可能维持正常生活的。12月我们开始增加了多于前年的剩余部分,但是所有的剩余比去年要少。只是到了4月,转运的剩余部分才比去年高出了0.11亿普特。我们需要在新的收成之前有多于去年的剩余部分,否则我们就不能不间断地供应粮食了。现在剩余部分只是多了0.11亿普特。而且这是在出口要比去年减少1.10亿卢布的条件下。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的,在一些地区,由于私营者有所收缩,我们不得不对这些地区的供应扩大支出。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我们应该更紧张地工作,从4月到7月要收购到比去年多得多的粮食。不这样我们就会重新面临粮食收购的危机。

在转向分析在粮食收购过程中采用的那些中央全会成员都知道的措施时,可以把这些措施分成3类。

第一类是非常性的措施,是由于失去了许多而没有足够的时间补上,但又急需补上引起的,在困难没有完全排除时不得不采取必需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只有随着粮食收购中的困难被克服和被消灭,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做到正常安排收购过程,不再需要采用它们的时候,才能够停止采用。

我认为,属于这种非常措施的,有采用第107条和广泛动员党的力量,这种动员的规模和范围是在通常局势下不能采用的¹⁴。党把他们的所有力量都集中到了粮食收购上来了。这并不意味着将来我们不再向党作动员了。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动员不应当有这样广泛的规模。

[其他措施是正常的,但是我应该把它们分成正常措施的两个方面。由于缺少时间,我们不得不用非常的方法进行正常的措施。]第二类是正常的措施,但是是用非常的办法推行的,也就是说如果有其他的方法,如果有可能采用它们,我们本可以作为正常的[不会引起扯动的]措施来推行的。这些措施的非正

常性并不在于它们的性质,而在于推行它们的方法。属于这一类的措施包括捐献¹⁵,农民公债¹⁶,从城市里投放商品。这些措施总是需要的,我们应该推行,但是推行它们的方法应该是更正常的。例如,捐献应该进行,而且所有农民都将会认为(而且现在就认为)是需要进行的,但是,第一,不该是像现在这样以这样的数额,在这样短的期限内,完全和公债同时进行,而且第一次就以这样大的额度,指望在很短的期限内完成,又没有足够地事先准备好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措施是完全正常的,我们今后也应该进行,但是采用的是非常的进行办法,这是由局势造成的——在很短的期限内要用公债和捐献的办法提取大量的钱财。

投放工业品。我们当然应该在收获季节向粮食产区投放商品,但是我们是在基本工业中心完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这样做的,当然是在一段短时间里。这就带有了非常的烙印。我想,将来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应该做得让这些正常的和正确的措施有应有的准备和应有的分量,让农民容易接受。

[在这方面,其他的措施也必须能及时跟上,这些措施是实践中采取过的,但是没有被包括进来。]我算进第三类的措施是扭曲和过火,这些措施在实际做法中是有的,但是没有包括到[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一系列建议里来。不过它们是产生于我们制造出来的局势的,是由这种局势的任务产生的,是由巨大压力的局势产生的。我想说的是,压力和非常措施造成了采用和出现这些过火做法的势态。下达的任务要求收购这么多粮食,要通过解释和再解释等等摊派这么多卢布的公债。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说服,而有些人也并不完全是一下子就相信了,而另一方面是任务下达了,谁也不愿意听到任何解释,任何对任务不可能完成的解释都被我们认为是对这个组织软弱的辩解,当然人们就要施加压力,而且认为重要的是要不吝任何措施地完成任务,于是这样就走上了采用过火的做法和加倍地采用行政手段的路子。

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完全令人气愤的、我们正在排除而且也是应该排除的实际情况,但是在许多地方,在具有这样压力的局势下,那些事实也就不那么令人气愤了,不过既然它们带有普遍性,便有可能会引发重大的政治危险。对于过火行为和歪曲做法的种种表现,我们应该和过火行为和歪曲作坚决斗争,因为农民对坏事总是喜欢了解得越多越好,而且久久不会忘记它们,而对好的情况喜欢少知道些,而且忘记得也快。看来这不仅是农民的心理。[我想,甚至不是 A. П. 斯米尔诺夫的心理。这是人性的心理。]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北高加索委员会决定对前所未闻的两件极其令人气愤的事件采取坚决措施,直至对两名工作人员采取了最高的惩罚措施是正确的。

柯秀尔：这不是北高加索委员会决定的，而是法院决定的。

米高扬：当然是法院决定的，但是法院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所有极其重要的问题都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决定。

喊声：科雷连科会怎么说呢？

米高扬：他会沉默的，因为他已经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了，不能让法院独立于党。

我想，这些歪曲的事实是所有注意到农民信件的人都知道的。但是从写这些信可以发现农民是非常活跃的，而且特别是能够找到路子 and 出路的富农。有贫农和中农的信件，但是有许多是富农的信件，它们一直被送到了最高层¹⁷。从这些信里我们看到，施压的种种表现是非法逮捕，不加审判地没收。他们说：来了人，夺走了东西，采用种种拖延的办法，围着粮仓转的不仅是合作社的人，还有政权当局的人……

[喊声：蛀虫。]

米高扬：在粮仓里“找”蛀虫¹⁸。查找的是家酿的酒，眼睛盯着的是粮仓。对于捐献和摊派公债的办法控告更多。例如，邮局的工人到农村去送钱，给的不是钱——要么给一半，要么是全部都算是公债了，或者在出售粮食时支付的不是钱，而是债券。在购买工业用品时，先是买工业品，然后就要求买多少数量的债券，你不买就得不到商品。工人把自己工资寄到农村去，比如说是15卢布。昨天工厂里从库比亚克同志那里拿了这部分钱作为周转，是15卢布，寄到了村里，邮局扣下了13—14卢布，折算成了捐献，给了工人家庭两个卢布。这种事太不像话了，不仅从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上说是危险的，而且从培养对公债和捐献制度的信任来说也是危险的。工人和农民联系密切，这在莫斯科的工厂里就可以感觉到，在那里的工人集会上，这些问题最为迫切。而且从阶级的观点出发，在一些地方往往对农民的态度是摆样子的，把他们看成一无是处[人们陷入了布尔什维克的亢奋状态，施加压力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在压力之下常常就不区分富农和中农了，不去努力对富农施压，帮助贫农和中农，不是联合他们和富农斗争。而富农在一些地方非常灵活地周旋，怂恿贫农和中农反对运动，特别是在北高加索；在那里采取了反措施，用低价向贫农出售粮食，分种子，等等，很快就把这些现象消除了。库班专区委员会编了一本小书，收集了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事实，对贫农采取了我们的党无论如何也绝对不能允许的措施。作为例子，我来讲一个最明显的事情，这件事受到了专区委员会的谴责，但是它表明了运动开始时那里的局势和工作人员犯下的打击贫农的错误。来到了一个没有缴

税或者什么收费的贫农家里,登记他的财产。他有一面镜子,一张床和一两普特的粮食。这是一个既没有粮食也没有什么东西的贫农,他过去是游击队员、红军战士,是和我们一起打过仗的。在开始登记这面镜子的时候,他恼火地把镜子给砸了。砸了镜子:不给你,我也不要。但是,好了,审判他的人民法庭认为他完全没有罪过,而且相反指控了把他逼到了这种地步的那个人。

喊声:可是镜子还是砸碎了。

米高扬:镜子碎了,是一种抗议。

有许多这样的对贫农的过火和过头行为。当然这更多的是在最初的日子里发生的,而且库班专区的组织马上就抓住了这件事并做了调整,让贫农组织起来,缓解了他们的处境。但是我们还是要指出,这是针对了贫农的过火行为。

我们需要非常坚决地和这些过火行为以及扭曲的情况作斗争,因为它们有广泛传播的危险,会动摇农民对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信任,使得我们和农民的基本群众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应该比以前更坚决地进行和富农的斗争,但是进行这场斗争应该绝不能牵扯到贫农,而且应该在这场斗争中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建立和富农斗争的贫农和中农的联盟,否则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这场斗争。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应该特别强调指出必须和这些扭曲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视而不见,不仅是农村中的富农分子,而且还有他们在城里的应声虫,有时甚至也还有一些对我们党的经济政策不特别满意的党员在说:“中央取消了新经济政策”,“你们的新经济政策在哪里”,新经济政策没有了,你们搞的不是粮食收购,而是粮食挖掘,不是贸易,而是征集制,不是和富农斗争,而是让富农破产,等等。我想,的确,如果党员这样说,那他们要么是完全吓坏了,对什么都不理解,要么就是他们不过是在重复我们的阶级敌人说的话。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是我们要谴责和排除的、在这样广泛的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曲折和过火、错误和不足,而是中央采取的措施。我认为,甚至我们采取的最非常的措施,它们也不是意味着要取消新经济政策。是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如果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市场自发性和经济发展的完全自由,这样想就不对了;如果想是我们在这个发展中应该保持中立,那也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在沿着完全正确和惟一正确的新经济政策路线前进,农民也将沿着这个路线和我们一起前进,随着自己力量和条件的增长,应该限制资本主义的法则和富农、私人资本的倾向。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但是新经济政策也规定了,要在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增长的基

基础上取消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不是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而是要走上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新经济政策不是一种僵化的经济体制形式。新经济政策是一条途径,我们应该沿着这条途径一直把我国的经济推向前进,而且这条途径有自己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各个过渡阶段。问题是要限制这个新经济政策的比例,要限制新经济政策的调节措施,使新经济政策服从于无产阶级国家,让分散的农民经济和私人资本就范。问题在于,在每个具体的时刻,这些措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和我们的力量以及组织和金融条件,和我国的国民经济总状况,和社会主义的以及私人的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保持应有的比例。在这里,我们需要善于在每个具体的时刻保持正确的比例。我们不应该放过所有的过火行为和扭曲,因为它们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

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党应该坚决和这些过火行为作斗争。请你们注意的中央决议草案是没有打印出来和只有党的干部和党的组织知道的那个没有公开的信件之后第一个发表了的文件¹⁹,——这是对最近一些月来在党的面前提出的极其重要的经济问题[对整个局势和采取的措施]做出了评价[并做出了驳斥]的第一份文件。在这里我们应该抨击的是那些批评者,而有时并不是批评者,甚至是对我们党的政策的诬蔑者,他们在出现了这些困难的时刻表现得趾高气扬,特别是在像康德拉季耶夫这类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们中间,这个康德拉季耶夫竟如此趾高气扬,甚至在国家计委用[格格不入的]和我们为敌的语言大喊大叫,在最重要的苏维埃机关里对我们的国家经济政策使用这种语言未必是能够允许的。这些与我们为敌的情绪在某些共产党员中间也得到了响应。

在对当今的粮食收购运动中我们在经济和组织领域面临的局势、我们采取的措施、今年的前景以及我们面临的任务做了一番描述之后,我想简短地说说对将来的运动进行准备的问题。这种准备应当涉及的,既有一些经济性质的措施,也包括了组织措施领域;及时准备经济性质的措施是为了建立比较更正确的供需平衡,组织措施应该建立在考虑今年教训的基础上,而且应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锻炼我们的组织对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预测未来的行情,特别是季节性的行情,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既然已经有可能预测了,当我们把供需情况、农民收入和从农民身上收取的情况等数据做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期待,情况会比去年更好一些,因为按价值计算,今年第四季度的工业商品生产比去年增加了17%以上,而去年的增长只有2.5%,而需求的增长看来只有9%。虽然情况比去年要好一些,[但是当然谁也不可能完全保证市场关系是完全有前途的,而且]市场状况还是相当紧张的。应该清楚的是,我们的发展速度本身就决定了

会是非常紧张的,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间断。我们前进的速度很快,为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平的喘息机会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整个国际局势的要求²⁰,由于是这种情况,我们没有能做到积累储备,让我们能保险避免不可避免的失算、不足、错误和失利。而在有储备的情况下,每一次的不足都不会对整个经济造成打击,不会引起中断,而在现在这个时候,在国家的所有力量和资源都紧张的情况下,每一次的不成功、每一次的不足都会是对整个经济的打击。这也就是为什么整个局势的紧张都是来自我们的发展速度,是在经济资源积累贫乏的情况下发生的,将来也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这种情况。需要保障的是在领导经济中少发生些一勺焦油坏了一桶蜜的情况。需要明白的是,如果我们不想降低发展速度,我们就不能保障四平八稳,而减速是我们不应该允许的,不过我们要努力掌握的速度应该是虽然紧张,但不会造成过度紧张,为的是乘坐一辆破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有一些颠簸,但是不会把车颠坏,也不会摔散了架。我们不可能缓慢和平稳地行走,肯定会有颠簸,但是需要不打破头和不把车子打碎,而且要不屈服。当然,在坑洼的路上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的间断,会有颠簸,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是考虑到我们是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太平稳的速度最终还是更危险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当我们应该利用每一个机会加强无产阶级阵地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寻求平稳的运动是一种奢侈和毫无结果的幻想。走狭窄的小路,走边缘,有可能会滑下去,所以,走中间的路当然是平稳的,但不是总有可能,更好的还是沿着边上快些走,虽然紧张一些,但是始终要有革命的谨慎和警惕。

[柯秀尔:如果没有宽阔的道路那又怎么办呢?]

米高扬:新的农业年度开始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有着这些特点的。我有可能通报由于出售商品农村能得到什么样的收入,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能向农村注入多少钱,我们又能从那里抽取多少,等等。但是应该说,虽然单位税收增加了²¹,[应该在10月以前收上来,今年农村实质上将比去年得到的更多,我们的支付,也就是给农民的保险费,将根据火灾情况归还;冬季收上来——没有着火,如果在夏天着火了,就可以得到钱]夏天农村通过各个不同的渠道将得到得比去年多。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重要,的是,这些支付和收取要从我们党的阶级政策出发,更正确地农村的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分配。

[柯秀尔:新的收入来源。(笑声)]

米高扬:所以我们认为,在一些地方强行塞给农民的公债如果不是一半也是部分地,至少是有四分之一,又回到了我们储蓄所里和银行里。另一方面,通过

签合同和其他渠道我们收回大量的钱。

臧声：捐献呢？

米高扬：捐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通过建设项目也将能回收。工业产品去年的产值增长了2.5%，今年第四季度比去年增长17%，这对我们将是很大的帮忙。对于新的收购运动来说，解决这些经济问题有着重大意义，在明年的前景（收获的规模等等）更清楚的时候，我们将全面审议所有这些问题，争取让经济的所有极其重要的成分多少能够衔接起来，在它们之间形成多少正确的比例关系，没有特别尖锐的比例失调，保障在明年能有比较正常的粮食收购过程和整个经济更正常的发展过程。

准备明年收购成功有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党和苏维埃政权将要进行的春季播种运动。我们正确地做到了一点，从我们非常紧张地收购到的数量不多的粮食中，还是向农民分发了0.15亿普特用于播种。但是需要考虑的是，个别类型的富农有可能要压缩种植面积，这就需要我们用进一步增加贫农和中农的播种面积来补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种子上给予他们更大支持。我们通过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商业人民委员部以及地方机关提供了大约0.30亿到0.32亿普特的种子。去年大约提供了0.13亿普特。当然收成并不坏，但是不能不给，为的是支持贫农和中农扩大播种面积。这项极其重要的准备未来收购的措施更会进一步鼓舞农村中的贫农和中农，可以迅速地扩大农业播种面积。新的统一税法通过免除35%的税收和提高对上层阶层的税收，支持了贫农群众，形成了富农农户收入的逐渐增长和征税增长之间比较更合理的对应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修改，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不再专门谈其他一系列经济措施了，这是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和政治局今后要通过的，是和准备迎接收成联系在一起。例如，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扩大工业产品，积累必要的、供收获时刻需要的工业品储备，以便在收购工作的高潮时把它们投放出去。我们可以把一千多车皮的布匹保存起来，在销售收成的高潮时投放出去，除此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金融的和经济的措施，它们应该能够为缓解夏秋两季的收购工作的紧张程度起到作用。

我认为在对行情做了一些粗线条的描绘之后，应该再谈谈党应该从今年的收成情况出发，为明年做准备采取的组织措施了。

在阐述中央政治局的建议之前，我认为需要说说我们的收购机构的实际状况。如果说到和私人的以及非计划内的收购相比，我们的组织，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组织占有的比重的话，应该说，后者在前半年占有的比例并不高，达到了总量

的75%，那么在下半年，基本的计划收购比重就大大提高了，而非计划的收购则减少了。如果说到国家的和合作社的各个组织的作用，我们看到的是，国家机关在1925—1926年度收购了76%，而在下一年度，它们收购了64.4%，今年上半年是43.7%，1月是30%，2月是28%，也就是说，我们见到的是国家收购的比重在不断地大幅度下降，同时合作社的收购在迅速增长，它们增长的情况是这样的：两种类型的合作社收购粮食的情况在这些年里是23.5%和35.5%，在今年的上半年是56%^①，1月是70%，2月是71.5%。这就是我们的地方机构的情况和国家与合作社成分的对应关系。这可以从关于收购运动的下列图表看出来（见附件1^②，图表3^③）。一个特点是国家机关的收购总是在下降，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停留在了低水平上。另一个特点是合作社的收购上升很快。得到了是一种开口程度不同的剪刀差。

臧声：这是指绝对数字吗？

米高扬：我们取的是比例数。得到的是开口不同的剪刀差，最后稳定在了这样的水平上：70%属于合作社，只有30%属于国家机关。

如果说到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²²作为全苏粮食收购组织的作用，那么发生的情况是它的作用在下降。如果说在去年，这个作用还是相当大的，占了所有收购的37%的话，那么在今年的前半年，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占有额是25%，1月是21%，2月也是21%；比重就非常小了。

我没有时间给你们单独举出农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数据了，但是应该说，消费合作社收购的超过了农业合作社。今天消费合作社收购的占全部收购量的44%。而农业合作社的占了26%。我应该指出，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处境困难是由以下情况决定的：第一，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在市场上遇到了地方上的国家收购单位，他们有地方组织的支持。地方组织在彼此之间的竞争中更多选择的是自己的而不是中央的收购单位。第二，合作社的作用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很大成就；私营者起到的作用更小了，农民开始更有组织地出售自己的产品，农民更多是出售给自己的合作社了，包括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而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虽然有自己很好的机构，很好的粮仓，也有很好的纪律，等等，却得不到应有的、适合它的能力的负荷，只能在那

① 以下均为约数，与附件5图表3所示略有区别。——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应为附件5。——译者注

③ 原文如此。应为图表4。——译者注

里坐等。

如果我们看看每一个个别的收购点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是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收购点的承载力最大。例如,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在克里米亚的一个点的承载力最大,上半年是23.8万普特;而哈萨克斯坦的承载力最小,是7.5万普特。合作社的承载力则要小一些,而且消费合作社的承载力比农业合作社更小。

收购网点的变化是,特别是从1月开始,网点增加了许多。如果拿网点总数来说,现在我们在全国有1.7896万个粮食收集点,也就是说数量很多,而且无疑还会有很大的增长。这里有一个图表表明了征收网点的增加情况(见附件1^①,图表5)。到1927年1月是1.47万个粮食收集点,到2月时就是1.78万个了,也就是说增加得很快,差不多增加了3000多个,而国家收购机构自己的收集点却增加得很少,只有100个,农业合作社也不多,也就是二三百个;消费合作社的网络有很大的发展,分布到了所有的村落。他们发展了自己在去年春天曾一度缩减的网点,只在一个月里就增加了3000个,也就是说和去年春天的数量相比,大体上总共增加了6000个。

应当说,网点有些扩展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因为图节省开支,我们的网点没有进入到深远的点上去,一部分粮食没有能包括进去。但是有一些扩展是多余的,超出了需求,于是我们不得不把这件事纳入一定的范围,一方面要全面保留所包括的范围,另一方面又要能保障网点满负荷工作。

至于与粮食收购联系在一起的磨坊工作,我们应该指出,如果说在注册的磨制工业里,1923—1924年度属于国家机关的只有64%的话,那么今天就已经有73%了。属于合作社的磨坊在注册的磨制工业里曾占16%,现在有21%了。属于私人的磨坊在比较大型的注册的磨制工业里原来占有19.5%,现在是5.9%。如果看再加工,那么在注册的工业中,我们可以从图表中看到它的增长情况(见附件1^②,图表6)。这就是通过我们的注册的面粉磨制工业再加工每年增长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年份里,指数每年都在增长。这是小麦的情况,下面是大麦。也就是说大型的磨制工业的负荷增加靠的是小型工业磨制企业的收缩,原来它们是在竞争的,是私人收购者或者地方机关施加影响的杠杆。

我不得不讲讲与粮食收购、供应以及面包烤制等等无关的粮食业的其他问

① 原文如此。应为附件5。——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应为附件5。——译者注

题,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问题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在面包烤制上,列宁格勒应该是所有城市的样板,因为那里大部分面包是用机械的办法烤制的。莫斯科今年在这方面将会有有一个很大的飞跃,会扭转情况,在城里建起两个大型工厂和在各个县里建起几个小一点的工厂。我们需要发展工厂式的机械面包烤制,作为面包减价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把私人烤制面包排挤出去,从总的方面调节面包市场。

我应该对粮食收购的额外开支说上两句,因为这有很大的意义。很难准确地搞清楚收购的额外开支的各种构成,但是如果我们拿到数据,那么我们就看到,用1926—1927年度的收购和前一年相比,我们在所有收购机关的额外开支上节约了大约0.35亿卢布,平均每普特粮食比前年减少了7戈比的开支。今年比去年略有降低。今年第一季度在开支上的节省可能只有300万卢布,而一年大约是0.10亿—0.12亿卢布。这表明在减少开支上是略有成绩的,但就是今天的开支水平也还是非常高的。

为了说明这些开支的意义,应当看看工人地区的粮食销售价格,并且确定,工人购买面包的价格中有多少是农民用粮食挣的钱。那样,你们就可以看到收购和加工总共享了多少开支了。这样一来,我们遗憾地看到的是一幅非常不能让人高兴的情景。这不能和战前的情况相比。战前认为,在面粉的出售价格中,大体上有70%是支付给农民的。如果我们在这里以莫斯科为例,看看粮食生产者在面粉消费者的价格中占有多大比例的话,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见附件5,图表7)^①,去年上半年,农民生产者占有的比例是41.1%。换句话说,如果工人为莫斯科一个单位的面粉支付100戈比,那么,其中的41.1%是直接给农民的,其余的59.9%^②是用于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收购,再加工、运送和出售的。去年下半年,生产者价格的这个比重提高了一点——43.9%。今年是45.9%,大体上是莫斯科的工人为面粉支付的100戈比中,有46戈比给了农民。但是在去年上半年只有41戈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更加有力地打击额外开支。当然,收购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掩盖了我们在收购工作中的额外支出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在这件事上下工夫,减少开支。

当我们拿着以戈比表示的小麦价格来分析开支的时候,收购的价格和小麦面粉以及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规定的一定品种的价格有这样的差

^① 原文未标明附件5图表7在文中何处,该括号内注释系译者所加。——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按附件5图表7所示,应为58.9%。——译者注

距:在战前,颗粒的小麦和小麦面粉之间的价格差异在莫斯科是 43 戈比,而现在多了 60 戈比,差距大体上扩大了 50%。和战前相比多出来的这 60 戈比是从何而来的呢?在这里当然没有必要强调各种假设和限制,我没有时间现在来列举这些,但是我请你们注意对各个单项开支的所有数字的假定。面粉再加工的指数低于一般的工业指数。原来是 13 戈比,现在是 23 戈比,多了 10 戈比。但是应该注意袋子的所值。一个装 1 普特的袋子在战前值 5 戈比,现在是 12.68 戈比,相当于原来的 2.5 倍。收购单位的另一个开支项目是运输的开支,也就是铁路运输的开支,还很高,我们也需要把它们削减下来,这样我们就能节约好几百万。

卡冈诺维奇:如果把各个项目合并,也可以节省几千万。如果把项目简化,也可以节省好几百万。

米高扬:这也取决于我们的组织。如果我们没有断档,不需要从一些地区向另一些地区转运的话,那么就可以不进行个别运进来又运出去的转运了。但是穷困有时迫使我们进行这样的转运,而从理智的角度看,从绝对理智的角度看,这是真正的发疯]是否有道理的角度看,这是真正的乱来。

卡冈诺维奇:从我们这里运到北方去,然后又回到乌克兰来。

米高扬:我们给你们的是你们不够的乌拉尔的春小麦。今年从乌拉尔运出后又返运回来,和种子的转运有关。

我们在中央的决议里做了规定,对待磨坊和粮仓必须有别于任何粮食收购点,给它们提供优惠,而对油料种子则是给油脂工业辛迪加提供优惠,通过追加费用鼓励农民把这些产品和原料直接运到加工和接收企业。这样,所有的中间环节就都没有了,粮食直接上了磨坊去清除干净和加工。粮仓也是这样。但是这里是怎么回事呢?

不能是给所有企业都规定一样的追加费用,在这里需要根据地方经济的特点而有所不同,需要研究距市场的远近,等等。有的时候有不协调的情况,两个收购点中的一个给出的追加费用对另一个来说是荒唐的,为什么要给,谁也解释不清楚,农民也搞不明白。需要做的是让农民不感觉是负担,让这种做法更有道理些,让农民能直接把粮食运到大型企业去。

转到对收购机构的改组,我应该说,政治局提交全会审议的决定有这样的规定:第一,在国家组织这方面,为了排除竞争,把所有中央和地方的收购单位都联合起来,对它们进行改组,联合成一个新的股份公司“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²³,建立全苏的粮食收购组织,这个组织是建立在大型股份组

织基础上的,要能保证从物质上,无论是获取红利还是为地方预算得到利润提成,都要能吸引地方上的股东,保障地方机关能对新的全苏公司在地方上工作施加影响和有所促进。没有加入到这个全苏组织里来的小型企业,收购的剩余部分,用于满足地方消费者的那部分,也都将通过“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销售。和合作社的收购机构比较,大型的、集中的“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机构一方面虽然在收购和加工方面将拥有巨大的技术基础,但另一方面却会脱离边远地区农村的采购点,失去向四处伸展的网点,失去围绕在这个收购网周围的、经过挑选的人员,一句话,将会失去那些能让合作社发挥威力和作用的优势;除此之外,“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将不拥有工业商品资源,而这在粮食收购时是有重大意义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必须让这个新的组织在某些方面能和消费合作社的工作衔接起来,后者拥有更强大的网点,有大量有经验的工作干部,而另一方面,又有大量能为粮食收购工作启用的商品。我们认为,必须让消费合作社和新的“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之间有某种衔接,让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和全乌克兰合作社联社以合同为基础,按照全苏的计划收购粮食,让基层的各个公司和收购点收购到的粮食直接缴到“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粮仓和面粉厂去。“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在对粮食进行了相应加工之后,通过工人合作社,通过工人合作社中央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合作社,向各个城市销售。另外,“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还要承担一些往往是没有赢利的、对通常的商业企业来说无利可图的任务,完成向军事部门承担的任务,保障对中亚的供应,等等,无论收购单位从商业的角度说是不是关心,这些任务都是必须完成的。这就是要对现有的组织体系所做的那些改变。有一个变化是莫斯科的同志们感到不满的。这里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的方面。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在去年和前年都直接在各个地方进行过收购。前年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曾有过自己的收购点,去年它是通过地方的合作社联合会工作的,有几个磨坊加工粮食。[我们在地方上的形势是,乌克兰的和莫斯科的同志们来收购。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得到了什么呢?由于这样安排的结果,我们的收购单位在地方上彼此冲突,所有收购单位的统一战线没有了。]所以决定在和基本的收购单位签订总合同的基础上为莫斯科的合作社进行收购,保障莫斯科的工人能够帮助我们的收购组织,促进在农村及时收购和供应粮食。这里指的是要划出一些省向莫斯科供应粮食。[莫斯科将是供应中心。]为了这个目的,将划出一些磨坊专门为莫斯科供应面粉。在这种形势

下,莫斯科的代表就能观察并且推动这件事前进了,莫斯科苏维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合作社就能掌握这件事的进展情况了。我想,这样的系统完全能够保障莫斯科组织的利益。我想,在这样的系统里,合作社的利益将能完全得到保障,收购工作的中断将会减少。|我应该说,说到粮食不够时,指的是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粮食不够。我们不得不得罪的,将是别的什么人,但是至少不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如果其他地区没有这样喊叫的话,那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则是最少有根据对这种情况叫喊的了,因为其他的首都,其他大城市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冒的风险更大。乌克兰不可能见怪,因为粮食就在它的手边,粮食总是会走上乌克兰的市场的。]

这就是我们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至于其他措施,我们不认为有必要把所有的方面都搞准,可以仅限于一些由于开展新的运动将要在全系统里进行的基本改变。

通过这次运动,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检查和清理我们的工作人员,把阶级异己分子和腐化分子赶出去。中央监察委员会也在继续清理,但是我应该说,粮食收购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夺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饭碗并免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检查和清理人的职责,虽然它在这一领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只是通过了全党的触角才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认为有数千人已经被开除出党和受到了惩罚。这是收购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会在今年和明年有良好的反映。人力加强了,建立了收购单位的统一战线、贯彻了价格政策、指令和调拨等等——在没有足够的资金保障所有需要的情况下,缺了这些,我们是不可能在国内顺利运作的。

接下来,同志们,我们将应该让党的组织把注意力集中起来,让它们更多地对具体的经济工作进行务实的领导,因为在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改造的计划中,我是说在经济方面要抓紧前进这方面,我们只是单一依靠苏维埃机构是不行的,我们应该争取让党在那些存在缺点的地方进行帮助和纠正。党的革命力量,它的敏感性和迅速周旋的本领应该用来帮助监督经济工作,特别是关系到千百万农民的粮食收购工作。我们应该安排好计划,完成计划和检查机构,没有党和它的所有环节千方百计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在中央是干不成事的。非常重要,我们要保持富有活力的联系,所以中央政治局在沙赫特案件上以及在粮食收购问题上通过了决议,要把中央的工作人员派到地方上去熟悉情况和进行检查²⁴。这将能让在中央工作的人员在他们的工作中学会一些有益的东西,而且可以帮助地方上的同志们找到更正确的途径,解决那些在地方上可以解决的任务。

另一方面,为了使计划更准确,必须把调节放在更正常的范围内,避免出现今年出现的那种情况,让我们不得不干预在正常条件下我们本不需要干预的所有细节和小事。我们认为需要在商业人民委员部里有一个专门的会议,有最负责的一些人、收购组织和产粮大区的领导参加,任务是研究、讨论问题、作业计划和收购方法,这样我们就能够加强调节工作了。我们有过这样的会议,它一直在召开,但是参加这种会议的是机关工作人员、收购人员,他们是这个机制的螺丝钉,而不是能解决问题的领导人。现在的想法是,这个会议的组成人员应该是真正的领导人。

接下来,在结束之前,我应该对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说两句。不需要举很多例子来证明,商业人民委员部机构的上上下下曾有过,现在也还有多少错误。我们应该把所有这些都消除掉,但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柯秀尔:说起来很轻快,干起事来就没那么轻快了。

米高扬:如果报告的不是粮食收购工作,而是另外一些与你有关的题目,我也可以向你重复这些话。(笑声)

至少我们应该把这一切都考虑到,让我们机构的人员能够保障我们不犯大错误。商业人民委员部在地方上的机构处境是不幸的和非常艰难的,这是许多同志已经证实了的,包括乌格拉诺夫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他们在巡视地方的时候详细地研究了这个部的情况。我应该引起你们注意到这一点,而且中央政治局专门在自己的决议中提到了这个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的机构肩负的是一些极其宏伟的任务,它和其他的组织——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机构比起来,比较年轻,比较弱。我们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既没有经验,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也没有人能够保证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当你看到某些省里的商业局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不可能也不忍心要求他们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人力和手段上的这种缺乏甚至不能和其他负责经济的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构的状况相提并论。

作为例子,可以说说两个农民省份的情况,在那里,商业人民委员部机关的任务不比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机关的任务少,而是更多。在工业省份里,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关承担着比商业人民委员部机关更多的工作。我举了两个农民省份,需要把省商业局和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些数据,把他们的工资数量拿来做个比较。沃罗涅日省商业局有31人,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编制是33人。

[奥尔忠尼启则:33人和31人——差别不大。]

米高扬:沃罗涅日省商业局收购的是0.39亿普特粮食和价值0.10亿卢布

的蛋和家禽,除所有其他农业商品外,还组织工业商品的销售。把所有这些极其重要的任务和沃罗涅日省的工业相比,我们可以看到,沃罗涅日省商业局的任务比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困难更大。接着,你可以看看平均工资。托姆斯基应该听听和维护一下自己工作人员的队伍。所有工作人员,无论是否担任负责职务,他们的平均工资在沃罗涅日省商业局是 93 卢布,而在国民经济委员会是 142 卢布。

我举的是办公开支,而且你们要记住的是,商业局每五天一定要写一份电报,做一份报告,而国民经济委员会系统是没有这样要求的。

托姆斯基:不可能给他们付更多了,没有黄油呀。

柯秀尔:就是因为支付得少,所以没有黄油。

米高扬:1926—1927 年度的办公开支,商业局是 3 500,而国民经济委员会是 9 500。(喧嚷,交谈声)今年商业局是 3 000,国民经济委员会是 7 000。省商业局长对我说:我没办法对付中央提出的要求,没有钱。

现在说说出差费——需要到县里去看看情况怎么样,我们是要求这样做的,可是怎么出去呢,用什么钱出去呢?国民经济委员会每年有 4 000,而商业局是 3 000。我不知道国民经济委员会的 4 000 是多还是少,但是对于商业局来说,我是知道的,这太少,不够用。

库尔斯克也是同样清楚的情景,但是我不想让你们感到厌烦了,我不再举新的例子了。我想,到处几乎都是这种情况,而且就俄罗斯联邦来说,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工资和机关机构状况比乌克兰更糟。完全有必要采取严肃的措施加强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构。工农检察院应该支持我们,在削减的时候……

奥尔忠尼启则:是的,是的,在削减的时候。(笑声,喧嚷,说话声)

米高扬:我指的是,在总的削减的时候要把我们除外,而且这里应该得到加强。不仅仅是在物质开销上,这里需要的是有权威的、有政治素质的人。常常发生的是,一些省里的商业局长进不了省委班子,进入省委常设局班子的很少,——这些工作人员不是能够进省委常设局班子或者省委班子的那些组织的干部。在一些大型的粮食组织里,组织这件事的领导人离省委班子很远,很不被看在眼里,而本来这样的领导人省委是应该给予最大的信任和支持的。应该能给出这样的干部,让他们能在这个领域里顺利地实现和农民的结盟,因为收购这个领域就是实现这种结合的领域。

应该有灵活的、像布尔什维克一样经受过考验的和坚强的人。应该说这项任务该摆在我们面前了,这样就将能少犯些错误,能有更多的条件及时排除造成

困难的障碍。

我还想就确立加强经济纪律的必要性再说两句。如果说在我们这里,我们的党坚强和强大的是因为我们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纪律的话,那么我们在苏维埃里就很缺少纪律,而且常常是在困难的时刻,缺乏纪律显得非常扎眼。我不想举例证明这个想法,引起你们的注意了。在发展速度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没有革命的纪律就不可能争取做到进行真正的和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照我的看法,我们必须要在粮食收购以及粮食资源的分配这件事上更多地加强纪律。我们需要在这里保障集中领导,使我们一旦需要就能优先着手完成尖锐的国家任务,让不大尖锐的,还可以拖延一些时间的问题先让让路。在这次全会上,我们应该在经济和组织方面准备好,在新的运动中不至于采用非常措施,因为不能再像今年这样收购粮食了:收购它的不是收购单位了,而是整个党,每个党的委员会都是收购单位,都成了收粮司令部。这当然很好,但是我们不可能长久地这样生活,这可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持续2、3、4个月,也许还要继续5个月,但是需要的是在经济系统里采取措施,在机构上做出组织改变,采取党的监督和领导的方法,不是把党的所有力量都引到这方面来,但是要能保障得到党的日常帮助和领导。

主席:同志们,开始讨论还是休息一下?

喊声:休息。

主席:宣布休息。

(休息后)

主席(李可夫):柳比莫夫同志发言。柳比莫夫同志要求给他增加时间。[因为消费合作社大体上收购了大约2.3亿普特粮食,他有用于2亿普特粮食的足够时间,而剩下的0.30亿普特粮食他请求每100万普特粮食给一分钟。]

叶努基泽:给他15分钟。

李可夫:他和我说要增加到半个小时。谁赞成给柳比莫夫同志增加时间?通过。

请柳比莫夫同志发言。

柳比莫夫:我想,联系到对粮食收购问题的讨论,我们在这里应该涉及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所有问题,一系列问题。我当然做不到面面俱到,但是我将努力在讲的过程中,既不能不是主要谈消费合作社的工作,但也涉及总的问题。

我认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发展我们的工业的途径问题——轻工业的发展速

度是不是足够了,我们制造的日用消费品是不是足够了,让我们在未来的收购运动中有所贮备和不用像我们在今年的运动中那样抛售了;关于工业和农业商品的价格政策问题;关于农业类商品的价格对应关系问题;总体上的收购政策问题,而不仅仅是粮食收购政策问题;对农村的商品供应问题;如何对待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的收购问题;调节收购和市场的方法问题和调节组织的权利问题。

我应该指出,对于我们消费合作社来说,粮食收购问题不仅仅是收购多少,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另一个问题:既然直接让我们承担了供应的任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供应我们的工人区和我们在外省的消费地区。

影响到我们的收购及其结果的,今天是地方上对消费合作社的收购工作制定的政策。遗憾的是,地方上执行的那种政策来源于劳动和国防委员会的1927年2月25日决议²⁵。我不想引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这个决议了,只想指出以下情况:在“B”里说到,“(消费合作社)收购(消费品)在和农业合作社签订的合同基础上进行”。农业合作社现在向《真理报》和《消息报》写了文章,说他们是农村里惟一的收购单位,要取消消费合作社的任何收购业务²⁶。农业合作社一直都在加紧努力争取能做到这一点。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劳动和国防委员会的这个决议被该委员会1927年4月29日的决议改变了。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权利,我们有了这样经过变动的措辞:“收购既通过农业合作社也按直接收购的规则由消费合作社的机构收购。”²⁷

这样,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1927年4月29日的决议,消费合作社收购产品既通过农业合作社,也直接通过自己的收购机构。但是各种决议中的这种混乱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至少农业合作社记得的只是第一个决议,但是不记得第二个,4月29日的决议了。斯大林格勒省合作社联社在印制涉及合作社的决议时,根本就没有把第二个决议放进自己的集子里。

对1927年3月25日决议的这种不正确的措辞也影响到了收购工作和对粮食产品的收购。

事先我应该举出一些数据,证明我们是主要通过自己的收购向边远地区和工人地区供应所有种类的农业产品的:67%的粮食,65%的蛋类,72%提炼过的油类是用我们自己收购的产品供应的。我们中央的工人合作社收购的肉类占我们自己需要的68%,土豆占15%,白菜占48%,黄瓜占62%,其他蔬菜占68%。

柯秀尔:“其他”没有,白菜也没有,土豆也没有。(笑声)

柳比莫夫:是的,其他还没有。

现在的情况是,既然农业合作社建立了自己的蛋品家禽联社²⁸,它认为所有的鸡都被它合作化了(笑声),消费合作社任何蛋也不能收购了。在那些我们对地区和省的收购占60%的地方(例如去年在沃罗涅日省),地方组织、省的执行委员会、省委都认为必须取消我们对油、蛋的收购,而在一系列的組織里取消了对粮食的收购。

我们认为,这些方针对消费合作社在粮食上的收购作用起了非常大的影响。起初,在第一阶段上,到处削减收购网,大体上把它的整个收购网削减了40%。恰巧对我们的网络的想法有一些夸大了。我们认为,除了乌克兰以外,我们大体上有5000个收购点,在乌克兰大约有4000个。当人们认为它们的数量很多的时候,通常是把一些收购的联合组织算进去了,这些组织自己没有任何收集点,而是为设在车站上的临近收集点、靠近这些车站的收集点和粮仓工作的。这样,就对我们的网络有了一个完全不正确的概念。有一些组织做出决议,在有农业合作社的点的地方,禁止把粮仓、仓库交给消费合作社,不允许开辟消费合作社的点,而允许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设点。一系列的壓力导致了消费合作社不能足够地铺开自己的收购网,在第一阶段上对收购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

在运动的第二阶段上,当出现了问题,应该消除粮食收购中出现的危机时,当给消费合作社提供了展开自己工作的全部可能的时候,它在收购中的作用就不是在前半年里的26%—27%了,而是在1—2月里就达到了所有收购的44.3%了。

但是遗憾的是,虽然消费合作社以它的收购比重表现出了这样大的作用,一些组织并没有做出需要做出的应有结论。从商业人民委员部和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它在收购中的作用大大降低了)那里,我们有了方针,有了路线,当然是既没有能得到赞同也没有能在这里提出的方针和路线,那就是(像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在自己的记录里设计的那样)把消费合作社从收购中排斥掉,或者是再保留一段时间,一年到两年,而整个收购工作都交给农业合作社。我们认为,还有很多年,消费合作社的所有收购工作和粮食工作还应该做下去。我们认为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应该给我们一个确定的方针,让我们能没有任何损失地工作,不必担心每一年都要对我们调整、压缩,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技术力量、相应的设备,有正在工作的干部。我们应该有一个确定的方针,让我们在一些年里能够从事粮食收购的工作。从事油、蛋和其他消费品的工作,否则其他任何工作都将是没有意义的了。

我们认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胜任粮食收购的工作,在农村,农业合作社应付不了这些收购工作。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机构分布更广,可以更成功地接收粮食,我们的积极分子更有素养,人数更多,有能力在农民中间开展广泛的运动,吸收他们的粮食;我们的积极分子是工人农民的积极分子。他们比农业合作社的积极分子更工人化了。从政治的角度,从农产品价格政策的角度看,消费合作社总是推行这样的价格路线,既符合农民产品应得的支付,同时又总是力图尽可能保持城市可以接受的低价位。在这里,我们总是会遇到农业合作社采取对立的立场。就拿蛋和其他产品来说吧,我们坚持降低被没有分寸地抬高的价格,而农业合作社基本上是农民的组织,它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维护被抬得最高的价格。

关于粮食收购的决议引言部分里写道:“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组织都没有能在市场上表现出行动的统一,曾指望粮食收购将会自动地给出积极的结果。”

一般对于已经形成的各种方针来说,是这种情况,但是需要说到的是,商业人民委员部作为这些粮食收购工作基本的和惟一的领导者,也曾有过这样的方针。商业人民委员部不只一次到处声明过,“粮食收购我们已经把握住了”,“粮食收购我们干得了”。这样的声明我们在中央,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在政治局里,也都听到过。看来,如果说得轻点,这些声明比需要做到的多少是更乐观一些了。还有另外一些声明,关于供应的,也是过于乐观了。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消费合作社,对局势的评价(我不知道我们对它的了解是比商业人民委员部更好些还是更差些)至少不是像商业人民委员部的评价这样带有玫瑰色。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过米高扬同志的声明,说是“我们要让你们在葵花油里洗澡”。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要和米高扬同志一起等待到春天或者秋天,让在我们到池塘里去洗个够,但是已经让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在这些池塘里洗澡了,而且已经把他们足足浇了个够。

现在我应该再指出一些情况,它们对收购运动的发展已经有了不良影响。

秋天,我们在农村没有足够数量的商品。给农村运来的商品,大约是总量的43%,其余的商品分配给了工人区、城市和其他地区。这样数量的商品是完全不够的,后来才匆忙地把商品按足够的数量运到了粮食收购地区。我们消费合作社以及某些组织这时候成立的向工人供应的委员会采取措施加紧向农村供应的可能性已经大大缩小了,而且消费合作社失去了任何周旋的条件,不可能把商品从一个地区转投到另一个地区去。

应该指出,商业人民委员部在收购工作已经展开了的时候提高了粮食的标

准,结果是在许多地区也降低了粮食的价格。这种状况和商业人民委员部采取的这种措施是农民运来粮食首次有些延迟的原因之一。价格的差异大体上在一普特3到6—7戈比之间。农民的理解是,这是直接降低了粮食价格,于是从这时起,正像粮食收购工作人员指出的,粮食的运出在很大程度上有些停顿了,于是对于其他产品,例如蛋类,甚至在最后讨论这个问题之后也认为不可能降价了。

由于党的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共同采取了措施,也由于动员了党的、苏维埃的和合作社的所有积极分子,收购工作向前推进了,以广泛的规模展开了。当然,这里不得不指出,我们的收购组织,也包括消费合作社组织,对这项工作的准备是不够的。它们对接受和分配商品的准备不足,对这样快速的收购工作也准备不足。由于商品的运入,我们的边缘地区甚至处于了困境,因为运入的百分比是这样的:10月份运到农村的商品占商品总量的43%;1月份在纺织品上,它就大体上占了商品总量的82%,在其他商品上占了70%。运到我们收购的边远地区的商品比计划运进的商品大体上多了0.65亿—0.70亿(卢布)。而与此同时,在银行贷款方面,从消费合作社抽走了大量资金,对按总合同向工业提供的贷款抽出了大约0.28亿(卢布)。这样,我们的边远地区处于了财政困难的境地,不得不把大量的剩余物质积存下来。如果以区联社在12月1日时的积存为100%的话,那么2月就是152%,3月是171%,3月时基层的积存和10月相比是130%。在我们的边远地区出现了工业商品的积压。

在运动的第二个时期,工作得到了充分展开,但是在这里,对我们的组织来说,也出现了一系列障碍。[这里建议的决议中有一点,也就是第二点,反映了已经形成的局势。]调节组织开始推行的基本措施,除了共同力图扩大粮食收购外,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收购。如果是说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在自己的各个点上收购的话,它们在整个收购中只占了不值得一提的比例,大体上是10%—11%。

商业人民委员部机关竭力要做到的是,无论如何也要提高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比重,通过把合作社基层组织收购的粮食转交给它来扩大它的收购。

消费合作社的基层[它们赶着收集粮食]应该把收购的粮食缴到粮仓、车站、码头上的各个点上去,[但是它们不得不把粮食缴出去],算在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账上,而不是算在粮食运到的那个合作社收购单位的账上。这里的情况是,我们的组织,区里的联社对自己在省里的联社承担了义务,要把

一定数量的粮食运出来并且上缴,把它们收购到的粮食运去,可以从省里的联社那里得到钱。但是如果他们把粮食运到粮仓去,那么在那里,相当大的一部分粮食就不是记在这些联社的名下,也不算在这些消费合作社的账上,而是倒进了大锅里,然后根据年初规定的平均标准在向粮仓倒入粮食的收购单位之间分摊。

比如说,在萨马拉省就是这样的情况:合作社向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粮仓运去的粮食占有所有收购量的46%,但是在粮仓中占有的比重只确定为22%。在萨拉托夫省,运到粮仓的粮食占总收购量的25.5%,而根据标准给它们记下的只是20%。到处都是这种情况。

提出来的任务不仅仅是要尽量扩大收购,而且还要尽量突出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在粮食收购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就造成了合作社的收购单位不是把粮食运到20俄里远的粮仓去,而是运到25俄里远的车站上的收购点去。

由于要为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创造出这样的地位,米高扬同志还推行了一项措施,对粮食的收购产生了不良影响——这就是所谓的路条措施。当活跃粮食收购的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合作社的积极分子们跑到了各个村镇去作宣传,让农民把粮食运来;他们在那里给合作社的成员发路条,有的时候也发给不是合作社成员的人。所有根据路条运到粮仓的粮食都应该记在发了路条的合作社的账上。但是后来就无论如何也要禁止给非合作社成员发路条了。除此之外,商业人民委员部命令每个合作社社员在向粮站运粮食的时候,身上要带着合作社的社员证,如果没有,就一定要带上可以替代的证件。商业人民委员部的电报建议:“所有苏维埃机关,所有粮仓的全权代表,执行委员会,镇执委会,村苏维埃都要检查路条的发放情况,记录下滥用的情况,凡是有过失的,就要立即移交法院”,等等。

我们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收购才刚刚开始展开,重要的是让农民能把粮食运来,无论是有路条还是没有路条,也无论是社员还是不是社员。但是既然是合作社鼓动了农民而且给他发了向粮仓缴粮的路条,粮食就应该记在消费合作社的账上。既然粮食运到了粮仓,反正它事实上是受国家支配的,受下达了指派这些粮食的商业人民委员部支配的,而各个组织,包括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和乌克兰合作社联社,都是要把粮食运到商业人民委员部指定的地方。关于路条的命令电报无疑是错误的。

我还想说的是米高扬同志从唐波夫发出的[著名的]电报,可能大家都知道这封电报²⁹。[我不详细援引这个电报了,因为同志们都清楚那些后来实际上并

没有推行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道理的。]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后来部分取消了,部分改变了。电报建议确定商品和粮食的实物交换,甚至在采取所有加强收购的措施但是收购工作也还是没有发生转折的情况下,要采用迫害措施。其中有建议说,要对所有基层的合作社规定没有缴足粮食的违约金,虽然它们是接受了委托进行工作的,还是建议要让所有股东都为没有完成上缴粮食的任务承担物质责任。

由于粮食收购工作的全面活跃,消费合作社在收购中占有的比重是:前半年为全部收购的26.4%,1月为40.7%,2月为44%,3月为43.4%,全年的比重是34.6%。而整个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和全乌克兰合作社联社,到9月1日共收购了2.227亿普特粮食;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和全乌克兰农业合作社联社³⁰共收购了1.739亿普特。消费合作社的全部收购从收购年度之初算起,占了34.6%。

臧声:你说说什么是全乌克兰农业合作社联社。

柳比莫夫:农业合作社——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和乌克兰农业合作社联社一起是27.4%,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是24%,而如果算它自己的收购,用自己的机构进行的,那就大体上要算是10.5%了。

我应该指出,同志们,这里还有一系列调节性质的和行政方面的措施,是商业人民委员部和调节组织针对我们的合作社组织所做的。

我不是说,其他任何人也不会说,在这些组织里没有马马虎虎的情况,工作都是有板有眼的。消费合作社对工作也没有做好准备,对它同样需要施加压力。

但是看来我们的组织在这方面要比其他组织遭难更多,而一些负责人,其中包括北高加索边疆区农业合作社联社管理处成员季申科同志和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粮食管理局副局长奈马克同志,由于米高扬同志的特别命令受到了当众宣布的处分。我们认为,对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惩罚措施是可以和应该采取的,但是我们认为,商业人民委员部超越了自己的职权,因为任何决议都没有授权它对合作社组织和合作社工作人员做出当众宣布的处分。

臧声:那他们能送交法院吗?

柳比莫夫:可以送交法院。合作社组织是社会组织,而且在对它的工作人员当众宣布处分之后,现在按照外国的和合作社的报纸的理解,这正证实了他们的说法,我们这里没有合作社这样的社会组织,合作社是由商业人民委员部指挥的。如果商业人民委员部向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通报了所有发现的不足,在管

理局审议了事件后宣布了这个处分,该是由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自己来宣布这个处分,而且不是对一个工作人员,而是对整个粮食管理局宣布。

卡冈诺维奇:是带着合作社问候的处分吗?

柳比莫夫:应该让合作社组织自己通过相应的措施,在向它们指出不足和忽略的时候,让它们自己动起来,而不是从旁采取行政手段。

我来谈谈消费合作社对提出来的决议中它所不同意的、我们要求修改的那些方面。我们要对第四部分“实际的组织措施”的第二点提出修改。这里说,最终消费合作社作为一个统一的收购系统,应该留在粮食收购市场上。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其他的收购组织在开始时建议的那条路线是完全奇怪的和不可能,政治局也不能走这条路;把一个在最近收购了我们国家全部粮食的44%的组织从收购工作中去掉,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从国家的角度看是犯罪。这只能是意味着收购工作的混乱。

但是,这一条虽然承认了消费合作社这样的地位;把它留下作为一个基本的收购单位了,但是仍然不能让我们完全满意,因为这里得到的情况是,所有收购来的粮食都要集中到码头上,集中到车站附近的各个点上,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粮仓和磨坊里。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粮仓、自己的磨房、自己在码头上和车站附近的点,我们也应该有权在这些地方进行收购。除此之外,把所有粮食都缴到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这种建议只是对消费合作社提出来了。我们建议对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建立起完全平等的关系,就是说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都应该有基本收购单位的权利,可以在偏远的收购点,也可以在自己的粮仓,在码头的和车站附近的收购点上开展工作,因为米高扬同志在谈话中声明了,没有要取消消费合作社的粮仓和磨坊的预想。

这就是说,应该保留我们在自己的点上,在我们有合作社组织的地方收购粮食的权利,保留为自己的粮仓和磨坊收购的权利,把粮食运到自己的点上去的权利。我们对第二点的第一部分提出以下建议:“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依然是基本的收购单位,既在边远的收购点上,也在自己的粮仓、磨房、码头的和车站附近的收购点上开展工作。”

至于第二点,我们建议改变它,应该这样表述:“国家的收购组织(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为一方,合作社收购单位(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和全乌克兰合作社联社,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和全乌克兰农业合作社联社)为另一方,在它们之间制定和推行总合同体系,据此,这些组织收购并上缴到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粮

仓和磨坊的粮食中的一部分(在一定半径内的地区里)交给后者支配。”

这样,在那些有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收购点的地方,也就是有它的粮仓、磨坊、码头和车站附近的收购点的地方,那里的粮食缴到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粮仓去,但不是全部,而是部分粮食,这部分粮食根据全苏计划用于全苏的需要。

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这个建议,以便让我们的组织能够工作,保留下我们的组织对这项工作的兴趣。因为我们有完整的经营:收购、粮仓、磨坊,我们可以用它们再加工粮食并派送到边远地区供应工人和其他的消费地区。我们用自己的磨坊再加工的面粉占全部需求的35%,那些用于消费的需求没有必要再缴给全苏机关,然后再从它那里重新得到我们缴上去的粮食。

然后我们再提出两个修改。一个是关于在第三点里第二段提到的商业人民委员部对合作社的作用。在第四部分的具体建议的第三点里,指出了要加强和想方设法巩固合作社,既包括消费合作社,也包括农业合作社。我们建议做以下的补充:“为了这些目的,认为加强合作社内部的计划和调节,排除来自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它的机关对合作社组织的行政干预是合理的。”

我们认为,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合作社现有的相互关系,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合作社建立的这些相互关系,是不健康的关系,降低了合作社的自我活动能力,降低了合作社的社会因素。我们认为需要做出这样的补充。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需要迎合莫斯科人对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的收购工作做出的声明。我们认为,既然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消费大量的粮食——0.65亿普特,就应该有坚定的信心和有自己的代表,他们通过相应的收购网可以帮助和推动粮食收购工作。我们认为,应该向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提供资金来支持它们的收购工作和组织粮食储备。

从我所说的一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1928—1929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里,有必要保留3个基本的收购单位: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和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

为收购单位,其中包括为消费合作社,建立没有任何损失和压力的、正常的工作条件。

为收购运动组织必要的商品储备和保障消费合作社相应的拨款,以便能及时把这些商品运到地方上去。

粮食收购单位和粮食收购机构以及党的组织和苏维埃组织要为展开粮食收购运动进行及时的准备。

这就是我认为必须提出的那些基本意见。

主席：请埃赫同志发言。

埃赫：米高扬同志说，西伯利亚人曾对强烈的压力提出过抗议。我要说的是，这是不对的，西伯利亚人中从来就没有人对强烈的压力提出过抗议。如果西伯利亚提出过抗议，那就是在两件事上。第一是抗议商业人民委员部不正确地报道了粮食收购运动，而且还在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继续做这样的报道。如果仔细看看商业人民委员部对西伯利亚的粮食收购运动的这种报道的话，就应该能形成印象，西伯利亚不仅没有收购，而且他们谁也没有费一点力气去多少向前推动一下这件事，凡是读到中央报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形成这样的印象。

我想谈的第二点是任务。粮食收购运动要提出任务，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商业人民委员部向边疆区和基层机关提出的任务可以用这个运动来解释。但是我感觉，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规定是对头的，但是商业人民委员部机构运用得却完全不正确，给国家带来了不少伤害。

我来谈谈3月给西伯利亚下达的任务。如果我们在2月份，也就是收购过程中最好的一个月份里，当我们施加的压力到了极点的时候，对明显的富农相当普遍地采用了第107条，这样，我们收购到了0.20亿普特，而在3月，米高扬同志又下达了收购0.21亿普特的任务，我想，熟悉前些年西伯利亚粮食收购过程的每一个人都会说，这样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是因为我们把这一整套任务本身都搞得威信扫地了。当这项任务传达到基层收购单位的时候，它看得很清楚，这样的任务简直就是胡来，这样，在他的眼里，这一整套任务就都变得没有权威性了。第二是与此同时，为完成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荒谬的任务，我们不得不还要准备交通工具。我们需要准备交通工具、车厢，在摊派了不可完成的任务的一些地段把持住火车头和车厢，当然这就要我们的国民经济花费不只一万卢布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出了抗议——我们是有权利对这种态度提出抗议的。

我应该对运动在西伯利亚是怎样进行的说上几句。我们当然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动作起来晚了，而且耽搁了非常长的时间。

柯秀尔：据说比其他地方耽搁的时间长。

埃赫：可能是这样，我同意你的说法。我只是想指出，现在，当我们扎扎实实地干起粮食收购工作的时候，我们做到了在很大程度上完成指令。4月1日我们完成了年度计划的84%。

戈尔茨曼：到2月1日时拿下了多少？

埃赫：我按每个月说不出来，但是在4月1日时，我们完成了年度计划的84%。如果考虑到在西伯利亚大体上4月的上半月是收购时期，再考虑到从5月下半月到6月底是收购时期，那我想，像商业人民委员部机构和中央报刊对西伯利亚的收购过程的那种怀疑是不对的。

需要注意到另外一点，那就是不能只是根据完成任务的百分比进行判断。应该考虑到每一个区在运动中的比重。我可以引用西伯利亚的粮食收购在商业人民委员部粮食收购总计划中的比重。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西伯利亚在1925—1926年度占有6.6%。在1926—1927年度我们占有了8.9%，而在今年的3月1日，和总的收购相比，我们在西伯利亚收购了10%。我们从这中间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给西伯利亚的是一个比起其他一系列地区更紧张的计划。我不想说西伯利亚完不成计划，我们在采取一切措施这样做，而且我们想，我们能够完全完成计划，但是不能在你做出了这样紧张的计划时，要求我们在收购时期结束之前就百分之百完成。如果不是满负荷而是只有一半负荷，是很容易百分之百完成的。而米高扬同志在谈到各个不同地区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次提高了比重，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对这一点说过一句话，吭一声。

马约罗夫：以前缴得少呀。

埃赫：马约罗夫同志，你以前是在西伯利亚收购过的，为什么没有收购到更多呢？——那个时候相反，你是闪烁其词地说给你的负担太重了。

最初粮食收购进行的速度很慢，原因是什么呢？米高扬同志自己谈到了一些原因，柳比莫夫也部分强调了这些原因。我不能不根据我们这个地区的情况对这些原因说上几句，我要指出，我们在第一季度没有商品。如果把1927年10月1日时整个商品供应网的商品储备和前一年相比，那么，和去年相比只有30%的商品储备。这表明了西伯利亚在今年的第一季度是供应不足的，商业人民委员部机构的所有叫嚣没有得到任何反应，没有能让更多的商品运进来。第一季度的计划定得是最小的。就在同时，这个起码的运进商品的计划也没有完成，预计要在11—12月运进来的商品，我们是在1月份得到的。想象在这样的商品供应情况下能够顺利地进行粮食收购运动就大错特错了。

我想谈的第二个方面，是地方和中央都已经搞清楚的那些调节上的错误。我要指出的是我们所有的各种不同产品之间的价格差异。拿肉来说，我们今年在一系列地区收购到的，比去年多了300%—400%。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肉的价格定得可以刺激得到更多的肉，而给粮食收购带来了损失。在这方面可以引用非常多的离奇的例子。就拿著名的雪松果来说吧，

它是出口量排行第二的产品,而且看来是相当赔本的项目。我们今年的雪松果收成很好,虽然这样,价格定得还是高于雪松果歉收的去年。

这些调节、计划和确定价格上的错误无疑对粮食收购产生了消极结果。

柯秀尔:而您是在哪里呢?

埃赫:我不想说在这上面只有商业人民委员部的过失。在这里也有我们的罪过,那就是我们没有及时和足够充分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说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可能关于这一点说得不够严厉和响亮——我们的罪过就在这里。

这里已经说过关于已经进行的降价。应该说今年在运动开始的时候进行了让农民非常不理解的改革,那就是在我们这些年来还没有习惯著名的质量补收款的情况下,就迫使农民转向新的体制,转向实际上是降价的体制,而且界限划得如此生硬,在农民看来,是一种让他们搞不明白的骗局。比如说,湿度为17%的粮食付给他80戈比,而湿度为17.25%的粮食是72戈比,这样,为0.25%我们就要罚款8戈比。事实上这种等级的过渡没有在任何地方和地方上商量过,是在已经展开的运动期间非常错误地进行的,降低了价格,——而且这也是在运动进行缓慢的情况下又加了一把火,更延误了上缴粮食的原因之一。

现在说说商品的供应。1月开始加强了商品的投放。但是我要引起注意的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商品是由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投放的,完全不顾地方上,也就是我们指出的,该把商品向哪里投放。而现在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在这种商品投放后,可以这样说,就像喝醉了酒一样。

就拿一个柯秀尔同志应该很熟悉的区——鲁勃措沃³¹来说吧。把大量的胶皮套鞋投到了那里。(笑声)可是那里谁也不穿胶皮套鞋,而且那里也没有这样的可能:那里的泥可以把高筒靴从脚上拔下来,而米高扬同志把胶皮套鞋投放到那里去。这些胶皮套鞋全死死地压在地方上的合作社里了。

喊声:可以把它们运走嘛。

埃赫:运走要花很多钱。当我们争取让商业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商量运货计划,按我们的计划运货的时候,商业人民委员部坚决拒绝对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这件事和商业人民委员部有大量的信件往来,它认为,哪些商品应该运到什么地方去,从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里比我们在地方上看得更清楚。我们现在很难消化这些商品,而且为此需要更多的开支。

顺便也该说说已经规定的商品结算条件。第二季度对于我们的商品运送网络来说,一系列商品结算的条件大大恶化了。一系列商品的贷款期限缩短了,现

金结算的利率增加了。这导致了我们在西伯利亚不得不几乎是用现金结算的办法得到许多商品。商品在路上要走30—35天,贷款期限又缩短到了如此程度,就和让我们用现金得到商品是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商品运送网络招架不了这样的结算条件,我们感到非常紧张;在过去,当我们要把粮食收购工作推广开来,我们的商品运送网络不得不从基层挖出更多的资金来的时候,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就是对今后来说,它也还是正确的,但是需要让它能适应每个地区的实际条件,我们不要矫枉过正,不要同样看待商品运去需要30—35天的边远地区和商品运去需要10天的地区。结算的条件应该适应市场,而不是要在苏联的所有地区都机械地推行。

在这里还要单独说说调节的错误——我应该说,我们的调节和计划工作在这些年里向前迈出了很大一步,柳比莫夫同志说,米高扬同志不该对合作社宣布处分,这是不对的。不能这样对待。我们这里的合作社和我们的收购机构是相当紊乱的,那里有相当多的缺点,对它的态度应该强硬一些,对柳比莫夫同志那里表现不好的工作人员宣布处分的时候,也不必害怕。我本来想,柳比莫夫同志在这里会证明,从实质上说,宣布的处分是不正确的,那么就可以理解这个意见了,但是既然它实质上是正确的,那我想柳比莫夫同志就无须争论也无须害怕这种压力了。

现在全党和整个党的组织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加强我们的合作社,向基层派去新的工作人员,加强基层,因为在粮食收购运动期间,我们坚信了在这个环节上,我们的指令执行得非常非常不好。

我应该说,在许多地方,我们把事情变得过于行政化了。莫斯科就有一个具体的例子。不久前签订了一个关于牙刷的公约。原来牙刷要求对它也要制定出一个公约来。我想,牙刷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而扩大了,工作也没有得到改善。[我是作为一个歪曲的例子引用这件事的。]我们需要放弃这种过分的行政化做法。

同志们,现在说说纪律。米高扬同志说,应该执行纪律。这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不衔接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在力图为自己积累储备。但是有一点,同志们,是应该说的:只要求模范地完成下派的任务还太不够——应该让米高扬同志下达的那些任务是合理的。我应该对你们说到我们和商业人民委员部机构的一个冲突。在我们西伯利亚这里培植的是“诺叶”小麦(种地的人们应该是知道的),这是纯种的种子,能够改善我们的经营,是专门适合西伯利亚气候的。在我们这里,这些纯种的种子并不很多,但是在商业人民委员部很大的压力

下,在得到商业人民委员部非常严厉的电报后,我们却要把30万普特对西伯利亚来说非常珍贵的种子运到乌克兰去,而《真理报》刊载的一篇报刊文章说,乌克兰把它磨了,美滋滋地吃掉了,使得西伯利亚的农人遭了殃,[夺去了纯种的种子]而后来却又说这些种子对乌克兰是没用的。我认为,这些事实、这些机构里混乱的事实应该消除掉。对我们的要求是守纪律,认真完成任务,而我希望我们也有权要求商业人民委员部更能经过慎重考虑地下达任务,不要剥夺珍贵的、能够适应西伯利亚的纯种种子,不要把它们转投到乌克兰去磨制了。

对今天农村的形势,还有农村中由于进行了那个运动存在的情绪,我要说两句。在引进了新经济政策之后,我们第一次进行了这样的运动,施加了这样的压力。现在我们在农村看到了什么呢?是不是[像在农村里说的]有什么大的回报呢?应该说,最初我们的措施遇到的是一片喧嚣,农村有许多传说。从农村写给红军战士的信里,我知道农村是怎样不安的,而且富农特别起劲地在那里搅和,竭力想方设法为这些传言添油加醋。从农村写给红军战士的信是一片狂吠,但是当我们进行了解释运动,在报刊上做了解释,又自己发表演说,说明了我们的措施是针对什么人之后,我们可以说,从农村来的信中有很大比例还是不安的,但调子已经变了,这些信现在写得调子就平和了。[看着现在的局势]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对富农施加了强大压力,他们企图把中农拉到自己这边来,企图依靠中农。他没有能干成,不然的话,即便是从我们掌握的这些信里的具体事实判断,我们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变化。但是我们从另外的事实也看到,中农没有支持富农。我想,这也更好地证明了,更好地检验了十四大提出的孤立富农的路线³²。如果我们要在十四大之前,在孤立富农和与中农联盟的政策之前进行这场运动的话,我们就做不到这一点了。现在我们做到了,因为十四大提出的党的路线虽然我们还没有充分贯彻,对它的贯彻还有许多缺点,但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李可夫:我们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对合作社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上是不是有什么差别?

埃赫:没有,我不认为是像柳比莫夫同志讲的那样,有这样的差别,说是农民把粮食交给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而不愿意交给国家工作人员。未必是这样。我们这里是另一种情况。[如果是回答问题。]我们的国家收购单位是有规矩的,没有权利也没有条件从自己的收购点上把鼻子伸出去。当然,如果合作社就在旁边,农村里还采用一系列不合法的多付钱的措施(要知道,在农村缴粮要为运送多付钱的),在采用这些措施的时候,合作社收购的比例就会大些。[我说了许

多,而且这里是可以检查的,你们得到的是]合作社今年收购了很大比例的粮食,[在这一点上]请相信我,[你们的贡献]它的过错很小。

主席:请米柳亭同志发言。

米柳亭:同志们,作为对米高扬同志的报告^{的补充},我想在自己的发言里引起你们注意3个问题。联系到粮食收购,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粮食收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在农民所有的粮食资源?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我们在2月的粮食收购运动中发生的转折曾借助过的那些方法。第三个问题很可惜在米高扬同志的报告里没有谈到,那就是在农村中发生的社会变化问题,对于这些变化来说,粮食收购和粮食收购运动的过程无疑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第一个问题,我就不再谈米高扬同志在这里已经举出的数字材料了,只想指出下列典型的指标。当然,基本的情况是,大体上今年第一季度出售粮食对农民是不利的。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基本的问题不在于它,而在于我们制定的计划上的那些错误。在这些错误中,我要指出两个最严重的。第一是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价格政策。7月规定的价格,在9月就降低了,而且就像米高扬同志在这里指出的,在10月、11月最需要的时刻,农村里的工业商品全光了。与此同时,农村的经济状况让农民有了可能不是通过出售粮食,而是出售其他的农产品得到钱,得到比去年多的资金,到1月1日时就多出了1亿(卢布)。在这方面,典型的数字是:1926—1927年度,生产粮食产品的农民在1月1日出售了3.69亿卢布,而今年则出售了2.73亿卢布。但是其他的农产品,他们去年出售了2.73亿卢布,今年是4.19亿卢布。粮食对农民来说是他积累的货币,而且米高扬同志指出的一种情况在起作用,那就是粮食价格和技术作物以及原料的价格差价,这一点激发了农民要把这些粮食作为货币把持着。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根据记忆我应该举出的是,粮食价格指数是108,而技术作物和原料的价格指数是120,甚至到了150。就是通过这样的差价,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考虑到它们的话,就可以看到一种情况,说明为什么农民不缴出粮食来了。

正像你们知道的,1月发生了激烈的转折。2月时,曲线急剧上升,于是在这里就出现了向农民索取粮食的有趣结果。

如果我们看看粮食资源,农民去年的资源,看看去年到1月底的粮食收购情况,如果我们看看粮食收购和农民的资源之间的关系,今年也进行一次这样的行动,那么我们会得到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数字。去年,各个地区对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值和农村资源之间的比例关系是这样的:在乌克兰,粮食收购对农民资源的比例是37%,今年是27%;在北高加索去年是40%,今年是22%,也就是说减少

了一半；在中央黑土专区去年是26%，今年是16%；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去年是21%，今年是11%；在乌拉尔去年是20%，今年是16%；在西伯利亚去年是26%，今年是12%；在哈萨克斯坦去年是22%，今年是18%。你们看见了，粮食收购和农民资源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今年和去年有很大差别。后来，在3月20日时，情况有变化了。3月20日在乌克兰，我们去年达到了44%，今年我们也是44%，在北高加索，去年和今年分别是46%和39%，在中央黑土专区是36%和35%，在乌拉尔是33%和38%，今年的比例甚至上升了，在西伯利亚是40%和36%，在哈萨克斯坦是36%和36%。

这证明了什么呢？这证明了从经济意义上说没有发生过粮食收购上的过火情况，农民在进入新的经济年度时比去年有更多的粮食储备。〔好像这是在一个什么图表上画出来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见到这个图表。在那里，上方绿线和红线表示了1月1日的情况，下面的线表示了3月20日的情况。〕这就是对明年的粮食收购来说我们非常珍惜的结论。

我应该说，看来明年统计播种面积要比去年更困难。通过检查专家委员会³³的数据和粮食收购的情况可以看出，专家委员会的数据是有道理的，但是今年必须特别仔细地统计播种面积，最终是要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这种统计来考虑农村的粮食储备。

我要说两句的是，对一系列省做的监督检查表明，隐瞒面积的比例有的时候可以是16%—70%。用对播种面积的监督丈量或者借助高空拍摄，然后再和通过询问农民得到的数据相比较，指标的不可靠的幅度有时是在16%到70%之间。这样不准确的指标是经常会有的。萨拉托夫省是这种情况，高加索也是这种情况。

现在，同志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关于粮食收购的方法。很清楚，决定性的因素是向农村投放工业商品的经济措施。这是第一。根据我们的数据，大约有2亿多的商品投到了农村。这大体上比确定的计划高出了50%。这是第一个措施。

第二个影响了粮食收购过程的措施是借助于农业税、捐献、国家保险和公债从农村提取货币资金。这样，根据某些数据，在相对短的时期里，从农村提取了大约1.20亿。这个措施刺激了农村对工业商品的需求，也刺激了向市场投放粮食。

除此之外，还有这里已经说到的行政措施。关于行政措施我想说两句。在这里向我们提供的提纲里，整整一章说的是地方上对我们政策的歪曲。歪曲无疑是有。可能每一个将走上这个讲台的来自地方的同志都将能举出不少这类

的歪曲来。但是在我看来,提纲忽略了什么呢?我感觉什么是必须完全明确和清楚地向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强调的呢?那就是党无疑拯救了我们的经济局势。拯救了我们的经济局势,否则我们在1月就要面临必须从国外进口粮食的局面了。对这一点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里就发生了转折。有负面现象,有歪曲和扭曲,等等,但同时不能忘记这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是必须指出的。所以我想,在提纲里,在那个我们在这里将通过的决议里,也该强调这一点。

最后,关于社会变化。收购运动当然显现出了这一点,而且现在也还在显现。这样做的结果在明年也会在农村的社会变化上显现出来。对这些社会变化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对它们应该睁大眼睛看着。现在农村发生的是什么情况呢?应该回答两个问题:朝什么方面发生了变化和在农村是不是可以期待会发生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我的感觉是,在农村发生的变化是现在贫农和中农群众的作用提高了。第一,今年的播种面积和播种面积的分配将不同于去年。可以期待的是,播种面积的增加将来自贫农和能力不大的群众以及中农群众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期待的是富农这部分人将会压缩播种面积。现在暂时还难说哪一方面将占优势。我们暂时还没有……

莫洛托夫:可能是我们这方面。

米柳亭:关于收成情况现在还很难说。我们将大体上在6月统计播种面积,那个时候将可以大体上说出来了。这里只能是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景象。著名的统计家、来自萨马拉的巴斯金来了。他说,在萨马拉省,大体上可以期待有20%的播种面积增长。(会场上有喧嚷声)这是很大的增长,而且正是很能说明贫农和中农播种面积在增长的。

另一方面从敖得萨专区来了播种面积压缩的消息,富农农户的工具减少了,所以我们有的是这两个过程的彼此交织。然后在今年将会出现农业工具的再分配。这是肯定的。

第三,由于这种情况,为了明确地调节播种面积的过程和收割的过程,必须以相应的方式提出我们的信贷政策、财政帮助的方针,并且要把握住农村从事生产的群众的新高涨。现在由于一系列的优惠等等,集体化将会发展,但是这里也是有危险的;如果我们不能用相应的组织措施把握这个过程,那么可能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缺点,考虑不周和错误等等,它们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给这个过程刹车。要消除那些我们曾犯过的错误,保障我们面临的前景,这就是必须最严肃地加以考虑的情况。

主席：10 点钟。要么我们再听一位发言？

喊声：不！不！

主席：那么明天早上 10 点开会。

第二次会议

4月7日上午

主席(李可夫):上午的会议开始。雅科夫列夫同志发言。

雅科夫列夫:当年,我们的党中央在向粮食收购地区的地方组织下发指令³⁴的时候,曾指出过,在我们手里有足够的施加影响的杠杆,让我们能有粮食,全部问题就在于,我们不会和我们腾不出手来利用这些杠杆。在组织下一次粮食收购运动时,这一点应该略微比现在的提纲更突出一些。在这些提纲的第三部分,我们可以读到:“全会认为,随着粮食收购运动中的各种困难的消除,由这些困难引起的非常措施应该失去自己的作用。”

这有些不清楚,于是一些地方上的工作人员便问到自己:将来还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收购粮食吗?提纲应该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不仅是不能这样做,而且需要及时采取所有措施来做到不需要这样做。

柯秀尔:这不完全清楚。

雅科夫列夫:但是,越是能早些说明非常措施可以自动地失去效力的话,这就会越清楚。这样就能在准备下一次粮食收购运动时提高我们的警惕性了。

当提纲里指出地方上发生的扭曲时,不能对一个事实保持沉默,那就是在一系列情况下,说得缓和点,促成这种过分做法的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机关在对某些运动发出某些指示的时候没有进行什么活动。

我可以拿捐献为例。这个问题的情况怎样呢?1927年8月颁布了关于捐献的联盟法令。直到1928年1月,无论是俄联邦还是乌克兰,都没有颁布自己的共和国法令。1月2日颁布了乌克兰的法令,为的是使它能和党提出的按这种捐献向居民征收资金的任务相适应。俄联邦的情况更糟。1月8日公布了法令,说到不超过35%的农业税要通过捐献来征集。后来出现了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指示,说是可以把这个比例提高到50%,不过要知道,关于最多是35%的农业税的法令是俄联邦政府签发的。后来又出现了对联邦联盟法令的修正,根据地

方上的省执行委员会的申请,可以把农业税的比例提高到35%以上。最后出现了对俄联邦法令的修正,说是省执行委员会可以根据县和区的请求提高捐献。但是对能不能提高捐献的比例这个问题,给我们的回答是,县里和区里没有请求这样做。

当然了,难道可能找到一个区会要求给它提高捐献的比例吗?这就是我们在这件事上存在的不衔接的地方。部分原因是,由于这样,地方机关不能不匆忙地推行许多措施,虽然这样做并不能让错误和扭曲有所改变,虽然这些错误和扭曲是该受到谴责的。

我想再谈谈第三部分说到的关于下一个年度组织粮食收购运动中的经济措施。显然重心将要放在用各种经济措施扩大总产量和它的商品部分。在这件事上,签订合同的作用还阐述得不够。这里说到,在看到扩大了根据合同预支付给农民的数额的同时,中央委托政治局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扩大总的播种面积,特别是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但是我们还没有直接涉及粮食作物的合同,而这个问题是应该涉及的。在这里应该事先就说到,合同绝不仅是意味着要支付预付款。如果想在秋天粮食收购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能够在拿出大量的资金为过冬的种植面积支付预付款的话,那是可笑的。

例如,和土地社³⁵签订的播种纯种种子的合同难道一定应该以预付款为条件吗?完全不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向播种的人供应种子就够了。

国家发放的种子在一系列条件下可以限定条件,在最近一次的收成中要有相应数量的粮食上缴给国家。实现农村的机械化、供应种子、提供农业贷款、采取农业技术改造的措施、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及在集体化基础上改造农业生产的形式本身,都应该通过签订合同和促进扩大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主要是提高它们的收成,保障在收成之后国家能得到粮食的措施联系起来。这一点需要在提纲里强调。

最后,关于组织粮食收购机构的问题。我想,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还没有谈妥。这一次粮食收购运动和以前的运动最大的不同,就像米高扬同志昨天正确指出的那样,在于合作社被推到了首位,占据了所有收购的3/4。虽然也采取了措施扩大国家机构的收购,但是它占有的比重还是在下降。

应该向我们的合作社人员们指出来,国家向合作社提供了一系列优越条件:把农业贷款和生产供应集中到了农业合作社这方面,供应工业商品集中到了消费合作社的手中,对合作社有追加支付,还有在边远地区的收购点的收购工作,等等,是所有这些在粮食收购运动中把合作社推到了首位。

(柳比莫夫的插话,没有听清楚。)

柳比莫夫同志,在这方面,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说,你走了出来,如果你们要取消我们的收购,那根本是办不到的事。柳比莫夫同志,我们两个人都是搞合作社的,我以前是,你现在是。当我们党的十五大在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里规定了进一步提高合作社的比重,减少国家机关的比重的时候,这个决议强调了,这样扩大合作社工作一定是要在保障国家的利益和直接在国家监督和领导合作社的情况下进行的。³⁶而今年的情况怎样呢?无产阶级的中央机关虽然工作起来有某些官僚主义的扭曲,还有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我们用非集中化的和非国家化的机构——合作社取代了。A.伊万诺维奇昨天向埃赫同志提了一个问题不是偶然的:一个合作社的职员和一个国家机关的职员是一回事吗?作为一个职员,他可以通过劳动交易所从国家机关转到合作社去,或者相反。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和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相比,我们对合作社施加影响的办法更少。对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下命令要比对合作社更容易。说得轻些,我们的合作社对于完成国家的指令来说,不是站在应有的高度上的。[正是因为合作社的收购和工业商品从总体上说是集中在偏远的各个收购点上的。]他们在价格上搞的手脚要多少有多少,在偏远的点上,多付款的情况要比在靠近车站的点和粮仓等地更难观察。我可以指出下面的例子。我参加了莫洛托夫同志在粮食收购地区的工作³⁷。[也就是以那些无产阶级专政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各个点上的价格,也就是我们应该作为工作起点的那种价格为依据。我们不会放弃这种做法的。当然可以说,米高扬同志搞得过于行政化了。]在梅利托波尔专区普里什勃站附近我们就遇上了“结合”统一消费合作社。它收货的票根上对粮食的实物、档次和湿度等都没有做任何记录。统一消费合作社给缴粮的人多付了钱,而且缴粮是按照协议价格支付的,这个合作社就赔了本。当时有一个区联社给这个合作社补上了这些损失。怎么样,这种状况可以忍受吗?这是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呢?从这中间是不是就能看出,如果合作社机构在粮食收购问题上居于首位了,它就应该像样地执行我们的价格政策呢?当然,现在不可能在这里就为最近的运动确定粮食的价格。中央全会现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关于价格,关于起步的价格,车站附近的价格和粮仓的价格问题,关于偏远的收购点的问题,关于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监督的问题,应该作为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这是无疑的。

联系到这一点,应该提出关于合作社粮食收购机构的问题了。要知道什么是联合消费合作社吗?它主要管的是柜台,而粮食只是副业。农业合作社做的

买卖,除粮食外,还有各种硬果、皮毛、油料、亚麻,他们什么都做,专门化的国家机构被放在了很靠后的位置上,而我们是在把收购工作转交给一个有什么就干什么的机构,从来就不可能指望它在工作中能有什么准头。所以,如果我们采取的路线是让消费合作社在各个基层环节上都能和全苏粮食公司机关结合的话,那么,对农业合作社就应该更明确地提出,它的粮食工作应该专业化,它的机构从上到下都要能相应地实现专业化。提纲里对于这一点点什么也没有说。米高扬同志对我说:“农业合作社这方面的所有一切照旧没变。农业合作社的专业化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请原谅,你是在谈到合作社总的情况下提出的问题,但是在说到粮食收购时,我们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件已经成熟的事情。]但是许多工作人员感到吃惊,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对农业合作社只是说了一点:要加强农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干部呢?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在米高扬同志提供的数字里有不准确的地方——只是在集中收购这部分,农业合作社的收购占总量的25%,而基层收购的数量并没有考虑进去。而且在乌克兰和在其他基本的粮食收购地区,农业合作社是占第一位的。结论怎样呢?结论是这样的,这个农业合作社应该实行专业化,所有类型的合作社的工作安排都应该是必须完成国家的计划,在价格上,不应该让它能违反规定地进行补偿,那时也就不会因宣布给予处分而有什么抱怨了。主要的不是处分,当处分发展到了处处可见的时候,它就失去了效力。需要让合作社知道,国家指派的任务和价格对于它们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在需要根据国家的计划把粮食送到相应的地区去的时候,合作社不能用“是我合作社搞来的”作为借口……

柳比莫夫:请你不要把“合作社”和“是我合作社搞来的”说得那么俗气——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好。

雅科夫列夫:而且要让合作社的工作变得比现在更明确,否则我们就不得不扩大国家粮食机构的工作,让合作社有所收敛,因为我们不能让对工人群众和红军正常和没有间断的供应受到威胁。

主席:请波斯特舍夫同志发言。

波斯特舍夫:我只是想引起你们注意几个问题。首先需要表示,完完全全同意米高扬同志的意见,还像今年我们正在做的那样继续收购粮食,那当然是不行的。不需要再说不能这样收购的原因了:大家都很清楚和理解这样的收购方法的害处。首先,我们所进行过的所有运动都是周而复始的:收取税收的欠款,支付给合作社,然后是捐献和农民的借债——所有这些本来可以按照更平静的秩序进行,那么农民也就会掌握和明白了借债和捐献对他们来说为什么是必须的,

是有益的了。而这种快马加鞭的做法让农民感到恼火,而且无疑会让我们在农村里的所有敌人如虎添翼。党的组织在这三个月里承受了收购工作的所有重担,他们被搞得极为苦恼,处境非常艰难。合作社的机构和粮食收购单位当然也被搞得很苦恼,而且最后是削弱了党的组织需要进行的基本工作。所以肯定必须放弃这样的工作方法。是极度需要迫使我们采用了这样的办法收购粮食的,因为国家的处境非常严峻。但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收购方法,现在应该预见到一切,而且照我的看法,需要更多谈论的不是我们在怎样收购粮食,而是第一,将来我们该怎样收购粮食。现在我们该怎样把粮食收购机构调整好,让它能够及时地胜任这个任务;第二,我们将拿什么来进行新的粮食收购运动。米高扬同志的报告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发言的同志们也没有特别讲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很好地研究了粮食收购机构,也揭示出了苏维埃的机构中的一系列缺点。在这方面,粮食收购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现在,所有这些考虑不周的东西都应该去掉。但是,在未来的粮食收购运动中,不仅仅是这些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也将需要考虑另外的情况:我们能给农民什么,当我们给他们的时候,我们又掌握了什么。现在需要更好地研究一下这些问题。

同志们说到价格遭到破坏。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把这些破坏的情况消除掉,我们就将又会面临困难。这就是价格遭到破坏的原因之一:纠正了的大麦价格破坏了对黑麦的收购,破坏了对小麦的收购,因为农民从来就没有见到过大麦有这样的价格,它比黑麦的价格都高,几乎和小麦的价格相当了。是穷苦把我们推上这条路的,没有作种子用的大麦,啤酒工厂有可能要停产。我们对大麦的加价好像出台的时间不对头——不能就这样把基本工作破坏了。对技术作物、甜菜和土豆的合同也是这种情况。土豆价格的确定破坏了甜菜合同,因为发现了酒精工厂的土豆不够了。应该扩大土豆的播种面积,那就提高合同的条件吧,自然农民便一股脑儿地栽种土豆了,减少了甜菜的播种面积,农民要做的是对他们更有利可图的事,而我们则是既需要甜菜也需要土豆。我们怎样也做不到把这些欠考虑的事情都考虑到,让一件需要做的事不会破坏了另一件同样需要和同样必须做的事。

最后,我们对农业还是像见到黑压压的森林一样。米柳亭同志在这里发了言,他是领导统计工作的,我们怎样才能最终把农户的情况搞个明白,该从何开始,怎样对待,他也说不出任何肯定的东西来。

就拿粮食收购来说吧——我们不知道,商业人民委员部也不知道,老乡有多

少粮食,在哪里,粮食收购机构也同样不知道哪里有粮食,能收多少。当我们开始施加压力的时候,搞清楚的是,商业人民委员部说没有粮食的地方却发现了大量粮食。于是国内贸易委员会的计划被推翻了。现在到了播种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情景,我们不知道哪里种多了和种得不够,多种和少种了多少,需要把种子材料送到什么地方去,需要的是什么种子,需要多少,等等——我们都不能准确地知道。村苏维埃是一个说法,区执行委员会是另一个说法,专区的农业局又有第三种说法,农艺师有第四种说法,农业人民委员部有第五种说法——你随便选择任何一种吧。最终该是让粮食收购,播种活动,技术作物以及整个农民的经营这样重要的工作对我们来说不是两眼一抹黑了,我们最终该是能走出这个黑压压的森林,不要在里面迷路了。而我们现在是在那里摸索着工作,如果我们老是在迫不得已地工作,如果我们总是面临着这种或那种威胁、困难,那就很不好。

我们在合作社问题上,在粮食收购机构里的错误和考虑不周,都是由此而来的;所有这些考虑不周和错误都能用这一点来解释。应该摆脱这种境地,那样我们就不会遇到我们在粮食收购中遇到的那些困难了。

主席:请库比亚克同志发言

库比亚克: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个米柳亭同志在这里提出了意见的问题,因为对秋天来说,在制订谷类饲料平衡表的时候,米高扬同志的这个意见有可能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因素。米柳亭同志声明说,今年农村储备的粮食比去年多。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在许多地区征收的是原来储藏的粮食。就拿萨马拉、萨拉托夫、巴什基尔、哈萨克斯坦和一系列我们在那里收购了原来储备的粮食的其他省份来说吧。[我们对原来储备的粮食采用了第107条。需要想到的是,在一些地方把所有粮食都均摊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拿那些已经被生活推翻了的数字做文章完全是危险的和有害的。我感觉,当然农村里有粮食储备,我们没有把所有的都拿走,但是剩下的绝不会比原来的多,因为即便是剩下得多,我们也会根据第107条收走的,因为……粮食收购计划还没有完成呢。(笑声)

第二个问题是,波斯特舍夫同志说,当我们说到农村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农村,需要让商业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其他的组织了解农村。当然是需要了解农村。要知道,关于富农我们写了多少决议,而当需要对富农采用第107条的时候,省委、县委和镇的党和苏维埃机构便开始走门串户地寻找这个富农。[把全村都挖遍了——就是没有找到这个富农。]

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这里真的没有富农吗?而问题在于我们只是议

论了[而没有进行登记]。我不知道,当党的组织和地方组织在农村转,要采用自己的第107条的时候,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时机,对农村进行了登记。因为是县委和省委在那里,在地方上,在自己的农村里寻找富农,当然商业人民委员会更难知道他是谁,它离农村更远了。

米柳亭同志的意见是,决议里一定需要写进一点,说党已经完成了粮食收购的任务,说需要这样做是为了外部世界,为了欧洲。没有这么回事。干什么需要这样做呢,谁在怀疑能够胜任呢?谁也没有怀疑。在10年里,党证明了它是能胜任的,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还需要全会来重申吗?当然不需要。[全会不应该再多余地重申了。]

柳比莫夫同志说,合作社收购到的粮食多,而且如果没有妨碍,它收购到的会更多。他说,合作社的积极分子在这场收购中感觉到了如此需要拿到粮食,甚至跑到了农村并开始为粮食做鼓动宣传和发放路条。不是这样的,柳比莫夫同志。我就不说这个了,也不来证明这一点了,因为每天在实践中都看到了,发路条的同志们是怎样就坐在这里的。[路条的票根并没有填写,你们的合作社主席是带着自己的邻居结伴到农村去的,而且说是我们在那里将会从粮食收购点上得到某种追加费。他把这记在了和他一起去的同伴的路条上。当然也有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事——路条是在啤酒店里发的。有过这样的事情。]所以,需要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两种类型的合作社组织为了收购粮食,搞得乌七八糟;他们说:你不把粮食给我们,我们就不给你们商品,你不给粮食,我们就不给机器、贷款等等。当然在这样的行政压力之下,当老乡总还得要依从我们的时候,在供应农村的战线上,城乡之间的衔接是非常严肃的事。当然老乡们不得不运给你们。

柳比莫夫同志在这里说,粮食断档的重要原因或者重要原因之一是什么工业商品;如果有工业商品,就不会有这种断档了,就没有必要削减粮食收购了,等等。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工业商品过去和现在都是有意义的,但是主要的原因是价格。我们有一些区是有工业商品的,当然数量并不够。我到过鞑靼共和国,到过奇斯托波尔,那里的合作社有商品,老乡也在运粮,不能说他们在拖延,但不是运给我们,而是运给付钱更多的私商。既然基本的原因是粮食的价格,那么在这里需要的是采取面向未来的相应措施。在向中央全会提出的决议里,有一个部分,就是要削减收购单位的那部分,有一些预测,说是我们在明年将减少竞争,但是我总还是感觉不够。磨面工业国家托拉斯还是一个独立的收购单位,也就是说我们还留下了4个基本的收购单位:两种类型的合作社,磨坊以及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将把自己的收购转交给面包

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但是它将不是为了洛巴切夫同志的那双好眼睛转交出去,转交是要收一定利息的,也是为了得到这些一定的利息,为了维持自己的系统,使它真正对粮食收购工作,对经营工作能够有所准备,它们也将力图收购到更多的粮食。而为了收购到更多的粮食,既然将会有这样的追求,它们也将会竞争,就像现在它们在竞争一样,而竞争是国家能够做得了的。也就是这种众所周知的做法,按等级、湿度等打折扣。在农村,一个店铺的主管怎么能确定等级呢?等级用眼睛还可以看见,那湿度呢?我到过偏远地区的磨坊收购点上。他们说:标准就是这样,价格就是这样。怎样检查呢?很难检查。磨坊主用牙咬粮食的办法确定它的湿度是多少。所以,在这种基础上的打折扣,竞争、多付、少付等等,在一些地区的浮动幅度完全有可能达到20戈比左右,而在磨坊里就更不用说了,一个农民把粮食运来了,你怎么检查呢?磨坊主把它买下了,倒到烘干机里或者倒到坑里就完了。

怎样测定质量呢?农民运来了二三十车粮食。他们从车上拿下一袋来,舀出一勺子这样的粮食,就按照一辆车上的一袋子确定了粮食的等级和湿度,于是说粮食如何。我觉得在这部分需要做出一些相应的修改。我不知道是怎样的修改。可以转而采用确定等级的办法:一等的、二等的和更多等级的,不要采用这种标准。

同志们,这里当然是有将来要考虑到的原因的。第一,价格政策,粮食作物和畜产品的价格差距。第二,在过去的运动中,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定价太迟。7月和8月在收购粮食,价格太高(例如在鞑靼共和国),而在9月就定出了另外的价格,并没有考虑前年的粮食不好,今年好些,在鞑靼共和国,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给出的粮价降低了12戈比。8月,鞑靼的工作人员好像是用92戈比的价格收购好粮的。而在去年,是用同样的价格收集了劣质的粮食,可是在9月,他们又不得不减价12戈比。当然,老乡们不走运,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在确定固定的收购价格上动作太迟缓了。它一直在拖,在和地方上争论,自己下不了决心做出决定,地方组织也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到处都在争论,说是这样的计划不合适。我们在省里,在边疆区里收不上来。需要减少计划,需要记住关于价格的争论在一些地方还在继续。我在1月和现在中央的指令已经下达之后,在地方上都看到了省委、州的组织、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讨论关于提高价格的问题,向自己的下属地区散发秘密公文,说是他们已经向莫斯科提出了提高价格的问题。难道老乡们就不知道这些吗?要知道在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关于提价问题的议论是在农村中有反应的。农

村变得警觉了,在期待着,把粮食囤积着不运出去。这样的情况是十分危险的,而且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它们肯定都将会对粮食收购产生不好的影响。

还有第二点——磨坊价格。磨坊价格的状况真正是一塌糊涂。是的,为磨坊规定的价格是应该比对偏远的收购点上的价格高,为的是不要在转运粮食的时候再加价了,这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收购点和磨坊就在一起,而且就在市场的旁边,那么,当你规定了磨坊价格高出7戈比的时候,老乡运到市场上来的时候,难道他还会去分析你的政策吗?他的理解是我们把价格压下来了,于是马上就不运来了,而且要抬价。我们越是往下压——向我们提出的加价就会越高。

而且商业人民委员部,至少是魏采尔同志,有好几次是一会儿一个价。这个磨坊价格搞得是一塌糊涂。而老乡就是老乡,他为一个戈比可以跑上百俄里。如果在那个市场上能多给他7个戈比,你能认为他是一个傻瓜吗?他会说:我们再等等,还会给更高的价。这样,我们就自己刹了车,自己把粮食收购工作给停下来了。

还有一个意见:米高扬同志说,粮食收购组织的附加开支低,合作社的附加开支高,它们的低。这是绝对不正确的。我拿着铅笔检查了这些数字,原来在一个省城里,把粮食从市场上运到磨房,而且磨房离市场一俄里,把粮食倒进磨房的粮库里,——普特大麦多用的开销是2戈比。

最后一个意见。米高扬同志[在这里宣布说,我们在夏天给农民下保票,向他们要保险费,然后在他们发生了火灾的时候还给他们。我想,如果村子烧了,它并不会因为能拿到钱而富起来。第二]说,给了0.32亿普特种子。怎么说呢,给了0.32亿很好,但是和我们埋在了地里的,这简直是小小不言的了,是0.32亿比6亿。再有就是种子贷款制度。这里又是各种小动作。我们向全国宣布了给农民的贷款是7.17亿。而我们现在不得不把这个数字减掉0.5亿,或者是从什么地方找出0.5亿来补上。也就是说是一个不现实的计划,也就是说是为农业确定了一些主观臆断的、不现实的数字。

关于播种运动,米高扬同志说,萨马拉省预计要扩大20%的播种面积。现在播种运动还没有开始,但是从各种不同的材料,从各种不同的来源得到的情况判断,我们可以想象,至少农业人民委员部是坚信播种面积能够增加3%—5%的。但是问题不仅在于规模,而在于要提高收成。[不能说收成会特别好,因为散发给各个地方的种子是不符合标准的。]我的感觉是,在提交给中央全会的建议里,需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粮食的价格要固定和清楚(要取消打折扣之类的做法)。

主席:请什维尔尼克同志发言。

什维尔尼克:同志们,政治局的提纲十分充分地分析了粮食收购领域里发生的困难,完全正确地规定了在未来的粮食收购运动中开展工作的途径。我想谈谈在我们乌拉尔那里最近的实际做法。例如,就拿 1926—1927 年度和 1927—1928 年度的计划收购比较,我们在 1927—1928 年度的 5 个月里,和 1926—1927 年度相比,所有农业产品的增长都达到了 115.6%。而且原料和易损坏的产品在这 5 个月里的计划收购增长了 56%,而粮食收购总共才达到了 88.4%。价格指数向我们揭示的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说在 1924—1925 年度是 100 的话,那么我们在 1927—1928 年度的第一个季度,在粮食上达到了 94.3%,而易损坏的产品达到了 130.5%。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在这次粮食收购运动的过程中,我们的价格问题处理得不完全正确:我们是用向畜牧业产品和技术作物产品支付很多的办法,而且我要说是太多了的办法,刺激了这些产品的上缴,而且这样就限制了对粮食市场的投放。所以完全清楚的是,就收购来的产品数量而言,粮食作物在这个时期大大不如去年了。我想,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得出以下的结论。应该在不提高粮食价格的情况下,调整畜牧产品和技术作物的价格,排除粮食价格和其他类型的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巨大差异。但是要确定这样的价格,使得它们能够刺激技术作物和畜牧业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我们在着手进行新的粮食收购运动之前应该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调整这些价格,依然维持这次粮食收购时期的情况,那我们就会又在粮食收购领域里感到困难。

同时我想请你们注意到商业人民委员部存在的一个缺点。在最近这段时间里,这个缺点和抛出来的“捉老鼠,捉田鼠,捉狷鼠”等等之类的口号应该算是同出一辙的。老乡们在捉老鼠、田鼠、狷鼠了。

斯克雷普尼克:是不是象虫中的一种?

什维尔尼克:不是,这东西和象虫不一样。结果怎样呢?老乡们开始捉老鼠、田鼠、狷鼠了,而且在一些情况下,一个农户的收入可以达到 200 卢布。为什么?因为一只就可以卖 35 戈比,甚至更高,我想,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当然,捉老鼠、田鼠、狷鼠是需要的,因为所有这些可以构成一个非常像样的出口项目,但是我看,像今年这样的价格收购是不行的,应该给这种政策划个界限。商业人民委员部应该定出价格来。

(有一句话没有听清楚。)

斯大林:不要欺负田鼠了。

什维尔尼克：斯大林同志说我们欺负田鼠。我们不是欺负田鼠，但是由于这样，老乡们就在为有田鼠生活的地段打架了。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调整，——这件事应该管，这是一件不坏的事，但是需要确定出价格来，让它不至于破坏了个别地区的粮食收购工作。需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是总的关于畜牧业产品的价格的。有一个为我们的统计工作服务的志愿记者写道：“一个农民缴了30卢布的农业税，按3.5卢布一普特卖了4普特肉，7.5卢布一普特卖了一普特短麻，还缴了两张兽皮，每张7卢布。你们看见了，他是怎样缴税的，出售之后还剩下点钱。农民总是竭力把粮食保存在夏天。而我们从观察中知道，大约是在1928年7月中旬，就像过去的年份表明的，价格又将会抬高。”他涉及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有的情况是，在一些农业地区，贫农需要自己弄到粮食过日子，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储备的话，我们就不能向贫农供应。我们看到，现在没有粮食市场，在个别的农业地区，由于没有它，贫农的处境很艰难。我们没有贮备就没有办法帮助贫农，而我们是应该向一些地方投放粮食来从食品上帮助贫农的。我们没有见到商业人民委员部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我想，我们需要在这一点上谈妥，让各个州有粮食资源可以投放到个别地区去，投到贫农在粮食上处于艰难境地的地区去。为此需要数量不多的粮食，但是它能够减缓一些地区存在的尖锐局面。

同志们，无疑粮食收购运动揭示出了党的组织、苏维埃机构、合作社组织和国家采购单位工作中的一系列考虑不周的地方。正像提纲里说的那样，这些困难“有导致发生国民经济总危机的危险，从根本上说，它们是由于经济原因而产生的，而这些经济原因又是和它们的社会阶级表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一切都是正确的，而且米高扬同志对它们做了正确的分析。但是我们必须在全会上强调我们的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以及合作社工作的缺点。这也是清楚的。例如，党组织的工作。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呢？在中央开始发出警报之前，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领导是一般性的领导。不是说我们没有研究粮食收购问题，我们及时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在莫洛托夫同志从中央来了之后，我们的领导变得更具体化了，我应该代表乌拉尔为这种具体的领导对中央表示深切的感谢，这样的领导在我们的工作中是不够的。我应该在这里承认这一点。我不知道，也许在其他地方情况要好些，但是我们这里是一般化的领导，这是对的，而在莫洛托夫同志来了之后领导具体了，这也是对的。我不知道，可能乌克兰人那里的情况是另一种样子，但是我们这里，至少（笑声）我们是不会见怪的，而是要对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柯秀尔:乌克兰人正相反。(笑声,喧哗声,有人在交谈)

什维尔尼克:现在我们那里揭示出了什么样的缺点呢?这些缺点基本上需要归结为,第一,我们很少关心把苏维埃机构放在应有的高度上。关心很少。我们有一系列的决议,非常好的决议,说是如何需要做好苏维埃工作,应该争取达到什么,但是粮食收购的实践暴露了苏维埃机构工作的一系列缺点。例如,就拿收税来说吧。结果是一塌糊涂。虽然我们也有机构应该能及时把税收上来,应该关心这件事,也有了确定的期限,——这些期限过了,税却没有收上来。如果说我们在3月1日当天在乌拉尔州总共收上了今年的各种税收4514.4万,而且所有这些税的60%是1、2月份收的,那并不是因为苏维埃机构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工作,而是因为州委常设局的成员,党的专区委员会委员到了地方上并推动了苏维埃机构,确实安排好了这次收税。数字很好地说明了,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的情况不完全是好的。

我们这里挑选苏维埃干部的情况也很糟糕。我在农村大约呆了4个星期,走遍了一大批农村苏维埃,地区,等等。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情景是:你来到了区苏维埃,开始盘问情况怎样。通常主席是带着数字来的,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以前他从来就对这些数字不感兴趣,没有研究过,而是在我们来了的时候把这些数字带来的,也不知道人家要问的是税收情况怎样,等等。他一来就说我们什么有多少,什么有多少——我们感觉到,看到的是,往往对这些数字完全缺乏理解。领导成员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对解决苏维埃机构和它的基层环节面临的那些问题没有足够的准备。可以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至今都没有足够注意选择这样的苏维埃领导干部。作为一种个别的评断,我可以引这样一个例子:在区执行委员会里,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党外的财务科科长手里,很多事情——能不能及时把税收上来,是不是要施加压力,等等——都取决于这个党外的科长。区执委会主席很少领导自己的机构,特别是很少领导机构中的这个部分——财务科科长。应该改变原来存在的那些考虑不周的地方,区执委会主席应该更多关心这个领域的工作,而且实质上应该领导这个领域。

同志们,现在我想谈谈合作社存在的那些缺点。当然,米高扬同志对领导合作社的同志们做出处分,对他来说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你能怎么办呢?我们几乎到处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情景——合作社的人员是坐在办公室里制定收购粮食的计划的,并没有在这个计划的周围创造出任何合作社的公众舆论来。我可以完全负责地宣布,在这件事的周围绝对没有任何公众舆论。当我们在地方

上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合作社的农民说:如果原来对我们说了,我们本来是可以完成算做我们该完成的合作社计划的事情的。

在合作社人员的种种失误中,还应该指出他们是怎样制定自己的粮食收购计划的。他们在7月份制定了计划,把它送到了中央,没有考虑到曾经下过冰雹,也没有削减去冰雹砸死的,而在1月时人家对我们说,计划不可能完成,因为下了冰雹。可是,如果合作社的领导组织没有考虑到冰雹砸死的,那这是什么计划呢。合作社有很大的缺点,而且清楚的是,本该是为这些缺点而感到羞愧的。但是当然还是应该看到社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之间的差别的。我想,米高扬宣布了处分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灾难,相反,这样做是对的。

还有一系列的缺点,但是我不再去说了,现在就转到调节机关的问题上来吧。我的感觉是,米高扬同志提出了关于调节机构软弱的问题,他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当领导调节机构的人平均月薪只能拿到65卢布的时候,我们怎么能选择到一个多少不仅在经济上懂行,而且甚至是一般有些文化的人呢?难道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人员来从事这种像地狱一样艰苦的工作吗?你什么也没有,却要去调节。——如果能有一些能够回旋的储备,那还轻松些,可是如果什么也没有,又要调节——这就是很困难的任務了,而且我们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人员。按我的看法,提纲里说得对:应该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

同志们,我想说,光是收购到粮食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有经营头脑地使用它。现在说有经营头脑地使用它,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现在从乌拉尔运出来了600万普特的粮食。我们可以答应再继续运出来,完成指标吗?我们可以答应。我们是不是想完成计划呢?我们想。我们想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改变年度计划吗?我们不想,我们要100%地完成它。但是,同志们,这个问题应该和粮食收购的速度结合起来。应该确定从乌拉尔运出粮食能够让我们有经营头脑地使用。可是现在不是这种情况。现在不考虑收购的速度和相应的从乌拉尔把粮食运出来。这是很危险的,我怕的是可别成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把粮食运出来了,然后我们将要从别的地区用更昂贵的价格再运进来,这样就破坏了国内市场的价格。应该担心的是这个。我说的是,我们不放弃百分之百地完成计划,我们将完成它,但是完成的速度不取决于我们。例如,在4月份,我们那里现在是道路泥泞时期,而且将要播种了,而商业人民委员部却想让我们运出大量的粮食来。这是很难做到的。我认为,运出的速度我们应该和粮食收购的速度结合起来——我们将竭尽全力百分之百地完成粮食收购任务。我们答应做到这一点,也请你们能让同志们在这个领域里协助我们。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农村的情绪。我应该说,总的来说农村的情绪可以用下面的话来形容……

卡冈诺维奇:能不能更具体些?

什维尔尼克:我具体地说。农村的情绪可以这样来形容:在解决了原来在农村存在的一系列困难之后,我们得到了贫农真正的支持,这种支持比粮食收购运动开始时更强大多了。对于我来说,这是清楚的,因为捐献运动在农村里把阶级斗争搞得很尖锐,它创造了前提,让我们能具体地开展和贫农的工作并从而在农村里依靠贫农。我们在乌拉尔收集到了800万(普特)而不是预计要收集的750万普特的粮食,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们在这场斗争中推行了原来预计要推行的路线,于是贫农现在努力帮助我们解决进一步进行粮食收购的问题。

现在进入了第二个时期,我们应该继续进行粮食收购,但是富农开始改变自己的策略了,在争取把贫农拴住。这是清楚的。农村有一个尖锐的问题:谁能战胜谁?在推行捐献问题时,我们把富农打垮了,这从我们搞的捐献超出了100%就可以看得出来。同时我们也把贫农带动起来了,但是富农在粮食收购的第二阶段上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他们现在提出了什么口号呢?如果你们想让我们把粮食运出来的话,就给我开个收条,说是可以运种子,那我们就运。而共产党员们不知怎么办了:是开收条还是不开?这就是富农的周旋。

现在有大量粮食在中农农户那里。他们有可以抛售出来的余粮。这中间有困难,因为我们不能像从富裕的农户那里把粮食挖出来那样去挖掘粮食,因为他们不能采用第107条,而应该这样来办事:既要从中农那里拿到粮食,又要保持和他的同盟。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而且在这里有不少共产党员把事情办糟了。要知道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富农老乡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你要是不相信没有粮食,那你就去看粮食垛子,看看有没有剩余的粮食。而这样的富裕老乡在采用了第107条之后便开始分散粮食[而且我们有情报说,不仅是富裕的农民,而且中农也开始]在贫农中间[分散粮食],把粮食藏在谷仓等等地方,[从中农那里搞出余粮来要困难得多,对收集商品余粮需要改变策略]。在现阶段上收购粮食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我们的党组织、经营组织和合作社组织施展的策略太少了;而且富农和富裕的农民为了争取掌握住贫农,在农村正在制造各种政治情绪,我们现在需要比以前更多的周旋,要有最大的灵活性,而这样的情绪则使得这样做变得更加困难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把富农粉碎,在收购的第二阶段上把他们粉碎。能不能粉碎呢?我们当然能。但是应该是粉碎而又不出现过火的现象,不要有行政性的压力,要做到借款能百分之百地收上来,粮

食收上来,把富农粉碎,不触动中农。能粉碎吗?当然能粉碎。(笑声)事情是清楚的,我们能粉碎,全部困难就在于应该规定出这样的途径来,让我们有可能从中农那里收集到余粮。这个困难降低了粮食收购的速度,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农村工作上出现了一系列最为复杂的问题,而且有具体形式和具体的方针问题。我们中央关于做贫农工作的决定是很好的决定。³⁸由于粮食收购中的困难,现在这些好的决定得以贯彻。为什么?就拿播种活动的最后时刻举个例子吧。我们有种子,有机器贷款、货币贷款,就是现在,这些机器和货币贷款的分配办法已经和去年完全不同了。围绕着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具体地把贫农组织起来,提高农村集体经营的形式。我想,向中央全会提出的那些提纲非常充分地分析了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些提纲规定了我们在未来的运动中进行粮食收购的途径。

主席:请格里亚金斯基发言。

格里亚金斯基:关于粮食收购中的失败怎样影响到对工业中心的供应以及总的对城市的供应,米高扬同志在报告里几乎没有提到。而我们只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才从政治局的通报中知道,我们的粮食收购工作搞得不好,在城市里,到十月革命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要有选择地发放面粉而且数量很少了,只给工人,对其他人连想都没有想。这表明整个冬天我们过日子的面包是这样紧张,甚至连白面也只能是看上几眼。当我们在计算由于在粮食战线上的工作,现在我们有怎样的贮备时,不能忘了进一步对工业中心的工人供应会是怎样的一幅前景。斯大林同志在十五大上说:“自己吃不饱,也得要输出”——这不是我们的口号。³⁹我们的情况是既没有吃完,也没有运出去。我们应该试着做到既吃光也运出去。米高扬同志完全没有能给出这样的前景。关于出口,他说这里的情况要好些,而且提纲里也写上了我们几乎把事情已经扭转了,看起来已经有了在出口上扭转事态的心情。可是怎样扭转对工业中心的供应状况呢——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在决议里还是在米高扬的报告里,一句话也没有说。至于粮食收购上的不成功在我们整个经济工作上都反映出来了,这是无可争论的。但是我们由于这些不成功,在工人中间造成了一定的情绪,这也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当我们掀起这个运动的时候,从农村向城市里给我们寄来了大量的信,说是现在这件事干得比以前略多了一些压力,而有些信描绘的情景是,这件事的进展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当然,工人们想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不光是关于供应,而是我们的粮食总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对工人们说,这件事有了起色,再忍耐一下,现在就能纠正的,粮食会有的,会比较轻松些的。可是现在从米高扬同志的报告

看不出来我们在城市供应上今后将会更轻松些。我想,首先应该明确地提出供应问题。而这样提出问题应该从以下的考虑出发。如果我们想到了粮食出口,那就先要想到城市的正常粮食储备,在这之后再提出出口的问题。我们是不可能在这次失败中把自己择得干干净净的。我们不可能像报告里所说的那样简单地脱身的。我们这里出现的是一个漏洞,它是会反映到经济上的。我们能不能继续这样走下去,非常紧张地搞对工业城市的供应呢?不能,我们不能这样做。

我们需要让对城市的供应变得轻松些。所以,第一,需要在决议里加上这一点,提出调节工业中心供应的问题。

接下来,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那个要把80%的工业商品用到粮食收购上去的指令首先打击的是大城市。昨天我们听到了柳比莫夫同志在讲台上说,他那里有0.7亿卢布的商品在农村是过剩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这件事上不够灵活。城市被剥夺得太多了,而且现在在第三季度,这件事需要纠正,因为这是我们可以减轻工人处境的唯一季度了。接下来就不得不又要紧张起来,因此,现在需要更灵活地拿这些储备做文章。如果现在有0.7亿卢布的剩余商品,那么可以在第三季度给我们的工业中心更多一些,让工人的处境能轻松一些。米高扬同志和政治局在关于机构问题的提纲里提出了要改组粮食收购机构,而且在这方面主要的着力点是搞集中化,要把所有事情都集中到一个联盟中央的周围。如果是好好地集中化,集中化是一件好事。我们指望我们这次的集中化能好好地集中化,但是我感觉,在集中化的同时,需要把为大型工业中心服务的供应机构的问题单独提出来。我完全同意米高扬同志对莫斯科提出的那种理解,他在讲台上说:“你们莫斯科人无须担心没有粮食了;我们会给你们粮食;你们到磨坊那里去检查一下吧。”我也在想,难道不能也关心一下列宁格勒吗,如果不是说从这个讲台上说一声列宁格勒会有粮食的话,那至少可以在决议里和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并列写上列宁格勒消费合作社联社,那么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安了。否则就会成为这样了:有必要把机构集中起来,有一系列的基本收购单位;在过去的年份里我们列宁格勒的合作社不是和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而是和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一起工作的,我们这里得到的情况是,和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一起对列宁格勒以及它周边地方的供应要更灵活一些。

丘巴尔:供应好些?

格里亚金斯基:是的,供应好些。现在这个决议里建议我们转到苏联消费合

作社中央联社这条线上来。这肯定会让我们有某些担心。我想,应该让我们有可能通过基本的粮食收购单位工作,所以和莫斯科一起应该写上列宁格勒。

关于粮食的价值和附加开支。当然,现在有的差距应该减少。这不仅在列宁格勒,而且在各个农民消费地区都可以感觉到。我们在西北州农民的磨坊里磨面是5—6戈比,而在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磨坊里是14—15戈比;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差距;当我们拿着自己的面粉和大麦去找农民的时候,我们的农民不要我们的面粉,因为他更合算的做法是把大麦拿到自己的磨坊去磨面。我们除了供应列宁格勒外,还要收购亚麻,我们在第一季度也落后了,因为在西北州根本就没有粮食,由于粮食收购中取得了成绩,我们能够得到的就多一些了,而在最近这段时间,也能正常地得到粮食了,农民从我们这里不大愿意得到大麦面粉,而更愿意得到大麦,有两种考虑:一个是面粉比大麦价格高,另一个是大麦可以保存时间长。当然,关于附加开支的问题,关于收购单位的价格增加了43%的问题,需要从全面的情况来看待,而且首先是应该提出面粉的磨制问题。

主席:请哈塔耶维奇同志发言。

哈塔耶维奇:米高扬同志在说到关于根据向我们建议的决议应该“失去作用”的非常措施时,应该更详细地谈谈私人经营者的问题。取消私人经营者是不是应该算是应该完全失去作用的那些措施中的一个呢,或者说我们从粮食市场上排除了私人经营者,排除了大的粮食批发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取得了成绩,我们是不是应该保住它,不再允许,或者说不再让私人经营者回来搞粮食生意呢?我觉得,无论如何也用不着再把私人经营者放进粮食市场了。要这样做的惟一理由是我们自己不能对付向各种类型的消费者供应粮食这件事。如果说今年春天由于我们没有能保障所有地区的供应,粮价上涨了,那么就不得不重新让私人经营者参加收购了。我想,这样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当然,在决议里应该更明确地说,不能让粮食批发商再回到市场上来。更何况在价格方面,显然我们面临的局面仍然和去年一样,也就是说,粮食作物的价格仍然是对农民十分不利的,不能刺激把粮食运出来。当然,如果我们允许私人经营者搞收购,他就会抬高价格和破坏我们的整个收购计划,在粮食市场上制造无组织的混乱状态。

决议对价格政策什么也没有提,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是米高扬同志在报告里,特别是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应该对价格政策说点什么。他对这一一点什么也没有说,一个字也没有提。库比亚克同志对这一点说的,我想是正确的。一些类别的原料,特别是皮革、毛皮原料和肉类的价格,应该多少降一些,而且要比商业人

民委员部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已经做得要更多一些,而且它也是做迟了。什维尔尼克同志在这里说到了老鼠。而在我们鞑靼利亚,没有一个猫能留下片刻。买猫给的钱要比一普特的粮食贵一倍呢。

臧声:现在老鼠可要泛滥了。

哈塔耶维奇:当然要泛滥。

臧声:老鼠可以卖钱呀。(喧嚷声)

哈塔耶维奇:如果一个老乡卖一只丑陋的猫就能得到比一普特粮食多一倍半的钱,那就清楚了,他会放下粮食而开始养猫了。我们也就要去签订猫合同了。(笑声)也应该提一提一些地区,其中包括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粮价了。这肯定是必要的,因为现有的那些价格不可能推动农民去扩大自己的粮食经营。同时必须要在降低某些原料的价格上采取更坚决的路线,同时要加强我们在原料市场上的阵地,由于对私人收购者采取了经常采取的那些行政压力措施,国家和合作社的收购单位在这个市场上的比重大大提高了。

关于规定价格的程序,确定粮食质量的程序,也应该在决议里说些什么。原来的那种程序是绝对不适用的。完全不可能让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从莫斯科几乎为每一个乡,每一个县确定收购的计划和细节。商业人民委员部是在力图把不可能包罗的都包罗进去,企图调节整个苏联的全部收购过程中每一个非常小的地段,甚至每一个微不足道的行动,而科济马·普鲁特科夫^①早就说过了,这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把不能包罗的东西都包罗进去。粮食收购中的领导和纪律是应该加强的,但是在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实践中,我们有的是太多的细微调节,有的时候是会破坏纪律的,今后应该摆脱掉。可以举出许多事实和情况,说明由于商业人民委员部的这种努力——包罗一切——在如何对待地方方面就出现了很多麻烦、混乱。1、2月份,地方上每天都能收到30—40份电报。这些电报常常一个是全苏的商业人民委员部签发的,另一个同样的电报则是俄罗斯的人民委员部签发的。我们经常是得到3页纸一份的电报指令,大体上是500—600字,而且前后矛盾。地方上被搞得简直不知所措了。喋喋不休地重复“要由本人负责”,但由于采用的太经常了,结果简直就再也没有什么作用了。

应该对这种调节和领导的实际做法做许许多多的矫正。

关于等级、打折、折价等等问题。中央的各种文件中说到了这个问题,但在

^① 科济马·普鲁特科夫是19世纪60年代一批俄罗斯诗人的集体笔名,他们创作的幽默、讽刺诗嘲笑低俗、市侩和官员的愚蠢以及贪官和官僚等丑恶现象。——译者注

米高扬同志的报告中什么也没有提。那我们就还是要照原来的打折和折价的办法做了……

臧声：怎么是这样呢？

哈塔耶维奇：而这个程序就让收购机构的工作人员可以有很多机会一方面欺诈、蒙骗老乡，另一方面破坏国家的价格政策。需要一种更明白、更简单的确定粮食质量的程序。不能在一个小小的共和国，比如说在我们这里，有十来个不同的确定面包及其他作物规格和湿度的标准（而在我们这里，为每一个区都规定了不同的等级），不能为每一个单独的区都规定这些。规定的规格和湿度标准不应该是适用于个别的省份的，而是应该适用于更广泛的经济区。应该让地方上有更大的可能适应局势、适应条件，等等。原来这一切都没有能做到，因此在邻界地区的价格问题上也就出现了杂乱无章的状况和官僚主义的拖延。如果工农检察院感兴趣的话，它就能看到一种非常严重的，而且几乎是完全徒劳的拖拉现象，公文堆成了山，都是为围绕着临界地区的价格差异问题的，这种差异给粮食市场带来的是极端的混乱和无组织状态。

米高扬同志建议在决议里保留对磨坊的加价。我认为这是完全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这样做，就能让我们的磨坊吃饱，而这些磨坊的加价带来的是对价格政策的破坏。对于粮仓应该保留2—3戈比的这种加价，而对于磨坊来说，没有这个也可以过得去，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和合作社的各个收购点，凡是有磨坊的，旁边就是市场。没有必要采用这种五花八门的价格，它会破坏农民对我们的信心，认为收购工作不是团结一致的。我们这里有这种情况，先是从莫斯科来的规定是加价7戈比，一个星期后变成了4戈比，后来又把价格提上去了，等等。一句话，是一种完全理不清的混乱，扯来扯去，让农民和地方上的人们都变得神经质了。

关于向贫农供应粮食的问题。我想，早些时候就应该关心在收购的地方建立专门的基金了。什维尔尼克同志说，应该运进来。这会怎样呢？先是从那里运走，现在又要运到那里去。这就是说，在这种粮食的成本中将要有两次运输的费用了，于是就不得不要么用比收购价格高得多的价格把粮食发放给贫农，要么就是亏本出售。最简单的做法是在当地留下一定的粮食储备向贫农供应。关于这方面的指示今年下达得太晚了。我们在自己那里建立了5万普特的这种基金。

关于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在收购中的作用。我认为决议里应该更多说说农业合作社，关于它什么也没有说。这将会被来自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

份公司和消费合作社的它的“竞争对手”解释成是,你看,对农业合作社什么也没有说,这就说明它被从粮食收购的市场上排除掉了。既然决议里对它什么也没有说,在地方上一定会是这样解释的,应该在决议里具体和明确地说,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在粮食市场上占有的地位应当保留和加强⁴⁰。

关于消费合作社我不清楚,合作社收购来的粮食为什么要缴给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要知道,消费合作社有自己的消费者。它们收购了粮食,把它交给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然后又该从同一个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得到它,用来供应自己的股东。我感觉主要的任务是减少收购单位的数量,让它们少带来些混乱。既然我们保留了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作为收购单位,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让它把收购来的粮食都交给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了。这样有可能会造成粮食在合作社和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来回倒手的时候又贵一些。

关于农民的情绪和对我们的机构的检查。这个粮食收购工作实质上就是对我们的机构,我们的干部、苏维埃机构和党的机构的一次大检查。在进行这次检查时,揭示出了我们工作没有成效的许多地方和许多缺点,但同时也应该说,我们的党的和苏维埃的机构,包括乡里的机构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基本上经受住了这次考试。像最近3个月那样工作,这是在过去的7年里从没有过的。我们的机构,直至乡里的机构,证明了他们是能够以战斗的方式工作的,而且基本上正确地完成了党的指令。至于我们机构的基层环节——村小组和村苏维埃,他们完全没有能经受住这次考验。结果是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完成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在多数情况下表现出了惊慌失措,反映了农民的情绪。在许多情况下,非党的贫农帮助我们推行加强粮食收购的所有措施要比农民中的党员更积极得多。这里已经说到了,由于我们的措施,贫农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积极性并团结在了我们周围。完全就是这种情况。

至于中农,主要是没有信心,向富农方面摇摆和害怕最近我们对富农采取的那些措施今后也会对中农阶级采用。所以他们注意倾听富农和反苏分子散布的诬蔑性的谈话和挑衅性的传言。中农的各个阶层没有富农群众中的那种对我们的强烈不满,但是有对我们的政策的害怕和没有信心,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消除这种对苏维埃政权的不信任和怀疑。应该通过加强我们的解释工作和通过坚决不放过任何对中农的过火行为和热衷于行政手段的做法来做到这一点。

由于我们就春播运动采取了措施,中农的情绪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必须

做到在进行春播运动的时候不要发生对中农的过火行动,而这是有时发生过的,太多地迫使中农去耕种贫农的土地,等等。否则,如果这样的过火做法存在的话,我们就不能做到完全消除中农群众中存在的这种不相信和动摇。

主席:请丘巴尔同志发言。

丘巴尔:为了能更正确地规定出需要在新的收购运动的准备时期推行的措施,我的看法是,需要多少谈谈我们过去有的但提纲还是没有包括进去的经验,既有可悲的,另一方面也有好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如果不能把握住整个经验,特别是个别地区的整个经验,在全苏范围内总结经验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一切都归总起来,得出一些中间性的结论了。所以,这里的发言阐述了个别地区的经验,这将是有好处的。在分析推行这次收购运动所处的环境时,不得不把两种情况明晰地区分开来。第一种情况,也是基本的情况,是农民在经济上是关心出售粮食的。需要明确无误地说,农民不卖粮食不是因为他的粮食多和他能够平静地生活,而是因为在工业商品的价格还很高的条件下,他对粮食的价格不满,在价格有所突破、有了加价和不合法的超额支付的地方,粮食运来就很快,而且有的收购点都来不及接收粮食了。在我们那里的一个区里的粮仓规定了加价,因为粮仓距村子有7俄里,把粮仓的价格和路程都算进去了。结果是一普特加了11戈比——粮食从100俄里以外都送到这里来了,接收都来不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给粮食规定的价格是老百姓不满意的。

莫洛托夫:是不是该提价?

丘巴尔:不是,不是提价。不应该提价,而各种作物的价格关系,粮食作物和工业产品的价格关系,这些关系对粮食收购过程产生了不良影响。需要考虑到这一点是为了在未来的运动中不要再发生这种情况。要知道,我们对粮食收购施加的压力使得我们不得不对机构做出更多的支付,以便得到我们需要的粮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更好呢——是在个别地区给出多3戈比的价钱,更确切地说,也就是在9月份不降价3戈比⁴¹,还是对整个不得不启动的机构每普特花上3戈比,在一些区要花上8戈比,这样来完成收购呢?毗邻地区的价格差异也影响到了收购进程。例如,在我们的斯塔洛别里区的粮食价格比临近的沃罗涅日省著名的康特米洛夫卡⁴²低30戈比。当然,这种差价是有影响的。这样的差价,而且最主要的是米高扬同志说到的9月份的降价,使得推行粮食收购变得十分困难了。

第二点。这里对商品数量、商品供应说得很轻松。我不想说粮食收购的下降只是商品没有跟上的结果。但是事实是,商品供应在粮食收购过程中曾起到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量商品的运作没有能足够灵活反映到粮食收购的速度上,这也不是偶然的。这里有两个数字。乌克兰在第一季度提供了粮食收购总量的50%—55%,而在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用于粮食收购战线的所有商品中,发放出的商品量总共只占了17%。我们的商业机关,特别是我们共和国的商业人民委员部,为了这件事,不是在领导粮食收购,而是坐镇在莫斯科,要保住另外拨发的50个车皮,100个车皮,争取到了在今年粮食收购应该扩大规模的时候起码能给出和去年同样多的商品。精力不是用在了应该用的地方,而是开会,讨论,为每一车皮的商品争吵,而这些商品在当时是可以让这种爬行式的收购不致停止下来。这是一些个别情况,我觉得,在准备新的粮食收购运动的时候,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按季节分配计划用于为粮食收购服务的商品是需要考虑的,但不必写到决议里去了。

关于价格,我们在今年看到的差异是应该消除的一种现象。这种可以看到的现象就是,7—8月的收购价格比9月份高。我的感觉是,我们应该正确地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到了秋季的时候,针对现在对工业产品保持的这种价格水平,我们这里的粮食作物的价格总水平是不够的。我们的任务是对工业产品,特别是对木材,要降低一些价格。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如果希望能全副武装地投入新的一场粮食收购运动的话,如果我们想把价格维持在那个水平上的话,在7月以前就应该解决这个任务,——我想,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能维持住那样的价格水平,——维持住现在已经维持着的这种水平。

这是一般性的经济措施,而第二部分是我们机构的培训技术、工作中的错误和失误了。我不再说谷类饲料的平衡表了,正像米高扬同志说过的,总的来说,它是符合事物的真实情况的,但是在个别作物上和个别地区上有重大的失误,我们应该对谷类饲料平衡表建立检查,建立地方上的党的和苏维埃机关有效的和实际的检查,而不是继续搞形式上的盖图章。我们应该比以前更多地注意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特别是中央统计局。

丘巴尔:不仅是中央统计局,而且特别是专区执行委员会和党的组织,不止是要让中央统计局的机构把这些数字记下来,而且地方上应该满怀热情地进行检查,在个别地区进行抽样检查,使得我们能够搞清楚统计上所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关于收购的方法。同志们在这里说了,国家收购单位是在那里坐等,没有把他们放到村里去。我应该说,乌克兰的经验表明,不仅是国家收购单位是在收集

点上坐等,而且合作社的人也是坐在自己的店里等着粮食运来。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我们是在完全没有储备和市场上有些紧张的情况下进入粮食收购时期的。我们害怕价格遭到破坏,因为每一个走到农民院子里的代理人总是要好说歹说地想办法绕过已经确定的价格。价格遭到破坏的危险是有的,它过去就实实在在地存在了,而且只要我們想生硬地把价格保持在符合国家总的经济形势的水平上,它就还将会存在下去。在运动的第一个时期,不能说在我们乌克兰到哪里都能做到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没有破坏价格的风险。后来,当施加压力开始的时候,和破坏价格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但是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结果。每一个收购单位都要为完成计划负责,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想在磨房、收集点和合作社里都要绕过规定的价格。

关于加强国家粮食收购单位的工作和合作社的作用。例如,在我们这里,当收购进行得比较好的时候,合作社里就开始出现这样的倾向了,说是我们自己能够完全对付收购了,不应该让国家收购单位有容身之地,我们可以成为在各个地区的垄断者。对付这些倾向的办法是执行保存国家收购单位和保护他们不受这种排斥的侵害的路线,但是当开始按照专区、区和村乡收购单位下达计划的时候,想要保持国家收购单位占有的比重的所有企图都失败了,因为区执行委员会在完成区里的任务的同时,想要自己也搞收购,而有时可能那里没有国家收购单位,那通过谁呢?——通过合作社。村苏维埃、村支部力图完成村里的计划,所以所有的粮食都通过村消费合作社,通过村里的联户等等放过去了。用行政办法分配任务的做法冲击了国家收购单位的比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有数以千计的自然收集点的合作社机构的比重。在未来的运动中,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做的是不把任务固定给各个行政区。当我们让大家都站立起来了的时候,这种非常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对每个机构都能履行自己的职能的时候,这种措施也就没有必要了。如果考虑到基层合作社系统应该在这个村里把所有粮食的收集都垄断起来的话,我认为,提纲里建议的合作社应该向国家收购机构上缴是正确的。它应该上缴的,是它由于自己机构的作用收购到的超出地方消费的粮食。从经济上说,需要让农民愿意用自己的马车把粮食运到粮仓、磨坊去,因为如果是农村消费合作社收购,把粮食倒到村里,不管怎么说,它都要再为运到车站或者码头另外付费,通过商品减价、商品奖励等等来做到这一点。

在那些大型的市场点上(我们乌克兰有许多这样的点)应该严格地在村里对收购单位做出划分。今年在我们那里有4个收集点,两个是国家的,两个是合作社的。我们自己在中央全会上决定,需要把消费合作社的和农业合作社的基

层网划分开。在那些农村合作社干得很好的村里,让他们有收集点,而在消费合作社干得好的地方,让它在不大的点上有收集点,让它能够满负荷。能不能这样进行,这样做对不对呢?我应该通报的是,在乌克兰有一些基层的消费合作社竭力想要摆脱委托他们进行粮食收购。它们没有专门的人,在很多情况下被减价、打折扣搞得破产了。所以,扣价打击的不仅是出售粮食的农民,而且还有在收购时没有扣价的农村消费社,当他们把粮食卖给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或者甚至区里的联社的时候,对这些粮食却采用了扣价的做法。在粮食收购上由于300—400卢布的亏损而破产时,农村消费社就解体了,社员们会说:“我们不想收购粮食,因为这是赔本的,让那些更能干这种事的人去干吧”。我想,在坚持加强国家收购单位的方针下,在确定更明确的工作和更多地从经济上引起关注进行粮食作业的方针下,需要在农村进行这样的区分,而且它带来的只有益处。不需要追求粮食收购机构的工作数量,需要追求的是它的工作质量。

关于通过作为全苏中心的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供应和派发合作社收购的全部粮食。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在实际上得到解决。那些合作社不供应的消费者和地区的那些粮食,应该通过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来发放。地方上的供应,有一些可能也不是属于地方供应的,而是由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自己供应的,从技术上和财政上就没有必要通过这个全苏粮食公司发放了。照我的看法,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这样会使粮食变得更贵,而且主要的是,在收购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这可能会更难保障对消费者的供应。一个机构再完善,通过它一家来灵活地运作单个的车皮,要比通过两个或者三个机构更困难得多,在这里,集中化可能起到的并不是特别有益的作用。

现在谈谈我们抠出粮食来时采用的那些杠杆。完全没有必要争论的是,有些杠杆我们启用得太迟了。就拿捐献的法律来说吧。它是1927年8月颁布的,我们在自己那里,在乌克兰,大体上是1927年10月制订出来的,发到了各地征求意见,因为这个法涉及广泛的群众,地方上应该在事先对它有所考虑。1928年1月1日,从40个专区里我们只得到了8个或者9个专区的反应。地方上在解决其他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考虑不把有些地方包括进去了。雅科夫列夫同志在这里说,我们是在1928年1月6日才开始动起来进行修正的,可是要知道,我们是在1928年1月2—3日时才公布了法律的。在法律做出之后,我们想得到不是35%,而是40%,而按照全苏的法律规定是35%。

莫洛托夫:不是,没有这回事。

丘巴尔:莫洛托夫同志,你从乌克兰回来后,就不得不对这个法律做修改了。

莫洛托夫：全苏的法律里没有限制。

丘巴尔：这是可以检查的。至少这样的修正是做出了的，是希望能得到更多些。

但是也确定了另外的修正，照我的看法，这些修正是不正确的。规定了期限，要在1928年1月15日以前进行捐献，而在1928年1月20日之前征收到多少比例。这就迫使许多人采用了那些非常措施，给我们带来了危害，而为了在今年不会有这样的现象，需要早些做准备。采用非常措施常常是由于推行某项措施给的时间太短，我们在去年采用的一系列措施当然是需要事先就制定好和及时推行下去，以便不用再一次跑到农村去了。

我认为，现在我们还不能彻底对已经进行的运动做出政治上的总结和充分考虑我们的错误和我们所有的过火行为产生的后果，因为粮食收购运动还没有结束，因为播种运动还没有进行完，因为甚至还没有认真地考虑到农村的所有情绪。在这方面，我说到乌克兰的局势时不是一个乐观派，我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悲观派在评价那里的局势。我们对中农触动得太厉害了，而且一部分贫农跟着富农的宣传跑了。我不认为这样一来播种面积就会收缩，因为我们推行的那些措施能够抵挡住这种威胁。但是事实还是事实，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情报材料和寄给红军的信件看，带有民族情绪的那些贫农和中农提出抱怨的信件数量相当大⁴³。

另一个例子：像查波罗什和米里托波尔这样的专区，一个需要收购1800万普特，另一个——2100万普特。1928年3月，它们分别在一个月里收购了大约40万或者50万，而不是任务规定的120万普特。于是那里开始采用非常严厉的措施，几乎是一个个地检查，几乎是一个个地施加压力，既在借债上，也在粮食收购上，很显然，由于这种压力，粮食都溜掉了。也有的情况是粮食不是从富人的手里转到穷人的手里，而是从谷屯里又把它倒到了稻草里和谷壳里。隐藏粮食和与国家周旋是故技重演，也就是采用的还是在粮食征集制时隐藏粮食的那些方法，——而且也不仅仅是富农，就是中农也害怕会使出各种限制手段。在这种压力的土壤上，政治上的恶势力就在投机了，在动员力量，而且在我们乌克兰，我们揭发出了各种反革命组织——民族主义的、立宪民主党分子的、马赫诺分子的。所有这些都开始鼓噪起来⁴⁴。这说明什么呢？

莫洛托夫：是在粮食收购之后吗？

丘巴尔：不是，不是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我是说的粮食收购进行的环境——我已经说过的捐献和公债的扩散、过火的做法、错误，——都会

助长反苏维埃组织的发展,而且我对这些的看法是悲观的。今天不能说我们已经结束了施加压力和我们可以消除这些情绪了。我们应该再施加压力,应该再在乌克兰收购0.21亿普特。商业人民委员部给我们下达了1928年4月份计划,是0.15亿普特,也就是到年底还剩下的那0.21普特中的一部分。完全是一个发疯的计划,因为当农民在播种的时候,是不能去触动他,让他把粮食运出来出售的。我们在3月份收购了0.23亿普特。4月份的任务无论我们怎样动员党的组织也是无法完成的,而且我们不是在消除由于我们的非常措施而激化的那些情绪,而是在鼓励这种情绪。我认为,这一点是需要向中央全会说出来的,因为不仅仅是粮食要求我们更加关注,而且需要动员力量消除的那些现象也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在自己那里建立了向贫农供应食品的基金,我们因此以这样广泛的规模在推行春播的运动中向农民供应种子用于播种。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是在和各种各样的情绪作斗争时手无寸铁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正确地、最广泛地和顽强地帮助贫农推行播种运动,这对准备未来的收购运动具有重大意义。这样的指令已经下达了,而且要把这样的指令贯彻到实践中去,不能让指令停留在纸上谈兵,也不能让指令落实到下面的时候被歪曲。这个任务要求全党都必须非常关注。

关于对决议草案的修改。我们对第一点有一个修改。那里说到要建立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这里说到,建立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是要通过合并所有的国家粮食组织。我们认为需要更明确地说,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是一个股份制组织,共和国的国家粮食收购组织带着财产、机构和资本参加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之后,应该是股东,加盟共和国应该得到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一部分利润。因为像乌克兰粮食和饲料产品加工和贸易联合公司这样的地方企业,是预算收入的来源,需要把预算收入的来源保存下来。为了让地方上关注,需要规定每一普特收购来的粮食的提成,让人们不仅把收购单位看成是国家的,而且可以让人们对它抱有不次于对合作社组织的友善态度,因为所有合作社的积累都是留在地方上的。关于国家收购单位,虽然在以前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在第一次改组收购机构的时候⁴⁵,也有过决议,但是决议是一纸公文,给地方预算的提成,至少在我们这里是有的,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平衡表没有确定下来。很自然,不论作为党的纪律我们怎样施加了压力,经济上的关注并没有利用起来,而它是需要利用的。最后一个意见是关于埃赫同志的声明,说是送到乌克兰的纯种小麦被淘汰了。

罗伊津曼:吃掉了!

丘巴尔:这是不对的。谁也没有淘汰小麦。它的个别批量中有了不太严重的发芽,但是整批的播种材料都用于播种了,用于了播种运动。

关于《真理报》上的短评。今天《真理报》上有一个短评,说是在鲁特钦科夫斯克爆炸中矿业局和地方委员会是有罪过的,而我们认为有罪过的是德国人⁴⁶。你看,误差往往会有多大。所以我们并不对所有评论都要经过什么检查的。

喊声:谁也没有能反驳掉。

丘巴尔:是的。如果要把所有的评论都反驳掉,那是需要很多时间的。而我在这里就是在反驳——请你们注意到这一点,——我要说的是,小麦基本上都用于播种了。恰巧我要指出,我们并没有要求一定要西伯利亚小麦,而是要的春播小麦。当然,你们舍不得,可是我们也常常舍不得把纯种的种子从乌克兰运出去,自己克服一点,得到的是普通的粮食。我们也想种上良种粮食。米高扬同志说了:收购到了什么样的就种什么样的,净化种子所需要的加价是没有人会给的。

[李可夫:有人建议休息一下,但是先还是让我们来解决问题,明天我们工作还是不工作了。有一个这样的建议:认为明天晚上全会不工作了……

喊声:对!

李可夫:如果我们能在今天结束辩论和听取对粮食收购报告的总结发言,就工作到中午。

喊声:结束,结束!(笑声)

李可夫:如果今天结束,明天就全天自由了。]

(休息后)

主席:现在请西蒙奇克同志发言,下一个发言的是来自北高加索的伊万诺夫同志。

西蒙奇克:在粮食收购领域里遇到困难的时期,党特别注意了粮食收购组织,这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时期揭示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缺点,在这个时期粮食收购组织有了很大的长进。但是同时必须指出的,还有一个在今年粮食收购运动开始时有过的缺点,那就是对网络的调节搞得非常严厉。对一系列地区的网络做这样的调整和压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已经没有能力把粮食收购都包围起来了,没有能力对付这些粮食收购了。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缩小消费合作社的作用的决议⁴⁷也有不小的影响。补充的解释从来就没有能传达到地方

上,于是在地方上,在个别的村子里,进行了如此“调整”,以至最后一系列的点都关门了;例如,在沃罗涅日省就有个别的情况,一连好几次给消费合作社的粮食收集站贴上了封条。很清楚,这影响了粮食收购的成功。

突击的粮食收购运动揭示出的缺点之一,是没有能足够地把非党的积极分子吸收到粮食收购运动中来。在对这个方面给予了更多重视的时候,在党向苏维埃组织和合作社组织提出了必须吸收这些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应该成为典范,他们应该提供协助的时候,需要指出的是,很大一部分群众理解了这一点,而这对粮食收购的成功是有一定意义的。米高扬同志在这里正确地指出了合作社具有的经验和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党直接抓了这件事,改正了缺点,为工作指出了方向,这样我们才有了积极的结果。但是这个经验必须要在今后也加以利用。今后也必须把合作社和合作社的积极分子吸收进来。当然,同志们,在看待这个问题时,缩小消费合作社的作用也是不对的。必须把现有的成就巩固下来,把现有的缺点消除掉。这样,在下次粮食收购运动中就必须是更多地利用合作社。

我们在合作社问题上有一系列缺点。例如,关于开支的问题,这是需要注意的,但是如果看一看在合作社里,特别是在消费合作社里,开支是怎样发生的,那我们看到的是,搞买卖的机构也在搞收购。这样开支就减少了。

收购的质量方面也有缺点。但是就是在这里,如果消费合作社能够对自己今后还将要继续进行粮食收购更有信心的话,那改善质量、改善设备等等问题就可以更严肃地提出来了。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现在出现的问题之一是,必须规定更固定的、更明确的合作社在粮食收购领域里的工作条例,其中也包括消费合作社。经常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说是收购妨碍了贸易,妨碍了合作化,收购是以贸易状况恶化和合作化状况恶化为代价的。需要指出的是,同志们,收购是在帮助贸易,帮助改善合作化。我们看到的是,流通领域里的合作社在成长,而且成长得相当快。我们看到的是,合作化也在相当迅速地进行着。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这方面,党本身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基本的作用,而且又直接参与。我们现在也有了这样的结果,那就是消费合作社在这次突击性的运动期间比在过去所有时间都更多地收集到了股金。所以,当党注意到了合作社组织的这个缺点时,我们在这方面就能看到一定的结果。同志们,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现在的一个严肃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要缩小消费合作社的作用。柳比莫夫同志在这里发言时指出了这个方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在粮食收购工作中,

我们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会有延误。决议的第二点说到,消费合作社和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签订总的合同,来自偏远地区的基层组织向站上的和码头上的收购点缴粮。如果我们能研究一下并更仔细地想想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一系列的缺点。基本原因之一是,基层和其他组织开展的工作将会很薄弱。在这里,丘巴尔同志是完全正确的,他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沃罗涅日省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基层和其他组织开展的工作要薄弱得多,远远没有完成它们拿到的那些合同。很清楚,今后也必须保持合作社系统的统一现在具有的那种作用。而这一点^①是在拆散这个系统,使得工作更复杂了,甚至变得更昂贵了,因为分配中的种种问题现在有了更复杂的形式。一方面必须收购,另一方面又必须转交给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然后为了分配再要得到这些粮食。这样,这里的工作就出现了相当大的复杂性。完全可以理解的是,这一点需要仔细注意和需要做根本改动。

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米高扬同志涉及的,那就是在粮食收购运动之前建立商品储备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完全正确,但是我也感觉建立储备是不够的。需要更严肃地提出商品的种类问题,在突击性的粮食收购运动期间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商品。我们有这种情况:在发送皮货的时候是这样发送的,例如,长靴发送的数量很有限,而每双长靴就给沃罗涅日省发出了2普特多的鞋底。这样的结果是这些鞋底有大量积压,而农民还是没有皮靴穿。布匹是这样的情况,给农民做裤子用的布料能够得到的非常有限,只够5%。只是在粮食收购运动结束的时候才开始发送这样的布料。这样就看得出来,在这里发生了某种误会——布料来的时候,突击性的粮食收购运动已经结束了。这样,品种问题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也可能有这样的送货,货从很远的地方送来,但是不能满足农村的需要。]

我想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丘巴尔同志的发言。他指出了乌克兰和沃罗涅日省的价格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他是在提到康特米洛夫卡的粮食收集点时说到这一点的,但是在瓦鲁伊卡区的情况更糟糕。开始的时候,在收购向日葵时,在这些地区收购的东西是运向乌克兰的,而在开始收购小麦时,由于经济的吸引作用,就转向了沃罗涅日省的磨坊等等地方了。有过一些个别情况,向沃罗涅日省临近的几个省的农民开枪了。我们这里发生过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理解,这样一些尖锐化的关系……

^① 指消费合作社和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签订总的合同。——译者注

臧声：这是在哪里，是在沃罗涅日省的领土上开枪吗？

斯克雷普尼克：是从乌克兰吗？

臧声：是开枪打自己的人。

西蒙奇克：是的，是的，有过这样的情况，当农民把粮食，包括小麦，运到瓦鲁伊卡去的时候，人家给了他们袋子，他们又返了回来，为的是把这些小麦从乌克兰运过来，而在交界处就有人向他们开枪了。

李可夫：边界警卫开枪了？（笑声）

西蒙奇克：所以说临近各省之间在价格领域里的相互关系问题需要引起更多的注意。我认为丘巴尔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及时的。而且相当大的部分是直接和乌克兰有关系的。我就说到这里。

主席：伊万诺夫同志发言。下一个发言的是克维林同志。

伊万诺夫：我们暂时没有出现什么名堂，虽然就粮食的价格而言，我们的状况比乌克兰更为不利，我们价格更低；但是我们并没有像乌克兰那样哭泣，而且我们不会建议现在提高粮食的价格，因为我们认为价格是能令人满意的。

彼得罗夫斯基：我们那里富农比你们那里少，贫农多。

伊万诺夫：戈里格里·伊万诺维奇，我们那里可能富农多，可是要知道，在改变价格和提高粮食价格问题上吵得最凶的，首先是农村里的富农，所以我们在北高加索应该是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能感受到来自老乡对我们的压力，但是我们没有屈服于它，而且对可能提高粮食价格也没有散布各种幻想，否则的话我们是要犯大错误的。丘巴尔同志在这里说粮食的价格不能令人满意，他的发言可能会在有些人那里散布了粮食价格有可能会改变的幻想。我们感觉，这只能对我们的粮食收购工作有害。

丘巴尔：如果不改变商品价格，那就不得不改变粮食价格。

伊万诺夫：决议草案对一个问题做出的回答是相当正确的，那就是怎样调节粮食市场。〔应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在这方面，也应该回答关于收购市场的问题。〕应该走的路子不是提高粮食价格，而是调节粮食价格和其他技术作物以及畜牧业产品价格的关系，还有就是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

在这里，库比亚克同志表示反对米柳亭同志提出的要在中央全会的决议里提到党是不是胜任了粮食收购领域里的重大工作的建议。库比亚克同志声明，这样做没有必要，因为党总是能胜任它所面临的任务的。党是在最近的3个月里，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本着有些不同的基本原则，以非常的程序，进行了粮食收购工作的，我们的这项工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和经济结果。而且既然我们

是以一种非常的程序推行的粮食收购工作,在这项工作中主要地和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实现十五大关于向富农进攻的基本指令进行的,那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党在自己的这项实际落实党的十五大的基本政治指令的工作中是怎样做的,它是怎样走出来的,是怎样克服了困难的,由于3个月的紧张工作,我们把农村推向了何处,有怎样的政治和经济结果?所以,照我的看法,不回答这个问题是很难规定出任务来的。

我们的工作进行得相当紧张。需要回答柳比莫夫同志的是,收购粮食的不是合作社,而是党。就拿北高加索一个地方来说吧,从城市里就动员4500位同志,而且把他们派到了地方上去,他们呆在了农村,领导了全部工作,而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粮食收购单位是在那里坐等党给他们收购,给他们运来,而他们只是在完成商业人民委员部摊派的任务。

我们没有看到合作社在粮食收购上有什么专门的工作。在发展粮食收购工作的最初时刻,合作社并没有起到它作为社会群众组织应该赋予它的那种作用。而当党把自己动员起来了并事实上进行了如此大量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农村通过这个运动得到了什么结果,这不是毫无意义的事。要知道,在这场运动里,我们在农村坚决地做了一次阶级力量的较量。我们转入了对富农采取积极的行动。我们是不是做到了在这场斗争中有赢利,在政治上更加坚强了呢,或者相反,我们被打得头破血流,丢魂丧胆,全党瘫痪呢?

波斯特舍夫在这里说,收购工作“带来了害处”,而丘巴尔说“我们对中农触动得太厉害了”,富农把自己的影响也散布到了贫农那里去,等等。我感觉这不是个小问题,不能对它保持沉默,因为这是一场太严肃的运动了,我们着手的事业太大了,我们是在农村里检验自己,检验自己的力量,摸索农村中的阶级关系,而且在从粮食收购运动中走出来的时候应该是有某种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在北高加索,当进行这些总结的时候,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从我们所进行的粮食收购运动中得到的,不是损失而是成就,是党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影响增强了,是富农有些受到了损失,被排挤了,是他在政治上进一步孤立了,是农村中的分野加强了,而且这是在保持了和中农的友邻关系的情况下和在贫农的积极性和他的组织性有所增强的情况下得到的。

我们有些人的脑子对最近时期的粮食收购工作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开始时批评所有的收购工作,他们坚持的观点是,完成粮食收购计划根本就不需要走上采用非常措施的路子,他们认为最好是走从国外运进粮食来的路子。这些怀疑分子甚至不能举出一个严肃的理由和证据来反对我们对农村的真正状况的评

价。在农村中我们的影响加强了,对比关系改变了,农村中阶级力量组合的改变是对我们有利的,在这中间起到了最重要作用的,是我们在播种运动时进行的工作,这个工作的目标是支持贫农,加强和发展我们提高农业的措施(供应种子、贷款和农业材料等等)和以这样的措施为中农服务。

当然,有一系列的过火行为和对党的路线的歪曲。它们起到了消极作用,和它们斗争是必要的和需要的。党中央的决议中指出了这种情况。但是和它们,和这些过火行为的斗争更多的是在做工作本身的过程进行的。[我觉得,既然在相当一部分地区粮食收购工作是用我们在最近时期推行的那些方法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干了一半工作的地带,离这个工作的最后结束还有一段有限的时间。决议中的这部分还是有必要的,需要把它留下来,但是此时此刻,今天它起不了很大的政治作用了。

丘巴尔:正相反,困难本身将在于怎样把事情进行到底。]

伊万诺夫:在发给我们的草案里,我们看到确认了有过这些过火行动,发出了这些过火行动可能产生危险的信号,得出了必须解决消除、克服对党在农村中的路线的歪曲的指令。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和必须的。应该围绕这件事把党的社会舆论动员起来。但是这里没有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项重大的工作把整个农村都动员起来了,在从事这项工作期间,在粮食地区党的组织全部投入到了农村,所有的专区委员会、区委、乡委和农村支部几乎是除了粮食收购就没有干其他的事了,那么,党在这项巨大的工作中只是有过火行为,只是出现了歪曲,形成了对联盟的巩固、贫农和中农的结盟最危险的因素吗?还是党由于自己进行的大量工作,在农村里既检查了自己也检查了社会组织,和阶级敌人进行了较量,产生了什么积极的结果呢?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需要做出回答,决议应该谈到这个重大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共产党员,参与这项伟大事业的人,而且不仅是共产党员,都想听到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怎么,这个运动是不是总还有什么积极的结果吧?当然,我们在农村看到了阶级力量的变化。这是可以指出的。现在我们在农村的生产关系上也有一些可以看到的变化。谁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需要说的是,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变化的轮廓已经开始可以触摸到了。富农在出售自己的复杂的农业机器、拖拉机、磨粉机等等,富农在限制租赁,他们拒绝给贫农贷款,等等,等等,——我感觉,所有这些都是无论如何不能绕过去的因素。它们在责成我们做些什么,它们在农村中有反映,是会有某种结果的。我感觉,这个结果就是贫农正在陷入比较更困难的境地并在开始更积极地寻找走出这种境地的途径,这也就导致了集体农庄在自发地增长,在自发地

追求发展集体农庄建设。贫农对集体农庄的向往是建立在一系列经济因素、经济前提的基础上的,农村正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把这一切都考虑到,需要考虑到贫农是向往集体农庄的。我们应该把这种自发的运动组织起来,把它抓在自己的手里,让这个运动不要跳过我们去,不要从我们的身边滑过去,因为这样只能是加剧农村中的经济和政治困难。

这些轮廓,这些在农村的生产关系中已经可以看出的变动,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的。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有根据地指望,就实现党的十五大决定而言,——也就是说,从用社会主义的基调改造它、在农村本身发展集体农庄建设的意义上说,农村是有着有利局势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说,党在农村胜任了摆在自己面前的任务,而且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胜任,它不仅完成了国家的任务,收购了粮食和克服了大量经济困难,而且还做到了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农村胜任了这场严肃的和伟大的运动,更加巩固了,没有被打垮,而且有了更积极的和更有组织性的贫农。什维尔尼科同志说得对,粮食收购工作之后(在乌拉尔),贫农积极性和组织性的增强巩固了我们在农村里的阵地,巩固了那里的力量。我们感觉,这也是需要指出的。

接下来,决议还应该对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贫农的进步和追求,对集体农庄的建设有所反应。我们现在就应该把这个运动组织起来,现在就必须从这种自发性的发展中得出实际的结论,立即把集体农庄的发展把握住,今天就应该派人到那里去,用最好的组织人员领导这个运动,确定集体农庄经济发展的方向,等等。[要搞清楚与集体农庄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应该怎样建设、应该打下什么样的基础,它们应该在怎样的基础上发展有联系的一系列问题。]

这就是我们首先由粮食收购工作的结果得出的那些看法。我们的结论不是属于官僚主义的、安然自得一类的,我们看到了农村中存在的困难,我们没有去抹杀它们。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把富农打翻在地,他们在农村还是某种因素,我们还需要和他们算账,还要继续实施对富农施加压力的路线。我们知道,富农将会在这里或者那里竭力破坏我们的工作,制造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他们将会使出全身解数,想方设法躲过我们,把中农从我们这里夺走,等等。我们不会对这视而不见。困难是很多的,巨大的。我们应该有准备、有能力克服它们。对于中农我们应该非常警觉和敏感,不要把他们丢掉。我们也不是在抹杀这个任务,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从粮食收购运动得到的积极因素应该确认下来,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些积极因素上,不能不看见它们,还需要对这场运动做出政治上的总结。

主席:请克维林同志发言。

克维林:我们在这里听到了一系列来自地方的代表对粮食收购的缺点的严肃批评。我不再谈问题的这个部分了,我认为这里提出的意见应该在决议里得到反映。我要求发言是为了论证我对政治局的提纲提出的两个具体的修改意见。米高扬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主要是说到了如何从行情上论证我们的经济困难。中央决议对这部分也给予了相当多的注意。我完全同意那里的阐述,但是我认为,在这个决议里应该更强调有必要采取措施提高农业的生产基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粮食经济的生产基础。

是的,党的十五大对这个问题说得相当充分了。既然向全会提出的提纲已经完全明确地说到了,必须在粮食和其他作物之间的收购价格上有某种有价值的变化,我们就对完善粮食收购运动未来的前景下一个步骤该怎样做有数了。但是我的感觉是,在这个决议里还是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在提高农业,特别是贫农的经营方面面临的那些特殊条件。一些同志在这里完全正确地强调说,由于粮食收购运动的结果,农村中的阶级关系非常尖锐。我们在这件事上将会得胜,当然是如果我们能在生产上让贫农更加巩固的话。这个工作的基本路线就是集体化。但是为了让集体化能够有足够的高度,我们的确应该让这些联合起来的集体能够转向机器经营,可是至今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很少。更不好的是,最近几年我们在这件事上甚至有某些退步。我说的是拖拉机化。拖拉机是集体经济的基础。我们的拖拉机不够,丘巴尔同志。

丘巴尔:答应我们了,但是现在没有给。

克维林:我这就要讲这一点。我们的拖拉机状况非常不好。我给你们举出以下的数字。在1924—1925年度,给我们运来了6000台拖拉机;1925—1926年度是1.2万台拖拉机,也就是说,我们大大前进了一步,1.2万台是大体上能满足农业需要的数字,但这不是足够的数字。1926—1927年度我们不得不大大地后退,运进了5000台拖拉机,而按今年的计划,我们该运进的是3500台拖拉机,也就是说,同志们,我们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在退步……

斯大林:那我们自己在生产什么呢?

克维林:我们在生产,遗憾的是很少。今年按计划应该生产1800台,这是完全不够的。

这样,同志们,我们的拖拉机数量没有增加,在有这么多拖拉机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加强生产的基础——大型的农业,也就是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

我这里有一位同志的一封信的复制件,他是在集体农庄方面的重要工作人员,他说,由于有了十五大的指令,现在集体农庄的建设工作有强劲的发展态势,

但是他指出了一些非常大的危险,这些危险会发生就是因为这些集体农庄没有生产的机器作基础。

他在信的最后还完全正确地指出了:“我们的农业机关和合作社是在用通常农民祖祖辈辈使用的插犍⁴⁸来替代大型农业的技术基础。他们想的是,只要把伊万的犁、西多夫的耙、彼得的老马和斯杰潘的镰刀收集到一起,就是大型农业了。需要解释的是,插犍不是集体化,集体化也不是插犍”……

我想,这位同志很正确地指出了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工作中的弱点和非常大的危险。昨天《真理报》刊登了一篇很长的小品,题目是《总的来说大体上是100%》。这个小品说的也是这件事。我们在地方上的工作人员接到了相应中心机构下达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用一定的数量表现出来的,于是就组织起了这样多的集体农庄,声明说:不必担心,亲爱的同志,总的来说大体上任务将100%地完成。但是它是怎样完成的呢?它当然是这样来完成的,急急忙忙地把几十个农户收拢在一起,给一点贷款,而我们却不可能为此奠定任何生产的基础。结果我们得到的是这些集体农庄大量地解体了。

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只有在每年运进1.5万台拖拉机的情况下,我们的农业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而且我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我们的进口计划全面压缩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找到可能每年进口这样数量的拖拉机。

的确,现在我们在这个领域里有一些困难。“福特”欺骗了我们,它把自己的生产停了下来,我们现在应该在国外寻找其他牌子。但是我想,整个世界的拖拉机厂显然是能够拨出我们需要的足够数量的拖拉机来的。

今年人家就答应再给乌克兰人价值500万卢布的拖拉机。

彼得罗夫斯基:那就把它们送到这里来吧。

克维林:我应该说,他们是配得到这些的。

[丘巴尔:到底还是表扬我们了。]

克维林:和去年相比,他们完成了粮食收购计划的132%。但是,戈里格里·伊万诺维奇,请你不要翘尾巴。

彼得罗夫斯基:我能拿什么骄傲呢。

克维林:乌克兰的粮食收购是搞得很好,但是如果拿北高加索来说,它和去年相比,只收购了97%,那这并不意味着这个97%就不如乌克兰的132%,因为全部问题在于今年和去年相比,在各个不同地区收上来了多少。而且如果我们看看比如说伏尔加河沿岸地区,那里只完成了50%,还有一些地区的情况更差,例

如爱伦堡省,那里只完成了去年收购量的10%,但这不是因为那里组织得不好,——可能如果那里组织得好的话,他们可以收购到的不是10%,而是15%,——但是根据收成的状况,他们不可能完成132%。我说这些不是要说,应当给乌克兰的那500万卢布就应该讲哥们义气地在所有区之间分了。答应了就应该给乌克兰人,但是所有的粮食地区都同样尖锐地面临着拖拉机化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这方面不能找到一种确定不移的解决办法,那我们在组织大型经济、大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方面采取的所有措施就将注定完全失败,因为只有普遍采用拖拉机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把它们组织起来。

丘巴尔:解决的决定是有的,但是没有确定不移地执行。

克维林:就是这样的决定也没有,所以我才建议就这个问题做出用数字表达的全会决议来,这样的决议要责成从明年开始每年引进不少于1.5万台拖拉机。

米高扬:记在国家计委的账上。

克维林:如果米高扬能靠国家计委把这件事干了,我不反对,我要说的只是,如果造成的进口计划是6亿卢布,那我们就有责任找出0.15亿—0.20亿卢布来进口拖拉机。

现在我来谈谈我的第二个修改意见。它关系到面粉磨制。我们收购的是粮食,正像大家知道的,吃的是面包。于是粮食到面包就要经历非常曲折和昂贵的道路。我不去说烤面包了。在这里,我们的市长们和合作社的人员可以说说在这个领域里是怎么干的,特别是关于巨大的附加开支,我只是要谈谈面粉磨制的状况。几天前国家计委研究了面粉磨制工业的工业财政计划。我应该说,这绝不是什么小小不言的事。仅注册过的工业企业出产的产品就大约有10亿卢布。面粉磨制业不同于这个工业的其他部分,是直接受商业人民委员部领导的,但是我应该说,商业人民委员部并不是一个够格的面粉磨制工业的主人。向我们交来的那个工业财政计划在许多方面是非常不在行的。首先是它只包括了这个行业很窄的范围。第二,有人告诉我们说,在商业人民委员部本身,计划调节的机关是很不像样的。

埃斯蒙特同志重申说,为整个俄罗斯联邦的工业只设了两个工作人员,一个主任和一个打字员。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对他们有什么要求。

臧声:在全苏的机构里有几个人?

克维林:在全苏的机构里多些,但是正像人们说的,对他们所要推动的那项巨大的工作来说,也是不够的。在地方上,在省里的商业局里也是要么一个人,要么完全没有人,可是在那里也是应该工作的呀。同志们,结果怎么样呢?如果

我们看看精磨的成本,我们就会看到,1926—1927年度,也就是在过去了的这一年里,精磨的成本比1925—1926年度增加了。什么原因呢?商业人民委员部的解释是,第一,提高了折旧提成,第二,提高了工资,第三,燃料涨价,磨制的价格又加上了几个百分点⁴⁹,第四,小麦的湿度。就算湿度是取决于老天爷和仓库状况不好吧,如果拿其他的来说,那折旧提成、提高工资、燃料提价,这些是在整个工业里都存在的现象。但是,去年我们在自己的工业里是降低了成本,而在面粉磨制里却提高了成本。这说明,这个问题上的经济关系不都是处理得很好的:附加的开支太高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在生产地区,也就是在粮食收购并就地加工的地区,大麦和面粉的价格之间的差距可以达到40%以上。也就是说,粮食的精磨就把价格抬高了40%。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把商业人民委员部变成面粉磨制工业真正的主人,迫使它降低磨制的成本。否则,我们在粮食收购战线上获得的成绩就不会相应地在消费者身上得到反映了,而我们所需要的不就是以尽可能廉价的形式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吗?而现在我们在粮食收购时从价格上没有给足农民的那部分,先是在面粉磨制工业里,然后是在面包的烤制中,会不断膨胀起来,最终是以非常高昂的价格到了工人和消费者的手里。对这个问题是必须严肃关注的。

主席:请戈洛谢金同志发言。

戈洛谢金:讨论今年粮食收购的结果和对它做出结论,就不能不讨论、总结和对伴随着收购和帮助了这些收购的所有各种运动做出结论。要知道,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在这段时间进行了捐献、农民公债、征收农业税、征收保险费、社员费和一系列其他的活动。我们把整个我们的党组织都动员起来了,把我们整个农村,我们所有的苏维埃组织都动员起来了,所以单独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有些不大合乎情理了。我们有很大的成绩和某些缺点。而对整个运动的提纲和报告没有涉及这些运动做了什么和我们今后需要怎样走下去,也没有做出结论。粮食收购的中断是没有能正确地安排原料收购产生的后果。价格、收购时间、这些收购的区域划分问题,都对粮食收购的成败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我们被迫要在同一个地区同时不折不扣地既要解决粮食的收购,也要解决肉类的收购和原料的收购。我们试图要没有损失地划分区域和在各个区之间进行分配,我们也试图要推行更正确的价格对应关系,但是遇到了障碍。而且明年粮食收购能否成功也将取决于是否能正确地安排原料收购的问题。

可是中央的决议没有规定出这一点,就像没有规定出在原料收购和肉类收购领域里就像粮食收购一样,需要组织统一战线。肉类和原料收购中的收购单

位的竞争和过分的多样化肯定既会破坏价格,也会破坏这些收购的顺利进行。我想引起注意的是,我们有一系列的优势,例如正确地调节城乡之间货币流通的优势。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确定了,如果不能把农村里积累起来的货币提取出一定数量来,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这场运动。这就意味着我们这里会经常出现一些需要调节机关、我们的领导应该监督的现象,需要及时采取迂回的做法,采取能够对它进行调节的措施。我想,这个问题也应该在提纲里得到反映。

我们在农村的商品供应上有做得好的地方。我们能确定什么呢?我们可以确定,比如说,从工业地区向粮食收购地区、向农民地区调拨的商品还不够。我们现在凭这次运动的经验知道,大量的商品留在了城市里,留在了市民化的城市里。就是将来,调节对农村的供应问题也应该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做过的实验在推动着我们这样去做。还有一点需要记住:实验表明,有些商品我们认为完全是农村适用的,但也有积压。而同时农村已经有了发展,它的消费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也在消费那些至今还被认为是城市里才消费的商品。现在在分配那些农村需要的商品时需要再前进一步了。

我们党的工作在这些运动中的作用问题在提纲里完全没有得到反映。大家都同意党在这场运动中取得了胜利。我们来参加这次全会的时候,不像是1925年加米涅夫来的时候那样了,当时他说“富农把我们整了”⁵⁰。我们带给全会的是我们“整了”富农。但是同志们,如果说有许多正面的东西,那么同时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比以往更清楚和明晰地看到了我们的党组织的面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农村组织的面貌,我们看到了有已经富农化的共产党员;另一方面,我们大量的农村党员没有学会按新的方式工作,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对他们更合胃口。这个运动对安排这项工作的一系列指令是有启发的。顺便说一句,同志们,如果有很大的过火,它受到了谴责,而且是理所应当地受到了谴责的话,那我们应该同时再说上一句,如果说要消除非常粗暴的和强硬的过火行为的话,那这些过火行为并不完全是我们的基层机关、我们的基层共产党员的罪过,领导,我们的最高机关的领导,省的,边疆区的领导也是有罪过的,我不敢说中央,但是我想中央也有一点。

李可夫:在全会上什么都可以说。

戈洛谢金:中央委员会的电报给了非常正确的、非常对头的和很好的指令。

柯秀尔:现在可以说说在克兹尔奥尔达的两年粮食储备了。

戈洛谢金:是的,关于我们那里有什么缺点是可以讲许多的。在这里可以指

出的是,在许多地方,地方上的供应超出了国家的供应。这是对的。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避而不谈的是,如果为了进一步发挥中央指令的作用,我们在领导工作中不是把全部重心转移到“完成了就行,我们对你的评断是看你完成得怎样,所以你就拼命干吧,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一定要完成”的话,如果我们能在这上面再增添一些东西,提供一些如果我们干我们会怎样做的方法(而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些材料和措施的,可以少采用一些行政压力的方法的),就可以在这场运动里,在贫农的物质利益和其他一些他所关注的基础上,把贫农组织起来,那么,我们也就能避免发生曾和农民有过的那些相互关系中考虑不周的地方了。

我们在这场运动中也看到了我们基层苏维埃的面貌,它们的缺点和优点。许多同志写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把省和县机关的行政开销减少20%,扩大我们所要依靠的乡村机构的开销。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合作社组织的面貌。对这一点是需要仔细关注的。要知道,它参与收购的比例在扩大,主要是因为现在它有了很大发展,它和农民的联系很紧密。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合作社组织有着一种过时的农民面孔,而且常常有富农倾向;如果我们不向那里注入人力,不对那里施加影响,如果我们在未来的运动中不加强我们的国家收购机构的作用,那么,在发生某种复杂情况时,这个合作社是可能会欺骗我们的。

我认为,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优点,也有一些没有完全反映出来的缺点。清楚的是,我们不能再重复过去搞过的那种运动了。在调节、领导和组织所有形式的收购中,需要指出该采用哪些办法才不至于引发和制造出某些成分,使得我们不得不重复这样的运动。而且这样的危险是依旧存在着的,那就是我们的基层党支部会从过去的情况出发,在惯性的作用下,将来会重复许多过去的东西。它们将会在征税上取代我们的财政机关的工作;它们将会取代我们的收购单位的工作,他们将会记得,再过2—3个月计划是完不成的,这又要落到它们的肩上了;他们可以再重复这样的做法。可是我们应该让他们走上新的轨道;我们应该让他们走上监督歪曲党的指令的种种情况,而这将是肯定会有的,因为我们的苏维埃机关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同志们,然后该说的就是提纲里有什么不足了,不足的还是这场运动的政治结论。问题在于,现在我们在农村得到的是什麼,甚至中央委员会的信里有的那种政治指令、政治结论,那些完全正确的指令和结论,这里都没有。党被动员起来了,它进行了大量工作,在这之后,在它和千千万万的农民有了接触之后[等待着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本该能期待比这些提纲给予我们更

多的结论。

[柯秀尔:要看齐。

戈洛谢金:这里的问题不是要看齐,而是党在这里想要从自己的最高机关那里得到一定的回答。]

还有一点:播种运动将会使得我们与农村的相互关系有很大的改观,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但是这里也有许多考虑不周、统计不周的地方。例如,我可以举哈萨克斯坦为例,它今年提供了0.28亿普特,去年是0.50亿,——它总共收到了62万普特种子。比如说,临近的奥伦堡省,它为收购提供了总共90万普特,而它得到的种子是72万普特。谢米巴拉丁斯克省提供了0.12亿普特粮食,得到的是11.8万普特。旁边的西伯利亚专区贡献的要少2/3,得到的是60多万普特。这是不正确的。这样一来,一个在粮食作物方面承担了这样巨大任务的大边疆区是不可能完成春播运动提出的那些任务的。

主席:请列别德同志发言。

列别德:我想,有一些同志企图深究原则性的政治问题,像从粮食收购运动中该得出怎样的结论这样的问题,这是不对的。政治局的决议已经完全确定和明白地回答了这个阶段产生的基本问题。虽然我们在粮食收购运动方面采取了那些非常措施,我们付出代价主要是因为从上到下都延误了期限,这在决议里也已经写上了。当我们把全党都投了进去,破坏了正常的生活节奏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是再去期待得到比我们已经得到的更小的结果了。这是完全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也就是说,这里说到的那些扭曲,同志们在这里,在自己的发言里提到的那些来自各个阶层的农民(从中农开始到贫农为止)的害怕,难道有了这一切就足以提出要中央委员会深入分析社会变化的问题吗?完全不够,因为那里明确地说了,来自地方的同志们也已经证实了,富农我们已经对付了,而中农和贫农是留在了我们这一边的。而村子里用一种语言说话的那些情况,主要需要算在米高扬同志正确指出的那些扭曲的账上,这些扭曲的现象是我们不得显现出来的那种不可避免的紧张产生的结果。

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来谈谈政治局提纲里的第一个具体建议,也就是关于改组我们的收购机构的问题。根据前半年的经验和工农检察院在乌克兰和其他地区调查的结果,我想谈几个事实,那是应该考虑最坚决地从我们未来的实践中消除的。我在这里做一个限定,那就是我将使用的,只是乌克兰的材料和那些能说明在党中央和乌共(布)中央采取了相应措施之前的粮食收购机构状况的材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在中央委员会的提纲里已经确定的“残

酷竞争”。这种残酷竞争在乌克兰是由调节机关不正确的路线决定的。调查材料说明,按照计划,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应该有61个粮食收集点,但实际情况是,给它分了6个区,其中的4个是歉收区,它们是奥德萨区、赫尔松区、尼古拉耶夫区和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这样它就不可能开设61个点,而只开设了46个点,担心收购不足。乌克兰调节机关的这种态度就决定了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后来的工作。乌克兰商业人民委员部答应了要完全保障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收购粮食的来源;如果出现个别地区不能满足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需要的情况,它应该在工作过程中把部分收集点转交给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但这一点它并没有兑现。

丘巴尔:这些材料是从哪里来的?

列别德:丘巴尔同志,这些材料是在乌克兰工农检察院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是这种情况导致发生的结果。这导致了上半年在完成指令方面,当党在这件事上还有压力的时候,我们有的是这样的比例关系:在上半年度,也就是6月到12月,粮食收购完成的情况是,乌克兰粮食和饲料产品加工和贸易联合公司完成了97.5%,而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完成了50.4%。

还有就是关于追加费用的问题。为了刺激生产者把粮食直接运到磨坊和粮仓去,劳动国防委员会规定建立了1.5戈比到7戈比的追加费制度。而乌克兰商业人民委员部规定的追加费制度显然是鼓励了乌克兰粮食和饲料产品加工和贸易联合公司和降低了对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工作的刺激作用。我有数据材料,我可以把它们说出来。对于乌克兰粮食和饲料产品加工和贸易联合公司,这些追加费规定为3—10戈比。给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粮仓规定的费用是1.5戈比,而对同样地区的乌克兰粮食和饲料产品加工和贸易联合公司的磨坊规定的是5戈比。正像你们看到的,这些材料说明了极其残酷的竞争,是中央委员会建议在我们未来的实践中要坚决与之斗争的。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一系列的扭曲,禁止国营农场向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而要求向乌克兰粮食和饲料产品加工和贸易联合公司缴纳粮食。

丘巴尔:因为他们交的是种子粮,而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是会把它磨制掉的。

列别德:禁止代理商出行,甚至逮捕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代表——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是在解决极其重要的问题之一,解决粮食计划问题,这样做的确是正确的,甚至是有些晚了。如果说我们决定了要对工业这样的制高点制订计划的话,那么在粮食这件事上形成无产阶级的拳头就是绝对必要的,

“全苏粮食公司”就应该成为这样的拳头。

接着丘巴尔同志说,除了大家的困难外,在他们乌克兰有特别的困难,是属于民族性质的。关于这一点我也是清楚的,而且可能这是要加强众所周知的倒退的决定,比如说沃洛布耶夫式的倒退,现在乌克兰有一个“经济学家”沃洛布耶夫,他建议按照这样的方向改革我们的苏联,毫无例外地把对所有经济和工业领导权,包括对顿巴斯、南方钢铁、铁路的领导权,都交给乌克兰的各个中心去管理。

很自然,这些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特别是在最近,由于富农总是在企图转入进攻,他们的力量有所增强,因为这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进攻。所以,除了来自全会决定的所有任务以外,乌克兰的同志们还面临着结束这些扭曲的任务,就像当年要结束吃了俄罗斯不少苦头的情绪一样。因为沃洛布耶夫情绪⁵¹影响了一大片知识分子和乌克兰青年。这是彼特留拉反革命情绪的死灰复燃,是企图分裂劳动人民的联盟。

主席:请亨金同志发言。

亨金:合作社的粮食收购有系统地增长和国家粮食收购单位的比重下降,这是一系列经济、组织及日常性质的原因以及合作社在地理上接近粮食持有者造成的结果,是由于合作社在粮食收购运动的最后时期采取了组织措施来活跃自己的粮食收购。正好要说一下,列别德同志说在乌克兰对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采取了很大的干扰行动,这至少是没有根据的。特别是在粮食收购运动的最后时期,向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提供了非常多的工作条件,在开辟收集站方面,在它的代理人跑市场等等方面,有不受限制的条件。

列别德:在最近一个时期,而我我说的是在上半年。

亨金:但是这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我们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月里收购点,只限于收购13—15普特的粮食。

柯秀尔:这有些令人怀疑,他们没有专门的网络。

亨金: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转达一下乌克兰商业人民委员部在乌克兰中央检查委员会上的正式声明,它说到了,通过对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在最后时期进行的工作检查,可以确定的是,有一大堆向中央提供材料的指令,说明了在地方上为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工作制造了什么样的障碍和困难,但是没有一个指令是要加强收购工作的,没有一个对自己工作人员的处分,没有一个要追究这些工作人员对没有完成任务承担的责任的。在中央检查委员会会议上的正式声明就是这样的。

[丘巴尔:不是面向农村,而是面向商业人民委员部?]

亨金:至于合作社的粮食收购,我要再说一遍:有一系列我已经说过的原因,而且只是在一定的、非常小的程度上,合作社机构本身的积极工作产生了影响。党在一系列自己的文件里确定了合作社工作最严重的缺点是对粮食放任自流,坐等这些粮食,在粮食的收购上没有做任何积极的工作。这是完全正确的。合作社有这样考虑不周的问题。最近这些月粮食收购运动虽然有它的特点和困难,但有了各种积极的结果,其中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有了可能把我们的机构动员起来,迫使它积极工作,对合作社机构的整个机制、对个别地段的工作、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检查,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出是有积极结果的。但是对于未来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制定出一系列措施,消除合作社的粮食收购机构的消极态度和它对粮食放任自流的倾向。在这里什维尔尼科同志已经顺便指出了,股东们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指出,粮食收购计划没有交给股东们,他们不知道这个计划,如果他们知道这个计划,他们会迎面而上地完成摆在合作社面前的任务。问题在于我们至今还没有应有的组织形式,在粮食收购领域里把合作社的居民们和合作社联系在一起。我的想法是,应该完全根据合作社和国家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来建立合作社的居民和合作社的关系。

菲加特纳:这是什么意思?

亨金:这就是说,如果合作社作为一个体系,对粮食收购承担着一定的义务,给它有一定的、它必须完成的计划,那么完成这个计划的义务应该也转移到合作社居民的身上。

柯秀尔:不大明白。

亨金:我可以试试更清楚地论证一下这个论断。

菲加特纳:你还是完全说清楚,不要更清楚吧。

亨金:米高扬在自己的第一个指令性的紧急报告里指出了有必要这样提出问题,让股东们对完成合作社的收购计划承担物质责任。如果这个措施骤然实行,在工作过程中它可能收不到应有的结果,但是如果这样来安排这件事,把商业人民委员部向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或乌克兰合作社联社下达的计划由各个中心传达到区联社,传达到农村合作社并在农村合作社的全权代表和股东代表的会议上提出来,经过审议并批准,它就具有了股东对合作社的法律义务的形式。这意味着什么呢?

臧声:这是异想天开。

菲加特纳:这在今天能做到吗?

波德沃伊斯基：这大约在五年之后可以做到。

亨金：如果这大约在五年之后可以做到，那么这个措施实质上也不失为正确的。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更接近在粮食收购领域里出现的所有问题，他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已经成熟了，这个措施是至关重要的。合作社受到指责是完全正确的，我要再说一遍，党的一系列文件里提到了它在粮食收购领域里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积极性，它只是让粮食放任自流。可以用什么来抵制这种情况呢？

臧声：好好工作。

亨金：在什么方面？这怎样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呢？怎么做才能实际上做好工作呢？这可能应该表现为，从社会层面上说，这项工作要有固定的组织形式，粮食收购应该放在正确的社会公众的轨道上，而且我的感觉是，我们正是应该这样走下去。这将能预防我们的工作遇到各种偶然的情况。我们可以让我们粮食周转的60%—70%严格地服从于通过股东会议和合作社居民建立起来的条约关系。米高扬同志的报告和提纲里提出的建议可以归结为把合作社收购来的全部粮食都交到国家的粮食收购单位——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去，这不仅是合作社不能接受的，而且从正确地安排粮食收购的角度看也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按米高扬同志建议的安排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会导致所有收购来的粮食根据和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以及全乌克兰合作社联社的总协议，都交给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合作社的中间环节——区联社在这项工作里将起什么作用，只字未提。但是实现这整个计划，这整个安排的极其重要的条件是区联社要参加粮食收购。如果说区联社作为中间环节，从粮食收购中被排斥了，那合作社的各个中心当然就不能为完成计划真正承担任何责任了。这一点是需要直截了当说出来的。

米高扬：这是清楚的。

亨金：如果区联社应该完成的只是一定的组织工作，在基层环节上把粮食收购单位组织起来把粮食交给国家收购单位的话，那它们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区联社的组织工作是抽象的，缥缈的；如果不对收购的结果负责，如果没有各个组织和各个地区之间的健康竞赛，那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可以带有一定限制地要求合作社中心做这样的工作，那它也是会做得非常不好的，而不让区联社有可能直接参加粮食收购是不行的，因为那将也会很难组织基层的收购机构。所以我的感觉是，这种状况还是要求把收购工作放在合作社里，让来自直接和自然地倾向于向国家收购单位的收购点上缴粮食的消费合作社把粮食缴到那里去，但是在有这种经济吸引力的范围之外的合作社收购的所有粮食都缴给合作社直接

支配。需要这样做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情况。出现了其他一些让人不解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一个铁路车站都会自然地吸引粮食,粮食往那里集中是完全自然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位于车站附近的合作社就没有权利和可能履行从头到尾加工这些粮食的组织职能呢?是不是这个组织接收了粮食,付了款,就该卸下来,按相应的地址送走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所有的车站附近都一定要组织国家的收集点等等,甚至在现在还没有的那些地方也要组织呢?如果是最后提到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做肯定是要有很大开支的,而且完全不是必不可少的开支。我感觉这个问题不能从我们的眼下滑过去。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是这里已经提到的,引起注意的。合作社将应该是而且现在就已经是粮食销售和供应的基本组织了。在一种情况下,它是把所有粮食都转交给国家收购单位,肯定将会为此得到某种手续费等等,然后得到为供应需要的粮食,而且这种作业是需要相应开支的。结果是在粮食流通领域里形成了一种很难消化的和非常复杂的机制。我感觉,柳比莫夫同志提出了有必要根据收购点的自然吸引力特征,给合作社的粮食收购工作划定一定的范围,由它们向国家收购单位上缴粮食,这是非常正确的。所有剩下的事情应该是合作社直接领导和关心的事情了。

最后我想再谈一些和粮食收购有关的其他问题,也就是商品周转问题。在这里我想指出两点。第一是在商品的全国分布方面,我们肯定是有一系列重大的考虑不周的地方。在收购运动的最近时期,也就是从1月份开始,商业人民委员部对供应领域,对商品在各个地区的分布,做出了生活本身需要的修正。商品开始被发送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大经济效益的地方去,不是按照原来的那种以完全没有根据的和偶然的系数为基础的商品配置体系办理了。但是,这种实际做法,这样配置商品的实际做法应该固定下来,因为它不仅符合各个区、州和共和国真正的现实需求,而且也符合国家在粮食和原料收购等等领域里的总体利益。但是与此同时,在各个共和国本身和在各个州里,也应该改变行政调节我们的商品周转的实际做法。由于这种调节,我们得到的是,一些区联社完全没有需要地和不能允许地堆积了过多的商品,而同时其他联社却商品不足,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得到的都是财政危机,而且是一系列合作社组织的破产。在我们乌克兰是这样的情景:所有不属于需要收购的地区都开始在粮食收购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没有能得到通常份额的商品,而另一些地区却得到了过多的商品,但没有交出预计数量的粮食。

最后一个也是关于商品流通领域里的情况。粮食收购是这样进行的,我们

的同志在地方上,了解合作社总的工作情况,结果搞清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那就是合作社的商品周转也是放任自流的。合作社是这样一种商业机构,商品通过它到不了消费者的手里,消费者也得不到他们要求的東西。机构的心思都花在了获取紧缺商品上面了,而不是在获取足够的、消费者需要的商品上。我想,在最近的未来,我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让合作社的商品周转活跃起来,让消费者所需要的、足够的城市商品,那些能够提高消费需求文化的商品到达消费者的手上。

主席:请瑟尔佐夫同志发言。

瑟尔佐夫:对于我们所有的组织和整个党来说,粮食收购是一次彻底的检查,而且不能说这次检查的结果能令人欣慰。关于我们的国家组织和党的机构以及合作社的状况和工作得出的结论是相当可悲的,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和那些乐观主义说法相吻合,说什么一切都克服了,所有的艰难险阻都过去了,我们在这件事上干得很出色。当然,把党动员起来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纠正了事态,但是这次大考验也表明了,我们的所有组织,我们的所有机关,我们大家如果不是说和我们面临的那些极其重要的任务有更大差距的话,也是矮了半头。

就拿我们西伯利亚的情况来说吧,最近一个时期的粮食收购经验表明,在工作进度上,我们一直是如何令人烦恼地落后呀。如果我们,我们的组织和所有的组织都能够意识到已经搞清楚的所有那些消极现象和缺点,如果我们能够开始按新的步调改造我们的工作的话,粮食收购的教训是能够带来很大好处的。但是还是应该说,在许多组织里和许多机关里,还是表现出落后状态和官僚主义的乐观。我认为,合作社也还应该算是这些最麻木不仁的组织中首当其冲的若干个中的一个。我要先说一句,我只是在观察了我们西伯利亚合作社的各个环节的基础上说这番话的,虽然我看到过合作社中心的一份文件,是从粮食收购运动中得出的结论,可以给这个文件写上的题词是:“有理智地留存下来的一切。”这标志着作者什么也没有学会,没有意识到合作社机关考虑不周的地方,没有能从这件事为自己得出相应的教训。我认为,在这里起了很大妨碍作用的,是我们到处都可以遇到的那种特殊的合作社不可一世的作风,特别是表现在合作社的独立性问题上。当然,合作社的独立性是一件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事,但是如果把这种合作社的独立性绝对化,我感觉这就完全不对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国家机关还是常常滥用的发号施令和行政干预就是正确的了,同样,商业人民委员部机构进行的粮食收购运动的经验再一次表明了这一点,它的问题就在于有太严重

的官僚主义的扭曲现象。当然,笨拙的干预、发号施令、行政命令等等常常会摧残合作社的独立性和妨碍它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还看到这样的情况,例如在事情涉及要从居民那里把额外的股份打掉的时候,一些环节上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就完全不担心害怕用国家机关的干涉破坏合作社的独立性了。非常多的合作社组织在向股东们征收股份这样的事情上十分乐意求助于警察的帮助。一些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该用法院的办法来征收这些额外的股份,等等。在这方面,合作社的同志们就不担心破坏合作社的独立性了,比如说,许多合作社就来找区执委会帮忙,就要靠镇执委会的命令,让股东们都把粮食只缴到合作社去。国家机关可能会用不讲礼貌形式和可能实质上不正确的办法,通过处分把一个出了问题的合作社机构工作人员抓起来,和这种情况相比,这里发生的对独立性的粗暴破坏更具有实质性和更致命。再有,合作社的独立性对于我们主要是以这样的程度和形式为度的,那就是我们要能够在这种独立性的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跟着我们前进,但是在粮食收购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合作社的各个环节不是在带领农民跟自己走,而是自己在跟着农民的情绪转。当然,这样的缺陷不仅是合作社系统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机关也都有。这里总的反映出了我们的软弱,但是可以未必夸张地说,尾巴主义、地方主义、缺乏国家利益观念、只从狭隘的经济和商业考虑出发而常常斤斤计较但得不偿失等等情况,在合作社里还非常盛行。我感觉,已经规定的和国家机关的联系应该能够对合作社大有帮助并能促使它比以前更彻底地转向考虑国家利益。我们合作社的实践中有许多例子,其中的一个就可以勾画出在“合作社独立性”方面有哪些过火的地方。我手里拿着的是一份我们西伯利亚的一个区执委会给所有农村消费合作社的公文。整个文件用不能许可的方式把矛头尖锐地指向了国家收购单位。在合作社这方面一切都很好。这位联社的主席没有去校正自己的农村消费合作社系统工作人员的脑筋,而是处处表现得很大度,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合作社存在的缺点上。在所有其他的级别上,在所有其他的系统里,都在滥用职权,只有我们的消费合作社系统没有这种情况发生。文件确定的方针是,需要和国家收购单位作最坚决的斗争,要积累材料,等等。

这就是文件提出的口号,而文件的意思绝没有因为在结尾时说了些有良好祝愿的话而有所改变,它说到了我们应该能够应付和排除自己的缺点。通过这次粮食收购运动,我们应该得出结论,那就是我们在基层和中层环节上的合作社干部非常薄弱,在现今条件下不能适应面临的那些任务的要求。这种薄弱状况在我们这里的其他方面,在党的方面和在苏维埃方面,也暴露出来了,但是在合

作社这方面,可能是因为它的肩上压的分量要比它能在现有条件下承受的分量多得多,所以显现得就更明晰、更突出了。

我认为,如果我们企图在某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身上,无论是商业人民委员部还是合作社,或者还有什么另外的一个组织身上,找到替罪羊,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这里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医治自己的缺点是要找到一个莫须有的或者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于是便确定某一个机关或者组织是有罪过的,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改正所有错误和失误的。当然,我们面临的错误和失误有非常多的是属于地方党组织的,就是一些非常受尊重的党组织也在内。虽然在十五大期间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充了电,当时在专门的会议上尖锐地提出了粮食收购非常艰难,处境非常严重,也还是有这种情况存在。

我想谈谈几个起到过作用的政治方面的情况。富农的积极活动和影响在这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这不仅是因为富农存心不良,而且还有客观的局势,那就是在恢复农业的过程中,富农经济已经接近了这样的界限,开始越来越强烈地冲撞到了苏维埃设置的框架和屏障,他们在想方设法利用我们的错误和缺点绕过去。不打破苏维埃的秩序,富农就没有前途。由于我们党内遇到了麻烦,由于我们过分地和不慎重地议论战争而产生的对马上就会打仗的期待⁵²,富农就和老百姓中间的其他敌对集团一样,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已经接近于危机了。这些一时的瞬息因素决定了富农会有过度积极的活动,而且在这里和一系列其他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搅和在了一起。富农的活跃在某种程度上又和一部分中农阶层的某种对立情绪联系在一起了。我认为,对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守口如瓶。这不是说,这部分中农是由于和富农同样的考虑而参与了这次粮食怠工事件的。富农的怠工是自觉的,而中农效仿富农是考虑到富农的估价更准确,认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把粮食卖出去,经济上的算计和相信富农经营起来更精明,这就推动了一部分中农走上了把持粮食的道路。但是,如果说富农的立场是由完全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消除的因素造成的话,那么一部分中农的消极立场则可以用我们与调节有关的错误,用商品的缺乏来解释。而且商品的缺乏并不是一种客观原因,因为当事态变得非常严重的时候,商品就找到了,而且向收购地区的商品投放数量是充足的,不过就是太迟了。而这场突击运动的第一部分是在没有商品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是有一个指令:把商品作为收购的杠杆。这些商品本身并没有,但是有把它们作为杠杆的指令,当然怎么完成这个指令是很难说清楚的⁵³。这就反映在这部分中农的情绪上并且帮助了富农在这方面和这部分中农联系起来,沉湎一气,但是没有能持续太久。

然后是收购单位的竞争,不合法的加价,这一切的发生都是由于我们党和苏维埃组织对这件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它们产生了提高价格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自然也就把中农纳入了期待提价的总情绪中了。对于将来来说,我们的所有机关,其中也包括了商业人民委员部,应该得出一个结论,为未来规定一个条款,让粮食产品处于比以前更为良好的条件下。在这方面要担心的,只是万万不可出现通常的那种即兴发作。需要的是不让这成为猛击一拳,使得我们把技术作物的所有阵地都打掉了。莫斯科有一种议论,说是必须要降低奶制品的价格。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肯定在国内需求和出口领域都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奶业也将会处于严重的境地,特别是在发生饲料危机的情况下,而且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做出不慎重的、猛烈的动作就有可能给这个经济领域带来打击,在国内市场上和在出口上打击我们自己。

一部分中农的那些瞬息的情绪是应该给予非常关注的。通过打击富农,党揭示出了富农对自己力量的看法多么没有根据和夸大。真正的力量对比关系和对它的正确观念已经确立起来了。农村对没有能考虑好力量对比关系的富农不再那么尊重了,虽然富农的情绪是非常敌对的和富有进攻性的,但对于这一击,富农也没有能采取什么重大的行动来回击。这表明了,虽然我们有错误,但总的来说,我们所面临的局面是富农基本上在农村里被孤立了,不过对一部分中农的某些反面情绪,我们是要给予严肃关注的。

一些同志表现出了对播种面积的担心。我感觉这些担心是被夸大了。例如,从西伯利亚的情况看,我们并不认为播种面积会减少。我想,如果只要我们组织上的混乱不致影响推行所有那些党和苏维埃机关规定的措施的话,我们的播种面积会是稳定的,可能甚至会有所扩大。而且在这方面,富农惟一可靠的同盟军就是我们的官僚主义机构;机构的缺点是富农指望最大的赌注。他们在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些缺点,让我们和贫农、中农吵起来。

当然,可以认为令人不安的一个事实是,现在富农在一些地方正在卖掉自己的机器。关于这一点,报纸上也写了报道。但是在这里,同志们,应该追踪的是哪些富农在出售自己的机器。我想,如果我们预料富农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会落入那些陈旧的反对派方针的束缚。而且有一些类型的富农是自己不播种自己的耕地的,也有一些是光使用机器的。可能推销和出售机器的富农是对他们能够继续这样有赢利地使用自己的机器失去了希望。所以需要追踪是什么样的富农在出售自己的机器。

非常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中农的情绪。一部分中农的情绪应该说是相当忧愁

的,有某种对明天的信心不足,因为他们现在不知道苏维埃政权是怎样看待他们的,会不会是对富农采用的那种路线也要扩展到他们中农的身上。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在春季的农业运动中采取的措施让这些中农阶层能够安下心来。只要到我们还不能把所有的中农农户都包括到集体建设中来,只要中农还能从事个体经营,不担心会把他们和富农同样看待,我们就还要贯彻这些措施。我觉得必须要考虑到中农的这些情绪,要把它们消除掉。

虽然一部分中农有这样的情绪,我们还是应该说,由于贫农和能力小的中农的情绪改善了,积极性提高了,这种情况得到了顺利的补偿,这使得现在我们在农村感觉到了有已经健壮起来的社会基础了。当然,我们在粮食收购时期,在存在所有缺点和反面因素的同时可以感觉到阶级状况的变化,让我们能够指望在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事业上发生某些质的变化,可以产生质变的效果,也就是提高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比重和意义。

我还想说说在个别的部分党组织里出现的那些动摇和涣散的状态。要让农村组织中所有已经富农化的分子和富农化的共产党员暴露出来,粮食收购是非常好的试剂。在这方面的一些不健康的情绪,不仅存在于我们的基层组织。请允许我读一位共产党员来信中的一段话,这是一位相当负责任的党员给农村里的一位非党农民[不知是不是富农,不过是符合107条规定的(笑声)]写的信。他在这封信里写道:“最近一个月的局势又变得非常复杂了。我们这里完全没有黄油、白面、鸡蛋、大米了,所有这些只能用发疯了价格从投机商那里买到,比如,买一公斤黄油就需要6个卢布。几乎所有的合作社商店又都排起了长队,但是食品不能全给,而只给合作社的社员。

我们那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在农村发生了什么,我只能猜想了,只能是根据各种报纸来判断了,而这些报纸常常是在骗人的……3月将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例会,将通过新的农业税⁵⁴,会上将总结粮食收购、捐献、向农民分摊公债,会上将讨论春播运动的前景。在这个时间之前,请你一定要给我寄来上面提到的所有问题的开诚布公的材料。你们生活在农村,你们开各种会,让你们去见各种长官,你们可以和各种老乡见面,不仅是自己村子里的。关于这样的会面、谈话、会议和推推搡搡的情况,你们给我描写一下,而主要的是,给我写写你们那里的捐献是怎样进行的,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是不是从你们那里把粮食夺走了?是不是像1920年那样在你们的粮仓那里走来走去?如果是夺走了,如果是走来走去,那是谁在干这些事:是自己村苏维埃的人还是从区执委会和专区里来的人?而且主要的是要对这一切都要坦白地和赤裸裸地写上,就像我们以

前和你们谈话那样,要多多写些赤裸裸的事实:在哪里?什么?在谁那里?在哪个村里或者镇里?我对农村的情绪还是老样子,没有改变,我还是像以前一样认为正在发生的对农民施加压力是不正确的和不公正的,但是遗憾的是,在这里,在不仅完全脱离了活生生的农民群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脱离工人的职员和知识分子中间,我依旧是孤立的。所以只能靠你们的支持,靠你们作为劳动者、有着长着老茧的双手和被力不从心的工作压弯了腰的老乡们的同情生活和继续生活下去。所以我将照旧请你们不要在表达方式上对我不好意思,不要不好意思告诉我老乡生活中的反面事实。再有,我也很感兴趣,老乡们怎样扩大自己的播种面积或者相反他们怎样更多地缩小播种面积?老乡们在这方面是怎么想的,他们说些什么?你们是不是又打算从我们这些地方迁走呢,如果是,那是去哪里呢?去哪些地方呢?谁打算和你们一起走呢?”

喊声:这个共产党员叫什么名字?应该把他送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

斯大林:这是谁写的?

瑟尔佐夫:这是帕尔菲奥诺夫写的,他是红色教授大学⁵⁵的学员,他就是这样在帮助我们在西伯利亚农村的工作的。

喊声:应该把他送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

[瑟尔佐夫:而且这封信在村里到处传递。党的组织对它感兴趣。]

主席:同志们,也许晚上的会议我们从洛巴切夫开始吧。现在休息到6点。

第三次会议

4月7日晚间

主席(李可夫):请洛巴切夫同志发言。下一个是卡明斯基同志。洛巴切夫同志请求给他的时间延长到20分钟。他说,我不要求得到你给合作社人员柳比莫夫同志那样的时间。

喊声:给他20分钟!

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今天应该把结束的话也讲完。

洛巴切夫:我们已经有4年时间在减少粮食收购单位的数量了,主要是在这个领域里进行改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能减少。你们看,两年以前把国家进出口贸易局取消了,组建了高加索粮食收购股份公司和其他的地方托拉斯代替它。去年取消了这个加米涅夫同志所说的著名的棍子——他想依靠的国家银行⁵⁶,取代它的是这些粮仓,只是在商业人民委员部里,收购还在继续进行。区别只在于银行是用钱在施加压力,在1925—1926年度的上半年收购了2950万普特,或者说是13.5%;而商业人民委员部不是用钱,是用行政的办法——两者彼此彼此——收购了1210万普特,或者说是3.5%。照我的看法,这是不正常的事情,而且在米高扬同志提出的那些提纲里,需要明确清楚地提出,粮仓应该转交给联盟组织,它们将能够装得更满和得到更充分的利用。除此之外,管理也将更加廉价,因为在每个州的粮仓管理局里有管理它们的局,而在联盟组织里不应该也有这个局,因为它们将从属于相应的处了。在有这样多的收购单位的情况下(我再说一遍,它们原来有多少现在还是多少,并没有减少),中央的组织自然是很难工作的。

如果你们看看全联盟的比重,就可以看到,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占有的比重在开始时是45.9%,2月份降到了23.7%。这样的比例降低了两个

* 原文如此。——编者注

地区的影响,在那里工作起来特别困难,这就是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就拿北高加索来说吧,它开始时是27.3%,而到2月份时就下滑到了12%。在乌克兰,下滑得更厉害,从19%下滑到了10.6%。如果把乌克兰和高加索抛开,不算这些区,那比例将是67.9%,比例最低的是在1、2月——37%。但是对于全联盟来说,典型的情况是,只要一减弱加强收购的压力,3月收购总量的曲线就会降下来,而如果看看联盟组织收购的曲线,那么,它也在下降,但是很慢。如果全联盟在1月份时是23%的话,那么在3月份就是30.9%了。如果不算上北高加索,在乌克兰是37%的话,在3月份就是41.5%了。正像你们看到的,这个有纪律的和集中化的机构没有屈服。

丘巴尔:说得对!

洛巴切夫:现在说说工作的困难。埃赫同志说得对,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机构不能在收集点露面。我所说的只是我们的机构不能走访市场和村庄,因为这是被禁止的。

柯秀尔:特别是在乌克兰。

洛巴切夫:到处都这样。我在走访基层机构时常说:到集市上去,到村子里去,和地方组织联系来提高收购量吧。不让我们从收集站出来。我们又能怎么办呢?他们也是对的;如果把一个人的手脚都捆起来——让他去跳舞吧。不管他在这方面是多大的行家,他也干不了。当然,在这方面是不能对机构有什么指责的,因为它已经做了取决于它的所有事了,只是“客观的”条件没有能让它做到这一点。当然,随着加强收购运动的发起,深入的合作社网开始有力地展开了。你们看——在乌克兰有67个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点,而合作社有5897个,就像米高扬同志在这里说的,每个月都有最大的工作量,我举的是平均数,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是20.85万普特,合作社是1.85万普特。

在萨玛拉州是14个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收集站,合作社有700个。在库尔斯克州相应的是23个和605个。当时最有意思的是在鞑靼共和国:17个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和1041个合作社的收集站,总共有1149个居民点,就有1041个收集点。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加强中央组织的收购当然是没有任何可能和任何基础的。有大量的收集点,这基本上就破坏了粮食主要送到铁路线和码头上去的状况。如果以前有3年的时间我们是提出把粮食运到铁路线和码头上去的方针的话,那么,这些深入到村里的收集点就从根本上破坏了这个原则。基本方针是从经济上吸引农民到铁路线上和到码头上

去,因为在收集点上,除去运送的费用外,加工一普特从马车和车厢里卸下的粮食要花费4.7戈比,而在粮仓上是2.7戈比。这样的差价可以自由地给农民,于是他就会把粮食送到粮仓去了。但是正像丘巴尔同志说的,制定的计划是按地区征收,这也就意味着不让把粮食运到铁路线上去,于是正常的粮食流通被打破了。曾想过组织粮食列车可以有所帮助吗?(后来可以看到不多的这种情况,收走了原来合作社收购到的粮食,挂着旗子和有音乐伴奏地送到了城里,但是这些情况不是常有的。)甚至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组织的列车也没有达到目的,还是转向了合作社。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工作人员的双手被捆起来了,什么也干不成。

柳比莫夫同志说,对合作社有排挤。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寓言,说是“熊把奶牛揪住了,自己却在吼叫”。谁排挤它了呢?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吗?他们或者是管理局的成员,要么就是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在挨家挨户地到处向合作社社员或者非社员散发路条。这就叫做发展首创精神。但是你们知道吗,如果发展首创精神指的是设置障碍不让把粮食运出去,或者是不把商品发给那些不把粮食交给合作社的农民,如果说的是这样的首创精神,那我的看法是,它是有害的,这样的首创精神是不应该发扬的。

我认为在这里是合作社工作基本原则本身遭到了破坏。按我直至今日的理解,合作社是一组人的联合组织,他们在一起推销某些自己生产的产品或者一起购买需要的供应品。这就是合作的原则。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散发路条,发给社员,也发给非社员,我就不说报纸上印的东西是不是正确了,也不说这些路条甚至是在啤酒店里散发的了。它们是见到什么人都发。难道这是合作社吗?基层当然是不懂得这些的。只要是把粮食送到了就行了。但是上层也能这样理解吗?无论你是不是社员,有给你的路条你就运吧,你们看到了,他们是想认为这些粮食是合作社收购到的,这是不对的。在这里需要向合作社指出,它是要在合作社原则的范围内行动和发展的,而不是用现在采用的这种方法。另一方面,需要指出不给商品的威胁和那些“交给我不交给你”的劝说。同一个农民既属于消费合作社又属于农业合作社。一个合作社威胁说,“如你不把粮食交给我,我们就不给你衬衫”,另一个合作社又说:“如果你不把粮食交给我,我就不给你轮子”等等。农民对这两种合作社都绕着走。他说:“给你50普特,再给你30普特。”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全部都交出来,因为他知道还会有人来找他要粮食的。农民对这些合作社原则又会怎么想呢?他会嘲笑我们的。当然这是需要甩掉的。

下一个问题是合作社怎样履行对农民的义务。我这里有一张纸。种子的供应——合作社如果收购粮食,它就要供应种子。照我的看法,这是它的首要义务,是最重要的义务。可是结果呢?任务没有完成,于是没有完成的那部分加在了国家组织的头上,让它去替合作社完成了。

喊声:因为是把粮食交给了你们。

洛巴切夫:问题就在于并没有交给我们呀,如果说是交给我们了,他就会是另外一种做法了。对国家组织有这样一种态度:在给不了农民的时候——你们来吧,可是在向农民征收的时候——给所有的人都发路条,无论是社员还是不是社员。柳比莫夫同志在这里说了,米高扬没有权力给他处分。我至今都知道米高扬同志不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他可以给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处分,他完全有权力给它处分。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并没有给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处分。相反,有魏采尔同志的一封信,说是提前明确和清楚地完成了给亚麻产区下达的任务。这是4月2日的信。柳比莫夫同志,我是拿着正确和提前完成了任务的文件走上来的,而你是带着对处分的抱怨上来的。你瞧,有一个不大的差别。另一个必须指出的重要的方面是,合作社的所有工作自然是造成了粮食在很大程度上动员不出来。

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能这样灵活地支配粮食的。这可以理解,因为在那些数以千计的征收点上,如果每一个点都留下不多一点的粮食,那么从总量上看,如果把所有的数量都加在一起,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我们来看看数字吧。在6个月里我们收购的情况是: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收购了27%,而在供应方面它的参与是41%——要比粮食收购的比例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问题了,从什么地方去拿。可以解释成是这个数字里有从去年的剩余部分转过来的。但是这说明了储备在减少,关于这一点我下面要讲到。在供应这部分里,我们必须拿出38.5%给中亚,拿出55.9%给外高加索,拿出73%给军事部门。这样,必须供应的东西中有一半以上就落在了我们的头上,而且所有供应,也就是说有41.8%,都是要由中央国家组织来承担的,尽管它在收购方面只占有27%的份额。如果你看看现有贮备的情况,它也说明不可能把粮食动员出来,那么就能看出,前半年的粮食总积累加上转移过来的剩余部分,在全苏是132%,而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则降低了3.9%,也就是说现在销售的粮食得要超过应该销售的量。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积累是137.7%,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的积累是406.5%。从这种积累就可以判断出粮食动员不出来的情况了,当然这种情况在

中央机关和中央组织要比合作社少得多。我在这里不是说柳比莫夫推说他供应了很多面粉。这里有一些简单的数字。关于前半年的大麦粉情况(我没有换算成百分比):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是2 300万普特,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是480万普特,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是170万普特,——这是大麦粉的情况。小麦粉的情况是: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是3 560万普特,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是940万,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是340万。可能对于合作社来说,就完成计划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了,但是35比4是一个太大的差别了,不过是从另一方面说的。当然,我们有磨坊,但是这不能说明合作社收购来的颗粒的粮食是完全到了消费者的手里,不是以颗粒状,而是面粉到了消费者的手里的,是经过属于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磨坊磨出的面粉。

现在说说和合作社的联系。在现在的情况下,这就是以后的运动应该有的状况,已经有人在说,上缴粮食应该是从上到下都要通过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和全乌克兰合作社联社集中起来。

丘巴尔:自下而上地。

洛巴切夫:就算是自下而上的吧,反正都一样。我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合作社人员,相反,我感兴趣的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妨碍着我们,在竞争和妨碍着工作,指的是这样的意思,那就是迟迟不给我们的缴粮户发放商品。如果它能强壮起来并很好地工作,我准备让步,但不是现在。而亨金同志是一个合作社人员,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说在决议里有了,和中央签订了合同,而中间环节则被抛开了,可是没有中间环节的影响,基层就不会工作,也不能完成任务。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我看,从逻辑上得出的就是,既然中央没有中间环节就不能影响到基层,就应该这样来提出这个问题,应该把中央抛弃,抓住中间环节——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自然,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领导还是应该保留的,但是联系的中介工作应该留给中间环节,那样才能顺利地做好这个基层合作社的工作。

这里有人说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意义不很大,是合作社在替它工作。但是在大多数地区,合作社并不能包揽基层,它是在利用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做到这一点的,然后又认为它是为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做了善事。正相反,是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而不是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加强了和它一起工作的薄弱的基层的。在这种关系中,我要重复说,是需要通过区联社而不是通过中央把粮食缴给中央组织的,后者会把缴纳粮食变得复杂起来的。

现在说说组织问题——改名为“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是由什么引起的,但是如果说到名称,那最好叫做“联盟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在高加索有粮食公司,而且就在旁边还将有一个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如果需要的话,最好叫做联盟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更何况农民知道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已经有6年了,不考虑到这一点是不行的。提纲里有一条说到,乌克兰粮食和饲料产品加工贸易联合公司、高加索粮食收购股份公司和哈萨克斯坦粮食收购股份公司都要归进去。我们都很了解,大家都会进去的,只有乌克兰粮食公司除外,而且也不需要把其他组织都拉进去了,因为他们已经是属于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了。

而且我要重复说,只有一个组织是行不通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就应该这样来命名。我觉得更好的做法是,如果需要的话,就是联盟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反正这还是一个全苏的组织,名称还是同样的,但是不会引起重新划分,不会引起最终平衡、簿记、招牌等等的改变,而这种改变至少要花费50万。更不要说特别昂贵的一条了——这会延误了推行这个组织的组织形式。延误是不行的,因为改革是全联盟范围的事,如果要改,就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可以说剩下的时间最多也就是到5月中旬了,再等下去是不行的,就是说剩下了一个月,而在这一个月里要组织新的事情是很困难的。

主席:你的时间已经到了。

洛巴切夫:请再给我5分钟。

我是说,如果所有这一切是必要的,就应该赶紧干这件事,因为这是需要很多时间的。

现在说说面粉磨制工业,我拿的是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是7月到12月的,经过加工的,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精制面粉占54.3%,而合作社的情况是,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和全乌克兰合作社联社一共占9.5%,两个农业合作社,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和乌克兰粮食和饲料产品加工贸易联合公司是1.9%。你们看见了,总共只有11%精制的面粉是从合作社走上市场的,其余的都是国家组织磨制的,当然,磨坊应该完全集中在一个地方。这里有人说,精制面粉非常贵,米高扬同志对这一点讲得很少,而克维林同志说,精制面粉的成本比去年高,这是不对的。车间成本是降低了,但这说的是,如果把折旧费、更贵的燃料成本,甚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都除去的话,是这种情况;不过这里忽略了一个内容,那就是今年,所谓节约出来的部分

有55%被拿出来交给了磨坊主,而节约的这个部分也完全算到了磨制费用里,自然,今年加上这些不利的部分,好像是更贵了。实际上并不是。如果拿现在粮食和面粉之间的价格差距和战前相比,把战前的价格定为100的话,那么现在的原料就是122,铁路花费是180.5,袋子的成本是227,其他辅助性的开支是184,而磨制的费用只是145.8。如果拿上取决于我们的附加开支,是119.4,贸易开支是140.5,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条件地进行压缩的,但是幅度不大,因为越是往下压就会越困难。(主席的铃声)

我只对今后工作的方法说几句。对劣质品和运输损失的折扣是必要的,当然它们被歪曲了,采用得不正确,但是它们是有必要的,因为它们能刺激农民把他们上缴的种子和粮食搞干净,可以多得一些,在磨坊和粮仓能得到补贴支付;由于经济原因,有必要采取措施推动农民在铁路沿线上缴粮食。

现在,在调节粮食市场方面还有一点。至今商业人民委员部对粮食市场的调整少,对粮食收购单位本身的调整多。在这方面,在下一次的运动中需要改变一下这个方法,要更多地调整粮食市场,对粮食收购单位该做的只是观察,让它们不要破坏已经规定的一定的指令。

然后我还要说,关于党在这次收购中的工作,许多同志在这里说了,不能这样把整个党都投到粮食收购上,但是我应该说,也不能像秋天时党对待粮食收购那样来对待这件事。在下一次的运动中,工作将是特别繁重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把粮食市场搞坏了,没有党的帮助,可能不是像最近这些月这样的规模,但是至少不是像秋天那样的规模,没有党对粮食收购单位的帮助,无论它是什么样的单位,都是对付不了粮食收购的,而为了能对付,我们就需要党的帮助,而且它当然也是会帮助的。

主席:卡明斯基同志发言。

卡明斯基:我们应该讨论的基本问题是,在农村里由于党进行的粮食收购运动出现的阶级平衡问题。

我认为,这场运动解决的不仅是粮食收购问题,而且需要直截了当地说,与这个问题一起,党解决了农村中的一系列其他极其重要的问题。

粮食收购运动是直接和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向富农进攻、加强农业的生产合作的决议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也不可能不是这种情况。后来,在这上面还加上了播种运动,它是一场动员贫农和中农农户,扩大播种面积、加强农业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广泛运动。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虽然在开展运动中许多缺点,但是有一系列重大成

就。不容置疑的是,富农现在比运动开始时更加孤立了。我们加强了和农村中的贫农的联系。我们在农业集体化上有很大的进展。中农通过这场运动的经验更好地意识到了自己对苏维埃国家的义务,而且坚信了必须要履行这些义务。有些同志指出,在一系列情况下我们把中农推开了。当然,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更何况在运动的前一个时期,地方上出现了不正确对待和严重歪曲我们党的政策的情况,不仅是对中农,而且是对贫农和富农也一样。例如,在前一个时期,在地方上采用直接的商品交换的做法时,这种做法不可能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富农的。在一系列情况下肯定触动了中农。有些地方也可以看到贫农的不满,在一些地方,他们在得到商品方面处境非常不好。就是现在也还能经常听到抱怨在产粮区向贫农供应食品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贫农从一些地区报告说,合作社里不卖粮食,因为所有的粮食都运走了,他们不得不去受富农的盘剥,从他们那里得到粮食。

但是,虽然有这一切不对的做法,但总的来说,还是及时注意到并采取了措施来加以消除,整个运动的阶级结论肯定是积极的。但是必须最严重地注意到,要最快地消除在运动过程中犯下的,特别是对中农的所有缺点和对党的路线的歪曲。在这方面,推行播种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像我已经说到的,它应该作为一种大规模地帮助贫农和中农农户的运动来推行。签订播种合同、提供种子贷款、供应纯种材料——所有这一切今年都是在更广泛得多的规模上进行的,而且比去年进行得更正确和更有组织了。

粮食收购运动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它是对党的、苏维埃的和合作社的机构的一次考验和严肃的检验。在运动过程中,我们做到了在一定程度上更新基层机构,发觉它的缺点和部分地加以消除。但是在这方面,特别是在农业合作社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们原来就应该在合作社面前提出的那些战斗性的经济任务,充分地揭示了它的所有基本缺陷、不足和缺点;这当然不少。其中最重要的,看来是工作人员中的积极分子还不够有力,锻炼和检验得还不够,办事的纪律还很薄弱。在农业合作社里加强工人干部,特别是党的干部的任务是巩固合作社的最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关于合作社的办事纪律问题已经是党关注的对象了,而且也在广泛进行讨论。这方面当然有许多东西需要重新看待,需要改变和搞得更准确。

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将要重新选举农业合作社的基层网,它曾由于粮食收购运动而中断了。在进行重新选举时,我们将需要充分考虑到粮食收购运动的教

训——要关心干部和纪律。

粮食收购运动以及最近的播种运动对我们在农业集体化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运动的极大高涨。集体的数量在飞快增长。当然这里有许多人为的东西。我们在新出现的集体农庄里有不少假集体,他们是想利用在土地安排、贷款和供应等方面给集体农庄提供的优惠。但是这个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集体农庄运动的高涨是直接来自于现在农村形成的阶级和经济状况的。联系到这一点,党面临一些重大的任务:把握运动,指导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保障对它的领导,让它能具有大型机械化经营的牢固基础。集体耕作在蓬勃发展,这是粮食收购和播种运动极其重要的结果之一。

联系到这个问题,我想对全会上建议的决议提一个意见。分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时,决议几乎没有讲到粮食经营的现状。但是我认为,除了决议里讲到的所有原因外,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所经历的困难的基本原因是我们的粮食经营在技术上实在太落后了,收成很低,商品率太低。在这个领域里,我们面临着一些极其重要的任务。首先是提高收成的任务,我们现在的收成要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低 $1/3$ 到 $2/3$,还有就是提高粮食经营的商品率的任务。我们现在的商品率还不到战前的 50% 。如果不提高收成,如果不提高各个粮食领域的商品率,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不时地不仅在粮食作物的出口方面,而且在向城市供应粮食方面遇到困难。已经进行的运动表明了我们面临的改造粮食经营的任务是多么尖锐了。这项任务应该是通过加速粮食领域的生产合作化来加以解决的。必须加强粮食产区的农业合作社。

这是应该从今年的粮食运动的教训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之一。但是提出的决议草案对这个问题写得太少了。决议草案里没有对农业合作社说出那些必须说的东西。应该填补上这个空白,强调必须想方设法地加强和发展粮食农业合作社。

粮食农业合作社在最近的一年里做出了很大成绩。在粮食收购的数量上,它今年占据了第一位。这里引用的数字还不足以准确地反映它的作用,因为它们反映的只是农业合作社集中化的周转,也就是通过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在俄联邦和通过乌克兰粮食和饲料产品加工贸易联合公司在乌克兰进行的周转,没有考虑到农业合作社为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和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通过和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签订的总合同收购的粮食。下面就是能说明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

易股份公司、农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在1928年4月1日时真正占有的比重(见表1)。

**表1 自当前运动开始至1928年4月1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
贸易股份公司和农业合作社的粮食收购情况**

	面包及其他农产品 贸易股份公司			除农 业社 外	没有独立地方收购 机构的农业社			消费合 作社 (总共)
	总共	其中通过农业社			总共	其中		
		按总合同	非集中收购			按中央计划	按总合同	
全苏 (百万普特)	162	22.4	10.4*	129.2	204.8	173.7	31.1	211.5
占有收购计 划的比重(%)	25.6	3.5	1.6	20.4	32.4	27.4	4.9	33.4
俄联邦 (百万普特)	133.1	22.4	10.4*	100.3	124.9	93.8	31.1	129.7
占有收购计 划的比重(%)	34	5.7	2.7	25.6	31.9	24.0	7.9	31.1

*根据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1928年1月1日的材料。

我还在引用一些数字来说明,和其他的收购单位比较,农业合作社在危机最严重的月份——10、11和12月是怎样工作的(见表2)。

表2 苏联粮食收购中的比重

	国家机关	消费合作社	农业合作社	结果
1927年10月	43.8	26.7	29.5	100
11月	43.3	25.7	31.0	100
12月	43.3	24.0	32.7	100

根据俄联邦的情况,农业合作社(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收购比重的增长速度还要更大,(按相同的各个月的情况)分别是25.1%、28.6%和30.1%。

农业合作社虽然是最年轻的组织,在财政和技术方面是最弱的,但今年在收购的规模上占据了粮食收购单位中的首位,这是因为它和农民人口有相对更牢

固的联系,种粮食的农业合作社不仅是在销售粮食上,而且已经在粮食的生产上一定程度地为居民提供服务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种粮的农业合作社的工作中有了某些向生产合作方面的转变。种粮农业合作社加强了和集体农庄的联系,越来越更多地把它们吸引到了自己的体系中来,促进了它们的粮食经营的提高和合理化。

农业合作社在签订播种合同方面进行的工作也是很有意思的。在现在正在进行的春播运动中,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完全通过集体和最简单的生产联合体——播种互助组签订了大约70万公顷的播种优质粮食的合同。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也在贫农户和困难户里签订了播种普通粮食和技术作物的合同。总的来说,和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签订了合同的面积在今年春播运动里将达到200万俄亩。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系统广泛利用播种合同向农户推广改良的农技术手段,组织对贫农和困难的中农农户提供生产上的帮助,推行他们的生产合作化。

但是这一切都只是最初的步骤,无论如何也还不符合党在这个领域里面临的重大任务的要求。在组织、财政和技术方面,粮食合作社体系还十分弱。需要通过加强它的干部、进一步专业化、发展合作社的粮仓建设等来加强它。

必须要加强粮食合作社体系里的合作纪律,发展合作所有制。在这方面,我想说几句话来回答柳比莫夫同志。他说到了合作所有制。但是在出现了要在两种农村合作社之间划分职能的时候,柳比莫夫同志完全忘记了合作所有制。是什么在极大程度上妨碍了在现在建立健康的合作社纪律,在农村建立真正的合作所有制呢?需要直截了当地说,妨碍这样做的是农村中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合作社的相互竞争。我们在农村是把同一些农户联合起来,我们对他们提出了相反的要求,让他们彼此竞争,相互瓦解对方的组织。柳比莫夫同志没有发现这种情况。需要在农业合作社里建立真正的社员制,需要建立真正的合作社纪律,它应该首先包括合作社社员应该通过自己的合作社上缴自己的商品剩余粮。需要通过正确地划分农村中的两种类型的合作社的工作,使得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健康起来。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应该在决议里提到。

我现在就结束。决议里应该指出,与粮食收购机构的合理化以及粮食市场的健康化任务一起,我们还面临着提高粮食经营、通过扩大播种面积增加粮食生产这样一些刻不容缓的任务。这些任务要求千方百计地加强粮食农业合作社系统,加快农民的粮食经济的生产合作化。

主席：请布留哈诺夫同志发言。下一位是巴达耶夫同志。

布留哈诺夫：政治局提出的决议完全正确和明确地指出了，我们最近几个月在粮食收购事业上取得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是借助于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全党通过的非常措施取得的。这一点强调了我们的成绩是带有临时性的，是暂时的，这一点已经有许多发言的同志指出了，我们的任务是把最近的运动中有的这些成就不是作为一时的而是作为牢固的成就固定下来，而把那些已经发现的缺点和工作上考虑不周的地方彻底消除和发展自己下一步的工作，在牢固的基础上实现自己下一步的计划。

决议草案在这里还正确地指出了，粮食收购事业中的成就同时也是推行整个经济计划的成就。但是在推行整个经济计划的各个部分中也应该把一时性的成就和牢固的战果区分开来，要把已经暴露的考虑不周和困难看成是暂时的和容易克服的，那些并非一时性的考虑不周要与过去的和现在留下的还需要克服的困难区分开来。

我想，如果中央委员会躺在已经取得的成绩上高枕无忧，感染上某些同志的发言中部分流露出来的过分乐观的情绪，把所有暴露出来的考虑不周和困难都看成是暂时的、容易克服的、不需要引起全党的注意，那将是全会极大的错误。

我要在这里指出，在我不得不直接和非常贴近地参与的那部分经济工作上，也就是财政工作上，这段时间党和苏维埃机构在粮食收购这件事上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看到日常的困难和成绩反映在以下3个方面：国家预算完成方面，贷款计划的完成和我们的货币流通状况方面，我们的货币计划和货币结算方面。在预算方面，我们肯定是在这半年里有丰功伟绩。我们没有6个月的完整数据，但是明显的是，前两个季度预算的收入和支出部分大体上都完成了我们的年预算计划的一半，大体上是30亿卢布。但是我想指出，在这30亿卢布的预算收入里包括了4.2亿通过借债得来的钱。在这4.2亿卢布里，大体上有0.6亿是属于通过捐献得来的资金。

[喊声：多少？]

布留哈诺夫：大体上0.6亿是属于通过捐献得来的资金。]捐献缴到了国家劳动储蓄所，国家劳动储蓄所用现金购买我们的有价证券，于是这些就以国家的公债收入记入了预算。然后有1亿卢布是借助于农民公债得到的。米高扬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说出了一种预测，说是下半年我们在这方面的前景是，农民不可避免地将会把这些公债的一部分抛出来，国库将从农民那里把它买下来。

现在很难断定用于这种抛售的开支是个什么样的数字。米高扬同志确定这

种开支至少是0.25亿。我想他是对的,抛售的数量可能会超出这个数字。

如果加上通过储蓄所由捐献转来成为收入的0.6亿在第三季度或者至少是在下半年能够折返回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从4.2亿中大体上有1亿是收入了,就像我自己所表达的,是一时的收入,不是牢固的预算收获。这说明了在下半年完成预算显然是有很大困难的,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对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得不有所准备。

在贷款和货币流通领域里,我们今年的状况比去年好。如果说去年第一季度我们发行了6300万面值为10个卢布的纸币,第二季度大体上也收回了这么多(6800万)的话,那么今年第一季度我们发行了4000万,而在第二季度里我们就从货币流通中抽出了1.5亿卢布。但是用什么办法达到了抽取1.5亿的呢?是通过从财政上加强了整个经济达到的吗?还是说这也是一时的成就呢?不得不承认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时性,是由于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往来账户有所增长的结果,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往来账户的增长靠的是上面已经指出的公债的临时收入,这是在下半年要还的。

这样一来,在贷款和货币流通领域里呈现出来的情景是不能令人安心的。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在工业方面对信贷系统提出的要求超出了去年的要求,可是你们知道,去年下半年的情况并不完全是很好的,因为在那半年里发行了3亿多卢布,对货币流通的状况和对我国货币的购买力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这样一来,在上半年货币流通和贷款领域里形成的行情决定了我们下半年的日子不好过。它给我们带来的相当大的困难,不得不让党和苏维埃机构都要能集中自己的意志和注意力来加以克服,进一步在经济建设上下工夫,在坚挺的货币和稳定的货币流通的基础上拓宽经济的发展领域。

在货币结算领域里,上半年的局势不可能是良好的。由于今年的粮食出口,上半年获取的外汇是4500万,而去年上半年是1.8亿。这已经说明上半年的货币平衡和进出口平衡上的情况不可能特别好。结果是(我想在中央委员会的全会上可以宣布这个情况)我们在上半年的货币平衡赤字大约可以确定为5000万卢布。

在这方面,下半年我们会遇到什么情况呢?根据已经确定的计划,规定了下半年要出口粮食(大部分是要靠今年预算年度最后几个月的新收成)2000万卢布。我想,看来这是现在大家都承认的,——在5月之前是谈不上能保障达到这个数额的。

如果有好的收成,5月份就很可能得到这样的数额了(可能甚至是更大一

些的数额),但是甚至是在这种条件下,至少我们还不能期待在下半年就把现在的外汇平衡表拉平,把它从逆差变为顺差。这样一来,今年我们的外汇平衡表的前景就不是像十五大说的和党已经几次说到的,会有外汇储备的积累了。外汇储备金的下降,是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支付工业原料进口和清算德国贷款时遇到的最大困难。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粮食收购在前半年的坎坷不平发展对财政这样一个国民经济领域造成的反映。我想,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而且我认为在关于粮食收购的决议里也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特别强调我们的成绩完全是一时性的,不仅是在粮食收购这件事上,而且在扩展我们整个经济方面,今后还要克服非常大的困难。

现在请允许我简短地再谈一个问题——加强农业的公债问题。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预算和贷款领域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成功推销了我们的公债相联系的。我们是不是能说,散发加强农民经济的公债取得的成就,从发展我们的国家信贷的角度来看就是很伟大的呢?在我们的金融经济里发展国家信贷,在我们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要建立在工人和农民的小额存款基础上,我们如果扪心自问的话,如果考虑到发展国家信贷未来应该具有的意义的話,我们在这方面是不能对我们的成绩夸口的。

波斯特舍夫:总共收到了多少公债?

布留哈诺夫:关于加强农民经济的公债,根据我现有的不完全资料,到4月1日收集了1.05亿。根据我们的计划,建议收集的是1.5亿,也就是说收集了三分之二。

喊声:好呀!

布留哈诺夫:但是有多少能再收回来,农民向我们提供的贷款能有多长时间和多牢靠,这是应该想想的。在这里我认为必须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财政人民委员部在财政机关这条线上,从一开始就给出了完全具体和完全肯定的指示,在散发公债这件事上不能用行政强迫的办法,但是这样的办法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农村发展我们的国家信贷事业中的一个缺点,而走向这种信贷的第一步本应该加强农民经济的公债。我们不应该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现在和散发公债运动的这些考虑不周的地方作斗争是极其严肃的义务之一,履行这项义务就应该改正过去考虑不周的地方和在农村创造发展我们未来公债业务的基础。

主席:请巴达耶夫同志发言。

巴达耶夫:联系到粮食收购战线上已经形成的困难,我认为提出改组粮食收购机关的问题是正确和及时的。还在危机之前,还在更早些时候,2—3个月以前,在粮食收购市场上就可以感觉到有很大的缺口和困难了,因为收购单位没有能明确地把他们的中央机关和各个地方联系好。这是在危机之前就该消除的。当然,现在把收购机构集中起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今年。虽然我们每年都需要有大量的粮食给列宁格勒地区,但是为了有计划地工作,我们没有一发现苏联有余粮的时候就在收购市场上行动*。我们决定放弃独立收购,因为我们认为,在收购市场上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它不仅应该年复一年地,而且应该一个季度接一个季度地研究如何在我国农业中存在的所有那些特点的情况下工作。我们有好几年都在争取做到不要让收购单位钻到消费市场上去,不要为了从商而从商。在这个领域里干成了许多事,但是这项工作至今没有进行到底。现在的情况是应该在这个领域里结束消费市场上的这种无组织状态。如果我们把工作区分开,让一个组织在收购市场上工作,另一个在消费市场上工作,那就对头了。现在为顺利地完成任务还是做得太少了。所以收购机构的集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直到最近都是这种情况:在地方上,甚至在看来没有必要制造特别的困难时,许多地区还是在制造困难。当商业人民委员部下达了任务把一定数量的粮食卸在某个地区时,就会发生和各个地方的不衔接和大量的争斗,而消费合作社只能是因此而受苦。现在应该结束这种没有秩序的状况了。好像是有些农作物产品,例如燕麦,加把劲就可以摆脱困境的,但是在地方上就是一个劲地为地方工业的利益卖力气,我们已经面临生产停产了,好几万工人险些就要从生产上下来了,而且与此同时国家也要从这项生产中少得好多亿的收入。现在这些情况应该消除了。如果在这方面缺少一定的专政的话,那就需要加强它。

我还想再说到合作社的粮食收购问题。我认为,柳比莫夫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最近我们有一种自发性的股份化,而且我认为,这样的股份化正在让合作社脱离主要的工作。就在不久前,把粮食之后排在首位的肉类搞了股份化,合作社马上就感到,在最近几年里,光是合作社自己是干不了肉类的那一大摊子工作的,它们不得不搞股份化。无论怎么着,这种情况一时还可以容忍。但是现在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粮食的问题——想要再搞股份化,其中也包括对消费合作社。我们要是让合作社不去管这些问题,那我们就会自己也不自觉地在缩小

* 原文如此。——编者注

它的作用。如果我们把粮食股份化了,把肉类股份化了,把蔬菜股份化了,然后是蛋和油脂,那么合作社还干什么呢?那时消费合作社还干什么呢?它在广大群众中还会有什么样的权威呢?它当然不会有该有的权威了。就是现在也可以抱怨合作社说,在一系列商品和产品上,我们的合作社一直就没有能占据它所应该占据的位置。可以严肃地考虑一下怎样把这项工作深入下去,但是,不是要力图用什么方法把这件事从合作社身边推开。我认为这是一时的情绪,最后我们不得不彻底地在另一方面再碰钉子。现在有这样多的消费居民群众,2300万人实现了合作化,而我们要转向另一条路线,转向股份化,转向国家路线,等等。我完全不是要维护合作社里存在的那些为数众多的缺陷,无论是消费合作社,还是农业合作社,但是这些缺陷在国家机关里也有呀,在任何一项工作里都有很多呀。在这里完全用不着我去说了,这些缺点我们的党是应该在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加以解决,纠正的。合作社也有许多缺点,但是这不是说就该这样对待这个问题,让合作社由于这样解决而有所损失。当然,我在这说这些不是出于某种要削减什么人的权利的考虑,不是。我说话的出发点是要深化合作社的工作。所以,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这样来提出问题,把消费合作社推到一边去,让它把收购来的粮食缴给国家机关,而自己眼瞧着这些粮食怎样通过它的系统分配下去。

我们是有意识地至今没有走进收购市场的,因为我们做到了通过粮食收购组织完成这项任务,但是需要承认的是,在这方面,每一次签订合同的时候都有困难。我们和收购组织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而且在我们沿着完成任务的这条路走下去的时候,落入了非常严重的境地。在签订南方粮食的合同时,我们不得不在年中就过渡到北方的粮食上来。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的粮食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在要建立最为集中的收购机构,这让我们有这样的怀疑,所有的组织都要聚集到这个唯一的机构来签订相应的年度合同,消费合作社将被置于一种非常严重的状况。就在最近的几个月里,我们看到了收购机构在品种的资金保障问题上几乎是向消费合作社提出了最后通牒,而当我们只有有一个机构的时候,一开始它肯定会让消费组织处于一种严酷的境地。而且除此而外在最初的这个联合机构里,现在就应该想到,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官僚主义的成分,需要及时纠正。在这方面合作社是能够提供帮助的。至于我们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我们曾让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有充分的可能在市场上和更小的组织一起从事有关粮食的工作,有意识地为它的这种工作提供保障,为它创造各种良好的条件,等等。我感觉现在也该把这些保障保存下来。

这里提出了一个相对不大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柳比莫夫同志说到了,那就是关于给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一个工作人员的处分。例如,我们在列宁格勒就有过一次价格下降10%的事。规定了期限,所有合作社到时都应该结束这个工作。但是有两个还是三个合作社没有来得及把这次降价做完。我们联社为此在报刊上给了他们处分,当然是和领导我们的党和苏维埃组织商量好的,而且很好地结束了这种局面。我认为,商业人民委员部也完全可以这样对待这个问题,这样可以摆脱这种局面。

当然,原先曾有过的那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克服了,但是它们当然并没有完全消除。我们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它们。再过一两个月我们就要决定明年供应各个地区粮食的全年任务了,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决议里列出更具体的材料来,不只是限于我们通知一个组织可以派自己的代表到收购区来。这还解决不了问题,需要更具体地提出问题,在收购市场上和在消费市场上,谁将怎样起到自己的作用。

主席:请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发言。

彼得罗夫斯基:我想,在阶级关系方面,党在粮食收购上采取的路线是谁也不会谴责的。它是正确的,而且完全得到了证实。不久前,我们在乌克兰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组织检查了这一点。不久前召开了贫农中央委员会全会,它完全同意党在粮食收购上的路线和其他运动,特别是捐献运动。曾召开了到地方上去的全权代表会议,他们在这项工作中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而且非常满意地进行了这场运动。我们这里召开了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它总的完全赞同党在粮食收购运动中采用的路线,甚至那些非党的农民也是这样。至于这项工作本身,大家都说可以希望做得更好些。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专门召开了由非党农民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上,他们要求我们更有组织地和间隔时间更长一些地举办这样极其重要的会议。但是我觉得,好像非党农民并没有把想说的话都说完。例如,他们说,“在城里工作的同志们觉得在农村搞到粮食是很容易的。这是不对的,我们搞到粮食是很艰难的”。有几个农民就是用这样的腔调说的,而且我感觉,他们表达的是由于各种运动造成的共同情绪,并没有把所想的都说出来。需要直截了当说的是,在运动开始时,好像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有了裂痕。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和进行紧张的工作,才能在阶级政策的基础上在农村把我们的力量正确地组织起来,把贫农,然后把中农都组织起来,一点点地把工作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引上正轨。可能也还不得不采取不少措施来纠正路线,为我们的党规定的农村集体化和合作化的计划

任务更进一步加强了阶级路线。但是为了推行这条路线,我觉得需要更多地把苏维埃和执委会拉到工作中来。而在开展最近这次运动时,苏维埃和执委会好像都有些脱离开了工作。应该做到让所有的运动虽然是由党发动的,但要有规模,要让它们能更广泛和积极地通过苏维埃和执委会把非党群众包括进来,那时我们就更有保障完成党在自己面前提出的那些任务了。收购粮食的这些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正像这里许多同志说的那样,我从乌克兰的实际情况出发也是要这样说的,唤起中农出售粮食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样做就更有必要了。例如,你们知道,在我们乌克兰并没有广泛采用第107条,让富农为囤积作为商品的粮食承担责任。

臧声:采用了。

彼得罗夫斯基:要知道,是在农户里可以找到2000普特以上粮食的时候采用的。

莫洛托夫:没有好好找。

彼得罗夫斯基:我想,莫洛托夫同志,我们好好找了,我们的收购情况表明了这一点。

莫洛托夫:收购情况是好的。

彼得罗夫斯基:当我们的同志们寻求是不是能更顺利地收购和采用第107条的时候,他们没有能找到预想的那么多的粮食储藏。我们问到了自己的贸易人民委员切尔诺夫同志,在富农那里找到储备的大体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他说,找到过有4000普特的,但是并不是那么多。梅利托波尔收购粮食的同志们问,发现了储藏粮食1000普特的是不是能采用第107条。我们允许了,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取消了。由此还可以看出的是,粮食储备更多的是分散在中农的农户里,而富农可能是用这些储备做饲料了,而且是用在了其他的运动上了。

我顺着这条线是要得出什么结论呢?是要说明我们的商业人民委员部机构和统计部门的组织状况还是很薄弱的,至今还不能更准确地说明,居民到底有怎样的粮食储备。现在布留哈诺夫同志说了,从米高扬同志的报告中也可以得出,我们的出口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的收成几乎已经达到了战前的水平。那就要问了:粮食到哪里去了呢?在战前我们可以出口7亿卢布,而且许多消费粮食的地区用不着我们管了。粮食到哪里去了呢?过去我们把7亿卢布的粮食运到国外去了,现在是有些人吃的粮食更多了。那好,播种地主土地的贫农把粮食吃掉了,喂牲口用掉了。但是难道所有剩下的粮食都吃掉了吗?城市里消费得更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在粮食这件事上,出现了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这些漏洞

的时候,什么地方问题没有搞清楚呢?同志们,我们这里在计算上有这样的漏洞,需要商业人民委员部和我们的所有机关都把它作为一项任务提出并且加以纠正。

柯秀尔:商业人民委员部都吃了。

米高扬:我是个坏人了。(笑声)

彼得罗夫斯基:说到底,对于党来说,进行粮食收购本身是很紧张的,为此不仅要把共产党员动员起来,而且要把党的书记们也动员起来。至少我们需要这样来安排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要在没有这种动员的情况下就能过得去,只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才让党来干这件事。我想,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来,是为了不让全党都扑到这件事上。粮食收购这件事应该由商业人民委员部机构来安排,当然总还只能是在党的协助下,但不是把整个中央和它的书记等都投到粮食收购上去。我觉得,同志们,你们的讽刺是徒劳的。

柯秀尔:坏事能变好事嘛。

彼得罗夫斯基:从这一点出发,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在什么地方马虎了,那现在我们就会整个倒向一方,把所有的一切都毁掉。明天我们会在什么地方又马虎起来,又要倒向另一方,又会把机构毁掉,为这耗费巨大的资金。

我说说在这件事上要采取的集中化。我想,如果真的粮食收购机关和合作社机关有错误的话,同志们已经相当深刻地从这些错误中学到了东西,不会再重犯了。不应该把这些机关毁掉,而是应该相反,通过学习过去的错误,现在把工作组织起来,用优秀的同志、设备等充实合作社和粮食收购组织,而不是把它们毁掉。在涉及粮食收购的集中化时,列别德同志谈到了乌克兰粮食和饲料产品加工贸易联合公司和联盟的面包及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斗争,说到彼得留拉风气⁵⁷对这场斗争的影响,这是毫无意义的。我就不说乌共(布)中央和政治局是由什么人组成的了,但是请允许我说,领导粮食收购的是切尔诺夫同志,是大家都知道的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人,领导粮食收购的消费合作社组织的是亨金同志,根本就不是乌克兰人。

臧声:这都是已经乌克兰化的人了。

彼得罗夫斯基:接下来,领导农业合作社的是奥金佐夫同志,大家都认识,是一位有乌克兰倾向的同志。我的担心是,正是由于有这种想法,有可能就会追求集中,把已经建设起来的事业破坏掉,给我们在乌克兰解决民族问题造成困难。可是同志们,你们看看,在粮食收购方面的这种集中化的实际做法,更需要的是在地方上有坚强的组织,要表现出最大的主动精神来,可别让它对我们成了一种

缺陷,和顿涅茨克国营煤炭工业联合公司一样,成了反革命。在那些地方,集中化带来的是极其消极的结果。而在粮食收购中可能会更糟。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在这里不应该推行强烈的集中化倾向。

关于价格政策。[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整个局势要求我们从新的收成开始略微提高一些粮食的价格。同志们,我的出发点是:第一,米高扬同志写了,而且许多人也很清楚这一点,农民现在不得不以贵出两三倍的价格购买自己在农业上需要的所有产品。第二,我们现在每普特大麦支付的是65—68—72戈比。这就是说,折合成战前的,是35戈比。农民是懂得这里的价格比的。如果我们给每普特粮食加上10戈比,我们那里的中农是会满意的。]从新的收成开始,应该重新审议了。直到今日的价格政策是正确的,一直到新的收成下来,都需要继续保持它的稳定,接下来这件事需要这样来调节,要让农民不是用粮食去喂牲口和猪等东西。我原先已经说到了,种粮食比较多的是中农,从这一切来看,需要重新审议价格。[稍微为中农提高一些粮食的价格,提高10个戈比,马上就能让中农居民对党有一种良好的态度。为什么?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做了许多事:7小时工作日、社会保险、工资、建设俱乐部、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事。对于农民来说,这种建设就做得少了。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把磨制的事情,把整个粮食收购的组织等做得更好的话,这10个戈比会让我们得到很大回报的。而我们拿这样的价格政策去和农业和工业商品相比的话,那是更要胜一筹的。*

主席:是不是让我们说定,今天还要听取总结发言呢?

喊声:今天听。

主席:那么在列帕同志发言之后就结束讨论,在这之后休息,然后是总结发言。

请列帕同志发言。

列帕:我的感觉是,在中央向全会提出的提纲和米高扬同志的发言里,对党的组织的作用和那些我们由于搞了粮食收购而在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的状态和工作上取得的积极进展还描述得不够。在2月13日的中央决议里,这方面的情况有了明确的描述⁵⁸。

政治局2月13日的决议做出了结论,我们做到了让农村工作活跃起来并蓬勃发展。这是在粮食收购过程中取得的极其伟大的成就之一。接着我们又检查

* 原文如此。——编者注

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状态,更接近了苏维埃和经济组织的工作,通过清除不合格的附着分子加强了党组织的队伍。这样,我们在这项工作里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现在提纲把这些忽略了,需要把相应的结论加进去。从改善党的领导的意义上说,基本的成就是我们现在学会了更好地把所有的措施,把相应的党组织、经济组织和苏维埃组织结合起来和集中起来,完成我们所面临的基本中心任务。粮食收购的经验现在被我们充分地用到了推行播种运动中。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关注过春播运动。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善于把所有组织——党的组织、苏维埃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措施都统一起来,联系在一起,更顺利地推行播种运动。

再转过来谈谈在贯彻党的指令中的缺点、歪曲和过火行为。什么地方犯了这样的过错呢?谁该对这负责呢?是不是光是地方组织的过错呢?我要说明的是,在地方上的确出现了许多过火和歪曲的情况。我们要在自己那儿的党的会议上和全会上最严厉地批评这些歪曲的情况。但是在这里应该更客观一些。提纲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有些地方党的和苏维埃的机关犯了这样的歪曲和有过的过火行为”等等。难道可以只提出“关于地方”的问题吗?不需要提出在中央机关工作中犯的某些过火行动吗?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是非常客观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是,对在粮食收购中犯的错误的,首先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应该负责。我不是想要在这个决议里一个字都不差地重复同样的内容,我不是建议要在这个问题上提到中央委员会。但是应该直接声明,地方上的实践中发生的某些过火行为和歪曲,中央的经济机构是有罪过的。我可以举几个例子。第一个问题——关于粮食征集制问题。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方针是粮食收购的计划应该下达到村苏维埃,我们对这一点是有争论的。我们认为计划应该下达到镇上,接下来这些计划应该在经济组织中展开,也就是在合作社和收购单位中展开。已经有一个方针说是计划应该下达到村苏维埃,这不由得就会推动苏维埃去进一步地搞挨家挨户的征集了,就是要建立统计,看谁缴了多少,等等。别尔戈罗德县执委会就颁布了相应的命令,其中一条说:“村苏维埃自己根据个别农户的能力和每个农户中存有余粮的多少向各个农户下达任务,监督及时地把要征集的粮食如数运出来,通过解释和国家社会性质的灌输对缴粮户施加影响。”

这个命令被取消了。1月14日,我们得到了丘赫里塔同志的一份电报,内容是:“戈尔东(别尔戈罗德县全权代表)推行的办法如果的确是作为个人的看法在基层推行的话,像戈尔东所说的,是米高扬认可的话,我们将在其他地区实验采用。在别尔戈罗德,征集这个词应该用计划、任务这样的词取代。丘赫

里塔。”

这个建议虽然是以实验的形式出现的,我们没有贯彻。

再来看另一个问题——关于商品交换问题。米高扬同志12月31日的电报说:“为大麦、燕麦和小麦可以发放紧缺的商品,不受上缴粮食的全额价值的限制。”

我们在中央面前提出了关于取消这个指示的问题。得到米高扬同志的回答(1月6日)是,“不能进行直接的商品交换”。最后,1月14日中央委员会给了明确的指令,无论是间接和还是直接的商品交换都不能进行。

第三个问题——关于兑现公债。李可夫同志给地方组织写了一封很好的信。⁵⁹的确,有些地方上的工作人员是不满意的,认为该挨骂的不只是他们,还应该有些中央的各个组织。

波斯特舍夫:没有什么关系,80%已经收上来了,只是在那个时候才收到信的。

列帕:这里有一个公文,上面指出了这些公债是怎样落实的。可能从外表上看这里面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它是为应该贯彻它的村苏维埃写的话,那就可能会而且应该会有所担心了,因为在采用这个公文的过程中,我们是会有过火行为和歪曲的。它说到了要在各个农户中摊派公债,接下来是“上面指出的按农户估算的数字是秘密材料,只供村苏维埃在和农民谈判时和领导合同当事人的工作时使用。和农民谈判可以按不同的方式进行。合适的做法是让村苏维埃把最富裕的农民叫到自己这里来,把与贫农和中农等的谈判委托给合同当事人”。考虑到粮食收购工作的经验以及发生过的对中农施压的情况,我们没有允许把这个公文转寄给村苏维埃。

李可夫:这是谁的电报?

列帕:这是布留哈诺夫签字的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公文。[而且当我们没有把这个公文发下去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新指示,说是公文应该贯彻下去。]

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但是我不想再让你们烦心了。

所以提纲里应该做些修正,说到不仅在某些地方组织的工作中有过火行为和歪曲。应该哪怕是用谨慎的措辞把这个结论也算在某些中央组织的头上。

既然得出了结论,说是有些地方有工作上的歪曲和扭曲,那就需要指出这些现象的原因。提纲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是的,米高扬同志指出了,某些农村的共产党员乱了脚步,没有搞明白党的路线,说到了要取消新经济政策,但是这不是

发生过火行为和歪曲的惟一原因。出现这些过火行为和歪曲的原因,第一是地方主义,它常常是被各种好的口号掩盖着的,但是导致的结果是某些地方组织甚至向党掩盖这些歪曲的情况;第二是领导不正确,就是在我们的中央组织里也有存在的过度行政化;第三是对基层工作的检查薄弱;第四是没有正确理解党的路线。在我们的镇委会的书记中,甚至在省里的工作人员中,可以找到这样的同志,他们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在推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而且是有“修正”的——是“文明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来,就有了对党的路线的不理解,于是就应该在这方面进行相应的教育工作了。

现在来谈谈商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以及整个对收购计划的领导。收购的计划,对它的正确确定,毫无疑问是顺利进行粮食收购的基本条件之一。我举一个发生在唐波夫的例子:开始时定的是3 000万普特的计划,第二次是3 300万普特,第三次是3 600万普特,后来又重新回到了3 000万普特。在这样的条件下,地方的党委会能对粮食收购运动进行真正有计划的领导吗?或者拿库尔斯克省来说吧。一开始给出的计划是收购燕麦600万普特,后来是400万普特。我们完成了年计划,恰好是从米高扬同志那里得到了感谢和增加计划的。就是这样写的:“我宣布对粮食收购运动所有参加者的成功工作表示感谢并把你们的年计划扩大300万普特。”(笑声)[扩大了的计划我们接受了,但是关于感谢,我想还是引用中央2月13日的信吧,我们是为革命服务,我们不需要任何感谢,更不要说是来自个别人的感谢了,虽然这也是地位非常高的人。]关于计划,我的看法是,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让规定的计划是在更多的地方党组织参与下制定出来。我不去说我们地方工作的缺点了,不去说我们在制定谷类饲料平衡表的时候没有领导好省统计处,没有领导好省农业管理局了。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制定平衡表的时候需要更多地考虑到地方党组织的意见。

我想涉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农村的政治状况问题。我想,2月13日的中央决议得出的那个结论,中农的基本群众是和我们,和工人阶级结成了联盟的——这个结论至今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向中央全会提出的提纲里,没有关于农村政治状况的结论。中央全会的决议应该做出相应的结论。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贫农的。贫农是跟着我们走的。但是现在,由于一些地区播种的材料没有得到保障,贫农的情绪有可能会变坏。在我们省里,没有一个合作社是同集中化的收购计划没有联系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一部分合作社的工作转向地方供应了。禁止我们这样做。当我们企图建立自己的、地方上的燕麦种子基金来满足贫农需要的时候,商业人民委员部坚决禁

止我们这样做。需要给中央发去好几封电报,最后才争取到了建立30万普特的共同基金。我应该声明,既然是从3月底才给了我们权利开始收购燕麦作种子,我们不可能及时和充分地向贫农供应这些种子。

主席:现在表决。谁赞成停止讨论?谁反对?很少。讨论结束。现在休息。休息后是总结发言。

(休息后)

主席:请米高扬同志发言。

米高扬:同志们,[先对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发言做几点修正。顺便应该说,]在说明这些或那些缺点或不正确的命令时,把一切都算是官僚主义的歪曲,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在我们这里的各个机构里,特别是在构筑得还很不好的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机构里,歪曲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它肩负着那么多的任务,我指的是最大的突击性任务,那些需要花费极大的努力去克服自发性的任务,恰恰是落在了商业人民委员部的肩上。要在极大的组织上的以及任何其他方面的压力下降低价格,对付市场的自发性,这样的任务落到了商业人民委员部的肩上。还要把比战前降低了一半的出口安排好,要是不用经济的、组织的和行政的措施去全力推动,出口就不可能扩大。进口在拼命扩大,在非常需要进口商品的情况下,也需要商业人民委员部把好尺度。粮食作物收购的处境非常困难,要在需求飞快增长的情况下保障对居民的供应,这也是商业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的需求增长之快,是我们来不及满足的。工人的政府不可能有另外的政策。另外的政策可以在资产阶级那里看到,而且因此那里发生的是销售危机等等。我们不可能是另外的政策,我们应该有迅速发展群众消费的路线。[如果在莫斯科肥皂没有了,来找我。这件事无论怎么说也与我无关,我不生产肥皂,我洗脸也很少用肥皂,没有时间去澡堂子。(笑声)我并不批肥皂的生产规划,但是对一切都要负责。或者说呢料,有人问,为什么没有呢料子。我们是在所有决定的范围内提供呢料的,但是消费是什么范围也圈不住的。]所以,我的感觉是需要区分开客观上不可避免的困难,由我们的局势产生的困难和[组织上的、经济的、可以改正的困难。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一点,那我们的思想就可能和站在尾巴上的婆娘的思想差不多了。应该学会区分客观的、不可避免的困难和由于我们不善经营、没有本事等而出现的困难。

柯秀尔:肥皂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米高扬:这困难是由于我们不善经营、没有本事造成的。

往往并不是这样,而是把这些都混淆了,这样也就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和改正真正的错误了,在说到这些错误和不正确的命令时,常常举出并不成功的例子来。我可以举出在我们的机构里和在任何一个机构里真正的官僚主义歪曲的例子来。而当人们举出根本不合适的例子或者没有根据的事实的时候,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什么也不可能纠正。埃赫同志举了一个关于种子的例子。关于这一点我应该说,收购种子不是商业人民委员部的事,它从来就没有收购过种子。但是政府说了:为了支持贫农和中农农户,请你们从收购来食用的粮食里分出种子来,选出适合于共和国和联盟的上千个地区的种子来。我们就干起了这件事,虽然它并不是我们的事。干了起来是因为需要有什么人来干这件事,于是选出了1500万普特的粮食,分别运到了指定的点上去。有消息说,这1500万普特的种子质量并不好,规格也不合适,在个别地区的条件下,到了它们那里的只有73车皮,而且还都是及时给替换下来了。这就是说我们还是选出了1500万普特的种子,在短期内调拨了,选出来了,做了清理并送到了该送的地方。我曾想过这方面可能会有大的错误,但是我认为,整个事情的发展是很好的。收购这么多的数量并且把种子从国家的一头调拨到另一头去,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呀。埃赫同志举了一个例子,说是我们从西伯利亚拿了小麦拨给了乌克兰,说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呀,是何等的官僚主义歪曲呀,等等。听到这个情况后,罗伊津曼这位很好的和很富有感情的同志非常气愤地说,你们真是太不像话了!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可能该说是不像话的:人们在干着他们不懂的事情。我知道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对自已机构的人说:你们对种子什么也不懂,也没有义务一定要懂,你们应该从农业人民委员部那里得到书面证明,说明这些粮食是不是适合,并且他们说该发到哪里去就发到哪里去。你们是执行者,但是不对粮食的质量和发往的地点负责,对这些负责的该是农业人民委员部,对完成任务负责的是你们。我决定要细致检查一下埃赫同志说到的事实,用文件来驳斥关于这些种子的神话,而且这些文件说的是以下的情况。第一,在乌克兰这些种子是被吃掉了,这是不对的。埃赫同志说这是写在《真理报》的通讯里的。但是《真理报》编辑部没有能及时跟踪每一篇报道和检查每一篇报道。在以此为基础在中央全会上得出商业人民委员部机构有官僚主义的歪曲的结论之前,应该先检查一下,问问某些人。事实说明的是以下情况。要求得到这些西伯利亚小麦的是乌克兰的农业人民委员部,我甚至可以用乌克兰语读出这份申请来,这是一份书面文件。

喊声:读吧,读吧。

米高扬:虽然我不会读乌克兰文,但是它是用俄文字母写的,可以读得出来。乌克兰贸易人民委员切尔诺夫写到,请我们从西伯利亚给春小麦不足的乌克兰拨一些“诺耶”小麦作种子,下面是。(用乌克兰文宣读文件)。(笑声)

一句话,说得很准确,需要欧姆斯克地区的种子,而且这个建议是农业人民委员部提出来的,是在所有种子专家都同意之后,由乌克兰经济委员会批准的。有了这样一个由这样权威的机构和专家说了话的申请,商业人民委员部只有丝毫不加怀疑地去完成它了。但是我们不是官僚主义者,我们在努力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工作,给乌克兰的同志们写了信,其中说到了下面的情况。

喊声:用的是哪种语言?

米高扬:已经是用俄语了。“但是考虑到乌克兰和西伯利亚不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责成你们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一起全权负责选择对乌克兰最合适的春小麦品种”。我们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且我想,谁都再也做不了什么了。如果在这之后看来从西伯利亚选择种子是一件蠢事,能认为该由商业人民委员部负责,能指控它吗?对大家都有幸的是,这里没有任何错误。为了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材料,我委托了人打电话询问乌克兰商业人民委员部和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部,是不是种子不合适,它们是不是已经被吃掉了或者要再次磨制,今天我得到的有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和贸易人民委员签字的通报说:“西伯利亚的‘诺耶’小麦运到乌克兰来是由乌克兰经济委员会决定的。惟一的情况是敖德萨,那里怀疑‘诺耶’小麦在敖德萨的条件下是不是能够成熟。种子专家会议确定,‘诺耶’作物完全能适应敖德萨地区的条件。另外没有再提出‘诺耶’是否适合乌克兰条件的情况了。所有‘诺耶’小麦都用于满足播种的需要了。商业人民委员加维曼。农业人民委员列兹尼科夫。”

但是,在有了这样明显事实的情况下,怎么能声明说商业人民委员部存在官僚主义歪曲呢?要知道,现在这种说法已经遍及全国了,说是你看是什么样的一些官僚和傻瓜坐在商业人民委员部里呀,他们是在怎样败坏事情的呀。我们完成的是这样极其困难的任务,例如在一个月里就收集了1.5万车皮的种子,清理了,发放出去了,而且对每一个车皮都进行了监督。不是看到这一点并给予支持,而是没有根据地指控,这是绝对不合适的。难道需要我们真正一本正经批评的东西还少吗?我们有许多缺点,是需要批评的,需要纠正我们。

接下来谈谈西伯利亚的计划。埃赫同志在这里说,我们在计划方面怪罪了他。第一,在12月埃赫同志来到莫斯科之后,我们就讨论了西伯利亚计划。我们和埃赫一起参加了商业人民委员部的部务会议,批准了这个计划,完全没有改

动这个计划,而且埃赫同意了这个计划。西伯利亚的计划连一个普特都没有改动,虽然看来按粮食资源说,如果我们在一年内再重新审议这个计划是正常的。我们的工业计划一年要改动3次,而在涉及更难考虑周全的粮食收购计划时,我们一次也没有改动。西伯利亚的年度计划没有改动过。至于月度计划,例如3月份的计划,我们的确给了他们很大的任务。为什么?西伯利亚在3月应该收购2000万普特,而且他们在2月对自己的计划完成得非常不够。[在最后的5天里只完成了350万普特。]我们决定,3月份给出的计划可以比2月份收购得多一些,因为在西伯利亚没有泥泞的情况,而且在3月份也不会有,播种在那里也不可能,而粮食资源是有的。我们想利用在泥泞情况出现和播种到来以前的这段时间,最大限度地得到粮食。3月比2月多两天,又没有泥泞,可以让西伯利亚动起来,让富有的西伯利亚动起来,他们本来可以收购到2000万普特,但是他们只收购了1300万普特,没有完成计划。他们要求减少计划被中央否定了,于是现在他们说:你们看,我们证明我们是对的。我不是说在西伯利亚的工作人员不好,那里的工作人员非常好,他们采取了一切措施来加强收购。当然,可以采取这样的路线,对谁也不施加压力,那时就会有人说:现在的贸易人民委员是一个好人,给的计划很轻松,对谁也不施加压力。但是同志们,我们不可能这样工作。

有一些同志对我说:你看,人家在怎样骂你呀。我应该说,在本着无产阶级经济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决定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是按照革命的良心去做,而不是为了让人家不骂你。[我可以给莫斯科人黄油,而在这之后停止出口。人们会对我说:你是一个好的贸易人民委员,于是他有黄油了,有蛋了,一切都很好,于是谁也不会骂我了。但是在解决经济带来的利益问题时,你就会看到,每次用黄油得来的100万资金都是用来进口钢铁的。我们的先辈没有给我们留下黄金资源,让我们用于进口物资,我们需要自己获得资金。如果我们不出口黄油,我们就要少进口供工业使用的钢铁,减少黄油的出口会在一定程度上中断钢铁工业的发展。那时你怎么去解决问题呢。怎么就不明白这一切呢!]

我认为,在西伯利亚人的抱怨中有许多公正的东西,我们的确对他们的触动很多,但是我们触动不是因为我们使劲没地方使,我们非常想触动他们,而是因为工人们在触动我们,他们需要得到供应,是出口在触动,是6月和7月的前景在触动,到那个时候需要向工人供应粮食。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触动得过分了,对西伯利亚也有些过分了,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无产阶级经济的利益。

不能说,如果是另外一些工作人员,情况就会好些;那里没有不好的工作人员,但是我们是对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把自己的力量都使出来。⁶⁰

我想,接着发言的人,什维尔尼科同志的说法也不对。他说,我们没有对供应贫农下达任何指示。这是不对的,我自己在北高加索看到的情况是,富农在非常灵巧地周旋。我们对富农施加了压力,他们回敬的办法是停止向贫农出售粮食。粮价跳到了4卢布—普特,于是贫农被困住了。我们下发了一个由我签署的命令,内容是:“为了向农村的贫农供应口粮,允许动用一部分从私人磨坊得到的谷物加工费⁶¹用于此目的。”当发现这太少的时候,我写了:“对我们下达的6/2255号文件补充上:允许在必要时,通过省、专区执行供应农村贫农委员会的决议,可以动用来自私人磨坊、地方国家磨坊和地方合作社磨坊的全部谷物加工。”后来又补充指示了,如果所有这些都还不足以供应贫农,可以专门通过基层组织为贫农收购。措施及时采取了。第一个指令是在2月下发的,另一个是在3月2日。所有的指示都下达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一个危险,那就是打着贫农的名义把收购来的粮食扯散,让无产阶级的各个中心地区没有粮食。

某些同志提出了一些原理是科济马·普鲁特科夫早就说过的,例如,包揽不了的就别去包揽。这是完全正确的。哈塔耶维奇同志说:“为什么商业人民委员部要搅到区里的物价里去呢?给鞑靼利亚一个共和国的价格就完事了。”我也是这样做的,只是给一系列省和州确定了价格,而结果怎样呢?你们看,有上百封的电报和记录,说是由于在一个村里,在一个省里,和另一个省的相邻村子的价格有巨大的差异,要求我干预并排除这种情况。哈塔耶维奇同志自己在鞑靼利亚的一次会议上也不得不确认:第一,“确认虽然不止一次地在中央面前提出了问题,有过允诺和指令,但是在临近鞑靼共和国的巴什基尔、乌拉尔和楚瓦什共和国的各个地区,物价的状况仍然非常不好,这些地区的价格要高出规定的指令性价格15—30戈比,这就使得鞑靼共和国邻近地区的市场完全处于了无组织状态,全部商品粮都被拉走了”。第二,“电报通知中央委员会和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如果在5天之内得不到准确指示和指令,就要对和楚瓦什共和国邻近地区采取行政性措施,限制粮食运到那里去”。接着,鞑靼利亚商业人民委员部发了一份电报,称:“根据冰冻期确定的情况,粮食完全由门捷林斯克流向了卡拉库里诺。门捷林斯克的收购停止了。粮食被吸引过去的原因是乌拉尔州收购单位的价格抬得很高。”商业人民委员部要求改变卡拉库里诺的价格。我不了解卡拉库里诺,没有去过那里,没有见到过也不可能认识所有的卡拉库里诺人,但是我这里有一大堆各种来自卡拉库里诺人的电报,一个卡拉库里诺人的电报

里说的是一种价,另一个却是另一种价,一个卡拉库里诺人是在鞑靼,另一个人是在乌拉尔。我召开了鞑靼、乌拉尔和巴什基尔的跨地区会议,说了:你们在当地一起决定一下,让价格能够合适。后来他们说:“干什么要搅到地区间的价格中去呢。”我自己也不愿意搅进去,[我召开了会议,是你们自己要求把这件事情安排好的,但是不能像是丘巴尔同志所说的那样。他在发言中说,沃罗涅口的价格和乌克兰的价格有差别,而我知道,北高加索的价格和乌克兰交界地区的价格不一样。派代表到地方上去解决吧。我能说的只是一点:这意味着要解释一件解释不清的事。当然这是解释不清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这里人们并不执行指令,我们这里的一个地方是这种价格,另一个地方却是另一种价格。就只有混乱了。可难道是在搅和吗?如果在地方上能够正确地采用指令,在这方面采用正确的经济措施。]所以规定了要召开这些跨地区的会议。于是在所有这一切都做了之后,又有人说商业人民委员部在干涉小的收购点上的价格问题,所以看来它很不了解科济马·普鲁特科夫的著作,想“解释那些解释不清的东西”。埃赫同志的意见就属于这种类型,他抱怨说松子的价格太高了。我应该声明的是,科济马·普鲁特科夫说不可能解释那些解释不清的东西是正确的,我也是很懂得的,而且我也在力图做到不去拥抱松子(笑声),没有为它们规定价格,我从来就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虽然曾下过指示,要安排好它们的出口。是谁在那里确定价格呢?是商业人民委员部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我问了俄联邦商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丘赫里塔同志,发生过我们进行干预的情况。有过这样一件事:我们的西伯利亚商业局要求把一普特的松子价格定为4卢布。丘赫里塔同志以俄联邦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名义指示他说,这太贵了,应该确定价格不高于3卢布50戈比。我想,在松子这件事上,埃赫同志比我更明白,而且埃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说的话更有分量。但是现在他要求我参与到松子这件事中来,这样他就是在推动我去抱住并不可能抱住的事情了,但是我不想这样做。(笑声)

哦,还有牙刷。(笑声)如果牙刷联合起来了,这和我有什么相干呢?(笑声)这件事谁也没有问到过我,我不知道这些牙刷是在什么地方联合起来的,是谁把它们联合起来的。对于牙刷这件事,我的参与程度是和埃赫同志一样的。

在这方面,把罪过推到老鼠、狗、狨鼠、田鼠身上是徒劳的。(笑声)当然,如果需要能够把所有的各种失败都推到它身上的不负责任的活物(笑声),那么在这方面最合适的活物就是老鼠了,它不能维护自己,也没有任何人能来维护它,这个可恶的老鼠是需要给压死的。(笑声)如果我们有这种需要,当然是可以把

罪过推到老鼠的身上的,但是干什么要这样呢?老鼠、田鼠以及所有次要的出口的情况如何呢?我们采取的路线是利用国民经济的所有下脚料,利用堆在那里连我们也不需要、但是可以利用起来卖到国外去和从那里得到黄金的东西,同时可以给农村里一贫如洗的人和没有任何工作的流浪汉们发工资。我们曾下过指示要注意这些小事情,这些骨头、破布、各种各样的下脚料,老鼠、黄鼠。要知道,所有这些“小零碎”和类似的东西可以得到数千万卢布的外汇。有人说它们是可以和粮食相媲美的。我想,老鼠未必能和粮食媲美。我是说,富农未必会去捉老鼠。给它们规定的价格是30戈比。有人说太贵了。我不知道30戈比是贵还是便宜,是好还是坏。如果给出40戈比的价格,那些没有为贫困所迫的人们中也未必有谁会去捉老鼠,把它打死,卖它的皮。富农就更不会去做了。谁会去做呢?会去做的是那些在世上一无所有,只有能抓这些老鼠,把它们打死用它们的皮的那些贫农和一贫如洗的人。我要说的是,不值得为了老鼠去争论了。(笑声)老鼠的价格我们没有规定。我很不懂得老鼠,也不打算去捉它们,商业人民委员部里没有老鼠专家。(笑声)我说过:国家进出口贸易局,还有收购人员,你就按照对你有利的价格收买老鼠吧。一只老鼠的付费是30戈比。这样对你合算,你就支付。我们这是怎么了?结果是这样。譬如说,我们为一只狗付1卢布50戈比(笑声),说是多了,——天晓得是少还是多。

阿尔秋希娜:要看是什么样的狗了。(笑声)

米高扬:“中等分量”的狗。(笑声)它在我们这里值1卢布50戈比,而我们在国外可以为加工了的狗皮得到4个美元,也就是8个卢布。

喊声:啊!

米高扬:该不该付1个半卢布,我不知道。我没有制定价格。但是收购人员说,可以得到非凡的利润。

喊声:你们一只老鼠能得多少钱?

米高扬:至少它们是有利可图的。在这些鼠类中,只有黄鼠是赔本的,但是沙皇,甚至沙皇,为了消灭黄鼠,甚至沙皇为一只黄鼠的尾巴还要付给5戈比呢。

喊声:不是尾巴,是爪子。

米高扬:是的,是爪子。我不知道这样有什么不好?我们把这里不需要的商品出口到国外去,我们减少了有害生物的数量,我们给农村里一贫如洗的人发了工资。我们做得不好吗?可以不做。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就不好。[我们想要消灭800万黄鼠。为这件事有人抗议,我认为这是徒劳的抗议。]国家进出口贸易局的想法是今年出口这种二类毛皮500万卢布[150万猫皮,平均一只

90戈比。这样可以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都得到很大的利润,比我们支付的要多出3—4倍。在莫斯科,为一只小猫,更确切地说不是小猫,而是一个普通的猫,出的价码是……(读)这是我们在3个月里应该收购的。我们可以停止做这件事,如果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话,但是我想,这是件好事。当然错误是可能有的。乌克兰人说是30—35戈比,但是最终还是能够谈妥的,但这是500万卢布。国家进出口贸易局在这件事上是有利可图的。关于出口,可以直截了当地说,黄油我们不能再增加了,蛋我们也不能再增加了,因为我们在国内要吃,而且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老鼠是谁也不要吃的,而国外在向我们买,我们用它们可以得到利润。至于黄鼠,也是同样情况,它们也能带来利润。无论是黄鼠还是老鼠,都不会和粮食去竞争的。富农是不会去干这种事情的,富农是不会去做猫的文章的。如果有争论,我准备退一步,准备干预这件事,“解释无法解释的事情”——老鼠、狗和猫的事情,解决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我在这里从来就没有规定过价格,但是我告诉了收购人员:多少对你有利可图你就支付多少]。

接下来我该对柳比莫夫同志的发言说几句了。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详细谈在我们的收购机构中,也包括在合作社机构中的那些缺点和那些毛病了。我想,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自己会在这里指出这些情况,揭示出自己的毛病和请求党来帮助医治它们。

柯秀尔:这可不是他们的习惯做法。

米高扬:完全正确,这不是他们的习惯做法。当然,合作社事业是非常困难的——要把数以千万计的农户联系在一起,组织起来,进行社会教育。需要有骨干人员,需要让农民能适应在国家的支配下前进。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要知道有多少错误和缺点需要改正呀!难道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在这个领域里有应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吗?有一次我曾经对柳比莫夫同志说过:“如果你不希望有人在一旁挖合作社的墙角,那你就在合作社的内部建立起一个阵线来对付各种胡作非为,对付散漫吧。我们是会支持这样做的。现在党就当着众人的面在抨击自己,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也大大可抨击自己的缺点。因为这是医治我们的毛病的办法。可你们可曾听到过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们在什么时候抨击过自己吗?没有,这是在自己家里,他们有的是合作社工作人员的那种陈旧的我行我素的心理状态。合作社就是该我自己说了算。合作社工作人员是这样在议论的:‘什么,要自己去揭疮疤,会有人不满意的,然后就要选举了’”。柳比莫夫同志说,他想做点什么,可是他所做的只是“向合作社鞠躬”,仅此而已。

但是为什么不这样提出问题呢:除了“向合作社鞠躬”之外,还有自我批评,

能让合作社清除掉缺点和一些与我们并非同路的人嘛。阶级斗争首先是在合作社内部进行的。共产党员在合作社里的作用是要学会让好的农民接近自己,培养他们,训练他们,而把那些坏的、凶恶的和异己的分子赶出去。问题就在这里。难道你们提出了这些任务了吗?没有,你们没有提出。难道在坦波夫不是已经确定了一个事实——合作社工作人员在领导着合作社,在拿着薪水,在收购粮食,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有600普特的余粮吗?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仅在唐波夫有。是不是应该打击这样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呢?既然你们不去打击,我们能不能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呢?如果你们打击了,我们就会说了:好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支持你们。但是既然你们有一个统一战线,企图把一切都掩盖起来,那么就不能不从旁对你们进行批评和纠正了。要知道,瑟尔佐夫同志读了这个条子是正确的。这一切不是偶然的。[这一切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要掩盖自己的错误,和国家机关勾心斗角和利用这种情况。]你在批评商业人民委员部有许多缺点,过于行政化了等等。在工作多得让人都能发疯的时候,当所有的人都要求得到一切的时候,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你为什么对合作社的缺点没有说一句话呢?按照柳比莫夫的说法,如果没有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妨碍,合作社的所有事都会是非常妥当的了。我准备帮助你们,但是你们不要掩盖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了。柳比莫夫同志完全绕过了这一点,用尖锐的方式对我宣布的对一批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了某些合作社工作人员做出的处分提出了抗议。请允许我详细地讲述一下这件事。这是一件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事,它表明,有时合作社机构中的我们阶级的异己分子,有时不过是一些马马虎虎的人,他们脱离了无产阶级国家和工人阶级,他们承担了巨大的国家任务,几乎是一项垄断性的任务,整个工业领域的命运都取决于它了,可是他们的态度就像是真正的敌人一样。当我在高加索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你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我来说说是怎么回事。酒精工业没有土豆,计划不可能完成了。劳动国防委员会委托我们不是要提供以前答应的600万普特玉米,而是1300万普特。我应该完成这个任务。我对自己的机构和其他机构,对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和其他机关,都施加了很大压力。但是事情进行得不好,装卸玉米的任务完成得不好。在12月里,我们给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下了好几个指示。我可以在这里直接把写给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信拿给你们看,这里引用了所有的数据。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求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采取措施加强收购和装卸玉米。但是事情没有进展。我可以给你们看我们就这件事写的信的发信日期。为了简化,我就不说编号了。12月1日,12月8日,12月9日,12月10日,12月29日,1

月16日。信都是关于那个倒霉的玉米的。计划没有完成,工厂停产,各个地方来了鬼哭狼嚎的电报。劳动国防委员会几乎是全体成员就玉米和酒精工厂问题开了两次会。要求是:拿玉米来。当下达的任务不能完成的时候,我怎么能拿得出来玉米呢?人家要求我,可是并没有装卸。我到了高加索,把人都召集来了:怎么回事?原来是1月1日有收购来的350万普特的玉米棒子,到1月1日时,没有完成的任务是250万普特,而且有一部分任务还是10月份下达的。我问工作人员:装卸为什么落后了?他们说,你要知道,都还是玉米棒子,我们来不及脱粒,脱粒机不够用,等等。

我说:把脱粒机都动员起来,要迅速行动,因为春天就要到了,对工厂的供应要在春天以前就进行完,否则就晚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来到了奥塞梯的一个我曾经去过的山村,到了一个基层的合作社里。在那里我遇到一个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是一个奥塞梯人,会计是哈萨克人。我说:把所有关于粮食的文件都拿出来。我看见是下达的任务。我这里引用了所有的编号,准确的编号,但是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在这里念它们了。有一个指令是在10月份要给某一个车站和某一个工厂装卸27车皮。11月的任务是30车皮,装卸了10车皮。12月31日下达的任务是10车皮,给某个工厂的。写的是:立即完成,而且这个“立即”是用红铅笔浓浓地画了两道强调的。1月20日我坐在统一消费合作社,看到的是一个车皮也没有装卸,可是说的是:立即,——但是就连一个车皮都没有。1月2日有另一个同样的任务。也是用红铅笔拼命重重地强调了的,可是……还是一个车皮也没有。有玉米,但是就是不装卸。我到了弗拉季高加索,把所有的当权派都召集来问道:情况怎么样?他们说——很好。我向所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执行委员会的和党委会的工作人员,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我收集了文件,派自己的工作人员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检查所有的文件,看看什么完成了,什么没有完成。一个小时后,这个工作人员来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玉米整月地堆在那里,没有情况报告,没有数据,也没有人去看管。我把地方工作人员叫来,问道,可以怎样脱粒呢?他们说,不需要脱粒机,现在只干一班,要是三班倒着干,所有的都能干完。但是工厂在停产,所有的工人都放走了,可是一片喊声,财政人民委员部在哭泣,说是预算将完蛋了,伏特加酒将没有了。

喊声:情况不妙呀!

米高扬:我做了些什么呢?我破口大骂起来。[我说,玉米不可能有任何民族,玉米是不认任何民族的。我说,应该装卸,你们应该做的是这个。你们是在

玉米上搞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工厂在停产。你们这些反革命,装卸吧。]我下了最严厉的命令并且指示说,在装卸玉米这件事上没有任何民族问题——需要有无产阶级的纪律。谁要是违反了——都不能原谅。我给你们5天来完成从运动开始以来就摆在你们这里的所有任务。地方组织请求给10天时间。我说:“根据你们的请求,我给10天。”你们想想情况怎样呢?这就是数据。我自己也没有更多地做些什么,自己没有去拉扯,推动,没有说什么,只是督促了他们一下,一个小时后就到另一个区去了。

柯秀尔:只是臭骂了一顿。

喊声:讲了道理。

米高扬:我到罗斯托夫去了一趟,督促了自己的机构。后来我就回到了莫斯科,开始整顿自己的人:为什么就相信了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检查?魏采尔同志告诉我,已经给罗斯托夫和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发了多少指示,就在我到高加索出差之前的几天里,他已经和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谈好了,让他们主管粮食事务的副手专门到边疆区去一趟,加快玉米的转运工作。他从那里回来就说,不可能完成所有任务。给我们减少70万普特的任务,否则就什么也得不到。我应该做什么呢?这是在1月份。合作社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通过这件事来教育其他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和惩罚自己的工作人。2月14日,也就是一个月之后,我看见谁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就命令把这件事转交给工农检察院追究责任,并且发布了一个关于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其中详细阐述了所有这些情况,引用了文件,有多少工厂停工和为什么停工,多少工人被辞退,而且宣布了对我们在弗拉季高加索的商业局长的处分,警告说,如果所有这一切不能完成,他就将立即被解雇。北高加索边疆区商业局长伊万诺夫得到了处分和警告,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粮食局副局长也得到了处分。实质上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为了教育成千的合作社干部,这样的措施也是必要的。干事情就是应该这样,不能让其他人也都一股脑地这样行动,需要通过别人的错误和缺点来教育人。在签署这个命令之前,我作为一个年轻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尤其是作为一个人民委员,是很不情愿担任这个职务的,我问道:这样的命令是不是符合宪法?有人对我说,贸易人民委员对合作社工作人员宣布处分的事过去是有过的,好像是加米涅夫或者什么其他人提出来的,那还是在我之前了。既然有过先例,而且如果不违反法律,那么先例就可以成为一种规矩了(而在英国甚至具有了法律效力),更何况合作社工作人员自己并没有对处分采取什么措施。所以,我问了李可夫同志,说是我想要放一把火,我们两个都没有权利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

他说,那你就放吧。(笑声)

臧声:对!

米高扬:于是我签字了。我想,这样可以刺激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自己加把劲。柳比莫夫同志有一次向我抱怨,他说:我想要卖劲,可是人家用退休来向我施加压力,来进行威胁。但是你们是怎么想的呢,如果落在我们肩上的是这样重大的责任,垄断性的职责,那就不能拿下了任务又不算数呀。我想,合作社的事情改正得越多,——干预它的事务并不是什么我们非常乐意做的事,不要以为我们没有什么更多的事情要做了,——它的事情改正得越多,我们对合作社的工作的干预就会越少。柳比莫夫也没有必要装成一个无辜的少女,说什么他们想要分配工业商品,但是商业人民委员部自己在分配,搞得很乱。谁会相信这种说法呢?我已经下了指令和指示,安排了 M. H. 赫洛普良京,对他说:把所有了解这件事的人都叫来,要盯住让这件事做得很协调,但是要快,要是真正在干。

罗伊津曼:我也从工农检察院那方面观察了。(笑声)

臧声:就是说收购得不好不是因为商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得不好,而是你所代表的工农检察院在帮忙。

臧声:那套鞋呢?

米高扬:关于套鞋我要说。第一,我们为农贸市场计划了非常窄的紧缺商品范围,布匹、皮革、金属方面的制品,没有更多的东西了。

罗伊津曼:还有玻璃制品。

米高扬:不久前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把玻璃制品包括进去了。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在1月份发放工业品的时候是怎样的情况呢?我们这里组织了下列会议,每天都要为散发商品开会(列举了一些组织)。1月份我这里就有了这么多这样的记录(拿出一大堆材料给大家看)。这个委员会每个星期都要开会,甚至更经常,下达计划——给什么地方运去多少东西。由组长把商品发送出去,而且发送得不坏。商品很快就到达了地点,比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出的加强农户公债的票据还要快。我应该直截了当地说,纺织辛迪加的工作就像准确的钟表机械一样。

臧声:说得对。

米高扬:它每天都在监督工厂里的发货情况。皮革辛迪加的工作也很好。他们的工作是好样的。可是你们想想,会是怎样的情况?在所有的记录里都只有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抗议,只有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提出的特别意见。这个意见是什么呢?那就是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提出的要求:你们

应该把所有布匹都通过我们发送。我们把80%的布匹给了他们,只有20%给了商业局和辛迪加。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惟一的特殊意见说是要我们把100%的布匹都通过他们发送。在所有其他问题上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我们问道:这样的话,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能为发送商品承担全部责任吗?要知道,正确的做法是应该承担的。关于套鞋。不是我们在分配套鞋,而是国营橡胶工业托拉斯根据地方上的要求在分配。例如,西伯利亚边疆区联社就有要求。边疆区联社的代表就蹲在莫斯科。我这里有关于这一点的相应文件。国营橡胶工业托拉斯从哪里能知道给什么点发送去多少套鞋呢?对边疆区联社的代表来说:这个点需要发送这样数量的套鞋。当然,他们可能会搞错,错可能会多极了,但是分配是根据合作社机关提出的要求进行的。最好是在那里,在当地,催促自己的西伯利亚边疆区联社,让它更熟悉自己该做的事情。我只仅仅有一次干预了套鞋的分配事务。我曾经到过没有套鞋的库尔斯克省和沃罗涅日省。我给国营橡胶工业托拉斯写了一封信,请求给这两个省发来5 000双套鞋。这些套鞋发到那里去了,整个这件事看来是合适的,因为合作社员们是要求套鞋的。

关于工业品。这里有人说到,第一季度时,商业人民委员部发出的关于发送工业品的指令不好。第一季度时,我们是照通常的办法工作的。这种通常的办法是什么呢?按地区确定每个季度的计划,4个月之后我们检查计划完成的结果怎样?按照商业人民委员部的计划,应该是60%的布匹发往农村,40%发往城市。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反对这样分配。实际上结果相反,也就是60%的商品发往了城市,只有40%发到了农村。柳比莫夫同志攻击工人供应委员会是徒劳的。它并没有做什么妨碍任何人,而是在帮助工作。真是找到了该攻击什么。一个说是老鼠有罪过,另一个认为工人供应委员会有罪过。我认为,在商品供应中是有许多错误,而且这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需要把大量的商品抛出去,但是我应该说,抱怨工作进行得不协调是不对的。特别是在西伯利亚,我这里有西伯利亚边疆区联社主席兹洛宾同志的电报,说到关于向什么点发送什么,我们是没有分歧的。当然,在这件事上,有很多错误,这些错误是需要改正的,我们也在改正,所有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之后,要想批评商品没有发送到该送的地方去等等是很容易的。有人说,一些边疆区联社给了很多商品。在第一季度我们就给了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大量商品——你可以随意分配到地方上去。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例如,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它干了些什么呢?给了库兹涅茨克边疆区联社很大一部分布匹,而生活在那里的都是些手工业工人,而产粮的边疆区联社

却几乎什么也没有给。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没有干预每个边疆区联社该给多少的问题。

应该批评商业人民委员部曾经有过的和现在有的缺点,而且我应该说,它们不是很快就能克服的。而柳比莫夫的批评是绕过了扭转局面所必需需要做的一切。柳比莫夫是把所有的一切都推到了别人的身上,竭力为合作社组织表白。[为的是让它能说:我们的领袖有多好呀,他们没有把我们出卖。]用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可能教育好合作社的,是不可能把它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的,我们教育它就要在好事上支持它,对某些错误提出批评。柳比莫夫同志的发言里没有这一点,而需要的是从这个讲台上说出这一点来。

接着,同志们,他是怎样说到路条的呢?是的,这是非常措施,但是事实是,而且库比亚克同志也说到这一点了,合作社的代表们到了老乡们出售粮食的集市上,把这些路条塞给他们——拿着路条吧,你能得到更多的支付。他们说,需要发给合作社社员,其他的人就让他们去缴给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算在他们的账上吧。人家不愿意。那就把所有收购的粮食都缴到粮仓去,那就不需要什么路条了。这是在洛巴切夫、卡明斯基和柳比莫夫之间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比任何的日内瓦会议⁶²还要坏,比任何的协约国联盟都要坏,比任何国际联盟都要坏。(笑声)每一个参与者都把自己组织的利益放在了全共和国的利益之上。每天都写来数十封信:柳比莫夫告洛巴切夫,洛巴切夫告卡明斯基,卡明斯基告柳比莫夫,等等。这几十封信都是在斗来斗去,更多的时间是花费在消除部门之间的裂痕上了,不是用来进行创造性的积极工作。

这里说到了取消坦波夫的命令⁶³等等。我应该说,柳比莫夫同志最好是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当然,应该说这次走访有助于搞清楚地方上发生的所有胡作非为的情况,而且99%的意见看来是正确的和可以采纳的。可能个别的措施,例如没有标准地发放工业品,是错误的,但是中央关于为加强粮食收购的商品问题的决定没有否认我发出的指令,而是相反重申了这些指令。而我一字不差地写了以下的话:我不是在建议采用商品交换。在我这里写着:首先把工业商品发给上缴粮食的人,即便不是合作社社员。就这一点,中央在1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以下决议:“中央建议党和苏维埃组织一定要执行不能允许粮食和工业品进行直接商品交换的做法,因为这样的做法将会带来整个城乡之间商品交换的瓦解,为收购其他农业商品造成困难和破坏货币的流通。

为了鼓励上缴粮食,在这个时刻,中央认为必须要在收购进行得不好的地区,无论是在消费合作社还是在农业合作社里,都要对出售粮食的农民比对不出

售粮食的农民在购买紧缺的工业商品时允许有一定的优惠,而且这种对出售粮食的农民优先发放工业商品的做法应该是不取决于他们是不是某一种类型的合作社的参股者。

对出售粮食的农民规定的优先权应该表现为得到工业商品的先后上和发放的工业品的质量上;发放的商品数量应该规定出这样的限制,要做到不可能利用发放的工业商品达到商业上的投机目的。

中央认为可以由合作社接受农民的工业商品预订单,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向他们收预付款,在粮食收购进程不能令人满意,农民手里的活钱相当多的地区,这些预付款可以用粮食来交纳。但是这种预售工业商品的规模不应该超过运送计划规定和保障的工业商品的额度。在接受工业商品预定的时候,应该优先考虑那些出售粮食的农民,无论他们是不是某种类型的合作社的参股人。”⁶⁴

我认为这个指令是完全正确的。我从坦波夫发出的指令也谈到了这一点。⁶⁵惟一的区别就在于我12月31日发出的指令曾允许没有限制地发放紧缺商品,这有可能成为投机的手段。这种情况后来由我改正了,而许多地方上的组织自己也改正了这种做法。

来自库尔斯克省的列帕同志[用教训人的口吻发言,]也谈到了这一点,而当我们和丘赫里塔来到库尔斯克省的时候,那里的情况非常糟。应该采取措施,对富农施加压力,稳住中农和支持贫农,以此来提高收购。那个时候还没有农民公债,关于捐献的法律也没有颁布,没有商品。学会的只是对富农施加压力,可是需要粮食,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临时措施,总的来说它们还是对事业很有帮助的。

原来反对这样做的那些人也相信了,这是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推行的。当然,在实践中曾有做过头的地方,有过火的地方,这是不合适的,例如只给缴粮食的人发放商品,用来换粮食,这是违背指令的,但是我们能拒绝利用工业商品做影响市场的杠杆吗?不,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杠杆,当然是应该采用能够保障对卢布,对信贷体系信任的办法,而且不能给投机等提供营养。很清楚,这是需要做的,而柳比莫夫同志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不是在说合作社在这种时刻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扭转粮食状况。没有提出一个能够有所帮助的建议来!而本该是这样做的,应该帮助我们,给我们发出信息来。[我没有来得及及时发出信息,而你们是应该能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脱节的原因的。]你们是收购的人,你们有联系,你们有可能,你们有民主,有社会公众,应该去帮助,去纠正。[既然是专政,就不可能。柳比莫夫认为,在专政条件下,合作社应该保持中立。您错了,

在专政条件下,合作社应该是帮助,而不是在这些问题上保持中立。我们有准确的机构。既然问题已经讨论过了,通过了,我想,可能自然应该有责任了。我是通过委托搞收购的。]

柳比莫夫同志还抗议我的一项命令,那就是在条约范围内让合作社的基层组织对自己的粮食收购任务承担物质责任。问题在于至今没有任何责任。所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合作社有收购10万普特的合同,但是没有收购到一普特,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责任,因为收购是按照委托原则进行的。所以,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常常是这样议论的:我愿意就收购,不愿意就不收购,我不接受委托,而且因为有布匹,有其他的東西,我就管这些事情。可能可以规定一普特的违约金是1/4戈比,让农民知道,合作社是要用什么来承担责任的,哪怕是一普特没有收购上来的粮食的违约金是1/8戈比也好。为什么就不能规定某种物质的尺度来迫使更好地进行收购呢?你们有硬性的合同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收购和提供粮食,可是基层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什么你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呢?有人说我的措施是不对的。我同意采取另外的措施,更正确的措施——可是这并没有呀!

接下来,同志们,是关于不干涉合作社事务的问题。当然,常常去干涉,更不要说是用行政手段了,是不愉快的事,也是不应该的。合作社是应该努力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得更好,经常不断地完成任务,等等。这将对我们的事业的保证,我们的人手不够用,力量也不够。但是采取行政手段并不是由于商业人民委员部的任性,而是根据了去年的政治局决定,当时价格下调进行得不好,那时我们不得不规定了每一个合作社必须执行的利润标准,也规定了加价的标准,等等。

政治局的决定就在这里:“为保障实际和及时完成上述任务,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1)由商业人民委员部在两个月内根据最低的附加开支和商业开支,为国家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所有环节,对已经降低的各个地区最主要的工业商品零售加价和价格做出规定,凡违反的(加价和价格)都应该采用贷款和税收政策的手段以及纪律和刑事惩治的手段来加以制止;

2)在不迟于两个月的期限内,由商业人民委员部规定把成本核算包括在内的商业利润的极限比例。”

这是什么样的措施呢?行政措施。如果有人建议我这样做,我就会做的。但是我又能另外做些什么呢?解除我对这件事的责任,我就不去干预了,会去休

假,最后神经也可以平静些。应该负责任——既然是在破坏价格,就应该采用行政手段。我们在商品不够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低水平的价格就是由于有政府关于加价的命令。

同志们,下面我想就彼得罗夫斯基同志的发言说几句。我想,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认为关于收购和收购机构要集中化的建议不正确是他搞错了。问题在于,出现麻烦不是因为市场上的收购单位少了,麻烦在于它们太多了。它们在彼此打架,当然也打到了我们。既然是这样,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就不是该扩展收购单位了,而是应该对它们做某些削减,如果说不是把它们集中成一个拳头,那起码也该是形成两三个拳头。彼得罗夫斯基同志,粮食这件事在我们国家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不能不作为一项中心任务。如果我们想把钢铁变成一个拳头,虽然谁也不会去吃它,它也不会被扯成好多块,那么粮食是能够被人扯成好多部分的,我们应该按照整个国家的规矩来分配它。这是完全正确的。粮食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应该是有某一个人支配它的。

我想,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说得不对是因为他把所有的缺点都算在了集中化的头上了。他甚至说,沙赫特案件也是由于集中化造成的。这就不完全正确了。如果从沙赫特案件只得出这样的惟一结论,认为是集中化的过错,那么就该把顿巴斯分成5个或者6个部分了,不是建议得出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那个决议了。但是在沙赫特案件中,我们遇到的是有反革命势力和我们的经济组织、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没有好好地工作。我们在那里遇到的事情是对我们的全部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我们如果抓住沙赫特案件,想在这个基础上分析出我们工作的所有薄弱点并对它们做出修正,那我们就做得非常对了。

我想,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在粮食价格上说到,现在应该提高粮食价格,这也是不正确的。

彼得罗夫斯基:我不是说现在,而是在有了新的收成的时候。

米高扬:你说了这是中农的要求。

党正确地宣称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党是严肃的、真正的政权,春季的价格将是和秋天一样的价格,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贫农是在秋季出售的,而将在春季出售的是富裕的农民,而提高春季的价格就意味着在老乡们的面前,在贫农的眼前,破坏党的信誉。这意味着在阶级关系上改善富农对贫农的地位和削弱我们的社会基础。我们应该把春季的价格维持在和秋季价格同样的水平上。

而且总的来说,在物价政策领域里,我们还是要坚持基本的中心路线,那就是不是把低价位抬高到高价位的水平上,而是通过把工业商品的高价位拉下来,

缩小剪刀差。这是我们党的总路线。当然,在实际推行的时候,也不排除有可能会有某些临时的调整。例如,如果说在乌拉尔的燕麦价格低到了不能再低程度的话,这里就需要有某种调整。我们将会对某些个别地区和对某些个别的作物进行调整,但是现在对这一点提出问题是绝对不正确的和有害的。

我想,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说我们这里的农民收入没有增长或者增长得很少,而在资产阶级那里收入的增长要更好些,这也是夸大了。我想,这是不正确的,而且这是有些夸大的。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不了解欧洲,所以他把它想得要比它实在的情况好些。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对农民的关系不比欧洲差。[而且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对农民的了解都比资产阶级更多。我们看到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说的是劳动的农民,而资产阶级想的是富有的农民。

接下来,我要说农民的收入是增长了,我说这个不是为了要把收入倒转回来[要反动],转向减少,而是要更正确地分配国民收入。可以把农民收入的增长,私人的收入转到社会利用的公共轨道上来,并且从富农的收入中抽取比以前更多的比例。在向富农施加压力上,我们已经采取了某些措施。我们的路线一直就是帮助下层的农民尽可能多地向富农施加压力,延长对农村最贫困的阶层和中农阶层的贷款期限[改善向这些阶层贷款的条件],关心在合作化的大道上提高农民经济的基本群众,而不是提高富裕的、追求资本主义农场类型经济的上层。

考虑不周的地方当然很多,粮食经济受到了影响,但是我想,无论如何没有必要去看欧洲。在这个问题上,乌克兰自己就大大胜过欧洲了。

彼得罗夫斯基:你的批评方向不对头。

米高扬:可能不该这样理解你的意思。我是顺耳听到的,没有看过速记稿,也没有查对过。

下面我想对列帕同志关于库尔斯克省的计划问题和一系列措施问题的意见说几句。列帕同志说了以下的内容:应该更多听听地方组织对计划的声音。这是正确的,但是我想说以下的话。政治局对今年的粮食收购下达的计划是6.75亿。我们就粮食收购计划问题召开了所有省和共和国的会议。请你们考虑一下能够收多少。结果搞清楚,如果把他们提出的数量加起来,只能得到6.1亿,无论怎样不能更多了。我听取了,可是需要扩展到6.75亿,需要不顾地方上的意愿做更大的扩展。于是就扩展更多了。

而在库尔斯克省是怎样的情况呢?丘赫里塔同志很了解这个省。他在那里转了两个月,到了村里,而且对这个地区的粮食收购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丘

赫里塔是一个诚实的、忠诚的[革命者]、很好的工作人员，常到村里去，帮助共产党员们提高粮食收购工作。可是结果呢？我们夏天给了库尔斯克省2200万普特的计划。库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个夸大的计划，不可能完成，说是他们没有这么多的粮食，决定接受1900万普特。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俄联邦商业人民委员部就是做不到让省执行委员会执行这个2200万普特的计划，[分摊到县里和各个组织去。他们分摊下去的是自己的1900万普特的计划。结果是省的委员会是省里的，而我们这些各个苏维埃机关的人在那里叫喊的是我们喜欢的2200万普特。]现在库尔斯克省已经收购了2200万普特，而且还超出了。[请你们自己说说，怎么能听你们的呢？当你们将按照党性，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摆脱自己省的利益，能够平静地生活和考虑到全国需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听听。是不是有过什么时候你们的计划能更多一些呢？一次也没有过。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会把自己的计划取消了，而且我们在你们那里能够得到的是超额完成，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我们听了库尔斯克省所说的，给出了2200万普特的任务，而不是2500万普特的任务。错误是在这里，而你们却要求1900万普特。]

关于丘赫里塔和他的命令的实际情况。事情是这样的。省委驻一个区的全权代表格尔顿同志(我不认识他，没有见过)开始对如何更好地收购粮食表现出了主动性。粮食收不上来。他下了命令，让在村村都召开会议，向农民们解释，让他们把粮食运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要按照农户摊派任务。这是不正确的，于是丘赫里塔同志取消了这个命令的这一部分，但是决定，可以允许共产党员召集农民集会，解释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局势并建议他们尽自己的可能自己把粮食运到一起。他也是这样做了——在一系列地方召集了农民的集会：需要粮食，计划是这样的，谁有多大可能就运来吧。没有任何迫害，没有任何逮捕。在我们路过罗斯托夫的时候，丘赫里塔同志向我报告了这个命令的情况，并且问道是不是要把它取消。我说：你试着在一个县里采用这个办法，不要搞任何迫害。我们来看看，这样是坏还是好。应该探索，找到怎样接近农民的办法。[怎么能不做到这一点呢？列帕现在用获胜英雄的口气说，这样做不合适。当然，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说，这个或者那个不合适，但是当这个事业都停顿在那里的时候，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应该明白，而且工作人员不能不表现出主动性来，否则这样是不会有好的工作的。错误是有过很多，没有错误是不可能的。列帕同志说，我没有分析过火和扭曲的情况。我不打算长篇大论地做分析，但是也说了些东西。]

列帕同志曾试图要分析过火的原因,但是我看,在他把过火行为和扭曲归结为地方主义的时候,他是不对的。[我不想引证了,你们已经累了,但是我已经说了,施加压力的局面、提出的计划、公债的任务、粮食的任务,等等,还指出了相信不可能……”引起来的是要让组织上转向采取行政措施。我说了这个——“施加压力”等等。我想,这是足够的原因了,但是他分析说,基本的原因是地方主义。这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一个工作人员由于地方主义的动机,不经过法庭就把一个富裕的人关到监狱里去,这未必是可能的,这不是地方主义。可是库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关于1900万普特的决定——这才是地方主义。而过火行为和扭曲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软弱和无知。这样的同志应该纠正,应该帮助他们。应该把地方主义和不会干、扭曲和过火行为区别开来。关于这一点,我在自己的报告里也说到。[我认为,列帕同志是把事情和省委里的地方主义搞混了,还是让同志们来推翻这个事实吧。]

接下来,同志们,在结束辩论的时候,我想谈谈今天在4月的第一个5天里的收购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是令人不安的。遗憾的是,许多同志和组织在想,收购已经结束了,无论是好是坏,它们都已经结束了,可以休息了。

有人喊:现在是在播种了。

米高扬:就是嘛,我们在播种,正在把自己的地都种上,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好事,也有坏事,更多的是好事。但是我要说,如果在这个季度我们不能达到比去年多1000万—2000万的标准,到6月、7月我们就没有东西给工人阶级吃了。我要跟你们说,如果你们在6月份来说:我们失算了,等等,——那就错了,应该现在就准确地知道,要没有危机地摆脱这种状态。如果我们不能至少收购到8500万普特,我们就摆脱不了危机。为了完成年度计划,需要完成1.2亿。乌克兰应该超额完成,因为它已经超额消费了。乌克兰的收购进行得怎么样,我没有说,因为我心里想着,乌克兰人将会像现在一样地顺利工作。但是我有些担心了,因为4月初几天的收购数字说明了相反的情况,需要加把劲了。你们看,乌克兰4月份的计划是1500万。乌克兰人说,我们勉强能拿下1200万,而现在,在4月份的5天里我们掌握的数字只有134.8万,也就是说,如果整个月我们将维持这样的水平的话,我们将只能得到800万—900万,而不是计划中的1500万普特,也不是乌克兰人认为可能完成的1200万普特。这不仅仅是在乌克兰。北高加索也是同样的情况,收购在减少。

* 虚点是没有修改过的速记记录上原有的。——编者注

彼得罗夫斯基：那播种的情况呢？

米高扬：是这样，我们知道将要有播种运动，但是应该明白，我们没有粮食是不行的。去年也有播种呀，但是收购并没有停止。我明白困难很大，但是应该知道，困难归困难，而任务是刻不容缓的，不能抛到一边，不能推延，它就在我们的面前。〔同志们，接着是北高加索，要知道，不是我在吃，这个粮食是我们大家为了不会面临危机所需要的。〕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不要再面临新的粮食收购危机了，而且是要采取更加非常的措施。我们是不能不采取这些措施的，我们是迫于需要。北高加索去年在4月份的5天里拿出了48万普特，而现在是16.5万——太少了，少得可怜。计划没有完成，要加把劲。

西伯利亚提供的粮食减少得少一些，但是那里也减少了，虽然西伯利亚平均降低的速度要小些。去年的一个五日工作周^①里是180万普特，现在是110万普特。这要比其他地区好些，但是这太少了。照我的看法，特别不好的是在鞑靼利亚。哈塔耶维奇到过那里，后来他走了，在他走后就更坏了。那里需要施加压力。现在那里得到的情况是：原来是16.9万普特，而一个五日工作周里整个鞑靼里亚是3.1万，也就是说没有收购到什么。巴什基尔共和国以及许多其他共和国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就会重新进入一个困难时期。这就是为什么要加把劲的原因。

巴斯特舍夫同志在这里问，我们采取非常措施，把全党都动员起来等等要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越是能更早地完成收购计划，我们越是能更早地提高粮食收购的速度，这些非常措施就能更快地自动取消了。相反，收购的情况越差，我们就要不得不采取那些妨碍我们的、可能是在砸我们饭碗的非常措施。但是既然没有其他的办法，最好还是砸饭碗了，得到粮食要比可惜饭碗而又没有粮食地坐着要好。当然，如果我们能不砸饭碗就变得对新的一年更有准备，那就更好了。

至于总的结果和结论，应该说，照我的看法，总的来说，在这里发言的中央全会成员是同意政治局在自己的决议里对工作中可能会对与农民、与中农群众的正确结合构成威胁的过火行为和扭曲的原因、性质做出的评价的，同意对斗争的措施做出的评价的，这些措施，这些经济性质的和组织性质的措施是为了准备未来的运动的，是为了正常地安排粮食和农业工作的。

^① 这里指的是五日工作周制度，即一周包括5个工作日和一个休息日。这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苏联试用的一种作息制度，并于1929年8月以政府决定的形式正式确定，但因引发了诸多问题，不久后便废止了。——译者注

米柳亭同志在这里说,我对农村分化的问题谈得很少。当然,是少了。这是很清楚的,因为上一次中央全会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这恰恰涉及了许多题目。我们有的是什么呢?我想,党的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评价是正确的,它在自己的决议里说到了以下情况:“我们现有的阶级变化情况的结果是,最接近苏维埃政权的农民阶层的影响加强了。我们做到了对富农阶层的某种限制,更明确地让中农群众离开了他们,通过这些运动,贫农变得比以前更有组织了。”⁶⁶对农村的政治结论做出评价的那种提法是完全正确的。最主要的是我们把贫农动员起来了,教会了我们的农村共产党员组织贫农,教会了怎样限制富农,但是暂时还不够好。这些富农还将会有影响,在下一次粮食运动中我们将会限制他们。在一些地方我们学会了让中农接近贫农,我们这里的中农被吓坏了,他们有怀疑,不信任,持等待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提出了要消除这些过火和过头行为的任务,提出了让中农不再动摇,让贫农能跟着我们走并带领着脱离了富农的中农的任务。我们应该巩固贫农在组织性方面的成果,巩固中农群众和贫农的联盟,我们应该巩固这个联盟。我们应该教会我们的共产党员这一点。我们应该在每一个组织里对这一点进行总结,通过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来学习。有一个同志说得对,粮食收购有许多对党有益的间接的结果。相应的组织应该是最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而不是在社会生活平静的时刻检查自己的力量。这个同志说,这种检查是如此重要,应该想出一个理由来进行检查。我想这中间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检查了自己,检查了农村的组织,它的力量、威力、周旋的能力。我应该说,除个别的小集团外,我们的党还是强大的和灵活的,它能够在一个月里就这样来重新组合自己的力量,解决最困难的任务。这是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最重要的特点:周旋的能力、灵活处事的本领,能够迅速地动员起自己的队伍并转向无产阶级斗争的新任务。我们应该保存住这场运动的所有经验、所有教训,以便真正是没有痛苦地、更少有过火行为和扭曲地、更少有跳跃地带领我们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迅速发展的道路,推动广大的农户投入我们的国家经济,让国家能够按照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发展。我想,党是能够解决这个任务的,它已经卷起袖子干起来了。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因为现在没有反对派用它的那种非组织的工作妨碍我们了。当然,自己的缺点是应该鞭笞的,这是为了改正它们和让全党和全体工人群众更勇敢地前进,去解决积极的社会主义任务,去改造我们的国家。这样来进行总结将能帮助我们考虑到这些教训和让全体工农群众走上提高国家生产力的道路,迅速地、坚决地和最有目的地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国家的生产力。

主席：有人建议在专门的委员会里研究发言的人和用书面形式提出的所有修改和补充。

喊声：对。

主席：有没有反对的？没有。委员会的草案大体上和各个地区的代表协商过了。委员会是很大的——有24个人。

喊声：没关系。

主席：我宣布一下：米高扬，布哈林，莫洛托夫，柳比莫夫，丘巴尔，什维尔尼克，卡明斯基，洛巴切夫，伊万诺夫（北高加索），埃赫，A. П. 斯米尔诺夫，瓦雷基思，乌格拉诺夫，科马罗夫，彼得罗夫斯基，魏采尔，埃斯蒙特，谢苗诺夫，雅科夫列夫（工农检察院），菲加特纳，列帕，维尔比茨基，卡尔马诺维奇，格里亚金斯基。够了吗？

喊声：还有马约罗夫！够了！反正不会到齐的。

主席：有没有人反对马约罗夫？没有，那就是说我们通过了补充上马约罗夫的委员会。

[喊声：还有阿尔秋希娜。]

喊声：按照粮食收购中的比重是不对的。我们占了40%，可是在委员会里只有10%左右。

主席：那就是说加上马约罗夫。]

主席：现在把决议草案交给委员会时有什么样的指令呢？

喊声：我建议以中央政治局的提纲作为基础。

主席：现在表决。谁赞成以这个决议作为基础？通过。

第四次会议

4月9日上午

主席(鲁祖塔克):请允许我继续联席全会的工作。现在由李可夫同志作报告。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就克服由于沙赫特案件发现的缺点而采取的实际措施的报告

李可夫:同志们,我作报告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容易了,因为几乎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和地方组织都已拿到了关于所谓沙赫特案件⁶⁷的主要材料。发给大家的不仅有提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的决议草案,而且还有在当地调查顿巴斯的小组的基本调查材料和报告。然而,我还应该扼要地提一下已发生事件的实质,主要是因为甚至在党的队伍里,有些同志不只是在破获阴谋之时,而且在此后形成了一种关于这一事件是人为“渲染”的看法。我本人观察了一些同志的这种“看法”或“警告”:

现在,在破获沙赫特案件之后,已经过去了相当多的时间,我们有了对侦查材料的准确性进行补充检查的可能。特别是我们通过克雷连柯同志检查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凡了解由缅任斯基同志和克雷连柯同志领导的这些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人(笑声),完全能想象这种检查的整个严肃性⁶⁸。除此之外,顿巴斯局势由托姆斯基、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等同志在当地进行了检查。

要从这次非常认真的调查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主要的结论就是:事件不仅不是被夸大的了,而且它比在破获它时可以预料到的还要大和严重。基本上可以确定,一批过去享有特权的专家,其中许多人从前是企业主,一批与从前的占有者有联系的人,不仅在沙赫特地区,而且在整个顿巴斯进行了破坏活动。这批人与反间谍组织,即与波兰的反间谍组织有联系。波兰大使帕捷克的顿巴

斯之行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⁶⁹。

在这一事件中还弄清了什么新的情况呢?譬如说,弄清了这样的事实,我们的许多计划在我们的机关讨论和确定之后,又受到了逃亡到巴黎的这些企业主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补充调查。这些从前的财产所有者对此作了某些修改,我们是根据这些在顿巴斯进行了大量工作的。这个事实是够典型的了,我来宣读一份侦查供词中的一段。这是某个苏谢夫斯基的供词,他是著名的专家和反革命组织的参与者之一。他供称:“在德沃尔然奇克(这是一个沙赫特破坏事件的境外分子,指令就是通过他得到的)的信中”有指示:最好准备一条“武装民船……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喊声:瞭望台。

李可夫:不是四条腿的,是三条腿的”。也不明白这是什么……“起重机由蒸汽发动的取代电力发动的。与此相适应的是组织蒸汽设施。矿井开工应该推迟;至少不在焦炭岩层工作。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示,我记不起来了。最后他提到要感谢舍维亚科夫(国营顿涅茨克石煤和无烟煤生产销售托拉斯⁷⁰的教授),说要给他写一封相关的信……国营顿涅茨克石煤和无烟煤生产销售托拉斯谢尔比诺夫斯克3号矿井的方案是由在巴黎的股份公司批准的”。

到目前为止,顿巴斯主要的技术人士之一,基本建设工程新的技术领导人马托夫承认参与了破坏工作,此人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改建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研究这一事件的同志们把各种供词汇总编成了一份大致的通报材料,可以把它称之为这个破坏组织的“纲领”。破坏组织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大约如下:

1. 花费巨大开支恢复一批已经无指望地被淹没的企业,为的是虽然有了这种耗资,但企业却不会那么快得到利用(雅科维科矿、戈尔诺—伊万诺沃矿)。
2. 为设计工作选择相应的项目。这些项目应该能引开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的注意力,最终却不能带来赢利,同时引开对优秀地段的注意力。
3. 拖延那些采用某种办法有望通过或装备起来的矿井的设计方案。
4. 制造一些部门与其他部门(采矿与选矿、电力)之间的不协调。
5. 主要是在订购国外设备时,组织与其生产任务根本不符的订货,或者过早订货。
6. 耗费巨额资金开辟最终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小矿井。用这种方法从主要的大型石煤工业中抽走资金。

奇斯佳科夫卡的总工程师卡尔马诺维奇证明:“我认为要开凿这种耗费巨大的基本矿井,预先不进行勘察工作是国营顿涅茨克石煤和无烟煤生产销售托

拉斯新建设局(领导人马托夫)的犯法行为。要是我的话,不进行勘察,绝不会去开凿基谢廖夫矿井”。

所有这些“活动家”同波兰情报机关的联系被完全证实,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试图通过破坏工作,在波兰军队改组完成之时,也就是大约在1929—1931年间,制造燃料业的危机。当然,不能从这中间得出结论,说是会不会进攻我们苏联要取决于这个组织的破坏活动是否成功。自然,确定战争是否会开始不是要看与我们敌对的军队改组的结果如何,或者我们后方的破坏组织能否成功,而是要看整个欧洲总的政治局势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力量对比。但是毫无疑问,波兰人有可能不仅通过改组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通过破坏我们的经济,准备同我们打仗。这就是补充调查和检查得到的事实,通过检查,我们现在得到的材料比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散发第一个文件时所拥有的多得多。

于是就出现了破坏工作与顿巴斯采煤的成就之间的矛盾问题,许多人向我指出了这个矛盾。

喊声:听不见,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关于什么矛盾?

李可夫:我是说,在顿巴斯有过多年的破坏工作是事实,顿巴斯的经济成就是事实,采煤量不断增长,因而我们这几年来在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出现危机,我们停止了从国外进口煤,也是事实,这些事实之间有没有矛盾?

骤然看来,这个矛盾是存在的。这个问题在调查过程中也向被告本人提出过。被告对这个矛盾的解释是:顿巴斯的危机是由基本建设工作的进程决定的。现在,老矿井在继续生产,但他们把那里的某些部门也引向了开采劣质煤。在新的基本建设和开凿新岩层的工作没有成功的情况下,按照他们的说法,顿巴斯的危机应该不可避免地在大约30年左右的时间里发生。我们现在在顿巴斯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破坏活动,耗费的资金要少得多。

根据已有的情报,破坏小组的人数大约占顿巴斯全部专家的10%左右。但它的作用要大得多,因为它在技术领域实质上占据了领导地位。我曾关注过一个问题:所有这些马托夫分子究竟是怎样在井然有序的技术监督下得以实施自己的设计方案的。在我的面前有一份苏谢夫斯基的供词,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可以确定破坏工作的“机制”。苏谢夫斯基说:“主要困难之一当然在于要在设计方案时让人看不出脱节。因此,要用某种可靠的东西做幌子来加以掩盖。技术委员会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工具⁷¹——它聚集了所有矿业行家。或是在高等院校,或是在最高国家机关,或是在其他的托拉斯,他们都是十分繁忙的

人;深入了解细节,静下心来周全地考虑各种条件和方案,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而且,大家都是自己人,要知道,归根结底谁花钱便是主人,所以,他们很听主人,也就是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的话”。

按照苏谢夫斯基的话,技术领导和这个技术委员会是这个破坏工作的掩体。也许他在这里也夸大了事实,但无论如何他说得对,技术委员会不是破获叛逆活动的工具。

沙赫特案件的特点表现在哪里?它的特点是:这一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是在他们起劲地帮助反对苏维埃的邓尼金撤退期间落到了我们的手中,成为俘虏的。他们中的大部分被迫按照专业在顿巴斯的劳动军⁷²里强制劳动。随着劳动军被解散,整个这批白卫军专家留在了那里,经过了一些年,他们从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服刑的前白卫军分子变成了该公司的主人。而且,在我们管理这一地区时,他们曾同企业主们开过专门会议,随着邓尼金的撤退,这些企业主正在向港口“靠近”,以便逃亡国外。这些会议其实为破坏组织奠定了基础。即将离开的企业主们说服了留下来的专家们如何为企业主的利益继续在顿巴斯活动。那里建立了联系并为那个后来工作了多年的组织打下了基础。后来,领导权转到了在巴黎的俄罗斯贸易金融和工业“活动家”协会的某个石煤分部,这个分部一直同留在顿巴斯的专家反革命分子保持着联系。这就是对这一事件总的鉴定。但如果我一点不说关于被捕的外国人的情况,那这种描述是不完全的,况且这个问题具有或者有可能会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在一些德国人被捕之后,整个国外报界掀起了疯狂反对我们的运动。德国政府趁此机会停止了经济委员会在柏林进行的会谈⁷³。这一事件也被其他国家用来反对我们苏联。德国人掀起的巨大喧嚣看来是由于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担心有可能被揭露。不能排除这一事件,既对我们施加压力,又向英国人和法国人表示,他们不是同我们有多大的联系,以致英国人或法国人不能用某种报酬来“收买”他们。

这是否会有引起重大冲突的危险,把我们同那个德国的相互关系真正搞得复杂起来呢?我认为不会。但是,我们追究了德国人的责任,这样做是否对呢?总的来说,一个政党应该使任何进程都服从于政治问题,而根本不是要遵循抽象的、公正惩罚罪人的原则。如果对我们有利的話,那么,连明摆着的小偷也当然可以给他留条生路。从工人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这里没有什么犯罪可言。而且对待逮捕德国人的问题,主要不是要从是否符合我们的刑事审理的实际利益或者“公正”原则的观点出发,而是要从我们的“大”政治的观点出发来考虑。我们觉得,既然被吸收参与我们工作的外国专家们同阴谋家们“串通一气”反对苏

维埃政权,那么,应该在某个方面给以打击,以免下次到处都出现这种现象。既然有了得到证明的事实说明,我们利用国外的技术和国外的资本来实行国家工业化的试图被人用来进行破坏,那么,要进行打击这一点是清楚的,所以从法律程序的观点出发,我们进行打击是有根据的。

在分析沙赫特案件时,我认为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这一事件本身没有什么特别惊人的东西。在被资产阶级国家包围,国内存在资本主义残余的条件下,在很多年内,我们的全部工作当然还将伴随着从前的占有者企图积极反对我们,在出现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他们会企图同国外敌人勾结。波兰间谍利用我们的资产阶级残余来同无产阶级专政作斗争,这里没有什么可令人惊讶的。如果不是这样,倒是令人奇怪了。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政策与实践的出发点是,波兰、德国以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是支持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外国资产阶级的出发点则是支持我们苏联的资产阶级残余。所有这一切是完全可以理解和自然的,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么说吧,在一系列国家还未发生无产阶级变革之前,这是“正常的”。令人奇怪的不是一部分从前的占有者反对我们的国家,也不是他们同在苏联组织武装干涉的人保持着联系,而是他们得以在乌克兰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和政治中心——顿巴斯,连续6年一直在做这种事。党应该认真讨论的不是反对我们的阴谋和隐蔽的斗争这个事实本身,而是如何分析那些使得阴谋家们在6年的时间里得以进行这种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的客观条件。这种情况使得这整个事件比发现企图阻挠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和帮助武装干涉的100或200个白卫军分子的事实本身的政治意义要大得多。当然,这个事实的曝光揭示了反对无产阶级共和国联盟的一些新的斗争形式,但是,我再说一遍,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分析在6年里为这批阴谋家的活动提供可能的客观环境上。

我们工作的主要缺点和弱点在哪里?大概说来,可把它们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所有党的、工会的和苏维埃的基层组织的工作极差,因此,它们在顿巴斯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被“化为乌有”;我们在顿巴斯有的只是一些经济组织,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工会的、党的和苏维埃的机关。第二,管理上过度的中央集权。可以把主要缺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与苏维埃,2)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与“三角关系”(即工会组织、党组织和经济组织),3)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与专家们。

现在来谈其中的第一个方面,我要指出的是,在整个顿巴斯,苏维埃政权机关实质上是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它的管理委员会、它在各地的分支机构,而且

属于它所管辖的范围的不仅是管理煤炭经济的问题,而且还有诸如给居民供水、盖澡堂、住宅的建设及其使用,满足工人的一系列生活要求这样一些问题。于是,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在那里成了包管一切的“管家”,而地方苏维埃的作用被降到了最低限度。我们得到的是经济部门对顿巴斯居民、对工人阶级的垄断权。比如,可以比较一下煤炭工人同莫斯科“镰刀和斧子”厂工人人们的状况。为莫斯科工人人们的需求提供服务的,是分布很广的苏维埃网络,不仅有莫斯科的,而且还有区的苏维埃分支机构,在这些机构里有一大批被提拔的和“未被提拔的”工人,他们讨论着工人阶级的所有的日常要求并参与解决市政、住宅、文化教育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这些最大的中心里做到了把苏维埃变成工人阶级首倡精神的大“熔炉”,工人们直接地接触到了城市生活、改善住宅、交通、卫生条件、商业机构和合作社的工作、同我们这里存在的许多形形色色的缺点与不足进行斗争等问题。比如在莫斯科,大量的工人直接参与了整个苏维埃系统的工作。

乌格拉诺夫:6万人。

李可夫:6万人,其中逐年有越来越多新的工人参加进来。这样,莫斯科委员会不仅是面对所有的工人们在玻璃罩下面工作,而且还在他们生动和直接的参与下工作。当然,莫斯科委员会和列宁格勒委员会的活动中还存在着许多缺点。

但如果拿这个系统与顿巴斯的情况作比较的话,那么,你们找不到任何相似之处。比如像莫斯科的任何区苏维埃这样的委员会在那里都没有,在那里,地方苏维埃的大部分职能被掌握在经济部门的手中。就是在经济部门内部,专家们也不仅是在生产技术问题方面受到重视。在这方面,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第33号令(1926年3月29日)批准、捷尔任斯基同志发布的《关于冶金和电力工业部门的工厂技术经理的权利与义务总条例》起到了并非微不足道的作用⁷⁴。该条例赋予技术人员的权利可以归纳如下。

根据这一条例,技术经理不仅是工厂或托拉斯的技术和生产活动的领导者,而且还是工厂与管理有关的所有问题的管理者的副手。他一个人管理技术,而在除技术外的所有其他方面,他按其地位来说是副经理。经理对技术不直接负责任,而技术领导人既负责技术,又作为副手要对其他一切工作负责任。该条例中的一条规定,“经工厂管理人的批准,根据现行的劳动法”,技术经理享有生产权以及“吸收、解除和调动担任领导的技术人员(生产主任,技术处处长、车间主任,首席检验员等)的权力”。

根据这一条例,“技术经理(技术领导人、总工程师)是工厂技术生产活动的

领导人和工厂管理人的副手”。“技术经理对产品质量、挑选技术人员和不间断的生产流程负有全部责任”。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是技术人员拥有巨大权力的经济机关取代了苏维埃。我想,大家都清楚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在顿巴斯所确立的关系中,专家在一系列情况下有点取代了苏维埃。我认为顿巴斯经济组织体制中的主要缺点就在于此,这种局面应得到改变。因此,在提请你们注意的决议草案里,责成乌共(布)中央制定一个改组苏维埃的方案,以便能增强苏维埃的作用、提高它的威力、帮助它把工人们吸引到苏维埃建设中来。

关于第33号令批准的管理条例,它应该被取消,应该强调各个工业机关必须贯彻关于经济管理制度的决议,这一决议是去年做出的,但是无论在党所提出的经济部门工作者的权力方面,还是在我们经济体制的基层环节的权力、职能和自治权方面,这个决议都没有得到贯彻。

根据这个决议,应该对工业管理实行重大的非集中化和扩大企业管理者的权力和作用。这已成为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拥有够多的经济工作者,他们有丰富的经济管理方面的经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那就是不仅要逐渐掌握事业的组织方面,而且还要逐渐掌握事业的技术生产方面。当然,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做到这一点,为此在各种《条例》中改变经济工作者的权力是不够的,这件事需要有专门的知识,要有耐心的工作和时间。但是,这个目标应该作为最为迫切的任务明明白白地摆在经济工作者的面前,党也应该在这方面全力帮助他们。

第二个问题——这是关于顿巴斯“三角关系”的问题,即关于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党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如果说,苏维埃在整个顿巴斯没有起到它们应该起的作用的话,那么,应该说“三角关系”的基层、群众组织发挥作用的情况未必能好些。我读了走遍顿巴斯的同志们的大量报告和单独的笔记,得出了这样一种总的印象:在那里,在地方上,党和工会组织的指令被传达了下去(我不能说,是否研究过它们),而托拉斯的指令、指示和命令得到了执行。这就是这些机构状况中的主要区别。党和工会组织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它们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需要和生活。忽略一大批党员工人和非党员工人的大量异议、抱怨和建议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到顿巴斯走了一趟,在这方面带来了非常有意思的材料,他记下了一些工人在会议上的发言。这里让你们听听其中一位工人尼古林同志的发言:“许多人说,我们大家都有罪过,可我说,我们应该首先指责党和工

会的工作人员。当群众好像是从地下发出咆哮,说这种制度是不合适的,这种制度会使矿井毁灭,这是奥洛维亚宁愿意看到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那个工人说:“我从1920年起研究利西昌斯克地区,并以自己的无产阶级本能感觉到存在反常现象。当我壮起胆子稍微同这种反常现象作了些斗争时,这个区的同志们、负责的工作人员们的指责就劈头盖脑地向我袭来”。

顺便说一下,这位工人遭到了迫害,最后被开除出党。一位叫邦达连科的工人同志是这么说的:“现在,比方说,召集技术会议。工人们指出了一些东西,说了出来,而到了明天,他们就挨了克,于是,在别的会议上工人就沉默不语了”。

这样的声明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所有这些例子说明了什么?它们证明,这些基层组织同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不仅没有联系,而且只要哪位工人想提出顿巴斯的问题,他就会常常被“打手心”,如果不是“劈头盖脑”的话。发生这种无法忍受的现象主要原因在哪里?在于那里的工会、党和经济组织的上层领导实质上在经济部门工作者的“专政”统治下,同他们沆瀣一气了,这种专政是他们在顿巴斯占有的比重决定了的。(要知道,许多党的机关是靠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预算过日子的。于是,在这里除了所有其他的因素外,还有物质上的依赖性的因素。)出现了上层领导的沆瀣一气和脱离广大工人群众。从我们掌握的文件中和去过顿巴斯的同志们与工人们的谈话中得出的印象都证实了这种现象。

我认为,党和工会机关脱离顿巴斯工人的日常利益和需求是所有这一切中最为重要和危险的。因此,关于顿巴斯缺点的问题不能用机关人员的某种调换来求得解决;当然要用新人来取代那些不中用的、官僚习气严重的工作人员,不过,这是不够的。要争取让工会和党组织像群众组织那样地工作和发展,使工人们在那里不怕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再出现整个上层领导各行其是,积极的工人和党员群众面对沆瀣一气的工会、党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层而走投无路的局面。顿巴斯不正常状况的加剧还由于工作中存在“任人唯亲”的因素。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党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层内,而且与专家们的关系也经常是建立在日常友谊、个人联系等基础上的。托姆斯基同志举了一个特别典型的、顿巴斯里称为“上海”的区为例:“上海”——这是一个用专门的特别网眼篱笆围起来的、上了锁的住宅区,这里住着专家们和一部分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因为工人们对中国革命非常感兴趣,对在中国租界的特别居住区有着某种概念,于是他们就称这个住宅区为上海⁷⁵。

群众组织工作的主要缺点在于“三角关系”极为薄弱(如果不是说完全没有

的话)。这些组织的上层领导脱离广大的工人、工会会员和党员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因素少得可怜。在收集到的材料中,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有这样的情况。有一次,工人们在全体会议上声称矿上材料的集中堆放有误。当工人们说到材料的集中堆放有误时,经理不是对工人们去解释这是怎么回事,而是简单地说:“我怎么说,就该怎么做。”

无论如何应该在顿巴斯加强自我批评和工人民主的成分。整个顿巴斯的组织体系应从分权制、加强基层部门、矿业管理局的作用的观点出发予以重新审理。我们关于托拉斯管理体系、关于技术人员的地位与作用的条例这些最新决定首先应在顿巴斯得到实施。过分的中央集权的疾病是顿巴斯的老毛病。顿巴斯一直是扭曲了的中央集权的源泉。党内最能干的管理人员在那里工作过,当时工作过的有皮达可夫、鲁希莫维奇,现在是洛莫夫在那里工作。我不知道那个老方案是否现在还受到维护,我记得这是由皮达可夫提出的,其实质不是要建立统一的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而是为顿涅茨克地区的整个经济建立一个共同的、集中的、统一的托拉斯—联合公司,即把煤炭、钢铁、化学以及在顿巴斯的其他所有的工业联合成一个托拉斯。

罗伊津曼:还有玻璃制造业。

李可夫:第33号关于专家的权利与职能的法令是实施所有这一切的前提。这种倾向是曾经有过的,在顿巴斯为此而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斗争。许多人对我谈到了这一点。

臧声:除了皮达可夫之外没有任何人。

李可夫:皮达可夫并非是在这种事情上绝对孤立的那种人。我不认为这是他个人的创作,看样子,他是得到了别人的支持的。

柯秀尔:道听途说。

李可夫:尽管他很顽强地提了出来,但这个方案当时没有被通过。正如经验所证实的那样,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中央集权至今十分严重。现在关于分权制的命令好像已经颁布,但是至今是中心对一切负责,而矿业局对什么都不负责任。根据新的、应该实施的条例,经济系统的基层环节的权力大大地扩大了。顿巴斯经济管理的分权制应该得到实施。第33号令应该予以改变。企业经理的权力应该得到恢复。我所说的新条例来源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27年6月29日颁布的托拉斯法⁷⁶。该法是由古比雪夫、布哈林、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其他同志组成的政治局专门委员会长期工作的结果。我们那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并抽出了最有声望的同志们去编纂条例。但是,这一

条例至今尚未得到实施。

专家问题是一个与顿巴斯事件有联系的特别问题,它如今重新具有了重大的社会政治意义。召集专家大会、做出决议、讨论专家问题有时被提到了重新审视党对待和使用专家的方法的原则性态度的高度。因此,我挑选了列宁同志著作中的一些语录来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在十月革命前研究这个问题时,预见到了它很快就会被提出来,1917年他这样写道:“无产阶级胜利后,就会这样做:让经济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等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之下来拟订‘计划’,检查计划,寻求通过集中化来节省劳动的办法,探索最简单的、最便宜的和最全面的监督方式和方法。为此,我们要发给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技师很高的薪金,但是……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老老实实、一心一意地为劳动者的利益去做这项工作,我们就不给他们饭吃。”⁷⁷

1919年他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想用棍棒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这一点我们已深有体会)”。可以迫使他们不积极地参加反革命,可以吓唬他们,使他们不敢伸手去拿白卫分子的宣言。(在这一方面,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很坚决的。)这是可以做到的,而我们也做得很够了。(我们大家都学会了这一点。)但是,要用这种办法来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可能的”⁷⁸。

在坚持全面使用资产阶级专家的同时,他在那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曾求助于资产阶级专家,他们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多次背叛过我们,而且今后还会背叛我们。”⁷⁹

一年之后(1920年),他这样说道:“如果我们可以用那些脑子里没有装满资产阶级观点的专家来建设共产主义,这倒是太容易了,不过这种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空想。”⁸⁰

根据列宁所说的,对党纲中关于对待专家的段落作了修改。

1922年,列宁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总结报告,那时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决议,其中很大篇幅是谈关于专家的问题。那里是这样说的:“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阶段以前,专家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我们要使这个特殊阶层的专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不仅在物质或权利方面如此,而且在同工农同志合作方面,在思想方面也如此,我们要使他们满意自己的工作,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是有利于社会而不

* 这里到段末在括号里的话在引用时均被省略。——编者注

是为资本家阶级的私利服务的,这一切我们还不能很快办到,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办到。

“只有在周到地照顾专家、奖励优秀的专家、维护专家的利益等方面有计划地安排了工作并且已经收到实效的部门,才能算是工作做得还不坏的部门”⁸¹。

与我刚才列举的最后一段语录所属的1922年相比,现在局势是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让你们回忆起这一局势,我扼要地罗列一下我们在那段时期在与专家、知识分子的关系中所经历过的事情。被称为“策略中心”⁸²的阴谋就发生在那个时期,这个中心联合了民族中心、俄国复兴会和社会活动家委员会。1921年还曾有过同样类型的“塔甘采夫的阴谋”⁸³,其中参与的有大量在我们这里占据极为重要地位的著名专家。参与这场阴谋的不仅有我们苏维埃大学的教授、学者、校长,而且有作家、雕塑家、最著名的专家——托拉斯和辛迪加的活动家。这个阴谋涉及了很大一批人。那个时期的局面比现在要坏,而且是在恶劣的条件下通过了我宣布的这些决定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出了我引用的那些话。从那时起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首先变化的是我们的力量和那个时期相比大大增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专家比以前更苏维埃化了,这部分人中间有了相当多的一批非常接近我们的人。在这个时候,原来被推到遥远将来的红色专家问题成为了今天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已经不是像在塔甘采夫的阴谋或者策略中心的时候那样无力和软弱。反革命分子在专家中间的作用大大减少,我们的力量和苏维埃成分在他们中间的意义明显增强了。但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对专家的政策是不是对头呢?我感觉,它基本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实际推行它的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这种错误中的一个就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这样的机关最近在一篇关于专家问题的社论里,在专家们的前面提出了一个任务:“无条件地(加重号是社论加上的)形成自己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态度(加重号是社论加上的)。”接着那里写到——好像专家中的群众运动表明,专家们已经在清除路标转换派⁸⁴思想的残余。这是否正确?据我看,不正确。至少无须夸大专家们通过的那些决议的意义。当然,在1922年或1918年他们不可能通过这样的决议。最近有可能出现这种大规模集会,这本身当然是由于专家们向我们迈近了一大步。然而,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第一个“谴责的”决议是由顿巴斯破坏工作的主要组织者马托夫起草和提出的。他在顿巴斯的专家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说,他们觉察到路标转换派思想的所有残余,原则上表示同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无须自欺欺人,因为非常多的专家阶层还不能完全真诚地这样去做。接着,是否需要坚持让他们现在在原则上承认社会主义建

设,并成为社会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呢?有人会相信这一点吗?的确,不会有人相信。因此,没有必要挑唆他们去这样做,欺骗他们自己和使我们上当。我举个例子:格鲁姆—格尔日迈洛是个冶金业领域的好专家,需要用他。可他说:我赞成在苏维埃政权下建立好的冶金工厂,但我不同情苏维埃政权。谁也不会逮捕他,他不搞任何政治工作,也不想搞。可他是个工作人员,为了这个格鲁姆·格尔日迈洛,我可以献出几百个一边参与破坏工作,一边做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决议的马托夫分子。

我们在对待专家方面还犯了什么错误呢?我们已经有一系列指令、决定和决议千方百计地表扬和突出好的专家。不管怎么样,近些年来,我们在“费解的”技术问题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例如,我们在纺织机械领域安排好了最复杂的机器、自动织布机、精纺机、粗纺机的生产。在烟草工业领域,斯米尔诺夫教授制定了烟草的人工发酵方法(人工烤干)。每年大约能收益1500万卢布。在化学制药领域制定了59种制剂的生产方法,其中30种准备投入使用。已有一大批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是否有哪怕一个工人会议知道这些专家、发明家的名、父称和姓吗?这种无人署名和无人负责的状况有何用处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幻想过:我们在会上将聆听的不是老一套的关于“时局”、关于“国内外局势”的报告,而是专家、工程师、农艺师们关于如何使国家电气化、如何提高金属生产、如何提高农业水平的报告。

一些专家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出版了专门研究这些或那些科学问题的书籍,可是谁都没有想想怎样“提高”和扩大有某种发明的专家的知名度。如果他“想出”了某个化学制剂,就请说出:“想出”这种东西是这么个人,他的尊姓大名是什么,对这个人表示支持。

我们这里的技术方面的事情都是完全不署名的,我们几乎没有做任何事强调技术领域的这些成果,用一些方法来支持那些真正同我们一起工作的专家。在提拔新专家方面也做得很少。不久前,一位非常好、非常负责的经济工作者对我说,他只是在沙赫特案件之后才得知在他的托拉斯或辛迪加里有多少红色专家。看来,令这位经济工作人员极为满意的是,他们相当多,而且工作表现不错。在沙赫特案件之前,优秀的经济工作者对此不感兴趣,现在只是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如果优秀的经济工作者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人做得大概还要差。我们原来甚至不知道在工业部门有多少新专家,他们工作得怎样,就更不要去谈什么在提高他们的声誉和支持他们方面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的了。要知道问题不只是用有用的人来取代无用的人,而且还要让我们的工业部门里有充足的技术

力量。例如,在瑞典生产涡轮机的领域里,专家占全体工人总数的近50%,即每两名工人就有一名工程师—技师。在先进的国家里,技术人员平均占工人总数的10%—15%,而我们总共只占2%。

喊声:还不到2%。

李可夫:而且这2%中,大部分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实现工业化是一件特别艰巨的事情。要知道即使有1000—2000个最正统的、“通晓”列宁和卡尔·马克思的列宁主义者,也不可能技术问题方面取代一个内行的专家。没有专家我们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在这方面我们十分落后了,我们对此问题的关注也十分薄弱。

同志们,我从政治局取得了就决议草案其中一个章节阐述两个观点的权利,这就是与红色专家以及高等院校有关的章节。中央全会收到关于通过把一些高等技术学校转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决定的提议。这里没有说如何转交以及有多少学校,但主要的指示就在于此。为什么会有政治局的这个指示呢?这是因为经济建设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造就指挥干部、工业部门组织干部的问题。当然,对培养这样的干部首先感兴趣的是负责工业部门的机构,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关心此事,也就能比较合理地高等院校挑选人才并为他们更好地学习提供保障。大家知道,干部问题在组织人才大军的问题上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支大军能达到目前它所占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能够自己的学校里造就一批自己的组织者和指挥人员。对于工业部门来说也是这样。组织干部的问题是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在本次全会上亲自提议不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在逼着我们非立即解决不可。当然,政治局有时未经事先广泛讨论和研究就不得不通过甚至非常关键的决定。这是迫于状况和局势而不得已时才这样做的。在高等院校的问题上我们是否面临了这样的状况呢?为什么不能把它转交给下一次全会,以便在此期间对它进行专门的研究、加工和讨论呢?民主以及管理党和国家的问题不仅要我们在这个大厅里讨论和解决,以后还要在各党支部里仔细研究。在可以先讨论、然后再决定的地方,我们有责任这样做。而这是一个可以很有成效地进行讨论和事先研究的问题之一。目前在学生中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共产主义成分。我们有没有管理和组织高等院校的丰富经验呢?在推行文化革命口号的时刻,这一问题是其有意思和重要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是这方面主要的工具之一。决定将3—4—5所学校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还谈不上什么对整个问题的解决。

一般来说,可以把2—3所学校随便归到哪个机构,比如归到社会保障人民

委员部。如果将有2所或者3所学校属它管辖的话,做到把它们伺候得比别人更好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但面临的是关于整个高等学校的组织问题,如果2—3所学校将得到比其余学校更优越的物质待遇的话,那么,这会破坏其他学校的工作。你们试试,如果在一所大学里规定的助学金比另一所大学多,那你们会看到这样会出什么事。在给教授们发放薪金方面,你们同样可以试试看,不知道这样做是否会有什么好结果。如果这样去安排事情和这样来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就会破坏对教授们以及对所有与此有关的组织的统一阵线。对于我来说,关于高等院校的问题完全不能归结为解决转交2—3所学校的问题:这是关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大问题。我没有最终的观点,我想在3个月内了解清楚高等院校没有教育人民委员部行不行,是否可以不带中学而只把高校转交给另一个部门,还是把中学和高校一起转交。要知道中学与高等院校之间脱节,特别在我们这里,是教育的主要问题之一。还有一系列其他额外的问题会出现,把3—4所高等院校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绝对不可能解决造就干部的方法和途径的基本问题。如果是把学校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而不是从原则上指出高等技术学校应该怎样去工作,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根据主张转交的人的观点,多数高等技术学校依然留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所以,最为合适的办法是在3个月后听取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报告,除了把高校留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还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问题外,还该讨论实质性问题,并就实质性问题做出指示。在造就新专家、迅速培养新干部、高等技术学校与生产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如果对问题的实质进行这样的研究,得到的成果无论如何不会少于解决3—5所高等技术学校从一个部门转到其他部门。

我在报告里没有涉及一系列包含在决议中的具体建议。我只谈一下其中的一个,即关于顿巴斯6小时工作日的问题。我应该说,对于我和许多人来说,如果不是对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大概托姆斯基同志除外,我们所了解到的有关顿巴斯工作日长短的那种局面是出乎意料的。我们在轻工业部门把8小时工作日转为7小时的同时,在顿巴斯却存在许多地下作业超过7小时的情况,无论如何这都不能认为是正常的。

臧声:这是对的。

李可夫:我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多频繁,但毫无疑问这是不能允许的。所以,我认为,实行缩短工作日的程序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实行地下6小时工作日,而后把轻工业部门的工作日减少到7小时。

我们对应该在这里提出什么性质的建议有许多犹豫不决,我们决定采用建

议中最激进的提法,即在6个月内在顿巴斯实行与地下作业有关的劳动法典。经济工作者和某些工会工作人员说,这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并可能造成重大亏损。困难和某些亏损将是可能的,但是,尽管有这些亏损和困难,地下作业6小时应该在半年之内得到实行。(同志们,这就是我想对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和你们拿到的那些材料内容做出的补充。)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我在报告中谈到的关于通过任何工作人员的调动不可能医治顿巴斯的主要毛病这一点的意义。这个毛病就是群众组织——党、工会和苏维埃的组织工作得非常不好。首先要实行的是党、工会和苏维埃工作中的民主和自我批评,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解决一切其他问题的前提。

主席:同志们,是转入讨论还是宣布休息?

喊声:休息。

主席:宣布休息。

(休息后)

主席(李可夫):同志们,报名发言的大约有60人。

喊声:还会有人报名。

主席:听到大家说还会有人报名,所以请大家严格遵守发言的时间。

丘巴尔:15分钟?

主席:没有全会的特别许可,我谁也不给增加。日丹诺夫同志发言。

日丹诺夫:我想,如果在李可夫同志的报告之后站在义愤的立场上并对自己的组织中没有沙赫特案件而表示满意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喊声:找找看吧。]

日丹诺夫:这会是最不正确和最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我们在这里不需要批评乌克兰的组织,而是需要更深入地了解那些在本组织内存在的缺点。

我认为,李可夫同志是完全正确的,他提出了关于深入分析我们各组织所进行的经济的、群众性的政治工作的整个状况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政治局的提纲中也提了出来)。我想就破坏活动问题谈几句。特别是近几个月来我们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发生了许多起纵火案和事故,我们认为并非全部都是偶然的。我们有多起火灾,特别是在索尔莫夫斯克工厂,最近频繁发生了多起事故,企业最为重要的、生命攸关的部件,如:变压器、滑轮、电动机等等,都报废了。毫无疑问,在这里有着并非偶然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组织试图深入地了解组织消防卫队、在所有方面保持警惕性等问题的原因。我们查明了这样一些触目惊心

的事实,在我们调查消防卫队的工厂里,在着火的安置机器的棚子前,有一个没有打扫干净的雪堆,就是它在火灾发生时使人们不能把机器运出棚子。在另一处,桶里的水结了冰;在第三处,值班人员睡着了,等等,等等。

柯秀尔:值班人员睡觉,这也是破坏行为?

日丹诺夫:这些事实无疑证明:企业中党和经济组织的警惕性和纪律性还是不够的。

现在来谈谈沙赫特案件。它在工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现在工人们有这样一种情绪,即需要在本企业里挖掘一下,可能会发现经济反革命。我们的党要利用工人们与沙赫特案件有关的各种不良现象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敏感,而且要把它体现出来,以便更深入地、更具体地对待经济问题和对待我们日常的生活实际。

我想请你们关注在巴拉赫纳发电站⁸⁵的大型电力工程的状况,那里没有确定是否存在蓄意制造经济损失的图谋。可是我要列举以下一些事实。最近两年以来,像过去的公爵、伯爵等这样的人物被招来担任各种技术职务的工作。他们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例如,过去的罗夏科夫斯基海军上将在采伐钻探石期间领导了工程的对外部,尽管那里不该设任何对外部,等等。

同志们,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有大型基本建设的大中心,应该要通过一个不把反革命分子从首都和其他地方流放到这些中心的专门决定。(笑声)我们有“六禁”⁸⁶,我想,不妨再多一些禁地,以便不把索洛韦茨基的苦行者^①派到搞大型建设的地区。(喧嚷)

乌加洛夫:请说出可以往哪些地方派。

日丹诺夫:除了6处以外的俄联邦所有地方。

有人喊:克雷连柯说,不要吸收他们到电站来。(笑声)

日丹诺夫:我们查明在巴拉赫纳电站存在经营不善,完全没有实行节约制度的状况和对待企业的化学防空计划的草率态度。其结果是,一方面,白卫分子集结明显;另一方面,公开地反对企业中的化学防空计划。这个企业的共产党员的状况恰恰就像中央委员会关于沙赫特案件最初的指示中说的那样。指示说,我们缺乏健康的、共产主义的对待专家的不信任感,我们的某些共产党员在企业中变成了可怜的应声虫。通过巴拉赫纳工程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清楚,这里的经济工作者不仅起了可怜的应声虫的作用,而且他完全有意识地让专家来摆弄他

① 索洛韦茨基群岛位于北海,在沙俄时期曾是犯人的流放地。——译者注

们,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这不是惟一的情况):经济部门的党员工作者,作为副手,由权力和各种其他条件所决定,处于听命于专家的地位,他陷入了这种境地:各种艰难的住宅问题以及其他棘手的事情都堆到了他身上,而作为企业领导人的专家自己却完全不对棘手的事情负责,特别是使工人们恼火的事情,他要共产党员去解决最使工人们恼火的问题,而自己站在一旁,而且,反而通过资本主义的方法——纵容、津贴和奖励来给自己树立个人威望。

我提个问题:我们的企业里有时有没有这种情况(而我们是有一种情况的),即作为企业领导人的专家试图通过纵容、收买的办法以及靠着破坏对党的信任、破坏对党员的信任和利用给部分工人预支工资和津贴搞小恩小惠的办法来为自己赢得威望,等等。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瞧,当我们在巴拉赫纳电站把作为党员的管理人员撤职时,那个变为专家们可怜的应声虫的共产党员同专家们之间已不仅是工作上的联系了,而且还有着家庭的联系。正如李可夫同志说的,在顿巴斯有这种情况。那么,这位共产党员在最后一分钟做了些什么?他以工程技术人员的名义签发了给被逐专家的感谢信。

丘巴尔:他被送到了我们这里。

柯秀尔:这是谁?

日丹诺夫:斯图平。

喊声:那更好的人找到了吗?*

日丹诺夫:在我们党内,在党组织内,还存在着一种观点,即把基本建设看做是一本难以读懂的书,看做是我们不能掌握的非常困难的事情。个别的党组织和个别的党员中存在着一种观点、一种心态,认为基本建设领域对党来说是极其难以涉足的领域。这种观点、这种心态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打消的。

喊声:所以那里会发生那么多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事情来。

日丹诺夫:我想在此提请中央全会关注,重视培养我们特别需要的三种专家的问题。那就是化学家、造船专家和建筑师。我认为,我们的党中央和中央委员会需要特别重视培养这些干部的工作。

我想就有关对专家的态度问题说几句。专家现在已经开始分化。在索尔莫夫,早在去年青年专家们就已经要求召开全体会议。我应该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的是,在工程技术部⁸⁷有一种压力,老专家事实上不允许组织青年专家进行必

* 原文如此。——编者注

要的批评,老专家有与工人阶级隔绝的意向。特别是必须表示反对为工程师们成立专门的俱乐部(在我们的一些工厂里有这样的工程师的专门俱乐部)。我认为,如果需要建立这样的俱乐部的话,那只能是工人俱乐部的分部,不需要有单独的专家俱乐部。

现在根本的是要在工人们施加压力时能及时地感觉到,不能像我们有时那样视而不见。我们有时只是看得见自己身边的缺点。问题是不仅要在工人们施加压力时,而且还要在工人们未施加压力时就看到缺点。领导人的作用在于不仅当人们指出缺点时看到它们的存在,而且还要在群众尚未开始公开议论它们的时候就看到缺点。这就是领导人的作用所在。

决议中说要实施生产会议的决定还太少,要极其重视工人会议的每一份记录。我认为,应该在决议里加上一条:对工人会议的任何记录给予应有的重视。

我现在就结束发言。斯大林同志在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反对派说:“治疗你们的耳朵”。我想,治疗耳朵这句话同样适合于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我们,适合于所有领导经济的党组织。

主席:苏霍姆林同志发言。

苏霍姆林:沙赫特的历史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10分钟内不可能谈完甚至它们中间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只能用特快的速度来讲,这样一来,也许不能非常清楚地表达我想说的那些问题了。

关于我们在沙赫特案件方面是否做得过火的问题,要是我说的话,并未过火,反革命存在,而时紧时松的打击是有害的,会带来相反的结果。我怕这场运动正是以运动的形式来结束,而后又会出现至今一直存在的那种漫不经心。我们叫喊了一个月,说我们在成长,在提高,等等,到了第二个月,报刊,特别是省报,大肆宣扬说我们要死了,我们的情况不好,我们垮了,等等。我们的做法往往是要干就一鼓作气地拼命干,不惜任何手段,有时失去了应有的布尔什维克的冷静。

我们应从沙赫特案件中得出政治性的结论并在某些地方重新调整我们的实际工作,特别是在那些放纵了沙赫特反革命、工作做得差的地方。我们应该改造群众组织的工作、经济部门的工作,而主要的是要改造培养工业指挥干部,特别是技术指挥干部的工作。

关于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这里指出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工业区苏维埃的工作问题,我认为关于集中制、关于其他机关取代苏维埃的工作方面说得很少。需要找到原因。我本人不想在这里辩解说,我们在乌克兰为了活跃

和巩固苏维埃做了一切,我们做得不多,但我们就这个问题做了工作。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和全乌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此问题做了工作。我们曾试图从组织的角度对待这个问题并活跃村苏维埃和工厂镇苏维埃的工作。但是,问题卡在了预算上。要知道我们工业区的苏维埃的预算少得可怜。他们的生产平衡表很庞大,可他们却无从得到资金。甚至如果拿像斯大林诺这样的大型工业区的预算来说,它比有同样数量居民的商业城市的预算要小。因此,如果谈及活跃苏维埃、工业区和镇苏维埃的工作的话,要考虑一下那个成为这些苏维埃工作基点的基础。我完全同意一种观点,即市政建设、澡堂等不是该由经济部门管的,应该让它们从这些组织中解脱出来。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就拿顿巴斯的住宅、它的劳动力流动等问题来说,你们也就能看到我们该克服什么样的困难了;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必须尽快把经济工作者从与生产没有直接联系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要对这些管理人员的时间安排进行调整。

我给你们举一个来自在我们苏联引起过轰动的建筑工程的例子,这个工程称之为“哈尔科夫地区电站”⁸⁸。那里的情况不妙,派来了新同志,瞧,我这儿有个统计:从1927年10月1日到1928年1月1日,新的管理委员会在各种组织里举行了13次报告:先是专区工会理事会,然后在专区工会理事会主席团,之后在建筑工人专区分部党团,后在区党委,而后在专区工农检察院,然后在另一地区党委,在市苏维埃等——做了13场报告。这些报告中的每一个都做出了决议:这位主席要为每个决议花1至3天的时间去开一些委员会会议,而且还要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去准备每一个决议。看看这些决议吧,它们实质上都是一模一样。而因为小伙子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对待问题,揭出一切事情的本来面目,于是,所有的人都想进行调查。仅一个月之内就进行了10次调查,而且有些调查持续了2—3周,接着又是同样的那些决议,而事情毫无进展。领导人没有时间去工作,他总是在作报告,在开会。因此,说到关于我们党的领导的问题,需要看看是在哪些条件之下进行工作。要创造可以进行领导工作的条件。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时间,真的,有时只得马上去解决最严重的问题或者在3—4点钟,当脑子完全不能思索的时候,在家里仔细地研究最重要的问题。

由于沙赫特案件,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想利用给我的最后几分钟时间来谈谈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专家的问题。如果有人问我:现在对于工业来说哪个问题最困难,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我会说,这是专家问题。刚才日丹诺夫同志在此谈到在巴拉赫纳和下诺夫哥罗德的建设工。如果要补充的话,那就是在巴拉赫纳出了丑的那个建设者现在被派到了乌克兰

去领导电力工程,而且给他提出了不仅要完成新的建设工程,而且还要完成起初搞得不好的一个在哈尔科夫地区电站的工程,而把表现不好的哈尔科夫地区电站的人派到了巴拉赫纳或者另一个类似的地方,这一切说明有关专家的问题现在对于工业部门来说尖锐到了何种地步。我们知道这些人不能胜任工作,却把他们派去做另一个仍然重要的工作。是否会有人对此指责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在技术人员方面太有局限性,没有替换人员,选择是有限的;那里——斯图平,我们这里——马特洛佐夫、科佩列尔⁸⁹。

喊声:斯维岑。

苏霍姆林:是的,斯维岑。一句话,我们所拥有的一批人从数量到质量来说都是有限的,我们不得不同这些人打交道。今天我们从这个建设工程撤了他的职,他出了丑,明天我们把他派到另一个建设工程,给他一项更大的工作。关于专家的问题我们提得迟了,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全党的重视。

有时,有人给我们指出,说我们没有好好地提拔年轻专家。我曾经演示过一些我们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材料,请允许我在此列举它们中的一些:1926—1927年间,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业技术学校全体1176名毕业生中,只有工人166人,农民76人,公务员876人*。那么,当876人全体坐在机关里的时候,你们试试提拔和提升他们吧。他们坐在那里,又从这些机关去上高校,要是我说的话,他们拿着十分体面的工资,当他们从高校毕业时,他们不去车间,也不会去,因为在车间里,我们付给实习人员65卢布。如果他在机关里呆过,拿的多,生活在文明的地方,又怎么会到那里去挣65卢布呢?毕业之后,从莫斯科跑到哈尔科夫,只挣65卢布,再多我们也无力给。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作为工程师能做些什么。所以,他们对为自己领取高校毕业证书并不感兴趣。去年我们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查清:只有14%的人领取了高校毕业证书。当然,现在已经不是我所说的那样的人员组成了,现在我们高等技术学校的人员组成是无产阶级的,但什么时候我们能得到他们?要等好几年之后。我认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提出的关于为我们的专家创造条件、在报刊上刊登姓名以便使广大的群众知道好的工程师、发明家等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而且我认为应该把这个思想延续下去,也发展和扩大到我们年轻的专家身上,好让他们到工厂去,到车间去,到设计局去,并在那里开展自己的工作,用实际经验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理论知识。我认为,在我们的高

* 原文如此。——编者注

等院校里以及他们毕业后在生产中,没有奖励勤奋和能干的学生的因素。例如,优秀的、最能干的大学生在忙着干什么,随你们怎么想都可以:忙着干各种社会工作,他们参加了5—10个有时与学习毫不相干的委员会。因此,我们的高等院校在学习上没有能引导其他人、渴求知识的先进学生,因为先进学生忙于各种委员会的社会工作,而并不是在学习。所以,他们同样赶不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被视做先进的大学生的不是学习好的人,而是那些身兼许多委员会职务的人。就拿外语这件小事来说吧。外语教学的情况不好,而这后来成为研究外国经验的极大障碍。必须修改我们高等技术学校的体制和重新考虑教学组织的问题。

至于是否应该把高等技术学校转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问题,要是我说的话,必须现在就解决高等技术学校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更紧密配合的问题,加强它对为工业培养技术领导人这种“活产品”的监督,我应该说,不仅应提出关于在高等技术学校培养的问题,还应仔细地查看关于中等学校的问题。如果中等学校就像目前这样育人的话,毕业生不了解文化知识,不了解数学,学了一大堆科目,却不知道什么是基本的东西,能够把人武装起来,让他掌握进一步的知识。

还应该提出关于实践和见习期的问题。要完全从把年轻的专家引入工业部门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而这还要靠钱。要提出关于年轻的实习专家的额外职务问题,为了不把毕业生派去扫院子并为优秀的、能干的和勤奋的人发酬金提供可能。

主席:柯秀尔同志发言。下一位是施瓦茨。

柯秀尔:我认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建议是正确的,是应该在“三角关系”里取消经济工作人员的专政,但不是臆造的专政,而是在它实实在在存在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还要消除一切常使人可能说存在这种专政的因素。如果拿关于同样是在顿巴斯缺乏苏维埃政权的问题来说,那里没有学校、输水管道状况恶劣、没有医院、没有澡堂,这些问题又是由何而来的呢?当预算不给这些项目拨款时,到哪儿去找钱呢?找到经济工作人员说:“给钱!”“不准许我给钱,不允许我这样干下去”。“给钱!”如果他不给,有人便会在托拉斯里,在更强大的组织的影响之下提出要求,于是有时就不得不违心地变成了经济工作人员在“三角关系”中的独断专行。我认为,如果能通过相应的预算得到用于这些需求的资金,如果经济工作人员能不为这些事操心,这会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

生产,对此经济工作人员是会感激不尽的。

但是,我想,既然下面有了三角关系的问题,就也应该提出关于三角关系的问题,对所有各方我们并不清楚,也无法进行统计。这个三角关系是从托拉斯以上的层面开始有的,直到了莫斯科这里,它肩负的使命是管理我们的整个经济。拿我们的计划来说,它们什么时候能得到确定呢?瞧,现在它们在年中得到确定的。我们的冶金工业部门至今修改了16次计划。如果在我们的多角关系里有那么多我们要带着计划去交涉的各方领导,那么,哪一个管理人员能向工人报告计划的变化呢?这种体制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的专家们应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工作。工人们是不会知道有哪些计划的。当我是个托拉斯工作人员时,我自己能背得出自己在这里起初阶段制定的计划,我能到每一个专家那里去检查计划的完成情况,但当这个计划在多角关系里被修改了20次之后,我自己感到茫然了,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到底有的是什么样的计划,哪一个计划有效。这个计划应该得到确定,并且对经济工作人员提出明确的任务,只有那时我们才能要求他去完成这些任务。要提出一个使工人能够在任何时刻检查完成情况的计划来。

我认为,这一点在纲领里反映得很不够。我们多次说到这一点,但在纲领里却很少有反映,在生活中尚未得到实施或者实施得非常不好。为什么,我问你们,在我国经济极大增长、在我们取得极大成就的情况下,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死水一潭,今年同去年一样,也可能更糟?应该提出多角关系问题,也只有那时我们才能使我们的管理相应地明确起来。

我想提及的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工作人员在托拉斯、工厂等地方的工作状况问题。如果每个工作计划按16次来改变的话,那么,经济工作人员就必须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我们莫斯科这里,而不是去管理生产了。除此以外,有无数委员会坐在那里,苏霍姆林同志在这里谈到了那些委员会,而且其他经济工作人员也要报告它们的情况。经济工作人员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它们身上。他确实只得跑来跑去忙得要命。在这种状况下,他有些东西还来得及监督,而对许多东西,正如有人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他只能履行公事似地加盖印章。对这一点应该认识清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根本的改观,以便使经济工作人员确实有时间去从事基本的工作——生产上的工作。工农检察院和我们的党组织都应该对此给予关注,让他们创造出这些条件来,然后要求负完全责任。而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经济工作人员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今天他拿到无数计划方案中的一个,从国外订购了一些设备,一些东西开始在这里采购。一两周后,他得知这个方案失效了,产生了新方案。当然在纸上是可以改变计划的,但

是,一部分设备已经采购了,一些必要的东西已经得到了,事实上要改变这个计划是不可能的。此后,来了无数个委员会,指责经济工作人员不善经营,等等,等等。这里说到,我们不干事情,而是经常派各种委员会下来。这是真的,虽然还未到纲领里说的那种程度。有时,委员会往往干得不好。我想起我在前线当政委的那个时候。我当时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工作的?首先,我总是有一个明确的我应该做什么的指示:不会像现在这样16次或20次地改变这些指示。我有了相应的信任并有时间去做这项工作。我检查过专家们的每一个指示,用手指着图纸,自己把一切都搞清楚,我学会了才能对专家们的工作进行检查。而现在经济工作人员没有这些条件。所以,为了改善状况,为了避免发生像沙赫特这样的事件,需要首先抓整个管理体制,不仅是抓三角关系,而且还要抓这个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角的多角关系——要知道我们经常像小孩子一样地被罚站在任何一个角落里。就拿我们的基本建设工程来说吧。这方面的情况很不好。我们目前的状况是这样的:在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通过的250项工程中,我们差不多有60项完全没有方案,大约有120项方案只是在我们这里通过了,而且只有这些方案中的小部分得到了确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状况就是这么糟糕。人们是怎样试图提出这个问题的呢?包括工农检察院在内的所有周围单位的人每天都向经济工作人员唠叨,说你们没有方案,说你们进行巨大的工程是犯法的,没有按规定,等等。那好吧,也许是在工农检察院的影响下,也许是我们自己懂得了不能这样做,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理解这一点,但是,也不能每天唠叨同一件事情。现在不需要去注意发现那些我们这里情况不好的已经公开的事实了,应该关注的是帮助各个工作人员处理好事情。因为在全国都在没有方案的情况下进行建设的时候,就应该更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不能随便拉出这人或那人并当众训斥。如果还是这样对待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训斥也无济于事。要搞清楚为什么在许多情况下会发生这种事,并真正有效地帮助肩负着巨大和沉重工作的经济工作人员。我本人记得,我是怎样开始在南方钢铁公司工作的,两个月后我看到在进行着没有方案的建设,建设工作进行得不好,但为了成立设计局,需要花一年的时间。没有住房,又不能买房,而邀请专家到任何城市,不给他住房也不行。为了克服我们的管理体制中的这个问题,不得不面对极其困难的状况。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工农检察院也没有任何人来帮忙,而后会发问为什么没有完成。应该早点来问:同志,你在什么地方延误了,需要帮助做些什么。而这都没有能做到,却开始当众训斥了。同志们,靠这种训斥我们是拯救不了任何东西的。

谈几句关于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问题。我认为直接在那里工作的那些同志将在这里发言。但我想,我们是在这里如此辱骂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而它是不该得到这样对待的。我们忘记了在1920年或稍晚些时候,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烧的燃料比它开采的还要多,而现在它不断地给全国供应燃料。那里长出了我们机体上的一个恶性脓包。让我们打开这个脓包,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骂得一无是处。不能在那儿摧毁和破坏掉一切东西,而现在人们谈论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就像谈论麻风病人一样。树立这种态度是完全不正确的。我认为,同志们,如果我们想消除我们这里存在的东西,就应做出相应明确的决定。首先要做出的决定应该是每年进行一次对生产的检查,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每天进行检查。第二个决定应该是不迟于9月15日做出工业计划,而那时我们将可以要求工农检察院鼓动大家积极地去完成这项工作,就像它在压缩行政开支方面所做的那样。我们必须在9月15日把计划准备就绪并把它交给经济工作人员们,到那时你们再要求他们去承担责任。

奥尔忠尼启则:1月份你们已经把工业计划交给了国家计委。

柯秀尔:稍微早些时候就已经交了。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惟一的一次。

柯秀尔:控制数字就足够了,不然的话,今天要控制数字,明天要工业财政计划,后天还有什么东西,这样一直到年底都要来确定。现在你们的责任是考虑一种制度,以便到9月15日拿出计划来。发现在哪儿有缺点,就批评哪儿,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现了缺点,就批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托拉斯发现了缺点,就批评托拉斯。你们的责任是完善制度,而如果你们考虑不出建议的话,我们就向你们提出相应的建议。

如果这两个东西都得不到通过的话,我认为提纲也帮不了我们,相反,它们会害了我们,因为如果我们的经济改善有某种速度的话,那么,没有这些基本的东西,速度将会减慢。

主席:施瓦茨同志发言。施瓦茨同志建议打破全会的工作计划,给他半小时的时间。

喊声:给!给!(通过)

施瓦茨:如果我在这里一定要尽力向你们证明,由于我们的工业至今还是一种艺术,我们在工作中没有确定某些硬性的制度,而这是任何一种科学以及其他工业领域中都有的东西,如果说我想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发表自己的言论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是爸爸膝下的乖孩子,根本就无须在这里白费时间谈

什么东西了。

柯秀尔:这样不行,谢苗。

施瓦茨:说到最后,我们都是俄罗斯人,是同你们一样的人。(笑声)如果我想向你们证明,我们不是像你们那样的人,那么,你们就有权说,我们除了是弃儿之外什么都不是,是什么德国人,可我们不是德国人(笑声),我们是俄罗斯人,我们也同样有那些缺点,有的地方比别人多些,有的地方比别人少些。但这也不能使我们逃避我们在实质上应负的责任。

斯大林:就是,就是。(笑声)

施瓦茨:对,绝对不能逃避。但我应该对你们说,同志们,没有人能像我们这样在自己的工作中总是记着政治局的指示的,总是以合理的不信任态度对待人和事的。我们说,谁要是不抱着批判的态度去对待人、对待自己的责任,谁就对自己的党不忠诚,而如果你们能自始至终地观察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是用最无情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同志的。我对我们的基层组织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们不会用应有的态度,而只是像随便的一个工长那样对待工作的话,那么,你们就是无用的工长,犯错误的就不只是经济工作人员和工程师们,而且还有你们,工会工作者们。所以,如果你们从头到尾回顾一下这些年的情况——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是这种情况。洛莫夫同志来到我们这儿,他也会向你们证实的,当他听到了我的口头禅的时候,而你们是知道我的口头禅的……

喊声:知道,知道。

施瓦茨:他就暴跳如雷了。为了不空口无凭,更好的办法是,我可以把我的讲话,——我在1927年2月的全苏联合学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读给你们听。可这需要2个小时,所以,我从讲话中摘出一小段。

喊声:对着话筒说。

(李可夫:施瓦尔茨,面对大家。)

施瓦茨:我说,他是1926年来到我们这里的,他不知道我的口头禅。其他人——鲁希莫维奇、柯秀尔、谢列布罗夫斯基——都知道我的口头禅。我无论对谁都从不讲究用词,我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我对他们说的就是这些。争论中短短的一段话,我现在回答经济工作者们的问题,而且我应该指出:在1926年,我中断了联系——去了国外,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基泽尔的信,工人们在信上写道:“你来吧,他们想派来一个委员会,但最好还是你直接到我们这儿来”,那时,我把信交给斯大林看了。他说:快派个委员会去。不,我说,最好我亲自去。]下面是我援引的话:“从对这里已经听取的报告的讨论中我受益良多。给我留下最

深刻印象的是直接从矿井、从工作面来听取全会的三位工人同志的发言。我应该说,只有这三位同志坦率和真实地在这里传达了我们的生产状况,坦率和真实地指出了这种生产的全部不足之处,坦率和真实地通报了工人们处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以及为满意地解决我党和苏联政府给矿业提出的任务存在着哪些条件。

依我看,其余的谈话都是空话;除了相互指责外,这里什么也没有说,我再说一下,你们,尊敬的经济工作者们,必须听听这三位同志的发言,必须在自己今后的工作中对他们所说的一切切实地加以领会,永远记住:没有工人群众的直接参与,我们就不能改进生产,不能降低成本,也不能建设新的顿巴斯。

我们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为了克服所有妨碍这项工作顺利进行的不足,经济工作人员们在做什么呢?没有需要的材料,无数小的技术故障,而最糟糕的是工人所处的不良的住宅和生活条件。没有住宅,可怕的拥挤,没有水,没有澡堂,没有能促进工人正常休息和保存其体力的许多东西。”

下面就没有必要再念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工会工作者们挨批了,工程师们挨批了;你们都推到了指挥人员的身上,可你们的这一招是不顶用的。

我在后来的一次全会上更强烈地对工程师们说了同样的话。这已经是5月在全苏全会上。不过,我认为也有必要在这里针对我们整个苏联突出强调这个问题。第一次我是在哈尔科夫讲的,第二次是在莫斯科,前一次在2月,后一次在5月:“我们必须承担我国经济恢复阶段的费用,有时这些费用要超过西方和美国资本家花费的1—2倍,如果注意到他们的经济是已经调整好的话。这种状况把非常沉重的义务加在了工人阶级、工会和经济机构的肩上。我们应该像爱护眼睛一样珍惜每一个戈比。我们应该全线紧缩并记住老的工作方法已经不顶用了。它们不仅不好,而且有时极其有害。这些方法导致的结果是工作在形式上的程序化。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工作重数量轻质量,从质量上说,我们的工作做得少得可怜。按照我的工作责任,我应该是在国外到处走走的,所以我长期脱离了各个区的情况,但最近我能够在一些地方呆一呆,看一看和听一听工人们说些什么。我不想隐瞒,给我的印象是:我们做的工作是形式上的程序化,我们有些脱离了工人们。我过去已经说过,可以与工人们肩并肩地在宿营地生活,而同时却与工人们相隔遥远,对他们视而不见。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我们负荷过重,是因为我们经常做着别人的工作,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只指望俄罗斯人会‘碰运气’,而对我们的工作缺乏周密的考虑。看看德国人,他们要考虑99次,要到第100次才拿起来裁剪,而我们好像是更‘天才’的人

民,更富于幻想,总是这样说:‘没有必要左思右想,拿起来就干,工作本身就会表明的。’”

柯秀尔:说得好,谢苗。

施瓦茨:在1926—1927年,当我们转入社会主义合理化阶段时,我们发现同专家的关系中有了裂缝,而它也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裂缝的,不是吗?在这里冒出了很大的压力,就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专家们开始像主人一样管起事来了。现在来谈谈我们的专家们。

“在解决那些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的时候,巨大的责任落在了技术人员的身上。我们是通过他们,和他们一起实行我们在工业改造方面的各项措施的。为了给他们创造相应的工作条件,党、苏维埃政权和工会做了一切努力,当然技术人员自己也没有忘记自己。”但要在哪里,在全会上指出的是,工程技术部从来没有从是否诚心诚意的角度提出过工程师的工作状况的问题,而是从他们与工人们相处如何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而这个问题需要提出来的。“存在一些不健康的和不能容忍的事实,乌克兰工程技术部主席自己应该承认,工程师有时的行为是这样的:工人应该用随手可得的东西来回敬的,而我们则用通常生活中惯用的方法,难道我们在争论中有时不也很想不是用言语而是用巴掌来回敬吗?这种态度要坚决和彻底地给以改变”。

喊声:别念了。说得很好。

施瓦茨:通过这些引语我证明了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

喊声:在口头上是正确的。(笑声)

施瓦茨:那看在地方的上是怎样实施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对我们说了什么?对工会和党组织的建议说的是已经注意到了,而对经济工作者的建议说的是去执行。而这里是谁的错呢?

柯秀尔:那是谁错了?

施瓦茨:是我们,是党组织的错。[同志们,记下来并去回答吧。你们还是好好听下去吧。不喜欢,可是要听到底,不然,我可以离开。如果承诺了,那请听完,而且你们可以到这里来回答,说说我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错。]

喊声:钻牛角尖。]

施瓦茨:我确认,我们,党在这里犯了错误,因为党是法律,基层组织应该成为法律,基层组织有否定权,我想,如果这样来提出问题,而不是相反的话,如果基层组织没有依赖性的话,经济工作者就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主人,而他们是这么看待的,他们是这么议论的:“上了谁的车,就该给谁帮腔。”他们在许多情况下

就是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位置上的。我们看到,有时一个昨天入党的小同志是怎样把自己看成主人的。在这里路线被扭曲了。而李可夫怎么说?他说,我们注意到了。这就不好了。在全会上,当讨论关于党的预算问题时,我发言说,要为党组织创造这样的条件,让它成为自由的、独立于经济组织的组织。我那时发言了吗?发言了。而事实上怎样?实际上我们的党组织被经济组织收买了。这里产生了思想腐化,在有的地方我们开始下滑了。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亲自给你们指出过,并且大家也都确认,党组织要少说一些,我们的基层积极分子被封住了嘴,非党人士说得更多,因为一旦有事,就可以拿他问罪。就是这么回事。难道能够允许存在这样的条件吗,这样,难道这些说大话的人不就宣告失算了吗?* 我的议论,一个老党员、矿业工人联盟中央主席的议论归结起来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当我们多年来不能开除任何一个我们的支部成员——一个酒鬼的时候,我们乌克兰委员会所有的通告和指示又能归结为什么呢?例如,叶纳基耶夫斯克矿委会有个酒鬼,爱酗酒,长年来我们不能开除他,因为党组织不让。(笑声)问问新的州委书记捷列霍夫同志,他是什么时候陷入这个阿尔乔莫夫斯克风气的⁹⁰,叶纳基耶夫斯克党委会两次决议不要撤销雷巴尔琴科的职务。需要把他们叫到专区党委会来,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让矿工们推行这些措施,我们就把你们赶走。我在这里说的对不对,捷列霍夫?对。这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因为这些雷巴尔琴科、恰普雷金之流能让管理人员在我们这里宣布进行二月革命,他们不时要喝上两盅,从管理人员那里收来一些奖金,一起酗酒和玩乐,所以这些事情在搞煤炭小买卖的人那里是少不了的,所以这样的事情就有可能发生。

说是我们没有能好好地维护工人的利益,我们的维护完全是无用的。这里有一个文件,我把它作为密件交给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给你们读读:《关于全俄矿工工会、全俄五金工人联合会的集体合同》,报告人拉琴科同志——省工会委员会主席,在顿涅茨克省委会上。

决议:“1. 确定全俄矿工工会、全俄五金工人联合会在顿巴斯的工资额时,应该考虑莫斯科对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和南部地区炼钢工业托拉斯的资源以及苏联的财政前景的估量,在确定这些工资额时,基本的要求是要能履行集体合同和达到及时支付。”

苏霍姆林:这是在哪一年?

* 原文如此 ——编者注

施瓦茨:在1923年。

苏霍姆林:原来如此,那时候没有可能及时发放工资。

施瓦茨:我听了你的发言——你该听我的发言了。我说的是体制,应该要多少想想了。(笑声)

“2. 没有理由放弃已经确定的在地下工作8小时的实际做法,地下工作8小时应该在关于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和南部地区炼钢工业托拉斯的新的集体合同里肯定下来”。

你们该好好听听是怎样论证理由的。

斯大林:是哪一年?

施瓦茨:1923年。第三,——这里已经是精华了,纯粹资本主义的用语,季特·季特奇^①的用语了。

奥尔忠尼启则:谁写的?

施瓦茨:顿涅茨克省党委就拉琴科的报告写的。

“3. 由于农民经营的经济行情引起工人源源不断来到顿巴斯,对于开采工人采用30%的补贴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你们觉得喜欢吗?

奥尔忠尼启则:你对这一点做了什么呢?

施瓦茨:这是保密的。我们没有接受这一点。

李可夫:这是在1923年。

施瓦茨:事情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即便是在1921年,即便是在1918年(喧闹声)——事情的实质由此绝对没有变化。

喊声:改变了。

施瓦茨:不,没有改变。我不同意。这里是体制,亲爱的经济工作者们,是体制。党组织受你们的支配,你们看,联盟组织主席做报告,说我们不应该补贴,而如果补贴——就按照苏联的资源来补。这是第一。接着是由于来了一批工人群众,要减少因为有害而增加的30%,应该实行8小时工作日。要知道我们只是现在,在第11个年头上,才发现了美洲,知道我们是生活在苦役般的条件下。我非常遗憾,同志们没有与我一起去顿巴斯,我会带着他们跋山涉水,我会亲自肚皮贴着地爬行来示范矿工们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① 季特·季特奇是俄罗斯剧作家 A. H.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代人受过》中的人物,是俄罗斯商人和刚愎自用的代名词。——译者注

柯秀尔：你不要故弄玄虚，实实在在地说吧。

施瓦茨：我是在实实在在地说。事情的状况就是这样的。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下，我们不能创造条件，让基层组织、工会和经济组织说出事情的状况，得出坚决的和独立的最终决定，——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无法工作的。你们看到，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这里说，他们不知道关于地下作业的情况，工作超过6小时的情况在我们这里通常是有的，而关于干满6小时工作的问题早在1922年在顿巴斯就已经得到了解决，那时是丘巴尔来料理业务的，那时还来了斯米尔加。

丘巴尔：不是料理，而是经营。

施瓦茨：好，是经营。我自己也去了那里。问题提得很直接：你工作满6小时，就能拿补贴。我们是应该同意在地下作业满6小时的。如果你们现在要来检查我们干多少，那我们就平均干满6小时，而在我们的条件下，如果采矿工是按劳动组合干的话，你们想，他会抛弃工作嘛？要知道下一班是要来接他们班的！要知道下一个采矿工也得挖！要知道这种情况是应该考虑到的。你瞧，我是一个采矿工，我干了6个小时，我挖出了一堆煤。总该有人把它拖走吧。如果这些煤不拖走，下一班怎么工作呢？那就要创造另外的条件。尽管这样，我们在2月1日……

李可夫：哪一年？

施瓦茨：就是现在，1928年2月1日，在沙赫特案件之前，我们已经用另外的方式提出问题了。我们开始搞机械化，我们将给你们记录，你们将能看到我们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

一般来说，要是想把所有的地面工人的工作日变成7小时，所有地下工人的工作日变成6小时，那么，现在就已经必须进行计算和准备出材料来。但是，我们现在是怎样干这件事的呢？你们在这里将可以看到详细的论证。这只是一份普通的记录，也就是说，要有第一、第二、第三点，然后指出我们建议该怎样分离出来：建议从新建的项目中分离出顿巴斯的两个矿井，基泽尔的一个矿井，库兹涅茨克矿区煤炭工业托拉斯的一个矿井，巴库的一个作坊，格罗兹尼的一个工厂；建议全乌克兰合作社联社、北高加索边疆区委指定企业并和相应的经济机关谈妥，在这之后通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将这个建议提交政府委员会批准。在我们采矿工业中，如果我们只是这样行动，简单地说，如果我们只是想表现自己好的方面，说我们比在这里所受的灾难要好，根本不顾经营者的良心，那么，我们要求得越多，你就越能成为样板。难道能够这样干吗？这是不负责任的政策。是不正确的，是不对的。

我们怎样对待建设我们的工业呢？这才是基本的问题。要知道我们矿工从第一天起就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组织我们的工业的问题，而且我想，丘巴尔在这里会对你们说并且确认当我还是一个经济工作人员的时候……

丘巴尔：如果给我半个小时——我就说。

施瓦茨：当我还是顿巴斯的经济工作人员的时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准备成为经济工作人员的时候，我是反对煤炭工业总局专家和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⁹¹的头子们的，所以我很清楚，他们曾是戴肩章的，而这些头子们是从哪儿来的呢？这都是原来的大公司的主人和经理们。当时，我面对着克桑德罗夫领导的这些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的人，我什么也干不成，——我实际上几乎是靠边站的人，因为我只有市苏维埃的委托书，实际上和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的人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把这件事转给了丘巴尔。虽然我和某些同志一样不很喜欢做档案管理员，但是我有幸地保存了一张纸条，这是给国有化企业工人管理委员会的指示，说到了管理委员会的权力和义务。需要说的是，只是多亏了丘巴尔，我从中抽出了第八条，它是这样说的：工人管理委员会每月至少要在企业召开一次由矿区管理委员会、工会全权代表、市劳动局及技术人员参加的会议，讨论涉及企业的最重要的技术和经济问题。这已经是在1920年了。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会议表示有某个一定的愿望，而且完成这个愿望是在矿务管理局的权力范围内的，那它就可以完成。否则的话，管理局就加上自己的结论转交给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的人。我们那时就已经提出了问题，而且你们知道，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我们的联合会在1922年提出了组织采矿工业的问题，甚至在1921年我们就提出了问题并写了一本小册子——《煤矿战线必须改变，必须改组》*。在皮达可夫著名的经营之后给我们派来了丘巴尔。来自联合会的基本指示和要求是必须这样来建设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它应该是一个理事会，而不是管理局。管理应该转给基层组织。这是在1921年决定的，并且要求矿业管理局的基层机构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报表。就这样一年年地我们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效果，但还不是完全的。我们作为联合会，从1922年开始坚持要求取消燃料总局。1924年中央委员会在我们的坚持下解散了燃料总局，于是，我们能摆脱掉资本主义头子。我们把拉比诺维奇、费奥多罗维奇、拉姆津和燃料总局都扔进了垃圾箱，让他们都见鬼去了。现在他们坐在国家计委，而我们争取到了安排一个矿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只是在这时候我

* 原文如此。——编者注

们才有可能实际上影响这种局势。

斯克雷普尼克: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说说现在吧。

施瓦茨:您来谈现在吧。您坐在哈尔科夫,在顿巴斯……(喧嚷)要知道他作为一名检查官,在要求得到我们的解释。

喊声:他是人民教育委员。

施瓦茨:如果你需要,请说吧。我是从组织采矿工业的意义上谈到目前为止我们工作的状况的。现在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需要改组,不能在上层留下让专家们发号施令的症结。我们在这里清理了专家,有些人被赶走了,把采矿业交给了纳济莫夫领导。他不是矿业工程师——他是个工艺师,通过全苏纺织辛迪加总部*对我们施加了巨大压力:怎么能这样呢,人家问我,——我们矿业工程师,采矿工业,将由一个工艺师来领导吗?这像什么话?而我们回答他们说:我们不希望这里留下症结,因为鱼都是从头开始发臭的。如果资本家和原来的那些有关的经理们还坐在这里,他们就会随心所欲地摆弄政策。(主席的铃声)我现在就结束。

同志们,在这方面,在采矿工业的组织方面,我们一直在说,现在也希望能做到一些事情。

现在最后一点是关于工人、工资,等等。我应该说,如果你们看一看劳动法法典的话,你们就会看到,在6小时工作日方面,我们比法典规定得要多,在假期方面,我们比法典规定得要多,在劳动服务方面,我们也比法典规定得要多。就是这样。但是你们还应该记住最后一点,我说完这些就结束,你们要好好地记住:我们一直都是从扬松那里得到的工资。我们得到的是眼泪,我们不是和经济工作者面对面,不能和他们进行斗争。我们是从扬松那里得到工资的,我要提醒阿列克谢,在1925—1926年的时候,当时给了我们9个月的补贴,而后来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训斥克拉瓦利之流及其数百名工程师的时候,把我们叫到了政治局说:“这不是9个月的工资,而是12个月的工资”⁹²。而当我声明抗议的时候,阿列克谢作为主席对我说:你忘记了你是在政治局。你们怎么想,我能回答他什么呢?而我在心里回答了他。就这样把他大骂了一通,我在裤兜里对他做了个轻蔑的手势。(全场大笑)

主席:奥什温采夫同志发言。

奥什温采夫:沙赫特案件使工业工作者的整个外围动荡起来并查明了我国

* 原文如此。可能指的是(工会的)工程技术部总部。——编者注

经济中的一系列不足。在我们苏联的一些地区、专区和州,存在着经济工作者把持的现象,看不到苏维埃政权在地方上对工人们的影响。这里应该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工业工作者都要比苏维埃地方机关工作者具有更多的实际知识,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更有文化一些,所以他们能够施加纯粹主观的压力。很明显,这里应该考虑一下我们的地方苏维埃组织的组成成分,考虑让具有更多实际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工作人员来领导他们,需要在这方面平衡他们之间的影响。同样应该指出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要让我们的地方经济组织的工作者更靠近苏维埃系统,从而吸收在工厂以及其他地方工作的厂长和工作人员直接参加到工作中来(成为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

最近在专家方面做了工作,联系到沙赫特案件,这种工作有什么影响呢?可以指出的是,专家们现在开始按公文办事了。在多数情况下,在着手某项活动前,他们每次都要提出说明道理的文件来。他们在努力地使每一个行为、每一份证件都得到保证,以便一旦他在某个时候因为他的工作中的缺点而受到牵连时,他能用这张纸条来为自己辩护。这使最近几个月来的工作中形成了不正常的局面。我们看到,从开始有这种公文时起,在机关里,官僚主义作风便愈演愈烈。我们必须以最坚决的方式与此作斗争。但是,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来进行这种斗争,不是把专家们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错误看做是纯粹的反革命和对经济体制的破坏。如果不这样,工业建设技术的进步将会受阻。所以,要估计到这一点,并且不要像日丹诺夫在这里指出的那样去做,如果在消防队里的雪没有得到清扫的话,那这就是反革命,就要把管这件事的经济工作者或有关的专家找来盘问。在这方面应该有相应的界限。

关于应该补充我们干部队伍的工程师们。在苏联的边远地区,我们工程师的补充力量太少。可能他们在中心地区是足够的,但在我们的乌拉尔只有个别的年轻工程师到我们这里来工作。同时,年轻的党员工程师们往往采取的方式是表示不愿同党外人士的专家在一起工作;我遇到过一件事,那时一个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年轻的党员工程师被派到一个机关工作,他一到那里就对党外人士的工程师声明:“我不想在这里工作,因为我将会妨碍您”。我们的党员工程师中间的这种声明、这种情绪当然应该根除,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该容忍它们存在。

现在我来谈谈关于补充专家干部的必要性问题。我认为,在我们的大学里很少注意培养建筑工程师的问题,即培养那些要在目前最为重要的、当前和将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关注的工地上工作的建筑工程师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的大学

应该重视培养建筑工程师。对这件事应该给予比现在更多的关注。

关于第33号令。这条法令在我们乌拉尔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呢?在实施这一法令的时候,我们那里出现了一系列冲突。我们那里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技术领导人根据这条法令要求得到法令里规定的权力,要求拥有副厂长的权力。其结果是技术领导人的利益同厂长的利益搅混在一起了,出现了冲突,并在一些情况下事情发展到了不得不解除厂长或技术领导人职务的地步。这种状况说明这条法令存在某些不健康的因素。我认为对这条法令越早进行修改越好。

现在我来谈最为消极的现象——工厂和托拉斯中的工资标准处的工作。遗憾的是,只是现在沙赫特案件才迫使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并确认在我们的机关、工厂等这方面的工作中还有为数甚多的有着白卫分子背景的人。我们这里有这样的情况:有时涉及工人政策、劳动问题工作等的机关在组织方面有欠缺,应有的、能正确执行工资标准、制定工作政策的工作人员配备也不够。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们注意到了这个不足之处,正在开始消除这种状况。

谈到关于经济工作人员的工作问题,我应该指出,在经济工作人员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该考虑到他极其超负荷的工作量。苏霍姆林同志在这里谈到了一系列说明经济工作人员极其超负荷的工作量的情况。我要重申的是,情况确实如此。的确,这里的状况是厂长自己只可能有40%,至多50%的时间用来从事生产方面的工作。

剩下的时间他都用在到了到托拉斯去做各种有关的报告了,这是必要的,到各种讨论会、全会和党的、工会的和其他组织的常设局去做报告。现在这些报告也是必要的。接下来说,经济工作人员也应该在生产会议上做报告。如果计算一下一个经济工作人员用在各种报告上的全部时间,我们就应该可以确定,经济工作人员剩下用在生产工作上的时间并不那么多了。我认为,应该确定一定的制度,让经济工作人员把一定的时间用于这一类工作,不给他的基本工作、生产方面的工作造成损失。我们的条件要求经济工作人员对广大的工人群众通报。我们实际上是这样做的。现在提出了条款,有道理的条款,必须在地方上领导和监督企业方面加强苏维埃政权。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方面,厂长也应该去报告情况,他在那里也应该用掉自己的时间。需要确定一定的制度,让厂长能够管理生产。我们完全不否认监督,相反,我们承认监督并认为监督是应该有的,但是该是合理的监督,而不是现在这种提不出任何实际建议的监督。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简化管理的,它应该能影响到我们工作的成效。柯秀尔同志也指出了这件事。我们必须让厂长在年初就知道他掌握着什么,他应该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和他应该按照什么样的计划工作。由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管理工业的体制,我们不能向他提供这些。如果我们不简化这个体制,如果我们不规定相应的形式,让厂长有可能及时得到已经批准的计划,在总结方面和监督工人方面以及在向我们的组织提出报告方面,我们就会使我们地方上的经理们和经济工作人员们处于困难的境地。

现在来说说关于生产会议的问题。我认为,在我们的经济中起着巨大作用的生产会议没有足够地得到利用,我们必须现在就更深入地进行这项工作。

生产会议有这样一些缺点,开会时提出的问题是鞋的价格、服装生产等诸如此类的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是平行地在其他的建制中和其他的机关里解决的,而生产会议却变成了这些问题的群众大会。那些应该在生产会议上占主要位置的生产问题要么被推迟了,要么就没有占到足够的位置。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组织和整顿对生产会议的领导。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提拔工人从事经营工作。我当然不是这样想的,不仅是在车床旁工作的工人,而且有专业工龄的工人,也就是说,那些在工厂委员会或者区的工会委员会里工作了一两年的工人就不能派去从事生产工作了。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事实,即提出用工会工作人员来补充经济管理干部的问题。他们往往提出问题:我们怎么去从事经营工作呢,难道我们已经不适合做工会工作了吗?他们认为去做经营工作如果不是一种耻辱的话,那也是非常受委屈的事情。

美尔尼昌斯基:往往也有相反的情况。

奥什温采夫:但罗森塔尔同志——乌拉尔工会委员会主席这样提出问题的结果是使被提议提拔到经济工作岗位上的那些同志受了委屈。我认为,应该指出的是,从补充工业干部的意义上说,提拔工人和工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应该占有位置。我们在地方机关里对一大批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进行了调动,我们有我们的工业科学院,它从我们这里要工作人员干部,但它做不到在两年内就让这些人回去补充我们的干部。所以,现在应该让工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同车床工人一起经过预先培训,加入到我们工业部门的技师、车间副主任、厂长和托拉斯管理人员等干部的补充体制中来。

主席:安德烈耶夫同志发言,你能在10分钟内讲完吗?

安德烈耶夫:不,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要知道这个反革命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这儿。

喊声:延长时间!延长时间!

主席：那就延长时间。

安德烈耶夫：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我们的北高加索境内……

柯秀尔：不是发生了，而是开始。

安德烈耶夫：我本应利用自己的发言来给你们详细地评述组织的状况和这种危害6年来在煤炭生产中继续存在的条件。但我认为，这些新的情况在中央散发的材料、托姆斯基同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简述中已经都有了，而且在北高加索委员会的决定中，我们已经对沙赫特组织和干部的状况做了评述，我想，对这一切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可补充了⁹³。任务将是继续在完善顿巴斯组织和对它进一步研究方面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我想，除此之外，由于我看到了对这些被捕专家的审讯材料，我认为这是如此丰富和有意义的材料，可以在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和专业工作者的工作实践中以及党的领导中使用它，不妨可以通过一个专门的决定，出版这个材料，这些审讯专家们中最重要的材料，对我们的组织在破坏活动时期实际状况的最有价值的评述，等等，让我们每一个党的干部、工会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都必须直接学习这个材料——这比任何概括性的总结和一般性的决议都要好。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从具体的沙赫特案件转到草拟总的政治的和实际的结论，我也想在研究这个材料和组织状况的基础上得出几个结论。

我认为，沙赫特案件对于我们来说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这个沙赫特案件给我们一种启示，让我们知道了，6年来在我们苏联境内，不是在不良组织而是在工人组织活动的范围里，我们的敌人得以在我们的大后方、经济建设的后方进行活动，6年中，我们的敌人还能继续工作，并为他们的工作拿到外国资本家付给的报酬。

喊声：是呀，我们给的酬金也不差。

安德烈耶夫：于是他们得了双份酬金。

喊声：还有奖金。

安德烈耶夫：我认为，这对于我们做出各种结论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在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所有我们的领导职位，至少是经济部门的领导职位。沙赫特案件使我们有责任严肃地注意到哪怕像整个燃料部门那样的领导职位。我认为，在煤炭部门之后，下一次检查应该在石油部门进行，因为根据那些来自国外的材料，活动最积极的巴黎燃料工业侨民联盟分部是旧工业家石油分部。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最为详尽的检查。我们应该仔细查看像交通这样的工作部门。我不怀疑，那里有些敌对势力正在我们的人中间搞些什么。我们就北高加索问

题已经在—一个铁路工段——齐霍列茨克工段的工作中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在那里揭出了技术人员长期以来直接进行的恐吓和破坏活动等。

我们必须检查冶金业，特别是必须检查军事工业。我认为，沙赫特案件直接地引导我们认识到有必要进行这种细致检查，在这方面更加保持警惕性。我们的领导干部们存在着某种认识上的迟钝，低估由于我们至今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而产生的一切危险。我们的敌人有潜入我们大后方并继续同我们斗争的诸多条件，只不过通过了另外的手段，沙赫特案件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领导干部们有这种认识上的迟钝，有些高枕无忧，认为现在我们这里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可以放任自流了，现在已经克服了所有主要的困难，一句话，胜利的炮声已经可以打响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有这样的心态的，它是有害的。应该和它作斗争。实际上，为了使我们的经济损失达数亿卢布和缩小我们的胜利，难道杰捷尔丁格或其他一伙资本家为此付出数十万卢布，代价还算高吗？难道这对他们来说算的了什么吗？他们在向着这个目标去做并今后将继续这样做，而我们这里还有许多他们计划的执行者，他们能够利用尚未同苏维埃政权结合的这批资产阶级专家的身份。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处在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我们面临着国外资本家危害我们经济建设的许许多多的条件；另一方面，我们本身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他们能利用我们自身的疏忽大意，并通过一部分我们的专家，即资产阶级专家来达到这个目的。我认为，这就是第一个结论，它归结为必须加紧哪怕是对我们的燃料、交通、冶金、军事工业等经济部门领导职位进行警惕的检查。

我想，由于沙赫特案件，我们可能会有两种极端情绪：一种是过分疑心重重，到处看到反革命，从怀疑专家搞破坏的观点出发来看待一切。另一方面，也许会在我们的部分经济工作人员中出现另一种情绪，而且有时会部分地在我们边区委员会的全会上得到反映，认为沙赫特也就是沙赫特，那里有反革命，而我们这里不可能有，我们这里完全是另外的专家，等等。这就是由于沙赫特案件在部分工作人员中可能出现的两种极端情绪。这样的情绪是有害的。

对于我们来说，绝对需要做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加强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干部力量，特别是在检查我们经济部门领导职位的工作方面，我们需要更加相信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并给予支持。有时国家政治保安局可能在这方面犯错误，但是，即便它有时会犯错误，也还是要让它更多地工作。

现在来说说属于我们自己的毛病、我们领导的毛病以及我们工作系统的毛

病。我想,首先的和基本的毛病是我们的党组织对经济的领导不够好,结果是我们粮食收购上有间断,通过沙赫特案件可以看出,我们在工业领域里也有间断。这是我们的党组织,我们的党对经济和工业的领导还不够内行、灵活和正确。我们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要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领导。

但是,我想更多地谈谈另外的问题,关于我们的经济管理干部的问题。我想,同志们,现在我们可能有上千名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的确是我們的人,这是已经证明了的事实。

现在几乎每一个企业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出身的人,而专家是他们的助手。但是如果给自己诚心地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千名我们的共产党员经济工作人员能不能完成保证我们的党想在工业化等方面实现的那条党的路线,那我想是不行的。沙赫特案件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保障有时只是形式上的,好像我们的局势很好,到处都是共产党员经济工作人员在领导等,——但这只是表面的。如果拿两件事做个比较:红军的指挥班子是怎样形成的和工业的指挥班子是怎样形成的,那么,在工业指挥班子方面我们取得的成绩要比在军队方面少得多得多。可是在工业方面,在配备工业领导干部方面,和红军相比,我们有着更多的优势……

布勃诺夫:但是困难也更多。

安德烈耶夫:在有我们推举的人的地方,我们有更多的条件进行正常的工作。但是我们在工业方面看来是路子走得不对。我们不是创造专家型的领导干部,而是创造社会活动家型的经济工作人员,这也就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危害:我们只是注意到了经济管理工作者是一个社会活动者,而没有注意到他该是专家。我们在红军中的优势是我们把自己的从事领导工作的指挥员作为专家来培养的,是从这个角度培训指挥人员的。

臧声:也是作为社会工作者培养的。

安德烈耶夫:当然也是作为社会工作者培养的。这里应该有社会工作者和专家之间的绝对联系。在军队里我们有这种联系,而在工业领域里,我们所有的是社会性超出了专业水平。我们的缺陷在于,我们的共产党员经济工作人员不是自己事业的专家,而是到处都能适应的社会工作人员。

我们应该提出问题。这里有许多经济工作人员。是不是能完全有理由说经营管理的业务工作是共产党员经济工作人员的基本工作呢?不是,我想,我们对这一点的回答应该是,往往基本的工作——经济管理上的业务工作——是附带性的,而共产党员经济工作人员的基本工作都是在企业之外进行的,在各种会议

上,在忙忙碌碌中进行的,而直接的业务工作只剩下了微不足道的时问。他们有可能检查和分析那些他们应该直接和首先承担责任的事情。对这个问题回答得最好的,是那些在沙赫特案件中被逮捕的反革命专家。这就是他们说的。请允许我从对他们的审判中引用几段话。这些话很有意思。专家萨莫伊洛夫说:

“我来谈谈关于为什么管理人员要把工作推到总工程师身上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空闲时间去关心他所承担的那件工作的直接细节问题。我观察到管理人员完全没有空闲的时间——今天他去参加会议,明天也一样,而有时一天开两次会并一直开到深夜。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在这种超负荷的情况下需要对生产给予关注,而这是没有时间就做不到。我在谢尔比诺夫卡最近就看到了这样的事实。管理人员只有很短的时间了解情况,而这只够用来让他略微赶上工作的进程,但完全不可能进行各种分析,因为他既然没有这方面的专门培训,就不可能掌握它们”。

还有第二个专家别列佐夫斯基说:不能深入地进行分析主要是因为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负担太重,管理人员受到的技术统计工作和商业工作的培训太少,结果是他就没有可能充分地用批判的态度对待技术人员的工作和活动,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后者的影响,而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和技术人员不自主地沆瀣一气,使得后者能够推行无论如何都要相互掩盖和保护的政策。

和技术人员的交往对于顺利地进行生产工作是如此之重要和必要,但又带有私人 and 家庭的性质,这无疑会对管理人员的公务上的关系留下痕迹,妨碍着后者有时提出足够坚决的要求。

第三个专家说的大体上也是同样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毛病。我们要求经济工作人员负起责任来。已经得到证明的是,我们的共产党员经济工作人员往往对资产阶级专家的工作失去批判性的敏锐感觉,他常常盲目地维护专家向他建议的一切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可能检查向他建议的那些东西,所以他就盲目地维护这些东西。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是怎样被阉割的呢?一方面,专家把各种各样的琐事捅给他,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把经济工作人员拖去开各种会议,做没有止境的各种报告,等等,把他们给阉割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零,而不是让他能够领导和对自己的事业负责。

伏罗希洛夫:结果是双重阉割。

安德烈耶夫:我们主要的毛病就在于此。我们有数千名无产阶级的经济工作人员在领导着我们的企业,但我们不能坚信他们是真正的领导者,遗憾的是,

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的工作体制不中用,是不好的。沙赫特案件对此完全彻底地做出了回答。

我认为,为了使我们的这种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为了使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保持对专家有批判的鉴别力,为了使他们——经济工作人员不盲目地签署和保护别人给他悄悄塞过来的一切东西,另一方面,为了真正使他能对所承担的事业负责,——党有义务坚决地改变经济工作人员的工作体制,党有义务为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创造条件,以便使他能够对所承担的事业负责。

喊声:对!

安德烈耶夫:这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东西。怎样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一方面确保使经济工作人员有能够学习的条件,不是像在顿巴斯那样的学习,不是像在沙赫特专区那样的学习,那时,两名共产党员好像是按照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指令一边管理着矿业局,一边在诺沃契尔卡斯克的学院里学习⁹⁴,等等。这样的学习是不行的,我们说的不是这样的学习,而是指在检查专家工作的同时,还要进行自我修养。学习同工作能结合在一起吗?可以结合。

喊声:不。

安德烈耶夫:而如果不能完全把学习和工作结合起来的话,那么,最好就把经济工作人员从领导工作上撤下来,派他去好好接受训练,然后再让他回来工作。

喊声:对!

安德烈耶夫:我们应该对经济工作人员进行重新培训,而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使经济工作人员能够最大程度地从繁忙的会议中解脱出来。这就要使我们党的领导人在认识上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以便使他们认识到经济工作就是党的工作……

丘巴尔:这不只是对经济工作人员。

喊声:对!

安德烈耶夫:但不要这么认为:既然他从事的基本上是经济工作,这就是说,他脱离了党,等等。而我们这里有这样的看法:如果不去支部,不去参加某个会议,这就是说,他脱离了党的工作。

喊声:对!

安德烈耶夫:我们必须根除这一点。

斯大林:对,要根除。

安德烈耶夫:这是在经济工作人员干部方面。

现在我想要谈的还有两个问题。

伏罗希洛夫:安德留沙,要给个计划,不然的话,光是一些空话,需要有些具体的建议。

安德烈耶夫:我想,伏罗希洛夫同志,如果我们真正懂得这种必要性的话,计划就不成问题了。如果您非要我给您搞个具体计划的话……

伏罗希洛夫:当然不是。你讲得非常好,这就足够了。

安德烈耶夫:请允许我谈谈培训年轻专家的问题。我想讲两个问题:关于争取我们的新专家的问题和关于工会的问题。

关于争取我们的专家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至今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少得不像话了,但是,在把握领导和组织我们的工业事业中,它却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我们却给予它少得可怜的关注。我在中央的一个委员会的工作中确信了这一点,那时我是根据组织局的决议参加的——是为了检查重新起用的专家的使用问题⁹⁵。

我来谈谈三个阶段的问题。拿对我们大学挑选学生来说,这种挑选是否能保障我们所需要的那些干部呢?不能,大学的选择是自发进行的,在这方面工会、党和经济部门都没有参与。

阿尔秋希娜:名义上参与,实质上不参与。

安德烈耶夫:挑选完全是由我们的学校来进行的。

臧声:委员会进行挑选。

安德烈耶夫: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做这种挑选的这些委员会是这样挑选的,并不是真正安排好的选择。它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无论怎样也要有好的社会成分,为了工农所占比例要好,至于从质量和社会上说,这样的选择并不一直都是进行得很好的。

[臧声:社会方面的选择并不一直顺利。

安德烈耶夫:这是对的。这就是培养我们的红色专家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学习。我问:我们的工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对这种学习的组织工作吗?丝毫没有参与。我是通过委员会的工作才确认这一点的。他们没有参与,但是提出了批评,批评说提供的专家并不是需要的,等等。参与这件事,修改和提出计划这些工作都没有。而现在经济工作人员又从另一方面提出这个问题了,他们说:请把大学给我们吧。

伏罗希洛夫:这是对的。

安德烈耶夫:这是官僚主义的态度。你们,经济工作者们,没有利用所能利

用的这一切，而你们想用官僚主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坚信你们的情况将不会比教育人民委员部好，因为，古比雪夫同志和柯秀尔同志，你们的事情极多，有基本建设，工作多得不得了，而现在你们对付得又不那么好，可是又把教育人民委员部转交给你们了。另一方面，也不需要让高等院校和中学分割开来⁹⁶。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做。问题应该在于更好地安排我们的国民教育体系、教育人民委员部体系的学习，而经济工作者应该把这样安排创造的条件都利用起来，但是你们不要用官僚主义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用转移高等院校的办法。

第三阶段——我们的青年人从大学毕业了。培养出了年轻的专家。如果他们学习得很好，再加上另外的条件，他们应该像金子一样宝贵，而我遇到的却是令人气愤的和不像样的事实。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带着优异的成绩毕业，有的毕业生很自傲并想立即得到工业部门的领导职务，而当时他们对此并不适合。这样的人是有的。但现在我们已经拥有很多我们年轻的好专家了，我们有优等的大学毕业生，这些大学生，年轻的工程师们整月地奔波，踏破了门槛，哪儿都找不到工作。没有地方要他们。(喧嚷)

喊声：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到哪里去了？

安德烈耶夫：大家问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到哪里去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没有任何使用这些大学生的制度，在托拉斯里也没有。偶尔有这种大学生来却又拒绝接收他参加工作的情况。有许多直接侮辱这样年轻的工程师和踏破门槛等的事实。可这是宝贵的材料。这是可以融入我们的工业的宝贵材料。

喊声：而这是节约的制度。

安德烈耶夫：好一个节约的制度。我想，看情况要更加深入些。这里的问题在于新老专家干部之间在进行着斗争。而我们的经济工作者盲目地跟着老专家干部走。同志们，这是老的资产阶级专家阶层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干部的一场阶级斗争，是为了争夺我们社会主义生产领导中的垄断地位。就是这么回事。而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懂得这一点。

柯秀尔：他们对老专家们随声附和。

安德烈耶夫：现在我们应该这样做：通过在所有阶段，即在选择、学习和使用阶段更加关心年轻专家的办法来打击老专家阶层的垄断地位。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工会。我想，沙赫特案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就是应该从关于加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参与的废话和闲话转到实事中来。至今我们一直在说废话和闲话。我们曾有过良好的愿望，可至今

却毫无进展。工会除基层环节外也搞些类似生产会议的东西外,实质上并没有接近生产。而我认为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如果我们不通过我们的工会来吸引工人们参加生产,我们就不能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来实施合理化,就不能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进行基本建设。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基层环节在做些事情,讨论小事的生产会议在开着,等等,而至于工会这个链条上的其他环节,那里除了闲话和官僚主义的工作之外什么也没有做。我等会儿再谈工会在这方面是否有过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花12亿用于基本建设,而我要问:工会参加这项基本建设了吗?没有,没有参加,特别是在建设新企业方面。在从国外引进进口设备用于我们的建设这样的问题上,——工会参与了吗?没有,没有参与。在我们经济部门的计划工作中,工会也很少参与。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作为党,虽然已经做出了决定,但没有能做到使我们的工会更加接近生产。我们没有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到使工会更近地接触生产,而另一方面,在这个基础上,工会中形成了狭隘的、有局限性的专家组成的狭隘的干部力量,他们也许懂得工资制度,他们非常了解组织工作、互助金发放制度,但他们不能严肃地理解,工会——这是在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吸引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的杠杆。我想,托姆斯基应该能完全证实这一点。

而这种结果的出现,是由于至今存在着我们的经济管理干部和我们党的地方领导对工会的轻视态度:你们工会搞搞集体合同吧,别来插手经济建设,也别妨碍!就是这么回事。

我认为,沙赫特案件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样子。如果我们不使工会现在更接近生产并通过工会系统吸引工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最新的实际成绩,我们就不能检查我们搞的合理化,就不能进行基本建设,等等。这就是我想谈的有关沙赫特案件的问题。

主席:同志们,我宣布休息。米高扬同志请求通知:粮食收购委员会将于今晚10点30分开会。

第五次会议

4月9日晚间

主席(李可夫):布勃诺夫同志发言,下一个是古比雪夫同志。

布勃诺夫:沙赫特案件的意义不仅在于反革命破坏分子在顿巴斯呆了6年,而且在于他们呆到了基本建设时期。

我们现在讨论的有关沙赫特案件的一系列问题如此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因为:新的建设要求党、工会组织和经济工作者进行较高质量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关于沙赫特案件的结论应该涉及的,不仅有我们的基层经济组织,而且还有领导业务的经济机构,比如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政治局关于沙赫特案件的决议就所有的问题做出了决定。我发言是想就政治局决议文本提出一些看法。

沙赫特案件重新提出了关于工业部门的专家和党的干部的问题,在这里我想首先继续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这儿开始的有关工业部门的干部与军队指挥人员的比较。

诚然,无须在此指出,军队对自己的指挥干部开展工作所处的环境要比工业部门好得多。这里有一系列客观原因。我应该在此向你们指出军队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它关系到最近一个时期并与1924年所谓的军队改革⁹⁷有关,当时我们对自己的指挥干部进行了激进的改组。在这一改组中,我们提升到军队最关键的岗位上来的,是那些在国内战争时期受到战斗考验,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里又接触过军事科学的战斗指挥员。这使我们能够在军事部门中储备一批指挥干部,正是他们使得我们极其需要在1924年进行的这次激进改组。

如果用这一尺度去衡量工业部门,那么,不得不指出的是,目前工业部门本身的领导干部还未使工业推进到自己的1924年。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任务不会摆在工业部门的面前。这项任务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现在就应该为使我们的工业部门的人员早日完成这项任务而工作。如果我们要讨论为什么我们的工业

今日不具备这样的局面的原因,我们将要指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我们在储备工业部门领导干部方面的速度极其缓慢。

沙赫特案件具有意义正是在基本建设时期被发现的,它把为工业部门储备领导干部的问题作为最迫切的例行任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里的问题实质上有两个方面:无党派专家的使用和工业部门本身领导干部的培训、再培训。政治局决议在这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措施。我认为它只需要一些补充。我觉得需要这些补充是因为,第一,我们工业部门的企业干部的状况不利;第二,在我看来,我曾在阿尔乔莫夫斯克巡查一批工业企业时看到,在对无党派专家实行真正的技术监督方面做得不够,甚至缺乏这样的监督。我认为这是这件事上最实质性的问题中的一个,即我们有一大批监督人员注视着无党派专家,但为了让这个无党派专家得到来自我们这方面真正的懂技术内行的监督——这种监督却没有。我这儿就有一份工作简报,它几乎用10页纸罗列了⁹⁸各种委员会和个别的调查人员的姓名,这些人大约是在一年半前被派往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几家工厂的。我们看到,被派到那里的个别的调查员和一大堆委员会不多不少正好是134个。而且,要奉告总爱引用工农检查委员会是怎么说的柯秀尔同志,我可以对他说,在这134名个别的调查员中,摊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阿尔乔莫夫斯克工农检查委员会头上的有5次调查,而大量的这种调查被派到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种经济机构——托拉斯、部门等。这样,我们有一大堆调查,但请问:所有这一大堆调查能否确保实行真正的实际的监督呢?所有这一大堆调查不能确保实行真正的监督。

丘巴尔:甚至相反。

布勃诺夫:甚至相反。我同意丘巴尔同志的说法。这只能产生干扰,而且首先是干扰。我记得资本主义企业当初是怎样进行“监督”的。例如,过去,在印花布厂,如果出现废品,那么配色员、厂长、印染技师、高级化工师和高级印花工就会聚在一起,在一起相互狠批一顿——是谁的错?到最后找到了真正的罪魁祸首。这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真正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主人斥责犯错误的人。请问: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监督?没有,在我们这儿不存在这样的监督,而且我们的管理人员并非经常能掌握应有的精湛技艺去好好地“斥责”什么人,因而领导力量薄弱,甚至缺乏应有的企业或一批企业的领导(我们的领导)。而这不只是“在下面”,而且还有少许是“在上面”。

有相当多的人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玻璃瓶厂并非偶然,正如你们所知道的,

那里并非一切顺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因为没有技术上内行的监督。有什么呢?干扰,而且它所涉及的不仅是一般的管理人员,还涉及了专家们,这种干扰不只出现在监督领域,而且还出现在柯秀尔同志在这里指出的那个领域,他完全正确地讲述了有关无休止的改换计划,等等。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我不是指书面文件,我有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局交给我的一份单子,上面涂满了这样一些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东西,它们是关于无休止地改变基本建设的贷款和基本建设的方案和预算等等的。]

早在阿尔乔莫夫斯克专区巡查时,我们就看了几个新建的工程,于是我可以肯定说,几乎没有一个建设工程具备及时确定的计划和预算。我可以说出它们的名字,譬如德鲁日科夫卡的螺丝帽—螺栓车间。工程建设正接近尾声,可正如厂长对我们说的,技术方案和预算还都没有确定下来。所有这一切建设都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在“走着瞧”,在“碰运气”,就看人们是怎么想的了。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这干扰了专家和管理人员,然后,如果那里有无党派专家,特别是反革命破坏分子的话,那么,他就真要交鸿运了,他可以在这浑水中随意掩盖自己的马脚了。

同志们,我的时间到了,我要求再给我10分钟。

喊声:请。

主席:没有反对意见?通过。

布勃诺夫:我认为这个问题与建立真正的监督和领导有关,而且这不只是要厂长们和托拉斯的代表们担负起重大的任务来,而且整个工业部门的管理体制都要对此承担一定的责任。那是怎么回事呢?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领导业务的管理工作者们要放弃这些对工厂的“袭击”。

我与一些厂长交谈过,并看到他们是反对经济部门工作者的这种“袭击”的,这些管理人员迅速地“跑遍”全厂,如果要求,可以做出一大堆承诺等。在我们的经济建设的目前阶段,靠这些是什么事都做不成的。

我们需要采用这样一种制度,如果一个人去工厂,他就应该了解工厂,为的不是使工厂受到“袭击”,而是使它得到真正“内行的检查”。我认为,要督促厂长和托拉斯的负责人,但我们也要打起点精神来,因为这是我们当前共同的任务。而且沙赫特案件再明白不过地再次证实了这一任务尤为迫切。

现在来谈有关这个任务的第二部分——关于为工业部门培养新干部的问题。政治局决议就此问题说得非常清楚。我认为只需稍加补充。我的看法是,这里不妨也可以采用军事部门的一些经验。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这儿说,能否把

学习和工作统一起来。我觉得完全可以,只要善于这样去做。为什么军事部门的军长在不间断当军长的同时,有可能在莫斯科通过10周的高级指挥人员的专业课培训?为什么不能为工业部门的领导干部组织这样的培训?我认为这完全是可能的,是需要的,也是有益的。军长在军里留了一名助手作为他的副手——就是这么回事,我不认为如果厂长去莫斯科学习10—15周,厂里在这段时间里会发生惊天动地的事情。

喊声:那在战时您允许去学习吗?

布勃诺夫:别这样说,同志们,现在我们这儿完全不是战争时期。(喧嚷,听不清插话。)

喂,你们知道,难道我们因为有一帮给我们搞反革命的专家,我们就会认为现在我们这儿是战争时期,这是行不通的。这将会不折不扣地引起惊慌。

其次,我认为,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这里争论是徒劳无益的,工业部门在对待本部门的干部方面应该走的那条路,是关系到一部分高等院校的移交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整个培训制度。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做?为什么军事部门要自己开设所有的学校?而且我们的学校并不比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逊色。

法布里齐乌斯:比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要好。

喊声:对。

布勃诺夫:从教学法的安排上说,我肯定我们的一大批学校不亚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学校,而是比它们强。为什么呢,试问,如果我们把一部分高等技术院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就应付不了吗?我完全不明白,这里有哪些原因会干扰。已经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了工业研究院呀。我认为,在如何对整个指挥班子进行考评方面,也可以采用军队的经验,这样就可以完全准确地从质量上考虑整个指挥班子并解决好他们的升职问题。

李可夫:不要脱离群众,对着扩音器说话。

喊声:请,请。

布勃诺夫: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工业部门采用这种办法?它极其有用,因为简化了基层干部的提拔以及重新培训的问题等。

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这里发牢骚说,管理人员的业务工作不是他们的基本工作,说他们被社会工作、党的工作以及工会工作等压垮了。这不只是关系到管理人员的不幸,这是涉及所有人的不幸。在军队里我们也同样听到了怨言。所以,不能从这里专门为管理人员得出任何结论。

同志们,我想扼要地谈一下第二组问题,它们关系到:沙赫特案件提出的不

仅是专家和培训工业部门干部的问题、改变经济工作的方法和消除工业管理上的某些缺点的问题。沙赫特案件还迫使我们注意地方上党的领导问题。谢苗·施瓦尔茨在这里引用了我的话。他在会下也“怂恿”我同他结成统一战线。我应该承认,我本想捍卫矿工的,可听了施瓦尔茨同志的话之后,我不能这么做了,因为这席话充满了本位主义色彩,而如果在这里,在中央全会上,我们将为像沙赫特案件这样的案子搞部门间的拳打脚踢,我们将寸步难行。所以,我不能支持C.施瓦茨并拒绝与他结成统一战线。(笑声)

我应该在这儿强调的是,我在巡查阿尔乔莫夫斯克专区的组织时,对党的工作考察使我坚信一点,那就是中央委员会就阿尔乔莫夫斯克专区委员会的报告做出的决议的调子有点软,应该在这儿大大加重色彩。这是因为我与中央委员会责任监察员梅什金同志一起进行了巡察——我们去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罗夫斯克厂、戈尔洛夫卡,并在所有的地方召集了党的会议——亲自弄清的东西使我确信,那里的情况更糟。主要的问题在于“高层”领导缺乏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团结,而搞起了小团体,到了掩盖比亚罗修克事件⁹⁹规模还要大得多的丑闻的地步。乌克兰中央监察委员会完全公正地对这种现象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已经在《真理报》上摘要发表了我关于阿尔乔莫夫斯克专区委员会报告的部分内容,不想再重复了。我认为有必要的只是从普通共产党员的发言中引用两句不长的话。例如,来自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普利瓦辛同志的发言。他说:“我们在地下呆了4年。”那么,我要问你们,如果党组织感到自己是呆在地下的话,它的领导意义何在?它在工人中间开展群众工作的意义何在?它在提高群众对专家的警惕性方面的意义何在?说这些话的是优秀的党员,而不是一些坏小子。

戈洛谢金:有哪些事实证明他们是呆在地下的?

布勃诺夫:要多少事实就有多少。如在康斯坦丁诺夫斯克,康斯坦丁诺夫斯克厂长和康斯坦丁诺夫斯克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对基层组织说:“嘘,不关你的事,这些我们都知道”,就这样一面堵住党组织的嘴,一面自己掌管着一切。而当组织做出关于解除他们职务的决定时,有阿尔乔莫夫斯克专区委员会书记作“靠山”的德鲁日科夫卡组织的书记就出来支持他们。扎东斯基同志在这儿坐着,你们问问他关于他们(乌克兰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康斯坦丁诺夫斯克两个人”做出的那个决定吧。我们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调查员文件中看到,这些人犯了刑事罪。那里就是这种情况。

然后,另一个发言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组织这样说:“我们怀疑通过这条线

(阿尔乔莫夫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的党的积极分子这条线)是不是能直接和乌共(布)中央通上气,一切是否会变成解不开的死疙瘩。”这就是在阿尔乔莫夫斯克专区委员会存在的那种党的制度下这些人产生的想法。而这些想法——要知道这是能想象得出来的最有害的想法。在这里到底谁错了?——错的是阿尔乔莫夫卡的党的领导。

我用了一个小小的调查材料来结束我的发言,我认为自己有义务这样做。当我在阿尔乔莫夫斯克时,我同一些来自沙赫特区的管理人员谈过话。他们给我指出,在《真理报》上曾经登过一篇介绍一位管理工人活动的短文。我应该在这儿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想战胜破坏活动的话,我们不仅需要树立群众对无党派专家的警惕性,而且我们还需要围绕这些人的工作创造相应的气氛。而《真理报》的短文要达到的却是相反的目的。这篇短文刊登在1925年10月27日的《真理报》第246期上,题目是:《辜负了工人们的期望》。在这篇报道中,作者是这样开始的:“从工人中任命管理员来取代老工程师管理员,工人们感到高兴。”然后,文章又接着写道,这位新管理员到任后是怎样开始安插自己的朋友,置了辆不错的敞篷轻便四轮马车和马,在门旁安排了一个特别秘书,然后赶走了负责物资部门的工程师并安插了来自矿业局的自己人等。这篇报道是这样结束的:“这就是来自工人的专家,——失望的工人们说,在置马、轻便马车方面和各种管事的人方面,原来的工程师专家要节省得多。”接着又说:“所有的工人们都很吃惊,这是怎么回事,自己的工人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我觉得这篇报道除了害处不能带来什么别的,依我看,这篇短文并不是工人记者所写,而是由工程师们安排的人所为。不过,也没有必要去刊登它。

主席:由古比雪夫同志发言。

喊声:给他一小时。

主席:古比雪夫同志并不要求这么多,按我的实际做法,很少给多于本人要求的时间。他要求半小时。

喊声:给。

古比雪夫:同志们,沙赫特案件暴露出我们所有的组织的工作中存在重大缺点。在6至7年的时间里,不仅抱着破坏经济目的的反革命分子能够在我们的工业肌体内部工作,而且他们实质上在实际管理着这些生产,不管这些反革命分子带来的灾难有多大,这个事实本身迫使我们考虑我们所有与生产有关的工作中的众多问题。这个过程将表明,这些破坏分子的破坏能量有多大;但是,假如甚至发现这种危害不是特别重大,但如果真的爆发了战争,如果我们的

阶级敌人实现了武装干涉的阴谋,那么可以想象,我们在那种情况下会处在什么样的境地!要知道使整个顿巴斯瘫痪对于这个组织来说完全足矣。而且看来他们非常坚决和明确地有了这样的任务,就像其原来的主子下达的严格指示一样。要好好地 and 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个组织和这个组织中的人怎么会不但没有被揭穿,而且对生产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有时还是决定性的影响。由于时间不多,我将不涉及关于必须改变党和工会组织工作的方法和形式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前面发言的人都讲到了,李可夫同志对此也有详尽的发言。我想谈谈由于沙赫特案件暴露出来的有关工业和经济领域的组织问题。

第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已经提出,这是关于经济部门的领导人,我们的共产党人管理人员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不能发现这个弱点,为什么他们让破坏分子能够对这个或那个经济机关有了决定性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这里已经谈了许多,总的来说,政治局的提纲以及在这里的发言都一致确认了导致这一痛心的事实的那些基本原因。我来归纳一下这些基本原因。首先,我认为,需要讨论决议,在这里的全会上,我们把它看成所有的管理人员的思考和对生产技术的态度有了某种进步。我说,必须铲除决议中正确指出的“劣性的政委主事现象”。应该由领会和掌握整个生产的技术生产过程来取代这种“劣性的政委主事现象”。企业经理,托拉斯董事长应该是企业的主人,这不仅是指他有权作指示或者下这样或那样的命令,而且还指他一切在行,他通晓一切,熟悉他那里生产上发生的整个基本过程,他对工人们在生产会议上提出的或来自某个技术员或工程师的任何建议并不感到陌生。在最近我们得到的悲痛教训之后,对厂长和管理人员们、托拉斯董事长们提出的方针无论如何应该有这样的转变。

到目前为止,情况怎么样?我想如果我们夸大事实,说我们所有的厂长、所有的工厂管理人员都是劣性的政委,那是错误的,是错误的,我认为,是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的。在这方面必须敲打,必须猛烈敲打。只有通过这种狠狠的敲打,我们才能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转过弯来,也就是说重新武装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头脑。但不能说,不好的政委或者坏典型的政委是我们整个工业部门的普遍现象,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公正的。每一个与经营有关的人,不管他是在工业部门工作,还是在某个与生产有关的其他组织工作,都会说,我们有一系列企业,厂长、厂里的主管是直接意义上的事业的灵魂,他了解每一个车床,了解整个生产过程,了解这个工厂的发展规划,他考虑过并感受到了这个企业的全部需要,他在任何时刻都能说出,什么事使他头痛,应该如何纠正;他不仅善于从总体上掌握

整个企业,而且善于让企业的整个工作人员集体按照他的意愿和指示工作。如果认为没有这些干部我们能这么迅速地发展我们的生产,这样的想法是可笑的。在发展的领域里,我们不只是在数量上以任何国家都达不到的速度前进,看来,这种速度甚至在任何时期、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而且我们是在建立新的生产。当然,专家们在这中间有很大的功劳,但是建立了这种新的生产的企业中的领导人也投入了很多创意、精力和劳动。

因此,我将向中央委员会全会提出建议,把这里提出的建议写成这样,使大家不要有这样的印象,即中央全会在分析工业部门局势之后,因这个沙赫特案件得出关于整个工业部门的指挥人员都成了劣性政委的结论。我认为,这不仅是不正确和不公正的(这还只是小事,有时候若是不公正能得到某种正面的结果,这种不公正还可以被允许),我想,这将不只是不正确和不公正,而且这将是有害的,因为当我们不善于分清好坏,当我们只是用一种色彩、只用黑色开始粉刷一切的时候,那么,要得到某些结果的创意、精力和愿望——这一切一定会消失了,这样,我们就不是在鼓励最好的典范了。所以,我想,必须承认这一痛心的事实,即我们这里存在着经常发生的、普遍的现象——某个机构的领导人不过是劣性的政委,但同时我们还应该说,党在选择工业部门的干部的工作中是取得了重大成绩的。在这方面我不完全同意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这里对工业部门下部所做的发言。当然,不能说我们这儿一切都好。情况非常不好。我们很多极其重要的企业缺乏能够称职地领导这些企业的人。选拔工作做得不好,提拔工人的工作做得不好——所有这一切是对的,可是党把自己最优秀的干部派到管理和生产岗位,特别是派到托拉斯和企业,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要知道,在有这些大型企业的所有地方,领导者—管理者在党组织里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有时正是因为)他是工厂的管理者或者厂长,而且还因为与党组织的其他成员相比,他更为成熟,有着更多的党龄,经历过国内战争,并在经济战线的斗争中受到过锻炼,等等。例如,列宁格勒有领导企业和托拉斯的中央委员。他们不是因为托拉斯董事长或者厂长才当上中央委员的。因为他们是中央委员,是这个或那个党组织中最优秀的代表,是党决定把他们推举到我国建设的最关键的部门,他们才当上托拉斯董事长或厂长的。其他党组织的情况也一样。每当我或者我们,工业部门的代表们,一起就分配工作人员问题争论时,每当我们需要增加新生力量时,我们就总是被告知说,你们有许多人了,许多比其他工作部门更优秀的人才。难道说党向工业部门派遣最优秀的党的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的巨大工作还没有带来实质性的结果吗?它已经有了众所周知的结果。我们

已经练就了一批干部,当然,他们还需得到进一步的锻炼。

在这里工作的余地是极大的。我们越是成长,越来越多的新任务就会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领导经济就越会更加坚持不懈地需要得到新的力量。

有人在这里说得对,除了许多经济工作人员对待生产的这种不正确的观点外,还有一系列外来的因素在干扰着对生产的领导,这就是经常性的干扰、群众性的调查、不断的报告和去请示中央,等等,结果使得他们只留下少得可怜的时间来管理生产,履行直接的职责。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得绝对正确,我认为他最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是的,这是可怕的灾难。只是同志们别以为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会很简单和容易,而且自然也不能要求安德烈耶夫同志或要求现在我在这个讲台上就能找到摆脱这一恶果的办法。如果我将点名说出那些总在干涉管理人员活动的机构的话,那你们会承认每个机构都有权这样做。

丘巴尔:在多大程度上?

古比雪夫:说的就是在多大程度上,用什么样的方法,单独地还是大家一起,总之,这需要妥善考虑。比如工农检查委员会给某个工厂派一个调查组。它很有用,可以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结果。但是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某个部门有这种财政监督权。当事情涉及使用财政手段的那些情况时,财政人民委员部也有调查的权力。当然,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也并非经常协调自己的调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不是没有错误的。这里有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省国民经济部门、托拉斯、总管理委员会,有时还有这些或那些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职能局。不无错误的还有工会组织,它们也有权对这些或那些企业进行调查。例如,南方钢铁公司的一个工厂现在由工会对提拔干部的制度、生产委员会和生产会议工作进行调查。但仅为了调查这一个领域,也必须涉及更广泛得多的问题,涉及工厂的所有部门。这里需要了解企业的活动是否符合给它下达的指示,也就是说要询问厂长,而当他作答后,要检查这些或那些生产会议的决定是否都付诸了实施,等等。通常是这个或那个调查必然会引起一些新的调查。

当这个或那个机关发现这家工厂工作中的不足,而工厂却对此进行争辩时,你们不能剥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再派出调查组以便进一步检查谁是谁非的权利,等等,等等。总之,这里需要制定、考虑和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当涉及我们现有的一切部门。但是,柯秀尔同志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及时制订计划是各企业较为平静地开展工作的以及使专家们特别是使领导者—管理者们能够集中精力从事生产工作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和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及

时的、固定的、经过批准了的计划,那么一切就会大大地改变。那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进行多方调查的必要了。如果拥有一个及时的计划、一个固定的计划,那么能更容易地追究这个管理人员的责任,因为不需要去弄清一大堆并非因为管理人员的错而发生的情况。这里不会有人顶嘴,说什么没有及时拿出资金来,什么计划改变了,什么他是这样建议的,可结果却相反,什么他预定了进口设备,认为会给他多少贷款,可他却没有拿到,等等,等等。企业将更加明确地工作,而进行经常性调查的胃口将会变小。还需要注意到领导人的迅速更迭。

所有这些生产条件的确往往是由于许多工业机关的领导人,至少是水平不高的政委而提出来的。必须消除这些条件。我认为,我们将在这里,在中央全会上通过的那个东西,仅仅是解决这一大堆问题的开端,我们采用这种办法只是在提出问题。工作是今后要做的。中央政治局也必须抓紧处理这个问题。

有关专家的问题。我想,许多人有点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他们一方面认为我们把自己出卖给了外国资本的敌人,幻想复辟资本主义旧制度的老雇主,而另一方面我们有忠于苏维埃事业的专家。事实上情况更为复杂。在我们的专家中间存在着许多阶层,这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的。除了忠于苏维埃事业的专家外,还有只不过是勤恳工作和履行自己的职责的人。有着一大批专家和工程师阶层,从他们不参加任何组织这个含义上来说,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但他们工作起来官架子十足,是因为受雇于苏维埃政权而工作的。我们必须看到所有这些阶层,对专家们采取这样的政策,不仅要让他们工作,已经不仅是说要他们不要危害事业,要他们工作起来不要官架子十足,而是应该让他们能适合我们工业部门发展的速度,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让他们对交给他们的事情负责。李可夫同志在报告中说到政治局建议全会取消关于专家问题的第33号命令时,他是失言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中谈到关于取消附加在第33号命令上的标准条款的必要性。

我想提及这个问题是因为由捷尔任斯基同志签署的第33号命令在组织生产秩序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第33号令是于1926年初,也就是两年前公布的。这一命令是确定专家们的权利和义务这项工作中的转折点。在公布这一命令之前,这方面的情况糟糕透顶。专家们愿意把自己看做是不担责任的顾问。这对专家们来说是最为有利的立场。他对什么都不承担责任,他甚至不指望得到发号施令的职能,他只是提供咨询,提出建议,而至于事情如何发展,这已不关他的事了,他并不对此负责。第33号令在当时是绝对正确的,其意义在于它为每一位专家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明确的义务,从而使这位专家要对该企业

某种职能负责。的确,在没有领导,没有来自共产党员—管理者的正确领导的情况下,第33号令可能会被完全错误地运用,可能会被用作是使专家们获取权力以图搞破坏活动,以图使企业朝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工程师所设想的方向发展。但这已是工厂管理层的共产党方面的领导,该工厂管理层的厂长的不足了。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条命令中绝不是想使企业分权,他说:“所采取的措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破坏各机构管理层的团结,托拉斯组成中的机构的管理《条例》仍然有效,其中包括它有关建立机构管理者(厂长)的一长制领导的内容。这不排除与相应的行政—技术班子的工作人员就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最密切的联系和共同讨论的必要性”。

这样,第33号令没有废除企业领导人一人的权力,它是让技术班子担负起了义务和责任。在这条命令附加的示范条例中有为了制造转机的条款,它们在当时是正确的,而在现时它们又是不正确的了。在第33号令附加的这个规范条例中,首先有一条规定了由托拉斯而不是由企业领导来任命技术经理;其二,技术经理对技术班子领导人的任命、罢免和调动要经经理批准。这是为了我谈到的要使专家对他所做的负责的这个转变所需要的。我想,现在,既然我们工业部门的共产党员干部们已经成长起来,既然一大批企业,大部分企业已经有了掌握并且今后会越来越多地掌握生产过程的经理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1927年春天做出的决议是正确的,这个决议规定,技术经理以及销售经理由企业领导人任命,整个技术班子也由他来选拔,但自然要考虑技术班子的意见。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这一决定是符合中央政治局就此问题规定的方针的。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关于托拉斯的条例,该条例后来完成了法律程序,其中这一条款也得到了反映,即企业的技术经理和所有其他技术人员一样,由工厂管理者、厂长任命。在这个法令的基础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公布了关于技术经理的规范条例。要由你们通过的决议提出的建议是,这个规范条例要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实施。糟糕的正是,关于托拉斯的条例和这个规范条例至今并不是到处都实行了。而且这里要直截了当地说,关于托拉斯的条例不仅是在任命技术经理和指挥企业的全体技术人员这一点上没有得到实施,而且在使轻重工业的工厂和企业从最高工业部门——托拉斯、总管理委员会等的监护下解脱出来这一点上也没有得到实施。我们有典型的托拉斯,它们实施了这个托拉斯条例,并通过实施使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工厂获得了新生,工厂有了可能更广泛地利用一切自身的内部手段和条件。工厂在摆脱托拉斯制度的过多集中之后站立起来了。但是远非各地都做到了这一点。

同志们,从到目前为止的争论中可以看出,管理者与专家们之间到处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即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去向管理者们灌输专家们如何重要、得到他们支持如何必要和在该企业、该工厂的技术设备更新中依靠他们是如何必要了。〔遗憾的是我们的国家太大了。

臧声:为什么遗憾?(会场一片嘈杂声,讲话声,骚动)

古比雪夫:遗憾的是,我们有太多的各种各样的地区。你们当然不要这样来理解我,好像我在为我国的强盛感到遗憾。]

我国各地的情况多种多样,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到处都用一种方式来衡量。例如,许多地方都有这样一种情况,沙赫特案件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到处都是简单地套用专家们所有的方案和对他们盲目崇拜。〔但是否能下结论说我们大家都明白了专家的含义呢?〕现在我手头上有一大堆材料,它们说明在我们一系列企业的管理者中,企业的领导者中,还没有根除真正敌视非党专家的态度。

如《劳动报》刊登了一篇本报驻彼尔姆的记者的报道,他写道:“臭名昭著的来自工人的敌视非党专家的态度已成过去,然而现在在佩尔姆专区的各企业里,把专家们从企业的行政部门赶走成了普遍的现象。

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

1)在丘索夫斯克厂,对专家们表现出粗暴要求的新厂长上任后,在两个月内有4位工程师被迫离厂了。

2)在雷西瓦厂,工厂领导人在有证书的专家们中推行强硬的行政路线,以故作大度的态度对待实际工作人员。结果发生了‘逃离工厂’、罢免等事。不久前轧钢车间主任被罢免了。

对待专家们的不信任是‘敌视非党专家的态度’的另一种形式。在内特瓦,经理处不信任专家们(技术领导),秘密地搞了4夜没有废料的轧制试验,其结果十分可悲。

对经理在技术上的无知感到气愤的工人们向工程师们抱怨。专家们强烈反对这样的行动方式,他们中有工厂极其需要的5个人离开了岗位。

工厂的行政领导以自己的行动造成了专家们的低落情绪并使他们焦躁不安。有时行政领导公开采用排挤的办法,辞退专业很窄的专家和专家—社会活动家(在雷西瓦和切尔马兹解雇了2名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处处长)。”

我不准备念整篇报道文章。这里还描述了一系列情况,它们说明并非所有的企业领导人都理解了必须依靠敬业的专家们去解决技术问题。在很多其他地区,其他工厂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同志们,我想请大家允许我只就一个问题,即关于高等技术院校的问题发言。遗憾的是,我的时间已经用完。

斯克雷普尼克:那是没有指望的事。

古比雪夫:斯克雷普尼克同志说那是没有指望的事,可我还是冒昧地再就高等院校这个问题说几句。

米高扬:说吧,我们支持你。对。

古比雪夫:关于青年专家们的问题已经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决议中被非常正确地提了出来。这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们,企业家们,应该对至今我们不十分善于使用青年专家们的错误承担大部分责任……

斯克雷普尼克:完全不会使用。

古比雪夫:那他们该怎样逐渐成为我们的依靠力量呢。我不准备列举减轻罪责的事例,比如培训并不总是合适,他们有时提出诸如把他们安置到重要的行政管理岗位上等过分的要求。然而,这些减轻罪责的情况已经不能消除我们还十分善于使用青年专家们的责任,尽管有些企业和托拉斯在这方面处理得不错。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来处理这些问题。关于通过这一渠道、通过锻炼新的干部来补充我们企业的专家这个问题是最为重要的、最能带来重大结果的问题。对于锻炼新的专家们这一问题应给予最大的关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这样重视高等技术院校的问题的原因。

同志们,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特别是我,对此问题一直是采取了温和的立场。

斯克雷普尼克:至今?

古比雪夫:是的,至今。我们没有要求把高等技术院校转到我们手里。我们试图与人民教育的有关部门进行协调,但是实践、生活和工业部门的要求使我个人最终得出了结论,当年提出这个问题的捷尔任斯基同志是绝对正确的。

米高扬:对。

斯克雷普尼克:他拒绝了这一点。

古比雪夫:他拒绝这一点是因为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同意这一建议。

斯克雷普尼克:当他拒绝时,他做对了。

扎东斯基:那么,农业高等学院归农业人民委员部管辖,医学院归卫生人民委员部管辖吗?

古比雪夫: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它引起了反对意见……

扎东斯基:我只是问问。

古比雪夫:不过,请允许我先对我的立场加以论证,然后你们再提问题。

我认为,党中央现在应该承认,生活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正是在于要最大限度地使高等技术院校向工业部门靠拢,要把一些涉及工业最要害的领域的高校交给工业部门来管理。于是反对意见就开始出现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本来的职务就够多的了(如安德烈耶夫同志说的完全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这些职务履行得不够好。可是我本可以以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职务整体上也已够多了这句话为托词,拒绝这个论据(笑声),而且已经不能再说,面对必须承担的所有其他职责,教育人民委员部对高等技术院校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和有所偏袒的重视。有人议论过为什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能更好地领导这些高等院校。我事先就要否定这个论据,并且以后也不会接受,因为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有得天独厚的个人条件来顺利地进行领导工作,他更了解文化问题,这些问题他已经处理了10年,等等。可是同志们,问题并不在于人,问题不在于古比雪夫、柯秀尔或者鲁希莫维奇主管这项工作,事情就能办得更好一些。事情办得更好是因为自高等技术教育成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核心工作以来,这方面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和彻底的变化。

喊声:钱包更鼓了。

古比雪夫:可以在任何组织模式下工作,可以在高等院校处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里的情况下工作。[当然,不会因此发生意外的灾祸。]但我们关心的是以最高的速度发展工业,我们关心的是以最快的速度为工业部门配备相应的专家。瞧,你们自己可以判断一下,只要是从整体上领导工业的部门同时也将领导培训专家的干部队伍工作,所有这些现在让高等技术院校头痛的问题都会极为简单和轻而易举地迎刃而解。我们开始来分阶段进行。挑选大学生的权力掌握在党和工会的手里。但十分明显的是,这些高等院校所在的部门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十分清楚的是,与该院校的活动和活动的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更关心的是,与企业有关系的工人和工人子弟们能优先进入高等院校,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本已具有一定的能力,使得他们在今后能较为顺利地领导这个企业。在选拔方面,我们可以比教育人民委员部做得更多。

下一个阶段是教学大纲。比起教育人民委员部来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将能更轻而易举地把高等院校的教学大纲与生产的需要结合起来,因为我们直接能经常感受到来自工业部门的压力。这些部门会对专家的类型、对这位专家的培训情况以及对他总体上掌握的实际知识等表示不满意。教育人民委员部是旁观者。所以,我们能掌握人们对这位专家素质的直接反应,就有可能整顿这个

高校的工作、修改大纲、增加或减少实践课,增加或减少这些或那些专业课等。

分配大学生们上实践课,现在可总是要吵架的,即使领导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天使,这种吵架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分配[这些专家们]大学实习生?即使我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有互相协商解决所有问题最美好的愿望,这种没完没了的协商之后,我们最终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地分配大学生去实习。只有当分配这些大学生的部门、使用部门将成为统一的部门时,只有那时,这个实习体制才会真正拥有它在锻炼相应的工业干部这项工作中应占有的地位。

最后是对从高等技术院校毕业的专家们的分配。我们能够做到(并非是因为我们比卢那察尔斯基工作得更出色,而是因为我们更加得心应手和容易一些)向有关的企业输送它们所需的专家们。我们能够做到让所有的学校服从于生产需要和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

斯克雷普尼克:那么现在有什么妨碍呢?

古比雪夫:现在有什么妨碍?现在的妨碍是在这样提出问题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无聊的麻烦事。同志们,我们在红军里有非常好的经验。红军的指挥人员……

斯克雷普尼克:这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不是一回事!

古比雪夫:我经历过红军掌握的学校的学习生活。我认为这种经验绝对可以无可争辩地证明,领导各种事务的部门是能够更轻松和更好地领导为该部门的需要提供服务的全部院校的。

最后我想说明一点。我只要一分钟。中央政治局建议的这个决议已大大地超出了沙赫特案件的范围。它给一系列与工业有关的组织提供了很多方针。这个决议在许多方面将被视做是一种转折。在专家问题上,在管理者方面,这里都有许多新的东西:管理者应该领导专家的工作,另一方面,管理者和专家都应该处于工人群众的集体监督之下,等等。这项决议将被看做是企业 and 工厂中的所有组织的一种行动纲领。所以,许多组织将很乐意把这项包含了所有问题的决议看做是取消了党迄今为止发布的一系列命令的决议。我很担心,由于关于工厂纪律的必要性的条款,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性的条款在这项决议中表述得不够清楚,这样,这项决议可不要被解释成,自中央通过决议之时起,党关于劳动纪律的必要性、党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性的指令——所有这些指令就都被取消了。我认为在显然即将选出的有关委员会里,最好将关于劳动纪律必要性和关于企业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款更清楚地表述出来并更着重地

提出。

喊声：休息。

主席：同志们，你们想现在休息还是在卡冈诺维奇同志发言之后休息？谁同意现在休息？少数。卡冈诺维奇现在发言。

卡冈诺维奇要求40分钟。（嘈杂声）

喊声：同意。

主席：谁反对？一致通过。40分钟。

卡冈诺维奇：对我们全党来说，沙赫特案件的教训之大，以致如果我们不是对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做完全明确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分析，而是进行“本位主义的”争论，在各组织之间推诿责任、引用所谓的“客观条件”作为借口的话，就是最为有害和最为危险的了。

况且党的工作者不能摆出这种姿态，因为党领导着国内全部的国家和经济生活，并非常自然地要对所有领域，特别是工人问题的群众工作中的一切不足与错误负责。

假如我们，地方党组织的代表们，特别是处于发生了这个事件的（与北高加索相邻的）领土上的乌克兰地方党组织，如果试图用关于沙赫特这一事件的全联盟意义的决议的提法遮掩，不揭开在我们乌克兰这里暴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的话，那也是有害的。

还在沙赫特案件之前，党揭露了在阿尔乔莫夫斯克和斯大林诺组织阻碍开展无产阶级的和党的自身活动的弱点。¹⁰⁰ 这些组织基本上仍然是健康的、非常好的无产阶级组织，但是这些组织所暴露和揭露出的主要不足、主要毛病就在于“自己”人的不大的领导小组的闭关自守。他们挑选各项工作的负责人考虑的是方便与否和能不能得到集团裙带关系支持。

这个小组成员中有一部分人彻底腐化堕落了，还有一部分人由于这种任人唯亲和“官官相护”的兆头只是在掩盖其他人的腐化和有害的工作。

奥尔忠尼启则：这就是腐化。

卡冈诺维奇：是的，这就是腐化。

他们都是在掩盖隐藏在个别基层组织、个别工作领域中的不善工作、工作不好的现象和缺点，并且庇护那些无用的和腐化的人。

同志们，这些组织所暴露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无疑是典型的党的工作中和对待群众中的命令主义，要是我说的话，现在存在着搬用政治处工作作风的倾向，在目前的条件下是无论如何不能容许的。

在顿巴斯党组织的工作中依然保留着采用政治部工作作风的方法的痕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它所处的独特条件有关。

当然，不能说在这些组织的工作中没有任何好的东西。只要想起没有一个州、没有一个工业部门在国内战争中遭受过顿巴斯的冶金和煤炭部门所遭受的那种破坏就足够了。

现在顿巴斯得到了恢复，譬如，1927—1928年它的煤炭总开采量大约比战前提高了10%。很明显，顿巴斯是通过党组织、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努力得以恢复的。但这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掩盖已经暴露的那些触目惊心的缺点。

不久前我们这儿来了一位毕业于军事学院的红军指挥员——苏霍鲁科夫同志，他本人曾经是顿巴斯的工人。在他去顿巴斯之前，我请他同他所认识的、曾一起战斗过的工人们聊一聊，亲自和非正式地把和他们的谈话记录下来并把谈话记录寄给我。苏霍鲁科夫同志完成了我的请求。

我认为他收集的材料是特别珍贵的，因为这并不是什么时事述评，不是一个工人同行政人员的谈话，而是同曾与自己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谈话。我们当然尽量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使用这个材料。

例如，一位1917年入党的人对他说（我引用谈话中的一些内容）：“我同阿谀奉承、经营不善和无秩序现象积极进行斗争已有数年了……我到处去说，去批评，我讲得太尖锐，在这方面触犯了行政领导、矿山委员会和局里的许多人。1926年前我被提升，得到了120卢布，而后来被降至45卢布。

我在生产会议上所说的揭露了行政领导的无秩序和缺乏远见的问题，我是对的。

矿山委员会和局里的成员们不下到煤矿来，不与工人们保持联系，呆在小圈子里闭关自守……工人们议论他们，说他们在旁边走过时只是‘兜个圈子’，只求不遇见工人的目光。

我在煤矿工作了30年，参加工人运动也有这么多年了，在前线呆了3年，而现在我处在了十字路口。而且并不是我一个人，我们中有许多人。我不知道：是交掉党证，离开政治生活，还是暂停同缺点的积极斗争，稍加等待，看看以后将会怎么样”。

当然，这个党员工人提出交出自己的党证和离开政治生活的问题是做得不对，这是颓废心理，不能以他为榜样，但这个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然不是整个顿巴斯而是顿巴斯的一些地方的真实情况。从沙赫特案件得出的决定性结论之一应该是，我们要朝着更接近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党员的方向加强群众工

作,不仅要认真听取他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呼声,实际帮助每一个人克服束缚他的缺点,而且还要对他就我国建设的普遍问题提出的意见给予落实。

毫无疑问,我们在群众工作方面的任务十分复杂。不能认为“克敌制胜如探囊取物”,这些问题会轻而易举地得以解决。这里提出了一系列物质上的问题,要一下子解决是非常困难的。

凡是在顿巴斯呆过的人都知道,那里工人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工资低,有可怕的住宅危机、非常落后的文化生活。

举个例子吧,有个工人,是采煤工,党员,他就物质条件和工作日问题对那位苏霍鲁科夫同志说:“我们在井底开凿每天不少于10小时,每月工作23—25天……我们这些该死的要干到晚上五六点钟……列车经常不够,有时要枉然地坐等二三小时”。

对于“为什么你们在井底要呆10小时?”的问题回答道:“如果限制在6个小时,那么,按现有的计件工资额你会饿死”。

我完全同意我们必须马上开始实行地下工作6小时工作日,并把这项工作与在劳动机械化方面实施新措施结合起来。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住宅条件也非常艰苦,并非所有的工人集体宿舍都有起码的方便设备。或者我们再来看看澡堂。不仅是公共澡堂,而且还有工人们离开矿井时必需使用的所谓专用澡堂,数量实在太少。在顿巴斯对澡堂的需求极大,原本根据合同必须在一年之内拨款120万卢布来盖澡堂,而实际上在这上面仅花费了30%的钱。

我们在对顿巴斯的革命无产者开展文化服务方面做得很少,这也是我们许多缺点中的一个。建好了几个文化宫,可是在开展服务方面它们还做得非常少。

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要真正从物质上舍得拿出少许钱来改善顿涅茨克工人的生活条件。顿涅茨克无产者应该得到这些。

我们的群众工作中的各种复杂情况也有些是由工人们的情绪决定的。如果谈及关于工人们的情绪问题,那我应该不加任何粉饰地说,在许多地方,工人们的情绪并不特别出色。

由于时间不多,我认为必须谈一下引起上述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们不久前开展了重新签订集体合同¹⁰¹和修改生产定额的运动。

我认为我们所犯的重大错误在于,我们在搞集体合同运动的同时又在修改生产定额。

我们不是在具体统计真正现实的可能性的基础上,逐渐从一个车间转到另

一个车间,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地修改生产定额,而是不得不通过搞运动的办法做这项工作,往往是机械地、笼统地、一窝蜂地搞,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鲁莽的错误和缺点。在许多大型工厂的车间里,我们现在(的工资——译者注)有一些减少。当然,这种工资减少的情况将只会出现在头几个月里,因为以后工人将能适应新的定额,结果是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重新拿到自己原有的工资。但是,暂时在几种类型的工人中,工资减少10—20卢布,个别情况减少30卢布。

我们应该更为严肃地吸取柳别尔齐的教训¹⁰²。

我谈到我们的群众工作的困难并非是为了散布灰心丧气的情绪,而是为了使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以相应的努力去克服它们。所有这些困难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方面,我们有许多真正客观上的困难,它们很难消除,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困难和缺点是完全可以消除的,我们也应该全力以赴地去消除它们。

伏罗希洛夫:那过去是谁妨碍了消除这些困难和缺点?

卡冈诺维奇:一部分是由于疏忽、对基层环节的不够重视,当然还有一部分是一些总的条件妨碍了我们。

我们应该在这里指出的是,总的来说,这些年来同反对派的斗争给我们的工作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个斗争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保障党的团结一致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政治视角出发,对待选拔人才、选拔工作人员的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忽略了这位或那位工作人员纯粹业务上的品质。

我还应该指出,这里在一定程度上还应该加上纯粹乌克兰当地的条件。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列举所有这些当地的条件和与其有关的不足了。

奥尔忠尼启则:我们知道这些情况。

卡冈诺维奇:是的,你们知道这些情况。我只说一点,国内战争、经济破坏给我们留下了占地为王分子、匪帮头子、散兵游勇的头目这样的成分,那些想要画地为牢的人,总是由个别权威人士抛头露面,把整个组织都遮掩了。

好些年来,我们都在根除这些来自这个或那个组织的病态现象。人们可以说这太慢了,人们可以说,这太迟了。我不想争论。

什基里亚托夫:要是能快一点,就更好了。

卡冈诺维奇:越快就会越好。这是对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来安排即将举行的选举运动——改选党支部委员会,

改造基层工会组织的工作,要给基层干部增加新鲜血液,要让群众赶走那些腐败透顶、骄傲自满和野心勃勃的人。我们应该在这些改选中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总之,要在工作中更加重视基层环节,经济、工会和党的领域里的创造性工作事实上是在那里进行的。

因此,更加重视基层环节在其工作的一切领域的具体工作,应该是从沙赫特案件中得出的严肃的结论之一。

诚然,高层的政策是非常好的,可我们经常围着总的决议转,这样的决议写了一大堆,形成了“决议摞决议”。

施瓦茨同志在这里引用了在联盟这条线上通过的决议。我本来也能在这里引用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甚至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谈及和提前警告可能出现脱节的数十个决议。

糟糕的是,在我们这儿决议往往只是作为决议留在了我们这里,而检查执行情况、检查这项决议实际上到底实施了多少——在我们这里还是相当薄弱的。

所以,我认为,实施我们自己的决议和加强检查它们执行的情况的结论,这应该是从沙赫特案件得出的中心结论之一。

喊声:对。

卡冈诺维奇:我们现在讨论了有关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反革命问题。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事是否提醒过我们重视托拉斯工作中的不足呢?提醒过,而且是通过更多的决议来提醒的。我看过了许多生产会议的记录和矿业工人联盟的材料,应该说,我并不认为那里没有提出过任何批评和指出过任何缺点。例如,去年,我们宣布竞选最佳矿业局和最佳矿井。仅一个卢甘斯克专区,参加竞选的工人就超过了1万名。揭出了一系列缺点,但所有困难在于,缺点是揭出来了,也点到了,可在生活中却什么也没有去做,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即使做了,那也只是不多的一部分,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而最珍贵的、最重要的指示被“束之高阁”了。这就是有关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发现的那些缺点的具体情况,工人们是在发现它们之前很久就议论过了。

我们甚至在我们的经济组织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那里不仅对工人们所提出的意见,而且对党委的指令贯彻得都不够坚决。例子俯拾即是。就拿在这里发布的关于改组托拉斯的决议来说。这项决议是如何去贯彻执行的(或者不如说是没有执行)——你们大家都清楚。

早在一年半前,我们自己也就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这个问题做出了指示。但是,指示并未得到执行,而我们连检查都没进行过。那结果怎样呢?共产党员

们,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局成员们,过去的基层工作人员们,列夫琴科同志和阿巴库莫夫同志对我说,他们认为,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不仅共产党员对像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这么宏大规模的经济搞不明白,而且甚至诚实的专家们也会被搞得晕头转向。

工作中的中央集权制是最难以置信的。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基本建设为例。

托拉斯的基本建设有1.4万项工作,而每一项又有5个分项,这些都是要经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讨论和确定下来的。对此还可以补充建设计划,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的3月的计划,已经讨论了不下7次,大概到年底之前还将不止一次地进行讨论。

我们已经不去说大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样的体制会完全自然地卸去了矿业局对工作成本的责任,甚至是对在当时进行这个或那个工作是否合理和有必要的责任。

或者来看看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机构的图表¹⁰³。它是如此复杂,而且工作得如此之差,以至于托拉斯有一次自己为调查托拉斯内部状况派出的委员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重要的工作文件,图纸丢失了。这里是一种魔圈,因为委员会所进行的细致的调查都无法确定这些文件和图纸是在运转过程中的什么地方和哪一点上丢掉的”。

于是就得出结论说,对工作中所出现的这个或那个错误谁都不能怪罪。人们对所承担的工作的责任混乱不清,人们开始学会不负责任,因为在这样的机构建制下,要找出谁应该真正负责和负什么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现在很清楚的是,反革命分子在故意混淆责任,牵着我们同志的鼻子走。委员会在其结论中指出:“对所有问题进行认真审查的结果是任何一个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工作人员都没有预谋的、蓄意的、任何不正确的行为。所以,委员会没有去清查肇事的个人”。

可以说,人们起初是踏在了反革命的尾巴上——他们自己宣称,说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有个中了邪的怪圈,重要的文件突然会在什么地方丢失(这还不止一次),后来又说什么预谋、蓄意的东西,等等。现在当然清楚,这些“丢失”的事情是专家—破坏分子们干的。

很自然,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工作的共产党员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凭其所有的愿望和全部能力不能胜任工作,不能照管好这么大和复杂的机器。这就是为什么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改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尤其是现在变得如此

之尖锐。

如今还很难确定给我们带来这种破坏结果的规模,但已经掌握的材料表明,危害是巨大的,如同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局已十分清楚地从侦查材料所得出的结论一样。在这里我应该说,在乌克兰进行的侦查情况已经让我们正在接近破坏活动的主要中心,这样的中心是存在的,对此不可能有疑问,沙赫反革命分子不仅与哈尔科夫的专家们,而且还与莫斯科的专家们有联系。由著名的拉比诺维奇在这里主持开会的技术委员会实质上并不是技术委员会,而是破坏委员会。

你们已经知道了破坏工作的种种事实。因此,我不再对此作详细讲述。我只想列举几个最典型的事例。譬如,“美国女人”矿井事件可以列入这类事例中。这个矿井是根据一个美国人设计的方案建成的,事先经过技术委员会的审核。而当这个矿井花掉了100多万卢布时,技术委员会突然决定停止整个矿井建设的工作并关闭了它。

而只有当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局来自基层的共产党员成员们列举出许多有关关闭矿井是不合适的论据并开始抗议时,他们的要求才被“仁慈地”同意了。现在矿井在,根据最为紧缩(开支)的方案,它将从明年初起开始提供矿产品。

我倒是能再给你们列举许多关于早在战前就开始开凿而至今尚未结束规划的、储量丰富的煤矿的事实。那时,在多数情况下开凿的是储量不大的煤矿,它们在短时期的开采之后就要停止使用了。

设备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机器被运到了那些要2年后才用得上它们的矿井,而这些现在真正需要它们的矿井却还得不到机器。

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该在全会后只局限于做出这一个决议,我们需要在会后严肃地仔细研究,并在这个最大和最重要的托拉斯的经验基础上发现和揭开我们在经济组织工作中存在的具体缺点。要帮助从未从事过管理工作的同志们掌握交给他们的业务工作,与其靠表扬来帮助,倒不如以实事求是的批评和对他们完成党的决定的情况进行检查来帮助他们。在党组织领导的经济工作中也有很多缺点。我们常常相信言论,或者局限于一般的报告,而不去对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

举例来说,去年,我们听了关于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报告,就这个报告通过了决议¹⁰⁴,大家照例赞同——瞧,总是赞同或者更多是沉默。

伏罗希洛夫:总是赞同,而需要的最好是好好考虑一下。

卡冈诺维奇:而后来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工作中暴露出来的最令人头痛

的问题之一,即关于进口设备的问题,不仅没有被提出,而且甚至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报告里也没有得到阐明。

或者南方钢铁公司到乌克兰来找我们,提出了应该允许拨给价值数百万的进口设备的问题。我们听完了南方钢铁公司的请求,进行了讨论并支持了这项请求。而后来表明,这套进口设备一直躺在那儿不用。

伏罗希洛夫:那为什么你们要同意?

卡冈诺维奇:这就是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的缺点,我们应予以纠正。

伏罗希洛夫:别自我埋怨了。

卡冈诺维奇:你别妨碍我作自我批评。自我吹嘘或缄默不语和规避的态度才是最有损的。我说这些不是因为我想自我埋怨——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扮演自我埋怨的角色和给自己抹黑是极为可笑的——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揭示出所有这些缺点,以便纠正它们并在今后使类似沙赫特案件的意外不再发生。

再就苏维埃和干部这两个问题讲几句。

这里提到了关于苏维埃的问题——关于顿巴斯的苏维埃政权问题。当然,“鬼并不像人们所描绘的那样可怕”。顿巴斯的苏维埃是存在的,在每一个村庄都有村苏维埃。但它们没有物质基础。

一年半前,在巡视顿巴斯之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顿巴斯的苏维埃几乎不具备任何物质基础,自然就不能积极开展工作,因而在工人中间威信极低。这是事实。在矿区内有水管,可它却不能用于公共事业。住宅由矿业局掌管,你们在莫斯科这里批准用于住宅建设的拨款,不是经过公共事业银行,不是经过公共事业部门,而是经过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下达的。它既在搞建设,也在工人中分配住宅面积。

要知道,为了把所有这些物质基础交给苏维埃,我们应该开列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所有这些财产并转到地方经济的账上,应该提高工人工资,以便补偿对公共服务等的必要付款。这当然是最大的改组。大约一年前,我与洛莫夫同志就这个问题谈过,他对我说,现在,在经济年度中期,要改变整个结构并把财产交给苏维埃是不可能的。

我们受乌克兰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仔细分析了关于村苏维埃的局势,确定它要作为真正的地方权力机构发挥作用。最近,我们正开始把这个条款付诸实施。但必须尽快解决苏维埃物质基础的问题,那时就没有必要再去议论什么顿巴斯没有苏维埃政权了。

有关干部问题。我认为,干部问题、选拔人的问题,就和监督实施我们的决定的问题一样,是我们对沙赫特案件做出的结论的中心问题。正如列宁在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的,问题的关键当然在于人¹⁰⁵。我们在选拔人这方面还存在不足,我们需要特别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拥有的经济管理干部是党能提供的最好的人才。这确实如此。可我们现已进入了经济建设最复杂的时期——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对我国工业进行改造的时期。我们现在管理着数亿、数十亿卢布。但是光靠无产阶级的觉悟、光靠即兴发挥的能力自然是不能使事情有特别进展的。

我们的经济部门工作者现在应该,这样说吧,重新武装,应该更为坚决和认真地着手培训自己,以便去完成我们工作中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要提高现有的经济部门管理干部的文化水平和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当然,不要走极端,也不要像某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完全解除经济部门工作者的社会工作。不能这么做。经济部门工作者应该做群众性的社会工作,他不应该只是在自己工作领域的一个狭窄的专家。临时解放部分工作人员(布勃诺夫同志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让他们得到专业上的重新培训,这则是另一回事。

与此同时,关于培训我国工业部门基层和中级领导人员的问题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根本问题。我们有数千名老的无产者、技师,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工人。如果培训一个有实践知识的工人并给他安排工厂的某项工作,与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一起干,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位有理论知识的工程师或者拥有丰富生产实践经验的无产者技师。我想,由此产生的效果是巨大的。现在必须在培训年轻专家们的工作中采取重大的、目标明确的政策,必须组织更多的招收和分配的工作,而主要的是使学生加强与生产和经济管理机构的联系。当然,我们将要避免老一套的“刻板公式”。

许多同志当了刻板公式的俘虏,而没有去考虑任务的实质。就拿把某些技术学院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事来说,个别同志指出,说什么“原则上不能破坏我们的人民教育制度,必须把农业大学交给农业部门,而医学院交给卫生人民委员部”,等等。同志们,我认为,不能把想法推到逻辑上荒谬的地步。这儿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要为我们曾经有过疏忽的最重要的阵地——工业部门培养指挥人员。谁能更好地培养他们?谁对此更有切身利益,谁就会离这个目标更近些。

斯克雷普尼克:谁有能力谁就行。

卡冈诺维奇:斯克雷普尼克同志,谈到能力,我认为,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以及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都可以同样地找到能与不能的例子。

斯克雷普尼克:钢是在工厂里炼出来的,而工程师是由教育工作者培养出来的。

卡冈诺维奇:不能仅仅抓住刻板的公式。只有大学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管辖下,教育工作者才能培养出未来的工程师。只要有目标明确的方针。不能光从为文化而文化的角度来提出关于为工业部门培养领导人员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从领导人员关注自我培养这一点出发提出来,当然也不要沉浸在刻板的公式里。“打破”公式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的观点是,应该支持把一些院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建议,应该扩大给我们培训工人、技术人员、采矿工长等的短期训练班的网点。这样我们就能够逐渐和系统地隔开老专家中的那帮破坏分子的干扰,这些人不仅在挡着年轻专家的路,而且也妨碍了那些更靠近我们、更靠近党的年老的、诚实的专家们。

喊声:休息。休息。

主席:宣布休息。下面第一个发言人是莫洛托夫同志,接着是洛莫夫同志。

(休息后)

主席:莫洛托夫同志发言。

莫洛托夫:中央派赴顿巴斯出差调查沙赫特案件的3位同志中也有我。但是由于我必须起草决议的委员会工作,我来不及呈递关于我的顿巴斯之行报告。所以,请按规定给我40分钟。(笑声)

喊声:请允许。

主席:有人建议给莫洛托夫同志40分钟。

喊声:给,给。

莫洛托夫:对我们的经济工作来说,我们所讨论的与沙赫特案件有关的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对于国家工业化问题,我们一直是按照这样的相互联系来讨论的:工业化与实现工业化的手段,工业化与技术,工业化与计划,等等。沙赫特案件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种形势下的工业化问题,那就是工业化与人的问题、干部问题、领导者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沙赫特案件使我们更加关注群众参与领导生产的问题。我正是想就这两个问题谈谈看法。

在转入这些问题之前,我想谈一下我们大家都看到的由于沙赫特案件产生的矛盾。众所周知,这种矛盾就在于:一方面,破坏分子对我国经济所进行的深层次的破坏活动被揭穿;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增长。特别是

这种矛盾明显地表现在顿巴斯本身。顿巴斯(整个)煤的生产计划今年应提高2 800万吨,这与战前水平相比,增加了112%还多。这就是说,今年顿巴斯超过了战前的界线,即顿巴斯的生产已经恢复了。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揭开了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重大缺点,这表现在产品的价格问题上。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产品成本情况并不像其产品数量的提高那样好。比如,去年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产品成本比上一年提高了4%,尽管工人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当然,高成本的问题不仅与煤炭工业有关。在过去的经济年度中,我国工业正好是在这个领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今年,规定降低成本6%,而且这也是任务,就像现在通常所说的,这被认为是“紧张”的,几乎是力所不及的。与此同时,目前工业品的成本如此之高,即使预计可以达到的降低6%能够实现的话,那也将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完全不够的,简直是微乎其微的成绩。

这就是党和工人阶级为何应该特别注意那些通过沙赫特案件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的发展苏联经济的障碍。而这些障碍无疑是重大的,克服它们就要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动员经济建设的内部力量。

从顿巴斯之行我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证明现在不仅在沙赫特地区揭开了我们的敌人——破坏分子公开的破坏活动。比如,在谢格洛夫斯克矿区,人们告诉我有两个矿井,被一个现已关押起来的叫库兹马的工程师——破坏分子罪恶地淹掉了。这个工程师在1920年淹掉了格里戈里耶夫卡矿井,根据矿业局的材料,这个矿井的优质煤的储量为3亿普特,而在1922年,另一个矿井,即别列斯托夫卡矿井被淹掉,它的这种煤的储量为7亿普特。现在谢格洛夫斯克矿区有一个生产劣质灰煤的帕斯多霍夫卡大型矿井在工作。这是最后一个应迅速关闭的、不赢利的矿井。现在我们谈到两个被淹掉了的矿井,由于它们已被破坏,要恢复它们是不适宜的,于是现在提出了关于开辟新矿井的问题。库兹马及其一伙人的破坏工作是被揭穿了,而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储量最丰富的谢格洛夫斯克矿区被破坏掉了。现在每当谈到库兹马的罪行时,谢格洛夫斯克矿区的一些老工人还会哭,这是可以理解的。谢格洛夫斯克矿业局现任负责人费先科同志——共产党员,顿巴斯工人,每当谈论此事时也哭了。

但有人会说,这发生得比较早,已是6—8年前的事情了。可迄今为止,就在现在,我们的敌人在顿巴斯罪大恶极的破坏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其他许多矿区,就像以托姆斯基命名的马克耶夫斯克厂这么大型的企业,至今也揭出了令人发指的破坏我们生产的反革命诡计。我在斯大林诺区

的所见所闻使我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即在顿巴斯的其他许多地区,沙赫特区的破坏工作在明显地继续进行着。这就要求党、工会和我国所有的经济工作者更加重视同经济工作中的缺点作斗争,不要满足于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取得的数量上的巨大成果。

由此我转到关于人的问题,关于经济部门干部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对它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现在这个问题与经济部门工作者的工作方法问题、与对待资产阶级老专家们的态度问题、与培养红色专家的新干部问题、与被提拔的工人干部问题连在了一起。于是,政治局决议草案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先谈谈关于我们经济部门工作者的工作方法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所有的经济工作者都是不折不扣的,不好的指挥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古比雪夫同志论证它只是徒劳。这种观点的错误是明摆着的。

喊声:对。

莫洛托夫:在我们经济工作者中,有不少来自一些企业和整个托拉斯的优秀领导人。但是,指挥员式的工作特点是经济部门众多管理人员的典型现象。同时,苏联企业的现有领导人的任务是如此重大和复杂,而十来年经济工作的经验又是如此丰富,以致党应该清清楚楚地提出向新的经济管理工作方法过渡的任务。与此同时,经济部门管理工作者现有的工作条件更多地使他们变为了指挥员,而且是不好的指挥员。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特别提醒党和工人阶级加强对这个问题的注意。

在十月革命的初期,指挥员式的工作方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假如没有它,我们就不能着手进行恢复经济和建设红军的工作。在那个时期,我们是从在一些企业和整个经济联合体中采用任命指挥员的形式开始的。但是,我们早已不再使用这种领导经济部门的方法了。形式上,我们的企业早就没有指挥员而只有管理人员和经理了。然而,就是现在,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者来讲,指挥员式的工作特点实质上在众多关系中也还是典型的,还是众多关系中所特有的。而且党至今没有向经济工作者提出放弃这样的工作方法,转而采取新方法、真正控制企业的整个生产过程的任务。

迄今为止,经济工作者的工作条件本身一直都在阻碍着他们去完全把握住托付给他们的工作。就拿经济工作者的迅速更迭这一事实来说吧。我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这关系到马克耶夫斯克厂,在那儿工作的工人超过了1.3万。这家

工厂在一段时间暂停之后开了工,于1924年作为主要单位进入马克耶夫斯克联合公司。结果是近4年来,马克耶夫斯克联合公司的领导人换了6任,这个马克耶夫斯克厂的厂长已换了7任。再补充一点,一位任期最长的联合公司领导,基里尔金同志,在其11个月的任期内,在哈尔科夫和莫斯科就呆了整整5个月。要知道这不仅是顿巴斯,而且是全苏联最大的企业中的一个!最大型企业管理人员的这种换班现象不可能导致什么好的结果;即便是聪明绝顶的管理人员,在马克耶夫斯克联合公司的领导岗位上只呆上几个月,他也只能如同一个不好的指挥员,不可能做成什么事。再看看事情的另一面。我们的经济工作者要积极参与地方的社会生活,对此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回避的。但结果是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总结与报告,会议及麻烦事都没完没了地向管理人员袭来。许多顿巴斯的管理人员对我说,一周内大部分的日子,他们脱离了直接的生产方面的工作,而只能干一大堆其他的事情。在这之后你再试着去把握企业的全部生活吧!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那些中央计划性不够,扼杀企业领导积极性的、严重的中央集权主义对管理人员形成的地方工作条件的话,那么,我们经济工作者的工作条件极其困难就更加清楚了。

最后,应该谈一谈经济部门工作者所处的法律条件。这里应该谈一下第33号令。

第33号令作为一个强调必须让企业的技术领导对托付给他的工作严格承担责任的法令,它在过去有过积极的意义。但是,在这一法令的基础上为一些工业部门颁布了所谓“示范条例”,使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员处于了非常不正常的条件之中。这些“示范条例”在企业中推行了这样的准则,使得负责技术的经理成了生产部门最重要的实际领导,首先是整个技术班子的实际领导。尽管话又说回来,技术经理本身是经企业经理同意才确定下来的,可主要专家在企业中的作用在“示范条例”中被强调到了如此地步,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经理的权力。在纺织工业部门也有过类似的“示范条例”,它从根本上破坏了企业经理们的地位,使他们处于直接依赖于托拉斯主要专家的局面。这一条例直截了当地提出:“工厂负责人由联合公司技术生产部门负责人经联合公司领导人确认后聘任和罢免”。这里已不仅是技术人员,而且还有企业经理,都要服从于托拉斯的技术领导人了,这一点已由“聘任和罢免”这样形象的话语表达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员领导者不能成为企业真正的领导。虽然去年颁布了关于管理人员一领导者与技术专家的相互关系的新条例,这一条例为企业领导创造了必要的团结氛围,保障了企业经理的全权领导,上述“示范条例”至今仍在许多

企业中起作用。谁试图否认这一点,谁就将犯大错误。

我不得不提一下专家们为恢复第33号令的全部效力所作的公开斗争的事实。在斯大林诺有人给我看了马克耶夫斯克厂工程师和技术员会议的决议,这是他们在今年2月16日的会议上做出的。马克耶夫斯克的专家们在这个决议中尖锐地反对新厂长的工作方法,指责他不能正确地对待专家们,压制技术人员等,同时该决议蛊惑人心地炫耀,把工程师和技术员们说成完全是工人們的捍卫者。在我的提议下,在马克耶夫斯克厂举行了技术员和工程师的大会,我在会上让与会者解释,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做出2月16日决议的。这次会议的结果是通过了新的决议,大会的细节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这个决议磨平了第一次决议中尖锐的锋芒,然而决议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必须在不久的将来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第33号令的基础上贯彻关于技术人员权利和义务的条例”。于是我们,特别是斯大林同志,开始认真地阅读第33号令以及在这个法令基础上规定的那些“示范条例”。我已经谈了经过我们的挖掘所弄清的事实。现在我要强调的只有一个事实,即至今工程师和技术员们还在公开地进行要求全面恢复第33号法令效力的斗争,尽管不只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还有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去年通过了取代这个法令的新决议,改变了企业经理的法律地位。此后不能再说什么第33号令已在实践中失去意义了。我应对此再补充一点,即在斯大林诺举行的会上,斯大林诺联合公司经理巴祖林同志(他是杰出的顿巴斯经济部门的管理人员)也谈到了不久前著名的专家斯维岑(现已被捕)在南方钢铁公司也曾是一个聘任和解雇了整个技术人员班子的人物。所以,在这里到目前为止,技术人员班子也是更多地取决于技术经理,而不是托拉斯的领导人。这一切说明了经济部门的党员工作者的工作条件是不正常的,对此我们现在应该给予更大的关注。

我们有著名的经济部门管理干部,他们能牢固地、完全地支配自己的工作,他们在企业中所起的作用并非是一位不好的指挥员,而是一位真正的领导人的作用。

罗伊津曼:对。

莫洛托夫:然而,至今还没有真正地提出完全控制企业的任务,不仅在行政上,而且在生产技术方面控制企业的任务,而且直到不久以前,我们还不能提出这项任务。这是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管理工作经验,我们已经造就一批自己的经济部门管理干部,我们应该按新的方式给领导企业的党员管理人员提出任务。现在,当我国工业已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当我们正在开展规模

宏大的基本建设,合理化的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时候,应该对经济部门工作者提出比过去更加复杂的任务——名副其实地支配企业的整个生产过程。沙赫特案件表明了我们对生产的支配还是如此之差,我们至今在管理工作中还如此容易被人捧得飘飘然和被人搞得晕头转向,它十分尖锐地给我们经济工作者提出了要管理好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的任务。这一结论对经济工作者的今后工作是最为重要的结论。那些在十月革命初期不可能做到的事,那些我们在过去应该妥协的事,在革命的第11个年头已经不能再照旧保留了。我们不要再盲目相信专家们的工作,不要还如此经常地照搬专家们形形色色的空洞计划,而是必须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不仅要合法地和对共产主义来说绝对必要地对资产阶级专家们采取起码的不信任态度的问题,而且还要真正和系统地研究企业的全部生产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以及在增长知识和加强向精通业务的专家们学习的基础上去完全地支配企业的生活。在这方面,党和工会应该全面支持我们的经济工作者们。

现在来谈谈专家问题。几年来,一小撮明显的破坏分子、明显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就能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而未被揭露,这是与沙赫特案件有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很清楚,除破坏分子事件外,我们还应该记得一个事实,那就是相当一部分未参加反革命组织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对破坏罪行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这一事实的意义不亚于顿巴斯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事实本身。一大批技术员和工程师群众存在的这种行业关门主义和对苏维埃国家经济的消极态度在这里表现得如此尖锐,有必要引起党和工人们对这一事实的高度重视。还有一个要指出的事实是,国家政治保安局是在没有任何一个专家任何协助的情况下揭开沙赫特案件的。我们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忍受这种情况。况且这里明显揭露出来的,是我们的工作、党的工作,特别是工会的工作中存在的重大缺陷。这些缺陷在这里反映出我们明显地不善于施展自己的影响并真正吸收主要的专家干部来参加工作。

为此,我要引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关吸引专家的方法的观点。1918年列宁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国家要利用优秀的组织家和最大的专家只有两种方式:或是按照旧的方式,资产阶级的方式(即付给高额报酬),或是按照新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即造成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的局面。这样就必然而且自然地使这些专家服从,并把他们吸引过来)。”¹⁰⁶

列宁是在整整10年前,于1918年4月说的这番话。从那时起,我们已经做

了许多年的经济工作。

起初,我们不得不提出最起码的任务:摧毁专家们大规模的暗中破坏活动并迫使他们为无产阶级国家工作。我们较快地做到了这一点。以后,要求特别关注为专家们的工作创造良好的物质和生活条件。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这些年来,党和工会同落后工人不加区别地否定资产阶级专家的态度进行了经常性的斗争。这一斗争,同敌视非党专家态度的斗争,也取得了积极的结果。我们所有受党的委托去过顿巴斯的人——雅罗斯拉夫斯基、托姆斯基和我确认,在工人群众中没有敌视非党专家的情绪。工人们是完全自觉地对待忠诚的专家工作者的,而且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好好工作的。

但是,关于对待专家们的态度问题现在也还完全不能认为已得到了满意的解决。

沙赫特案件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揭露了在一部分专家中存在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的事实,他们主要来自原来的私有者和一些过去享有特权的人。这一事件特别清楚地显现出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新方法。共产党员变得迟钝的觉悟减轻了反革命破坏分子的工作负担,这是常有的和显而易见的。为了打击无产阶级国家最敏感的部位并使自己在破坏工作中得以长期不被识破,那些反革命破坏分子也充分研究了我们的缺点和弱点,对我们的工作人员中的好多人有了足够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众多专家中,我们的影响、党和工会的影响显得非常不够,甚至在是不是能早几年揭出一帮破坏分子在顿巴斯的罪行上也是这种情况。这就是现在需要要求我们的党特别重视关于无产阶级国家使用专家的方法问题的原因。

如果好好地想一想10年前列宁谈到的两种使用资产阶级专家的方法,那么应该承认,我们对专家的使用仍然基本上是用“老方法”,用“资产阶级的方法”。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在使用专家的方法上,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高薪、奖金等问题。我认为无可争辩的是,今后仍然必须加强重视专家的物质和生活需要,可现在主要的并不在这里。事实上,现在未必能维护今后大大增加专家们的报酬和奖金的必要性。在这方面,在报酬和奖金方面,多数情况下再往上增加已经不合适了。因此,在使用专家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用尽了“老的”、“资产阶级的”方法,今后,在不放弃这种方法的同时,我们应该承认,这种方法在目前条件下明显是不够的。在使用专家方面,我们真正做得不够的是发展“新的”、“无产阶级的”方法。列宁曾指出,“新的”、“无产阶级的”使用专家的方法就在于“全民的关注和来自下面的监督”,这不可避免地会使众多专家转到无产阶级国家方

而来。现在我们就应在这方面加强工作。在革命的第11个年头,苏维埃国家的领导阶级应该给予特别重视的正是这个任务。这种无产阶级的使用专家的方法将对工会提出特别高的要求。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一方面要大大发展我国经济建设中的计划成分;另一方面要加强基层生产会议的工作。这些前提(有计划地领导经济和工人群众参与领导生产)已经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而在这方面,1928年当然无法与1918年相比。

关于生产会议的工作问题,我在后面还要谈到,这里我认为必须强调工会工作的意义,它应该真正把众多的专家们吸收到无产阶级国家有组织的专业工作人员的大家庭中来。工会对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群体的真正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影响在今天是完全不够的。很明显,工会对这个任务并不重视。但是,我们有一切理由指望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带领众多技术人员并使他们服从我们的政治领导。李可夫同志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不应该要求每一名专家签字画押,说他赞成社会主义,他在原则上赞成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这种签字画押的确在许多情况下简直都是假的。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关心专家们的物质上和生活中的需求、吸引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参加生产会议的工作,使专家群体与工人阶级的基本骨干在共同的工会组织中互相接近,开展这一领域的政治工作,我们现在就能使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基本成员即他们的真正群众,忠诚和热忱地为无产阶级国家工作。而现在工会在这方面几乎什么也没有做。

我在顿巴斯了解了许多工会下属的工程技术处的工作。我在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工程技术处工作的好典型,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看到的是,工程技术处或者处于我们的敌对分子的直接影响下,或者成为以专家们的上层特权分子为首的闭关自守的集团。一般的情况是,工程技术处只管与个人利益有关的问题,为自己争夺权利、好处和奖金等。这种情况不可能使专家们团结在我们苏维埃的和工会的机构周围。在这种土壤上,苏联经济这部分工作者的帮派独立王国反而会更加膨胀,因而会有助于掩盖类似沙赫特案件的罪行。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坚决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要在专家中间开展广泛的工会工作,使得我国在使用专家这件事上,现在真正能把“新的”、“无产阶级的”方法提到首位。在无产阶级革命第2个十年的初期,该是想起列宁关于使用无产阶级的方法来影响专家基本群体的指示的时候了。

我扼要地谈一下有关红色专家新干部的问题。

通过顿巴斯之行我可以确认,在许多情况下,老专家对我们的红色专家的态度是不支持的,而且常常是公开敌视的。同时,现在有数千名新的工作者毕业于

我们的大学,我们要为他们的工作争取良好的条件。于是,关于培养红色专家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这个培养工作中的作用应该彻底改变。教育人民委员部反对把某些大学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这带有太多的部委意味。军事部门的经验告诉我们,是否能够培养自己的干部对建立真正新的、真正的红军起了巨大的作用。不能这样来看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认为它只管机器、设备、原料,等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管理我们全国工业的最重要的国家机构。必须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够为了自己的工作培养和培训领导人,否则它将无法应付大量的基本工作和生产彻底合理化方面的事情。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可以为整个工业部门培养所需要的专家(更不用说教育人民委员部还有培养其他各种专家的任务)——这意味着有了一幅看上去很好的纲要,却忘记了解决最困难的实际任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要指挥的不仅是机器,而且还有大量的干部工作者。要使指挥这些干部同培养他们的工作最密切地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哪怕是作为尝试,把一部分大学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管理。

最后,关于从工人中提拔干部的问题。

在斯大林诺专区,我看到的是,近来工业企业从工人中提拔干部的工作进展很快。我在大型冶金企业和许多矿区了解到有关把工人提拔到行政和技术的负责工作岗位的材料。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大批干部现今不仅在基层担任工长、工段长等,而且还在车间担任主任助手、车间主任、矿井领导的助手等十分重要的职务。在提拔工人担任干部的工作中也有重大的不正常情况,例如,在大多数情况下,提拔的只局限于共产党员。或者说有这样的例子:在马克耶夫斯克厂储备了一大批“干部提拔的后备力量”,超过了300名候选人,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导致滋长了不健康的升官思想。这种现象以及类似的曲解必须纠正。但从工人中提拔干部的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缺点是完全不重视对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进行专门的生产训练的任务。有必要对工人中提拔的干部进行专门的专业培训只停留在口头上,在实际中却什么也不做。这些任务没有安排好:在这方面没有经济部门的领导,而工会还未注意到这项工作。与此同时,如果依然是这种状况,那么从工人中提拔干部的思想就将会失去威信。必须重视开设专门的,特别是夜间的学习班,以便对从工人中提拔的干部进行专门教学。只有经过这样的专门培训,只有通过开设这样的学习班,被提拔的共产党员干部的作用才会不停留在处理小事和各种对行政领导来说与工人之间“不愉快的”事情上。

关于工人群众参与领导生产的问题,我只说一两句。在此我想强调一下顿巴斯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以及我们的中央机关在为解决顿巴斯工人们最迫切的需求提供服务方面肩负的责任。

在我国和平经济工作的最初时期,人们对恢复本国工业的热情在顿巴斯得到了特别强烈的反映。为了恢复自己的工业,顿巴斯的工人们对于任何牺牲都是挺身而上的。党和工会组织同样全身心地充满了这种情绪。当时,皮达可夫同志由于过分仰仗行政行为,没有能找到正确对待顿涅茨克工人的一种基本情绪的方法。可是鲁希莫维奇同志当年却找到了,甚至有些“过分”了。这导致在一段时间内(这是在3—4年前)顿巴斯的党和工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处在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的霸权领导之下。众所周知,这里出现了党和工会组织过分地依赖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过头行为。这一度表现为工会和党组织从物质上广泛依赖地方经济组织。遗憾的是,地方群众性组织在物质上对经济机构的依赖甚至到目前为止还远未消除,而这种现象当然必须坚决予以清除。但是,现在仍必须强调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就是地方的党和工会组织没有自己的“面目”,顿巴斯工人们至今经常抱怨这一点是有道理的。很遗憾,至今地方的党和工会组织的“面目”与经济部门的面目太相像,结果有损于捍卫工人们最迫切的需求。

顿巴斯的地下作业不遵守6小时工作日制度的事例是十分典型的。不过,应该考虑到,直到最近,这个问题未必能成为顿巴斯的迫切问题。恢复顿巴斯的工作使工人们以及与他们在一起的地方组织如此全神贯注地投入,以致工人们放弃了对一系列地下作业准确地实行6小时工作日的合法权利。劳动法受到了破坏,然而顿涅茨克矿区的恢复工作却在顺利地地进行,——这使得工人们容忍了对他们的权利的损害。但这种状况在目前的条件下是不能容忍的。苏维埃国家使顿巴斯得以恢复:在轻工业实行了7小时工作日;在所有的工业部门广泛地采用了合理化的措施。不能不利用苏维埃国家经济建设的这些成就来大大地改善矿工们的工作条件。因此,在地下作业方面消除任何破坏劳动法典的现象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可地方组织至今不敢提出这个问题。在斯大林诺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我提出了关于按照劳动法典必须准确地执行6小时工作日的想法。甚至专区工会主席也在这次会上声称,这是无法实现的,这样做不是时候,而其他的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时至今日的经济建设热潮使得地方工作者把捍卫工人最迫切需求方面现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推到了一边。

实行这个措施有困难,这不可能不在这一问题上约束了地方组织的主动性。

所以,在这里需要党中央发出明确的指示。应在短期内,消除破坏劳动法典的现象和迫使地下作业单位正确地实行6小时工作日。这要求在矿井工作机械化以及更合理地组织使用劳动方面采取许多措施。但是,地下作业可以实行6小时工作日是由于至今地下作业实际上常常只有3.5—4小时。

还应该促进满足顿巴斯工人许多其他迫切的生活需求。这里有关于水、住宅、澡堂、工人区的文化机构的问题。必须使苏维埃政权和党在短时间内用一系列实际措施来证实它是力图要在改善顿涅茨克工人的状况方面取得最快的进展。

所有这些措施也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工人们参与生产管理的积极性。

生产会议已开始在我国工业中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尽管工会和党的组织根本不会开展这项工作,更不要说经济部门了,生产会议正在从讨论小问题过渡到讨论生产上最重大的问题。开展生产会议的工作并大大增加临时监督委员会的实践活动——这就意味着沿着真正无产阶级的组织经济的道路前进,不这么做就不可能取得苏维埃国家经济建设真正的成就。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应记住这一点。那些不认真细致地对待这件事的工会远远没有反映工人们的要求。工人不仅关心生产,不仅准备为提高经济而做出牺牲,而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表现出积极参与生产管理的愿望。要全力帮助工人群众加强这种愿望,因为工人们参与生产领导无疑将使我们在提高经济水平方面取得比我们现在大得多的成就。

沙赫特案件为我们揭出了经济工作中的无数缺点。对此要承担责任的不仅是地方组织,而且还有中央的组织。最终,党要对工人阶级承担主要责任。党组织要负特别大的责任,是因为它们至今对工人们指出这些缺点麻木不仁,而同时工人们提出的意见,尤其是在顿巴斯,并没有不够充分的地方。我曾去了解过马克耶夫斯克矿区的工人奥梅利琴科的声明,他早在1925年初就向地方的党和工会机构提出声明,其中他正当地提出了许多令人气愤的经营不善的事实。那时,奥梅利琴科同志在结束自己的声明时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即在马克耶夫斯克矿区不可能没有经济上的反革命,可当时没有人对此引起特别的注意,而如今奥梅利琴科同志的多数意见得到了证实。而有多少工人们的其他意见没有引起我们党组织的注意!与此同时,这些事实证明党的领导明显地不理解自己的共产主义义务。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些经济部门领导存在缺点的地方,就像那些工会与群众联系方面存在不足的地方一样,正好反映了党组织对工人呼声缺乏

灵敏、党的机构对自己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所负的责任缺乏了解。这就是为什么至今会遇到这样直接反映出我们的组织对工人缺乏真正的联系和关心的事实。

我应该宣读一位工人的字条。这张字条证明,尽管我们所有的工会的、党的和其他的组织都存在,但工人们在某些情况下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无助。只有这些组织不重视和不关心捍卫工人人们的日常利益,才会促使工人奥辛写出这张特殊的“字条”,他把字条交给了鲁特钦科夫斯克矿区的一位工程师。这张“字条”是这样写的:“工程师波格丹诺维奇收,工人奥辛寄。字条。加夫里尔·谢里维斯特罗维奇,我保证,我将再也不会不服从您了,不管您派我到哪儿,即便让我消失,我也永不拒绝。H.奥辛,9月21日。请取消对我的第3条处分。奥辛。”工人奥辛的这张字条只能反映他的绝望,它的出现只是因为奥辛同志没有能在我们的党和工会组织这边找到真正的保护。正如我们在当地弄清楚的,奥辛同志的确是被由于从事破坏活动目前已被捕的工程师波格丹诺维奇对他所施加的压力走上了绝境。[另一方面,这个“字条”说明,我们的工会和党的组织是多么脱离工人的真正生活,在如此密切关系到工人的问题上,他们是多么不积极。]这张“字条”之所以会出现,只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党和工会的组织对保护工人最迫切的需求不热忱;另一方面,它们和生产上所做的,和工人们工作的条件是相脱离的。

无论是对党组织而言,还是对工会组织而言,从这一切该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类组织都应该更接近生产,应该直接并从实质上领导经济工作,应该加强培养新干部和吸收广大的群众参与管理的工作,并应该在许许多多方面对工人群众的要求和需求给予重视和关心。

主席:同志们。我们将继续会议还是结束会议?

喊声:闭会。

主席:会议结束。明天第一位发言人是洛莫夫,第二位是斯大林。

第六次会议

4月10日上午

主席(李可夫):洛莫夫同志发言,下一个是斯大林同志。洛莫夫同志要求半小时。

喊声:给他,不反对。

洛莫夫:我在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托拉斯已经干了快一年半了。应当指出,这种规模的背信弃义,我无论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还是在其他托拉斯,自然是没有预料到的。我将给你们列出老干部的基本数目,以便使你们做出判断,有多少我们的专家被捕。托拉斯总共大约200—250名老工程师;被捕的共有160多人。

喊声:少些。

克雷连柯:有多少老的?

洛莫夫:克雷连柯同志,您听着就会听到的。这160人中约有120名是被捕的老专家。这样,如果仔细了解一下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专家“指挥”班子,那么,总的来说,受到打击的是那些变节者,那些致力于破坏我们经济的人中的大多数。尽管这种变节和破坏行为是有系统地进行的,我应当指出的是,在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托拉斯的生产和直接开采量的指标远非总是不好的。

整个顿巴斯经济恢复得怎么样?如果在1921—1922年度,当矿区转到我们手里时,我们的产量大约为551.1万吨,那么,到了1926—1927年度,开采量已从1921—1922年度的100%增至354%,即几乎达到了2000万吨;而到1927—1928年度,它将达到2200万吨左右。最近几年来,开采量的增加是够快的,在1926—1927年度增加了5%,今年,在1927—1928年度的上半年产量增加了20个百分点。与开采量增加的同时,合理化的工作也正在进行。我来说一下用机械化的手段开采煤和无烟煤的数字。1926—1927年度的上半年通过机械化手段(用挖掘机)达到的开采量为125.5万吨;1927—1928年度的上半年——

251.8万吨,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机械化手段开采的产量在一年内翻了一番。而现在机械采煤量在3月时大约为23%,也就是说,如果与和平时期相比,当时机械化开采大体上占1%,如今我们采用机械化开采的产量已几乎占全部采煤量的1/4,而且我应当指出,我们的路线是把大部分挖掘机用于开采硬岩层、无烟煤上面。因此,在最不可靠的地区——在弗拉索夫卡、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井,有65%是通过机械化手段开采的。

现在我们从这些数字转到成本问题上。莫洛托夫同志提出,去年一年内,成本方面的情况不太好,即与前年相比,在去年一年内,成本增加了4%。莫洛托夫同志只说了一半应该说的话。问题在于由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批准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计划有意识地规定了成本提高这一点;当时规定成本为10卢布97戈比,而实际上我们是按10卢布85戈比做的,即它比计划要低。计划中提高成本是因为国家需要煤,于是那些不能按较低成本生产这种煤的不能赢利的矿井也投入了运行。你们记得,去年第一季度就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是进口煤还是无论如何要扩大开采量,以便从这里向我们全国提供这种煤。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加码,我们那时没有往苏联进口煤,而且列宁格勒烧的是我们顿涅茨克的煤。

如今上半年成本的情况怎么样呢?当然,只有当我们到了年终时以及当我们在做生产总结时能考虑到这种成本的所有因素时,才能产生成本的最后数字,不过,现已清楚,上半年成本的回落微乎其微,不是多一点,就是少一点,但离政府为我们规定的成本数不太远。而且我应当指出,今年的成本是每吨10卢布44戈比,不是过去的每吨10卢布97戈比了。尽管如此,我再说一遍,在第一季度我们做得好了些,1928年1、2月份稍差些,但3月份要强得多。列举这些数字,我想说明什么呢?通过这些数字,我想说,在工作稍微简单一些的地方,说得粗些,就是在我们有可能进行直接盯住的生产领域,在这里我们的矿业局管理人员也显得强干些,在这里我们能牢固地将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完全可以显而易见地得出这一结论。我不想以此证明这里的一切都顺利。我要说,这里也有无数缺点和不足,但是,在这个领域里我们有一系列显著的成绩,这是不可回避的。请看1928年3月份开采量的最新数字。我们在投入少得多的人力的情况下,开采了1.21亿普特。1927年12月份,我们投入生产的劳动人数是16.2万人。而在1928年3月份,生产部门的劳动人数为15.3万人,产量却没有变。我们如今1928年3月份在顿涅茨克矿区的生产率是创纪录的,尽管其生产率与1927年相比仅增加13%强,但它超过了计划规定的指标,并且

顿巴斯工人1928年3月份超过了和平时期的生产率。这是顿涅茨克矿区建立以来的一次创纪录。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把我们在生产领域的工作与新的基本建设领域的工作严格区分开的。后者做得要差得多。如果说我们直接培养和建立了干部队伍,把一大批基层矿工提拔为熟悉生产情况的矿业管理人员,那么,在基本建设领域,情况就要差得多,这首先表现在设计领域。在设计领域我们不得不依靠专家领导班子——老干部们。我们这儿有没有能领导设计的比较年轻的干部呢?我可以肯定,我们这儿过去还未曾有过这样的干部,而且眼前几乎也没有。

工程师毕业生的断档(从1917年至1923—1924年间我们没有毕业生)造成了自然的脱节现象。1923年后毕业的年轻工程师差不多还没有在生产部门呆过,他们没有按照欧洲的和美国的最新样板建立新的大型单位的实践,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只能依靠老干部,而这些老干部却原来是变节的干部。我们至今是如何努力避免这种变节行为的呢?我们同国家计委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一起,集中了教授中的优秀代表人物,集中了优秀的矿业界代表人物,这些教授中的每一位都来为这个或那个矿井的设计负责。这里提起了关于基谢廖夫矿井的事,这个矿井定位不正确,预先设想要打在较为厚实的矿层上,而结果打在了薄得多的矿层上。负责这个矿井的是苏联国家计委委员捷尔皮戈列夫教授。负责在涅斯维塔伊的“斯卡钦斯基”¹⁰⁷矿井的是全苏联的最大腕人物——斯卡钦斯基教授。这次开采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于是,每一个大型的、基本的矿井都要经过这个权威性的评议会——由所有教授参加的技术委员会来评定。每一个矿井都交由一名教授来负责它的设计。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那些技术不甚精通的人来说,要改变某个图纸,改变某个细节,都是极其困难的。

最近我们采取了哪些保险措施呢?我们去找国外的人帮忙。在我们这儿参加设计的有来自德国的盖泽教授,还有来自美国的“乘务员”公司以及许多其他的公司。在一系列情况下,我们知道,如果俄罗斯技术人员设计的话,那要经过一年半才能交用铅笔画的草案,而“乘务员”公司只要两个半月就可拿出最终的设计方案,而不是用铅笔画的草案。

亚戈达:出自现已被捕的工程师克雷扎诺夫斯基的手*。

洛莫夫:这还要查对。不过,同志们,我认为这还不够。我们设想,必须把一部分设计方案交给外国公司去咨询,但这仅仅是修改。到目前为止,只要我们没

* 原文如此。——编者注

有自己的干部,自己的工程师干部,我们就将一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

怎么样,同志们,我们现在转到有关托拉斯经营管理的问题上来吧?首先,在战前,老板们是在3 000个矿井采煤。在我们的制度下,我们仅从285个矿井开采的煤产量就超过了战前水平。我们提出的基本方针是选择优良矿井并从这些矿井获取比战前多的开采量。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了托拉斯本身的机构,形成了现有的经营管理状况。现在完全清楚的是,我们在依靠老专家的问题上自然是做得过分了,我们相信了那些本不该信赖的人。我们从资本主义得到了老专家们封闭的帮派。

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是清楚的。但是,我们并非总是能使这个专家帮派靠近我们,更多情况下是做不到,也不能把他们打散。然而,我们做到了在各地矿业管理机构中提拔许多年轻的工程师。别忘了年轻的工程师们仅是从1923—1924年间被开始使用的。可这里应当直接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与选拔和提升年轻同志不相适应。在地方上往往没有可以为还需要学点本领的年轻工程师提供的职务。在这里不只要倒向经济工作者,而且还要注意在精简的时候,谁将是第一个被精简的人?首当其冲被精简的是年轻人,是尚在学习、羽毛未丰的工程师。把他给裁了,扔出去了。叫他怎么去学习,怎么叫不在生产第一线?十分清楚,提拔年轻工程师的问题提得非常及时,但需要的不是从群众大会发言中提出这个问题,而是需要建立一种使这些青年们能有工作并能得到发展的秩序和体制。

但是我认为,提拔年轻工程师的问题掩盖了其重要程度并不次之的为我们的工业部门建立中级和低级干部的队伍的问题。

如果你们读一读最近的比利时矿业杂志,那么,你们就会看到有关比利时矿业工作者倡议进行的一次极其有意思的调查材料,这是关于改造德国煤炭工业的调查材料。他们断言,德国在发展自己煤炭工业方面首先得到的好处,是在该部门造就了一批工长干部,他们无条件地忠实于企业的利益,在这批干部的基础上才有德国煤炭工业的繁荣和合理化局面。

我们的工业部门这方面的情况怎样呢?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做得非常少。所做的那些事通常是根据托拉斯的建议做的,我可以肯定地说,当这里有人攻击说,我们经济部门的管理工作者们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的时候,我可以肯定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在这方面要比其他人做得多。我来列举一些事实,让同志们对此做个评论。

除了26所共有3 600名学生的采矿工业技工学校(其中井下专业的学生占

50%)外,我们还有下列培养初级采矿监督人员的训练班。

通过鉴定的工长训练班,学习期限为9个月,2400人。

斯大林诺试验站下设的机器采煤场工长训练班,120名学员,学程5个月(脱产,有助学金)。

计时员训练班,学习期限为3个月,60名学员,全部领助学金,全部脱产。

我们如何对待我们那些有权负责的工长干部呢?

在斯大林诺,诺沃切尔卡斯克的训练班:有1926—1927年间招收的60名工人学员。预计在1929—1930年度毕业。

每位学员的工龄为5—20年。其中,共产党员占70%。全部脱产并享受我们的助学金。

区里的矿井负责人员夜间训练班:40人,还有100人在矿场,共有140人。全体学员都是从职工中提拔起来的负责干部。

我不再涉及这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了,但我坚信这一问题的基本解决很大程度上在于造就一批从工人中提拔的干部,我们是可以从他们中造就和挖掘一批非常好的负责工长干部的。

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碰到了最严重的墨守成规。首先,按技能的一切规定,对这些有20年工龄、通晓一切技巧的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几乎是要考出高等数学来。所有这些训练班,所有这些教学大纲和考验根本不顶任何用。它们都是一些老掉牙的东西,可是我们暂时还无法打破。

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对这些具有无数实践经验的负责干部的所有要求,要简化这些考试的理论部分。同志们,在这方面我们还做得很少。

现在来谈谈李可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以及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发言中谈到的那些问题。卡冈诺维奇同志说,我们在开凿小型矿井时犯了一系列错误。是的,同志们,有这些错误。这样的错误有多少?卡冈诺维奇同志打出了一个数——33个矿井。可问题在于,这33个小型矿井的费用总共只占托拉斯为开凿所有增补的中、小矿井耗资的4%。政府关于发展小型和中型矿井的决定合理还是不合理?这个问题在3年前就已经在解决了,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解决。我们那时没有那些我们非常需要的、能快速采煤的大型矿井。在这里应该回忆起鲁希莫维奇同志不得不在两个月内完成所有这些矿井的开凿这件事。毫无疑问,这里有变节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有错误,但如果你们拿美国的石油工业作例子来发问:用“野猫”法空掘了多少口钻井的话,那么,给你们的回答是:没有石油的钻井超过了40%。在这里,错误占了多大的百分比是显而

易见的。在开掘这 33 个矿井的问题上也有大错。我再说一遍,这里也有变节行为,但 4% 总还不是一个像我们这里某些言必称“世界规模”的人有时故弄玄虚的那么大的百分比吧。让我们来看看小型矿井,它们的开采量有多少? 说两句关于开采计划的问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年初确定了开采量为 14 亿普特的计划,此后,它做出了新的计划——你们的步子迈得太大,要迈得小一点——计划减至 13.70 亿普特。我们减少了工人,为完成减量的计划采取措施,如今突然下达了新指令——“开采别少于 14 亿”。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计划规定在五年计划内增加开采量 55%,而按照国家计委的计划却要增加 57%,可现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们来到这儿说:得了吧,五年计划需要重新制定,为了使开采量到五年计划结束前增加整整 100%,而不是增加 57%。而对这样的跳跃,思想上实在难以接受。现在当我们需要增加开采量的时候,开采量为 2.5 亿普特的小型矿井填补了没有它们便会出现的漏洞。2.5 亿——这是国家和政府从这些小型矿井得到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小型矿井将怎样发展下去? 按照我们的设想,它们的开采量在五年计划结束前可以达到 5 亿普特。我认为这个数字是十分现实和可观的。同时,不要忘记目前我们的开采量为 1.4 亿普特。所以,现在那些藐视小型矿井和认为小矿井完蛋了的人是错了,这种情绪需要克服。

李可夫同志提出了第二个特别重大的问题。他说:变节分子曾指望在工作过程中,大约在 1929—1930 年间,使我们开采出现脱节,那时,我们的大型的和主要的掘井工作将推迟,而老矿井将掘尽。可能变节的专家们曾有过这样的打算。我们来看看国家计委的五年计划。我看到我们的开采量是怎么增加的。在 1931—1932 年间,15 亿将由基本有效的矿井提供。候补的中、小型矿井应提供大约 4 亿普特,新的主要矿井应提供 3.44 亿普特。总之,在最近两年内,中、小型矿井和主要的老矿井能承受其负担而不致降低开采量,因此,专家们指望新的主要的矿井能提供 3.44 亿普特。拖延设计方案的事情曾有过,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从“新谢尔比宁斯卡亚”和“卡尔”这样的矿井来看,我认为,专家们是在竭尽全力地拖延设计,主要拖延开掘,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这方面,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如果所有新的主要矿井来不及赶上,我们会怎样去摆脱这种可能出现的缺口呢? 我可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不顾一切地对中、小型矿井施加压力了。

现在来谈谈我们的托拉斯的组织结构及其改组的问题。早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前,为了对我们庞大的、拥有 16 万工人的托拉斯进行改组,我们成立了由列夫琴科同志担任主席的委员会,他过去是矿业局的负责人,现在是我的副手。对

于他们来说,要管理这个比世界上所有企业都要大得多的企业,其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同在这里发言的同志们一样,力求转而实行分权制度。不过,我们认为,在改组时,与其说要考虑矿业局权力的转移问题,倒不如像我想的那样,要把我们举棋不定的关于矿井本身、矿区本身的权力问题作为基础。总之,如果矿业局感到来自托拉斯的压力的话,那么,矿井和矿区感受到的来自矿业局的压力并不比前者小。那时,当我们转入合并矿业局(把现有的27个合并为10—12个)时,我们的任务是使矿区得到全部生产权,这样它就能把握自己企业的整个生产实际。这项制定改组方案的工作差不多已经结束。我希望其他的、我们的上级机关能来检查这个项目并帮助我们实施。这项方案我们已部分地在沙赫特的三个矿业局进行推广,它们是整个含无烟煤的沙赫特地区最有特色的矿业局。

必须摆脱老专家们施加的压力,但要用这样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提拔新的年轻干部。有些同志说,专家—“祭司”层,老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圈子不允许年轻人进去,说的完全正确,就是这种情况。在这方面要怎么去做呢?首先,半年后,当我来到托拉斯后,我撤销了一个技术经理的职务,他实际上把托拉斯对生产技术部门的管理权全部集中到了自己的手中。我丝毫未想过他是个变节分子,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这样做的。

我只是希望不要再出现这种能垄断开采量为15亿吨的托拉斯的管理权的工程师。我们是这样做的:安排一位从职工中提拔起来的、最优秀的负责干部——我们的矿工出身的矿业管理人员阿巴库莫夫同志担任生产管理业务部门的领导;安排我们从最老的矿业管理人员中提拔起来的、最优秀的负责干部列夫琴科同志担任整个生产部门的领导,那些新的基本建设方面的工作都归这个部门管理。我们是在努力逐步控制住领导权,是的,这件事做起来比原来设想的要慢一些。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专家问题上,我们对待老专家们的态度无疑是大大超出了他们应得到的信任。

现在请允许我只停留在一两个问题上。如今在托拉斯工作极其困难。留下的专家们经常极力推诿责任。比如,在德国人被捕后,我们的鲁特琴科沃出现了这种情景:在没有经过德国人验收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要开动新的涡轮机。我给应该开动这台涡轮机的工程师莫罗佐夫下命令。我收到了他的这样一份电报:“我执行命令,开动涡轮机,但不负责任。”懂吗,这就是该诅咒的推卸责任——如今被吓破了胆的专家从头至尾都充满了这种情绪,依我看来,新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政策来促使他们不去利用这个方针“推卸责任”。

托姆斯基:你应该发一封简短的电报:“监禁你”。

洛莫夫:托姆斯基同志,他总还是开动了涡轮机,而且干得挺好,而我只有2名能做这项工作的电气工程师留在了托拉斯。如果我把他们也抓起来的话,我怕我保不住明天得自己去开动涡轮机了。

我认为,不要在这里说,好像突然间发现了新大陆。捷尔任斯基同志的第33号法令是有作用的,而我们是采取了一切措施去取缔它!我认为同志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举例来说。早在今年夏天,矿山燃料总局的委员会跑遍了顿巴斯的企业。该委员会就我们企业的状况问题做出了什么结论呢?它的结论是:专家被禁锢,管理人员骑在专家的脖子上;应该根据第33号法令给专家们扩大权力。这是发生在1927年7月份的事,矿山燃料总局的委员会是由负责的经理和党员们组成的。我想在这里说,但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要躲避,因为……

什基里亚托夫:在委员会里大概也有专家?

洛莫夫:既有专家,也有党员。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第33号法令的路线早就被“羞答答地”取消了。第33号法令在我们这里完全没有得到执行。鲁希莫维奇同志应该记得(我清楚地记得这一点)捷尔任斯基是如何对他这样强调的:“为啥你这个歹徒要使党员来挤对专家?”有没有这事?我认为党采取的方针是正确的。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改变方向,但在此应当提醒那些有时忘记这一点的同志们,要记住原来的方针是共同的方针,而不是仅仅在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盛行的方针。应该不是羞答答地围着这一点左顾右盼,而是应该像我们布尔什维克能够做到的那样,直截了当地把这一点说出来。

我只再说两句。大家在喊:压制,压制。我同意应该坚决抛弃压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莫斯科为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规定了制度,要求就基本建设工作提交关于1.6万个方面的材料,并于今年7次改变这些“方面”……同志们,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说我们搞压制和中央集权主义,而这里,在莫斯科,难道就都像天使一般纯洁吗?我认为,需要把争取分权斗争的路线继续执行下去,直至莫斯科,因为这1.6万个问题完全占用了我们所有的时间,而且我们忠实的专家们都会陷进这个官僚主义的丑闻中去。

我坚信党在总的方面采取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个别的经济部门工作者往往只会发号施令,确实是这种情况。可我还是强调,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成长起来的干部,生产部门的管理干部,是不错的干部,尽管他们现在攻击我们,我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批最终恢复了顿巴斯和能够深入生产工作的管理人员。在他们中间有在鲁特琴科沃有7年矿山管理经验的、不错的佳格尼别德

管理工作者格林科；在沃兹涅先卡工作的党员工程师基谢廖夫，他1904年入党，走遍了美国，曾在美国矿井干过而现在穆希克托夫卡工作；不久前毕业于我们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①矿业学院的祖博科夫，一个不错的党员，现在在奇斯佳科夫卡工作；被安排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弗拉索夫，他是我们的红色党员工程师。如果这样地列举这些干部的话，那就不应该把事情想象得如此糟糕，好像我们在党员管理工作者中什么事也没有做。有人说在军事部门一切都已具备，而我们还仅仅在开始阶段。不，同志们，造就红色的经济工作者要比造就好的军事专家困难得多。我想，这是要难得多，在这方面制定的方针要为期更长，要投入更多的力量和耐心，但我们已经在培养经济部门的工作者，而且我们这儿已涌现出第一批干部，应该带着爱心指出这一点，以便使这些干部成长得更好和更加坚强。

主席：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由于前面几位发言人已经十分详尽地通报了沙赫特案件，我就只谈几个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是关于我们争论的性质问题。你们看到我们就全会日程上的问题的争论，不管是关于粮食收购问题，还是关于沙赫特案件问题，是在极其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的。对自己错误的批评，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组织的自我批评是我们争论的共同的调子。这说明了什么？这种“抑制不住的”自我批评从何而来？总之，我们需要这样的自我批评吗？

这一自我批评的浪潮是从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自我批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它对我们来说像空气和水一样需要。有哪些原因？其原因至少有三个。

第一，因为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是由一个党——共产党执政的，该党不与也不可能与其他政党分权，因此，如果我们想前进的话，我们应该自己来揭发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因为再没有别人来纠正它们了。这自然是清楚的，我也不准备就此展开来说。

第二，因为在消灭了反对派¹⁰⁸的十五大以后，党内形成了新的局面，对此我们不可忽视。这种局面新的特点在于我们再也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了反对派，于是有了一种危险性：认为党在摧毁反对派后想吃老本，想稍作歇息而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视而不见。为了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早在十五大上就应该提出全面加强自我批评的口号，以此作为我们前进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① 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的旧称。——译者注

第三,因为最近以来,我们的党内在领导人与群众的关系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对这些变化我们也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些变化表现在哪里?它们表现在:我党的领导集团爬得太高,他们的威望过高,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他们变得几乎高不可攀了。我们拥有这样一批权威领导人的事实反映了我们党最伟大的成就。但是,事实上,群众开始从下边眯缝着眼睛向上看这些领导人,不敢经常去批评他们,这个事实反映出群众远离其领导人的危险,或者更确切地说,反映出领导人脱离广大的工人群众的危险。这种危险可能会一方面现实地导致群众远离高层领导和对他不信任,另一方面,导致高层领导的骄傲自满。如果高层领导骄傲自满和开始俯视群众的话,那能有什么好结果?很清楚,这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况,要永远开放自我批评的渠道,要使苏联人民能“斥责”自己的领袖,批评他们的错误,以便使他们不骄傲自满,而使群众不远离领袖。

这就是我们党召开十五大以来出现自我批评蓬勃发展的总局面的基本原因,这一局面给今天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整个工作打上了烙印。

正因为如此,应该欢迎《真理报》在组织《工农检察院专页》¹⁰⁹这个问题上的倡议。由于同样的原因,要欢迎《共青团真理报》为批评我们的不足和我们组织的自我批评开辟专页的倡议。应该希望的只是批评将是深刻和严肃的,而不是轻描淡写地停留在表面上。

有人有时责备批评者们的批评不完善,说他们的批评有时并非百分之百正确。同志们,这是错误的。这是很大的误解。不能要求批评百分之百正确。谁要是批评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就排除了提出批评的任何可能,特别是来自工农群众的批评的可能。普通的工人或农民哪里能组织最最完善的批评?同志们,这是空想。如果批评哪怕只要5%—10%是正确的,那么,这样的批评就应该欢迎,应该认真地去倾听并考虑好的地方。否则,我们就得堵住千百个来自基层的我们的文学家和评论家们的嘴,他们在自己的批判工作中还不够内行,但他们所反映的是事实的真相。正是为了不压制批评,而是要鼓励批评,正是为了这一点,必须认真地听取苏联人民的各种批评,即使有时批评甚至不完全正确或者不是所有部分都正确。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群众才能相信他们不会因为不完善的批评而受到申斥以及相信他们不会因其批评意见中的某些错误而被“讥笑”。

为什么我说这些?因为一些发言人对批评的意义和目的并不完全清楚。一些同志这样议论:既然开展自我批评,那就意味着一定是想要撤某人的职。(笑

声)而有些人认为,既然批评教育人民部的实际工作,那就意味着想搞垮教育人民部而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受益。当然,这一切是不正确的。问题并不在于撤某人的职或者搞垮一个人民委员部和加强另一个。不,同志们,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揭露我们管理国家的实践中的缺点,并在揭出这些缺点后,本着减轻和加速我们发展的精神来改变我们的实践工作。说的是这个,而不是什么别的,同志们。如果想要知道我个人的观点,那我主张不撤任何一个与沙赫特案件有关的管理人员的职。有人在这儿找被告。不用找被告,同志们。如果要找的话,那我们大家在这里都是被告……

臧声:对。

斯大林:从党和国家中央机关到基层组织。问题是要揭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并共同消灭它们。而为此需要开展自我批评,诚恳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并希望改正这些缺点。

有关第一个问题的情况就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同志们在此很少涉及,这是关于沙赫特案件的阶级内幕。事实上,沙赫特案件的根子隐藏在何处?这种经济反革命在何种阶级秩序的基础上能够发生?有些同志认为沙赫特案件是偶然的。他们通常说:我们这儿忽略了秩序,没有注意到,假如我们不疏忽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沙赫特案件。这里有疏忽,而且疏忽还很大,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但是,用疏忽来解释一切,这表明不明白事情的实质。事实说明了什么?事实表明,沙赫特案件是由过去控制煤炭工业的部分资产阶级专家们挑起的一场经济反革命事件。事实接着表明,这些曾经组织起秘密小组的专家,从现移居国外的原老板[在欧洲]和西方的反革命的和反苏的资本主义组织那里得到搞破坏活动的经费。事实最后还表明,这个资产阶级专家小组是根据西方的资本主义组织的指示进行活动和破坏我们的工业的。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是在这里与西方反苏的资本主义组织对我国工业进行的经济干涉打交道。过去有过军事、政治干涉,我们用国内战争的胜利消灭了这种干涉。现在我们遇到了经济干涉的企图,为了消灭它,我们并不需要去进行一场国内战争,但我们还是应该去消灭它,我们应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方法去消灭它。

设想国际资本不来干涉我们是愚蠢的。不,同志们,这不对。存在着阶级,存在着国际资本,它不会平静地看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发展。过去,国际资本想用直接军事干涉的方式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前途落空了。现在和将来,它将一如既往地用看不见的、不经常看得见的、但有足够威力的经济干涉的方式

来削弱我们的经济实力,组织破坏活动,在各个工业部门蓄意制造各种“危机”,以便将来可能进行的军事干涉更轻松些。这里的一切都交织在国际资本与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任何偶然性可言。只有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要么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采取革命的政策,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把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受压迫者组织起来,到那时,国际资本将竭力来干扰我们前进;要么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转而对国际资本做一系列原则性的让步,可能国际资本看来不会反对“帮助”我们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有些人觉得,我们可以采取革命的对外政策,并同时争取得到西欧资产阶级的好感。我不再去证明这些人与我们的党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了。例如,英国要求我们同它确定在某地,譬如说在波斯湾、在阿富汗或者在土耳其的势力范围,并且它提出保证,如果我们做出这一让步,它就准备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怎么样,同志们,也许我们走这一步?

喊声:不!

斯大林:美国要求我们原则上放弃世界革命的政策,要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做出这种让步的话,一切都会顺利。怎么样,同志们,也许我们要做出这种让步?

喊声:不!

斯大林:如果我们同意与日本分割满洲里,我们就能与它建立“友好”关系。我们能做出这种让步吗?

喊声:不!

斯大林:或者比如有人要求我们“减少”对外贸易垄断并同意偿还所有战时和战前的债款。也许去这么做,同志们?

喊声:不!

斯大林:但是,正因为我们不能违背自己去做出这些和这样的让步,所以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国际资本将总会一直给我们制造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管这是沙赫特案件还是什么别的类似的事件。

这就是沙赫特案件的阶级根源。

为什么国际资本的军事干涉得以在我们这里发生?因为我国有一大批军事专家、将军和军官、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孝子贤孙,他们总是准备挖苏维埃政权的墙脚。这些军官和将军如没有国际资本的财政及其他援助,能否组织像样的反对苏维埃政权战争呢?当然不能。如没有这个白匪军官和将军集团的援助,国际资本能否组织重大的干涉行动?我想,不能。那时我们有的同志认为军事干涉是偶然的现象,如果我们不释放克拉斯诺夫、马蒙托夫¹¹⁰等人,那干涉本不会

发生。这当然是不对的。释放马蒙托夫、克拉斯诺夫等其他白匪将军在国内战争的发展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对此不可能有怀疑。可军事干涉的根源并不在此,而是在于以苏维埃政权为一方、国际资本及其俄罗斯的将军残渣余孽为另一方之间的阶级矛盾,对此也不可能有任何怀疑。

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在财力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如果不是寄希望于国际资本能帮助推翻苏维埃政权,一些原为矿主的资产阶级专家们能在我们这里制造沙赫特案件吗?当然不能。如果在我国不存在某个准备进行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专家集团,国际资本能在我们这里组织类似沙赫特案件的经济干涉吗?很清楚,不可能。总之,我们这儿有没有这样的准备进行经济干涉的资产阶级专家集团呢?我想是有的。

臧声:他们有很多。

斯大林:我不认为他们会有很多。但是,我们这儿存在着某些不大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专家集团,他们比干涉时期存在的要少得多,对此是不可置疑的。这两股势力结合在一起就会给对苏联进行干涉提供基础。

沙赫特案件的阶级内因就在于此。

现在来谈谈从沙赫特案件得出的实际结论。

我想讲一下沙赫特案件提示我们的四点实际结论。

1. 列宁说过,选拔人才问题是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沙赫特案件表明,我们没有很好地选拔我们的经济工作者,而且不单单是没有很好地选拔,给这些干部所提供的条件还阻碍了他们的成长。有人在这里提到了第33号法令,特别是提到了这一法令附带的《规范条例》。这个《规范条例》的特点是它几乎为技术经理提供了所有的权力,而只给经理留下调解冲突、“当代表”和弹巴拉莱卡琴^①的权力。很清楚,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经济部门的管理干部们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当时这条法令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它是在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经济部门管理干部的时期颁布的,那时,我们不会管理工业,出于无奈不得不把主要的权力交给了技术经理。但现在这条法令变成了枷锁。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经济部门管理干部,他们有经验并能成长为我们工业部门真正的领导人。正因为如此,是到了取消陈旧的规范条例和将它更新的时候了。有人说,共产党员们,特别是工人党员—经济工作者们不能掌握化学公式,根本不懂技术知识。这是不对的,同志们。世界上没有布尔什维克工人们不能攻破的堡垒。我们过去在同资产阶

^① 俄罗斯民间的一种三弦的三角琴。——译者注

级的斗争中攻下的岂止是这样的堡垒。所有问题在于要有掌握技术知识和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布尔什维克式的耐心武装自己的愿望。但为了改变我们经济部门管理干部的工作条件和帮助他们成为真正的和全权的事业主人,必须取消老的规范条例,用新的条例取而代之。否则,我们会有损害我们的人的危险。譬如说在3年前,难道雷库诺夫比我们中的任何人差吗?像雷库诺夫这样的人在其生活中同资产阶级混到了一起,开始腐化堕落。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们经济的实践是不正确的,说明我们经济部门选拔干部和工作的条件阻碍着这些工作的开展,使他们变为资产阶级专家们的尾巴。应该结束这样的实践,同志们。

2. 沙赫特案件提示给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在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里教育干部,我们没有很好地培养我们的红色专家。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结论。我满意地听到了安德烈耶夫同志的真正的革命的讲话。他建议在完善我们的实践方面改变方向。这是完全对的。但遗憾的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必须在这方面讲一下。安德烈耶夫同志同意在我们管理的所有领域,即在党的、工会的和经济的领域里改变我们的实践工作。可他留下了一个领域没有触及,那就是培养新的红色专家这个领域。他想仍然按照老办法来做这项工作,他不明白原来教育和培养新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实践需要有重大改变,他不明白在这方面同样需要改变方向,使其朝着完善我们的实践工作的方向发展。安德烈耶夫同志要我们相信在新老专家之间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因为在新的专家中间有时会遇到这种在做坏事方面不亚于某些老的反革命专家的无赖。但是,如果在这里真的有阶级斗争的成分,而它们确实在这里存在着,那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应该这样来武装新的专家们,要使他们在同老专家们的斗争中获胜,而不是失败。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新的年轻的专家们不断地在与老专家们的斗争中失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照着书本学的,他们是书本知识的专家,但他们没有实践经验,他们脱离生产,他们自然也要失败。难道我们需要这样的专家?不,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专家,哪怕他们是年轻3倍的专家。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专家:不管他们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他们不仅要擅长理论,而且在实际经验和与生产的联系方面也要有很强的能力。一个未见过矿井和不想进矿井的年轻专家,一个未见过工厂和不想在工厂里蹭脏自己的年轻专家,这样的专家永远不能战胜在实践中久经考验的老专家。所以,不仅老专家们,不仅我们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而且还有工人们,常常会与这样的年轻专家格格不入,就容易解释清楚了。

但为了不发生与年轻专家们的这种突发事件,必须改变对他们的教学,而且要这样来改变:要使年轻专家们从他们在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最初年代就开始与生产、工厂、矿井等保持紧密的联系。那谁更容易在教育年轻专家的实践中进行这种改革——是教育人民委员部还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呢?我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更容易实施这种改革措施。我想,如果我们哪怕把几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我们就会在加快培养新的,真正有经验的专家方面获益。我想,在这种条件下,年轻的专家们就会在同资产阶级老专家们的斗争中更好地武装起来。那时,我们会有几十所高等技术学校掌握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手里,有几所高等技术学校掌握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手里,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建立起一种竞争关系,它们就不得不改善教育年轻专家们的工作,那我们最终就能加速进行培养新专家的工作。

就是这么回事,安德烈耶夫同志。

为什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要比教育人民委员部更容易做好这件工作呢?不是因为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人比起来,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经验更少或者能力更差吧?当然不是。从这个观点来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可以说是处于同样的位置。那么区别在哪里呢?

第一个区别在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并且它比任何其他人民委员部更关心加速培养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的事情,而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够把其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这项工作上。教育人民委员部则是另一回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应该培养数学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生、律师、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等等。教育人民委员部不可能同样程度地去重视所有这些学习领域。从这一观点出发,应该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负担过重,只要把几所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管理,它就能顺利地减轻负担。

第二个区别在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能比教育人民委员部更合理地挑选自己的教师队伍,因为前者不仅有研究理论的教授,而且还有能在高等技术学校教书的精通工业的实践家。而这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最后一个区别在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由于自己的地位,将更容易使高等技术学校同工业实际结合起来。不见得能证明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方面能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平起平坐。而大学生们同工业部门的联系是减轻从年轻干部中培养优秀专家工作的主要因素。

有人说,外国的高等技术学校集中掌握在人民教育部的手中,而不是在私人资本家的手中。就算情况是这样的。

古比雪夫:不是到处都是这样。

斯大林:就算情况是这样吧。它也应该是这样的。我想,培养专家的工作应掌握在国家或者国家的人民委员部手中,而不是私人资本家的手中。但是,难道我们的问题在这里吗?要知道我们是把几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而不是转交给私人资本家,它同教育人民委员部一样,也是国家的一个人民委员部,区别仅在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全联盟的人民委员部,而教育人民委员部则是共和国的,而且这个区别并非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利,而只对它有利。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几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同时保证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机构参与这些高等技术学校的领导工作,那么,我们无论在培养新专家还是从工人中选拔学生的工作中只会得益。

这是否意味着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方面注定要垮台?当然不是。大部分高等技术学校还继续留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里,而教育人民委员部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的竞争只会会有好处。假如我们不把任何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是否意味着这样做我们就会毁了事业呢?不,没有这个意思。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在加速培养新专家方面失利了。而速度对于我们来说意义最为重大。

菲加特纳:这些高等技术学校会不会处于特权地位。

斯大林:不,菲加特纳同志,根本不一定是这样。问题并不在于特权,而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把高等技术学校与生产结合起来。

霍多罗夫斯基:我们在这方面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没有争论。

斯大林:不,霍多罗夫斯基同志,这里所说的不是指高等技术学校目前的领导人,而是指要改变和改进对高等技术学校大学生的教学实践。

霍多罗夫斯基:我指的不是那个。

斯大林:有人说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转交几所高等技术学校意味着当前体制的瓦解,当前教学模式的瓦解。这不能令人信服,同志们。不能使模式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我们从未答应要做模式的奴隶,也从未发过誓要对任何一个模式绝对忠诚。例如,众所周知,一年前,当我们面临有关我国工业部门指挥人员的问题时,我们组织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工业学院¹¹¹。这个学院至今还在,而且如了解情况的人士所说,它运作正常。大家知道,那时我们对由哪个人民委员部参与组织工业学院的问题有过争论:是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还是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参与。争论的解决是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参与。因

此,我们对模式有所“摧毁”,如果你们想这样说的话。我们从中得到好处了吗?我想,我们是获利了。接着你们知道,高等军事学校是掌握在军事人民委员部而不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手中。这是好还是坏?了解情况的人说,这非常好,因为这种情况减轻了培养军事管理部门的指挥干部工作的困难。这是否是某种“摧毁”或者是模式的改变?很清楚,是的。同志们,那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由于害怕模式而畏惧改进对工业部门新干部的教学工作吗?

我们有没有任何关于向有关部门或组织转交某些高等专业学校从而得到良好结果的经验?我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以党为例。大家知道,党有自己的高等院校。正因为它直接领导自己的高等院校,所以,可以认为我们的党是一个配备最为齐全的组织之一,从县的工作人员一直到州的工作人员。也许为了模式要把这些高等院校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那会怎么样?或者比如军事部门。众所周知,中等和高等军事院校(总参谋部的学院)集中由军事部门把握。在这些学校里就读的大约有2.5万—2.6万名大学生。那又怎么样?可以肯定地说,军事部门是干部配备最为齐全的部门之一,从连队指挥员一直到军区指挥员。这好吗,同志们?我想是好的。但如果按照模式来进行的话,那这些学校就应该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去管理了。

我知道在培养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之间是有区别的。洛莫夫同志是完全对的,他说军事干部的培养要比经济干部容易些。事情本来就很清楚,正因为经济工作更为复杂,所以必须使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转交某些高等技术学校的事有所进展。这将是有益的和符合逻辑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整个实践中正在转变方向,似乎在培养经济干部方面也应该改变方向。

某些同志害怕事情向好的方面迈出一小步,这是非常奇怪的。这种胆怯来自何方,它对于布尔什维克们来说是否体面?我想,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有些人就像是契诃夫笔下的那位动不动就说:“可别出什么事”的主人公。众所周知,不管雨天还是炎热的天气,这位契诃夫的主人公总是带着雨伞、穿着套鞋,这是“为了小心翼翼”。比方说,跳出一只蟑螂,露出了触须,我们的主人公就急忙闪到一边,说:“可别出什么事。”同志们,可我们不能去模仿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我们不能这样去推动事情向前发展。我们应该在这方向前迈一小步,即便是能确保培养新专家的工作加速进行的一小步也好。

喊声:重要的一小步。

斯大林:不很重要的一小步,同志们。两年前,我们拖延了这个问题,后来把它官僚主义地推给了一个委员会,它最终艰难地产生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

会管辖下的工业学院。可这是发生在两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有以沙赫特案件这种形式出现的警告和报警信号。为了向前迈出新的一小步,难道这还不够吗?

古比雪夫:是不是迈出更勇敢一些的一步呢?

斯大林:古比雪夫同志,我反对更勇敢的一步。

古比雪夫:我只主张迈一步:总共8所高等技术学校。

斯大林:让我们限制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之内,我们瞧瞧,比任何其他人民委员部更关心此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干些什么(笑声)。如果它证明它能做更多的工作,那时就能看清楚了。

喊声:那如果不能呢?

斯大林:3. 第三个结论关系到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工业的工作问题。根据沙赫特的材料来看,这方面的情况怎样?非常不好。坏到了极点,同志们。已经证明,劳动法典遭到破坏,每日6小时地下作业的制度得不到履行,劳动保护的条件受到压制。而工人们忍着;工会不说话;党组织不采取措施去消除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党要求每天地下作业7小时的说法使工人们惊愕,但工人们仍在干着活,因为如果党有指示的话,他们准备干得更多。谁需要这种欺骗,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手段?为什么要嘲弄那些有充分理由被称为英雄的工人们,而且不只是工人们?不久前去过顿巴斯的莫洛托夫同志,跑遍了那儿的矿井,并向矿工们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条件。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矿工认为需要对条件去发牢骚。莫洛托夫问他们:“同志们,你们过得怎么样?”矿工们回答他说:“没什么,同志,过得不坏。”莫洛托夫问:“我去莫斯科,告诉我,我应该向中央汇报些什么?”矿工们回答他说:“告诉那里的人,我们过得不坏。”莫洛托夫对他们说:“听着,同志们,我可不是外国代表团(全场大笑),我是俄罗斯人,到这儿来是为了了解你们的真实情况。”矿工们回答他说:“我们无所谓,莫洛托夫同志,我们对外国人和对我们的人都说真话。”这就是我们的矿工们的面貌。他们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英雄。这正是我们得以积累在工人们心坎里的那种精神资本的财富。只是要想想,我们是在褻渎地、罪恶地滥用这笔无价的精神资本……

喊声:对。

斯大林:十月革命最伟大遗产的继承者是多么愚蠢和毫无用处呀!但是,同志们,总是抱着过去的精神资本不放,轻率地滥用它是不行的。该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早就到时候了。如果说工作6小时,那就应该诚实地和认真地去完

成。谁不想去完成,就让他尸首分家!如果有工人的工会,它们有义务捍卫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那就应该做到让这些工会运用相应的权力,让它们不要逃避自己应尽的义务。我们工人的国家也是为此而存在的。如果有人提,提拔工人的工作做得不好,那就应该明白,在破坏劳动保护最起码的条件下,这方面的情况不可能好。如果事情发展到了甚至沙赫特区的工人中都有人怀疑:“这是他们(即资产阶级)的政权,还是我们的”,那就应该明白,在这种秩序下,我们就将无法吸引广大的工人群众参与工业管理的工作。到时候了,是该结束我国工业部门中这种混乱现象的时候了!

4. 最后,第四个结论是关系到执行情况的检查问题。沙赫特案件表明,在所有的管理领域里,在党、工业和工会领域里,我们这里执行情况的检查工作状况坏极了。写决议,发指令,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要问问自己:这些决议和指令完成得如何,它们是被执行了还是被压在了书桌上的垫毯下面?伊里奇说过,国家管理事业中的严肃问题之一,是检查执行情况问题。但是恰恰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况糟糕极了。领导不光是写决议和发指示。领导——这意味着要检查指令的执行情况,而且不仅是指令的执行情况,还要检查指令本身,它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认为我们所有的指令都百分之百正确的想法是可笑的。这种情况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同志们。检查执行情况也正是为了使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实际经验的熔炉里不仅要检验我们指令的执行情况,而且要检验指令本身的正确性。所以,在这方面的漏洞就意味着我们整个领导工作中存在漏洞。

就拿检查纯粹党的系统的执行情况为例吧。我们通常是召见州委和省委书记到中央作汇报来检查中央指示的执行情况。书记们汇报时承认自己在工作存在的缺点。中央揭出这些问题并做出公式化的决议,指出要加强和拓宽工作,强调这点和那点,要求重视这点和那点等。(笑声)书记们带着这些决议回到地方上。以后又重新把他们召来,又还是那些加深和拓宽,等等,等等。我不是说整个这项工作没有用处。不,同志们,这件事在培养和振兴组织这个意义上有其好的一面。但必须承认的是,这种检查执行情况的方法已经不够了。必须承认这种方法应该由其他方法来补充,这就是用派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成员去参加地方工作的方法。

喊声:这是件好事。

斯大林:我说的是把我们的领导同志派到地方去临时工作,不是作为指挥人员,而是作为听从地方组织命令的普通的工作人员。我想这件事有远大的前途,

如果诚实地和认真地去履行的话,它能使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得到改善。

乌加洛夫:应该让这些去的同志不住进经理的家里。

斯大林:经理是各种各样的,乌加洛夫同志。不久前,我看了话剧《轨道在轰鸣》¹¹²,其中描绘的主人公是一位工人出身的党员经理。去看看这个话剧,你们就会知道,工人出身的经理是一个应该竭尽全力给予支持的、饱经忧患的人。

喊声:对!但不是任何人都这样。

斯大林:耐普曼^①暗中监视着他,任何一个专家都对他吹毛求疵,妻子攻击他,尽管这样,他经受住了这场斗争,他清清白白地通过了这场斗争。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为什么不在这样的经理家里住下呢?

那么,同志们,政治局关于派遣我们的领导同志参加临时的地方工作的相关决议草案务必要通过。如果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人民委员及其副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工会中央主席团成员,其中还有施瓦茨同志……

喊声:首先。

斯大林:如果他们将有组织地到地方上去并在那里开展工作,为了了解工作、研究所有的困难、所有的短处和长处,那么,请你们相信,这将是真实的和最有效的一种对执行情况的检查。这将成为丰富我们尊敬的领导人经验的最好的方法。如果这成为一种制度,而且这务必要形成制度,那么请你们相信,我们在这里签署的法令和我们所发布的指令会比目前的这些要更具有生命力和正确得多。

主席:乌格拉诺夫同志发言。

喊声:休息!

(休息后)

主席:同志们,我收到有许多中央委员签名的一项建议:增加后面参加讨论的人的发言时间,从10分钟增至15分钟,但要严格遵守这一点。丘巴尔提出了修正意见:形式上给大家增加到15分钟,而实际上增加到40分钟。(笑声)名单上有62名发言人。

斯克雷普尼克:别吓人,您总归不会让所有的人都讲。

主席:对此有哪些建议?

^① 耐普曼——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分子。——译者注

喊声：保留原来的顺序。

主席：谁赞成原来的“无序”？（笑声）谁赞成给发言人增加到15分钟？大多数。乌格拉诺夫同志发言。

乌格拉诺夫：斯大林同志在其讲话的第一部分指出，坚决地和一贯地通过自我批评揭出我们全部的缺点是保障我们的工作进一步顺利开展的最重要的条件。我试图在这方面谈一些问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自己的报告中说，现在我们需要客观地评价局势。那么，如果从沙赫特案件的角度来客观地评价我们的经济建设的话，那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一个党，我们领导得非常不好，在把握按照我们的指令所进行的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也做得不好。

米高扬：对。

乌格拉诺夫：这就是能给目前的局势所做出的总的原则上的评价。

为了证实这一评价，我试着来研究一系列与经济建设有关的个别问题。现在我来谈关于经济管理干部的问题。我认为克服那些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出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今后我们的任务是提拔新人，但更多取决于我们是如何更好地做那些这10年来在我们这里成长起来的经济管理干部的工作。而我们对经济管理干部们的工作至今做得不好，这是毫无疑问的。让我们沿着从基层、从党支部到中央整个这条线来看一看，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经济管理干部们给予了很多关注，花费了很多时间呢。并非所有支部的人都认为，有时让表现好的、党员出身的经济管理干部进支部委员会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说：“他是经济工作者。”在党的、区和县的委员会里，近年来，我们有进步，那里对经济工作者开始给予更多的关注。但如果从考虑经济管理干部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及其遇到的困难的观点出发，而他们是有很多工作经验的，他们也有许多困难，那么，不管怎样，我们有没有真正地、越来越多地掌握经济工作者工作中的这些经验和困难呢？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掌握得极差，所以，对现有的经济管理干部做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近3年来，我们在莫斯科委员会的实践中不断地集中力量干这件事，通过吸引经济工作者靠近党组织的领导机构来加强党在经济工作者中的领导。我们提出的任务是要使经济部门的党员管理人员一方面成为党员社会活动家、群众的领导人，另一方面要成为出色的经济活动组织者。我们实行的就是这条路线。当我们提出关于人的问题时，现在的任务在于要提拔新人，而另一方面要加力做好现有人员的工作。

略谈一下关于我们白白浪费经理人才的情况。我们早在1至2月在莫斯科

市委全会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莫斯科组织的实践中，不珍惜经济管理干部——经理的现象也开始成为一种时尚。这里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这种漫不经心和是非不分地攻击经济工作者的现象。现在，中央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推动此事和对经济工作者提出更多要求、为他鼓劲并同时支持他提供了可能。工作做得不好时就斥责，工作做得好时就支持。我认为，做经济工作者的工作的形式之一是更多地组织党委会（从区委会到党中央委员会）下属的经济工作者会议，以便总结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工作结果、安排好他们的工作等。那样，党的工作者、经济部门的党员管理人员就会减少与专家们的共处机会。要不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忙于自己的工作，很少与党委会取得联系，而经济部门的党员工作者扎在专家堆里忙这忙那。这就是为什么往往小市民作风害死人、共产党员的怀疑态度和坚定性变得迟钝了。如果我们能提出一项任务：有计划地考虑经济工作者的经验、听取他们的意见等，那么，这将有可能更好地组织经济活动和加强干部队伍。

关于专家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以自己的总政策在专家中间赢得了极大多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粗略地说，大约有1/3的人是骗子、怠工者等，但占2/3的大部分人可以说是在诚实地工作着，的确，在这2/3中，有一部分人工作消极、无精打采，可是我们把大多数人争取到了自己这一边来。但要是说我们经常不断地把他们组织起来，这就不是事实了，在这方面，从上到下我们都工作得不好。说得粗俗一点，在支部里、在各个工厂里，至今还是把工程技术处看做是神出鬼没的地方。企业经理是怎么对待工程技术处的？也不好。企业经理应该按照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章程进入工程技术处。他进到那里了吗？没有，没有进去，对他们不屑一顾。我们企业的党支部对工程技术处是否重视呢？一点都不重视。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讨厌的苍蝇一样。在工会方面的情况也一样。几年前有人就此冷嘲热讽地说：“何苦建立这些工程技术处”，在对待工程技术处的问题上，有的地方，这样的偏见在工会干部中间至今仍保留着。

事情本来就很清楚，如果我们自己不从组织上对工程技术力量施加影响的话，当然，那里就会产生守旧思想、停滞萧条等问题。由此而来的就是这些保守分子老头们对年轻的工程师们纠缠不休。我们的莫斯科委员会就沙赫特案件召集了一次党员工程师会议，同志们给我们谈了许许多多关于各级党组织以及莫斯科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现在的任务是要在这方面坚决地抓好工作。

关于新生力量的问题。说新生力量受到排挤，这是毫无疑问的。说青年中

间有不想干活的“赫列斯达科夫式的人物”^①，这也是事实。

但另一方面，同志们，过去，1—2年前可能发现不了的那些东西，如今就应该发现了。现在我们这儿出现没有工作的，不能参加工作的年轻工程师干部。一方面，他们不能参加工作是因为不让他们干，而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由于没有给行政技术人员拨款而无法要他们。经费往往被我们的政府砍掉……

臧声：对。

乌格拉诺夫：应该看到这些东西，应该琢磨透它们。我们削减的结果是，比如，在瑞士，在李可夫同志报告中提到的那个方面，有15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而我们只有2名。如果你们想有哪怕5名的话，那就需要给钱，就是这么回事。

现在来谈关于科研所以及我们掌握科学技术思想的问题。近一年来我过问了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科研所里有些什么呢？排挤。在科研所里共产党员受到排挤，让他们无路可走。科研所的一些领导人就直截了当地声称：说什么用不着共产党员去做专门的科学工作。他们需要去做宣传鼓动工作，他们需要去做社会主义的理论工作。这是科研工作的事，这是具有特种气质的人的事，等等。对此要作坚决的斗争。而且我认为，这项工作做得不好、推荐共产党员去做科研工作不力，是因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来自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的领导不好。那里有外行的同志，他们在我们杰出的科学家中没有威信。

臧声：对。

乌格拉诺夫：许多是杰出的大科学家的党员同志，其中包括矿业学院院长古布金同志，实际上都是被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撵出来了。我们可以指出一批被说得一无是处的同志。国家石油研究所实际上受到排挤并对我们正在发展的石油工业基本建设没有任何影响。捷尔任斯基批准了关于科研所，尤其是石油科研所的条例。开始拨出资金。现在事情又停顿了。给石油研究所拨了可怜的30万，而所有的数百万都给了地质委员会。那谁在这个地质委员会坐镇呢？都是些死硬派。而开始练就出新的科学干部，新生力量的科研机构受到排挤，多一个戈比都不给。这是可以得到证明的。莫斯科委员会拥有这些材料。中央监察委员会、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也同样拥有这些材料。

必须真正地提出关于我们在科学和技术方面采取较高姿态的问题。必须在

^① “赫列斯达科夫式的人物”是来自《钦差大臣》主人公的名字，意为吹牛撒谎、招摇撞骗的人。——译者注

最近,在中央、工农检察院、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这次全会结束后抓这件事,要真正地清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并安排真正的人,以便推动这项工作。

臧声:对。

乌格拉诺夫:现在谈关于在专家中间开展工作的问題。莫洛托夫同志说需要在专家中间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而不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去开展工作。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去做专家们的工作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将会是顺利的,条件当然是我们要全力以赴地、要有组织地、要比此前更起劲地投入这项工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要对毕业于我们高等院校的新干部给予头等的重视。

关于将几所高等院校从教育人民委员部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问题。我本人于1920年离开部队后,在列宁格勒担任省工会理事会书记,我也赞成将几所高等院校,尤其是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经济部门。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正了我们,他指示我们说:“你们破坏我党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纲领”¹¹³,所以,我们当时停止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至今过了8年,我们的形势改变了,我想,可以试着将几所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了。我认为做这种尝试并不会破坏我们党的纲领,而如果犯错误的话,我们可以退回来。

斯克雷普尼克:时代变了,原则也变了吗?

乌格拉诺夫:没有,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在改变了的形势下,需要采取某种应变措施。

臧声:对,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

斯克雷普尼克:虽然不是太好,但总还是和过去不同了。

乌格拉诺夫:我认为,同志们,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做专家们的工作,这意味着要更好地安排、更好地使用我们的新干部,要为他们能更好地学习提供保障。这就是按照无产阶级方式去做工作。但是,我们能不能现在就认为并且说,我们该从日程上取消按资产阶级的标准给专家们报酬的任务,说在这方面不必同他们打交道了呢?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从较高的工资上说,还不得不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打交道。应该按资产阶级的标准去付报酬,要对那些能做好工作的专家们付给较高的酬劳,这样最终才能完成真正的无产阶级事业。这里不存在任何曲解。我是这样看这件事的。

现在来谈下一个问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说从沙赫特案件可以看出两个主要问题:基层党的、工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很差以及极端中央集权制。请允许我也分析一下这些问题。

关于三角关系^①工作做得差的问题。当然,在我们的企业以及上级党的、工会的和经济部门的组织里存在着不少缺点。如果看一下企业的情况,这里存在着工会组织不关心群众的要求和行政部门的独断专行以及党组织的压制。例如,在莫斯科,当然这不是我们这里的普遍现象,可也有这些事情发生。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关于三角关系工作的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个老问题,但它仍然将一直是新问题,对它必须研究又研究。很遗憾,由于时间不够,我不能详尽地去对它进行分析。

下一个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李可夫同志提出来的关于极端的中央集权制问题。我应该指出的是,基层的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工作问题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并且主要由于上级部门在计划和中央集权制方面的错误产生了额外的困难。请允许我对一些问题做些分析。我们来看看很多人在议论的关于计划方面的频繁变动,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基层组织的工作引起的。厂长、支部书记、厂委会主席有时为了扩大和改建自己的工厂,于是施加压力,提出要求,迫于来自地方上的压力,有时会产生虚浮的计划。但这只占1/3,占2/3的基本建设和改建工作还是要取决于上级机关的决定。当基层、企业的工人们从一个项目到一个项目、建设到改建被推来推去的时候,这当然只会引起完全合法的不满和激烈的批评。请你们说说,当南方钢铁公司的许多企业、我们莫斯科和还有什么地方的一些企业里还搁置着尚未利用过的进口设备时,工人们的情绪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引起不满!请问,基层党组织是否有很大的过错?没有。我们应该从经济部门、党、工会和苏维埃各方面来反思自己。最终我们是在上级机关等地方制定政策的。管理中的所有这些荒唐事对于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来说是最大的障碍,它引起了工人们的不满。工人们起先求见经理,然后开始找更高一级了。这时候,工人意见的重心开始从经理转移到上级机关。重心开始转移,而且是正确的转移,可是为了使这整个系统协调好,我们必须将经济的计划性和中央集权制的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不好。

与中央集权制和计划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工业原料的供应经常断档。一个月前,在政治局会议上,我向米高扬同志提了一个问题:米高扬同志,能否保证亚麻工业的亚麻原料的供应?他说:能!而我手里有文件,说今年与去年一样,亚

^① 这里指的是苏联时期苏联机关、企业中由党、政府、工会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译者注

麻工厂有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将停产,因为亚麻原料尚缺20万普特。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是因为所有的经济工作者确定亚麻产量为850万普特,而内外商业人民委员部所确定的产量为920万普特。其结果制定了一份很大的出口定额,可亚麻却没有那么多。于是,我们的这个工业部门停工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而我们将为停产付出一笔巨大的款子,我们知道,在莫斯科,仅“全苏工艺纺织品加工”托拉斯去年我们就因停产而亏损了71.9万卢布,至于其他亚麻托拉斯的亏损我们已经不去说它了。这就是上级机关中央集权制和计划性的错误。不管你怎么样叫,一点也没有用。我们莫斯科有个不大的皮毛托拉斯。我们需要原料,但是不让我们采购。内外商业人民委员部把所有的东西都中央集权化了,以致我们在莫斯科甚至连抓猫玩玩都不让,真是见鬼了。(笑声)

造成这样无休止的拖拉,使得任何有益的事情也做不成,我深信,这样,原料全被集中了,结果是全部原料都被闲置起来了。你再翻腾也没有用,由于亚麻工厂原料供应的断档,这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滞留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中央集权制、经济计划性的问题要求我们对其采取特别关注的态度。再举一个我们与中央集权制打交道的例子:我们有玻璃瓷器托拉斯——一种生产像餐具、瓦罐、杯子、玻璃制品等产品的轻工业,似乎只要把产品投放市场就行了,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作状况应该最为出色。但实际的情况却是,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工业部门经常无力按期给自己的工人们发放工资,没有周转的资金,等等。原来是它被如此中央集权化,以致它的全部产品必须交由硅酸盐制品销售辛迪加来处理。而这是个非常不灵活的产物,它使我们感到窒息,瓷器托拉斯和莫斯科玻璃瓷器托拉斯的产品常常躺在它的仓库里,而瓷器托拉斯无力支付全部工资。与此同时,劳动和国防委员会谴责托拉斯理事会并向法院对其提出起诉,理由是他们没有完成关于通过硅酸盐制品销售辛迪加销售产品的指令。我们就是这样搞中央集权制的。可以实行中央集权制,可以实行计划,可以也需要实施通过辛迪加制度来销售产品,但不是永远这样。如果有规格化的产品,那可以实行,但在这方面不能对所有的生产照搬一个公式来套。必须适应市场的条件,必须考虑到这些,必须迅速地适应。如果有过火行为,所有这些都要预见到并予以消除。由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时间不多,我不想在这方面多谈了,但我想,从总的方面来看,我们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会更详细地讨论经济建设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想真正地进行领导,那么,我们就应该着手研究这些经济建设问题,而不能回避它们。在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不能像现在这样生硬地搞中央集权和计划,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将会演变成阻碍经济发展和破坏工人群众积极性的官僚主义的中央

集权制。

我还想说一说关于工人阶级力量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提高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情。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取之不尽的。但如果我们想使这种热情持续不断,如果我们想继续保持这种热情,如果我们想使这种热情不断扩大,扩大到越来越新的工人阶级阶层的话,我们必须尽量减少错误,尽量少犯错误,努力不再犯那些我们常有的严重错误,现在我们不能犯严重错误。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前,我仔细观察和倾听了工人们的情绪,我是经常去工厂的,我发现,中亚水利经济事件¹¹⁴让工人们非常不安。这一事件引起了工人们的强烈关注。在每个工厂都能感受到这一点。总之,工人们非常关注我们这儿经常发生的重大不幸。但使工人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这个新的沙赫特案件。工人们对这个事件的关注是非同小可的。工人们的情绪是这样的:我根据莫斯科工人们的情况也许可以说,工人们有无穷的意志和力量去克服所有的缺点,去克服我们的道路上面临的所有的困难。但与此同时,工人们越来越坚定地说:“少出缺点,少犯错误。我们在生产中干得很好,而你们今后不该再出那些你们有时出的严重毛病了。”我认为,为了使工人阶级在今后工作中保持全部力量、能力和干劲,我们的任务是要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去克服那些我们所犯的错误,克服有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当我们现在实际上重新签订集体合同的时候,工人们说:“可真是见鬼,你们对我们是一味地施加压力,可你们自己却经营得这么差!”的确,如果看看实际情况,那我们会发现,与战前相比,我们的工人们在许多业务部门中的工作强度要高出0.5—1倍。工人们说:“瞧瞧我们是在怎样干活,可你们经营得太差了,常常是跌跌撞撞,工作上不节约,不珍惜钱。”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要改善我们的管理状况,要珍惜每一戈比,要存好钱。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党的国家工业化路线完全是正确的,但我们现在应该关注如何很好地理财,如何合理地使用钱财。从这里也就引出了计划性等问题。与此同时,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问题变得极为迫切。有哪些方式能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这一事业呢?生产会议。这方面我就不谈了。生产代表会议。我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们在莫斯科每年都举行各经济部门的生产代表会议。这种生产代表会议是在老的财政年度行将结束、新的财政年度即将开始时召开的。在这些生产代表会议上,讨论这些联合体经济建设的所有问题。这是向前迈出的的一大步。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于这一步,我们在莫斯科开始作为试点,划出100个经济部门,如今在这些经济部门中成立了来自于莫斯科省境内的托拉斯或管理局的各企业的工人积极分子组织,工人积极分子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我应该直截

了当地指出,工会方面对这件事有点冷淡,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这是由于工会轻视这项工作。但是,这个工作方法,即在各经济部门中有来自企业的工人积极分子,这是件最为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关于此事的材料有没有拿给党中央去研究,但我们很想劝党组织的其他同志们去做这件事,去安排好这件事。这样做的结果会是在每个企业里动员起一批人,他们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已不仅可以直接找经理,同时也可以找托拉斯。而且这项工作正在系统地进行,这当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项工作涉及越来越多的经济建设部门。我认为这一经验该推广到其他的组织去实行。这有助于破除因循守旧,克服保守主义和经济部门领导人、工会工作者和党员们存在的冷漠态度。需要朝这方面去努力。

现在要谈到党的领导的问题了。为了克服所有存在的这些缺点,只有当党去亲自抓这项工作时,情况才会好转,这自然是清楚的。现在我仍认为,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工作方法作某种修改。最近这些年来,由于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去同反对派作斗争,我们不得不在经济工作方面投入较少的精力,造成我们的工作只停留在研究来自上级的指令上。如今,当我们在摧毁反对派之后进入新生活时,在有了可能开展经济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要少犯错误和少出纰漏,党的、工会的和经济组织的领导者们以及我们全体要开始制定指示,而不仅仅研究指示。当然,这首先要在党内开始。要利用各类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并把它推向前进。

斯大林同志提出了总路线,但由于我们每天为这些事忙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这一点是绝对行不通的,现在就必须沿着这条路线走。在党组织的、工会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参与下,在考虑到他们的经验的情况下制定指令——我们就应该在所有的方面,即在经济的、工会的和党的部门,都通过这种办法去做工作。那时将能极其顺利地前进。然后,要提出关于必须组织更加系统地检查决议执行情况的任务。我认为,为了保证更好地组织经济管理,我们必须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联系我们的干部,使我们经济部门的全体管理干部和工会工作者们都积极起来。关于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积极性有何等重要就不用说了。我认为,如果我们想使事情有更快的进展,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的确,必须指出的是,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到企业经理,从经理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都要开展自我批评。我认为必须着重地强调自我批评问题。我觉得斯大林同志对全会上进行的争论不满意,所以我决定在斯大林同志之后立即强调这一问题,以便使同志们更加热烈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怎样严肃地去组织这项工作呢?请看莫斯科的经验。我这儿发生过这样一

件事——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粮食事务负责人来我这里并说：“事情不妙，面包房里丝毫不讲纪律，烤出来的面包质量很差。”我说：“为了让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吃上好面包，让我们把党员面包师们召集起来。召集了党员、厂工会主席、面包房负责人、支部书记们。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粮食部代表作了报告，食品工人协会代表作了副报告。此后，同志们发了言，坐了7个小时，我也去了那里，我想，这样做之后，我们将能够推动工作。很多缺点我们发现不了，而当富有朝气的人们来后，他们就会向我们指出。选出了委员会来制定决议，讨论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件事。我们在莫斯科委员会常设局对这个决议进行了讨论并予以确认。此前我们很少这样做，现在要这样去做，因为你可以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但不能认为自己在所有经济问题上都是内行。另一个例子。莫斯科的城市公用事业这一项每年就要用去我们1亿卢布。我们听取了城市公用事业负责人拉夫罗夫同志的报告，讨论了有关市政政策的总方针问题。要建设许多项目，而如何建设，这一点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决定最好还是召集由城市公用事业的职工和主要工人区的代表组成的600名积极分子来讨论这些问题。让拉夫罗夫同志给他们再作一次自己的报告，他们听了后会指出缺点和成绩，并提出必要的问题来。我认为需要在党、工会和苏维埃系统里这样去做。

(听不清苏霍姆林同志的插话)

从这里不会产生任何官僚主义，而只会对工作非常有益。这会非常有益于工作，并且我们将会看到许多新人涌现出来——他们就在我们这里，于是，我们将能够扩大我们的干部队伍。这就是我们的看法。

我想，整个问题只是在于要在我们的经济建设的条件下更好地把我们党的巨大力量组织起来，到那时我们的事业将无比辉煌。

主席：阿库洛夫同志发言。

阿库洛夫：我要感谢中央，因为它通过向地方派遣一批负责人揭出了我们地方工作中的许多缺点。除此以外，我要感谢中央还因为这些问题最终在全会上被提了出来。沙赫特案件迫使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乍一看似乎与反革命没有直接关系。

波斯特舍夫：这就是说要感谢沙赫特案件？

阿库洛夫：我不感谢沙赫特案件，但是，同志们，我们那儿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如果不对我们在某一个地区进行很好的干预的话，我们就不会把这些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们的不幸在于，要到我们在自己的肌体内发现某种肿瘤的时候，我们才会提出这些问题。

斯大林:拉比诺维奇努力过。

阿库洛夫:我想,除了在这里已经谈到的外,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了。我只想就顿巴斯总的工作条件说几句。莫洛托夫同志曾说,在顿巴斯,皮达可夫做不到的事,鲁希莫维奇都能做到,他说的完全正确。这不是说鲁希莫维奇是个不好的经济工作者,他是我们最优秀的管理工作之一,可是在顿巴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即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的利益重于其他的一切。比如,3—4年前,我们在顿巴斯曾有过这样的事情:支部书记要在矿长的命令上签字,规定工人们无权每天在12点以前出矿回到地面。曾有过支部书记签署此类命令的事实。在顿巴斯,我们还有过闹得我们整个苏维埃联邦家喻户晓的事情:当工人们在节日里干活得不到酬金时,我们不得不去说服地方组织付给工人们双倍的酬金或者给他们补偿休息日,这个问题被提到了乌克兰中央政治局。

我想用这两个事实来说明曾经有过并通过顽强的斗争改变了的那种局面。若干年前发生的这种情况的根源多数在顿巴斯仍然遗留着。

我想谈谈有关三角关系的问题。是的,李可夫同志谈到了这个问题,许多其他同志也涉及过,但他们只是附带地提了提。但愿大家不会指责我有本位主义的观点,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三角关系(工人群众与这个三角关系是有相互联系的)中的力量对比使我们感觉到有待改进。斯大林同志在这里说到了《轨道在轰鸣》一例,他正确地称经济部门工作者为多灾多难的人。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在这个剧里,有一个工会工作者的人物呢?(笑声)你们笑这个人物,如果你们笑,同志们,请原谅,可你们不明白,在工会工作者这个过度夸张的人物背后隐藏着某种更多的东西。要知道这个人物是把我们的思想贯彻到党外的工人群众中去的人,而他却是以这种令人气愤的形象出现的。这意味着,在我们党组织的队伍里对这种人物还缺乏应有的方针。我们对待经济工作者是一种态度,对待党组织的领导人是另一种态度,而对工会组织的代表们我们是藐视的。我认为本不该有这种笑声的。当我看到作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描绘这个工会工作者时,我的心在淌血。(笑声)要知道这是要到群众中去演出的。

臧声:应该禁演话剧。

阿库洛夫:不要禁演话剧,我不反对话剧,而是反对你们嘲笑工会工作者。

戈尔茨曼:对,对,脸丑莫怪镜子歪。

阿库洛夫:我想举个例子。全乌(克兰)矿工委员会与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签订了关于提高生产定额的合同。与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达成了协议:签订了某些条件,这个合同到了地方和矿业管理局。在地方上,顺便说一下,在雅罗斯

拉夫斯基同志曾研究过的佐洛托—托什科沃区¹¹⁵，党组织决定把定额提高到3%，而不是1.3%。工会工作者开始反对。当他声称说我们在定额问题上本来就偏激时，他被党组织叫去，那里的人对他说：“你是党员吗？是党员。你知道区党委的决定吗？知道。别说话，按照给你的命令去做。”

我可以列举一大堆“实行”工会民主方面的事例。我来公布一个党组织发来的一条独特的电文：“速派来矿委会主席以取代某某”。你们看到了对待工会组织的态度。矿委会主席——这似乎是行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为什么撤了矿委会主席。我们知道在这个矿区已不是第一次撤换矿委会主席了，因为那里有一位很难与其合作的管理人员（不错的管理人员）。既然在地方上找不到合适的候选人，你们瞧，在这个电文里，负责工会的工作人员就被看成是可以作为包袱。这就是如何在我们的工会组织中实行民主的实例。

所有的发言人在这里的讨论中都谈到了经济工作者、专家以及许多别的问题，但奇怪的是，谁都没有谈到工会工作者，对他们只有责骂。

喊声：施瓦茨同志说了很多。

霍多罗夫斯基：既然有人责骂，那就是说有人谈到了。

阿库洛夫：施瓦茨同志谈到关于我们的工会有过哪些指示等问题，而我要说的是干部问题。我们在企业，不只是在顿巴斯（如果在顿巴斯揭出的问题只是顿巴斯所特有的话，那还不那么要紧）到处看到，经济工作者要有影响得多，我们经济工作者的智商要比工会工作者强得多。你们在这儿说到要建立一支新的经济工作者的队伍，说到要提高我们现有干部的专业水平，而你们有没有说到要提高工会工作者的专业水平以及要建立工会工作者的干部队伍呢？同志们，要知道你们交给工会工作者一项并不轻松的工作。要知道当你们说要提高经济工作者的专业水平时，当你们说要给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更多的权力等时，你们同时把捍卫工人利益使其不受可能来自这位管理人员的曲解的工作交给了工会。从党交给的那些任务出发，工会工作者应该是强有力的工作者，他们应该很好地了解经济。你们哪怕用在这次全会上提出问题的方式来责成他们也去熟悉技术，这也好呀。

喊声：甚至熟悉设备进口问题。

阿库洛夫：我没有说设备进口问题。工会工作者还应该熟悉文化工作。他最熟悉组织工作，因为已确定下来的组织工作方式变化不大。他应该熟悉文化工作，因为企业的文化工作、工会的文化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这项工作每天都有不同。而且我认为，的确也要谈谈提高我们的工会工作者的专业水平问题。

这还不够。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创造工作条件。比如说,当上级工会组织下达指示时,不管这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还是联盟中央的指示,这个指示可能被忽视,这是不合适的。如果工会工作者从本系统得到了在上面与有关组织协调好的指示的话,就应该去实施这些指示,而我们在地方上有这种现象,这些指示被压在文件柜里,而每当想起它们时(不是以像剧中出现的那种滑稽可笑的形式),党委就会召见工会工作者并对他们说:别提了,去完成我们命令你做的事情。在培养干部的同时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这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不够,我不能再谈矿工联盟的结构问题。对此也有许多话可说。我现在来谈关于中央对顿巴斯的态度问题。4年前,在顿巴斯曾有个雅罗斯拉夫斯基委员会,它是中央委员会由于著名的“卡普斯京事件”¹¹⁶派到那里去的,它也在同一个沙赫特区。根据雅罗斯拉夫斯基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一个决议,其中指出了现在也指出的那些缺点中的许多缺点。这个决议看来已被遗忘。除此以外,我认为,中央机关对顿巴斯的态度通常简直是不能容忍的。李可夫同志说,他不知道每日6小时地下作业工作制在顿巴斯被取消。当然,尽管李可夫同志是当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席,但每一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非要知道哪里在干什么等所有的事情。就拿安全技术问题来说,对于我们采矿业来说,它具有重要意义。1926年在顿巴斯曾有过劳动人民委员部极其相似的调查。我党的领导机关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机关的人员写了许多文章。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有一大堆。而且,连矿工联盟中央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在当时收集的材料的基础上指出了主要的缺点。对这个主要问题给予了特有的重视。这本小册子被送到中央机关领导人的手里,皮达可夫就更不用说了,给了李可夫、鲁祖塔克、托姆斯基、古比雪夫以及许多其他同志。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政治局委员。要求他们了解情况,结果又怎样呢?结果是安全技术贷款被削减了150万卢布。这是一个事实。

这里确实也说到顿巴斯全体工作人员严重的不文明问题。我认为,所谈的这个问题不只是涉及顿巴斯,也涉及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许多其他偏远角落。再举学校建设的例子。我只想勾画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对它的态度。任何人都清楚,在学校方面,顿巴斯不能作为能依靠地方预算的单位,顿巴斯是一个我们的工业最终要依赖于它的工作才能维持的地方。所以,乌克兰政府在对顿巴斯学校状况进行了调查之后,提出了从联盟政府对这项事业发放相应贷款的问题,因为顿巴斯地区很贫困,他们几乎没有地方预算,你们想是什么情况,我们得到

这微乎其微的地方预算了吗？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我不再谈关于住宅建设等问题了，我只想说说工作日的问题。我们欢迎提出关于工作日的问题，但是我想提醒中央的是（我曾同斯大林同志本人谈过这一问题），通过相应的决议条例之后，不要公布这个条例。

喊声：为什么？

阿库洛夫：我来谈谈为什么。随便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中央的事。但是，在6个月内这一点是做不到的。对全体地下作业的工人实行6小时工作日，这如今是一项特别大的技术性工作，你们不可能在6个月内完成，既然完成不了，你们还要下达任务，你们是要丢人现眼的。这项工作与修改定额，与大规模地修改定额、降低定额有关，这项工作与重新考虑整个矿井的工作有关。矿井——这不是工厂，可以在某个钟点停工而一切都不会改变，这个单位要复杂一些。

在做出实行6小时工作日的决定时，需要考虑关于期限和实行后将出现的物质损失的问题。快速地落实此事，在没有考虑清楚所有的情况、确定实行期限之前就予以公布，这是不对的。遗憾的是我不能再详细谈了，我的时间已用完，我请求哪怕再给我3分钟。

喊声：给，给。

阿库洛夫：我认为，我好像是惟一努力严格按照议程所限定的时间发言的人，我要求再谈一些。

柯秀尔：努力了，但未成功。

喊声：给5分钟。

阿库洛夫：我在5分钟之内完全能结束。

我想就关于我们的劳动法的决议条款说几句。我认为，这里出现了，我不说是错误，但是某种误解。例如，第5部分第5条款指出：“按照劳动法典，在6个月之内保证全部实行地下作业6小时工作日……”等等。劳动法典没有提到对所有地下作业的工人们实行6小时工作日。该法典提到的是劳动人民委员部所确定的享受6小时工作日的工人类别的特殊名单。如果我们通过这项决议，而它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再到群众中去实施，你们将会看到，人们会要求重新审定我们的法律的。

关于增补假期的问题我再来讲几句。这里同样是并非所有类别的地下作业工人都能享用增补假期，而是要按照人民委员部制定的特殊名单来执行。

斯大林：难道那里写着“对所有人”？

阿库洛夫:您看,斯大林同志,这项条款的提法应该使工人们能看得懂它。要知道重要的不是我们理解这个决议,而是工人们如何去理解它。从这一观点出发,这种提法不令人满意。

斯大林:(念第4条款)可这里写着:“根据法典。”

阿库洛夫:我想最好是写得更准确些,斯大林同志,要知道这并没有坏处。

斯大林:难道过去有过违反这一条的情况吗?

阿库洛夫:我们这儿有过,因为有权享受6小时工作日的工人名单,我们的要比劳动人民委员部制定的名单多得多。但我们的问题在另外的方面,那就是甚至干满了6小时的工人还要在矿井里耽搁远远超过6小时。这就是需要消除的那些现象。

托姆斯基:“耽搁”这个委婉的词是什么意思?说得简单一些:“工人多干了。”

阿库洛夫: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如果我说有经验的采煤工干活超过6小时,这不是真的。有的工人能在6小时之前干完活,可也有的工人会耽搁。

戈尔茨曼:为什么?

阿库洛夫:矿井,这不是工厂。你们应该下到矿井去,到井底去,有的矿井从井筒到井底要走2.5俄里。要知道工人来到工厂,就马上可以开工,而这里需要下矿井,而且还要走到井底,有时路程很长。

托姆斯基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指出的状况,好像在有关对我们工人少量尺寸和多称分量的问题的决议里也有,我也想提供实际的情况。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消耗额外的时间。

[托姆斯基:或者要用掉额外的费用。]

阿库洛夫:那么就需要在决议里写上:中央对此将发放相应的资金。

戈尔茨曼:这和你有什么相干?

阿库洛夫:我在这里是作为党中央委员在发言,我想告诉你们……

奥尔忠尼启则:您作为中央委员完全不必反对给予工人6小时工作日。

阿库洛夫:谢尔戈同志,在解决一系列有关石煤工业工人状况的问题时,中央应该准备耗费大量资金,应该考虑到这一状况。

喊声:记下来。

阿库洛夫:因为我们要求对此拨款。再记下[因为不然的话,当我们来到你们那里,你们会说,随便你们怎么去做。我把这作为一个插曲并非因为我想这样。不要这样想。煤过秤的问题是所有矿井重要的基本工作的问题。这意味着

需要在所有矿井里发秤。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规定尺寸的矿车，比如，容量为40普特的矿车。矿车没有装满，就打某些折扣。于是这就引起工人们的不满。所以，需要强调与在这方面执行决议有关的问题。]需要在这个决议中强调，引起一系列耗资的问题也应该从物质方面给予解决，否则，这将毫无用处。我主张实施这个决议，主张实行6小时工作日，我们为此已经奋斗了两年，为了争取增补假期，为了争取在节假日减少工作量[这一点在决议里根本没有提。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提议。我认为，以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工作者来找你们，我们将在提供必要资金的问题上支持他们，你们就会遇到这种事情，你们就将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你们写道，你们建议在6个月之内解决这个问题]，还为了争取用于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拨款。因此，资金问题也应该得到解决。这就是所有我想说的。

主席：托姆斯基同志发言，下一位是卢那察尔斯基同志。

托姆斯基：同志们，沙赫特问题给我们带来了两种危险。第一种是陷入惊慌，过分地开展批评而没有任何限度以致失去自信。这种危险是可能的。说什么我们这里的一切都不好，被扭曲，看不到我们的成绩，于是情绪低落。第二种危险是把这个被称为沙赫特案件的带刺的植物的尖枝逐渐地、一根接一根地折断，使它变成完全光滑的东西，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囊括一切美好东西的协议！关于苏联的共产党员中“谁生活得快乐和无拘无束”——是经济工作者还是工会工作者这一问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我认为在那些工作者中谁也没有无拘无束地生活着。省委或州委书记的道路没有玫瑰花铺盖，工会工作者过得也不快活，相信我，不快活；经济工作者过得也不快活。可以从《轨道在轰鸣》一剧中得知这些情况。因此，没有必要再去剧院了解这些情况了。（笑声）莫斯科的人民委员过得也不快活，每个人都有很多要操心的、不高兴的和令人不安的事情。

斯大林：那谁过得快活呢？

托姆斯基：谁过得快活是个小问题。在这里已经有很多很多人就总问题发了言之后，我要说的已经非常少了，因为我能讲的这些的确已经基本上简要地在我向中央委员会提交的便函中表述过了，我要涉及的只是一些细节。我怕某些发言的经济工作者同志们会表现出想要把这个问题说得轻松些。为了避免从整个问题中会对经济工作者得出不正确的看法，为了避免把所有的经济工作者看成是同一类型的人，说什么所有的经济工作者都不好，不会干活，不懂事，等等，为了避免经济工作者从此威信扫地，同志们开始对犯过的错误轻描淡写。而

由此得来的是数字表明情况不错,所有的经济工作者人都不坏,说是经济部门的党员管理干部已经造就好了,在从总的方面来看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一切都好。那还议论什么?又担心什么呢?

而担心的是:我知道,在技术学校,我们完全被资产阶级专家们控制在手里,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曾怀疑过我们不总是能像希望的那样去管理生产。对此我们怀疑过。我们从未怀疑过的是,不是我们在管理,而有时完全是专家们在管理我们。尽管我们是在阵线的一段,在沙赫特阵线发现了这一点,但这是事实。不仅是他们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不仅是他们任意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惟一怀疑的是:我们在领导工人群众,这一点牢固地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透彻地了解工人,了解他们的情绪、需要和忧虑,可连这一点也没有了。他们(专家们)把我们同工人阶级分割开来,他们指挥工人们并像厨师收拾土豆一般地整治他们,因而我们听不到工人们的呼声、抱怨和警告!我现在说的只是指矿井的情况,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是灾难性的,比英国国王的情况还要差,他虽在“统治,但没有管理”,而那里的情况(我只是指矿井)是,我们不仅不管理,而且还不统治。那里对工人们做了什么?我们都在那里呆过,亲自都见到过……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怎么回事——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是批评还是批评过度?

斯大林:批评过度了。

托姆斯基:我来回答,别着急,匆忙不总是美德。(笑声)我们在阵线的这一段发现了非常严重的情景。工程师被告中的一个,萨莫伊洛夫在审讯中证实了以下的事情。当问他:您是怎么得手的,为了……

喊声:指使周围的人。

托姆斯基:为了使人们,为了使任何共产党员、工会工作者都没有发觉,没有看到是您干的?他讲述着,稍稍拉上了窗帘。他说,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有了一套“良好的关系”,人们就不那么警惕地跟踪我们。我不再念萨莫伊洛夫的证词了,看来,很多人都知道这些证词。这种整套的“良好关系”表明,那里存在的不是三角关系,而是彗星:专家们,他们的后面拖着米高扬的尾巴。(笑声)我可以对米高扬同志说,这种关系像一条当今的苏维埃长凳,而它的后面是尾巴……

米高扬:尾巴上是中央和中央委员们的食堂,其中包括托姆斯基。

伏罗希洛夫:这是你的乐观主义,米沙?

柯秀尔:托姆斯基发现了新的彗星。

托姆斯基:专家们是核心,在他们的后面跟着经济工作者,管理人员的后面跟着工会工作者和党员们。在沙赫特那里发现的东西,毫无疑问,就好比是在一些部门的所有缺点的总和,这不仅在那里存在,而且那里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集中了各种缺点的最典型的角落。沙赫特的经验表明,我们的领导,我们在党的和工会的会议上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是一种表面上的讨论。没有人去深入研究这些统计出来并得到确定的数字。在沙赫特领导着那里工作的党的机关对于他们所讨论的那些数字不进行深入研究,听之任之。我怕这不只在沙赫特有。而当洛莫夫同志登上这个讲台并念一系列数据时,他似乎“总的来说,在这一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一切都好”。通过这个结论我丝毫不想要求洛莫夫同志,而且在我们的共产主义环境里也不需要这样,不想要求他站出来,开始说一些后悔的话。任何人都不会要求他这样做的,可我们有权等待洛莫夫同志告诉我们,那里的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你是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的主要领导人,你想想这一点,你是怎么会让沙赫特出这种事的,而且不只是在沙赫特,在顿巴斯的其他地区也有,你怎么来解释这一点。我们没有从你那里得到这种解释。对于“怎么发生的和怎样引起的?”的问题,我们没有从你那里得到回答。而我只是站在老朋友的立场上说:我知道,而且大家都知道,尽管洛莫夫同志是一位非常好的共产党员,光荣的革命者和最忠诚的人,我对你说:对你在这里说的这些数字,我一个也不信。因为如果认为我或者别的什么人看不到我们的成绩,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可是,顿巴斯的某些工会工作者来到我这里说:“您怎么现在否定一切?在您看来,一切都是歪了、斜了?”不,这一切都是废话。我们了解顿巴斯,它是什么时候被毁、被淹、被炸的,我们还知道如今它的开采量已超过了10亿普特,这当然是经济工作者的巨大功绩,而且不仅仅是他们的。开始时,我们用燕麦喂养我们的矿工,而有时甚至没有什么可喂养他们,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顿巴斯一直在工作着。那时没有工会,没有任何工会,我们开始建立工会,特别是同波隆斯基同志在一起,他了解这些情况,在1919年,1920年,刚刚建立起了工会,而到了1923年,我们发现它根本不像工会,1923年,在我的要求下,派出了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委员会,委员会把这个工会以及整个顿巴斯搞得天翻地覆。只有到了1923年以后,它才开始成为工会,当然,从1923年至1927年期间,这个工会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席话我是说给阿库洛夫同志和其他工会工作者听的。有了一系列成就,可问题现在不在这里,问题是在错误和缺点,对此我们无法回避,因为需要把它们揭出来,去研究它们以便使我们在将来不再重犯。因此,我不能对这些数字无动于衷。为什么我谈到了领导的表面化态度?

我来说说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在叫喊：“机械化！掘煤机！”这叫起来有多自豪——机械化，掘煤机，等等。那这里是否会有人提出异议，说你们对掘煤机的使用率还不足其可能达到的效率的25%？没有任何人会对此提出异议。我可以肯定地说，你们通过机械化的途径对掘煤机的使用率也不可能超过其效率的25%。所以，我对这种把资金耗费在机器上而我们的使用率仅为25%的做法的效率产生怀疑。资本家们对机械化设备的使用率达100%，在那里这种耗费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他们的使用率仅为25%，这种耗费对他们来说还有意义吗？这里可能会有许多错误：订购的不是那种系列，没有指挥干部，等等。错误是可能的，到处都有。但是，当机械化实行到了这种程度时，就像在你们那儿，当给你送来了机器——如果我错了的话，请指正我——这台机器昼夜运行可以生产180吨，煤堆在了那儿，可发现没地方再堆了，需要把煤运走，这就傻眼了：没有运煤车，没有空车。急急忙忙地安排好了空车，可发现马来不及把它拉走。需要电力机车。结果是，这台机器做了一班工，歇了两班，而且连一个班的时间都干不满。掘煤机是好东西，可当你这么去做并不假思索地起用了它之后，那会怎么样呢？这是为什么？任何一个差劲的工程师可以在矿层的流向——是向上还是向下，开采哪个矿层方面欺骗洛莫夫和我们所有与洛莫夫在一起的人，对此我们什么也不懂。他们可以在机器的系列方面欺骗我们。

但是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沙赫特地区在资本家经营时期曾开凿了别谢尔戈涅夫斯克矿，它还在，它上面还有井筒、雷管洞等，可经理不知道这里有年产5000万普特煤的凿井。他为什么不知道这些情况？因为没有把它印到计划上。对它谁都不知道。人们从它旁边走过，眼睛瞪得大大的，可不知道这是什么，干什么用的。我在想象，这位权威的管理工作者在大会上是怎么发表演说的，他说：“我对我所管辖的工业部门和经营活动了如指掌，对一切都了解得非常透彻”，而实际上他却一窍不通。这可是事实：抽了一年的水，抽了两年的水，而它却一点也没有减少。我理解：我和洛莫夫都不是矿层、机器系列等方面的专家，但是，如果一年又一年地抽水，可水仍然不减少，怎么会这样。（笑声）

当然，此后可以说：我们的管理干部是好的，党员是好的，工会工作者——小伙子一个个都是经过挑选的，可……“机械上的小缺点”谁都会有。瞧，这些好的管理干部的“机械上的小缺点”就是日常生活中同专家们混在一起。这表明，当这种东西出现时，总会有小的污点。“小污点”不仅在尾随着群众的工会工作者身上有，而且这种“小污点”到处都有，在党组织里也有。安德烈耶夫同志做得对，他一下子解散了整个常设局。在发现这件事之后，这些管理人员都被解雇

了。可他们去哪儿,专区委员会说他们什么?专区委员会给他们的鉴定是这样的:你们每个人在党内干20年,然后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¹¹⁷,不过得不到“充满活力的、天才的、能干的……”这样的鉴定。他们就带着这样的鉴定转到另一个工作岗位。贡恰连科从弗拉索夫斯克矿业局转到谢尔比诺夫斯克矿业局,索尔达坚科从谢尔比诺夫斯克矿业局转到了弗拉索夫斯克矿业局。(笑声)舍伊金也一样,转到了卢甘斯克专区的五一城。这是怎么回事?鼠目寸光,“自己人”的制度,“怎么得罪这个人”。而人们是怎么调动的?施雷德尔好像在那儿担任矿委会主席,由于工人们在称呼他时,除了姓外,还要加上他父母的名字(笑声),就这样把他给撤了。把他换到了哪儿?他又当上了专区矿业工人部的书记。你们瞧,这就是选拔人。难道这不是说明了在沙赫特的党组织中也有好大的腐败吗?腐败透顶。领导处理经济问题只能触及皮毛。是的,只触及皮毛。

我们应该从这些情况给自己得出相关的结论。我看过沙赫特会议的党内记录。它们一年又一年地提到了所谓的“顿涅茨克的混乱”,一年又一年地就此做出决议。在1925年,通过了这个决议,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主席来了,听了报告并通过了这个决议。而我要说的是,在顿巴斯那儿,没有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同意是什么事情都办不了的,因为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可以自豪地说:你坐汽车,这是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汽车;你地上走,这是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土地;不管你到哪儿,你躺下的那张床,是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床。就连空气和水——一切都是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在那里没有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就什么也做不了。在1926年的另一次大会上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在1927年又通过了这样的决议。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没有人去注意决议的执行情况。做出了决议,而是否有人注意它的执行情况——谁都不注意。我们要做到去注意决议的执行情况,去听听经济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对所发生的情况作何种解释,他们认为哪些是他们的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决定其他一切的毛病。

我认为,来自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同志们以及所有乌克兰的同志们关于丑恶的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中央集权主义的问题¹¹⁸提得太迟了。这里有个细节:掘煤机是个好东西,可是你们知道,如果没有好的铲,这些掘煤机也就干不好活了。难怪一位是铸造专家的英国同志说,苏联的铸造业要从好铲起步。当工人们对我说:“托姆斯基同志,没有铲”时,我回答他们说:别的怎么样我不敢说,而铲说不定会有的。他们说:铲倒是有的,可铲把不好,铲把是直的,要么把它折弯,要么硬把它给安上,结果铲把就断了。我问同我一起去的工程师:为什么铲

把不好?他说:“这些铲把是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送来的。我知道他们要什么,他们要的是法国的铲把。”“那为什么不制造这样的铲把呢?”

“您瞧,这样的铲把要用山毛榉木或栎木制作”。“那既然我们有一大片山毛榉树林,为什么我们不能制造呢?”他说:不能。为什么?林子可以有,可铲把就是没有。(笑声)你们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吗:我靠在墙上,心想:完了,真是走投无路了。当他说:“林子有,可铲把没有”时,我又能对他说什么呢。我,一个政治局委员,为了解决这个铲把问题,大概还得跑到哈尔科夫去找洛莫夫,他还得接见我,可他不是所有人都见的。他也许会和我谈谈关于铲把的事情。而如果工程师知道没有铲把却说:“这不关我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的人知道这件事”,那情况则完全不同了。你们试试在这里制造好的铲把。生产会议能做点什么呢?任何一个经济工作者或者工会工作者应该给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写信。看看你们顿巴斯的体系,党的关系体系。这不像莫斯科的体系。你们试试从任何一个区越过莫斯科市委会和乌格拉诺夫同全莫(斯科)托拉斯联系,它会使得花样缠你,你可玩不过它。而在你们顿巴斯,区委可以越级直接去找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这没事。而且你们的区委也越过专区委员会与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进行联系呀。

卡冈诺维奇:现在不行。

托姆斯基:我曾问过,特别是卡季耶夫斯克区:你们是不是常越过专区委员会同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进行联系的?他说:不常是,多数情况是因为小事才越过专区委员会。结论会是什么样的呢?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一个强大的组织。你生活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土地上,你的住房是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你享受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服务,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水,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亮光,没有什么不是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没有它你哪儿也去不了,在这样的组织中,它是在与各个区对话,而那些地区也就被淹没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机关里了。在它们的面前竖着一堵墙,任何东西都打不通它。

你们说成本的数额是多少和多少。请允许我指出引起我对这些数据产生怀疑的两个东西。如果能向我证明我错了的话,我很乐意承认我自己的过错,但是,我有这样的怀疑,即投入基本建设的资金并没有花费在基本建设上,而是花在了营业支出上。我举两个例子:弗拉索夫斯克矿业局用于营业需要的支出为23.5万卢布,沙赫特组织的代表在这里坐着,我在积极分子会议上对他们说过这个情况,谁也没有反驳我。没有一个经济工作者起来发言,也没有人反驳。我

指出,不仅是这个矿业局,而且还有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业局,也是把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中的14.5万卢布花在了营业开支上。这样,请你们注意,我这儿没有专业会计师,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懂得的很少,没有时间去看书,所以,用眼睛以及通过与此有关的人们的交谈,估计到这两个矿业局把基本建设的资金花在了营业开支上的数额分别为23.5万卢布和14.5万卢布。任何人都起不来反驳——那里的管理人员,经理坐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把基本建设的资金用于营业开支,这就等于靠我们投入基本建设的那些资金来降低成本费。往后我还能百分之百地或百分之八十地相信给我递来的关于成本费的数额吗?

再告诉你们另一个情况:科克索本佐洛夫厂是怎么降低成本的。那里有许多临时工,我们开始时不明白,于是就问:临时工是怎么回事?原来,这种工人在那里过去属编制内的人员,而后来从编内转成了具有同样内涵和享有同样待遇的临时工。但区别在于,以前他是编内人员,走营业支出的账,而如今他作为临时工,其薪金则走基本建设的账了。成本费就是这样降低的。如果往后你们给我出示关于降低成本的红色、蓝色、绿色的图表的话,我就说,这漂亮,好,但是,只要工会组织和党组织不紧紧地跟上,不亲自看一看,不一头扎进去搞清楚投入基本建设的资金是怎么花掉的话,这些数据就不会是令人信服的。这是应该极其关注的事,应该在一些地方进行检查,那时,我们也许就会发现那里错误地使用了基本建设的资金。我们对工人们说:要有耐心,要建设,要实现国家工业化,要建设新的工厂,耐心点,我们应该自己给自己匀出这些钱来,因为外国资产阶级不给我们贷款。忍了一年——什么也没有,两年——情况不好,三年——情况不好,四年——情况还是不好,那时我们和你们就要挨工人们剋了,如果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扣出来的用于基本建设的主要资金一点一滴地流失掉的话,工人们就会非常尖锐地指责我们了。我们将满足于数据,我们的数据不错,从绘图纸上的图表中看到成本费在一小格、一小格地降低,太好了,然而事实上这将只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请允许我就监督问题讲两句。这里有人抱怨说监督太多。我赞成尽量减少监督,尽量提高监督的质量,赞成不仅要检查出缺点,找出、指出并记下它们,而且最主要的还要监督这些缺点是否已被克服,不这样做就等于没有监督。当工人们抱怨说“监督多”时,我同意经济工作者的日子不太称心如意的说法,监督人员总是在打扰他。我所感兴趣的是谁在监督财政,资本流向哪里。有人说,我记不得是谁,好像是古比雪夫或别的什么人,谈到过第聂伯建设工程的财政监督

问题。我对此感兴趣并问了扎东斯基,财政监督是怎么回事。谁监督财政?原来情况是这样的:过去由检查委员会来监督,后来经济工作者说检查委员会一点事都没有做,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就同意了,取消了检查委员会。过去,工农检察院监督过财政,后来有人说,因为工农检察院是个照着书本跟在经济工作者后面转的官吏、官僚主义衙门,于是就解除了工农检察院的监督。那么,现在是谁在监督基本建设的钱是怎么花的以及营业开支的情况呢?专门的财政监督是存在的。任何地方几乎都没有它,而有它的地方,它也完全是形式上的、官僚主义的和僵死的东西。如果想信任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们的监督,把他们看做是无产阶级社会公众的楷模和正确使用最重要方面的资金的榜样的话,那么,这样做也还是行不通的。我们同意采取措施以便使监督尽量地减少,但是,既然要监督,就得好好进行。

现在,我想就工作日问题说几句。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在这里讲错了,他说我不知道关于在顿巴斯破坏6小时工作日的事情。看来他那时没有听清楚我们在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说的话。我说过,我知道我们实行的是8小时工作日,我想,老人们会证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我们在顿巴斯对地下作业的工人们实际上实行的是8小时工作日。我们应该在矿业部门开始实行这种制度。不然的话,我们就振兴不了顿巴斯。

但是,现在我想就在顿巴斯的工作日总的情况来说几句,那里是否像人们说的那样,真的在实行8小时工作日的制度。我原来想是8小时工作日,而知道的是9个和九个半小时。当然,同志们,要看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算这个工作日。如果从工人走上工作面和抡起十字镐的时候算起,一直到他放下十字镐为止,那么谁也不会是这样计算的。事实上他的工作不满四个半小时。我希望,在大家谈论工作日以及谈论工作日是否做满、满负荷还是负荷不足、工作日精神集中还是涣散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检查一下,能否一刻不停地干8小时的活?在自然界,甚至在福特汽车公司,哪儿都没有人能手分秒不停地干活,这样不间断地工作8小时。你们不妨试试,拿两个半磅重的哑铃,在8小时内不停地这样做操——一手向上,一手向下,等等。(笑声)只是在这之后不要来求我在你们的葬礼上讲话。(笑声)谁都不能这么干活,过去任何地方都不是这么干的,现在任何地方也不会是这样工作。我们的矿工们每隔15分钟便会撂下自己的丁字镐,他们累了,不然,他们就无法工作。各地的工作日是这样计算的(工会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也是这么理解的):从工人们得到指令:“你应该哪一天到,从几点钟开始干活”,一直到他离开自己的工厂为止。这被称为工作日。有时工厂

所在地离得很远,要走1.5俄里或1俄里的路才行,但多数经济部门是不计算这些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提出了关于人们在长达几俄里的矿内流动的问题。在英国,这个问题是用车来回送人的办法解决的。也许我们不了解这个问题?请原谅,我有一个文件,它表明专家们在矿区讨论过关于在矿内运送人的制度问题。对不起,这已不是新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长的工作日?我们的工人们有1小时要花费在等候派工单、等候安排工作上,然后要等着下矿井,然后在地下他有时要在危险的路途中走上几公里,净摔跟头。因此,为了实行真正的6小时工作日,必须取缔这种不合理的派工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工人们像在交易所一样互相拥挤着,等候给他们派活干。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自己的提议中认为,第一步必须立即开始哪怕是向实实在在的7小时工作日靠拢,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到6小时工作日。但是,我将欢迎并举双手赞成委员会的多数人所表达的主张实行真正的地下作业6小时工作日的明确愿望。

而阿库洛夫同志,这是所有顿巴斯工作人员的错误,他们试图缓和这个问题的提法,说:你看到了吗,矿工们干活并没有超过8小时,他们只是“在地下耽搁”了……“耽搁”——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懂不懂,举例来说,这就是说,他留下同好友一起坐在煤堆上,聊聊看戏、好天气和其他什么事!事情不是这样的,实际的情况是:耽搁往往不仅超过8小时,甚至还有每天整个超过9小时的情况。但最终我不能把责任推给顿巴斯的工会工作者,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对于我和顿巴斯来说都是新鲜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糖果厂的女工每逢节日能提前2小时结束工作,而矿工在周六却无权提前2小时下班。谁使他们丧失了这个权利?在这里就开始乱套了。甚至工会工作者们为自己辩解说,甚至C.施瓦茨也说,他们既然已经挖出了煤,就一定得在今天把它运出来,不能留下。这个结论对每个工作日来说都是适用的。如果掘煤工干了12小时,把煤都打碎了,也要把它都运走吗?总的来说,就没有正常的工作日了。你干6小时、8小时、10小时的活,挖出了煤,某人就应该用超出常规的时间去把它运走。你们怎么想就可以怎么去组织,可是应该有正常的工作日,像在周六人们应该多干2小时的活这样的解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有人认为用丁字镐掘煤的人应该得到一个月的假期,他的劳动危害健康,而认为把这些煤运走,同样也在地下作业的工人享受两周的假期就足够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只是采煤工比较专业、比较能据理力争,所以他们为自己争取到了这额外的两周假期的权利,而那些最不幸的、不善反抗的矿坑中马拉矿车的赶

马人却被我们剥夺了额外两周的假期。我就不去说医疗救护以及笼罩着整个顿巴斯的待人粗暴的行了。这是谁的过错？工会。但不只是工会，还有对此不屑一顾的党的部门。如果读一下在访问矿山期间有人递给我的声明，那里的工人们是怎么说的呢？医疗救护差，医生待人粗暴，开假条让人逍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一个工人来上班，由于没有为他安排好采矿工作面，那么他就不能开始工作，这在所有的工厂里到处被称之为由于企业的过失造成的停顿，工人们可以得到批条，享受不带工资逍遥的权利！人们对他说：“听着，这是给你的条子，去溜达吧。没有活给你干，去免费溜达吧。”“我怎么去溜达？”“我给你条子，你就不是故意旷工的人了”。工人走了，“溜达”去了。

阿库洛夫同志为缺斤短两的做法护短是不对的。这是否意味着不能没有缺斤短两？如果提出问题说，这样做代价太高了，这是不正确的。我再说一遍，我同意对任何一个委员会负责，但我要说的是，不只是像你们说的，由于车皮和没有秤面出现的缺斤短两，还有矿上拉煤的马车坏了。这里要安什么样的装置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瞧，在沙赫特区弗拉索夫斯克矿业局在一个月内就大约有1000辆马车坏掉了。为使马车不受损坏，要安什么装置呢？为什么会发生尺寸不够的情况？为什么矿工干活却不知道干这活能拿多少钱？这儿有一位来自卢甘斯克的丘维尔金同志。这些话我在卢甘斯克和沙赫特都说过，而谁都没有起来反驳我。难道你们认为你们能驳倒我吗？驳不倒。这儿的矿工工会对工人们完全不重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这是必须坚决地给以纠正的，不能对此进行袒护。

斯大林同志说过：我们要推行和鼓励自我批评。这是对的。因为没有自我批评我们就不能摆脱市侩作风，不能摆脱“自己人”的圈子，而这样就不能实行监督，任何党的部门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认为，自我批评产生的第二个结果应该是伴随着它而出现的，这就是教会共产党员，首先是共产党员，而同时教会所有的非党工人去发牢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谈到这一点，这是他喜爱的思想之一——教会工人和农民发牢骚。

斯大林：如果不打开自我批评的阀门，任何人都不会硬要去发牢骚。

托姆斯基：那应该把这些阀门打开。现在不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这里的人都不会发牢骚了。我不会念冗长的文件来使你们为难，但文件的实质我是要说的，这是另一件事情了。从沙赫特我们转到恰图拉，那里的承租者。格鲁吉亚的工人们空旷地里工作着，大约有15个人。下着倾盆大雨，他们要求

发给不漏水的雨衣。给他们发了亚麻布、粗麻布制的雨衣。下着山里的暴雨,10分钟后他们浑身湿透了,便说:“不能干了”,于是扔下了活儿,要求工长:去找工程师,请求发给不透水的雨衣,工人们要雨衣。工程师回答说:记下工人们的姓名,明天就解雇他们。工人们被解雇了。他们问工程师:“您为什么要解雇我们?”工程师愚弄了他们好几天,最后说:“如果你们给我写个保证材料,说你们今后不再这样做了,那我就让你们来干活。”你们瞧瞧这份材料,它与莫洛托夫念过的材料差不多:“致姆格维梅夫斯克矿业处主任”。所有工人们的姓名都被记下了,我不准备念姓名了,怕把他们搞混,这里有7个姓名(B. 约巴什维利, III. 加普林达什维利, C. 加普林达什维利, Г. 加普林达什维利、瓦诺·阿比阿泽, K. 舒卡基泽, 瓦诺·奇塔泽)。

“声明。我们报告:现在,自6月11日起,我们被第26工厂解雇,我们认为自己对此负有责任,因而请求原谅我们的错误,并请按照您的提议允许我们回去工作,在此我们保证,从我们这方面来说,类似事件今后再也不会发生”。

下面是签名。决议:“如果格鲁吉亚炼锰厂同意的话,我同意原谅他们并允许回去工作,1927年6月17日。П. 萨克瓦列利泽”(上级领导)。下面是签名。“我们不领窝工期间的工资”,还是那些人的签名。第二个决议:“致办事处。允许从6月20日起上班,6月18日,П. 萨克瓦列利泽”。

这证明了什么呢?当我们的国有企业过分地走了极端的时候(这里是管理上的偏激行为),就会走弯路或者就认着一条道走。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可以做到的。但这项工作要由……企业家来做。工会在哪里?苏维埃政权机关在哪里?劳动人民委员部在哪里?为什么工人们不是抱怨,而是做出这样低三下四的事来?批评——这是好事,但这不是主要的或者说这不是惟一的,要教会工人抱怨。我们还是要使我们各部门的整个系统做到:不管在何地,要使工人知道他该去哪里和怎样去提意见。这一点我们还没有教会他们。

我给你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它反映笼罩着党员圈子的是什么气氛。我曾在顿巴斯同各种各样的同志们交谈过。我正式问过一些人,还做过记录。他们这么说:你们说为什么我们不提意见,不开展批评?您试试提意见,批评一下,那就有您好看的!

当然,部分过错是由于那种不让人说话的压制造成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难道这是为共产党员辩护的理由吗?难道我们当年是这么做的吗?——如果说你面临失去位子的危险,那么,别张嘴,沉默!如果我们这么认为的话,那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是在这个大厅里坐着,而是蹲在不知什么别的地方了。认为“如

果我抬高嗓门,会因此而被赶下台,于是我就沉默”的人算是什么共产党员。你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员!这个共产党员同官员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说,一方面,党内缺乏民主或者歪曲了党内民主,它阻碍了开展批评、提高积极性,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有责任使普通的共产党员振奋起来,教会他们提意见而不是去赞扬,是去抨击那些只有当领导允许这样批评和这样做安全时才批评的人,抨击那些只在安全的时候才去斗争、只在能使自己提升职位等时才提出批评的人。不能是这种情况。

就红色专家问题说两句。同志们,我认为,关于高等技术学校及其命运的争论(我应该坦白地承认,我对这个问题曾可耻地动摇过),在我这里至今继续停留在动摇不定的状态,尽管斯大林同志预示会有诱人的前景,因为应该凭良心说,我认为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谁将管理高等技术学校,而是在于将如何管理并谁将在这些学校里学习。

喊声:对。

托姆斯基:现在我们学校的学生中,工人约占40%,有的地方约占22%。这样我们永远也不能培养出红色专家来。我们这里建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即我们很少去考虑这位红色专家在大学毕业以后会怎么样。他们毕业时,即便是留在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最红的党员专家在那里也不过是安于技术秘书的角色,或者有时他们甚至改变专业,变成了从事各种其他的事务性服务工作的职员。这是谁的错?部分责任由我来负,工会以及所有其他人都要承担责任。我不能把自己与工会分开;工会错了,我也错了;党有过失,我也有过失,因为我是中央委员;经济工作者犯了错误,我们同样也就犯了错误,因为我们领导这些管理人员。我们的事情是这样安排的,我从中看到了主要的弊端:我们选拔并派送一名工人去学习,于是,这个选拔和派送他的组织就此完成了使命。工人切断了把他与自己的组织连在一起的绳索,便漂到了莫斯科。在多数情况下,他在这里会遇到不健康的环境,有时陷入这些充满小市民习气的学生阶层里。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他忘记了是谁派他上大学或高等技术学校,便寻找适合他呆的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改变专业是为了不离开莫斯科,并作为一个并不需要的办公室的包袱留在那里。难道情况就应该是这样的吗?我不准备展开来谈此时此刻我所感兴趣的和我们迟早要说的想法,这就是关于总的干部问题以及关于培养党的、工会的、经济部门的和其他方面的干部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改变对工人学员和工人、党员子女的态度。我们这儿的的情况一般是这样的:你不是学者,你是车床工人,你是我们的人,我们爱你、尊敬你。当你被调离后,你去工

农速成中学,从大学毕业,你是另外一个人了,你成了外人,你不是我们的人,你成了知识分子。我们使你成为了红色专家,可你哪里还管车床工人。而我认为,如果乌格拉诺夫、伏罗希洛夫,如果我们这些老工人们毕业于某个高校或者高等技术学校,我们就会比现在的我们要更强一些。例如,我们遗憾未能毕业。而在我们这儿,当知识分子被看成好像是耻辱。要知道这是我们来自工人队伍的技术知识分子,是产生在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完全应该用新的方式来评价它,老的标准已经不适用了。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它会成为统一的工人阶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从他们中间招收我们的文化工作者、我们的工会和党的工作者。你们不要以为,今天一窍不通的人能胜任工会工作。就拿税率、文化教育工作来说,它们要求很高的专业水平。我们现在不能光靠专业的税务工作者,他们在我们这里所掌握的专业面太窄;这是工资问题的专家,这是劳动问题、劳动法问题的专家,等等。需要有非常多的训练和培训活动。我们再也不能用土办法来培养人了。我们应该更加严格地监督共青团的人员组成和提拔共青团员的制度,使他们经过党和工会的监督,但共青团应是提供我们要培养和教育的那些年轻、可靠的无产者的主要单位,我们应使这些由工人组织、党的、工会的和合作社组织挑来的人一分钟都不中断与它们的关系,使他在学习期间和毕业之后同自己的组织保持联系。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制度,即由工人阶级负担学习费用,由工人阶级教育并培养成人的人,有义务按某种方式为工人阶级服务一段时间。

喊声:对!

托姆斯基:那么,在关于高等技术学校和高等院校的问题上动摇不定之后,我的观点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可以同意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因为我们同教育人民委员部一起已经进行了各种试验。这方面的情况并非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教育人民委员部也不会想出新的试验来了,那就让我们来进行另一种试验。我当然并不认为我们应该束缚自己的手脚,并不认为这种试验能百分之百地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如果结果证明是不正确的话,那时谁能禁止我们说试验不成功,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犯了错误,让我们回到老的或新的经验上去,否则,怎样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呢?在这里原则性问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实际问题,但此时此刻它与一系列其他问题连在了一起。我们将招收谁?我们将怎样组织大学生的内心生活?我们将怎样去看待这个大学生?

最后,我应该说,如果我们仅仅做出一个好的决议然后就“洁身自好”的话,如果我们将保持洁身自好和只限于做出一个好的决议的话,这就将是又一个好

的决议,如此而已,而大家都清楚,这里的工会工作者也好,经济工作者也好,都非常担心不能做到“洁身自好”,想的都是千万别让这种“洁身自好”在这场争斗中受到伤害,“我们的权威”可千万别受到伤害。可是,如果说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说,有过困难的地区,粮食收购困难,而如今我们把一切都很好地摆平了:巩固了同中农的联盟,限制了富农,贫农自己有了保障——一切都很好的话,还是留下了尾巴。不能忘记还有遗留的工作要做。如果我们忘记还有遗留的工作,那我们的好决议将成为坏决议。如果我们在这里就沙赫特案件一致通过决议,那不要忘记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情,还需要重新审视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这整个巨大的机构,研究它的每个螺丝并重新检查整个这台机器。任何一个工会工作者都不能互相推卸责任。要在其他地方检查,看看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还有沙赫特案件的某些因素。如果我们不开展自我批评,如果把它理解成:比如说,谢尔戈作自我批评,那很好,但如果他批评我,那就不好了,如果我们是这样来进行的话,特别是如果我们不教会工人们提意见的话,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

同志们,我再说一点。阿库洛夫同志在发言的第一部分所谈到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别忘记,我们对第十五次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执行得不好——这是关于对工会的态度问题的决议¹¹⁹。

主席:由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发言。

卢那察尔斯基: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利用这次发言的机会来阻止你们迈出我认为是错误的一步。这里的问题当然不在机关的本位主义,不在任何一个机关的权力大小或者它的威信降低,而是在于,我们对这个问题是知道一些情况的,而如果在工作了10年之后对它一无所知,那就丢人现眼了。所以,我希望在关于把几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决议通过之前,在座的各位先听听我的意见。

这个问题已被多次提出并十分认真地讨论过。

首先,我就原则性问题,即两种体制的问题说几句,而不是去谈提出与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2—3所学校的妥协性决定有密切联系的问题。关于两种体制的问题决定着一切:是否存在着要对新的一代进行培养,要从小学培养到专家的问题,这是一个统一的领域,这中间所有的东西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不能把一个环节从其他环节中分割出来;或者是斯大林同志说得对,他提出了每个部门为本部门培养专家要容易一些的观点:卫生人民委员部是给人治病的,它将培养医生,而农业人民委员部将培养农学家,等等。只存在两种真正的公式,两种

观点。如果说到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坚定性和准确性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要么持这种观点,要么持那种观点。教育人民委员部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场的情况下对这两种观点都组织过讨论。经过了对这一问题极其认真的讨论,决定结束在这方面存在的各部门间所有不协调的现象。我们把所有的学校都抓了过来——私立学校、财政部、贸易部和工业部的学校,决定把所有的学校集中成一个共产主义教育的拳头。

1920年1—2月,开始了经济工作者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他们说,教育人民委员部没有充分地开展专业技术教育,不给他们提供新生力量,说应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成立了由托洛茨基任主席的委员会。工作了两个月。托洛茨基开始时所持的观点是主张把高等技术学校交由各部门管理。起先是这样的。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召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此后,托洛茨基的观点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他主张成立居民专业教育局¹²⁰,它对所有部门负责,为它们培养人才,就像现在我们拥有的这些一样,它为所有的部门服务,但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来统一领导。

一年半以前,捷尔任斯基同志又重新开始向这个方向进军。由许多专家、校长、教授等人组成的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讨论,最后做出决定:认为把这些大学交给各部门将有某种好处的想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这里,用斯大林同志的话来说,发表了非常令人深思的、出色的、革命的讲话,但是他耍了滑头使他上了当,他刚谈到高等院校问题,就说开了荒唐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安德烈耶夫同志几个月前正好参加了由经济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会议,这个委员会极其认真地讨论了如何培养和分配专家的问题,并在极其认真地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结论。安德烈耶夫同志在去北高加索之前一直在这个委员会里,他得出的结论是,最不明智的做法是尽量减少抵制,把高等院校交给一些部门,因为事情的实质、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托姆斯基同志一带而过地提到的那些方面。而突然现在发生了这种事情,原来,在国家对此事多次认真讨论之后,随着安德烈耶夫同志离开,柯秀尔同志进入委员会继续工作之后,突然在沙赫特案件之后,决定迈出“一小步”,可这一小步是如此之坚决,在它之后当然接着会迈出若干步,而这是突如其来的,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听取了支持这种看法的人的意见,而没有听取反对派的意见。现在我们来读读决议中这致命的几行字。如果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样,赋予批评领袖的权利,那请允许我来略微批评一下斯大林同志。依我看,这样去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是不行的,它没有考虑周全,也没有研究透。

首先,请允许我说,这里做出的以及斯大林同志谈到的妥协性的决定不能令任何人满意。[斯大林同志依照原有的论据,在此提出各部门最好为本部门培养专家的观点。指的是军事部门。关于军事部门我下面再谈。]在古比雪夫同志看到原来并不需要雨鞋和伞、对他来说天气不错,不值得害怕蟑螂之后,他立即放下了伞并开始要求多给儿所高等技术学校。从这些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斯大林同志不得不用自己的权威性的指示来划定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暂时不应超越的界限,然而这并不能保证我们不会受到进一步的猛烈攻击。但我应该说的是,这个妥协不顶用。你们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是经验吗?什么经验?建立特权学校的经验吗?

臧声:对。

卢那察尔斯基:怎么,你们要掩盖你们已在为这些机构寻找财政基础、要给“被选中的”高等技术学校提供几百万,也可能几千万的事实?你们要建立某个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管辖区,那里所有的大学生可以得到比其他高校的大学生更多,那里的教授们可以得到比其他高校教授更高的薪金,那里的设备将比其他高校的更好。到那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将会说:瞧,我的孩子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已经完全摆脱了贫穷的村民,那些依然生活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下的贫困村民。但是,难道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仅仅需要来自3所学校的大学生吗?不,它需要来自所有高等技术学校的大学生。这种分离以及我们这儿会出现的这种界限将带来极其严重的腐败,将带来嫉妒,带来人们争着去酬金高的地方,并将摧毁统一的政治措施体系,摧毁目前存在的方法论的统一。你们说:取得了经验。取得了经验意味着什么?洛博夫同志说,如果1—2年后会觉得好的话……当然,会好的,如果给百万的话,你们就能吃喝下去啦。(笑声)

斯大林:决议中提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要给所有的高等技术学校拨款,而不只给本部门的学校拨款。

卢那察尔斯基:这很好,可这不解决问题。斯大林同志想说的是,其他高等技术学校将得到某个百分比。很自然,不这样做就会非常不像话了。我们当然将得到一点。不能认为其余的高等技术学校毫无希望,而只选这3所。大家谈到试验,可把这次试验进行到底意味着什么?什么时候它能得出结果呢?1—2年之后?为了解学校提供的是什么人,需要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并实践2—3年。当然,如果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来进行这个试验的话,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这次试验的结果会差些。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3所学校,也给教育人民委员部3所学校,给双方的补贴绝对一样。让我们看看,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可能最高国

国民经济委员会由于没有足够的科学基础,会降低对实习工程师的类型*,也可能我们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高等技术学校里能培养出真正适应一切新的经济条件并真正达到现有技术文化的顶峰的工程师。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试验少于5—6年是不会有结果的。

再来谈谈整个体制的问题,我应该说,如果今后采取步骤,当然这些步骤是会采取的,这里将会产生许多不便:大学生和教授们将会出现在各个部门里,党将会难以在自己的领导下把这项事业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有很多开设各种系并为一系列部门服务的学校。不得不把它们分散开,等等,等等。当我们说不能把党的教育搞得七零八落时,这一切受到了重视。

大家夸奖军事部门,说它好像自己在培养专家。这是不真实的。他们把军事大地测量、军事工程、军事道路、军事化学、军事技术、军事兽医方面的工作转给了我们。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上来,是他们自己来对我们说的:我们干不了这个……

伏罗希洛夫:没有这种事,这是不正确的!

卢那察尔斯基:军事院校的负责人们对我们说,因为在我们体制中的这些方面并不需要在这样的程度上遵照科目的要求,也不需要按军事方式进行教学,我们把这些事交给你们去做。对于军队的专家们来说,不仅应该要对他们进行技术教育,而且还要培养他们具备军人特有的气质和军人的纪律,这就是服兵役的一部分内容。谁对此有异议?在哪里,在哪个国家,不是从初级军事学校,从他们要为自己培养的小孩子们开始,就把军事学习看成是服兵役呢?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军事部门已经把8所军事学校交给了我们,我们把它们变成了服务于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其他部门的高等技术学校的一些系,而且他们并不就此止步,他们还将继续这样做。对所有不带纯粹军事特点的科目这样做,谁来确定教学大纲呢?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学术委员会。要求教授们有专业化的素质要找谁呢?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学术委员会。这就是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军事部门对军事科目和军人气质的培养问题有许多考虑,如果这些对它不构成障碍的话,那么,它就把这方面的工作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实际上,他们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那些高等技术学校与军事部门关系,就同所有高等技术学校与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关系一样。国民经济委员会暂时还没有自己的军队和舰队。

丘巴尔:那里有军事警卫队。

* 原文如此。指的是“降低要求”。——编者注

卢那察尔斯基：他们能自己培养军事警卫队。罗列了哪些理由呢？国民经济委员会也有自己的工业学院，好像我们曾经争论过，过去没有让它搞。不是的，我们从未争论过，而当时的问题是：你们是否想在我们的先进技术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工业学院，例如在莫斯科鲍曼先进技术学校的基础上，那里有宏伟的设备，就不用再花钱了。这是在我们之间曾有过的惟一的争论。难道卫生人民委员部没有自己用以提高医生水平的学院吗？在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学校：进修班、提高班、学成后的进修单位。我们从来没有对它们提出过异议，它们在多数情况下分布在不同的部门，为这些部门的职工办学。我们从来没有对此反对过。

同志们，当然，我们非常理解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并不认为我们的理由很有力，而对方的理由毫无根据。我们对此采取的不是这样的态度。需要共同地通过严肃的工作去检验这一点，我们只要求一点——不要盲目地接受这两行字。由于3个月里什么都没有垮下来，国民经济委员会一点都没有受损失。也许3个月后你们听我们的总结报告时，你们会真的相信我们，这一措施并不需要。你们至少可以周密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决定。

这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与沙赫特案件之间有着直接联系。请问：这是什么联系，这里有什么联系？当然没有直接的联系；你们可别以为沙赫特叛徒来自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笑声），这是教育人民委员部所采取的拙劣政策的结果。间接的联系则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什么样的？看来，我们的老专家们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说质量不太好，充分利用他们的可能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小。要尽快地得到更好和更多的毕业于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的新人。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让我们把3所学校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有没有人研究过我们的大学生情况怎样的问题，有没有人知道这些？我们已经提供了6000名工程师，今年我们大约有5000名学生毕业，这些数字是谁也不知道的。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有没有人知道，他们被派到了哪里，他们被安排在什么地方，他们的结果如何？我们现在只是利用自己的力量在做调查，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这些调查表是霍多罗夫斯基同志发出的。这个调查的结果表明，毕业生的工作现在一点都不比战前差。新的工程师在这些或那些工厂里工作着，而我们有来自几十家工厂的消息，他们在那里完成任务的表现非常出色。如果想列举某些其他的关于另一种评价的证据的话，那就列举吧，可我们暂时没有看到。当我们问国民经济委员会，你们需要多少大学生，什么水平的，好久没有人回答我们，现在给了一些数字，其中一部分与我们的相吻合，在这里没有给我们任何新的东西，而沉默了好久，什么都说不出来。但是，如果再问问国民经济委员会，它是如何使用这些年轻人的，它却

什么都不知道。(喧嚷,议论)

你们以为这是可以用来对付我的论据了,我可以证明不是这样。有人说他们不关注这一点,因为他们自己不生产人力资源,所以不关心怎么利用这些人力原料;但是,你们对工厂又会怎么说呢,它从某个地方得到原料、金属,于是说:因为我不生产这种资源,所以不清楚它在我这儿是如何用掉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得到了受它支配的这些人才,却不会对他们进行安排,还要把培训这些人的事情交给它,这可以认为是当代杰出的逻辑了。我认为,这完全不合逻辑。既然我们走上了自我批评的道路……

莫洛托夫:那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里是否一切都这样顺利?

卢那察尔斯基: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里有很多极其不顺利的事情,我们经常处于挨你们批评和打击的地位,对此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也不要什么别的:给我们时间来准备报告,邀请随便什么人来作副报告,国民经济委员会、工农检察院或什么鸟人来,我们都同意(笑声),让他把我们给你们提供的情况一一否定掉吧,但要睁大眼睛和了解实情地去做。我再说一遍,既然我们走上了善意批评的道路,请允许我讲一下今天我得到的材料,对列宁格勒国民经济委员会科研机构的调查已经结束,结果是工作做得差并与工业脱节。你们知道,这使我们有些警惕起来。为了支持工业而成立的科研机构却与工业脱节。

戈尔茨曼:你们的人更差。

卢那察尔斯基:如果我的人只是差了一些,但与你们相比,没有完全失败的话,必须痛斥你们,因为你们可以把你们的预算是多少与有多少预算作个比较,你们比较之后就会看到,我们花每一个苏维埃戈比所得到的要比你们多。

斯大林同志的最后一条理由。他说,这个卢那察尔斯基有某个米尔和梅里利兹¹²¹。他培养化学家、律师、铁路工程师,等等,应有尽有。

斯大林:我可没有说米尔和梅里利兹。

卢那察尔斯基:如果一个部门离开了,它只会更轻松。而你们看看,国民经济委员会什么不能生产?那里能给你煤、金属、木材、化工产品(笑声),你也给它砍掉一些什么。斯大林同志说:怎么能让教育人民委员部把一切都包罗起来呢?国民经济委员会怎么能包罗一切呢?如果我们走中央集权的道路,总是会有多种多样的各种圈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要学会包揽起来,当然没有必要把它们打碎,不能像发纸牌一样这儿一张、那儿一张地把它们随意安置在各处,然后再收拢在一起并认为这就是合理化。同志们,要想前进一步就不该前怕狼后怕虎——大家都是这样的,但要迈出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先要有把握,这真

是向前而不是向后迈了一步。从形式上来看,这一小步是向哪儿了呢?是迈向沙俄时的状况。

斯克雷普尼克:对。

卢那察尔斯基:表面上这是向前迈了一步,而实质上,请调查一下,请看一看,我们的病灶是不是在这儿,我们的红色专家的恶劣品质是否来自这里。

在结束时我请你们,同志们,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不是2年,斯大林同志,不要害怕新的官僚主义委员会,我本人也怕他们并躲避他们,然而,我认为,在这2年之内,我们将能避免错误,我希望当我们真正调查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仍然能避免犯这个错误。甚至官僚主义委员会也比考虑不成熟的决定要好一些,我呼吁不要通过这种考虑不周的决定。

主席:晚上的会议将在晚6点举行。第一个发言的是阿勃拉莫夫同志,第二个是鲁希莫维奇同志,第三个是丘巴尔同志。

宣布上午的会议到此结束。

第七次会议

4月10日晚间

主席(C.柯秀尔):请阿布拉莫夫同志发言。

阿布拉莫夫:沙赫特矿场事件让我们大家重新尖锐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工会组织进行经济工作和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生产管理的条件、方式方法问题。我不涉及会上不少同志已经谈过的当地产生沙赫特案件的一般原因,只想讲一讲妨碍工会组织进行经济工作、保障我们对经济组织的工作特别是对专家们的工作进行更多监督的几个问题。

在这一方面妨碍基层工会组织进行工作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我觉得,在这里首先需要分析在会上评价我们经济干部的工作时谈到的那些原因。事实上,如果说,在这个领域中,生产纲要和计划要经常不断重新审查,地方和中央的工作一片混乱,阻碍着经济组织和经济管理人员的工作的话,那么这种状况本身就极大地妨碍着我们基层组织的工作,妨碍讨论这些生产计划,妨碍吸引广大工人群众讨论这些生产计划。要知道,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状况,这些生产纲要是按照中央经济组织的命令急急忙忙制订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不但不能吸引广大工人群众讨论这些纲要和计划,就是基层工会组织也没有能力讨论这些纲要和计划。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生产纲要和计划正在制订过程之中,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纲要和计划又返回来的时候,甚至连工会组织也认不得这些文件了。这种状况往往使基层工会组织对这件极其严肃的事情采取冷漠的态度,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管讨论多少次,不管提出多少建议,反正都无人理睬,变成废纸一张,不起任何作用。

第二个问题也同样非常严重地妨碍经济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基层经济单位(矿井、矿场等)缺少权利。

最后,妨碍基层开展经济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会干部的工作负担太重。就拿我们在矿井和矿场从事税率经济工作的基层工会干部来说,他们必须每天

3次下矿场或矿井给工人派活:早晨5点到7点,中午1点到3点,晚上10点到11点。除此之外,他们必须一周2—3次到矿场参加各种会议。这样一来,基层工会干部就不可能全面考虑他们所在矿井、矿场的一系列经济秩序问题。如果再加上我们从事这种工作的工会干部缺乏技能,不懂经济,那么,这种状况对于我们从事经济工作的基层工会组织来说那就太难了。当我们工会基层组织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那就不说自明了,我们这些从事中央工会工作的人工作也就更复杂了。在一系列经济问题上,由于没有基层工会组织的结论,没有他们的意见,我们的工作也常常是瞎忙。我们提出的一些普遍的问题往往脱离矿井、矿区和矿场的具体实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正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成为瞎忙的原因。如果注意到,这些计划在中央过分频繁地全面改动,而且经常是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专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在小圈子里进行全面改动,那么,由于这些原因,工会领导干部对生产计划、生产纲要的性质就不可能施加什么影响。

我想谈谈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引起了大量的争论,这就是顿巴斯6小时工作日的问题。这是一个在顿巴斯能不能实行6小时工作日的问题。首先谈一谈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这里已经有人指出,不实行6小时工作日是由大量原因造成的,燃料不够,资金困难,等等。我们这些年来不止一次提出过这个问题。例如,1926年年初,由于劳动人民委员部和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的调查向劳动人民委员部尖锐地提出过顿巴斯6小时工作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我们的过错可能是只看到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严重的财政状况,拖延发放工资,受顿巴斯矿区严重财政状况的影响,对6小时工作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它立即贯彻实行下去。现在,这个问题又尖锐地提出来了。我个人认为,6小时工作日可以实行。我们没有任何特殊原因不实行6小时工作日,或者造成重大困难妨碍实行这个工作日。如果我们能以相应的方式实行8小时工作日,那么在技术和实际情况方面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实行6小时工作日。当我们向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这里出现了并不是来自这方面的一系列困难。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不要让实行6小时工作日引起大量的更多消耗。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消灭顿巴斯矿区毫无疑问存在的一系列所谓技术故障,那我们就不得不在很多地方降低生产定额,这就意味着给国家造成更多的耗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从利用劳动力的观点、从利用机械的观点出发,以最少的追加资金实行6小时工作日。我个人还有其他问题: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在实行6小时工作日时,要不要保留

3班制或2班制,或者为了百分之百地利用设备和固定资产,不但要实行2—3班制,而且要实行4班制,以便每班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本费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解决了按以下最基本的原则研究这个问题:为实行6小时工作日,需要多少追加资金,要不要追加资金;我们应如何组织矿场工作,为了在矿山工业中百分之百地利用固定资产,是实行2—3班制还是实行4班制,因为这不是如此简单的问题。在美国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情况,矿场总是实行1—2班制。美国人认为这种办法是最为有利的。而我们一般是按3班制工作。同志们,问题既然提出来了,毫无疑问就应当接受它,我们、工会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现在就应当进行工作,切实加快解决这个对于矿山和工人群众来说极其重要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这就是定额偏低,当班完不成任务和工人不懂得如何估计产量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托姆斯基同志的书面建议已经谈到,在这里的中央全会上发言的同志也已谈到了。这种事情有没有呢?同志们,这种事情在顿巴斯,在其他矿区毫无疑问是有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同志们,必须考虑到,部分原因是采矿业的一系列特点造成的。在工厂开展日工资制要比矿场容易得多。在矿场分配工作任务时,工人往往不是干工长指派他干的工作,他们是被监工派到矿场去的。因此,工长所领导的一个班组的工作量有时完不成。其他方面情况的统计也同样困难。

托姆斯基:惟一正确的就是矿场不是工厂,而工厂也不是矿场。

阿布拉莫夫:不是的,托姆斯基同志,不单是这一点。我下面就要讲。我是说,这是采矿业的某些共同原因造成的,而这些杂乱无章也是由于取决于我们的许多原因造成的。这也是我现在就要讲的。我们的劳动力统计工作太糟糕,这是毫无疑问的。劳动力的使用也同样糟糕。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只到现在才开始调整这个问题。我们基层监督工作的水平也同样糟糕。工长在他的记事本里记得乱七八糟,而办公室的人无论如何也分辨不清楚里面写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调整好劳动力的统计和使用问题,我们就能根除很多缺点。我们工作糟糕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定额问题。给采矿业制定定额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而且,在革命前这项工作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仅只是在不久以前,我们才详细研究这个问题,开始着手制定采矿工作长期工作条例。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工会克服了大量困难,因为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内部我们遇到了来自专家们的极为强大的抵制,他们在采矿工业劳动定额问题上消极怠工。鲁希莫维奇同志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们的乌克兰委员会颁布了篇幅不大的长期工作条例并

要求试行。专家们否决了执行我们称之为条例手册的可能性。之后,重新制定了条例,这一次是同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一起制定的。你们以为如何,执行还是不执行?直到如今,这个条例手册或者叫长期条例也没有贯彻实行。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组织的过错。我们全联盟组织的过错也是很明显的,它们没有认真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无疑是应当加以解决的。

主席:请鲁希莫维奇同志发言。

鲁希莫维奇:我想就一个共同问题讲几句话,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矿场的历史,是个中心问题,同时也是今天难于解决的复杂问题。这里讲的是要根本改变各个领域的工作方法;说的是重新配置力量,重新建设队伍,主要的是吸收新生力量,以便保障在经济工作中具有另一种更合理的工作。现在我们具有什么?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吸引工人群众积极参加建设事业的能力比较小。与国家力量的增强和建设速度相比,在工人群众参加建设方面,我们大大地落后了。除了我们工作中的这些缺点之外,我们还有总体工作上的极其复杂的情况。第一,在一个农业国家,在快速发展工业的时候,我们必须在技术领域由老式机器向区机器站跳跃,由老式采煤法向掏槽采煤法跳跃。我们必须为此动员和利用国内所有技术力量,尽可能汲取国外的技术力量。因此在初期,相对而言我们实际上多半要依赖对我们构成威胁的力量。

下一步,我们应当利用当前的“间隙时期”,尽快弄到必要的机器设备来装备薄弱环节和提高技术水平。当我们在国外购买设备的时候,在每个国家都会遇到障碍。比如说在德国,当要执行德国的贷款时,当要加强我国的锅炉工业的时候,当一出现购买大批锅炉的时候,立刻就遇到了锅炉卡特尔。当需要购买涡轮机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在这一方面的卡特尔,需要购买管道时,我们得到的是管道卡特尔。也就是说,遇到了把我国看成是殖民地的障碍。经济管理人员吃不准,能不能在国外买到所必需的那种质量的设备,而我们也没有把握,能不能买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在价格上我们会不会受欺骗。同志们,这同样是我们建设事业中的大难题之一。

[沃罗希洛夫:你认为耐普曼知道你想要什么?]

鲁希莫维奇:克利姆,我现在就要转到这个问题上来。]最后一点。我们有一个比较长的“间隙时期”,因此在共产党人和专家之间,不但是在经济管理人员和专家之间,而且在从事党和工会等领域工作的共产党人之间,有些地方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同志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但是在经济管理领导人和专家之间的界限更是模糊不清了,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工程师、技术员

和市场。因此,我们要想调整下一步的工作,要把机器向我们希望的方向运转,要想防止堕落,我们就必须随着经济管理人员力量和能力的增长,逐步地摆脱对专家的依赖,由我们自己更多、更深入地研究生产过程。那么,用什么方式来吸收专家呢?同志们,可以用两种途径来做成这件事。

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将要走什么路:用无产阶级的方法还是仍然用资产阶级的方法来吸引专家?对此我要说,可以只走第一条道路,但是,同志们,那样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就要承担多余的费用,就会出现所谓减速。也可以只走第二条道路,但这不是我们的道路,现在应当采用混合方法。现在也应当鼓励专家,对此,乌格拉诺夫同志讲得完全正确、及时。

现在,在1928年,我们在掌握生产方面究竟处于什么阶段?当前,我们能不能更多更近地接近生产本身而让专家们只起咨询作用呢?同志们,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年轻专家。我们可以更多更深入地做这件事情,我们在经营方面可以更广泛更深入掌握这些问题,但是当事情涉及(对此,在全会上我希望开诚布公地讲一讲)向另一个工业发展轨道转变、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时,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十分薄弱的。现在举一个小例子——莫斯科附近的矿区。当谈及莫斯科附近矿区的问题时,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3个派别的观点。有一派认为莫斯科附近的矿区是发展的。第二派做出了另一种评价,第三派的评价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谁也不确定,在这几派的背后没有隐藏着外国资本的爪子。谁也不会确定,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鬼把戏。但我们只能根据对这几派材料的分析挑选对我们比较接近、比较有利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自己还不能研究这些问题,因此,对专家的依赖性仍然十分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现在应当根据沙赫特发生的情况采取果断的方针,更深入更多地直接解决生产问题,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在更短的时期内拥有新干部。但是,同志们,我们应当分阶段做这些工作,以便在新的专家式干部到来之前不出现差错,在使用专家为工业服务时不要出现空挡。

现在我再谈顿巴斯的问题。矿场所发生的问题,顿巴斯所发生的问题是破坏小组干的,这个小组是公开的,它让我们看到的,除了我们中间存在的不会工作的问题以外,看来还有另一种恶意,有意识的破坏活动,这种破坏活动既阻碍着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又阻碍着工人物质状况的改善速度。这一事实表明,如果我们没有这只罪恶的手,我们前进的速度会更快。但这么多年来我们在顿巴斯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呢?我下面就讲一讲。必须回顾顿巴斯的历史。1920年我们发生了什么?曾建立了托洛茨基委员会¹²²,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必

须在五年的时间里使顿巴斯发展到在1926年生产150亿普特的水平。在这之后,建立了丹契奇委员会¹²³。这个委员会分析并总结了顿巴斯的状况,对那里存在的个别因素进行了研究,它应该根据手中掌握的数字材料说出,该怎样恢复顿巴斯。说到在委员会做出的结论之前,我现在应当简短说一说我们1923年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1923年5月29日,当时丘巴尔同志还在国家煤炭工业管理局工作,建立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以瞿鲁巴为主席的委员会¹²⁴,其任务是解决顿巴斯何去何从的问题。我们给这个委员会写信说:“最近一个时期大家开始都确信,丹契奇委员会的计划(我下面就要讲这个问题)不正确,没有生命力,最后,最主要的是它没有考虑新情况。”同志们,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当我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时,顿涅茨克省委员会做了些什么呢?当我到丘巴尔那里,把我们的决定通知他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呢?大家都同意撤销丹契奇的职务。我们决定撤销丹契奇的职务,不执行丹契奇委员会的计划。而他提出了什么要求呢?丹契奇委员会为解决问题向莫斯科送去了什么呢?请看。在五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在1927—1928年度前,我们生产的不应该是托洛茨基所说的15亿,而应该是3种方案规定的数量:第一种方案是16.15亿,第二种方案是14.42亿,第三种方案是12.3亿。我们在今年生产的数量,可以告诉你们,甚至不是最高方案规定的16.15亿,而是17.2亿,也就是说超出了1亿多普特。丹契奇为完成自己的计划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这就是他提出的要求:为解决这个问题他需要3.889亿金卢布。这就是我们立即否决这个计划的原因,并指出,这个计划没有生命力,国家无力执行这个计划。而这些年我们花了多少钱呢?我们在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用去了2.42亿,对其他联合企业用去了5000万,也就是说总共用去了面值为10卢布的2.92亿卢布。请看明白,这是面值10卢布的纸币,不是金卢布,与此同时又多开采了1亿普特。除此之外,我们为17座大型煤矿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出现了什么奇迹?请再给我几分钟,让我继续讲下去。

喊声:请讲。

鲁希莫维奇:同志们,请看,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从一开始就只是按一个思路进行斗争,认为现在我国只用我们的知识去进行大型基本建设,而不考虑国外的技术,是不行的,是有害的,我们只会做出大量蠢事。后来,我们虽然也做了不少蠢事,但还是把庞大笨重的顿巴斯搞了起来。我们曾为建立中型矿场而斗争。这场斗争,政治局是知道的,开始于1921年。当我们

于1923年进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时,我们就开始把这条路线进行到底了。那时我们应当提什么问题?1924年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让我们派自己的人出国学习。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出现波兰委员会所预言的在1929—1930年我们会处于没有燃料的境地这种状况,我们启动现有矿井和进行中型矿井建设。可以告诉你们,莫斯科激烈反对这么做。不止是专家们反对,像斯米尔加那样勤奋的同志也反对。在这里就有这场斗争的活生生的见证人。他给捷尔仁斯基同志写了信,这里也有见到过这封信的人。信中说,在1925年年初,春天,我们,也就是斯米尔加,可以保证,在顿巴斯的鲁希莫维奇的鼓动下,顿巴斯将会完蛋,会出现燃料危机,我们将会从国外大量进口燃料。这就是斯米尔加同志提出的问题。而我们说,随便你怎么预言吧,像格里涅韦茨基^①所描述的那个天生缺少燃料的国家肯定会有燃料的。

1924年秋季,我们把那个基里尔金派出去了,斯大林同志,他吉他弹得很好……

斯大林:巴拉莱卡琴……

鲁希莫维奇:把他同斯卡钦斯基教授、奇纳卡洛什工程师一起派往美国,让他们在那里研究矿场的组织工作。与此同时,在1925年,我们提出了派一些矿业管理人员和总工程师去欧洲。与此同时,我们也提出了派部分共产党员到柏林购买进口矿山设备的问题。我要问,当不久以前政治局提出进口设备问题时,你们知道,尽管我们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做了一些蠢事,犯了很多大错误,尽管有这些事情,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没有给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处分。为什么?克列斯廷斯基同志好像在这里坐着,他应当知道,在柏林是哪个代表团最好地完成了采购进口设备的任务。看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代表团比其他代表团更好地完成了任务。我们为此做了些什么呢?

主席:鲁希莫维奇同志,你的发言时间已经过了。

鲁希莫维奇:请再给我10分钟。

喊声:给他。

主席:除了昨天登记要发言的人以外,今天又有10人登记要发言。鲁希莫维奇要求给他10分钟。谁赞成?好,您还有10分钟。

鲁希莫维奇:现在我才明白了,那些资料我不会讲它们了。资料写道,被捕的人说,他们想淹没顿巴斯,他们确确实实要极力淹没顿巴斯,如果这些“反

^① В. И. 格里涅韦茨基(1871—1919年)——俄罗斯热力工程学家。——译者注

革命”的涡轮机不能工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些派到国外购买设备,认真负责的共产党员,我们顿巴斯现在的处境将十分艰难了。谢天谢地,时来运转。我要说,现在国家政治保安局所指示的,如果把可以扔的和应该扔的都扔掉,那么这本手册就应该成为指导今后行动的最好的圣经。

喊声:对。

鲁希莫维奇:我觉得,现在揭露出来的是我们这些在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工作的共产党员们没有觉察到的事情。这是遗憾的。那里揭露的事情有:专家们一直在地方,不止是在地方,而且在中央,排挤共产党员,而我们没有保证共产党对生产产生影响。我们为吸收共产党员做了些什么呢?由此又得到了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证明。1925年12月16日,正好是对安德烈耶夫派贡恰连科和舍伊金出去学习的答复:“要特别注意……(读)……为改变矿务管理状况,不再设一名副手,而要设两名,其中一人应是共产党员。”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不只得到了命令,克利姆同志,而且得到了27人被派出去学习。但遗憾的是我们顿巴斯仍然存在着政治处的习气。对于这种习气,我要完全公开地讲一讲。应该派出的人没有派出去,我们没有给他们安排应该做的工作。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讲话时说,皮达可夫过分喜欢采用行政命令手段,而鲁希莫维奇总是靠压服人。我要说,问题不在于鲁希莫维奇。问题是,顿巴斯存在着皮达可夫习气,搞的是劳动大军,是政治处。需要很多年才能消除政治处的习气,一两年内是改不了的。施瓦尔茨同志在这里发表演讲时说,1923—1924年我提出过关于工资的问题——是的,那时是这样提出过这个问题,怎么办,在初期难道有别的办法能把顿巴斯搞起来么?那时也采用过政治处这种做法。

李可夫:为什么要很多年?

鲁希莫维奇:为的是不再搞政治处的那一套做法。我不知道有一下子就能根除这种做法的例子。

李可夫:不明白。

托姆斯基:需要一个时代。(笑声)

鲁希莫维奇:需要一个时代。我认为,同志们,顿巴斯的实际情况,莫洛托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所了解的那种形势以及那里实际存在的状况在一两年内是绝对不可能消除政治处的做法的。

我来谈谈托姆斯基同志的发言。托姆斯基同志完全正确地指出,下面的工人群众现在实际在受压制、沉默,不敢讲话。托姆斯基说得完全对,在物质方面他总被一些小事情干扰。本来可以不这么做。但是,托姆斯基同志,当从另一个

角度来提问题,当涉及自来水管、住房、澡堂等问题,也就是所有日常生活问题时,可不可以一下子大大改善呢?我以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通过进行良好的经营,通过吸收工人自己来参与这些事情,在每一项基本工作中都可以减少失误。如果在这之上再机械地加码,那就不对了,因为那样价格的差距就会比现在更大。

现在来谈别谢尔格涅夫卡,这是就在旁边的一个矿场,谁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托姆斯基同志,第一,在矿务管理局资产登记册中有这个别谢尔格涅夫卡。

托姆斯基:有吗?

鲁希莫维奇:我是在这个全会上讲话,有这个地方。第二,在丹契奇的登记册中没有指出别谢尔格涅夫卡,而指出了下面的一个,它在佩特罗帕夫洛夫卡的东坡上,这就是那个煤层,需要开采的煤矿。这在丹契奇的登记册中是有的。

托姆斯基:登记册里写的是:煤层还是别谢尔格涅夫卡的掘进?

鲁希莫维奇:对那里的细节和滥用职权的事,我不想谈。您发表过演讲,您说过,有这么一个矿场,但您又说不知道这个矿场。

克雷连柯:不知道。

鲁希莫维奇:我说过,在资产登记册里有这个地方。

克雷连柯:丹契奇好像在自己的登记册里没有找到。

鲁希莫维奇:在1923年向政治局写报告之前,我对丹契奇的那本登记册研究了3次,那里确实确实记载着下述情况:在佩特罗帕夫洛夫卡的东坡上有待开采的煤矿。我不知道丹契奇指的是什么,我在这里说的是上面写的东西。

克雷连柯:如果丹契奇说,他没有写呢?

鲁希莫维奇:我不知道丹契奇要说什么,但我说的是他写了什么。我想说的是,在顿巴斯那个地方,如果我们当时花气力去搞最有利、最好的中型的、小型的和大型的煤矿,自然我们现在的状况就会好得多,如果这些企业的工人们考虑、研究、探索开采哪些矿场更好,那就更好了。但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做,我们没有吸收工人群众参加这项最为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过错。但是说我们不知道掏掘矿区,那是不对的。

下面,我要讲讲掏掘机的例子。托姆斯基同志,我要说,这些机器使用得不恰当,但是我们开始把这些机器用在顿巴斯。不久以前,我们从美国订购了“苏利万”牌的机器¹²⁵,开始订购英国的、德国的机器,我们开始探索,在哪些矿井、在哪些煤层使用这些机器会更好。

克雷连柯:你们开始探索在哪些煤层不需要使用这些机器。

鲁希莫维奇:我应该说,克雷连柯同志,我没有否认我们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否认,克雷连柯同志,从1903年到1904年呆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共产党员基谢廖夫到过美国,看到了那里的全部机械化,他负责分配机器,有可能他做得不对。当然,对错误我们大家都要承担责任。

克雷连柯:不对。

臧声:因为基谢廖夫有功才提升他。

鲁希莫维奇:他一直留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工作,你们这样想是没有根据的。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想说,现在托姆斯基同志关于重新彻底研究煤炭工业和然后研究其他具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正确的。这里的正确是指,经济管理人员需要的不是走捷径,这样工作起来相当困难,对此,每一位经济管理人员都应该知道。为了使他们的工作,准确一些说是,为了使他们能够胜任工作,需要给他们最大的支持,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当我们对煤炭工业进行工作的时候,托姆斯基同志,我觉得不应当受某些情绪的影响,比如说不能走极端,极端乐观,极端悲观,都不好,而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个托拉斯。我不怀疑,将来它会取得更巨大的成就,会工作得更好,会更好保障工人的物质状况。这是正确的。但是,托姆斯基同志,这些事做起来应当深思熟虑,应当谨慎,不是干一两个星期就可以完成的,而应当坐下来研究。为了真正给整个煤炭工业系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可能需要3—4个月。

托姆斯基:特别是在顿巴斯电气化计划方面,我没有看到有这种深思熟虑。

主席:请日丹诺夫同志发言。

日丹诺夫(雷西瓦):沙赫特案件不仅给我们提出了我们要同经济反革命进行斗争,要监督专家的问题,而且广泛地提出了进行正确管理的问题,不是依靠老专家,而是依靠新干部,依靠我们的技术员专家、工程师专家,他们应当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助手,特别是来自工人中间的技术员专家和工程师专家。

如果在这里说到老专家,当然我不能臆造他们都是坏蛋和骗子,但有根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在我们的矿区有这种例子。一切从实质上看似乎很好,工人们被吸收参加了生产会议,大多数老专家也参加这些会议,但其中一部分人明显对这些会议是漠不关心的,特别是对生产会议。会议上工人们提出的意见虽然被采纳,但非常勉强。新专家、工程师和技术员参加这些会议,不止进行社会组织工作,而且多数是盯住了生产问题。在这里,某些专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新专家们可以说是吹毛求疵。这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这里有一点点问

题。这就是技术部门用一些繁文缛节加重了新专家的工作负担,使他们没有时间到车间去。

决议草案还说,监督工作薄弱,等等。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我要说,并非处处如此。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搞过集体合同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怎么取得的?那是因为工会善于做这些事情。在那些工会工作灵活的地方,在那些工会和工厂工会委员会工作能力比较强的地方,他们就能把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集体合同运动问题研究好了没有?研究好了。这个问题不仅在积极分子中间进行了研究,而且在所有的车间工人会议上进行了研究。尽管时间很短,但仍取得了一些成绩,不止在集体合同运动中取得了成绩,而且降低了产品成本,使产量提高了5%。

决议草案还说,经济管理的过分中央集权制对顿巴斯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对此,我完全同意。什么叫中央集权制?我的理解是,应当在必需的地方实行中央集权制,而我们这里却有这样的例子:就说工厂的供应处吧,它要给工厂管理处技术科打报告,而技术科又给乌拉尔炼铜厂打报告,而乌拉尔炼铜厂又要给什么单位打报告,等等,等等。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能得到什么?就拿马丁炉车间来说吧,它是我国整个工业列车运行的中枢、轨道,铁水在高炉里,虹吸管还在运输途中的马背上呢。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中央集权制。我们总是在干临渴掘井的事。其他同志说得对,需要给工厂更多的自主权,让资产阶级的拖沓没有办法拖沓。我们的车间里没有砖,没有好的虹吸管,没有钢锭模。其办法只有一个:打报告,送申请,结果是毫无用处。因此,我认为这种拖沓作风必须根除。

决议草案还说,我们应当照管我们的所有的工作。说得对!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10年中间,在第11个年头上,正像在这里所表述的那样,我们仍在探索。这意味着什么?怎么会得到顿巴斯脓疮这样的结果?我认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是对的,他在自己的报告中、自己的结论中说,顿巴斯的党的领导和工会领导是不好的。不仅是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领导少了。我认为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写长篇大论的好决议,必须更多地关心生产,到车间去,听取工人的呼声、要求和建议,看一看车间里在做什么。而我们这里正好相反。我们怎么样呢?看一下我们的情况。比如,某个车间主任干的工作,就是为工厂管理处,为技术领导人写情况报告,比如说写统计报表,等等。结果是任何工作也没有做。就在这时,技术领导人来了,如果车间里有年轻的工程师,他特别爱询问他,就像问车间主任一样,你的工作为什么做得不好?你怎么会这样工作?技术领导人忘记了,正是他让工程师搞那些繁文缛节。怎么样,难

道这是正常工作吗？我认为这样的工作不可能是正常的。

总之，同志们在这里所讲的顿巴斯、我们的全部工作和我们的工业的情况表明，应当好好地来抓这项工作了。必须根除阻碍我们的日常工作的这些脓疮。提交我们全会审批的决议草案可能要做些补充，但必须整个地加以通过。

除此之外，不能只局限于这个决议，应当用双手来抓这项工作，再也不能让这项工作出任何差错。只有那时我们的工作才能调整好，才能不再出现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而使工人们产生不满。因此，我认为，这里所说的一切应当贯彻到生活中去，那时，我们将会获得胜利，成为胜利者。

主席：请伏罗希洛夫同志发言，下一个发言的是雅罗斯拉夫斯基。

伏罗希洛夫：我不想涉及在这里从各个方面阐述得已经相当充分的问题。我只想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直接涉及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不仅为了消灭沙赫特案件暴露出来混乱，而且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出现这些混乱所采取的措施。同志们，我觉得，不管我们作出了什么决议，只要不采取一系列组织步骤，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就将再会遇到类似的困难。

培养自己的专家干部的问题是当前的基础。吸收无产阶级的广大社会公众参加建设事业的这项任务，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完成。我们也能改善苏维埃组织、工会组织和党组织的工作质量。所有这些都是能够做到的，是能够比较容易地达到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以应有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完成培养忠于我们国家和党的工业指挥人员的这项任务。我个人极力主张工业指挥人员由工业自身来培养。交给你们审议的决议有一点不足，这就是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只走了小小的一步。我主张走几大步，也就是说，把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所有高等技术学校全部拿过来交给工业。

斯克雷普尼克：要急行军？

伏罗希洛夫：这里没有什么急行军，斯克雷普尼克同志，这里有应当以某种方式完成的任务。不解决建立技术熟练的工程师和其他专家干部队伍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建设问题。我们还不得不长时期依靠，或者至少要使用老专家，当然是理智地使用他们。目前我们还不能没有他们。我们处于这种条件下，不得不快马加鞭地造就自己的专家，同时通过整套措施来同化老专家，[让他们对我们的红色专家进行速成教育，不这样做，同志们，我们这些刚刚上任的专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能够领导我们的工业、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宏大任务的专家]，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诚实的工作人员。

红色专家在初期需要老专家的帮助，需要他们的经验。没有这些帮助，不把

我们刚刚上任的专家同有经验的诚实的老专家结合起来,是不行的。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犯了一个大错误,他肯定说,只有在一个部门,在一个领导之下,才可以培养出所需要的专家干部,而后,在将来,他们可以服务于所有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如果要走这条路,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同志,那就得一贯到底。请您建议撤销您管辖之外的一切学校,这也包括军事部门的学校。请您要求把这些学校转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您说,提出决议案的人们走出了胆怯的一小步,而且还不是向那个方向走,而是向后走,向旧的过去的时代走,您也没有分析过去的时代。在过去的时期,大家知道,有很多学校——财政部的学校,交通部的学校,商业部的学校,工业部的学校,军事部的学校。而且经验证明,这样并不坏。至少军事学校不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总领导之下,尽管发展得不是那么辉煌,我们也有很多毛病,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完成了国家给它们提出的任务。我们在我们的军事学校和军事科学院培养了红军相应的指挥干部。国家有了红色的指挥员,可靠的、苏维埃的、有本事的指挥员。而您拿到了,确切说是继承了交通部的学校、财政部以及其他部的学校,而您的专家在哪里呢?这些高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在哪里呢?他们可能完全没有,可能有,但在我们的建设事业中完全显现不出来。

卢那察尔斯基:您对此研究透了就会肯定说不是这么回事。

伏罗希洛夫:我对这个问题问过,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同志,我肯定,事情就是这样。至少教育人民委员部向国家提供的干部在当前无论如何也不能同红军强大的指挥干部相比。在这一方面,军事部具有不可争辩的成绩。通过一整套各类措施,我们做到了拥有自己的指挥人员。我们从沙皇军队接受下来的指挥人员,到现在如果不是百分之百,也是百分之九十九地完全可靠,他们成了我们的指挥人员,我们把他们同化了,把他们同年轻的红色干部连成了一片。这个情况您就没有。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说,必须解决为经济培养指挥员的问题,不是通过把一部分或者全部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办法,而是让工业关心这些问题。让工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一起做这个事情,培养自己需要的专家。同志们,在我们生存的这整个历史期间发生过什么事?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曾担任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是不错的经济领导人,不错的布尔什维克。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之后是捷尔仁斯基,也是不错的经济领导人,很好的布尔什维克。现在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有一大批很好的党员和不错的经济管理人员。在这三个“时代”期间,如果可以这么表述的话,您为什么没有让我们的经济管理人员去关心这个最为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受尊重的同志,责任如此重大的国务活动家对此事过去不关心,现在也不关心?您怀疑他们什么时候关心过对于他们来说如此重要的问题?怎么,李可夫是不好的经济管理人员吗?当然不是。他为什么不把经济、工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高等技术学校结合在一起?他为什么不为经济组织培养指挥干部?为什么即使不用缆绳,也要用其他绳子把企业、工业部门和应当向社会主义建设供应建设者和技术员的高等学校联结起来?

卢那察尔斯基:这是因为,只是在十五大上才坚决提出了文化革命的问题。

伏罗希洛夫:为什么已经去世的Ф.Э.捷尔仁斯基没有抓这个问题(如果他抓这个问题,也不会有成效)?为什么我们现在观察到的仍是1922、1923、1925年那时候的现象?为什么?显然,事情不在于人,而在于体制,在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事情自然也不在于卢那察尔斯基的机关体制或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关体制,而在于全部国家机关体制,在于各个不同的部门机关和组织之间现有的相互关系。总而言之,有某种原因妨碍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正确地解决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专家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必须把全部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由于其他人觉得这个思想是异端邪说,我想,在目前可以作些限制,只把3—5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害怕试验。我想,这不是试验,这是解决如此急不可待的重要问题的开端。

斯克雷普尼克:必须进行证明。

伏罗希洛夫:我这就证明。这里说到了军事部门,而且说了很多。同时,这里也说到为军事部门培养自己的指挥人员要比为工业部门培养专家容易。

喊声:为什么你把自己的学校转交了出去?

伏罗希洛夫:这不对。(全场喧嚷)你们别在这里喧嚷。不是说我们培养指挥人员比卢那察尔斯基容易,我说的是,你们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瞎叫唤。我们培养指挥人员并不容易。

你们知道,我们主要是从农民或者工人当中培养红军指挥员。从农民当中培养指挥员不容易,这是因为,我们要在政治上长期认真、严肃地培养他们,完成这项任务我们有时力所不及。我们几乎招收不到真正的无产者到军事学校里来。红军中的生活条件和其他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对良好的无产阶级干部没有诱惑力。党和工会很少关心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要把学校配备齐全时时处处感到异常的艰难。我们得不到足够的备选人员,不能从中选拔所必需的人员。但我们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同志们,我们现在大约有2.6万名学员。我们有培养初级指挥员,也就是培养排长、连长等军事干部的学校。除此之外,我们还培养各个专业的技术人员——枪械师、建筑师、机械师、化工人员、摩托师、铁路工程师、地形测绘师等。

斯克雷普尼克:什么都有!

伏罗希洛夫:我们有6所军事学院培养高级专家——各个专业的工程师:有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学院、海军学院培养工程师,有军医学院培养医生,军事政治学院培养政治工作者。[我们培养的工程师是不错的,是很好的,要比你们的工程师强。关于这一点,您可以去问问使用过他们的人。我们培养出了160人。我们在我们的空军学院培养专家,培养空军部队的专家工程师。从来没有把这些干部转交给你们,也不打算把他们转交给你们。]最后,我们在军事学院培养一般的指挥员。我们军事学院培养的专家和工程师在学业质量上远远超过民用高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

我们的哪些高等技术学校交给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为什么要交给它?我们在为红军培养指挥员时,我们始终关心的是要花费尽可能便宜、尽可能合理。有一段时间,我们大约有200所学校和进修班,学员12万人。现在还剩下68所,学员2.6万人。过去,我们曾经有过两所同样的学院:工程学院和炮兵学院,不得不把它们合二为一,取名为军工学院。在合并时,我们把某些系取消了,把某些专家如电器技师,交给了教育人民委员部来培养。红军每年需要这类技师50—60人。

霍多罗夫斯基:军队的化学工程师呢?

伏罗希洛夫:我们有化学学校。我们培养化学兵指挥员。至于说化学工程师,在战争时期国家应当多给我们一些这一方面的专家,而在平时时期,我们每年则只需要十来名。军工学院为我们培养和平时时期不可缺少的化学工程干部。后来,我们关闭了军事管理学院——过去的军需学院。我们一共需要这一专业的工程师114人。在您的普列汉诺夫学院正在培养工艺工程师,我们需要这些人作为高水平的验收人员。这就是教育人民委员部所说的要将军事学院转交给它的全部情况。您以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甚至能独立地培养上述专家?没有那回事。在高等技术学校里设有我们的军事系,一共有5个系,首长是我们的,用的是军事教官,学员和军事教官的编制和全部给养都是我们的。只有公共教学问题才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来管。

霍多罗夫斯基:只管公共教学问题。

伏罗希洛夫:对,只管公共教学问题。如果我们只为了培养我们所需要的几

十名专家就支撑一个学院,我们就成了怪人。况且,应当告诉你们,决定从今年开始撤销普列汉诺夫学院的军事管理系,并研究将电工系(从电工学院)转交给军工学院的问题。

教育人民委员部设有兽医学院。我们从来没有设立过兽医学院。喀山兽医学院曾为沙皇军队提供过兽医。现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按照我们的教学大纲,在我们首长的领导之下,用我们的军事问题教育在专门的系里培养军队兽医。在把这些情况告诉你们之后,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的说法就显得奇怪了,他说什么由于我们完成不了培养专家的任务,似乎不得不向教育人民委员部乞求了。

臧声:那就让首长来管。

臧声:您按什么条件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签订合同?

伏罗希洛夫:我现在就讲,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什么不按我们同教育人民委员部确定的道路走。应当说明,我们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霍多罗夫斯基同志的关系在各个方面都是很友好的,很好的,正常的,从从来有发生过任何误会。

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是因为它比我们差?不是这么回事。

奥尔忠尼启则:克利姆·米柳亭说,你有红军,当然大家同你的关系都是友好的。

伏罗希洛夫:现在,整个工业需要大量的可靠的受过训练的专家,而教育人民委员部却提供不了。再过5—10年,很多工业部门可能就会有红色专家来了。到那个时候,所有的高等学校都要划归卢那察尔斯基统管了。那个时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相互关系将会是正常的、良好的,因为将要进行谈判的是已经平等的双方。而现在的情况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向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要求,而后者不完全明白前者想要它干什么,不知道在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那些干部面临着什么样的任务。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责备我们说,我们向后倒退了一小步,因为我们试图把两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现在我就给您拿出一个例证。去年,在充实我们正规学校的时候,对毕业于你们学校网的七年制和九年制学校的学生进行了测验,结果发现,他们按照初级教学大纲的考试都没有及格。在1926年参加考试的人员中,28%的人不及格,也就是说,按照老的国民学校教学大纲,九年制和七年制学校的毕业生考试不及格。去年,我们也对大体上这么多的人进行了考试,而不及格的人已经达到了36%。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这可不是一小步,而是整整一大步,正如您看见的,这是向后倒退的

一大步。瞧,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如果您注意到这个情况,您会看到,您自己的事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我应当补充一点,在这些考试不及格的人当中,有很多工人,按社会状况看他们是我们的很好的小伙子。我们不能接受他们加入军事学校,因为他们一个字不识。他们为什么不识字?因为教育人民委员部没有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只用一个部门来包罗国民教育的各式各样的任务和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专家,不可能不在这个或那个方面造成损害或在两个方面都造成损害。因此,我建议,教育人民委员部应把主要精力放在真正意义的国民教育上,暂且把自己的部分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会把事情办好。我深信,只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像军事人民委员部那样,它能够在短期内解决造就有专业水准的、忠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工业指挥干部的这项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沙赫特案件不再重演。

主席:请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发言。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认为必须首先提请注意,尚在1923年11月,我们就已经指出了我们现在在顿巴斯看到的现象。当时似乎觉得在5年之内就可以根除我们指出的缺点。那时在顿巴斯曾发生过一系列罢工。1923年的前9个月发生了121次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7万人。当然,这样的罢工现在没有了。当然,现在之所以说到处都是一幅阴暗景象,这是因为我们的任务就是指出应当纠正的东西,因此我们才指出了缺点。如果说那时党组织的工人人数极少,那么现在,我们的党组织增长了好几倍,我们矿业工人的组织强大起来了,文化工作加强了,建成了很多文化宫(虽说有了文化宫,但里面并没有文化,里面的文化教育十分薄弱)。当然建成了大量住房。但当我们研究这些住房建设情况时,我们就得承认,住房建设也搞得太糟糕了,甚至比5年以前建的房子还要差。住房建设没有工人的任何监督。如果你们看一看,工人的文化需求是如何满足的,那么可以说,在5年期间我们虽然取得了成绩,但如果我们对这个战线给予足够重视的话,这些成绩远非是目前这个样子。我提请注意,当时我们就警告过,沙赫特矿区对于矿场上存在的反苏维埃的异己分子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那时,我们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但直到现在为止,对于我们警告的危险仍然没有引起重视。在那个时候,似乎加米涅夫同志反对我们对局势的评价。他说,如果我们所描绘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那里就不会有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我直截了当地说,当时是极力要抹杀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因为现在不再抹杀这个问题了。但同时应当采取一切措施,防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局势变得不再尖锐的时候,再出现抹杀问题的现

象。我们这里常常有这种状况：在给我们当头一棒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出最坚决的决定，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平安无事了，又恢复以前曾被我们谴责过的工作方法。在这里，我们应当来一个很大的转折，应当抵挡住强大的反抗。

在这次全会上，很多注意力都集中到我们要如何培养新的专家接班人，我们要如何培养领导顿巴斯和全苏联生产的经济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的接班人。同志们，你们不觉得这里的辩论已经过分地强调高等学校要保证完成培养专家的任务吗？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主要的、基本的、大量的领导人员要直接在生产中培养。我们的生产会议应当帮助推举领导干部，帮助培养领导干部，使我们的生产合理化，可我们的生产会议现在情况如何呢？在这里大家列举了许多事例。我可以列举出20来个例证，说明工人或者工程师自己是怎样讲述生产会议的召开情况的。几年来我们都说应当使生产会议达到一定的高水平，应当对工人的建议给予奖励。就以奖励基金为例，实际情况如何呢？就说我刚刚呆过的阿尔乔莫夫斯克区吧。很多企业根本就没有划拨出奖励基金。在23家大型企业当中，56 650卢布的奖励基金中只用了5 589卢布，占9%。矿业工人协会的奖励基金只用了1.86%。谢尔比宁斯克矿务局更可笑，为此目的专门设立的4800卢布的奖励基金发给工人的只有40卢布，占0.8%。之后，当一年结束的时候，预算要结账了，才发现基金没有加以使用。矿业工人协会奖励基金的使用率大体上只有1.8%，所有企业的平均使用率为9%左右。戈尔洛夫卡、利西昌斯克、格里申斯克等矿的奖励基金共有10000卢布，从来没有颁发过一次奖励。是不是工人们提出了不能给予奖励的建议？在这一方面工人们描绘了简直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叶尔米洛夫发明了榨取润滑油的水压机，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他在1926年提出了这个设计方案。但是谢尔比宁斯克矿务局把他的设计图纸给弄丢了。我们有一个发明人叫弗努科夫，他发明了掘进测量仪。之后，他用很长时间打听他的发明得到了什么结果，打听对他发明的研究结果。结果是当局不顾工人抗议硬把他给解雇了。当然，有人要求他们的发明有人管，这对某些人来说觉得不方便。但是，如我们这样对待工人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努力改进生产、使生产合理化，那么任何红色专家、任何高等学校对我们都不会有帮助。在对待提拔有经验担任技术领导职务的非党群众方面，也是这种情况。施瓦茨同志在这里说过，而且所有矿业专家都这么看，即矿业不是科学，而是技能。如果矿业是技能的话，那么工作了二三十年的工人的技能不会比刚刚从某个高等学校毕业的技师少。不会比他们少。在这一方面，对被提拔的工人，态度是过于冷漠的。就是那些毕业于矿山中等技术学校的工人，也得

不到使用,对他们的态度时时处处都是恶劣的。利西昌斯克中等技术学校的领导人帕谢奇尼克在会上对我说过:“在我们区出了这么一件事,利西昌斯克区的采煤工在利西昌斯克矿山中等技术学校毕业了,来到矿务管理局找到工程师说:我在中等技术学校毕业了,想去实习。工程师问:你是从哪里来的?那人回答说:我是利西昌斯克的采煤工。我们不需要利西昌斯克这样的采煤工!瞧,工程师竟然做出这样的回答。”

这样一来,如果对毕业于技术学校的工人们采取这种态度:“你,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毕业于正规学校的学生,需要工程师所了解的‘自己人’”,那么你们还是会把年轻的专家给赶走,年轻人在那里要碰壁,而他们必须把壁给碰穿。那位帕谢奇尼克同志在会上说:“人们不愿意同技术学校毕业后去中顿巴斯工作的工人讲话。身为共产党员的经理们首先要同总工程师商议,可以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人来工作。”这样的状况必须坚决改变。

我认为,考试制度也存在这种情况。工人们多次向我们抱怨说,他们出差来到这里参加考试,而在中心,在考试委员会却这样对待他们:要是他们对某个问题回答不出来,而从来没有当过采煤工的教士的儿子能够回答上来,那么就录取教士的儿子,而把采煤工拒之门外。于是对采煤工说:过一年再来吧。于是采煤工又回到矿井。所以必须保证我们所有的考试委员会实行这样的办法,有这样的成员,让具有足够生产工龄的工人,即便他没有掌握教士的儿子所掌握的书本知识,也要录取他,要帮助他。这就是我们这里有时所说的要取消工农速成中学的原因。我们应当十分坚决地强调,工农速成中学提供了培养工人的机会,不能取消它,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持它。

斯大林同志在这里全面地提出了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对待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和极不认真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在很多单位达到了荒谬的地步。当中央委员会的巡视员梅什金同志在斯拉维扬斯克区作报告的时候,给他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发言中可不可以涉及个别党员和批评在座的经济管理人员?”你们看一看,在那些树立了经济管理人员专权的地方,能否批评经济管理人员已经成了问题。还有这种情况,由于领导人不能容忍批评,由于受到“压制”,老工人们不得不交出了党证。在沙赫特区,近期有几百名工人退党,这比入党的人数还要多。我在报告中列举了很多压制批评、不容忍批评的事例,我还可以再列举一些。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采取大转变的果断方针,如果我们不惩罚那些实行压制的人,我们将一事无成。我们应当考虑,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能不得不撤换某些区的领导人。

要知道,你们应当看到哪怕是康斯坦丁诺夫斯克工厂里的状况。在那里当政的是邦达连科,就是那个虚报康斯坦丁诺夫斯克制瓶厂“成绩”的邦达连科,他毫无羞耻地向代表大会吹牛,说他们工厂取得了什么“成绩”。这个同志,他是怎样做领导的呢?他是区党委会委员,但同时,他还是这个区的主人。他对党内的同志这么讲话:我是主人,你们是佣人。他对所有的党支部发号施令,他作为经济管理人员,却对所有的工会集体发号施令。他取代了一切。托姆斯基同志在1923年谈到过沙赫特区,他说的就是经济领导人下属的不太好的政治处。他在这里指的是党组织。遗憾的是,有些党组织仍然保留着经济领导人下属的政治处地位。

当前,很多区的党组织的状况不好。我们本应当在顿巴斯的阿尔乔莫夫斯克、斯大林诺区采取非常强烈和果断的措施。尚在不久以前,克里沃罗日斯克专区的苏维埃机关的情况就很不好。我们刚刚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研究了索契区案件,不久以前研究了里亚日斯克案件,后来又研究了科斯特罗姆省涅列赫茨克县的情况¹²⁶。所有这些都是应当根治的脓包。有些同志们走上讲台说,好在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沙赫特案件。同志们,不要自我安慰,应当十分认真地看一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是不是真的没有发生这种事情,还是我们没有看到。当然,阿尔乔姆斯克区发生的所有不成体统的事都与谢尔盖·阿尔乔莫夫^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¹²⁷,被称为“阿尔乔姆风气”。我想问问同志们,能不能不把这些不成体统的事同阿尔乔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为终归阿尔乔姆斯克的组织总体上是健康的,就工人群众而言,和整个顿巴斯的组织是一样的。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要略微提醒在减轻经济管理人员所承担的党的工作这个问题上可能出现的过火行为。安德烈耶夫强调指出,我们应当给经济领导人松绑,应当认为,他们的主要的经济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党的义务。这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就是党给他提出的工作,这就是党给他们安排的主要工作。但是同志们,这里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解释: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学习是党的工作;经济工作是党的工作,等等。那好,干嘛要职业演讲人、职业宣传工作者去进行群众工作、工人工作,进行对列宁志愿者和十月志愿者的群众性教育工作呢?

我想提醒的是,要防止这样解释,说我们的经济管理人员是最有文化的、受过政治教育的工作者,除了与管理经济直接有关的工作以外,我们要让他们摆脱其他一切义务。我们在这里会碰到的这种解释,它可能会导致经济管理人员完

① 原文如此,应为阿尔乔姆。——译者注

全脱离党的会议,完全脱离生产会议,等等。经济管理人员有可能发展成为好的专家,这也是需要的,但是,最终他有可能会脱离党的路线,脱离党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是狭小的生产领域所不能包容的,因此,我们在这一方面可能要遭受某种损失。因此,我认为,必须防止这一点。

主席:递上来一张书面建议,要让所有的发言人都能发言。这里登记的有几十个人。再请波克罗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H. K. 克鲁普斯卡娅发言,然后讨论结束。

喊声:对。

主席:我来表决,谁支持这个建议?通过。请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发言。

喊声:休息!最好让他们在做闭幕词之前发言。

李可夫:我的闭幕词不需要很长时间,可以听完四位发言人的发言。
现在宣布休息。

(休息后)

主席:请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发言,下一个发言的是奥尔忠尼启则。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听到了很多很好的关于把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般性的讨论。我想,全会应当具体地对待这个问题,列宁教导我们说,要具体地对待一切问题,只有一般性的讨论是十分不够的,而且这些一般性讨论的某些部分是以不完全清楚,不完全准确的事例为依据的,对此,我将尽力做出证明。因此,我重申,我在这里不再进行一般性议论,而那些以为我要捍卫教育体制的整体性和其他原则的同志可能要错了,也会失望,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想只谈谈某些实际问题,这些问题从我的工作性质上讲是非常亲切和非常熟悉的,可惜,这里对此无人问津。首先,我没有听任何人说过,打算用什么样的人力去进行全会所建议的改革。现在只有一个技术教育中心——职业教育总局。但是谁也没有直接说到,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各种暗示是相当清楚的:我们党没有足够的力量领导这个中心。领导这一个中心的力量不够。于是,有人对我说,由于领导一个中心的力量不够,那么就建设两个中心。同志们,这是试图推翻初等数学的著名公理:部分总要小于整体。这里试图要证明部分可以大于整体。请看,这里有一个单位,不够大,把它分成两半,于是就比一个单位大。我不清楚,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古比雪夫同志讲了很多关于不称职的委员的事情。他讲得很好,并说明了

这些不称职的委员是怎样产生的。把一个不懂得生产实质的人派去进行生产,他当然不可能领导生产,只能在官僚机构里做些无谓的小事。是的,的确是这样。但是试问,难道对工厂、矿山能这样,对高等技术学校就不会这样了吗?难道在这方面没有受过理论教育的人能够领导高等技术学校吗?一个受教育程度比高等技术学校教授低得多的人能够得到教授的尊重吗?这可能吗?我们为什么要让在国内战争提拔上来的经验极其丰富的领袖来领导红军(对红军我还要特别讲),而谁也不会让我这个科学院的人来领导?为什么?这是因为,在军事专家和国内战争的英雄看来我是矮一截的,这是完全对的。来了某个老百姓,没有当过兵,没有打过仗,没有受过理论训练,却开始发号施令。他们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让那些理论水平不高的人来领导高等技术学校,那我们造就的就是不好的指挥员。事实上,老教授们熟悉情况,具有应有的理论水平,他们将是这些高等技术学校和整个高等技术学校系统的主人,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你们自己来评判。现在,我要说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之内而是在它之外的状况。我了解我们党的理论队伍的现状。我有幸在一个委员会里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整我们的研究机构的工作,合理使用我们党的科研力量。我知道,对不起,请原谅我的用词,我们的这种力量寥寥无几,我们只能是精打细算地使用这些力量,并用这些力量建成规模可观的重拳。

比如说经济,这是我们储备的专家比其他任何领域都多的一个领域。现在,各个人民委员部需要大量的经济理论家。结果如何?为了向农业人民委员部集体农庄局提供有一定理论水平的领导人,我们不得不关掉红色教授学院的一个学习班,砍掉了这个对我们极其必要的机构来让农业人民委员部得到相应的专家。为了安排一个人民委员部计划工作,我们撤销了共产主义学院经济部即学院中心部的学术秘书。如果不关闭,我们至少也要压缩这个部。这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啊!这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我们是把衣裳的下襟剪下来补袖子上的窟窿。这是经济领域的状况,在这里,我们的力量还算相对大一些。

要说高等技术学校在我们的技术和精密科学领域具有很多的力量,我没有这样想过,这里的这些力量还很小。而且没有任何人说过,要吸引多少人力来参与这件事情。顺便说一下,有人说,这会自然搞好的。同志们,不能这么做,这纯粹是分配力量的具体问题。在我刚才提到的委员会里,我们正在尽力简化体制,取消重复建制,因为,不这么做我们就要垮台。我们正在建立科研院所,似乎这里有党的领导,而实际上任何领导都没有。那里虽然坐着几名共产党员,但他们的科技水平要比管理研究所的专家低得多。有人建议我们把这些力量化整为零。

我请求给我这个委员会成员和主席下达指示,我应当如何做。因为我们要实行联合路线,有人却让我们不要联合,要我们搞分散。我再说一遍,或者让我们安排那些没有受过理论培养、不能得到教授尊重、可以说是被教授牵着鼻子走的人担任领导,那么,我们得到的将是不称职的委员。这是给你们讲的第一个实际困难。

同志们,再说另一个实际困难。这里使用的两个术语相互混淆不清。一方面,决议里说(我记得是),预先就决定了把某些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而这里说的是必须让工业为自己培养人员。但同志们,可惜的是工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是两个可以相互对冲的数字。请你们数一数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那些最大的学校,它们在为谁服务。请你们看一看列宁格勒工业学校,那里设有造船系,当然,造船系为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服务。

喊声: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设有船舶制造局。

波克罗夫斯基:就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设有船舶制造局。下一个系就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了:农业工业系当然是为农业人民委员部服务的。之后,有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那里设有建筑工程系,这个系为市政公用事业、整个城市建设以及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部分部门服务,这个系至少不只是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服务的。那里有电机系,它的一半用弱电流为邮电部和交通部的部分部门和信息化服务,另一半用强电流为市公用事业服务,那里有有轨电车。对,有轨电车是小事,你们会说工业不在此列。给你们看另一个情景。就拿普列汉诺夫学院说吧,那里有经济系,它主要是为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合作社服务,而不是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服务。

喊声:不对。

波克罗夫斯基:就说乌拉尔工业学校的林业经营管理系吧,你们看到了,它是为农业人民委员部服务的。

所以,如果你们要把所有这些学校都放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各个部门里,你们就得重新改造这些学校,也就是说,对这些学校做非常复杂的手术。这里针对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了一个论据:教育人民委员部为什么要培养法学家、历史学家、工程师等专家。这话同样也可以这么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什么要为邮电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培养人才?而且我应当说,我们已经习惯把所有的东西都包揽起来或者叫经营国营百货商店。我们能把所有的部门都按部就班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十分怀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够在这一方面一下子摆脱部门的框框。我也十分担心,随着把高等技术学

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那些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服务的系将会成为宠儿,各种好事都会落在它们的头上,而其他系则会无人过问。结果是,把两三所高等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看起来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问题,可是会让这些学校都被各个部给扯散了。要知道,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建立起这个系统,而你们想一下子把它破坏掉。这就是向你们所说的这条道路上的另一个具体困难。

现在,我想转一个话题,谈一谈论据本身的问题。是的,相关的发言人原谅我,在这个论据中有很大的毛病。有人指出,军事部门和党把工作安排得很好,是因为高等技术学校都掌握在它们各个部门的手中。对于军事部门,这大部分是对的。但对于党,我只是现在才听说是党按照部门方法管理红色教授学院。我作为校长同很多机构打交道,同财政人民委员部、中央执行委员会财政局、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工农检察院等都打交道,工农检察院不久以前因为建筑问题给了我一个处分。

伏罗希洛夫:“遗憾”的是我们大家都同工农检察院打交道,这种“不满”是普遍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

波克罗夫斯基:我更认为这个不满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但问题在于,我们只从工作方法或者思想工作方面同党打交道。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党掌管一切。但是容我说一句,难道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就没有类似的权利?请允许我引证尚在1920年颁发的命令的片段。

臧声:列宁时期的命令。

波克罗夫斯基:是的,这是列宁时期颁发的命令,这是列宁签发的命令。“教学的进行应当以对国营企业生产过程和生产组织的实际研究为基础。大学生在这些企业的工作计划要由高等技术学校会同有关经济机关协商规定”¹²⁸。工作计划要会同有关经济机关协商制定。现在,在教学计划的教学法等方面,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具有一切权利。遗憾的是它不去实施这些权利或者极不认真地、只是形式上实施这些权利。但是,没有任何人妨碍它实施这些权利,妨碍它同我们一起以相应的力量参与制定教学计划等工作。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具备,所以党管理高等技术学校的那条路线也完全可以由其他机关来实施,不用把学校划归某个部门。所以,惟一足以让人信服的论据,这就是军事部门的问题,但伏罗希洛夫同志提出了很好的反对自己的论据。他说,你们的中学提供的是完全不使用的材料,28%的学生不及格。

伏罗希洛夫:1927年有36%的学生不及格。

波克罗夫斯基:太好了,36%,这个数字更好。这当然是为了刺激教育人民委员部。这倒不错。从整个系统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将会向我们宣布,只要它一有困难,而它是会有困难的:中学能向我们提供什么,你们知道吗?由此得出结论,把中学也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吧。(笑声)而后,当中学转交过去以后又发现,小学提供的材料也是低劣的,那么,也不得不把小学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这是茶余饭后的笑料。按伏罗希洛夫同志所说的道路进行学习的人,他们在过去的学业具有连贯性,这是因为旧的部门学校是一个体系。在尼古拉一世时,海军士官学校学业五年,在刚刚入学后,培养这些未来海军军人的不是教导员,不是教师,而是给他们擦鼻涕的保育员。(笑声)

伏罗希洛夫:我们现在也还有两所这样的学校,学员是自己管理自己。

波克罗夫斯基:这样连贯起来分析判断,我们就可能要设立各部门自己的幼儿园了,这是可能的。(笑声)

这样以来,同志们,你们就看到了纯粹从实际情况看,这里所说的部门学校的理由就不能说是很牵强附会的了,也不说是很大的误会了。我们在对高等技术学校的教学领导中,过去从未拒绝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将来也不会拒绝,如果我们拒绝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依靠这个法律,有权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并要求我们进行整顿。我想,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不会不同意我的看法。

卢那察尔斯基:完全正确。

波克罗夫斯基:在这一方面,不做任何转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也可以感到满意。正像我指出的,转交不但会严重破坏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系统,而且会破坏每个高等技术学校的内部系统。在各个部门范围内你们是什么时候也做不到的。有人对我们说,这是实验和小步骤。小步骤有各种各样的。不久以前,我在中央委员会已经明确规定了的节约制度的阶梯上走下来的时候,刚迈出了一小步,后来在病床上躺了三天。(笑声)我以前认为(正像给我们提出计划的起草人所认为的那样),只要我迈出一步,就能一下子踏在了平台上。我这么做了,结果发现,下面还有三个台阶。如果我们要迈出这样的一小步,可别出现我这样的情况。谈到这一点时,人们指出,只有在六年以后才能真正显示出这一步骤所产生的结果。

喊声:七年。

波克罗夫斯基:为了让按新规则录取的大学生学完课程需要四年,实习需要

两年。瞧,同志们在提醒我,可能不是六年,而是七年。你们去实验,经过七年,这个实验就会取得我在中央委员会的阶梯上迈出一小步所取得的结果。我不想站在部门的立场上把一切都留给教育人民委员部,我们不坚持现在就从这个意义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是说:先生,如果请您听好!您不可能在四个小时的演讲里听我们把话说完,请建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第一要研究职业教育总局和它的高等技术学校提供的是什么样的产品,请您委托这个委员会,或者通过若干个委员会联合、简化和排除并列能比它做得更好,研究如何具体办好高等技术教育的问题。你们可能决定没有必要给职业教育总局留一所学校,把它的学校全部拿走,但那将是对问题进行全面地讨论的结果,而不是照现在的这个样子讨论的结果了,这就是另一码事了。(主席摇铃声)

人造眼睛已经眨眼了,这就是说,我该结束发言了。(笑声)

主席:请谢尔戈同志发言。

奥尔忠尼启则:有些同志抱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对他们作出的处分,我现在在这里没有可能向他们作出答复。这也不需要今天作出答复,尽管我不隐瞒,在这个讲台上听到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责备对他作出的处分,我很不愉快[因为他是非常好的学者,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有其他的一切,但他并不会做科学院的管理工作。我有什么错?我真没有错,但我们不谈这个问题]。我也不向对我们指三道四的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作出答复。就这样吧。伊里奇要求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工作不要讲情面。我们尽可能完成这些要求。如果做得不好,应当改正。我请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站出来,如果我们对他的决定不正确,请他讲出来。

卢那察尔斯基:不,不,非常满意!(笑声)

奥尔忠尼启则:是很满意还是很不满意,但至少我没有错。我想,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也不想把他十分不满的问题当做全会的讨论对象。

卢那察尔斯基:对。]

奥尔忠尼启则:现在讨论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的经济管理人员没有像他们应当做的那样去做。他们没有利用工业优势,没有把那些不解决就难以让经济管理人员进行工作的所有的基本问题向党提出来,同时又掩饰自己的缺点,却装出了自卫的架势,好像是有人在指责他们,好像有人说,他们什么都不中用,任何成绩都没有取得,一切错误都在经济管理人员身上。请原谅,亲爱的同志们,如果你们这样认识自己,所有的优缺点都是你们所作所为,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谁也没有说过,你们什么都不中用,我们没有进步,不是这回事。这里

说的是,由于发生了沙赫特案件,为了不成为我们的资产阶级专家的俘虏,我们应当如何进行工作。我们应当如何安排我们红色经理的工作,让他们真正管理起委托给他们的企业,而不是给他们拿来什么都画圈同意。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柯秀尔同志在《真理报》发表的文章¹²⁹起的作用不怎么样。顺便指出,柯秀尔同志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他早已不是工厂经理或者托拉斯经理了,他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副主席。他总是埋怨,这没有,那不好。柯秀尔同志应当说的是如何改正这一切。他还以为,直到今天他仍坐在格罗兹尼或者哈尔科夫。顺便说一下,处于这种状况要好得多。[我也是这样,当我在梯弗里斯时,什么都指责,来到这里以后,才发现,需要你指出如何改正。

伏罗希洛夫:现在的指责越来越多了。]

奥尔忠尼启则:我们今天印发了《工业基本建设》¹³⁰这本书。不是我们编写的。书中所写的缺点,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我认为,我们做得正确,我们要为这些缺点大声疾呼,而不是掩盖这些缺点,要是三年以后再来改正,到那时候再谈这个问题就太晚了,就无法改正了。现在几千万大军正在投入这个事业,能对这件事高枕无忧吗?当然不能。我们现在对这种现象正在进行批评,害怕这种批评的同志是不对的。他们硬说,我们进行肆无忌惮的批评,我们的报纸上满篇都是批评,等等。我认为,这是由于我们完全忘记了应该怎样进行各种批评。因此,当略微碰一下某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呼喊起来,说什么动摇了基础,等等。不会的,同志们,自我批评刚刚开始,是左顾右盼地开始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危险不会危及我们。我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就在前几天,在特维尔市,康德拉季耶夫同志,一位不错的经济管领导人,只是因为反对省里的监察委员会的书记和主席,简直就像被钉上了十字架。我们不得不斥责这位省监察委员会的书记和主席,撤了他的职。你们看,这就是自我批评。我问这位省监察委员会主席,您为什么把康德拉季耶夫同志钉上了十字架呢,他回答我说,因为康德拉季耶夫同志批评领导。什么领导?如果批评你这个省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就得受体罚吗?昨天斯大林同志转告我说,莫洛托夫说,在斯大林诺,一位党员工程师因为喝了纳尔赞矿泉水而被赶走。我们的专区监察委员会直接把这位不幸的党员工程师赶走了。据说,他是位好的工作人员,但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要把他撵走,然而却找不到赶他走的原因。

喊声:(乌克兰代表团席上)不是这么回事。

奥尔忠尼启则:我没有去过那里,我是转述斯大林同志的话,这件事是莫洛托夫同志告诉他的。在你找不到原因的时候,就去查看他的碟子,看他吃什么东

西;就要查看他的瓶子,看他喝什么东西。查清楚他喝了纳尔赞矿泉水。既然他喝了矿泉水,那毫无疑问就是反革命。在我们那里,在工厂里,工人们要发表意见时,开始总要说,我可能因此会被赶出工厂,但我还是要说实话。你们看,这能说是广泛的自我批评吗?不久以前,我到过橡胶厂。工人们特好,气氛特好。12个人发了言,把我们所有的缺点都坚决地摆了出来。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到工资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到肥皂、黄油不够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出个人的问题。但是每一个人在发言时都说:我们总还是有些害怕。我们现在还常常只是提一些小缺点,批评一些小缺点。[谈到这里我们就离开了,再多的问题,我们没有涉及。你向报社寄信,需要几十次叮嘱,因为信件发表了以后,总要麻烦不断。因此,对此只好不说。柯秀尔同志做了发言,他在自己的发言里把整个事情都归结为对专家的工作,归结为怎样让我们的经理成为工厂的真正主人,让他们这些不幸的人们知道,他们搞得人心不安。那里发生了什么,不要签完字就了事。他把所有这些大问题归结为调查。]

И. 柯秀尔同志在他的文章里大发议论,在他的讲话中谈到让我们的经济领导人感到不安的无数次调查。我完全同意柯秀尔同志的意见,现在进行的一些调查不成体统,这也包括工农检察院有时进行的调查。我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说过,我们所做的调查不起任何作用。只有当问题败露时,我们才去调查,才去抹稀泥。而及时的防止,及时的警示,我们往往不会。按柯秀尔同志的说法,结果是,很多调查的过错完全在于工农检察院。是这样吗?我们以布勃诺夫同志进行的调查为例。在对化学煤炭托拉斯进行的调查中,工农检察院只调查了四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调查了130次。莫非为此事就应当责骂我们,而不是柯秀尔同志自己?他刚刚对我说,检查员们在巴库蹲了6个月,进行了检查,——不像话,不能容忍。阿塞拜疆石油托拉斯的经理巴里诺夫在这里坐着,他给了这样一个说法:是的,从10月份开始检查,检查了6个月,谁检查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构。我们在半年的时间里进行的惟一的一次调查是按政治局的决定往那里派去了我们的委员会,在那里大体呆了24天,而在其他的五个月零八天里,进行调查的是柯秀尔。(笑声)我们有什么错?

C. 柯秀尔:哪一个柯秀尔?(笑声)

奥尔忠尼启则:И. 柯秀尔。应当把这些调查降低到最低限度,但没有必要企图摆脱监督。

柯秀尔同志在他的文章里谈到了不得安宁的南方钢铁托拉斯。我认为,本来最好不谈这个事情,既然你在文章里提到了,就让我来解释问题出在哪里。南

方钢铁托拉斯花了几千万卢布订购进口设备,把设备运来了,却闲置在那里,不知何时投入使用。你们想想,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乌克兰工农检察院像我们一样,对此不管不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现的?不是。商业人民委员部发现的?不是。是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告诉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公司为安装设备派来一名安装工。他给捷克斯洛伐克写信说,布尔什维克在我国买的设备在这里闲置不用。那边通知商务代表处,而商务代表处又告知米高扬。米高扬得到这个消息后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写信,而后者长期不愿意进行联合检查,最后,它同意了,进行了检查,发现安装工的话是对的。政治局命令我们调查这个事件,确实发现了价值2000万卢布的设备搁置在那里。谁管理这个设备?不是柯秀尔同志,而是斯维岑,就是现在被关在监狱里的那个,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说法,他从波兰政府那里得到了美元,而按莫洛托夫的说法,斯维岑习惯包揽一切,用托姆斯基话来说,就是让共产党员跟在他屁股后头转。同志们,我直截了当地说,从我半年的“钦差大臣”工作、极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和令人不快的工作中积累的经验看,我们的监督十分不够,应当把它放在应有的高度上。应当这样来安排这件事,使它达到这样的水平,让我们无须从捷克斯洛伐克来了解我们家里在做什么。中央委员会为沙赫特案件公开指责我们,这是绝对正确的。像瞎了眼的狗,围着沙赫特矿场乱转悠,却发现不了那里在干什么。决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有人说,一年进行一次调查。如果是在年中从捷克斯洛伐克来了通知说,设备在那里躺着不用,那我们还要等6个月?请原谅,必要的时候就要立即进行检查。

梅日劳克:不只要听捷克人的,也听听我们的吧,这件事我们已经讲了半年了。

奥尔忠尼启则:梅日劳克同志,至少我一次也不知道您曾要求检查某些地方不好好利用外国设备的情况。是捷克人向我们提出了此事。怎么办?您有什么好说的?既然话说到这儿了,那么像去年春天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基本建设进行得极坏,当我们打报告送到劳动国防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时候,不是别人,而正是您梅日劳克同志直接[鼓动所有的专家在报纸上反对我们,到列宁格勒的苏联国家冶金工厂设计院说,工农检察院如何如何,主张要通过支持所有这些专家的决定。我看,对此就没有好说的了。

梅日劳克:不对,我从来没有鼓动专家们反对过党。)一切都是为了证明所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你永远也不能否认,在格瓦哈里伊那篇关于我国基本建

设缺点的文章发表以后的第二天,您在报刊上发表声明说,在苏联国家冶金工厂设计院,在您这里有什么样的专家,他们有多少生产工龄,有多少教授,您想用这些教授的工龄来压制我们。

苏霍姆林同志在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全会上抱怨说,汇报制度压得他们喘不上气来。规定很多,这是真的,苏霍姆林同志,但谁在规定的呢?您自己在规定的,您自己又在抱怨。(笑声)是您自己,而不是别人。

苏霍姆林:不,不对。制定了无数的,往往是用不着的规定,而这些规定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来的。

奥尔忠尼启则:去年,我们少许做了一些努力,略微缩减了这种报表,现在,只要是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需要信息,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则没有,就会冲着对我们说:是工农检察院压缩了汇报制度,所以我们现在什么报告也不提供了。(笑声)

那么现在请你们看一看,因与沙赫特案件有牵连而在梯弗里斯被捕的一个反革命工程师写了些什么。他写道:“我们没有进行过任何重大的、深思熟虑的工作来使技术人员摆脱办事拖沓的工作作风,这有碍于他们的本职工作,也就是有碍于他们正确地进行生产、正确地订购需要的材料。而这个拖沓作风其实就是一条线,顺着这条线,现在被称之为有计划的破坏活动便从看不到摸不着的罪恶权力那里传播过来了。通过这条线,在需要的文件中也传来了许多无用的文件,给边远地区的技术人员制造了一条完整的循环链,让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破坏活动的参加者。地方的技术人员由于忙于为中央那些看来像是办大事的某个科长、专家所需要文件而脱离基本生产,从而带来危害,一部分人是高兴地而另一部分人是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

他们用这些文件绝妙地把我们禁锢起来,现在只要碰一下这些文件,就有人认为这几乎是犯罪。

我认为,同志们,谁都没有指责我们的经济管理人员有什么罪过(沙赫特案件中有类似于某个别列佐夫斯基的反革命分子,至于说鲁希莫维奇、皮达可夫或者洛莫夫,他们在这件事中有过错吗?胡说八道。在我们的沙赫特、莫斯科、列宁格勒、西伯利亚和乌拉尔都有反革命分子),我们的经济管理人员应当想一想,这群败类到底是怎么就能在这几年当中胡作非为而我们竟毫无察觉。

在这里我要说,同志们,不能再怪罪我们的经济管理人员了,而应当怪罪我们自己。乌格拉诺夫和其他人都说过,我们把我们的经济管理人员放在了什么样的条件之中。一个人刚刚成为经济管理人员,就提醒他,你要知道,你不再被

认为是真正的党员了。不但如此,时至今日,我们这里对苏维埃工作还有这样的认识,似乎这项工作不值得党员去做,当推荐某个同志去担当苏维埃工作时,他会说,嘿,我不去,因为我是党的干部。[有一次我对斯大林说,您真该死,您既然让我做人民委员,又好像没有让我做非党员。]瞧,对待苏维埃工作者的这种态度是多么地错误,多么地有害啊。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讨论的仅仅是沙赫特区的缺点。这些缺点不仅仅存在于沙赫特区。请看一看我们的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您在很多地方就会看到大量不应出现在我们机关里的那些美妙的东西,这些东西应当出现在那边,出现在缅任斯基、亚戈达那边。

这几天我们在阿尔乔莫夫斯克、斯大林诺、沙赫特和索契看见了什么?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些单位腐朽的上层。在沙赫特,近400名工人退党,他们递交的声明说,他们抗议乌七八糟生产中的现象。对他们的声明未予理睬。我问在那里坐着不动,只是盯着看有谁喝了纳尔赞矿泉水的专区监察委员会,它同这些工人们谈过话没有,工人们为什么要离开?没有谈过。这是曾到那里去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奥西莫夫同志说的。索契的状况比这里好得多吗?鬼才知道那里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区党委书记在干些什么,他们铺张浪费、花天酒地,荒淫无度。这种状况已经有半年多了,应当从这里,从莫斯科派人去,把所有这一切都揭露出来。

同志们,我认为主要缺点就在这里。我们成就的基础就是健康的党组织,否则,我们将会形形色色的别列佐夫斯基。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组织:在我们的组织健康的地方,那里的别列佐夫斯基就会少一些。应当承认,在这里,在顿巴斯和北高加索,我们某些组织的上层已经腐烂。昨天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发了言。有些人说,他是讲了话、发了言,可又有谁妨碍他改正这一切呢?我认为,这不对。他说了现实存在的东西,他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安德烈耶夫在这里做了精彩的发言,他无论如何不能对沙赫特、索契的事情负责,他也有大量工作要做。斯大林同志和其他同志在这里谈到的自我批评,如果这不是一纸空文——而某些同志正是这样想的:这是“出于最高层的政治考虑”才说的,那么,我们多半可以免受今天会上所讲的各种不愉快的烦恼了。必须坚决提醒同志们,这里所讲的事情必须认真贯彻到生活中去。

在索契、阿尔乔莫夫斯克、斯大林诺我们碰到了什么?在那里工作的人,我们过去都是十分熟悉的,他们忠于党,忠于苏维埃政权。他们为什么就这么无耻地腐败了呢?是的,他们受到了异己分子的影响,成了他们的俘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有时候战败者会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战胜者。在我们这里这

类事情常常会完全无声无息地发生。那些在国际会议上举行的庆祝会、各种各样的仪式、宴会等,这些都是强加的,这些东西来自失败者,他们希望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自己的“文化”强加给我们。在这方面党应当坚决给以打击。[主要是在党的这方面,因为不管对个别人如何斥骂,我们说什么,没有党的统一正确的步子,如果我们不对党施加些压力,我们的事业就不会成功。乌克兰和北高加索主要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基本按照这个路子走,事业就能成功。]

还有一句话。在这里人们说过,我们对经济管理人员安排了过多的党的工作。我们给人们安排的工作,让他们紧张得喘不上气来,这是不妥的。但是如果任何一个经济管理人员要摆脱党的工作和监督,请他相信,过不了6个月,他就会落到斯维岑那帮坏蛋手里。没有党,没有同党的紧密联系,没有党的监督将一事无成。我的话讲完了。

臧声:讲一讲高等技术学校的转交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高等技术学校转交。[你说,有人说。某些同志知道,我反对这种转交,于是,有人拿我示问。]我认为,总的来说需要让教育人民委员会来做这项工作,要想方设法帮它。但是如果全会决定把这三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古比雪夫和鲁希莫维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会都不会因此垮掉。(笑声)

主席:请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发言。

克鲁普斯卡娅:我们在这次全会上讨论的问题,其实不是新问题。从某个层面讲,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在前几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上都讨论过了。现在这些问题只不过是更为集中、更为尖锐罢了。在这里,我们的问题由量转到了质。如果我们看一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1—1922年和1923年的讲话,所有这些问题他都涉及过了,例如,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分子[专家]问题。对这个问题,他说过:“我们战胜了敌人,战胜了资本家,而现在,这个敌人已经在我们之中,但我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却看不到它。”沙赫特案件正是这种情况。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个处在我们中间的敌人。

其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直接讲到顿巴斯,在评价顿巴斯所出现的情况时,他说,其原因在于我们把行政管理和政治分离开了¹³¹。因此,我认为,现在我们谈论的沙赫特案件,从这些发言和陈述中我们看到了行政管理和政治分离的那种情景又重复出现了。如果行政管理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就不可能出现如此鄙视工人们,如此轻视工人们的现象,就不可能出现我们在这里很多人明确指出的那种无视工人群众的现象。这是症结所在。这里分

析的问题总起来说要比沙赫特案件更广泛。在各个地方,在各个州,我们到处都是把行政管理与政治分离开来,正因为如此,官僚主义有了很大程度的滋生,因为时间往往都消耗在讨论从政治观点来看完全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上。

再其次,是学习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恰恰是把这个问题同顿巴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但他提的不是关于高等学校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向敌人学习、应当如何向资本家学习的问题。他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写道:你们是否用所有军事艺术规则把这个“敌人”(他把敌人用括号括起来)给包围起来了?他说过,有可能用所有的规则把敌人包围起来的这种学习,这种学习是严酷的,不是学校里的学习,这是来自生活的学习,是在错误中学习,是向敌人学习。他还说,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学习就不会那么严酷,而现在对我们来说,这是生死问题。现在,这样的提法仍然有效。我认为,这一点在沙赫特案件中看得特别清楚。如果我们用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设立三所高等学校的问题代替所有共产党员所面临的严酷的学习问题,这样来解决学习问题,那是极不适当的。这像是在开玩笑。这不是问题的所在。

我想说一下我们经常忘记、我们自己现在又在讨论的问题。当我们制定党纲的时候,我们在教育问题上贯彻了马克思的主张。那时,我们在谈到学校时,说的是综合技术学校,我们说到了整个教育必须紧密联系生产,和生产紧密衔接。如果我们看一看欧洲、美国,我们就会看到,这种联系不仅是在高等学校,而是从上到下都要贯穿这种联系。这种联系马克思讲过,这种联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过。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而是把一切归结为几所高等学校,归结为这些高等学校归哪个部门管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对于我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重大原则问题归结为一个小小的行政措施问题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从起步时就在争取教育与生产相联系。如果说这一点没有做到,那是开始时没有实行,是因为我们处在经济崩溃的年代,而后来则是因为经济管理人员不配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配合。举例说一个小问题——大学生的实习问题。教育人民委员部极力主张大学生要进行实习。而大学生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实习的情况呢?对此他们是敌对的。他们去实习的时候,让他们做什么呢?譬如说实习纺织工的大学生应当看织机,而行政领导却让他们一天三次看温度表,看车间里有多高的温度。这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给予的嘲弄而不是帮助。当你提出点什么,要求拨款时,各方面都要求你拿出计划,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则要求人们相信它的话,它能把高等学校办得更好,但它任何切实的建议也拿不出。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了切实建议,说到了应当怎样培养工程师,考虑了泰勒的说法,考

虑了德国人的说法,考虑了外国专家的说法,培养出的大学生要能够成为真正的经济管理人员,能够管理好生产。也要考虑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推荐的泰勒的书,关于工业企业管理的书¹³²。泰勒发展了完整的体制,他论述了应当怎样培养工程师,工程师在生产中应当怎样在车床上工作,在工厂应当完成哪些任务。教育人民委员部对此了解甚好。如果教育人民委员部不能贯彻这些办法,那就是说各个部门从自己部门的角度对待它:咳,这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事情,我们不会帮助你们的,这是你们的事,你们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而我们自己招来了大学生。办了其他方面的事,有什么样的切实计划呢?没有。危险不在于把三所工业高等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而在于整个教育与工业、文化生产和经济紧密相连的重大问题代之以2—3个高等学校的问题,而且还要争论,把通过我们党纲之后本不该浪费的时间都耗费在这些争论上了。这个问题,如何培养红色专家的问题,我们曾在今年春天预计要举行的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党的会议还没有举行,就在全会上向我们提出了转交高等学校的方案。要知道,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得不设立自己的“职业教育”。要知道,古比雪夫、柯秀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们,他们应当管生产问题就够他们忙的了,如果他们不去组织生产,这件事摊到他们头上,他们就得要建立自己的职业教育总局。他们为什么认为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自己的职业教育总局,这样安排工作更合适呢?主要是因为,提出的那点建议造成了错觉,似乎关键仅在于高等学校,而不是在所有阶段上教育必须与生产紧密结合。

主席:请李可夫同志做总结发言。

李可夫:在我的总结发言里,对所涉及的问题我仅仅谈几点简短的看法,因为从问题的实质看,很多发言人阐述得十分充分,很难再讲些什么、再补充些什么。

首先谈一谈争论本身。我觉得,所有谈到沙赫特案件的发言者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同志在寻找哪些人与机构正确,哪些人与机构有罪;另一部分同志在探求沙赫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根本原因。

我觉得,第一部分的所有发言人都没有弄明白问题出在哪里,遗憾的是施瓦茨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任何人都肤浅(大厅内骚动)。对他,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说了,因为在中央全会上未必对他的讲话再做进一步的评价。

乌加洛夫:这就够了。

李可夫:事情的根源(我觉得,这是我们要绝对确定的)就在于我们整个党的组织、工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工作方法存在着共同缺点,我们的这些组织,第

一,要使我们的党组织同广大工人群众接触;第二,要使我们的党组织同专家们接触。在党如何对待非党工人上,我们开始面对各种重大的原则问题,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些关系中有些东西必须改变,必须改进,在党和工人阶级对待专家的态度问题上,在对他们采取的监督方法上,必须改变,必须改进,要能保证他们正确地完成任务。沙赫特案件所提出来的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

当然,要想得到好的结果,不能只局限于查明某些共同的缺点,还必须“铲除某些根源”。但是斯大林同志对习惯上所说的“组织结论”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不能用这种或者那种人员调动甚至是大换班的人员调动问题来代替我们建设中的根本问题。而且在“铲除根源”时也总要遵循一定的度,不要使乌克兰土地上的健壮“树根”飞落在我们的土地上,因为这些树根在乌克兰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如果现在非要“铲除根源”不可,也必须考虑到,它终归不是解决迫切问题最好的方法。必须使我们的干部处于能够及时教育和纠正别人错误的工作条件之中。对于这个问题,我下面再讲。现在,我想谈一谈某些局部问题。

首先是高等技术学校的问题。我提的不是转交不转交高等技术学校的问题。我提的问题是,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我们必须听取教育新专家干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由于要教育新专家干部,不能只是把两三所或者五所高等技术学校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假如说,你们把三所高等技术学校转移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但要知道,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一年可要培养出近6000名大学生,而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部也会培养出一些大学生。我们大家没有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听取过关于安排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的问题。假定有人认为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或者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不好是产生沙赫特案件的原因之一,假定他们的意见是对的,那么也必须揭露这个的原因。见鬼去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要花五至六年的时间才能积累起三所高等技术学校的办学经验,在这段时间里教育人民委员部要继续培养新的在你们看来不中用的专家干部。在这五至六年的时间里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干部呢?是要培养的,我们不能没有他们。怎么。您是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从全会上走了之,对问题的性质一字不提吗?我对政治局说过,我宁肯采取治本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并不担心把哪所高等技术学校或者高等学校转到哪里去,但我不认为把三所或者五所高等技术学校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是对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

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说过,过分苛守一定之规,在必须打破体制时就要打

破体制,决不能止步不前。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打破几千个常规。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为了什么目的来破坏什么东西,然而,对此谁都没有说过。全部的不幸就在这里。这个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根本意义,要比初次看来的意义重大得多。这里是有东西要进行检查,要加以思考,应当下达指示。

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论据说,为什么教育人民委员部有的事没有做成,没有培养干部,就是培养了干部,那些干部也是不好的,等等。有人告诉我们说,新培养的干部不次于战前的干部,在我们这里毕业的大学生,就其知识而言,与国外的大学生相比,不比战前的大学生差。事情可能不是这样,那就让我们来检查检查、改进工作。我问过伏罗希洛夫同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研机构的状况怎样?那里一年要花2000万左右的卢布。这些科研机构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组成部分,按他的话说,一切都能够与生产、工厂相联系,都能够运用科学经验,发挥发明创造的主动性。而实际上,不幸就在于那里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与生产的联系。

臧声:对。

李可夫:如果我们按照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说法,我们同教育人民委员部打交道具有十年的经验,那么我们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的科研机构打交道的经验也不少,但时至今日,我们没有建立起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研机构与工厂的必要联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臧声:那问您自己吧。

李可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我们不去解决实质问题,而是限于频繁地调换机构,是因为只做官僚主义的决定,只做表面文章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致力于建立战时工业和和平时期工业之间的联系,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都在帮助它,你们想一想,我们有了门道吗?一个部门搞冶金工业,另一个部门搞化学工业,第三个部门搞纺织工业,第四个部门搞军事工业,它们之间没完没了地传送公文,但没有生产上的联系。现在我们同古比雪夫和伏罗希洛夫坐下来开会研究,就是要建立这种完全必要的联系。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论据不能为解决干部问题提供任何东西。

但是,我重申,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急急忙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可能的地方来讨论、思考这个问题,研究经验。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只要在这个会议上进行讨论,而且要事先进行讨论、思考和公开的辩论。我们同你们都会因此而受益。现在解决三所高等技术学校的归属问题还不够,这意味着抹杀问题。既

然3个月什么事都干不成,为什么还要匆忙行事?另外,党的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域工作的工作人员只是在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之后才知道这个事情的,难道认为这样的工作程序正确吗?要知道,开始由安德烈耶夫后来由斯·柯秀尔领导的中央所属的高等学校委员会表示反对把高等技术学校分散给各个部门。

柯秀尔:委员会眼下还没有表示反对。

李可夫:但是大多数委员和委员会主席——C.柯秀尔都表示反对。对此,大家都知道,然而后来突然提出决然相反的解决办法。要知道,谁都不能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怎么回事,屁股底下着火了?为什么这么突然?我的意见是全面讨论这个重要问题,我认为这是惟一可行的办法。我想,经常突然让中央委员会、全党、全国去解决应该在党、国家和人民委员会讨论的问题是有害的,应当听取最熟悉这个问题的那些同志的意见。我们常常被迫不征求地方的意见,不进行争论,不做全面思考就解决某些问题,这不是我们工作中的优点,而是缺点,但是,当不能不这么做的时候,还就得这么做。但是,要知道,在这里可以不这么做。在我看来,作出这个决定是不对的,第一,这个决定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第二,我们的整个高等学校系统本身将会快速解体。你们今天把三所高等学校转交出去,其他的学校明天就会为自己寻找新主人,肯定为自己寻找明天的主人。库皮亚克同志已经开始谈论季米里亚泽夫科学院了。(笑声)他是完全正确的。不可能不这样!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整个系统不知道明天做什么,只能干一天算一天。再也不想不出比这个决定更坏事的方法了。

我希望就这个问题继续进行争论。要知道,这个问题不是能为在党内建立某个纲领或派别制造借口的问题。(笑声)这个问题可以用各种方法解决,不涉及阶级。这不是涉及农村和阶级分化的问题,这里没有一点类似于“热月政变”的东西。对这样的问题,必须进行争论,也可以进行争论,在这里看不到建立派别、进行思想斗争的任何根据。这是实实在在的教育干部的问题。

我在总结发言中想简短谈一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专家的问题,尽管我在报告中已经十分详细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安德烈耶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谈到资产阶级专家时提到了阶级斗争问题,我担心可能会理解有误。当然,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也是阶级斗争,但我们的出发点应当是,我们应当能够争取部分专家,而且已经把部分专家争取到了我们这方面来。关于这一点,列宁同志说过,工人、地下工作者和革命者正在用一种方法达到共产主义,将来农艺师要用另一种方法达到共产主义,工程师、专家将来要用第三种方法达到共产主义。我们应当

尽力将越来越多的专家拉到我们自己这方面来,也要把资本家拉到共产主义这方面来。不言而喻,在不可能把他们拉过来的时候,那就只能同他们进行斗争。如果根据这一总的方针来评价当前专家们的状况,必须肯定,专家中的分化已经开始了。如果再用党的力量、工会的力量更有力地推动这一进程,我们就将会打碎专家之中的故步自封,在他们中间建立更加接近我们的派别,我们和他们一起同最顽固的资产阶级专家和对我们采取敌意的专家进行斗争。这个刚刚兴起的专家们的分化进程应当加以强化、固定,应当千方百计地帮助技术和科技知识分子中最为靠近我们的人士。

第二个问题是莫洛托夫同志谈及的用资产阶级方法和无产阶级方法争取专家的问题。他说得完全正确,无产阶级的方法关系到群众监督,关系到广大群众接近所有的经济问题,关系到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要使每一个专家就像工作在玻璃罩里一样,让群众能够评价他们的工作,这是首先要采用的。但是资产阶级方法也不是不能用了。我觉得,对专家的高付酬制度不但对外国专家,就是对我们国内的专家也不应当改变。我觉得,特别是对外国专家,我们今后建设时期的特点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应当用更多的钱去购买美国和西欧的大专家。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花100万卢布,那么这100万卢布就会为我们的工业化、发展速度等节省下几千万甚至几亿卢布。

莫洛托夫:这是正确的,但必须更多地使用无产阶级方法。

李可夫:必须使用两种方法,既要使用无产阶级方法,也要使用资产阶级方法。我们已经比较多地使用资产阶级方法把专家们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还要向前推进,要更多地使用资产阶级方法,但我们要把资产阶级方法和无产阶级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责任的问题。鉴于颁发了第33号命令,专家现在的地位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这个命令应当全部取消,把专家置于经济管理人员的监督之下,这样做的时候要让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成为不负责任的顾问。“我执行,但我不负责任。”——这句话出自罗莫夫同志的电报。这种状况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我们把事情弄到专家们不负责任的地步,而我们自己又不能生产涡轮机,不能设计矿井,谁来负这个责任?经济管理人员不能负责,而专家不想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迫使专家对自己担负的工作承担责任。专家领导地位变更的同时,应当相应提高委托给他们的全部技术事务和技术问题的责任心。我在好几次代表大会已经说过,要彻底铲除在技术问题上的无人负责、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不知道哪个专家对什么问题负什么责任的现象。同我们到

现在为止遇到的所有情况相比,要加强专家们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其所承担的工作的责任心。

我本打算就И.柯秀尔的抱怨说几句话,但是,谢尔戈同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完了。我只想指出一点,他所引用的控制数字和工业财政计划是不正确的。假如И.柯秀尔是对的,工业财政计划确实改变了假设的工业控制数字。但这种变更是有利于工业的。要知道工业财政计划与控制数字的不同在于,对工业的投资数额、对基建工作的投资数额要高于控制数字。如果柯秀尔同志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中遵循自己的建议,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抱怨资金不足和必须压缩某些工作了。年初,我们制定了控制数字,之后,又根据总体工业财政计划,其中包括基本建设费用,增加了这个控制数字,再之后,政治局通过决定再次增加拨款,可是结果我们还是压缩或者降低了某些工作的发展速度。就是用И.柯秀尔的方法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关于“多方面配合工作”。当柯秀尔同志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到过他那里,我也到过很多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那里。我请他们拿出在托拉斯和生产工作中摆脱官僚主义的办法,因为他们亲身痛苦地经历过我们所有丑陋的官僚主义工作。柯秀尔对我的回答同他对谢尔戈的回答一样:“这件事让谢尔戈去做吧!”为什么这件事就应该由谢尔戈来做?我们有意把那些抱怨我们残酷的负责工作人员从地方调到中央,以便在他们的帮助下消除不成体统的事情。但是,他们就在这里,就在莫斯科,仍像以前那样抱怨。鲁希莫维奇还像他在顿巴斯工作时那样骂娘,柯秀尔也还像他到达格罗兹尼石油托拉斯时那样骂娘。对于我们所有关于如何办的建议和问题,对于我们下达的关于主要错误在于他们自己、官僚主义的拖沓作风出自于他们内部,我们除了抱怨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我曾建议简化这个工业财政计划,因为这样的计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及时制定出来,我把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召集起来,对他们说:“同志们,让我们来简化这个计划,说说看,应当做些什么,应当怎样做?”会后,他们到处跑、到处骂,说什么我们这里存在着拖沓作风、存在着官僚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批准这个计划的细目。我为了减轻他们的工作,以立法程序制定了决议,我们听取了各个工业部门的意见,批准了好像是3—4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发展计划。对于主要工作的细节,我们没有做任何干涉。经济机关制定的上百种主要工作,我们既没有在人民委员会,也没有在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加以批准。对不起,我们过去从来没有上过当,将来也不会上当去研究这些无休止的清单。如果你们认为我们这里还有什么东西过于集权,那就请您说出来,否则,您

别抱怨您在这方面提的建议不受重视。

关于工会工作人员。我觉得,所有在这里发言的同志讲到工会工作人员的讲话,最值得注意的是托姆斯基的话:“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关于工会的决议我们执行得不好。”毫无疑问,必须改进工会工作,加强工会的干部,全面帮助他们,等等。这是毫无疑问的,必须这么做。但是从顿巴斯的经验中我们看到了奇特的东西,把1928年工作中的缺点说成是1922—1923年造成的,托词某些当时那里存在的政治部,这真是驴头不对马嘴。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六年,活见鬼,这与政治部有什么相干?顿巴斯过去和现在都是工人们关注的焦点。那里革命的阶级材料对于工会工作来说是独一无二的,要说在那里找不到党的干部,找不到组建工会的干部,这分明是在说谎。莫洛托夫同工人们的谈话(斯大林同志也提到了这个谈话)表明,尽管那里出现了各种不成体统的事情,但矿工们却是非常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可以感觉得到,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们的事业,他们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们近来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的斗争。他们是苏维埃制度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热心者,不能用这些人来组建工会,真是岂有此理,甚至就是施瓦茨不引用列宁的话,而引用自己的话为这种情况做解释,来辩解(笑声),这也是说不通的。

沙赫特案件把顿巴斯这样重要的地区、联盟最大的工业区的工会工作方法、工会干部、对工会的领导等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总的结论。在这次全会上,我们讨论了两个问题:粮食收购问题和沙赫特案件问题。

其中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而且在发言者的讲话中也可分为若干小问题,一直小到老鼠价格和粮食价格的关系。但这两个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普遍的原则性问题。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提的实际建议的意义就不大了。它们也具有重大意义。不能忘记,我们的一个主要不幸就在于我们做出的决议很多,决议遭到歪曲的也很多,实际效益很少。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但在实际问题的背后必须看到普遍的和原则性的东西。

联系到粮食收购问题,基本的东西可以归结为,在条件有些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保障同中农的联盟。我们在最近的一次运动中加强了同贫农的联系,这是完全不容置疑的。但是同中农联盟的问题要比以前复杂一些,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有鉴于此,我认为对于农村的主要结论之一是,在短期内,在加强贫农组织的同时,以新的方式提出关于集体农庄的问题,拉平我们同中农的路线。现在,

我们对富农的上层加大压力,而富农上层也在一层一层地对中农施加压力。我觉得,来自北高加索的伊万诺夫的讲话,其中说到现在同中农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是不对的。毫无疑问,我们的困难是由于今年一系列特殊情况造成的。但是,其中某些因素可以确定今后几年粮食收购中也不会遇到这样的困难。这是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基本建设阶段,进入了这样的在农村争取社会主义成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不对上层施加比以前更大的压力,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但这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些上层播种面积的减少。需要采取某种新的、更为有力的办法激励其他集团扩大播种面积,促进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等的发展。必须指出,仅仅防止播种面积的减少是绝对不行的,必须扩大播种面积。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即同中农的联盟将得以巩固,在当前要比以往更加有力地进攻富农。我认为,形势的新特点就在这里。

沙赫特案件。我已经说过,在个别的、局部的问题背后,沙赫特案件提出了很多普遍的问题。反革命阴谋本身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残余和知识分子将时时推出这类集团。我们的敌人试图在顿巴斯——我们的主要经济中心之一——打击我们,这也不偶然。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原因能够保障反革命集团在顿巴斯这样的无产阶级地区进行长达六年的组织工作。我感觉,我们的状况说明,不能只从顿涅茨克区这个无产阶级拳头自身来看待发生破坏活动的这些条件。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保证了破坏分子能够在顿巴斯进行六年的工作,当然,这类情况在其他地点也是有的。谢尔戈同志十分正确地列举了最近一年揭露出来的一系列案例。最具特点的是“易卜拉伊莫夫案件”,他还在担任自治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就已经是匪徒¹³³,而且他在入党之前就是匪徒,他是钻进党内的匪徒,是作为匪徒当上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对于他,不能说他是蜕变的,或者是背叛的。他从来就没有蜕变过,他本来就是匪徒,后来仍然是匪徒。这么多年来,不管是我们,不管是克里米亚的组织,不管是党组织,还是苏维埃组织,都没有觉察出来。

是什么样的条件造成了这个令人发指的事件。我想,这些条件与我们在沙赫特区形成的条件具有共同之处,这就是缺乏批评,缺乏自我批评,主动性差,群众不能参加领导经济工作、建设和整个苏维埃工作。如果没有这些缺点,则谢尔戈同志列举的这些事件,或者“易卜拉伊莫夫案件”就一件也不会发生。

因此,我觉得,我们从沙赫特案件做出的结论应当广一些,不应当局限于一个顿巴斯。在这件事情上,乌克兰的同志(北高加索也一样)应当从沙赫特案件

揭露出来的问题出发,这不只是乌克兰实际情况的特点。它在顿巴斯要比在其他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它使我们确定了传播的很广泛的病症,我们的工会组织、经济组织和我们党的组织各个环节都感染上了。无论如何要治好这个病。

我觉得用人员调动的办法未必能治好这个病。必须让我们的工会工作,党的工作、经济工作和苏维埃工作有一种全然不同的基调。必须把我们的干部安排在其他工作条件下。在整个联盟境内治好这个病症的基本办法是吸收群众参加领导工作、接近群众和让工作活跃起来。

主席:建议就这个问题选出一个委员会。

喊声:应当采纳这个决议作为基础。

主席:要把这个决议作为基础,要解决惟一有争论的问题。这就是说,首先表决要不要把决议作为基础,专门就涉及高等技术学校的条款进行表决。谁同意把决议作为基础?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

彼得罗夫斯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们能否在委员会再对高等技术学校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然后把制定好的建议提交全会?

喊声:对。

斯克雷普尼克:需要表决。

主席:要对这个建议进行表决,就是说要把关于高等技术学校的条款从这个决议中删除出去,把这个建议提交最近举行的全会进行讨论。建议政治局把培养专家干部的总问题列入最近召开的全会的日程,责成政治局起草报告和提纲。

现在对这个建议进行表决。谁赞成?同志们,需要数人数。谁反对这个建议?少数。这就是说,把这个问题推迟到最近举行的全会上去解决。

现在宣布委员会的组成:李可夫、斯大林、莫洛托夫、托姆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卡冈诺维奇、施瓦茨、安德烈耶夫、基洛夫、乌格拉诺夫、什维尔尼克、瑟尔佐夫、丘巴尔、洛莫夫、阿库洛夫、米尔佐扬和缅任斯基。

托姆斯基:建议加上多加多夫。

主席:多加多夫,好,加上多加多夫。

喊声:伏罗希洛夫!鲁希莫维奇!

主席:好,伏罗希洛夫和鲁希莫维奇。

斯克雷普尼克:苏霍姆林。

主席:还有谁?没有了。

喊声:扬松。

主席：扬松。]

喊声：够了，够了。

主席：就是说增加了多加多夫、伏罗希洛夫、鲁希莫维奇。共21人或者22人。有没有反对的？没有。

我建议，为使委员会能够结束工作，下一次会议定于明天12点举行。

喊声：1点。1点。

主席：1点？如果你们放弃许多人签字的建议，可以在1点开会。这个建议说，部分代表要求将从日内瓦回来的李维诺夫的简短报告列入会议日程。

喊声：让会议期间的各个派别去听吧。

主席：那就请把李维诺夫在会议¹³⁴上的发言散发给联合全会的各位成员。现在表决，谁同意李维诺夫报告的建议？人很少。那就推迟。就是说，明天1点开会。

库比亚克：政治局在讨论取消合作委员会问题时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非正式会议。因此，明天上午10点召开取消合作委员会问题的会议。会议在这里举行。

第八次会议

4月11日上午

主席(李可夫):请米高扬同志发言,就粮食收购工作委员会工作结果的报告做说明。

米高扬:同志们,我看没有必要通读整个决议,只宣读那些做出修改的地方。我认为,不需要解释修改的原因,这从修改本身的性质就可以看得出来。修改的地方有以下几处:第7页,如果你们手里有决议文本,你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篇,去掉第3、4、5条,我们建议做如下修改,加上:“打击富农。”

李可夫:第几页?

米高扬:第7页,第二篇,去掉第3、4、5条,加上“打击富农粮食投机奸商……”(读)

第二处修改,第8页,第三篇开头,去掉头3行,代之以“中央委员会确定党在农村的工作有所改进和活跃,富农的作用和影响削弱了,贫农工作活跃了”。

李可夫:我们对修改逐条进行讨论。

喊声:略微慢一点。

米高扬:可以。

主席:要不要米高扬同志再宣读一遍?

喊声:不要!

主席:委员会对第二章提出了修改建议。有人要发言吗?

喊声:没有。

主席:对委员会做的修改进行表决。谁赞成委员会的建议?大多数赞成。继续。

米高扬:第三篇。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过渡?第二篇以所采取的措施作为开头,末尾是指出粮食收购工作的成绩。第三篇的起头是对过火行为、歪曲的评价。但是,同志们在辩论中指出,这里没有直接对农村的阶级变动做出总结,而

这是在中央委员会2月13日的信¹³⁵里是已经指出了的。因此委员会认为应当在这一章的前面先讲讲歪曲的情况。第一段写我们取得的好成绩,同时要指出不好的方面,整个这一章都讲述各个不利因素。这个过渡是这样的,我读一下:“中央委员会确定党在农村的工作有所改进和活跃”,等等(读)。

主席:有人要发言吗?表决。谁赞成提出的修改?通过。继续。

米高扬:第9页,第2段做如下修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会认为……”(读)

主席:有没有人要发言?现在进行表决。谁赞成委员会的修改?通过。继续。

米高扬:还是第三篇,第10页,第2段末尾,这里列举了苏维埃政权为保障种子运动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发放了多少贷款等,做如下补充:“加倍发放……”(读)

主席:有没有要发言的?现在表决。谁赞成委员会的建议?通过。

米高扬:还是这一段的末尾,讲到扩大播种面积,我们规定了收获量。

主席:有反对的吗?通过。

米高扬:末尾我们补充这样一句话:“还要采取措施以保障来年集体农庄的生产基地……”(读)

主席:现在表决。谁赞成这条建议?通过。

米高扬:现在看改组粮食收购机构一章。我在这里要把所有的修改都读一遍,因为这一章很重要,在委员会引起了最激烈的争论。

我们把第1条的“联合”一词删掉,换上“全苏”一词。

下面,第11页第1行写的是“转交它们的财产和机构”。我们做了这样的修改:“转交它们的机构和财产,并将后者划入有关机关股份的账户上”,也就是说,将财产转移到“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并划入有关机关股份的账户上。

这一页的第3行写的是:“它们的利益等”。从这里起到这一条的末尾都删掉,我们做如下修改:“确定利益……”(读)这一条新增加的内容与我们的整个实践和提纲不同的是,除了在股东之间分配利润之外(利润可能会产生也可能不会产生,利润也可以用金融欺诈手段化为乌有),我们接受了丘巴尔同志的意见,不管利润有多少,要按每个专区、每个共和国、每个边疆区从采购的每普特粮食中扣除一定的资金数目,哪怕是一个戈比还是半个戈比,中央全会不对这个资金数目做出具体规定。

这就是做出的修改。

主席:有没有人要发言?现在表决。谁赞成委员会提出的建议?通过。

米高扬:还是这一页,第2条,这里写的是,合作社提供消费合作社按全苏采购计划采购的粮食,我们打上了括号,里面写的是:“即不考虑地方上的计划外采购。”由此需要得出的结论是,并非合作社收购的所有的粮食都列入全苏收购计划。

主席:有没有人要发言?表决。谁赞成委员会的建议?通过。

米高扬:第4条说的是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我们在措辞上做了改动并做了如下补充,这里讲的是及时装卸。最后,我们形成了如下的文字:“主要收购单位要及时履行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总合同规定的义务。”

主席:有没有人要发言?现在表决。谁赞成委员会提出的建议?通过。

米高扬:除此之外,委员会决定提出下面的建议,这条建议应当成为全会的特殊决定,但不写入本决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委托政治局在7月底以前听取商业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收购运动计划、在农村市场上销售工业品计划,以及商业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执行中央委员会全会的这个决定而采取的措施的报告”。

主席:哪一位要发言?现在进行表决。谁赞成接受这一建议?通过。

米高扬:所有的修改都在这里。

主席:现在进行总的表决,对最后文本进行表决。谁同意?谁反对?谁弃权?一致同意与柳比莫夫同志在一起。(笑声)请柯秀尔同志发言。

柯秀尔:同志们,鉴于安德烈耶夫同志现在在北高加索工作,我们建议解除他在组织局的职务。

我们建议把鲍曼同志列入组织局成员以代替安德烈耶夫,鲍曼将在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工作。除此之外,我们建议鲍曼为参加书记处的候选人,我们还建议把安东诺夫列入组织局的候选人名单。

主席:谁想发表意见?谁同意这个建议?通过。请莫洛托夫同志发言。

莫洛托夫:同志们,请允许我不作关于政治局和中央全会工作计划的报告。计划包括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你们从政治局的建议草案中都可以了解到。如果对计划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来回答提出的问题。

斯克雷普尼克:莫洛托夫同志,委员会昨天的决定呢?

莫洛托夫:根据全会昨天做出的决定,关于高等技术学校的问题由政治局转交给中央全会。

主席:请卡明斯基同志发言。

卡明斯基:我请求把全俄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作为报告人列入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工作计划,因为计划中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现状”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讲的是合作社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工作。

主席:建议把全俄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作为报告人加进去,有没有意见?有反对的没有?通过。

还有什么修改?现在进行表决。谁同意卡明斯基对政治局建议的修改?通过。

休息10分钟。

(休息后)

主席:请李可夫同志发言,对委员会所作沙赫特案件决议的报告做说明。

李可夫:同志们,对沙赫特案件问题的决议做了大量修改,其中大部分是修辞方面的改动。请允许我只通报那些具有重大意义或者原则意义的修改和补充。

彼得罗夫斯基:对!

喊声:对!

李可夫:属于这种情况的有,第5页第1条,这里讲的是生产会议的工作。我们委员会做了这样的措辞改动:“吸收群众参加生产领导工作的状况令人很不满意”。这是原来的。下面是新加的:“向工人通报生产计划和生产进程的工作纯粹是形式。生产问题、生产合理化问题、基本建设问题等不在生产会议上进行讨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迫害那些批评行政工作缺点的工人”。

喊声:对!

李可夫:下一段我们做了如下改动。去掉括号,加上冒号,读起来是这样的:“工会没有经常进行提高生产会议作用的工作;生产会议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好,技术人员,有时甚至身为党员的经济管理人员很少参加生产会议,轻视生产会议的工作;对所通过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缺少认真的监督”。

下边,仍保留原来的句子:“企业临时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做得十分不够”,其后的句子是这样的:“重大建议和发明奖励基金完全没有使用起来,对某些种类的生产根本就没有设立奖励基金。各级工会机关、区工会委员会、省工会、工会中央委员会和跨行业工会组织机关的经济工作安排,特别是在参与基本建设、生产合理化问题、降低成本的措施、对生产会议的领导上,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这里加入了两层意思。以前说的只是信息通报工作,而在一系列情况下“信息通报”工作做了很多,但这些信息通报都带有纯粹的形式主义性质:报告人讲完了,参加大会的人也听完了,大家散会各走各的。在这之后,没有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加上了另一个因素,通过生产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对工业的领导。这是做出的一处重要修改。

另一个主要修改也是吸引由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但是是通过工会的上层环节和中间环节来吸引工人参加对生产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领导,让省工会、区工会委员会、工会中央委员会、跨行业工会组织都更多地研究经济建设问题,吸引工会组织参加对经济生活的领导。

要单独表决吗?

莫洛托夫:同志们,有没有反对这些修改意见的?

喊声:没有。

莫洛托夫:那就是说通过了。

李可夫:第6页,6小时工作日问题。我们改动了措辞。委员会争论的是工人在井下工作几个小时的问题。由于我们没有任何数据用来确定准确的小时数——3个、4个还是5个小时,于是我们把这一条措辞写成如下的样子:“应把6小时井下工作日的问题特别划分出来,由于劳动组织工作做得不好,致使大部分时间耗费在了非生产事务上”。这样一来,由于没有指出准确的时间,使另外一个事实变得尖锐了。工人工作超过6小时,但大多数时间不是用在生产工作上,而是用在了不知是找矿灯,还是去矿场,还是井下,但反正不是干活。

斯克雷普尼克:请再读一遍。

李可夫:去掉这一条,这一条说的是:“尽管井下工作的实际生产常常不超过3个半—4个小时”,改为:“由于劳动组织工作做得不好,致使大部分工作时间耗费在了非生产事务上”。

斯克雷普尼克:第一部分要保留下来吗?

李可夫:原样不动。

喊声:说的好!

莫洛托夫:对这一修改有反对的吗?

喊声:没有!

莫洛托夫:通过。

李可夫:继续往下进行,还是第6页,倒数第3行,句子的末尾。这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在选拔工作人员时一般不对过去的工作进行认真的审查。常常把

因工作不好而免职的经济管理人员调动到新的甚至更为重要的工作岗位”。为了更加强调这一条,我们是这样写的:“要把这些人从经济机关清除出去并提拔新的经济管理干部”。

喊声:好!

李可夫:加重强调。

莫洛托夫:有没有人反对这一修改?

喊声:没有!

李可夫:现在看第8页,第3条,关于专家问题。这里的措辞做了这样的改动,首先是改进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其次是提高技术技能,关于把专家们作为小团体的斗争就完全不写了。我们说过,必须把专家们划分成阶层,要更多地把最靠近我们的分子吸引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尽量考虑在全会上讨论过的这些问题。第3条第一句话的措辞是原来的:“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各分会在专家、工程师和技术员中广泛开展工会工作”。下面是新措辞:“工会应当争取为提高专家的技术技能创造良好的条件,吸收他们参加生产会议,克服至今在专家中仍然存在的小圈子风气、狭隘的小团体情绪,要把生产纪律、工会纪律贯彻到他们中间去,同时要保持敏锐地关心改善专家们的物质需求、生活需求和文化需求”。我们尽力强调沙赫特案件揭露出来的那些新的和迫切的问题,最后,要把过去也要完成的任务保留下来了。

莫洛托夫:请科罗斯捷列夫同志发言。

A. 科罗斯捷列夫:同志们,我建议的科技工作人员中也进行这项工作这一条加进这个决议中去。沙赫特案件揭露出了工会在工程技术人员当中的工作缺点,但现在我们还不能确信,在科技工作人员中就没有这样的情绪。因此,同样也需要加强工会对科技工作人员的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干部培训工作和技术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我建议把这一条修改放在这里。

托姆斯基:我想不必把这一条修改加进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会考虑这个问题的。

李可夫:我建议在下一次全会上讨论这个修改。现在说的是劳动纪律和生产中的职工问题,而不是在高等学校工作的职工问题。关于高等学校的问题将在下一次全会上提出来。

科罗斯捷列夫:我对李可夫同志的建议感到满意。

莫洛托夫:可见,委员会的修改被采纳了。

李可夫:第9页,增加了新的一条,在这一篇的末尾。在第7篇,这一篇讲的

是巩固和扩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附属工业科学院,增加的内容是:“以及扩大红色经理专修班”。除了工业科学院以外,现在又有了专修班,但这个专修班不是为了专家干部的培训而是为了行政负责人和经济管理人员的培训而设立的,这些专修班的数量还不够。扩大专修班的指示正在下发。

第8条之后增加了新的一条,即在所有这方面的工作上,应最大限度地吸收工会参加对专家的工作和提拔工人的工作。这不只是经济管理人员的任务,而且也是工会工作人员的任务。

“要保障工会组织能够最广泛、最积极地参加培养新的红色专家的工作、加强培训高技能工人和被提拔起来的工人的工作。”

莫洛托夫:对增加的这一条有没有反对意见?没有。通过。

李可夫:昨天对第6条进行了表决。今天,联合全会的决定没有变化。

下面,到第10页末尾的第4篇为止,没有修改了。把这个决议的最后一段调到第1条上,把第7段调过去,不做改动,这是更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我认为这用不着表决。更重要的修改在第11页上,第3条之后,讲的是检查委员会。联合全会委员会认为,检查委员会的工作经验现在足以广泛适用于其他企业。我们把它作为经验,原来只用于个别规模不大的企业。工会组织和经济管理人员在自己的工作中也是以此为依据的。我们建议做出这样的决定:“经验全面证实了临时检查委员会作为生产会议的机构在整个工厂各个组织系统中存在的合理性和更广泛运用这一组织的必要性,因此,工会组织和经济机关应更加关注它们的工作”。

莫洛托夫:有没有意见反对这一修改?没有。通过。

斯克雷普尼克:为什么是临时的?

李可夫:因为这些委员会是按个别任务建立的,而不是作为常设机构来解决生产委员会研究的所有问题。

第4条以前是这么表述的:“为了使工会接近工人群众”。现在的表述是:“为了改进工会为工人群众直接需求服务的工作并广泛吸收他们参加日常工作”。在“顿巴斯”一词之后的表述是:“在其他地区”,这样表述是为了赋予矿务局具有工厂工会委员会的权利。顿巴斯的经验正在扩展到所有矿区。

莫洛托夫:有反对的没有?没有。通过。

李可夫:根据工会经济工作中查出的缺点,在这里作为结论加入了参加经济生活和领导工作的内容,这一条的措辞表述为:“建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保障加强整个工会组织系统的经济工作……”(读)

对最后一段做如下说明,工会自己有时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它需要经济管理人员在信息方面给以帮助,以便能够了解经济问题和经济工作,需要党的机关的参与,以便不至于由于地方机关、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官僚主义的拖沓作风而破坏了这个指示。

莫洛托夫:有反对的吗?没有。通过。

李可夫:下面有一些小的修改,个别地方调动了次序。在第5段末尾,委员会建议加上新的一段,这一段表述为:“不管是经济机关,还是工会组织和党的组织,都要把尽力关怀改进矿工的生活条件(澡堂、工人集体宿舍、食堂等)看做是自己最近必须完成的义务。必须正确使用为此拨出的资金并对此承担特别严格的责任”。

斯克雷普尼克:那里提到工人集体宿舍。我认为集体宿舍式的住房建设是最坏的一种。它是住房的代用品。我认为,在全会的决议中不是一般地提到必须保障住房,而是写建设工人集体宿舍,是不恰当的。当有其他住房建筑方式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写上建设工人集体宿舍?

李可夫:我没有宣读第3条中斯克雷普尼克建议的修改。在说供水的地方,委员会建议这样表述:“委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在今年研究改善顿巴斯工人新村的供水和生活条件问题”。今年确定的财政计划就是用于供水问题。至于工人集体宿舍,我同意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意见,是不恰当的,但这些工人集体宿舍确实是存在的。这里没有说要建设新的工人集体宿舍,而是说,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工人集体宿舍里住着大量的工人。工会的记载,到过顿巴斯和工人集体宿舍的人都指出,那里的情况很糟糕。因此,我认为,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闭眼不看事实是行不通的,在这里应当把全部的话都表述出来。必须改善居住条件,这我们知道,但眼下我们改善得还不够,需要让工人集体宿舍比现在的状况更好。

喊声:对。

莫洛托夫:对这一条要不要修改?

斯克雷普尼克:我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去掉“工人集体宿舍”,换上“住房”,因为这里说的不是改善现有的居住条件,而是建设新的住房,不是改善澡堂,而是建设新的澡堂。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改善现有的工人集体宿舍,而是建设工人集体宿舍式的住房。

莫洛托夫:谁同意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修改?谁反对?大多数。

李可夫:现在请看第12页,这一页上的第4段……

斯克雷普尼克:我还有一个修改,在第11页,第5篇,这里写道:“委托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在2个月之内提交……”(读)

我们的村委员会有这个权利,这是在村委员会下建立物质基础的问题,保障它们具有一定的资金来源的问题,这一条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制订了计划,我们有法律,但必须具有一定的基础。“活见鬼,没有农民,哪里来的农村”,1861年“解放”农奴之后地主们这么说。现在可以这样说:“活见鬼,如果它们没有任何条件,哪里来的村委员会”。村委员会有权利,但是它们不为工人物质需求提供服务,因为村委员会的口袋里除了虱子就是跳蚤。我们在乌克兰拿不出这些钱,在这里必须委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保障村委员会具有一定的资金。现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给予保障,答应使物资设备完善起来。顿涅茨克煤炭联合公司愿意把这件安排工人生活的操心事转交给村委员会,因为,那样它就可以不花钱和把这件操心的事交给别人了。因此,必须为村委员会留下一定的资金,让它们服务于工人的需求。

李可夫:这里说的是,请乌克兰共产党(布)提出关于顿巴斯村委员会工作的建议,把对工人日常需求服务的工作交给村委员会。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担心,他在向政治局提出这项建议之后,会把钱的事情忘掉。但是除了斯克雷普尼克同志以外,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里还有其他很多委员,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们是不会忘掉这一条的,因此,我建议不接受斯克雷普尼克的建议。(笑声)

斯克雷普尼克:说得漂亮,并不刻薄。

莫洛托夫:您有什么建议,斯克雷普尼克同志?

斯克雷普尼克:保证这些村委员会有必要的资金来源。

莫洛托夫:我表决。谁赞成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补充?不接受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提议。

李可夫:第12页,这里讲的是经济管理人员,说的是必须让他们丢掉经常打形式主义报告的做法。委员会曾正确地指出,有时他们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因为他们要做汇报,但是他们也常常参加会议却不做任何汇报,坐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无所事事。所以我们在这里加上了,没有必要时可以不让他们参加委员会的会议。这项修改是这样表述的:“在没有足够的必要时少让他们参加会议”。这样的表述力度不够,我建议这样表述:“没有真正必要时”。这样说好一些。

莫洛托夫:有没有反对这个修改的?没有。通过。

李可夫:这里讲的是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被选进了某个机关,在他落选之后,

就形成了这样的惯例,既然在机床上干活的工人被选拔起来了,离开了机床,那么,他到死都要呆在某个行政机关、经济机关或者工会机关,他再也不会回到机床旁边干活了。这种惯例已经形成了。但这里说的不完全清楚。我们在修辞上努力做了些改动,结果是这样的:“责成党组织对下列工作负责:经选举产生的机关的成员、工会组织和党组织的经选举产生的机关的成员在被选出来的新同志代替的时候,不再仅因为他们过去是选出来做其他负责工作而不调任,这些成员应当调往基层工作或者参加生产”。对此,我们增加了新的意思:“与此同时,责成政治局制定措施,同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等充斥着无能的官僚主义分子的现象进行斗争,加强选拔新的比较有能力和比较接近群众的干部”。我们就是这样采纳了安德烈耶夫完全正确的指示,因为在我们这里,特别是在苏维埃的工作,有这样的惯例,如果有人做了部务委员,要想把他调往其他地方工作,这比在法国罢免总统彭加勒和选举新总理还要难。但这不仅仅如此,因为在我国的整个管理体制中存在着一种争夺权位的地方主义斗争。如果一个人有了一定的官衔,比如说我是人民委员会主席,那么我一直到死都不会去当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应该坚决打掉这个传统,为此,我们加上了这一条。然后,我们试图把斯大林同志在这里的讲话中阐述的主要思想形成指示。这说的是批评。

这个思想在我们这里是这样形成的。它涉及整个这一段,表述是这样的:“应当切实贯彻十五大提出的关于自我批评的口号、关于实行党内民主和关于认真同党的机关、苏维埃机关、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斗争的口号,这是保障顺利落实所有措施的最重要的条件”。

莫洛托夫:对这个补充有没有反对意见? 没有反对意见。

李可夫:我向你们宣读的仅仅是最为重要的修改。我们把某些条从这一段调到另一段,加进了一些小改动,这样做只是为了使所表达的思想更确切一些。我们在委员会也讨论了公开发表这个决议的问题。在是否有必要公开发表决议文本中个别条文的问题上,存在几种意见。属于这种情况的问题有,必须重新审查一些领域的专家构成问题,把某些专家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从专家作为工厂主的工厂调往他不是工厂主的工厂,总之,必须进行检查。一部分人说,这一条用不着公布。另一些人建议,涉及明显违反劳动法典的条文不要公布。这里说的是发表在公开报刊上。当然,在党组织中,这个决议应当完整地照本传达。

通过交换意见作出决定,按已有的做法,决议不都是公开发表的,到现在为止,由政治局确定公开发表的形式。在这种场合,根据不是一切都应当在公开报

刊上发表的意见,把公开发表哪些内容和如何公开发表的问题提交政治局来解决。

臧声:对!

莫洛托夫:对委员会的这个建议有没有反对的?没有。

现在表决整个决议。谁赞成批准整个决议?谁反对?没有反对的。决议一致通过。全会日程结束。我宣布联合全会会议闭幕。

附 件

1

1928年4月6—11日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会议记录№2

出席人：

联共中央委员：

阿库洛夫, A. A. 安德烈耶夫, 安季波夫, 阿尔秋希娜, 巴达耶夫, 鲍曼, 布勃诺夫, 布哈林, 伏罗希洛夫, 加马尔尼克, 戈洛谢金, 多加多夫, 茹柯夫, 泽连斯基, 卡巴科夫, 卡冈诺维奇, 加里宁, Э. И. 克维林, 基尔基日, 基洛夫, 克诺林, 科洛季洛夫, 科马罗夫, И. В. 柯秀尔, С. В. 柯秀尔, 科托夫, 克日扎诺夫斯基, Н. К. 克鲁普斯卡娅, 库比亚克, 库利科夫, 占比雪夫, 列普谢, 洛博夫, 洛莫夫, 柳比莫夫, 梅德韦杰夫, 缅任斯基, 米高扬, 米哈伊洛夫, 莫洛托夫, 莫斯科温, 奥拉赫拉什维利, Г. И. 彼得罗夫斯基, 波斯特舍夫, 皮亚特尼茨基, 鲁祖塔克, И. 鲁缅采夫, 鲁希莫维奇, 李可夫, 斯克雷普尼克, А. П. 斯米尔诺夫, 索柯里尼柯夫, 斯大林, 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 斯捷茨基, 斯特里耶夫斯基, 苏利莫夫, 瑟尔佐夫, 托洛孔采夫, 托姆斯基, 乌加洛夫, 乌格拉诺夫, 契切林, 丘巴

* 原文如此。——编者注

尔,丘多夫,С. 施瓦茨,什维尔尼克,В. В. 施米特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

阿列克谢耶夫,安采洛维奇,巴拉诺夫,布留哈诺夫,瓦雷基思,格伊,格里亚金斯基,日丹诺夫,В. И. 伊万诺夫,伊克拉莫夫,科达茨基,卡雷金娜,卡明斯基,А. С. 基谢廖夫,克利缅科,Т. 康德拉季耶夫,克里尼茨基,列昂诺夫,洛佐夫斯基,洛米纳泽,马尔科夫,梅日劳克,美尔尼昌斯基,米哈伊洛夫—伊万诺夫,米尔佐扬,穆萨别科夫,尼古拉耶娃,诺索夫,奥新斯基,奥什温采夫,В. И. 波隆斯基,К. 鲁缅采夫,伦金,留京,谢苗诺夫,索博列夫,斯特罗加诺夫,苏霍姆林,温什里希特,乌雷瓦耶夫,哈塔耶维奇,齐洪,恰普林,丘维林,丘茨卡耶夫,埃利亚瓦,埃赫同志。

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Ф. 阿列克谢耶娃,В. Г. 安东诺夫,安东诺夫,阿法纳西耶夫,巴尔马舍娃,鲍尔,巴赫京娜,别连基,波格丹诺夫,И. А. 波格丹诺夫,博良,布尔,布谢,瓦西里耶夫,温伯格,维克曼,维克斯宁,维什尼亚科娃,沃热夫,加列耶夫,加利耶娃,加卢什金,格拉西莫夫,戈尔茨曼,贡恰罗夫,戈尔恰耶夫,戈尔什科夫,格列恰内,格里戈里耶娃,格罗斯曼,格鲁泽里,格里亚泽夫,А. М. 格里亚泽夫,古列维奇,古谢夫,杰索夫,季里克,多利泽,久热夫,叶夫列伊诺夫,叶戈罗夫,叶利扎罗夫,叶努基泽,日丹诺夫,扎维茨基,扎格列别利内,Г. А. 扎伊采夫,Г. М. 扎伊采夫,扎伊采夫,赞格维尔,扎东斯基,泽姆利亚奇卡,伊利英,卡冈诺维奇,В. С. 卡拉什尼科夫,М. И. 卡拉什尼科夫,卡尔马诺维奇,卡尔宁,卡拉瓦耶夫,卡拉耶夫,卡里莫夫,卡雷—库利耶夫,卡尔波夫,克利诺夫,克柳耶夫,克尼加,科贝林,科瓦廖夫,科热夫尼科夫,科兹洛夫,科科维欣,科洛博夫,科米萨罗夫,康德拉季耶夫,科诺年科,科潘,科皮耶夫,А. А. 科罗斯捷列夫,Г. А. 科罗斯捷列夫,科罗特科夫,科萨列夫,克雷连柯,库兹明,库兹米娜,拉多申,拉林,拉里切夫,列别杰夫,列别德,列维京,列扎瓦,林格尼克,利西岑,洛卡茨科夫,利亚克苏特金,马格,马祖罗夫,马约罗夫,马克耶夫,马尔采夫,曼扎拉,马哈拉泽,梅德韦杰夫,米利恰科夫,米柳亭,米特罗法诺夫,莫罗兹,穆采涅克,纳扎列

强,纳扎罗夫,Х. 纳西罗夫,尼基京,尼科诺罗夫,诺沃肖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奥斯特洛夫斯基,奥西莫夫,帕夫卢诺夫斯基,帕斯图霍夫,彼得斯,彼得罗夫,佩列卡托夫,普列沙科夫,波德沃伊斯基,波泽恩,波科,波林,拉杜斯—津科维奇,列坚斯,赖因瓦尔德,雷夫金,罗森霍尔茨,罗济特,罗兹米罗维奇,罗森曼,罗曼诺夫,萨哈罗娃,萨希亚诺娃,谢姆科夫,谢尔加宁,谢尔古舍夫,西罗托夫,斯米多维奇,索尔茨,斯塔兰尼科夫,斯塔罗斯京,斯捷波瓦内,斯特列利佐夫,斯图季托夫,斯图鲁阿,斯腾,塔尔贝格,捷列霍夫,特里利谢尔,特鲁舍奇金,特先科,М. И. 乌里扬诺娃,法布里齐乌斯,法捷耶夫,菲加特纳,费克捷尔,菲勒,哈斯曼,茨韦特科夫,齐利科,沙茨金,施韦泽,舍博尔达耶夫,什基里奇,什基里亚托夫,什洛克,施特劳赫,舒什科夫,尤诺索夫,尤尔金,尤尔岑,雅科夫列夫,Я. А. 雅科夫列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贝金,弗拉基米尔斯基,列帕,利亚多夫,里亚比宁,里亚博夫,斯捷潘诺夫,尤列维奇同志。

听取并决定:

1928年4月7日的决议

一、今年的粮食收购和组织明年的粮食收购运动(米高扬同志)。

(一)基本上赞同政治局提交的关于下列第一号问题的决议草案:今年的粮食收购和组织1928—1929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

(二)为讨论修改、补充和最终审定决议,成立以下列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米高扬,布哈林,莫洛托夫,柳比莫夫,丘巴尔,什维尔尼克,卡明斯基,洛巴切夫,В. 伊万诺夫,埃赫,А. П. 斯米尔诺夫,瓦雷基斯,乌格拉诺夫,科马罗夫,彼得罗夫斯基,魏采尔,埃斯蒙特,谢苗诺夫(乌克兰),Ал. 雅科夫列夫,菲加特纳,列帕,韦尔比茨基,卡尔马诺维奇,格里亚金斯基,马约罗夫同志。

1928年4月10日的决议

二、政治局委员会关于消除因沙赫特案件暴露的问题而采取实际

措施的报告(李可夫同志)。

(一)在取消决议中有关将若干高等技术学校转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的条款以便由政治局提交近期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关于培养红色专家和经济工作人员的报告之后,基本上赞同政治局提出的关于沙赫特案件以及在同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作斗争方面的实际任务的决议草案。

(二)为讨论修改、补充和最终审定决议,成立以下列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李可夫,斯大林,莫洛托夫,托姆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卡冈诺维奇,施瓦茨,安德烈耶夫,基洛夫,乌格拉诺夫,什维尔尼克,瑟尔佐夫,丘巴尔,洛莫夫,阿库洛夫,米尔佐扬,缅任斯基,多加多夫,伏罗希洛夫,鲁希莫维奇同志。

1928年4月10日的决议

三、关于今年的粮食收购和组织明年的粮食收购运动的决议草案(中央全会委员会报告)(米高扬同志)。

(一)批准中央全会委员会提交的附有修改意见的决议草案。

(二)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责成政治局不迟于7月底听取贸易人民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收购运动的计划和工业品在木材市场上的销售计划,以及关于贸易人民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执行中央全会这一决定而采取的措施的报告。

四、关于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人员变动(柯秀尔同志)。

(一)解除安德烈耶夫同志中央组织局委员的职务。

(二)委任鲍曼同志担任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委员的职务。

(三)委任安季波夫同志担任中央组织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五、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工作计划。

(一)批准政治局提交的政治局和中央全会关于对1928年工作计划的修改意见草案:增加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及现状的报告——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

六、关于沙赫特案件和在同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作斗争方面的实际任务的决议草案(中央委员会报告)(李可夫同志)。

(一)批准全会委员会提交的有关修改意见的决议草案。

(二)责成政治局确定决议中哪一部分不宜见报。

中央委员 1928 年 2 月 11—15 日通过征求意见决定：

七、关于农业人民委员部(政治局,1928 年 11 月 9 日,第 9 号命令,第 42 号命令)

(一)解除 A. П. 斯米尔诺夫同志俄联邦农业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其为联共(布)中央书记,继续留任俄联邦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二)任命库比亚克同志为俄联邦农业人民委员,解除其中央书记的职务。

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8 年 3 月 17—24 日通过征求意见决定：

八、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3 月 14 日以及中央政治局 3 月 17 日关于 Ф. Т. 科尔古什金问题的决定。

批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中央政治局的下列决定：

(一)将 Ф. Т. 科尔古什金开除出联共(布)。

(二)考虑到 Ф. Т. 科尔古什金在整个革命时期在工作中表现了对苏维埃国家事业的忠诚,认为可以在负责的经济工作中使用他。

2

关于今年的粮食收购和组织 1928—1929 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

1928 年 4 月 11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根据米高扬同志的报告一致通过的决议

—

在国家整个生产力迅速提高,特别是国营工业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在第三次总的丰收以后,今年的粮食收购运动遇到了一系列困难,一时几乎演变成为总的国民经济危机(粮食收购、原料收购和工业原料供应中断的危险,城市供应中断的危险,进出口计划遭受破坏的危险等等)。

产生这些困难的原因,是市场平衡遭到猛烈破坏,而市场关系(一方面是农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工业品的供应)不协调情况的加剧,是由于农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由于农村富裕阶层和富农阶层收入的增加。

同工业品的供应相比,农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提高有种种不同的原因:工业品价格降低而同时技术作物产品和畜产品价格提高;这两个部门在整个农业中的比重增大;零活收入的总额显著增加,这首先与建筑业的扩大有关。农村购买力的这种增长,既没有同商品供应的相应增长(对农村的商品供应,按数量计算摊派到农村是增加了,但由于价格降低,供应总值并没有增加)保持平衡,也没有同对农村富裕阶层的课税的相应提高保持平衡,没有同非农业性所得税额保持平衡。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同技术作物产品和畜产品的价格相差很大,而从税收观点来看,粮食生产比其他农业部门吃亏些。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就减弱了对销售余粮的刺激;种子、口粮和饲料消费的增加、粮食储备的扩大以及其他等等,都是靠缩减市场的粮食供应达到的。这种经济情况同自己的社会阶级

表现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由于农村的进一步分化,这种情况就使富农(虽然他们不是粮食的主要持有者,但其经济比重增长了)有可能利用他们在市场上的阵地,并同私商一道,对整个市场行情有相当大的影响。

因为国家和合作社的收购机关既没有在市场上表现出一致行动(而是进行激烈的竞争,从而在客观上帮助了私商和富农),也没有以必要的速度开展工作,同时也没有根据主要的粮食收购地区的需求情况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广泛地展开运送工业品的工作,所以富农更加可以利用市场的这种行情。另一方面,特别是由于争论,党组织忽视了同粮食收购有关的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指望粮食收购会自行产生良好的结果,而部分党员,特别是在农村,也没有能够给富农以有力的回击并相应地提高农村贫农、中农阶层的积极作用。

可见,已经形成的经济行情,富农对这种行情的利用,在执行实际的工业品分配计划中的错误(工业品运送迟缓),整个计划工作的错误(对农村上层分子课税太轻,粮食价格和其他农产品价格相差过大等等),工业品的增长的暂时落后,以及机关(包括党的机关在内)的组织性和积极性的不强(这一点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在生产力及其社会主义的成分有很大增长的背景下,这一切引起了极大的经济困难,如果及时地和正确地使主要的经济因素保持平衡和消除经济机关与党机关中的缺点,那么这种困难是不致发生的。

二

为了解除总的经济危机的威胁,为了不但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而且坚持党所采取的国家工业化的速度,中央委员会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近期目标是:

(1)加紧运送、生产和向粮食收购地区的农村市场供应工业品,甚至不惜以城市暂时的工业品缺货为代价;

(2)吸收农村的部分货币积累:一方面对农村富裕阶层课税,另一方面把从农村吸收来的资金大部分用于农村本身的生产(发行加强农民经济的公债,实施关于捐献的法律,确立严格的交款期限纪律等等);

(3)打击蓄意进行粮食投机,抬高粮价以及使工人、贫农和红军遭受饥饿威胁的富农和投机包买商(运用第107条,从依法没收的投机商的粮食中抽出25%贷给贫农等等);

(4)建立粮食收购机关的真正的统一战线,制止它们之间的竞争;

(5) 实行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同时保证执行苏维埃稳定粮价的政策,扭转合作社机关、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的个别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动摇;

(6) 党参与粮食收购工作,把全党的力量从上到下动员起来,使粮食收购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7) 检查粮食收购地区的苏维埃的、合作社的和党的机关,把那些看不见农村中有阶级以及不愿意同富农“吵嘴”的显然蜕化的分子清洗出去。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不采取诸如此类的措施,就不可能克服粮食收购方面的严重困难。

因此,联席全会完全同意政治局今年1月6日和2月13日在指令性的信件中所提出的关于粮食收购问题的路线。

现在我们有充分理由断定,党的上述措施部分是非常性质的,在加强粮食收购工作方面保证了极大的胜利。到去年12月底为止的上半年度收购的粮食此前一年少了12 800万普特,而在今年三个月内(从1月1日到4月1日)就比去年同一时期多收购了11 000万普特,即几乎完全弥补了过去的亏空,而且所有作物的收购量(在9个月内)达64 400万普特,前一年则只有61 700万普特。可见粮食收购方面虽然有些不足,但总的收购量还是提高了。

这样,我们就缓和了并进而消除了对城市、红军和工人区的供应中断现象,防止了实际工资的下降,消灭了产棉区、亚麻区及木材采伐区的粮食供应不足现象,最后,建立了一定的、起码的粮食储备。

但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提醒各级党组织注意:在本经济年度所剩下的第三季度内,为了完成计划,还要比上两个年度同期收购更多的粮食和油料。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负起责任,不要满足已有的成绩,毫不放松地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收购运动。

三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尽管中农上层分子有一定程度的不满,特别是由于有过歪曲和过火行为,但是农村中党的工作有改善,也更有活力,富农的作用和影响正在削弱,贫农工作日趋活跃,苏维埃政权在农民基本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

必须绝对制止某些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这种歪曲和过火行为,党有责任同它们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歪曲和过火行为会造成长期的、经济上的和

政治上的不良后果。

凡是不仅打击了富农而且也打击了中农的一切做法都属于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已经滑到余粮征集制的路上去:没收余粮(完全不按照司法手续地运用第107条)、禁止农村内部粮食买卖或一概封闭“自由”粮食市场,为“弄清”余粮而进行搜查,建立巡查队,在粮款结算和出售奇缺的商品给农民时强行摊派农民公债,付款由邮局转汇,其中一部分以公债券或其他证券支付,对中农施加行政压力,实行产品直接交换,如此等等。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坚决指出,这种对党的路线的歪曲同党的总方针、同中央委员会由于目前粮食收购运动时期遭到特殊困难而采取的非常措施毫无共同之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要求同这些做法进行无情的斗争,立即消灭诸如此类的过火行为和歪曲现象,因为它们破坏着党的经济政策基础,威胁着城乡间的经济联系,破坏着信用制度并使工人阶级同基本中农群众的联盟遭到削弱。

只有在作为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结合的惟一正确形式的“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只有在严格实行无产阶级国家的革命法制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实现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的口号。所以,向富农展开进攻必须建立在基本农民群众进一步协作化、加强城乡经济周转、提高农业(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已指出它的缺点)的基础上;向富农展开进攻必须采用如下办法:一方面不断提高对富农的课税,限制他们的剥削倾向(实行劳动、租佃立法,采用总的土地政策,在供应机器和发放农贷方面根据阶级原则,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大力和全面支持广大农民群众的合作化、各种集体经济形式和贫农组织,采用各种形式和方法不断加强国家计划对市场和小农经济的影响。

“新经济政策”就是党坚决循以前进的道路,只有通过它才能对全国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党对于富农、耐普曼以及他们的应声虫关于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恶意宣传应给以坚决的回击。党同样应该特别坚决消灭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歪曲和过火行为,尽管中央政治局已经提出相应的警告,但这种行为还没有完全绝迹。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不能把今年粮食收购中所发生的困难看做是偶然的。这些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是和整个国内外形势要求无产阶级国家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所形成的困难有关的,是和计划经济领导上的错误有关的。这些困难的加深和加重是由于农村富农和投机分子竭力利用这些困难,抬高粮价,破坏苏维埃价格政策。粮食收购中的困难在将来还有可能出

现,因此党必须更加坚定不移地彻底实现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的口号以及关于合作社与国家机关不断要调节私人市场和把个体农户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的口号。

同时,联席全会认为,随着粮食收购中的困难的消除,应该取消党的措施中带有非常性质的部分。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责成政治局要考虑到党从今年粮食收购的错误和考虑不周中取得的教训,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今后粮食收购运动中能没有间断地进行收购。

在主要的经济措施方面,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首先必须使国民经济各部门间保持更正确的比例和应有的有计划的配合。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工业品,特别是供应广大市场的工业品产量有了显著的增长(由去年的15%增长到27%),特责成政治局采取办法,以便:第一,避免工业品产量在夏天发生季节性下降;第二,建立供粮食收购运动最紧张时期机动使用的日用必需工业品的专门储备。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国家贷出的春播种子超过去年1倍以上(去年是1300万普特,而今年达2900万普特),根据预购合同预付农民的款项已增加到13500多万卢布,集体农庄建设拨款增加了1倍多(用于集体农庄的专门资金总共达6500万卢布),农业的拨款总共增加71700万卢布以上,——这一切应该能对农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责成政治局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提高整个播种面积的单位面积产量,特别是提高谷物播种面积的单位面积产量,还要采取一切措施,特别是要扩大苏联国内的复杂机器和拖拉机的生产,保证大大加强明年集体农庄的生产基础。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免除35%力量单薄的农户的农业税是近几年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有必要增加农村上层阶层的农业税,责成政治局特别注意掌握富农的非农业收入情况,适当地调整谷物生产和其他农业部门生产之间的课税,按法定的期限准时征收农业税。

四

为保证贯彻上述指示,为建立国家的和合作社的收购机关的统一战线(这是顺利贯彻收购政策以及实现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必要前提),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定:

在改组收购机构方面：

(1)统一国家粮食收购机关,合并粮食公司、地方国营收购组织和地方面粉厂(乌克兰粮食和饲料产品加工和贸易联合公司、高加索粮食收购股份公司、西伯利亚粮食贸易公司,哈萨克斯坦粮食收购股份公司等等),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股份公司——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并把它们的机构和财产移交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把财产折成相应机关的股份,保证地方机关对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工作施加影响和予以协助;通过按股分红,由收购的产品中提出一小部分作为地方预算,使股东和地方机关关心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工作成就;其次,要保证那些没有并入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面粉厂按照合同把收购的粮食的剩余部分(除地方需要外)全部交给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

(2)在国家收购组织和消费合作社收购组织之间(即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为一方,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和乌克兰合作社联社为另一方)的关系中,应建立和实行总合同制度;根据这种合同,消费合作社系统按全国计划(即不计算计划外的地方收购)规定收购的全部粮食应直接送到附近的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粮仓、面粉厂以及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在火车站和码头的栈房。

(3)为面粉厂和粮仓的工作规定一定的条件,以保证它们能满负荷工作以及同居民保持直接联系(直接运送合作社收购的粮食,对直接送到面粉厂和粮仓的粮食给以特殊的价格补贴等等)。

(4)保证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直接根据它同主要收购机关签订的总合同进行收购。为了使各主要收购机关执行总合同,为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规定专门的收购、装卸区,建立专门的莫斯科面粉厂,同时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有权派遣全权代表驻在这些地区,以便督促各主要收购机关根据同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签订的总合同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向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报告收购和运输情况。

在改组调节机关方面,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定：

(1)保证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在组织和调节收购方面,在利用计划收购得到的粮食储备方面,具有苏联人民委员部的权利;

(2)加强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构,提高工作人员的熟练程度,增加工作

人员的数量；

(3)在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下组建由主要收购机关的领导人员和主要粮食收购区的代表参加的常设的定期专门会议,在人民委员部直接领导下制定粮食收购的业务计划和方法等等。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特别注意到有必要大力巩固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增强合作社中的基干工作人员,加强合作社的内部纪律,更广泛地吸引农民入社,发展合作社的社会舆论,保证实现阶级政策等等。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力求保证所有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在粮食市场上的行动一致,责成党的组织同各种各样破坏和违反收购政策和纪律的行为,同地方主义、本位主义以及对待业务计划的形式主义态度(谷类饲料平衡表、毫无根据的申请书等)进行坚决斗争。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必须实行一切从事粮食收购、加工和销售的经济机关的合理化,责成苏维埃机关的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努力做到使粮食收购和销售方面、磨粉和烤面包方面的杂费开支进一步大大缩减。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责成各级党组织加强注意在总的经济计划的执行方面确立绝对的革命纪律,因为在迅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因此而展开基本建设的情况下,在无产国家集中一切人力和物力来进行工作的情况下,只有使一切经济机关都严格执行无产阶级的纪律,我们才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直前进而不致发生较大的停顿。

3

1928 年政治局和中央全会工作计划

1928 年 4 月 11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批准

1. 4 月。1927—1928 年度粮食收购运动总结和为保障新运动采取的措施。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报告。移交全会讨论。
2. ——共产国际纲领。
3. 5 月。关于从培养和正确分配红色专家和经济工作人员的观点出发制定改善高等和中等技术院校的措施。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移交全会讨论。
4. ——关于改善广播和电影事业状况的措施。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5. ——关于普及义务制初级教育。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移交全会讨论。
6. 6 月。交通人民委员关于铁路交通的财政状况的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副报告。移交全会讨论。
7. ——建设业的状况和减少建设费用的措施。卢卡申同志委员会的报告。工农检查院的副报告。移交全会讨论。
8. ——政府委员会关于 7 小时工作日的初步结论及其进一步实施的报告。移交全会讨论。
9. 7 月。关于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改组。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工农检查院的副报告。
10. ——对工业合理化实践的检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报告。工农检查院的副报告。
11. 8 月。关于国家国防状况。李可夫同志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告。
12. ——俄联邦和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部及全俄农业合作社联社关于集体

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状况的报告。移交全会讨论。

13. 9月。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移交全会讨论。

14. 1928—1929年度工业财政计划。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报告。移交全会讨论。

15. 1927—1928年度进出口和金融计划完成情况总结以及1928—1929年度计划。贸易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报告。

16. 10月。1927—1928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总结以及1928—1929年度计划。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报告。

17. ——银行联合和国家银行改组的经验。国家银行的报告和工农检查院的副报告。

18. 联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政治和经济工作总结的报告。

19. 11月。关于同国家和经济部门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总结和今后的措施。工农检查院—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移交全会讨论。

20. ——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和各部门就相应问题的副报告。

4

沙赫特案件和与经济建设的 缺点作斗争的实际任务

1928年4月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根据李可夫同志的报告一致通过的决议

随着沙赫特案件的发生,顿巴斯的反革命暗害组织被破获了。这一事件具有明显的全国性的意义,因为它揭露了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在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斗争中所采取的新形式和新方法。这一事件之所以具有政治意义,是因为这个由从前的矿主和一批过去享有特权的专家组成的顿巴斯暗害组织,是同从前俄国和外国的企业主以及外国军事间谍机关有联系的。除了其他的任务外,这个暗害组织还抱有破坏苏联国防、直接准备武装干涉和对苏联进行战争的目的。

顿巴斯反革命阴谋的破获,以及其他经济破坏、怠工等一系列事实,证明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克服极其严重的困难。虽然如此,苏维埃国家还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经济,这就又一次证明了苏维埃体系,包括苏维埃工业,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雄厚的内在力量;同时也特别清楚地表明: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苏联经济文化的进一步高涨是有极大可能的。

十月革命后的十年中,大部分技术知识分子都转变过来同苏维埃政权实行真诚的合作,并且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工业化,这种情形对克服上述困难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这次破获的阴谋暴露出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经济管理体系本身存在着不能容忍的缺点和错误,我们的工作人员对阶级敌人缺乏共产主义的警惕性和革命的嗅觉,在吸收工人群众参加生产领导方面的工作做得不能令人满意,群众性组织即工会和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漠视工人日常的需求,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

表现得非常薄弱。

顿巴斯的例子特别突出地暴露了我们的下列缺点：

(一)在经济领导人员的工作方法和对待专家的态度方面。从顿巴斯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直到目前为止,很多企业的领导人员多半还只是起着工业中拙劣的政治委员的作用,也就是说,用所谓“一般的领导”来代替真正的企业管理。那些不钻研生产技术的党员经济工作人员,对专家的工作不进行检查,在同他们一起工作中不进行系统的学习,往往盲目地信任他们的工作,对专家执行的工作不加警惕,不加监督,不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对他们提出的计划和建议多半不加审查就予以同意。对那些已经批准的计划通常是不审查,不执行。不是认真去选拔并切实帮助那些业务能力强的而且在工作中受过考验的专家,不是经常地坚决地对不老实的和怠工的分子进行斗争,反而对这个极重要的任务不予以严重的注意。不去为忠实于生产的专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之能顺利地进行工作,反而只靠私人感情上的生活联系(一块儿吃吃喝喝,以庸俗的态度评价他们的工作等等)来同某一部分专家接近。目前,当经济建设特别是基本建设正在大规模进行的时候,这种情况更加是不能容许的。至于经济工作人员不熟悉企业的生产技术,他们的工作经常调动,担负过多的非生产性的工作(做总结,做报告,跑中央机关)以及其他情况,使经济工作人员变成政治委员(而且是拙劣的政治委员),变成不能真正承担起自己的工作的工作人员;这在目前条件下是尤其不能容许的。

此外,参加企业工作的红色专家也非常不够。新来的红色青年专家往往遭到旧专家的公开敌视。另一方面,招聘外国专家和利用外国技术帮助的工作也缺乏应有的领导和监督。

工程师和技师的工会组织充满着小圈子气味和狭隘的行会情绪。这些组织往往被无产阶级的异己分子所把持,同无产阶级国家和工会对立,在进行工作的时候实际上不受国家和工会的领导。结果,资产阶级专家中个别怠工分子没有遭到大部分忠于职守的工程师和技师的应有的反击。

尽管在生产中提拔起来的工人干部(从组长、工长到车间主任)增加了,但在业务上对他们的专门训练却注意得不够。他们的职务往往只限于干些琐碎事情,办理一些专家所“讨厌的”与工人打交道的行政事务。常常有片面地只提拔共产党员的情形,这造成党员脱离工人的危险,滋长党组织内的名利思想。

(二)在工会和吸收群众参加生产领导方面。吸收群众参加生产领导的工作做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向工人报告生产计划和生产进程往往流于形式。生产、生产合理化、基本建

设等问题都没有在生产会议上研究,而在某些场合,工人由于批评行政工作的缺点甚至受到迫害。工会没有经常设法发挥生产会议的作用:生产会议组织得不好而且很少召开,技术人员(有时也有党员行政人员)轻视生产会议的工作,对已通过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缺乏必要的监督。企业中临时监察委员会的实际工作是做得非常不够的。对有价值的建议和发明创造的奖励基金根本没有利用,个别的生产部门甚至没有拨出这笔基金。工会机关(区委员会、省办事处、中央委员会、工会联合组织)的经济工作,特别是在参加基本建设,实行生产合理化以及实行降低成本的措施和领导生产会议等方面的工作,做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另一方面,工会组织没有能够保全自己的“面子”,也就是说,在维护工人日常利益方面没有起它的特别作用。工会工作人员的威信不高,在车间里、矿井中、工人宿舍内以及其他地方同工人的经常联系很差。对违反劳动法规的行为,对在工人问题上歪曲苏维埃政策的实质的现象,如不缩短节日前一天的工作日,让工人在休息日做工,因企业过失而停工时不发工资,违反休假制度和工作服条例等等很少展开斗争。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工会机关对于行政上不关心劳动保护和不重视消除工伤事故的现象所作的斗争是非常差的。对于因疏忽大意而造成不幸事故的人往往不加追究;对这种情形,工农检察院各机关和检察机关同样没有予以注意。

* 应该特别提出在地下的工作中不遵守 6 小时工作日的问题,以及联系到这一点,关于在矿井劳动的组织中的那些导致浪费大部分工作时间的缺点。

(三)在各级党机关和经济工作的领导方面。党组织对经济机关的领导往往只限于做出一般宣言式的决议。对经济机关贯彻指示的情况通常是缺乏检查的。对工人提出的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缺点、有关工会和党机关工作中的错误的意见,特别缺乏敏感。对工会的工作,不管在广泛吸收工人参加生产领导方面,或在劳动法规遭到破坏和行政上用粗暴态度对待工人时保证工会能及时地顽强地维护工人利益方面,都没有加以应有的领导。党的地方机关对地方机关和中央经济机关的缺点总是只限于提出官僚主义的形式上的批评,而不积极地为真正消除这些缺点而斗争。在挑选工作人员时,对过去的工作通常不认真加以审查,往往把那些因不称职而被撤换的经济工作人员调到新的甚至更负责的工作岗位上去,而不把这些分子从经济机关中清除出去,不提拨新的经济工作干部。在委派负责人员时,存在着照顾“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等等的健康现

* 本文中星号标出的是没有写进报刊上公布的决议的段落。下同。——编者注

象。很少监督经济工作人员向工人报告自己的工作,也很少帮助经济工作人员去创造有利于他们提高生产和努力钻研生产技术(学习)的条件。有些场合,党组织还在物质上依赖经济机关,这是党所绝对禁止的。

中央机关粗暴的官僚主义和错误使地方机关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加深起来。例如中央机关不可容忍地拖延经济计划的批准,并经常修改这些计划,因而打乱了企业中的工作,浪费了国家资金,并助长了经济工作人员和专家对自己工作所采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从顿巴斯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经济管理机关(顿巴斯煤矿管理局)中存在着不正常的过分的集中制,这一方面加强了下层经济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拖拉作风、无权现象和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地方机关对企业的工作所起的作用。最后,1927年6月29日公布的、修正了以前所颁布的条例(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1926年第6号命令公布的“标准条例”)的关于托拉斯的法令,特别是其中关于企业管理人(厂长)同领导技术的专家相互关系的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几乎完全没有付诸实现。这种情况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使全部技术人员直接从属于技术领导者的做法,阻碍了建立真正的统一管理,降低了企业管理人(厂长)的作用。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管理体系中的这种不良现象,反革命暗害分子才得以长期逍遥法外。

在顿巴斯的例子中暴露出的经济工作的严重缺点和错误是多数工业区都存在的,这种缺点和错误必须从速采取实际措施予以消除。

1. 关于专家

因沙赫特案件而进行的审查工作,非常有力地说明了我们工业、运输业等部门中科学技术专家的使用情况必须改进。为此,目前除了经常注意为他们安排良好的工作条件外,特别需要对他们的工作加强检查,切实规定严格的工作责任制。一方面要无情地惩办那些蓄意怠工的人员和暗害分子,同时必须改善绝大多数正直的忠于职守的专家的工作条件。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在专家中间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旧时遗留下来的、作为资产阶级制度的残余的各种情绪和偏见,而妨碍积极吸收那些工作老实而且技术熟练的专家来参加生产技术工作。敌视非党专家的现象,虽因党和工会的努力而大大减少,但是今后仍必须进行彻底而坚决的斗争。同时必须使绝大多数工程师和技师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而自觉的助手。必须特别注意培养新的红色专家干部和在生产中广泛使用他们的问题。

根据以上情况,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定:

* 1. 建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它下属的经济机关在最近几个月里特别集中注意检查专家(特别是前财产所有者)的人员组成,从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开始。对运输部门和在计划机关等地方工作的专家也采取相应的措施。

2. 采取各种办法保证最有效地发展科学技术知识,特别应通过有关报刊(专门性报刊和其他报刊)广泛阐述科学技术问题,在科学家和技师的专门组织中或在代表大会、专门会议和群众性会议上公开讨论这些问题,或为此组织专题讨论等等。

3. 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在专家(工程师和技师)群众中广泛开展工会工作。工会应该努力为提高专家的技术熟练程度创造有利条件,吸收他们参加生产会议的工作,克服专家中到现在还存在着的小圈子习气和狭隘的帮会情绪,加强专家中间的生产纪律和工会纪律,同时密切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的需要。

4. 有系统地吸收外国专家到我国企业中工作,利用外国的技术帮助来解决某些任务,并建立对他们的正确的领导和必要的监督形式。

5. 扩大并改进不断派遣我们的专家出国学习最新技术成就的工作,为此特别需要增派最优秀的青年专家和高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出国留学。

6. 保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在招收和分配高等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方面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保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上述学校的教学进行监督。在招生的时候,特别是在学习进程中,应保证工人占大多数。

7. 巩固并扩大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直属的工业学院,同时扩大红色厂长训练班。

8. 建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扩大并加强专门培养由工人中提拔起来的中、下级经济管理干部(组长、工长、技师等)的短期训练班网。

9. 保证工会的组织尽可能广泛而积极地参加造就新的红色专家干部和提高被提拔的工人的熟练程度等方面的各项工作。

2. 关于党员经济工作人员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日趋复杂,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应当是:努力学习

专业知识和生产技术,以掌握生产技术方面的业务。现在党必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从那些有实际经验的基于经济工作人员中和高等技术学校毕业的红色专家中提拔红色的无产阶级专家,去代替资产阶级专家中间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这是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不顺利地实现这一任务,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无法进行。要实现这一方针,必须从速采取若干实际的措施。

因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定:

1. 建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于最短期间在一切工业企业内贯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27年6月29日的决议(《国营工业托拉斯条例》),贯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1927年10月4日的命令(《标准条例》),以保证企业的管理处企业管理方面的真正领导,同时废除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第6号命令公布的《标准条例》。

2. 为了帮助在管理方面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的有才能的经济工作人员掌握生产技术,应派遣他们去学习或出国留学(给以明确的学习任务,并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严格加以监督),供给他们以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书籍等等。

3. 责成工农检察院于一个月内做到尽量减少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对企业的各种调查,保证提高调查工作本身的质量,保证对调查的结果进行必要的研究,并督促消除调查中所发现的缺点。

4. 建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彻底改组顿巴斯煤矿管理局,消除过分集中化的现象,发挥其下层机关(矿务管理处、矿井)的主动性。

3. 关于被提拔的干部

1. 在提拔工人担任行政技术工作的同时,必须采取措施保证他们有机会入专门训练班、中等专业学校等进行专业学习。增派熟练工人出国受专业训练,并对这一工作加以整顿。

2. 加强工会和党组织在提拔工人担任行政技术工作方面的主动性,同时必须保证行政上在这方面应有的影响并对被提拔的工人的工作负完全责任。

3. 无论提拔党员或非党员担任经济工作,都必须严格根据被提拔的同志要真正适合于新的工作的原则。

4. 关于吸收群众参加生产领导工作

1. 经常而及时地向工人报道生产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继续努力改进和加强工人和职员劳动纪律,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同样,经济机关和工会应该力求使全体行政技术人员在工作中更加遵守计划纪律和财政纪律,工作更加准确,有条理,负责任。

2. 车间和企业的生产会议应当有系统地进行工作,特别是在企业中实行合理化措施和进行基本建设的实际工作方面更应如此。

3. 在大企业中,特别是在建设工作和使用设备方面有重大缺点以及正在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大企业中,必须立即成立工人的临时监察委员会,并吸收技术人员参加。

经验完全证明,在工厂工人组织的总的系统中,成立临时监察委员会作为生产会议中的一个机关是适宜的;党、工会和经济机关必须更广泛地运用它们,更多地注意它们的工作。

4. 建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保证加强各级工会的经济工作,尤其是加强工会组织在基本建设方面,在生产合理化,实行降低成本措施和领导生产会议等方面的工作。党和经济机关在这一工作中必须协助工会,使它们能真正实现这个指示。

5. 关于改善顿巴斯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

1. 立即制止违反劳动法规的行为,节日前一天应缩短工作日,不许在规定的休息日让工人工作,不许让妇女从事井下工作,因企业过失而造成停工时不得停发工资。以上各点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局和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必须负责执行。

2. 行政负责人员如对劳动保护和生产安全措施采取忽视的态度,应负严重的法律责任。

3. 建议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在今年就研究和解决改善顿巴斯各工人村的供水问题和公用设备问题,批准有关供水工程的财务计划。

4. 为了改进工会工作,使其更能满足工人群众迫切的需要,并广泛地吸收

工人参加工会工作,必须改组顿巴斯和其他地区矿工工会基层组织网,使目前的矿井委员会具有工厂委员会的权利,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应当在实行这种措施中努力提高自己的威信,加强自己的机关同群众的联系。

5. 委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内提出关于顿巴斯各区工人村村苏维埃工作的方案(有关把工人公共生活服务事宜交由工人村村苏维埃负责的问题)。

*6. 保障在6个月内根据劳动法典完全实现地下工作6小时工作日,把这件事和推行工作的机械化等新措施联系起来。责成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期限内对这个问题提出第一份报告。

7. 经济机关、工会和党组织目前必须尽量关心矿工的生活条件(澡堂、工人宿舍、食堂等等)的改善。它们对于这方面的拨款的正确使用,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

6. 关于改进党的领导

1. 同意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3月22日关于解散沙赫特专区委员会常务局的决定。

2. 委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检查顿巴斯某些党机关的工作,消灭这些党机关不正确地开除一些同志党籍(由于“不可容忍的”批评等等)的错误,克服它们在挑选工作人员中的“亲戚关系”的残余,以及其他等等。

3. 责成党组织彻底改进经济机关在检查专家工作方面的工作,改进工会在吸收工人群众参加生产领导方面的工作。

4. 责成党组织为经济工作人员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例如不要让他们经常做形式主义的工作总结报告,使他们少参加些会议,而要他们切实负责地向工人群众报告工作。

5. 责成党组织对经济机关基本建设方面的工作进行应有的领导,保证切实检查已批准的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这方面的拨款的使用是否正确。

6. 党组织必须负责使由选举产生的机关(工会机关和党机关)的落选委员去做下层工作或生产工作,不能仅仅因他们从前被选举做过负责工作而调他们去做其他负责工作。同时,为了同不称职的官僚主义分子混杂在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其他机关内的现象进行斗争,为了加紧提拔较有能力的同群众联系较

密切的新干部,特委托政治局就这一问题拟出一个方案。

保证顺利地实现上述各种措施的最主要的条件,应当是切实贯彻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自我批评的口号,大力改进党组织的工作,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对党、工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经常的斗争。

以单独的特别决议通过:

“为加强同地方工作的缺点斗争和改善各中央机关的领导实践,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做出决议,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人民委员及其副手、全苏中央工会理事会主席团和各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每年至少要有不少于一个半到两个月的时间从事地方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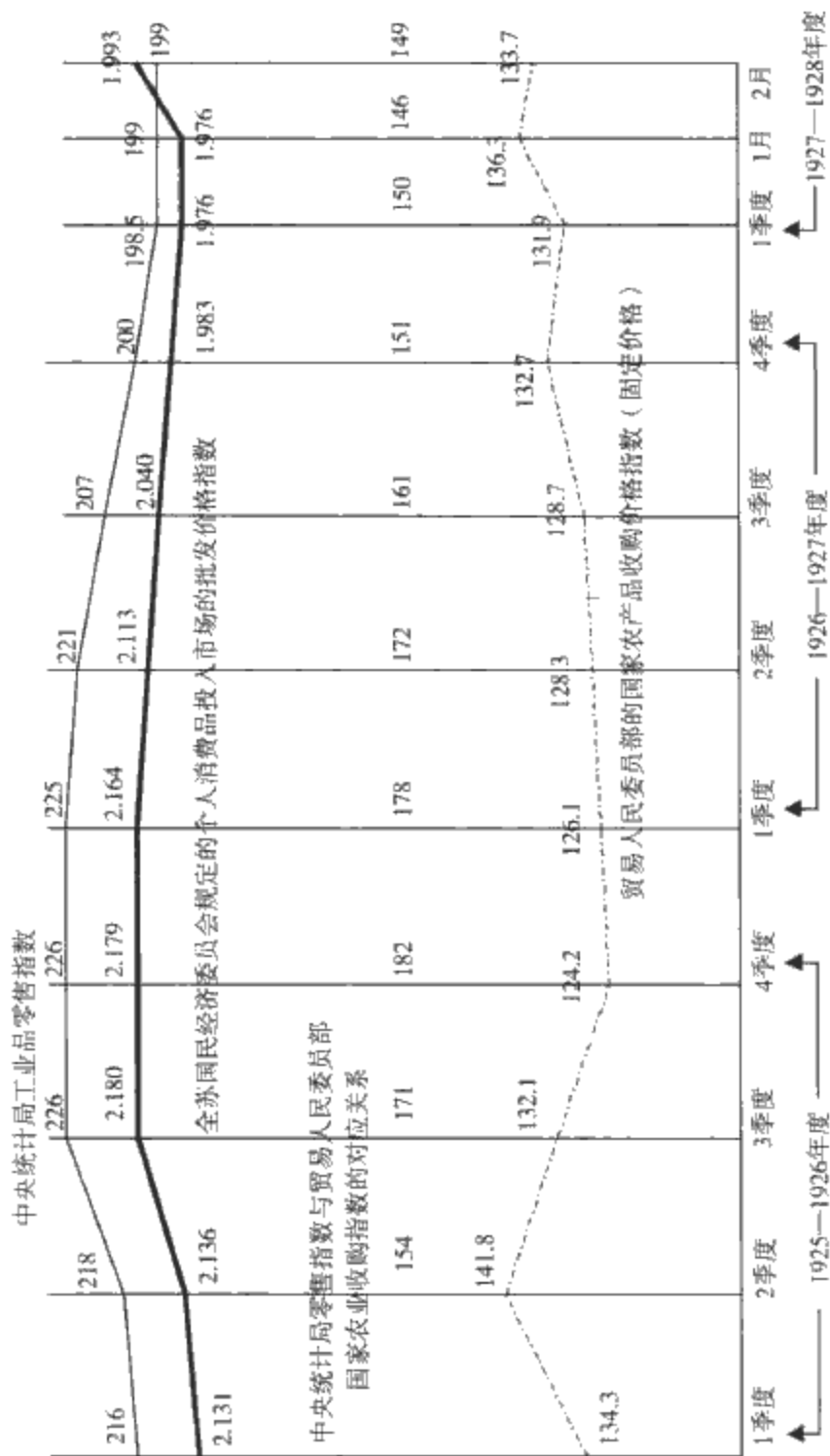
5

米高扬同志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报告
《今年的粮食收购和组织明年的
粮食收购运动》
图表

1. 物价指数变化情况
2. 大工业工人实际和名义月工资变化的对应关系
3. 粮食收购累积结果
4. 合作社和国家机关在计划收购中的比重变化
5. 各收购系统所有收购单位网数量
6. 注册磨坊精磨的粮食
7. 生产者在莫斯科面粉消费者价格中占有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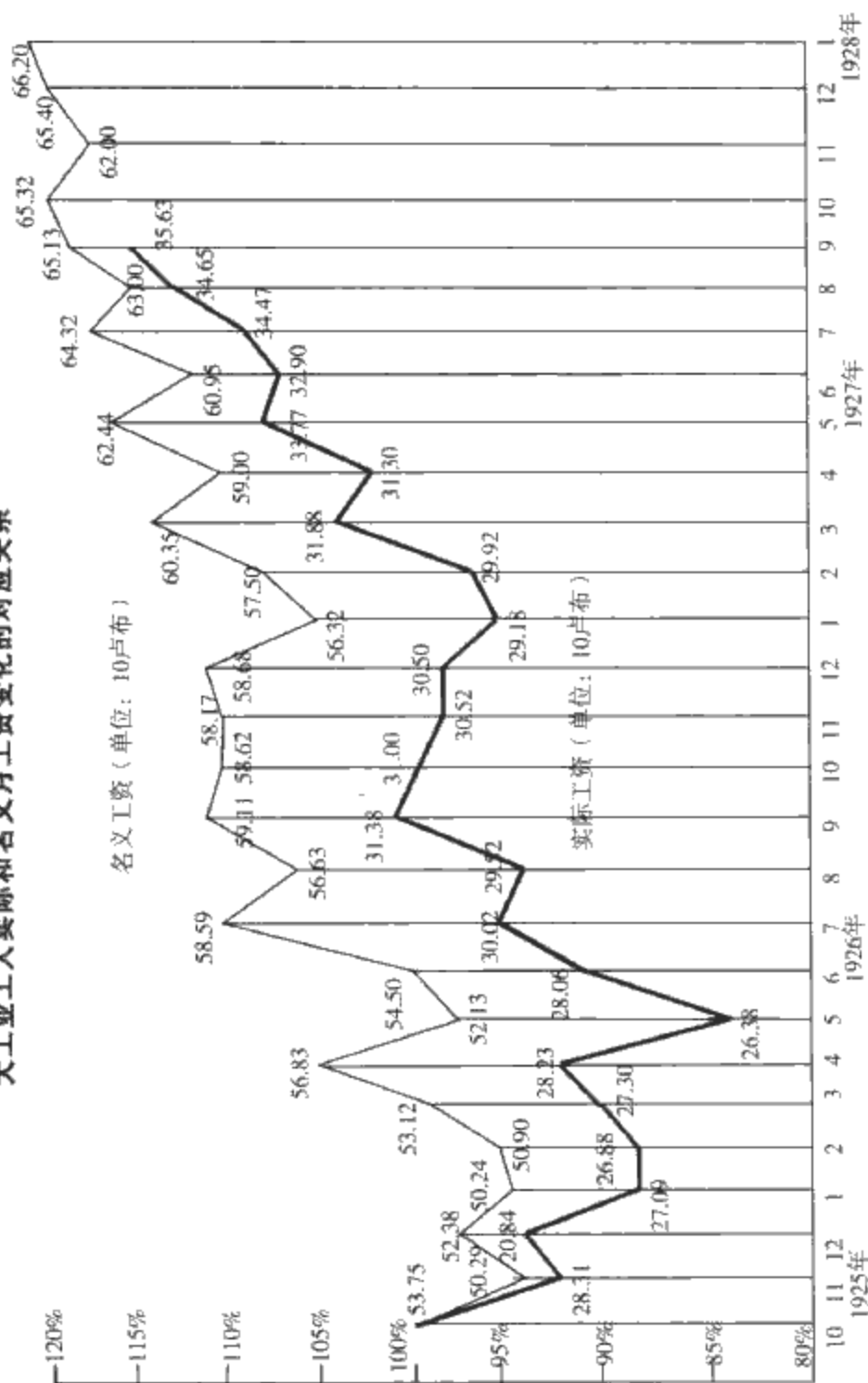
图 表 1

物价指数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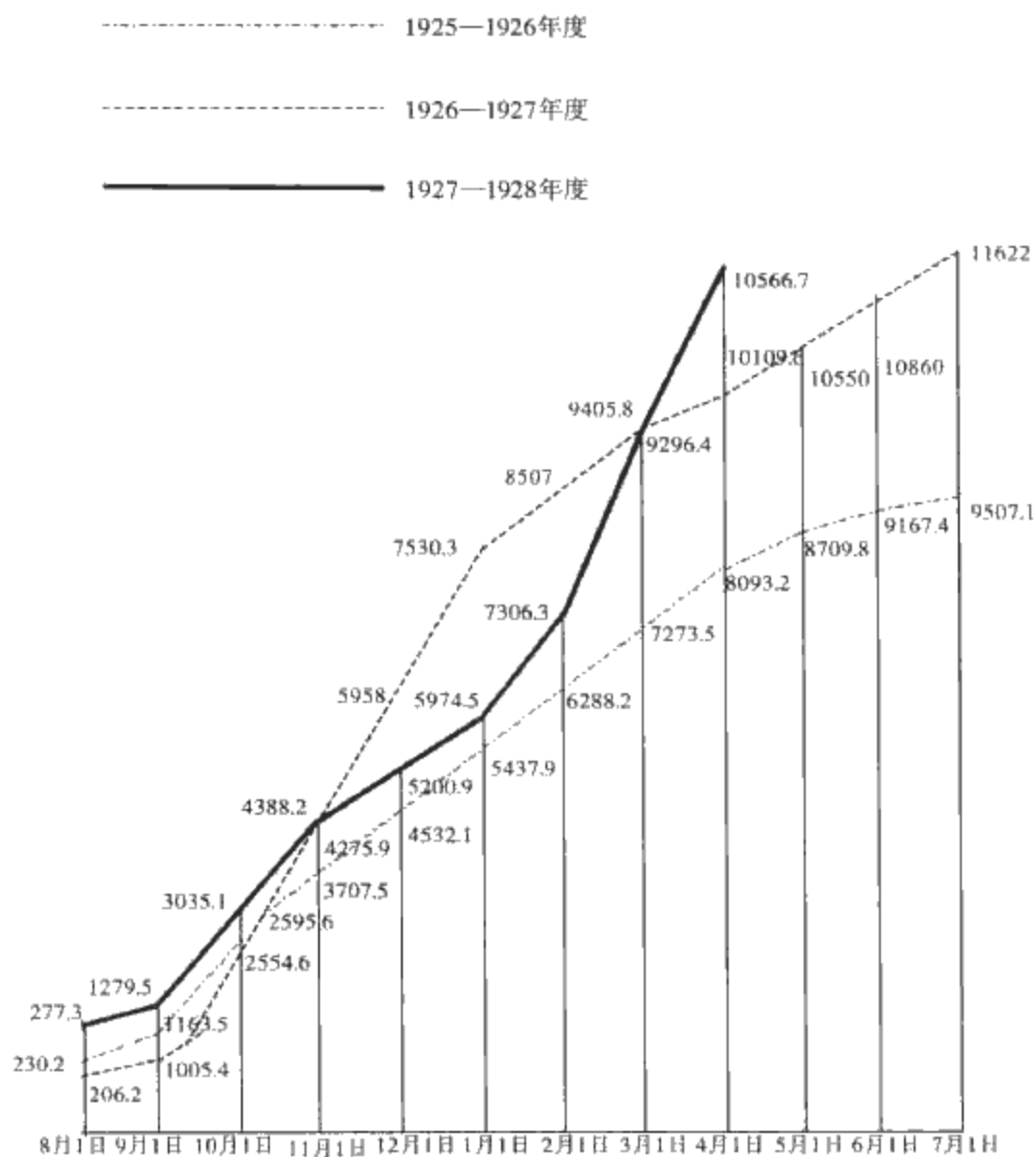


图表2

大工业工人实际和名义工资变化的对应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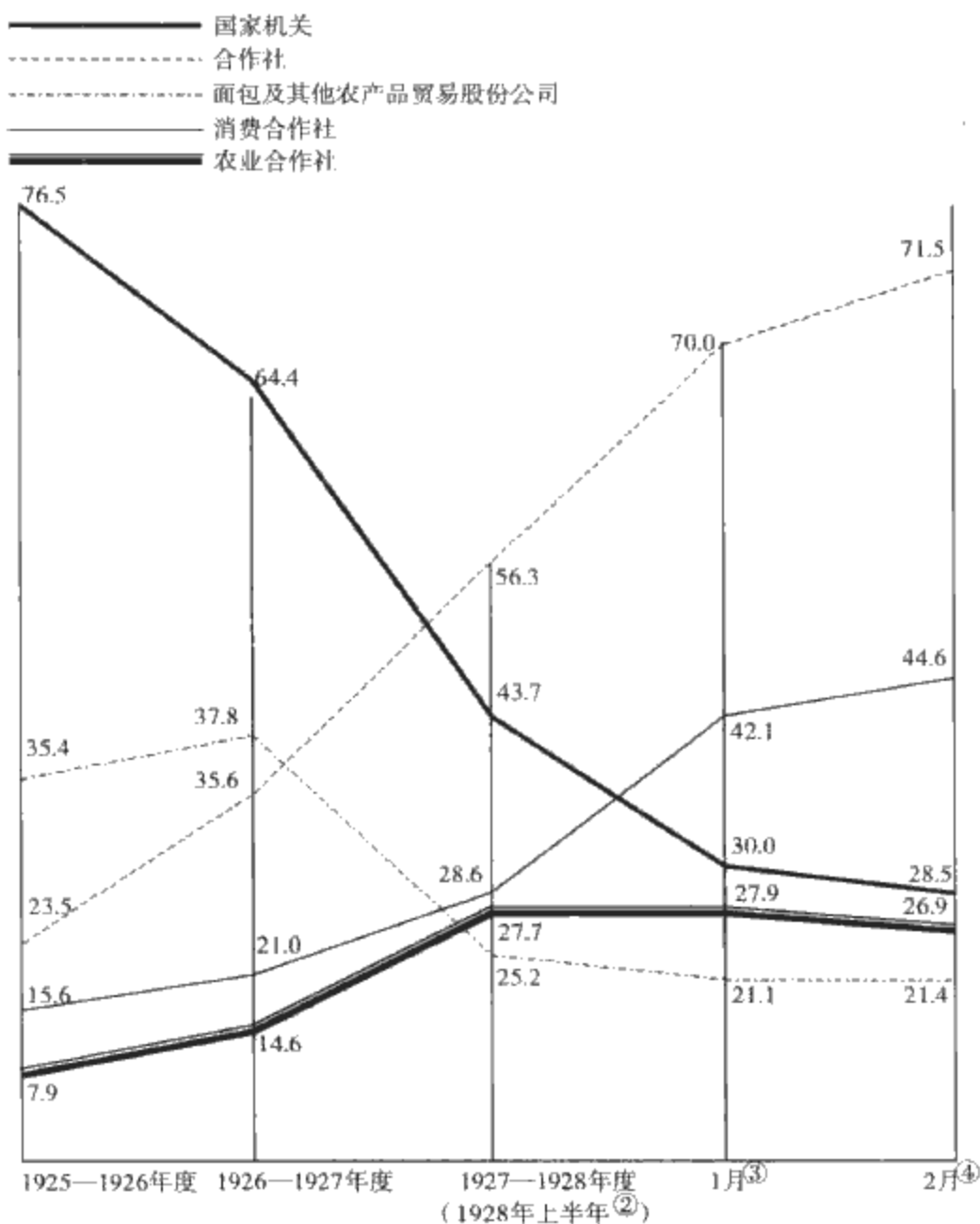
图表3

粮食（包括油料作物）收购累积结果（千吨）^①

① 表中数字原文如此。——译者注

合作社和国家机关在计划收购中的比重变化(%%)^①

图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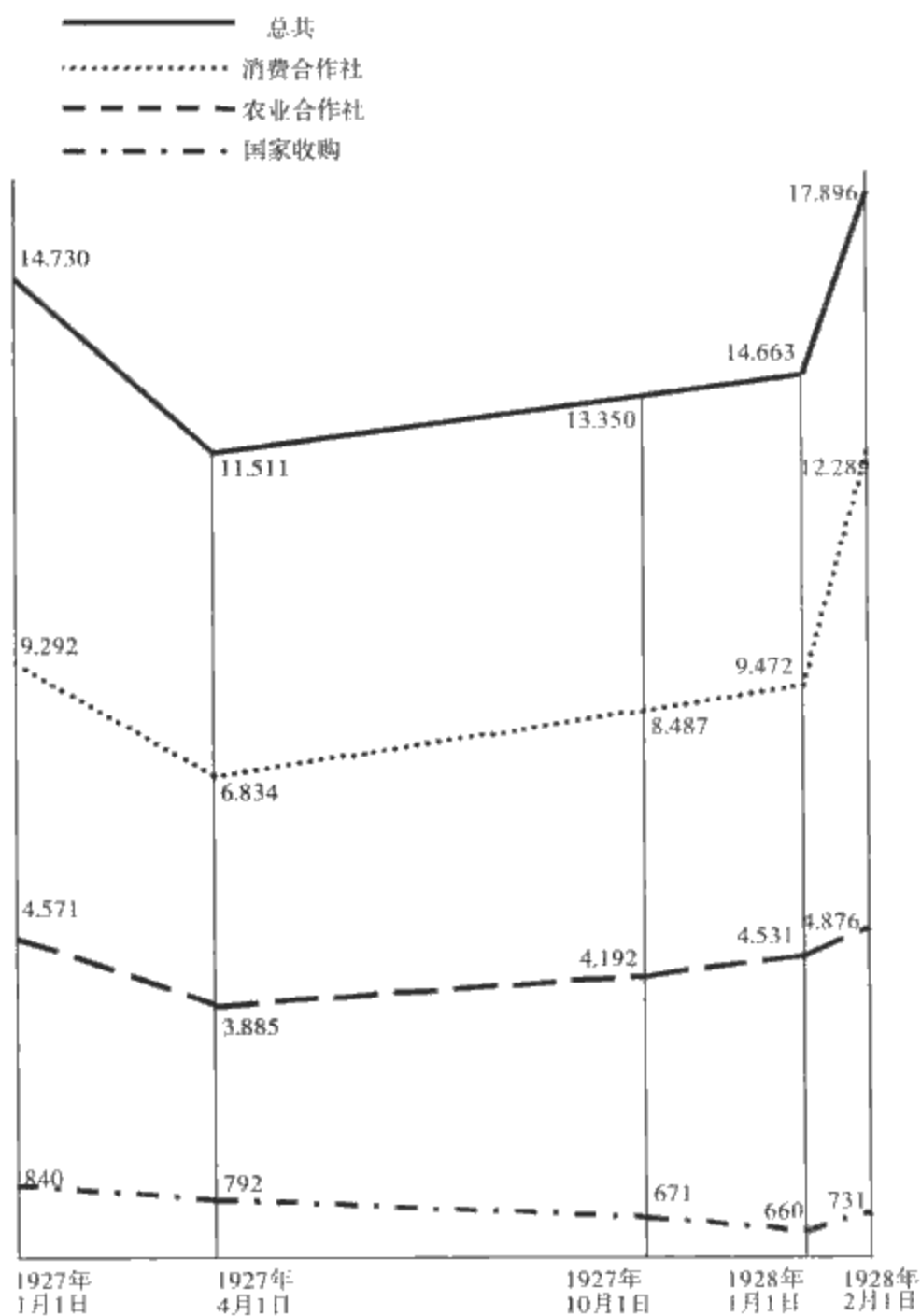
① 表中数字原文如此。——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应为该年度上半年。——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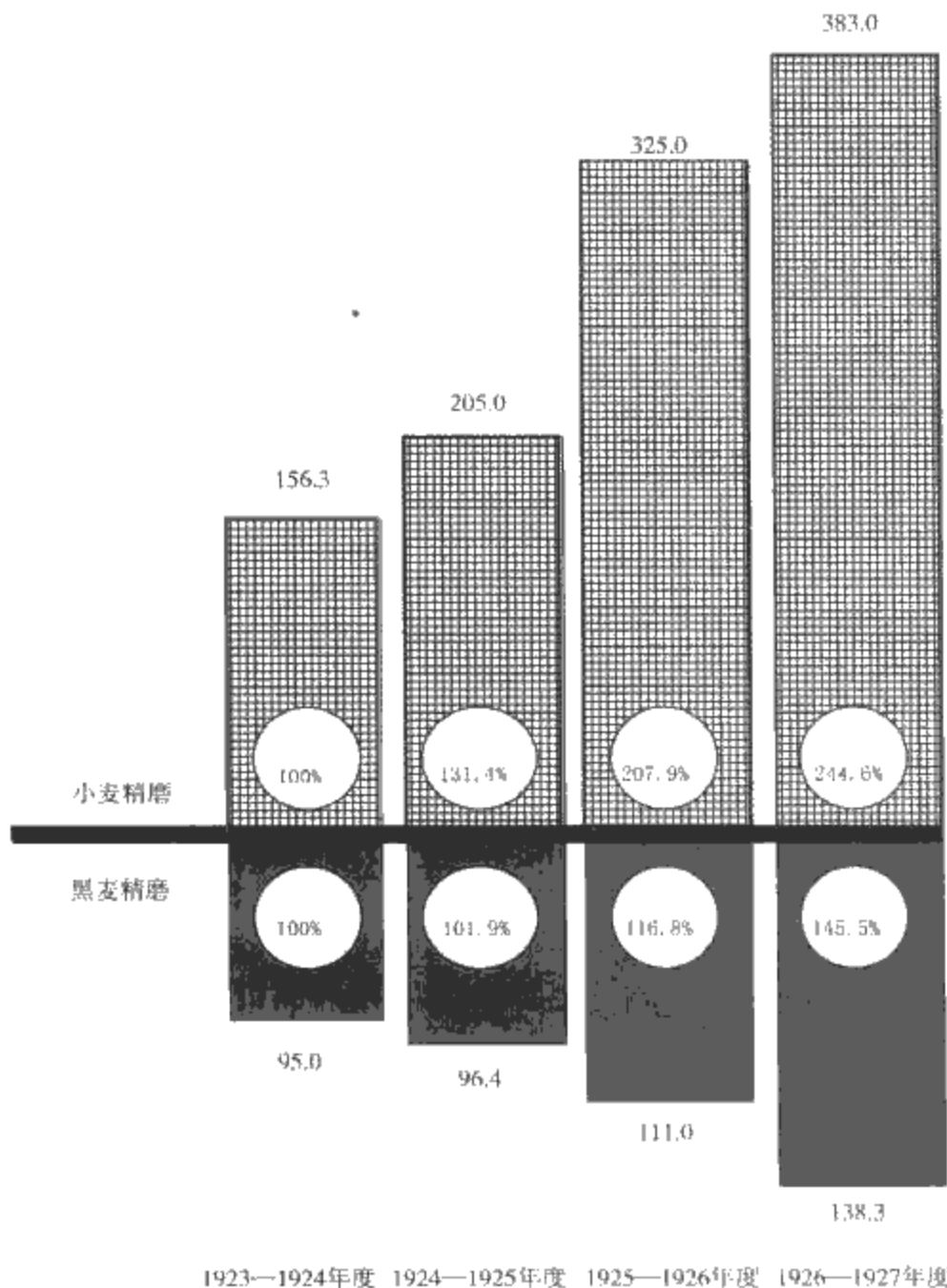
③④ 分别为1928年1月和2月。——译者注

各收购系统所有收购单位网数量

图表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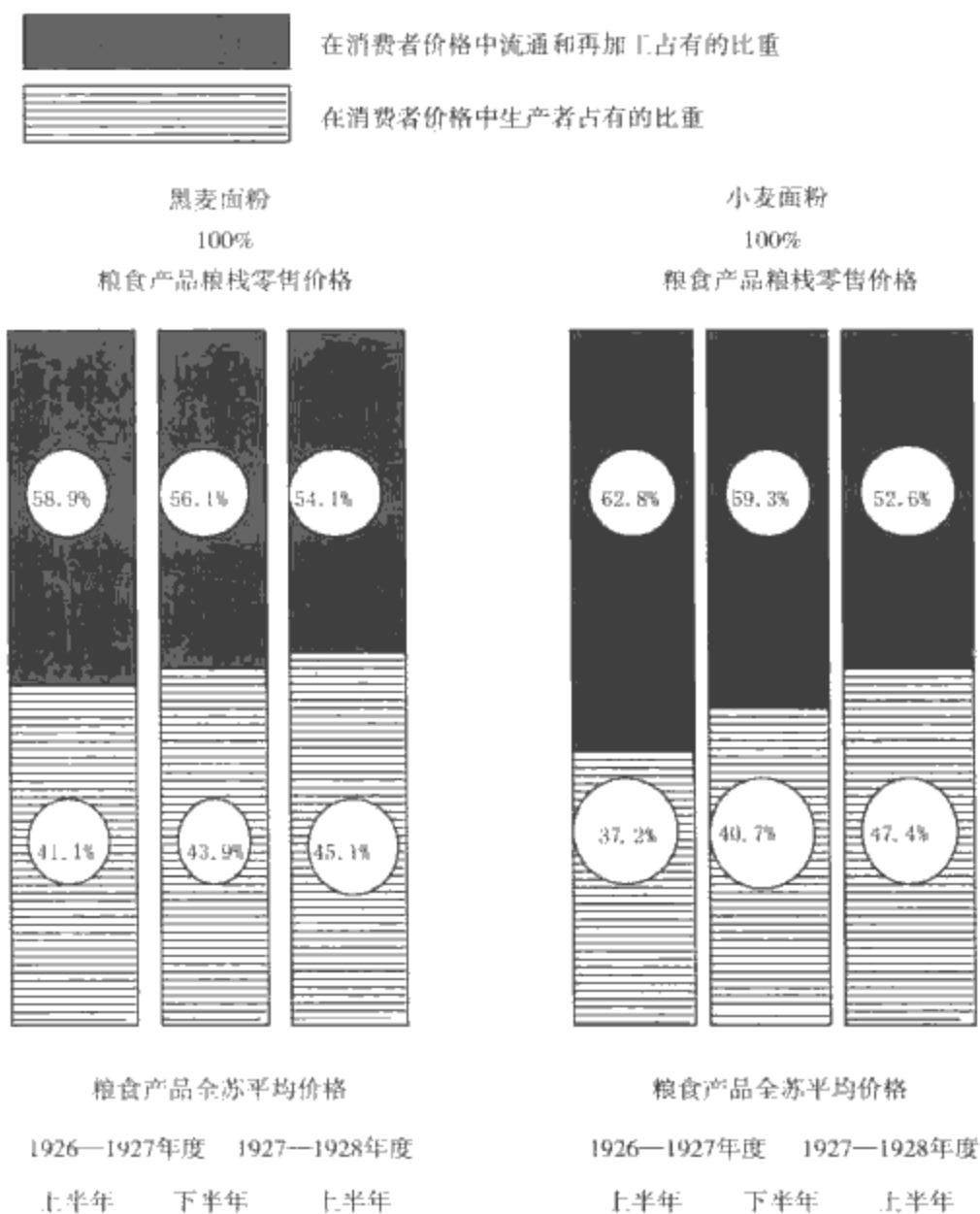


图表6

注册磨坊精磨的粮食(百万普特)^{*}

图表7

生产者在莫斯科面粉消费者价格中占有的比重



6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联席全会主席团

本月7日在全会全体会议上,列帕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提到发放巩固农民经济的公债的方法问题时强调,在当前粮食收购运动的局势下,地方从中央得到的某些指示可以解释为允许采取行政施压和强制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他作为例子从我签发的财政人民委员部通令中引用了几句话。

因为列帕同志没有完全引用今年2月27日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第0207/4通令中的有关段落,恰恰是略去了这一段里直接讲到不允许在出售公债时采用行政施压的那部分文字,我把这段文字全部引用如下:“实施发放公债是在控制数字(任务)的基础上进行的。镇(区)执行委员会从专区的财政局*得到任务并分摊给村苏维埃。村苏维埃根据各个农民状况的材料(关于外出打工的工资、农业税及其他的材料),为自己确定村里的每个农民应该登记的数额大概是多少。同时应该考虑到,让村里的贫困人员,甚至那些免交农业税的人员,也参加购买公债,哪怕数额很少,这样做是合适的。这种参与可以形成一种能对村里的富裕阶层起作用的气氛。

村苏维埃为自己制定的各户分配公债的估算数额绝不应该公布于众,也不应该带有强制分摊的性质。

一些区的村会选举了委员会,它要确定每个农民应交的公债数额。这种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应予以取消。对各户估算的上述数字是秘密的材料,只是村苏维埃用来同农民谈话和领导契约当事人的工作的。可以用各种方式同农民谈话。适当的做法是村苏维埃把比较富裕的农民叫到自己这里来,把同贫农的和

* 原文如此。指的是专区和县的财政局。——编者注

中农阶层的谈话委托给契约当事人。村苏维埃所确定的数额是希望劝说农民能拿出的数额。然而,在他不同意的情况下,不能采取任何行政施压的办法来迫使他购买这个数额的债券。在这些谈话中不能只指出国家的需要和公债的政治意义。在列举政治理由的同时,必须详细地解释公债对农民本身的好处。”

我认为,列帕同志把我所签署的财政人民委员部公文说成是为“强制手段”辩解的,这完全是不能容忍的,是企图将罪责推到那些与此丝毫不相干的人的身上,我想,我所列举的上述全部引文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请求将我的这一声明列入4月7日全会的记录。

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财政人民委员

H. 布留哈诺夫

1928年4月8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2号全宗,2号目录,339—354号案卷。原件。)

补充材料

1

苏联 1925—1926、1926—1927 农业年度 粮食作物平衡表和 1927—1928 农业年度 粮食作物预计平衡表

(百万普特)

表 1 农村平衡表

各项收入与支出	1925— 1926 农业 年度	1926— 1927 农业 年度	1927—1928 年度		
			7 月 22 日给劳动 国防委员会的 报告	8 月 26 日给劳动 国防委员会的 报告	11 月 18 日给 劳动国防委员 会的报告
收入					
1. 年初农村居民 储备(不可见)	153.5	423.7	711.6	711.6	720.8
2. 报告年度收入	4 515.7	4 749.3	4 560.9	4 655.4	4 617.4
其中					
1) 农户	4 420.4	4 653.2	4 467.9	4 562.6	4 525.7
2) 农场和农庄	95.3	96.1	93.0	92.8	91.7
进入分配的总数	4 669.2	5 173.0	5 272.5	5 367.0	5 338.2

续

分配					
1. 农村人口消费	3 685.2	3 806.6	3 740.6	3 772.3	3 807.4
* 其中					
1) 播种	704.4	720.8	737.9	746.6	751.3
2) 食用	1 648.9	1 660.2	1 679.2	1 692.5	1 692.9
3) 畜禽饲料	1 121.7	1 272.6	1 211.9	1 221.0	1 251.0
4) 其他开支(磨碎、皮壳、酿酒、食品损失等)	210.2	153.0	111.6	112.2	112.2
2. 年终农村人口储备	423.7	720.8	867.7	898.6	896.4
其中					
报告年度收成中的积累			156.1	187.0	175.6
3. 城市人口供应、可见储备和出口总量(农村余额)	270.2	297.1	664.2	696.1	634.4
总计分配	4 669.2	5 173.0	5 272.5	5 367.0	5 338.2

表2 苏联的总平衡表

各项收入和支出	1925— 1926 年度	1926— 1927 年度	1927—1928 年度		
			7月22日给劳动 国防委员会的 报告	8月26日给劳动 国防委员会的 报告	11月18日给 劳动国防委员 会的报告
收入					
1. 报告年度初的 储备	238.3	535.7	843.6	843.6	843.6
其中					
1) 农村人口 储备(不可见)	153.5	423.7	711.6	711.6	720.8
2) 城市人口紧急 储备	—	—	—	—	15.9
3) 商业储备(可见)	81.8	112.0	132.0	132.0	106.9
2. 报告年度收入	4 547.5	4 776.7	4 587.8	4 682.3	4 644.3
其中					
1) 农户	4 420.4	4 653.2	4 467.9	4 562.6	4 525.7
2) 农场和农庄	95.3	96.1	93.0	92.8	91.7
3) 城市土地播种	31.8	27.4*	26.9	26.9	26.9
供分配的总量	4 785.8	5 312.4	5 431.4	5 525.9	5 487.9
分配					
1. 农村人口消费	3 685.2	3 806.6	3 740.6	3 772.3	3 807.4
2. 城市人口消费	379.5	394.9	415.7	415.7	415.7
其中					
1) 播种	3.5	3.5	3.5	3.5	3.5
2) 食用	270.9	280.2	295.5	295.5	295.5
3) 饲料	95.3	100.6	105.6	105.6	105.6
4) 其他开支(磨碎、 皮壳)	9.8	10.6	11.1	11.1	11.1
3. 军队和工业消费	60.0	70.0	75.0	75.0	75.0
4. 年终储备	535.7	843.61	1 019.7	1 050.6	

续

其中					
1) 不可见部分					
(1) 过去的结余	153.5	423.7	711.6	711.6	720.8
(2) 报告年度收成积累	270.2	297.1	156.1	187.0	175.6
2) 城市人口紧急储备	—	15.9	—	—	15.9
3) 可见的贸易和国家保险储备					
(1) 过去的结余	84.8	112.0	132.0	132.0	106.9
(2) 报告年度收成积累	27.2	-5.1	20.0	20.0	170.6
5. 出口	125.4	160.0	180.4	212.3	
总的分配结果	4 785.8	5 312.4**	5 431.4	5 525.9	5 487.9
其中					
可见储备积累和出口总量	152.6	154.9	200.4	232.3	170.6

* 不得公布。苏联中央统计局。苏联 1927—1928 农业年度谷类饲料的预计平衡表。附 1927—1928 年度农业状况的某些基本指标。苏联中央统计局，莫斯科 1927 年版，第 8—9 页。

** 其中，平衡表中的 37.3 (百万普特) 或者 0.70% 与收入总数有出入。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 5446 号全宗, 55 号目录, 1618 号案卷, 140—165 张。)

2

关于南部煤炭工业区的经济反革命

引自 1670 号/C

1928 年 3 月 7 日

绝 密

阅后归还

第(…)号¹³⁶致联共(布)所有组织、全体共产党员—经济
工作者、全体工业和工会负责人以及工农检察院和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人¹³⁷

关于南部煤炭工业区的经济反革命的附件对于每个党员和每个负责人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分发这些文件的同时,中央提请同志们注意下列情况。

在经济建设领域揭露出来的阴谋相当充分地揭开了反革命方面斗争的新形式和这一斗争的新方法。文件表明,在煤炭工业的许多部门,工人阶级的敌人、原矿业主及其后来成为我们经济和计划组织技术领导人的专家中的反苏朋友们,致力于系统地破坏我们的建设工作。五至六年来,他们一直在通过直接损坏机器、纵火、淹没矿井、毁坏工厂和矿场、罪恶地和故意不得法地“使用”设备、挑衅地对待工人和蓄意利用社会主义合理化的实践去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实施这一图谋,而且他们善于经常绕过和欺骗我们的经济的、工会的和任何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因而没有遇到来自他们的相应反击。许多最有影响的专家在这个反

革命工作中不仅同原矿业主,而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间谍机构有联系。最后,在这些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的圈子里明目张胆地进行着针对苏联的干涉和战争准备。

文件讲述了首先在煤炭工业区之一的沙赫特地区,然后在顿巴斯其他一些地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事实。在我们工业领域的其他部门很可能也存在着这种破坏活动的事实。只要回忆一下在索尔莫夫斯克工厂、在列宁格勒、在布良斯克、在巴库等地组织的纵火就够了。尽管存在这些以及类似它们的最危险的破坏活动的事实,我们仍然拥有逐年增多的建设领域的成就,这就说明了苏维埃政权内部是异常牢固的,我们苏联的工业有健康发展的基础,工人阶级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能粉碎散布在我们经济组织中的敌对势力的毁灭性行动。很清楚,如果没有这种恶毒的怠工以及无休止的蓄意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企图,这一建设的成就会大得多。

另一方面,清楚的是,暴露出来的阴谋揭示了我们本身的工作中、经济工作人员以及工会组织、党组织、工农检察院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工作中存在的触目惊心的缺点。正是这些使得我们的负责工作人员的革命敏锐性和共产主义警惕性变得迟钝了,使得苏维埃政权的死敌多年来敢于在“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的鼻子底下推行其不断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筹划军事干涉的政策。

十分明显的是,沙赫特地区的共产党员经济工作人员们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俘虏,成了这些凶恶的破坏分子的所有计划、建议和想法的沉默寡言的记录员。看来,共产党员经济工作人员们已经忘记,资产阶级专家,首先是原资本主义公司原来的股东,是与工人阶级敌对的阶层,不对这样的专家进行不间断的监督,就无法领导他们;要对这样的专家进行不间断的监督,就必须对整个这一阶层有一种起码的、健康的、共产主义的不信任;缺乏这种不信任,共产党员经济工作人员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变成资产阶级专家们的尾巴的风险。很清楚,所谓敌视非党专家的态度是不分哪些是诚实的专家工作者,哪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分子而且必须同他进行坚忍不拔的和顽强的斗争,上述情况不能成为对这种态度进行辩护的理由。但是,在同敌视非党专家的态度作斗争以及向专家们学习并力争逐渐吸引他们到自己这一边来的同时,经济工作人员共产党员应该警惕地和有效地监督资产阶级专家的工作,一刻也不能忘记,他自己最终应成为这一经济机体的真正的领导人,他所要掌握的不仅是行政工作,而且还有生产技术方面的事务。现在,党的方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是在工作的全方位上,既在行政组织方面也在纯技术方面,都要用红色的无产阶级专家

替代来自资产阶级专家营垒的无产阶级事业敌对分子。同时必须特别关注尽快地通过大学培养无产阶级的技术工程人员,并且对经济行政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中央确定,工会工作人员远没有达到形势所要求的高度。他们让搞阴谋诡计的工程师们得以对整个工厂和矿区实现了自己的反革命计划。他们放任了资产阶级专家对工人的公然戏弄,发生了从住房建设上的怠工到在矿井里殴打工人和使其窒息等事件。这说明工会组织是极其软弱的,他们脱离了生产,对生产,特别是对工人群众的迫切需要缺乏起码的敏感。很清楚,消除这些缺点是消除文件中指出的各种不成体统的做法的第一步。

中央接着指出,党的组织本应该最坚定地坚守岗位,有义务改正经济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的错误,但它们对此完全熟视无睹。它们装着既“没有发现”资产阶级专家们的反革命政策,也“没有发现”经济工作人员的错误。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请党组织注意沙赫特地区资产阶级专家们不能允许的行为,所以党组织的错误就更加严重了,对它们的缺点的评价也应该更加严厉。完全清楚的是,这种状况是一个信号,说明存在着远远超出沙赫特地区范围的、带有普遍性的危险。毋庸赘言,如果不立即消除党的组织的这些令人发指的缺点,就谈不上同反革命的怠工者和危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进行严肃斗争。

最后,中央确定,工农检察院机关没有及时地提出文件中指出的那些缺点的问题,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当然也就迟迟未能揭发这个极其重要的阴谋。中央在指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该局驻北高加索全权代表处、叶夫多基莫夫同志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经济局长佐诺夫同志在揭露阴谋中做出的毫无疑问的贡献的同时,不能不指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在揭露阴谋上迟了一步。

粮食收购领域的困难迫使党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它们既改进了粮食收购的工作,也改进了党在农村的工作。毫无疑问,沙赫特案件要求党也要这样去介入和检查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工作,以及党的机关本身的工作。毋庸赘言,同在粮食收购领域里一样,党在这方面也将会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事实是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而反对派被打得落花流水,这一事实为消除上面指出的经济建设领域中的缺点提供了最有利不过的条件。没有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做好粮食收购工作。这一事实无疑将使我们能够动员党的力量去消灭反革命破坏活动。检查我们党的机关与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接近程度;检查我们的工会机关对工人群众的需求和对我们工业的需求的敏感程度;从培养我们的红色专家干部的观点出发检查我们的经济机构;从吸引数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参加社

会主义建设的观点出发检查党和苏维埃机制各个杠杆和螺丝钉，——这就是最近的任务。

中央通报，它任命了一个特殊的委员会，要针对我们的建设工作的所有领域制定出消除上述缺点的实际措施。

中央通报，沙赫特案件将受到法院审理，诉讼过程将具有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这一点必须用来：

- 1) 直接吸引数百万工人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2) 分化技术知识分子和保障技术知识分子中所有的可靠分子向苏维埃政权靠拢；
- 3) 动员广大的工人群众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把所有共产党员的注意力都动员起来保卫我们的工厂和矿山，使之不受工人阶级的敌人的侵犯；
- 4) 消灭沙赫特案件中暴露出来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 5) 最后，加强全党和工人阶级对培养可靠的红色专家干部工作的重视。

联共(布)中央
1928年3月7日

苏 联 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1928年3月2日

3146号

绝 密

附在“概述”卷宗上的送件函*
致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机构破获了长年来在国营

* 保留了原文的拼写。——编者注

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活动的强大的反革命暗害组织。由于上述案件超出了该地区的范围，它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在哈尔科夫（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局）、莫斯科（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进行侦查，我们下达了命令把对该案的侦查集中到莫斯科，因为从该案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组织领导的暗害活动不仅存在于我们的煤炭工业，而且还存在于我国经济的其他部门。

事件的实质是：

在顿涅茨克—格鲁舍夫斯克、弗拉索夫斯克、涅斯维塔耶夫斯克、谢尔比诺夫斯克、戈尔洛夫卡矿区，以及在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局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个组织多年以来一直在系统破坏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经营活动。

该组织的活动从波兰（德沃尔然奇克，顿涅茨克—格鲁舍夫斯克矿业局过去的股东）和德国（什卡夫，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矿业局股份公司原主席；奥尔巴赫和伊格纳季耶夫，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矿业局原股东；以及“罗比特”（Робит）股份公司的一些成员和帕拉莫诺夫）通过莫斯科的（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哈尔科夫的（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中心进行指挥。来自德国的任务是通过出差在境外的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工程师得到的和来苏联的德国公司的专家（来自“А. Е. Г.”公司的迈尔、奥托、韦格纳，来自“Ф. 蔡费尔特”（Ф. Зейферт）公司的魏斯特列尔和来自“克纳普”（Кнапп）的科斯捷尔和巴德施基倍尔^①）转达的。从境外——波兰和德国得到工作用的资金。

该组织给自己提出了广泛的任务，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任务也各有不同。1919—1920年的任务是在红色分子撤退时，在过渡时期，完整保存矿区的财产和设备，但是后来该组织的纲领变得更广泛了。

“……早在1925—1926年就已经提出了另外的问题——通过在境外获取无用资产、不合理地投入资本并阻碍其周转、降低产品质量、提高产品成本、增加煤的含灰量等办法危害苏维埃政权——通过这些办法首先使交通受损并减少了在境外的竞争能力，等等。所有这一切的目的不仅是要破坏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经济，而且还要破坏苏联其他的工业。这里说的已经不是为老主人保存

^① 该姓名以3种不同的拼法（Байштыбер, Бадштыбер, Байштыбер）在文中出现，但从前后文可以断定指同一人，故统一采用了一种译法。——译者注

财产的问题,而是对苏联经济的直接破坏。”(工程师 H. H. 别列佐夫斯基的供词)

随着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专家和国外的联系更加充分,随着局势的变化,由于意识到自己有力量,而且几乎完全可以不受到惩罚,该组织在 1926 年末根据国外的指示,对各种得失做了重新估价——修改、补充了组织的纲领并使之与可能发生的对苏联的武装干涉结合起来。该组织的活动有了新的规模,包揽这种活动的计划应该在 1928 年从国外送来。该组织已经给各个地方下达了具体任务,要制造大型事故,要让大型设备(锅炉、电站、涡轮机等)停顿,但是暂时还没有规定完成的期限,工程师别列佐夫斯基是这样描述该组织第三阶段的工作的。

“……我认为,从把我们的整个活动与对苏联的武装干涉联系在一起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工作的第三阶段是从 1927 年开始的。第三阶段就是有没有可能进行干涉的问题。针对这个阶段应该得到更准确的指示。我们已经为武装干涉可能发生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地方上的每个人都需要周全地考虑怎样才能破坏企业的活动,也就是说,停止它的独立活动。

因为煤炭是整个经济,首先是交通、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基础,我们实质上是提出了在武装干涉期间破坏苏联整个工业的问题。给地方上下达了任务,要寻找进行大规模破坏活动的可能,也就是说要让基本的设备、锅炉、涡轮机停产,要把开采的速度马上降下来,从而引起整个经济的危机。对矿井造成的打击应该是让它们在这之后还能够恢复起来——矿井不应该彻底被破坏。第三阶段的任务可以归结为迅速和有力地降低国家的国防能力。除此之外,这里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任务,那就是在矿井回到白军手里的时候,要保存它们的价值免遭可能遇到的破坏,应当采取措施让这些矿井不至完全消失,因为在白军来到时,原来的主人应该不至于面对一堆废物”。

为了实现提出的任务,该组织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在顿涅茨克—格魯谢夫斯克、弗拉索夫斯克、涅斯维塔耶夫斯克矿业局,该组织通过一系列措施对工人施加了影响并推动他们参加了反对苏维埃政权、党和工会组织的行动,引起了骚动和罢工。为此,在工作时破坏了矿业安全的所有规则。矿井的通风设备本来就不够用,还遭到了故意破坏。广泛系统地采用了对完成的工作进行错误的评估和错误的测量、克扣工人的工资等做法。对工人的住房故意不予修理,任其逐渐倒塌。即便是修理和进行新的建设,也是故意地使坏。对工人们的态度粗暴到了不能容许的程度,甚至对他们进行殴打。据

一些被指控人供认,专家们的这种活动不仅引起了工人的不满,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导致了罢工。1922—1924—1926年和1927年发生的一系列罢工都是故意制造的。

用大量的款项在国外采购完全不需要的设备。规定的订货完成期限要么早于要么晚于必须完成的时间,所以,大型机器从国外运来都比临时存放它们的场地建成的时间要早。答应要给各个矿井新的设备,那些矿井就不特别注意维持老的设备了——设备遭到破坏,新的设备又迟迟不来,——矿业局就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实际的做法还有发来并不需要的设备,而扣押必需的机器部件和各种部件在不同的时间发来。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最终发生的是顿涅茨克国营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的大量资本不能启动。

该组织故意不正确地使用设备,割煤机的工作组织得让这些机器不能完全发挥经济效益。那些适合于在硬层面工作的割煤机被派去开采软煤,反之也一样。在同样的工作条件下,把各种不同的系列和品牌的机器集中在一起,这就需要有大量备件和大量多余的专业技术工人力量,导致了开采量的减少,维修费的大量支出,等等。在锅炉和电力方面的破坏活动主要表现为在最大限度地耗费燃料、劳力和资金的条件下得到最小的效益,也就是说,尽可能地少产出电力。

参加了该组织的工程师还直接从事破坏机器的活动。据工程师切尔诺克尼日尼科夫、别列佐夫斯基、巴什金、巴边科、萨莫伊洛夫和采矿工长加夫里申科等人的供认,他们都直接破坏过机器,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大大小小的事故。例如,加夫里申科就故意损坏过卷扬机,曾企图烧毁弗拉索夫斯克变电站的变压器和设备等,工程师切尔诺克尼日尼科夫用从锅炉里抽水的办法弄坏了涡轮机。根据“A. E. T.”公司代表韦格纳布置的任务,工程师巴什金破坏了起重机。总的来说,该组织造成了数百起事故。

该组织佯称要搞合理化,故意进行一些给经济带来巨大伤害的工作。据巴什金1928年1月16日供认,在阿尔乔姆矿,装配的电力运煤机非常容易损坏。在那里,煤炭运输的合理化被搞成了除了把运输设备打碎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在第2号矿井,B. H. 萨莫伊洛夫进行了一系列并不需要的工作,或者是带有破坏性的工作,给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通过加速倒车和马虎的支撑故意造成了倒塌。故意每天把大量煤炭留在地下不运出来。在采煤的时候采用美国的“叉件组合”进行了巨大的破坏工作。只有在坑顶牢固、支撑良好的情况下才可以采用这种工作系统。在“A”区没有这些条件。该组织的这种活动造成了巨大

亏损。

该组织故意让一些不能赢利的矿井(“克拉斯年卡亚”、“伏龙芝”、“塔戈罗”和“泽姆利亚奇卡”矿)投产,光它们的恢复就消耗了60多万卢布,而采煤量却微乎其微(500万),什么地方也都用不上,销售不出去,每年带来的亏损超过了15万卢布,还不算本可以在主要矿井上使用的机械和劳力的工作。

故意搞垮矿井: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业局(原波波夫卡矿)的克拉辛通道,弗拉索夫卡的第五矿井。淹没了新亚速矿和企图炸毁沃罗夫斯克矿。该组织淹没了许多最富有的矿层。例如,“十月革命”矿的第二矿层,第二矿井的东翼,沃罗夫斯克矿的第二矿层的一部分,“世界公社”矿——深矿层等,把矿石运出来就用了(更确切地说是压了)5—7年。其中只有沃罗夫斯克矿和“十月革命”矿抽出了水,但是在这些矿里至今还没有进行作业。还有大量其他的类似情况。

根据一些被逮捕的人的供认,预计要向苏联投放武器。一些没有经过检查的证据表明,确实有这样的指示,要从国外投放资金,在哥萨克地区组织暴动队伍。

有意识形态和物质方面的刺激促使专家们完成自己原来主子的命令和委托。该组织的工程技术人员几乎可以经常地每月得到额外奖赏,通常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除此之外,如果完成个别的委托,还能一次性地得到100—500卢布的报酬。工程师别列佐夫斯基自己就供认,他曾经给科尔加诺夫(顿涅茨克国营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矿业局总工程师)、库兹马(弗拉索夫卡总工程师)等人大约20万卢布的工作经费。别列佐夫斯基从这些钱里给自己留下了2万卢布;工程师巴什金供认,在各个不同的时间,他因为从事破坏活动,从戈尔列茨基、别列佐夫斯基、科尔加诺夫和库兹马那里得到了1.6万—1.7万卢布。在该组织里工作的专家姓名被通知到国外,在那里至少给主要人员 in 银行里存入了大量款项,作为在苏联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奖赏。

为了更充分地向您介绍这个事件,我们给您附上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权代表处就苏联监察委员会编写的沙赫特区经济反革命事件综述。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 Г. 亚戈达

莫斯科,1928年3月2日

绝 密

关于南部煤炭工业区的经济反革命事件综述的引言

对在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业局工作的专家们的长期观察以及对大量损坏和事故的仔细分析表明,在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业局有一批对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经营活动进行破坏的专家。

在进行破坏活动的这批人中有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业局前股东及其亲属和过去工作过的专家们。参加的有:工程师安东诺夫、科尔加诺夫、谢科赞、E. 科洛杜布、K. 科洛杜布;技师 A. 科洛杜布、加夫里申科、瓦西里耶夫;工程师萨莫伊洛夫、别连科,即 5 个股东、6 个亲属和 11 个因物质利益、亲属关系和朋友圈关系有关的人。

这批人的思想基本上是君主主义的,但参加的人中间更多的是左倾分子。至少该组织中没有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左的人。

加夫里申科在 1928 年 1 月 29 日的供词中确定这批人的思想有以下特点: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有君主主义者,有立宪民主党人,总之,这是各种派别的集结——混合物。他们必须做到的只有一点——推翻苏维埃政权并取而代之地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从被告工程师——加夫里申科、巴什金、巴边科等人的最新供词中可以认定,这批在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业局工作的破坏分子只是囊括整个顿涅茨克国营煤炭工业联合公司、按照国外的指示进行工作的强大的反革命组织的一个分支(见概述第 12—13 页*)。

二、“破坏者”的反革命组织

组织的中心在国外。参加该组织的有一系列德国公司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原

* 原文页码 ——编者注

股东们。参加该中心的人中，著名的有：帕拉莫诺夫和什卡夫。加夫里申科在1928年1月29日的供词中把该组织的任务确定为：

“……推翻苏维埃政权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它竭尽所能地利用一切手段进行斗争。这些手段中的一个就是通过贵重矿区生产劣等煤来阻碍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恢复经济、保留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工业岩层、隐藏赢利的矿井和启用亏本的矿井、损坏和不合理地使用机器、在国外采购不需要的设备、——总之，不适当地和没有经济意义地制造大量浪费，让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财政开支陷入困境，造成煤炭短缺、产品成本昂贵以及同时为原矿主保存整个顿涅茨克矿区。”

为了完成任务，在哈尔科夫成立了中心，参加该中心的有工程师：戈尔列茨基、别列佐夫斯基、卡扎里诺夫和杰捷尔。

在矿业局里设有间谍机关的情报点，通常包括主任工程师和一些责任工程师。

例如，参加在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业局中的组织的有：主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萨莫伊洛夫、巴边科、加夫里申科、E. 科洛杜布、A. 科洛杜布、K. 科洛杜布、科斯坚科、别连科、科斯莫达米安斯基等。

同国外的联系通过外国代表巴德施基倍尔、奥托、迈尔等人进行。

外国公司的所有这些代表带来破坏机器、各种装置和涡轮机的任务——破坏活动的任务。从组织成员那里收集各种情报并传往国外。使用密码互相通信（见概述）。

三、把持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业局的工程技术部。

挑选自己的人。共产党员的存活。工人问题

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业局的破坏者们把工程技术部把持在自己手里。参加工程技术部的有：主任——安东诺夫，成员——巴边科、E. 科洛杜布、加夫里申科。破坏者们通过工程技术部挑选自己的人和解雇不称心的人。把忠实于苏维埃政权的所有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都排挤了出去。吸收参加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业局工作的有过去的股东——萨莫伊洛夫、韦列斯库诺夫等人，原来的白匪军官乌萨诺夫将军的儿子等。

在分配奖金和津贴时毫无法律根据，不是发给工程技术部人员，而是发给破坏者组织的成员。

企图通过有组织地对行政管理机构和工会组织施加压力释放被逮捕的工程师别连科。在非法集会上决定抵制任何其他代替别连科工作的工程师。

上述这些人(该组织成员)有组织地通过一系列措施对工人施加影响,推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党和工会组织,煽动骚乱和罢工。

为此目的,在工作时违反矿山安全的所有规章制度。爆破是用最不像话的方式进行的:在很远的距离用手工操作的办法同时爆破14—20个点,这是矿业监督所绝对禁止的。爆破工随时都有丧生的危险。

矿井里的通风根本就不够,还遭到了故意破坏,不让空气进入矿井。工程师巴什金承认,他一下子就烧掉了6个通风扇,工人们难受地放弃了工作。

克扣工人工资,错误地做出评估等等是普遍存在的,就像是成为了规矩。结算时不断欺骗工人,答应给他们发一种工资,而发工资时却采用另外的结算办法,给他们少算,对他们进行侮辱。

这个集团的专家和工人的交往难以想象。通过无数的供词可以确定,在革命前和在白匪占领时期都曾在矿上残酷殴打工人。特别凶狠的是加夫里申科和古泽尔。加夫里申科用铁拳套打工人。命令把犯有过失的红军俘虏锁在工具箱里过夜。就是在苏维埃政权下,也还继续着这种野蛮的和粗暴的、不能允许的对待工人的做法,殴打他们。

工人的住处故意不给修缮,天长日久都损坏了。就连最起码的生活便利条件也不向工人提供。在这种条件下有大批人生病,也发生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抱怨和不满——所有这些最后都在生产上反映了出来。

被告A.И. 乌萨诺夫1927年11月23日的供词表明,第10、13、14、15、16、17、18、19、20、21、23和26号基本工房都遭到了破坏,也不进行修缮,即便是对它们进行修缮或者建新房,也故意不好好搞。恶劣的居住条件造成工人普遍生病,引起他们对党和工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权表示不满和抱怨。

结果乌萨诺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完全搞清楚了,是在有意制造一场破坏性的混乱……所进行的工作是在破坏生产……在建设部所做的工作中,用我在供词中所说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一直破坏着生产。”

专家们的这种“活动”不仅引起了工人们的抱怨和不满,而且也导致了不断发生骚乱,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罢工。根据工程师加夫里申科和巴什金的供认,1922年、1924年、1926年和1927年发生的一系列罢工都是故意引起的。

四、在国外购买不需要的机械。不正确地使用设备。故意破坏挖掘机

根据巴什金和加夫里申科的供词可以确认,这伙工程师通过故意在国外斥巨款购买不需要的设备,给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经济带来了完全无法挽回的危害。在国外订货规定的交货期有的早于必需的时间,有的则晚于必需的时间。大型机器早在需要安装甚至临时存放它们之前就运来了。或者是答应给矿上提供新的设备,于是这些矿就不特别注意维护老设备,致使它们遭到破坏,而新的设备又迟迟不到,有时拖的时间很长,矿业局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往往是不订购相应的设备或者是某些机器的零件在不同的时间送来。也有送来的设备并不需要,而必需的设备却被扣押的情况。经常发生的情况是送来最需要的机器时没有备件。所有这些导致了非常巨大的消耗,对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预算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最终的结果是大量的资本无法启动。

有意使挖掘机工作的组织不能得到在正常安排的情况下本可得到的经济效益。适于在硬矿层工作的挖掘机被派去挖掘软煤,相反的情况也有发生。在一些工作条件下把各种不同体系和品牌的机器集中到了一起,这就要求有大量的备件,大批过剩的专业劳动力,从而减少了开采量,耗费了大量维修费用,等等。

加入了该组织的工程师们不仅不正确地分配挖掘机的工作和在技术上不能合理地使用它们,而且还直接破坏机器。加夫里申科在1928年1月25日的供词中说,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曾布置他完成破坏挖掘机的任务。

在锅炉和电力方面的破坏活动不仅是直接损坏机器,而且主要是最大限度地消耗原料、劳动力和资金,得到最小的效益,也就是说,尽可能少地产生动力。巴什金在1928年1月23日的供词中说,1925年在工程师戈尔列茨基、库兹马和萨莫伊洛夫在场的情况下,科尔加诺夫给他下达了有关整个锅炉运作的任务:决不能让锅炉运作得到发展,以便使矿井没有足够数量的动力排气。发电站也采用了这样的一套做法。

五、打着生产合理化旗号的破坏活动

在生产合理化的旗号下故意进行了给经济带来巨大损失的工作。根据

1928年1月26日巴什金的供词,在阿尔乔姆矿上,电力运出装置被安装得非常容易受损。在那里,煤炭运输的合理化被搞成了除了把运输设备打碎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在第2号矿井,B. H. 萨莫伊洛夫进行了一系列并不需要的工作,或者是带有破坏性的工作,给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

这个集团通过过分的加速倒退和马虎的支撑故意造成了倒塌,故意每天把大量的煤炭留在地下而不运出来。

据1928年1月21日工程师巴什金的供认,在采煤的时候采用美国的“叉件组合方法”进行了巨大的破坏工作。只有在有牢固的矿顶和良好的支撑的情况下才可以采用这种工作系统。在“A”区没有这些条件。造成了巨大的亏损。

在沃洛夫斯基矿上,虽然有正确制定的计划,但实际上工作进行得并不正确。矿长加夫里申科进行了单翼工作,导致了第一矿层的一个区发生断层,加大了产品的成本。

还进行了一系列其他的破坏工作。

六、故意隐瞒富矿层和有赢利的矿井

萨莫伊洛夫在“十月革命”矿所做的工作是为了保存主要的矿层,加强东侧一号矿层的开采,但对西侧矿层的开采要少得多。而所有的材料都说明,本该加紧对西侧矿层的开采。萨莫伊洛夫是了解这两翼矿层的状况的。

扎瓦茨基和加夫里申科分别淹掉了“Ц”和“Б”两个区,加夫里申科在三年之内故意未对这个区抽水。加夫里申科承认了。

帕拉莫诺夫在卡德莫夫卡河打下了3个矿井的基础。发现了22—24俄寸厚的优质煤矿层。矿井是在战前开始生产的,但是后来被中断了。库兹马和奥夫恰列克知道这些矿井,但勘察完全是向相反方向进行的。目前在卡德莫夫卡的所有井眼都由于无人看管塌陷了。

革命前,在格鲁谢夫卡河边计划充填大矿井以便整出位于下面的地。这块地有两个矿层,即“格鲁谢夫斯基”和“雷赫雷依”。这里的储量被确定为3亿普特。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业局的所有专家都知道这些情况。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关于这个项目的议论由于专家们的普遍看法而停止了。

第5号矿井遭到了专家们的蓄意破坏,尽管它有丰富的生产潜力。从质量

上来说,这是区内最优质的煤之一。

这批专家蓄意遮蔽了贝塞尔格涅夫斯克矿。对贝塞尔格涅夫斯克矿产地的勘察工作曾得到良好结果。矿井是用粗大的混凝土浇灌的井筒打得结结实实的。被审讯的别连科交代了以下供词:

“……按矿层走向和对矿产品位的调查,这个矿预计年开采量为3 000万普特。而且过一段时间它也不会比一级矿井‘阿尔乔姆’逊色……所有这些前提条件和不愿意动手开采贝塞尔格涅夫斯克矿都使人有理由认为,该矿被留下是带有某种目的的。”

鉴定证实了贝塞尔格涅夫斯克矿的价值。

萨莫伊洛夫在“十月革命”矿没有足够的理由就开始开采早就知道是亏本的雷赫雷依矿层。现在在雷赫雷依矿层开采出来的是搀杂着黄铁矿的煤。挖出煤来要比其他矿层昂贵得多。在恢复雷赫雷依矿层方面不合理地浪费了大量的资金。

在具有像贝塞尔格涅夫卡这样的几乎已经完工的基本矿的条件下,以科尔加诺夫和其他工程师为代表的矿业局故意开辟了新的不赢利的矿。“阿尤塔”就属于这样的矿。“阿尤塔”的开凿是在没有经过地质调查,纯粹根据原矿业主马尔琴科的指示进行的。该矿井是打在了技术力量使不上的矿层狭缩处,打在有許多水的沼泽地和泉源上。管理局把“阿尤塔”淹了。

七、蓄意损坏机器

沃罗夫斯基矿矿长加夫里申科伙同机械师利托夫琴科多次制造筛分事故。加夫里申科蓄意毁坏卷扬机(绞车)和西蒙诺夫卡卷扬机。他还企图烧毁沃罗夫斯基矿的变压器和弗拉索夫卡变电站的设备。

在弗拉索夫卡,按照来自国外布置的任务,工程师巴什金烧掉了6个通风机和进行了一系列其他破坏机器的活动。巴什金在1928年1月23日的审讯中供认,A. E. Г. 公司代表迈尔蓄意毁坏了电站的起重机,从那里取走了开口销,如果不是机械师及时地进行了检查,就会发生灾难了。

在“十月革命”矿区,工程师切尔诺克尼日尼科夫从锅炉把水抽了出来,毁掉了涡轮机。水流到了涡轮机里并使7个涡轮叶片皱成一团。涡轮机的停止使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业局的所有矿井受到被淹的危险。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才得以铺设了到弗拉索夫卡的线路。涡轮机的毁坏至今一直在影响着顿

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业局的生产。

在安装了新的涡轮机之后,弗拉索夫卡的工作被蓄意拖延了几个月。故意不正确地安装了涡轮机。被捕的加夫里申科有如下供词:

“……新的涡轮机是要在 15 个大气压、蒸气加热到 350 摄氏度的条件下安装和使用的;而为涡轮机服务的电站锅炉的压力低于 12 个大气压,蒸气只能加热到 300 摄氏度;对于涡轮机的正常工作来说,还缺少 3 个大气压和 50 摄氏度。当负荷达到 5 000 千瓦时,涡轮机便开始降低转速,压力开始下降。只要是压力稍微下降 1—2 个大气压,这样的现象就会发生。于是,安装新的涡轮机就得不到完整的结果。所以它是在蒸气的湿度低于规定标准的情况下工作,就有相当快报废的危险。它是从德国的‘A. E. T.’公司采购来的。”

被捕的工程师巴什金指出,涡轮机是被人故意错误地采购和安装的。

有意思的不仅仅是涡轮机被不正确地安装的事实本身,而且迈尔还从国外带来了破坏刚刚安装好的涡轮机的任务。巴什金证实,迈尔带来了立即破坏新涡轮机的任务。

八、蓄意使矿井爆炸、塌陷和淹没

克雷连柯矿,也就是过去的马卡里耶夫斯克矿,是区里最优等的矿之一。煤的质量是顿巴斯地区最好的。煤产量在革命前为每昼夜 2 万普特。1917 年,该矿被蓄意淹没并一直没有抽水,也就是说,抽水后又重新被淹没。该矿彻底被淹没是在 1927 年底至 1928 年初。

克拉辛矿,也就是过去的波波夫卡矿,是“破坏者”组织刻意要毁掉的矿。该矿是由工程师别连科领导的,当他们和加夫里申科一起查看该矿,发现那里有大水泵和流沙的时候,加夫里申科马上把这个情况通知了科尔加诺夫,他们决定通过用木料来取代砖或水泥加固的办法来使该矿塌陷。但该矿的井眼并未塌陷,因为流沙的压力比他们所期望的要小,可是矿井井眼歪了。

沃罗夫斯基矿是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业局的主要矿之一。为了使它停产,有人曾试图把矿炸掉。为此在坑道支架上安放了 3 普特黄色炸药。由于工人们偶然发现了炸药,爆炸没有发生。在他们第二次试图引爆时,同样由于这种偶然性,爆炸也没有发生。

还是这批专家淹没了新阿佐夫矿。该矿曾可指望每年产煤 1 000 万普特。煤的质量良好。煤矿设备完好并预计有 20 年的开采期,有着美好的前景。把该

矿淹没的工程师巴边科在1927年12月12日供认如下：

“当时有反苏倾向的别列佐夫斯基建议我把矿淹没是为了减少煤产量，其目标是危害苏维埃政权，这正是在共和国最急需煤的时候。我那时的想法与别列佐夫斯基一样，我同他商定通过抬高水泵淹没了第二井眼和第二矿层。这样该矿的停顿便是肯定无疑了，它被列入了在顿巴斯销毁该矿的命令之中。”

九、故意投产非赢利的煤矿

“克拉斯年卡亚”矿。

从大量证人的证词和被告的供词以及技术鉴定证书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投产“克拉斯年卡亚”矿在经济上是不适宜的。把为恢复“克拉斯年卡亚”矿所花掉的资金用来投资诸如新阿佐夫矿区或贝塞尔格涅夫斯克矿等其他矿可能要更划算得多。

由矿区领导人——工程师若尔科夫斯基、专区技术检查员——工程师斯帕谢维奇、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业局代表——工程师切连科夫、热力工程专家——工程师霍达列夫、机器设备安装专家库切尔、矿长沃尔科夫、联共（布）党支部书记巴拉诺夫、矿委会主席希罗科夫、工人代表梅什科夫、波诺马连科、希申科夫和挖掘机检查员波诺马廖夫组成的鉴定委员会查明：

“……‘克拉斯年卡亚’矿的所有有用矿层已经挖尽，只有部分疏松的矿层在运作。A.科洛杜布在1926年使该矿投入生产，在得知该矿的有用矿层已被挖尽之后停产的也是他。该矿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经济效益。它在整个生产期间耗费的资金不可能得到回收。该矿生产的煤毫无用处，其质量十分低劣。”

该委员会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直接的经济反革命或者是用心险恶的、近似于有预谋的经营不善行为。”

伏龙芝矿——原斯拉京矿

由沙赫特矿区工程师加兰吉^①、工程技术处代表——涅斯维塔耶夫斯克矿业局负责安全的工程师莫勒、彼得罗夫斯克矿业局副总工程师——矿业工程师

^① 该名在文中有两种拼写（Галадж 和 Галандж），但为同一人，故用统一译法。——译者注

萨哈罗夫、专区技术检查员——矿业工程师托皮林、联共(布)党支部代表、“克拉斯年卡亚”矿矿长博洛戈夫、矿业委员会代表贡恰罗夫、工人代表特韦尔多赫列博夫组成的鉴定委员会查明了该矿的状况类似“克拉斯年卡亚”矿。

“……没有任何意义对它进行恢复,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可能收回其耗费的资金。伏龙芝矿如同‘克拉斯年卡亚’一样,过去和现在只能造成亏损……煤质量不好。没有销路”。

“泽姆利亚奇卡”矿

由上述人员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还调查了“泽姆利亚奇卡”矿。调查结果如下:

“为恢复耗费了93 000卢布。这些资金不可能得到回收,该矿亏损。煤质量极差,也没有销路……该矿的一切材料与‘克拉斯年卡亚’矿和‘伏龙芝’矿相似。”

“塔戈罗”矿

上述鉴定委员会在调查“塔戈罗”矿时查明:

“……由于该矿亏损,今年春天矿业局自己将其关闭。其耗损资金得不到回收。很难确定已有的煤储量,但根据矿业局的材料,截至今年9月为9 310吨,其质量得不到保障。”

被捕的加夫里申科在其1928年1月26日的供词中证明如下:

“……原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的破坏性工作表现在:1)在‘十月革命’矿投产疏松矿层,除其产品没有销路外,挖掘费用昂贵也使企业的得利减少;2)投产同样是挖掘疏松矿层的‘克拉斯年卡亚’矿;3)投产同样是挖掘疏松矿层的原斯拉京矿;4)投产同样是挖掘疏松矿层的原塔甘罗格斯克联合公司的矿。各种煤层的煤在含大块煤30%的情况下的平均售价不超过17戈比,而开采成本往往不少于20戈比,如果开采500万普特,矿业局最少要承担1.5亿卢布的亏损,还要加上用于电力装备和可以加强开采优质的和更便宜的煤炭的矿井机械化的机械租赁费用。”

委员会得出了非常有意思的结论,指出各项工作对生产具有破坏性。委员

会在做出这些结论的时候,对被告人的供词还没有概念(上述供词当时还没有,因为被告人在当时还没有招供)。

委员会得出的结论说,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安德烈·科洛杜布和矿业局采矿科在开采“克拉斯年卡亚”、“伏龙芝”、“泽姆利亚奇卡”和“塔戈罗”等矿的问题上是有罪的。所花费的这些资金本可以用来恢复新阿佐夫矿区和发展“U”区“无产阶级专政”矿和“沃罗夫斯卡”矿井第二矿层的工作,这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关于这一点矿业局及其领导成员不会不知道。

鉴定书说,“克拉斯年卡亚”、“伏龙芝”、“泽姆利亚奇卡”等小矿虽然亏损,但工作状况还是可以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沃罗夫斯卡”、“克拉辛”等矿井,工作无计划、经营不得法,破坏了生产。鉴定委员会确认,矿业局不顾“克拉斯年卡亚”、“伏龙芝”、“泽姆利亚奇卡”等矿井的明显亏损,煤炭大量积压、无销路,制定了再开采这些矿井五年的规划,也就是说,一直到1933年。

十、被告人进行破坏活动的简况

1. 加夫里申科, H. A. ——白卫军统治时期曾在反间局供职,他出卖的工人被枪杀。他经常殴打工人。被揭发有受贿行为。故意制造大量事故和各种破坏机器的活动。一贯进行破坏我国经济的活动。

2. 科尔加诺夫, H. E. ——顿涅茨克—格鲁舍夫斯克矿业局总工程师,领导了顿涅茨克—格鲁舍夫斯克矿业局的全部破坏活动。同哈尔科夫中心联系密切。接受过国外的任务。根据加夫里申科的供词,他通过工程师库兹马向波兰传递情报。

3. 瓦西里耶夫, Ф. Т. ——曾参加过孟什维克,曾是小矿产主,在白卫军占领时期是农村的匪首,匪首库丘姆的助手。对工人极其粗暴,殴打工人,曾被一个矿井解职,因为工人想把他用独轮推车推走。现有共产党员 Г. М. 杰尼索夫 1927 年 12 月 16 日控告 Ф. Т. 瓦西里耶夫是挑唆者的证词。

4. 科洛杜布, E. ——在白卫军统治时期曾在反间局供职,自己掏钱为反间局的办公地点安装设备。切尔尼佐夫是著名的白卫军游击队队员,曾在他家里逗留,1919 年被红军枪毙。革命前曾驱散过工会。在担任工厂技校校长时曾组织过学生罢课。

5. 巴边科, C. A. ——K. H. 克拉季科 1927 年 10 月 27 日供认:“我在反间局

不止一次见到过C. A. 巴边科。巴边科那时是马卡里耶夫斯克矿井主任,准确些说,主管过萨莫伊洛夫矿区。C. A. 巴边科和科洛杜布一样,同反间局所有领导人的关系都很好,无疑他向反间局提供了有用的情报”。

6. 科洛杜布, A. ——“克拉斯年卡亚”矿井原来的股东。在白卫军统治时期与反间局有联系。在革命前驱散过工人群众的集会和工会。在无烟煤工业公司的工人当中安插过暗探。由于他对工人粗暴,引起工人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一名工人曾要暗杀他。他曾命令木工把悬挂在木杆上的苏维埃旗帜撤下来撕成碎片。在十月革命节时不让制作红五星。在庆祝十月革命节时,命令把悬挂在“阿纽塔”矿上的红旗撤下来,说:“把这块红布撤下来,别让它在那里飘动”。

7. 列佐夫斯基, H. H. ——无烟煤工业公司的原股东。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破坏活动的领导人之一。淹没新阿佐夫卡矿井的发起人。企图炸毁“沃罗夫斯卡”矿井的发起人之一。

8. 萨莫伊洛夫, B. H. ——曾为矿业主。试图爆炸“沃罗夫斯卡”矿井的组织者之一。他同科尔加诺夫一起领导了顿涅茨克—格鲁舍夫斯克矿业局的破坏活动。

9. 普里亚诺夫, П. Я. ——沙赫特反间局的内线, 1927年12月22日供认:“我在沙赫特反间局做了5个月的内线和警卫。在这段时间内,我看到原来的矿主瓦西里·尼基福罗维奇常常在白天和晚上到反间局来,同反间局局长普鲁坚托夫或者他的助手莫纳斯特尔斯基或者副官马克斯谈话”。

10. 科洛杜布, K. ——矿业主的儿子,采矿工程师,当过白卫军军官。他说过,苏维埃政权不让他过安静生活,苏维埃政权不会持久,他不想为这个政权服务,也不想为这个政权工作。

11. 利托夫琴科——参加过红军,投靠过白卫军并把密令交给了谢米列托夫将军。谢米列托夫的军队按照他的指引攻占了沙赫特矿场,在一个矿井砍死了90名工人,在另一个矿井砍死了近300名工人。怀疑利托夫琴科曾在白卫军的反间机关供职,但侦查结果尚未确定。

12. 乌萨诺夫——将军的儿子。在白卫军统治时期曾在白卫军服役。在搜查时发现他有可疑地图和黑帮传单。他承认,他曾破坏了委派给他的工作。

其他被告人的破坏活动情况也大致如此。

结 论

(见概述)

绝 密

南部煤炭工业区的经济反革命案件概述

—

经过对工作在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专家长期观察,我们得出如下结论:部分专家相互联系紧密,正在从事反对苏维埃的活动。对很多破坏活动和事故的详细分析表明,所有这些事情大都发生在一定的人中间。所有这些资料迫使我们最为严重地关注这个专家集团的活动,并把其中一部分人从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开除。

一系列证人的证词和犯人的供词证实,在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工作的专家从事破坏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活动。

从事破坏活动的专家集团的成员有,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前股东及其亲属和以前同他们共事的专家。在1919年以前的各个时期,在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工作的人有:

1. 戈尔列茨基、拉比诺维奇和什卡夫,前格鲁谢夫斯克无烟煤公司的股东;
2. 叶梅利扬·科洛杜布,该矿(当时称格鲁谢夫斯克无烟煤股份公司)经理,他也是克拉斯年卡亚煤矿和无烟煤工业公司的股东;
3. 叶梅利扬·科洛杜布之弟安德烈·科洛杜布,克拉斯年卡亚煤矿矿长;
4. 康斯坦丁·科洛杜布,叶梅利扬·科洛杜布的儿子,在别谢尔格涅夫卡煤矿工作;
5. 2号矿井采矿工长加夫里申科是叶梅利扬·科洛杜布的亲戚;
6. 巴边科在2号矿井工作,是叶梅利扬·科洛杜布的亲戚;

7. 萨莫伊洛夫在克拉斯年卡亚煤矿工作,他是这个矿的股东、无烟煤工业公司的股东,叶梅利扬·科洛杜布的亲戚;

8. 韦列斯库诺夫是无烟煤工业公司的股东;

9. 技师科尔加诺夫在科洛杜布领导下的彼得罗帕夫洛夫卡矿井工作,他是叶梅利扬·科洛杜布的密友;

10. 巴什金在科洛杜布领导下的彼得罗帕夫洛夫卡矿井工作,他是工程师,与叶梅利扬·科洛杜布的关系亲密;

11. 瓦西利耶夫在加夫里申科领导下的2号矿做采矿工长(1918年他曾是一个小矿的矿产主);

12. 技师科斯莫达米安斯基,在股份公司工作,H. H. 别列佐夫斯基是彼得罗帕夫洛夫卡矿井的工程师;

13. 波波夫,科洛杜布的熟人和下属,是彼得罗帕夫洛夫卡矿井和2号矿井的工程师;

14. B. H. 纳希沃奇尼科夫,布拉戈维申斯基矿的采矿工长,是叶梅利扬·科洛杜布安插的人;

15. 谢科赞,叶梅利扬·科洛杜布的密友,在矿山区作工程师;

16. 总起来看,在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工作的所有专家中,有7人是股东,6人具有亲属关系,17人是密友;

17. 从1919年起,在同一个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工作的还是那些人:科尔加诺夫、谢科赞、E. 科洛杜布、K. 科洛杜布、A. 科洛杜布、加夫里申科、萨莫伊洛夫、别连科、瓦西利耶夫、纳西沃奇尼科夫和两名新专家:安东诺夫和乌萨诺夫。也就是说,我们在矿务局又看到了那些人:3位股东,6位亲属和13位亲朋好友。其他人,部分跑到国外,部分在顿涅茨克国营煤炭联合公司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找到了工作。

这个集团的思想非常明确地显示在犯人的口供里。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具有君主主义信念的人,但也有比较左的。在这个组织里几乎没有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左的人。

对于自己的政治信仰,被告人科斯莫达米安斯基做了如下供述:

“老的君主主义我当然不能承认。它是德国人的傀儡。只有了解俄国的君主,了解俄罗斯人民需求和俄罗斯人中产生的君主才配得上管理俄国。我宁肯要全体俄罗斯人民和所有阶级实行选举原则,而不要老的君主主义。热爱俄罗斯的俄罗斯人中间产生的君主才配得上管理俄罗斯。老的君主主义,或者

确切些说是它的代表人物,我不再喜欢了,因为它没有能力有意识地同德国作战。”

对于您如何对待犹太人、您是否认为犹太人是俄罗斯人民的敌人这个问题,科斯莫达米安斯基回答说:

“……犹太人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竞争对手。对此,我不喜欢。犹太人总是竭力要占据远离危险的职务。他们不到俄罗斯军队里当兵。现在,高等学校里充斥着犹太人,而他们都坐在责任重大的职位上。对此,我感到不高兴。我认为,犹太人应当自己成立一个国家。我不喜欢犹太人在俄罗斯横行霸道,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靠边站。很多犹太人在人民委员部和托拉斯里当头头的现象也是不正常的。”

巴什金工程师在他关于破坏活动的供词里也顺便提到了破坏分子的思想:

“……我想起了影响我的、发生在我身边的国内生活的某些事实,我记得,那是在 H. E. 科尔加诺夫那里为什么隆重的事件举行的庆祝晚会上,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很多技术人员都聚集在那里,有 B. H. 萨莫伊洛夫、H. A. 加夫里申科、C. H. 巴边科、H. H. 纳西沃奇尼科夫、科洛杜布、别连科,还有这伙人中的其他很多人,我听到他们幸灾乐祸地谈论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很快就要完蛋的事情……”

他们喝得有些醉了,举起酒杯,祝愿苏维埃政权很快完蛋,他们唱着《保卫沙皇》、《静静的顿河愤怒起来了》等哥萨克歌曲。

采矿工长加夫里申科归纳这个集团的思想有以下特点:

“总起来说,大家对布尔什维克持否定态度。按我的看法,集团的一部分人大概拥护立宪民主共和国,也就是说,主张工业能够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平静地运转,也就是说主张在私有制基础上运转的那种国家秩序。”

加夫里申科在 1928 年 1 月 29 日的供词里更加准确、明确地认定了这帮专家的思想趋向: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有君主主义者,有立宪民主党人,总之,这是各种派别的集结——混合物。他们必须做到的只有一点——推翻苏维埃政权并取而代之地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从被告人加夫里申科、巴什金工程师等人最后的供词可以确认,这帮在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工作的破坏分子只是强大的反革命组织的一个基层组织,这个反革命组织遍及整个顿巴斯,按照国外的指示进行活动。

二、南部煤炭工业区的反革命组织

根据被告人、工程师 H. H. 别列佐夫斯基、A. B. 巴什金和采矿工长 H. A. 加夫里申科尚未充分核实和确认的口供,组织中心在国外,在德国。其成员有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前股东、“罗皮特”股份公司和“弗拉索夫基”股份公司的前股东。眼下具体查明的人员有什卡夫和帕拉莫诺夫。其他人员还没有确定。

上述人员通过从各个公司到苏联出差的德国工程师与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工程师们进行极为频繁的联系。外国专家们带来国外的前股东们给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专家们的任务,而后者按照来自国外的指示或者千方百计阻碍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或者破坏机器。已经确定由国外带来任务的工程师和技师有:从 A. E. T. 公司过来的工程师奥托和安装工迈尔和韦格纳,从“克纳普”公司过来的股东兼工程师科斯捷尔和安装工巴德施基倍尔。

按工程师加夫里申科于 1928 年 1 月 29 日所做的口供,反革命组织给自己规定了下列任务:

“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资本主义秩序。该组织尽可能利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进行斗争。其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各种手段阻碍恢复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生产:在优质煤矿中开采劣质煤、保留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工业矿层、隐藏优质煤矿,开采无利润煤矿,破坏机械,不合理使用机械,在国外购买用不着的设备,一句话,就是使生产耗费巨大,进行不合理的生产,造成生产混乱,使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财政处于紧张状态,使采煤量不足,加大产品成本,同时把整个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矿区留给旧主人。”

从工程师别列佐夫斯基的口供来看,这个组织的任务归结为以下几点:

“1. 隐藏地下的富矿,动用各种手段以各种借口使已经开采的矿井失去开采的基础。

2. 拖延已经开始开采的矿井的掘进速度和开发矿区,而在另一方面,采取措施在国外购买设备(升降机)的大型部件,而在国内要订购设备,形成重复订购,让设备闲置不用。

3. 拖延在当前可能带来好处的设施建设,如拖延选矿场的建设,使煤炭质量恶化,从而破坏需要煤炭的交通运输业和工业。

4. 破坏设施、设备、蒸气动力机车、选矿厂,目的在于破坏采矿和加大产品

成本。

5. 向有关国家散布显示企业生产状况的重要方面、可以断定生产稳定程度的一切信息和数字资料。

6. 针对每一种情况使用不同的手段,在各个企业制造在外国军事干涉期间的全面停工事件,但要做到借助于国外进口设备能够恢复生产。

7. 不拖延住房建设,不拖延代替旧机器的大型机器设备的安装,要搞矿业电气化,目的在于大规模更新设备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

8. 要善于进行破坏活动,不要让人看出来是无缘无故的破坏,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甚至允许进行有害于相关国家的活动。”

为实施上述任务,该组织为进行工作吸收了必要的技术人员,尽量不让下级技术人员和工人知道它的反革命活动。关于这个问题加夫里申科供述了下述情况:

“……高级技术人员通过对下级技术人员和工人施加压力,利用自己的威望迫使他们实施上述任务。所有这些活动是在生产机械化、生产合理化、进行各种必要的完善等等的幌子下进行的。下级技术人员和工人无论如何不能参与组织内部的工作”。

根据被告人别列佐夫斯基、科尔加诺夫、萨莫伊洛夫、巴边科和加夫里申科的供词查明,招募由戈尔列茨基、沙德伦、别列佐夫斯基和科尔加诺夫进行,该组织既从思想上也从物质上激励工作。老主人从国外寄来钱以便支付按其任务进行破坏活动的那些工程师。该组织对其成员用苏联货币支付完成任务费,支付奖励费、出差费、更多的工资等。

根据被捕人员的供词,该组织的中心在哈尔科夫。参加该中心的工程师有:戈尔列茨基、别列佐夫斯基、卡扎里诺夫、杰捷尔。

这个组织在很多矿务局都设有自己的基层组织。基层组织的秘密领导人一般都是矿务局的总工程师,他为自己挑选必要的工作人员。在弗拉索夫卡矿务局,根据巴什金工程师1928年1月24日的供述,参加该组织的有总工程师库兹马,矿井主任兼工程师И. Г. 戈尔洛夫、电站站长П. Э. 日丹诺夫、采矿技师М. Г. 尤特金、建筑技师А. Н. 昆潘和巴什金本人等。

“总工程师Л. В. 库兹马的任务有以下人来完成:(1)矿井主任,矿井破坏工作的进度和破坏工作的完成情况都取决于他;(2)工程师А. Н. 布列季欣,他负责破坏升降机和运输工具;(3)工程师П. Э. 日丹诺夫,他负责让电站工作不正常,发电量不足;(4)技师М. Г. 尤特金,他负责让通风工作,采矿准备工

作和农业工作经营管理不善;(5)给建筑技师 A. H. 昆潘交代的任务是破坏新的建筑工地、新的掘进地段、电站工作,使这些单位的工作运转缓慢、浪费、无序。”

被捕的采矿工长加夫里申科于1928年1月29日交代说,参加该组织的顿涅茨克—格魯谢夫斯克矿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萨莫伊洛夫、巴边科、加夫里申科、纳西沃奇尼科夫、E. 科洛杜布、A. 科洛杜布、K. 科洛杜布、科斯坚科、别连科、尼基申、科斯莫达米安斯基,所有这些人都是高级或中级工程技术人员。

根据工程师巴什金和加夫里申科的指示,工程师们从国外不仅为处于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中心带来了任务,而且还把一系列任务直接转交给了各矿务局的工程师。

他们所转交的任务都直接涉及破坏机器设备、蒸气动力设备和电站设备。他们把完成破坏设备任务和接受他们下达任务的活动费亲自交给各矿务局的专家们。他们散布谣言说,对苏联的军事干涉定在1928年秋季,进行军事干涉的全部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有专门的军队和空军,等等。

该组织成员之间不进行通信联络。不管是在苏联国内,还是在外国,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口头传达必要的任务,情况极其特殊时使用暗号。外国工程师从国外带给苏联工程师的信中写有“帽子”或“雨衣”的字样。为避免怀疑,由外国间谍带进来转交信中提到的东西。“帽子”指的是,得到任务的人应当进行破坏机器的活动,破坏活动要慢,规模要小,要不显眼,但应该对生产是致命的。“雨衣”或者“防雨大衣”是指必须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

在德国“A. E. Г.”公司工作的巴什金工程师(被捕工程师巴什金的弟弟)就是使用这种暗号把任务转达给采矿工长加夫里申科的,后者在1928年1月29日的供词里也承认存在这种暗号。在回答谁同国外保持联系这一问题时,他回答说:“外国来的工程师和安装工保持同外国的联系。我自己只认识韦格纳、巴德施基倍尔、奥托和迈尔。”在回答用什么方式同外国进行联系的问题时,加夫里申科说:

“他们从总工程师那里得到通报,通过来自国外的外国公司的代表把这些信息转交到国外指定的人……通报是用密码做的。密码由科尔加诺夫和我来做,大部分密码工作都由我来承担。”

这就是该组织的任务、结构和联系形式的总概况。

三、占领工程技术部,挑选“自己的人”, 排挤共产党人,工人问题

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破坏分子集团首先试图要把工程技术部掌握在自己手里。工程技术部里有:主任安东诺夫,成员巴边科,Е.科洛杜布,东侧代表加夫里申科。通过把工程技术部拿到手,该集团就可以挑选适合进行破坏活动的人和解雇那些碍事的人。破坏分子把身为共产党员的工程师,把那些感情上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从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从工程技术部排挤出去。把过去的股东,萨莫伊洛夫、韦列斯库诺夫等人以及一些新工作人员,白卫军将军的儿子,前白卫军军官乌萨诺夫、罗曼年科,前股份公司“塔格罗”的经理普罗什科等人接纳到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工作。

这个集团对共产党员和感情上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所采取的态度,从身为共产党员的工程师利夫希茨的证词中看得特别清楚:

“……1926年3月,我作为矿业工程师被俄共(布)专区委员会派往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作工段主任。在我到来之前,工段一昼夜的开采量为3 000—4 000 普特。我到来以后,开采量上升到20 000 普特。应当说,苏维埃政权执政以后,这个‘B’号工段就被淹没了,当时的矿井主任是加夫里申科,恢复工作只是在1925年才开始的。从我来到这里工作起,从开采量开始增长起,我就发现了纳西沃奇尼科夫对我的攻击。他声称:‘派来了一个犹太人的共产党员工程师,我们给他一个工段,让他折腾去吧。’电工库津也能证实这一点。自从技师科斯坚科来到矿井以后,对我的攻击就增强了,他们在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的支持下,这个情况工程技术部的安东诺夫、巴边科、加夫里申科都知道,向贡恰连科提出要解除我的工作,理由是我不能胜任工作。但实际上,开采量是创纪录的,尽管科斯坚科他们故意阻碍工作,干涉并改变我的决定,致使工作受到了损害。贡恰连科没有撤我的职。当我看到那批专家对我的诬陷以后,我自动提出离职。我现在亲自看到了,过去我也看到了,除掉我的事情是早有安排的。在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形成了由科尔加诺夫、萨莫伊洛夫、科洛杜布、巴边科、加夫里申科、纳西沃奇尼科夫、安东诺夫组成的集团,他们只挑选自己的人,回避站在苏维埃生产一边的新来的专家。通过有组织的诋毁、诬蔑,这个集团把一位好工程师利布金德、‘十月革命’矿井主任的助手切普尔诺伊工程师等人赶走了。”

加夫里申科供认,工程师利夫希茨是被技师纳西沃奇尼科夫、科斯坚科等人通过技术工程部赶走的。

在对技术工程部的成员分配奖金和补助金的时候发现,这些奖金和补助金不是发给这个部的成员,而是发给破坏分子组织的成员。尽管技术工程部成员提出的要求是合法的,却遭到了拒绝。

在分配技术工程部的奖金的时候,他们曾有组织地通过同时退出工会(想有组织地退出工会,但没有得逞),试图对行政机构施加影响,改变奖金分配办法,提出要一季度发放一次,而不是顿涅茨克国营煤炭联合公司规定的在年底发放。这个行动在工会和党组织的帮助下费了很大的劲才得以制止。

从工资标准处处长П.Е.科尔日的证词可以清楚地看到技术工程部主任安东诺夫的嘴脸,他在感情上是远离苏维埃的,总把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看做是妨碍他正常工作的绊脚石。

“我参加技术会议(1922—1923年的联合工会),因而知道,П.И.安东诺夫总是第一个发起同工会组织和党组织的激烈冲突。由于过了很长时间,他的原话我记不住,但他在自己的发言中要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不要干涉生产工作,他认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是不需要的组织”。

在试图争取释放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常设代表处逮捕的别连科工程师的事件中,这个集团的表现尤其突出。该集团召集非法会议,决定抵制任何代替别连科工程师的其他工程师。被告人加夫里申科就此事作证说:

“这个会确实开过。我也参加了这个会。它不是正式的会。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必须任命技师博罗金代替别连科的问题。我现在要更正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提出来的:如果不释放别连科,那么就抵制代替他的任何一个工程师。这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其他参加会议的人都完全同意我的提法。”

上述人员(该组织的成员)有组织地通过各种手段对工人施加影响,挑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工会组织和党组织,煽动风潮和罢工。我们把关于工人问题的许多证词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证词列举如下。在工作中,违反所有的采矿安全规则。放炮工作进行得异常混乱。14—20个炮眼同时放炮,长距离的手工操作,这在矿业监督中是绝对禁止的。放炮手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从证人П.М.克柳什涅夫的证词中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爆破办法:

“在‘十月革命’矿井,所有的爆破工作规则都没有执行,爆破工作由他们安排,准确地说是由他们进行的,毫无规矩,显然对工人的生命和生产都是危险的。

派往工段的爆破工人单独执行任务,对同一个工段的20—30个或者更多的

炮眼连续下达爆破指令,这些点火工作都是手工操作。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连续爆破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有一次在15个平巷连续放炮,我被熏倒,失去知觉,丢了24个炸药筒,把一个装有100个炸药筒的炸药袋留在了矿井里。我本人,而且是所有炮手都向工段技师报告了这件事,萨莫伊洛夫也知道此事。但任何人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清除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由于是进行大量的爆破,不可能数清有多少次爆破声,因此,炸药落在煤里,存在着发生不幸事件的隐患。”

矿井的通风设施一向不够,但是通风设备还是被人为地破坏了,不让空气进入矿井。工程师巴什金承认,他一下子烧坏了6个风扇,工人们立即感到难受,放弃了工作。在“十月革命”矿井,主任萨莫伊洛夫调节通风装置,使得矿井内的矿灯因空气不足而熄灭。萨莫伊洛夫迫使工人在黑暗中工作。有3名工人因缺少空气而失去知觉。对希望改善通风条件的所有要求,萨莫伊洛夫回答说,“已经采取了措施”,或者是“只能这样,因为苏维埃政权没有钱”。

克扣工人的工资,错误计算工人的工资已经成为常规,比比皆是。在计算工资时,一贯欺骗工人,答应发给的工资是一样,但发工资时是用的另外的计算办法,克扣工资,侮辱工人。从工人K. H. 米申1927年12月1日所做的证词可以看到,是如何计算工资的:

“在106号人口处很多工人拒绝工作,因为人口处不正常,没有空余的地方,开出来的岩石堆积在那里,人口处没有人管,与工段脱离,搁浅了,这是1927年10月的事。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标准,这些要求完全是正当的,矿井委员会和劳动保护委员会对此也予以认可。但是纳西沃奇尼科夫和科斯坚科不给提高工资标准,却欺骗工人。科斯坚科要我到106号人口处工作。我不去。科斯坚科就威胁我说,那你就什么工作也不要干了。我不得不去上班。科斯坚科许诺我说,不会让我吃亏,也就是说,清除那里的杂乱无章是会发给工资的。但是一个月的期限过去以后,纳西沃奇尼科夫和科斯坚科却按1米15卢布30戈比的标准计算我的工作。我和我的一组6个人同他发生了冲突。这个冲突在矿井委员会主席希罗科夫强大的压力下解决了,对我们有利。纳西沃奇尼科夫和科斯坚科这样欺瞒、哄骗工人的现象是一贯的。”

M. C. 希罗科夫1927年12月6日为此作证时证实了上述情况,并做了以下补充:

“……1925年我被选人‘无产阶级专政’矿井的矿井委员会,在工资科工作。从工作的头几天起,我就碰上了‘克拉斯年卡亚’矿井的主任A. E. 科洛杜布。工人的告状信一封接一封地送来,说科洛杜布安排的工作不对,粗暴对待工人,

错误地计算工人的劳动标准,致使工人们总也达不到自己的工资定额。尽管‘克拉斯年卡亚’矿井的职工仅有180人,2号矿井大体上有1800人,而后的劳动争议要比前者少。那里的劳动争议90%解决得都有利于工人。工人的不满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他们甚至向矿井委员会声明说:‘如果你们不把科洛杜布赶走,我们就把他扔进矿井里’。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副局长克拉米奇看到了矿井委员会的强烈要求,想撤销科洛杜布‘克拉斯年卡亚’矿井主任的职务并把他调往2号矿井。关于这件事情的公文已经印发出来,却遭到了技术工程部的抗议。科洛杜布的问题交到了矿工工会主席团会议上去解决,为此,主席团决定成立委员会来查明矿井主任科洛杜布同工人的相互关系。

委员会由主任、我、全俄矿工工会专区工会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经济管理机关的奥夫恰罗夫和技术工程部的纳西沃奇尼科夫组成。委员会发现,不论是矿井的工作,还是科洛杜布对工人的态度,确实不像话。纳西沃奇尼科夫千方百计极力抹杀事实,为科洛杜布打掩护。我本人和经济机关代表奥夫恰罗夫要求立即撤销科洛杜布的职务。最后,科洛杜布被撤了职。从他被撤职时起,‘克拉斯年卡亚’矿井各个方面的状况立即得到好转。”

工人布托夫做了同样的证词:

“……从开始工作起,就不给我们工资定额。在同一个月里,干一样的工作,几个班的矿工,有的是9个人每人3卢布41戈比,有的是24个人每人1卢布50戈比。工人们开始着急。我找到了矿井委员会主席马尔琴科。他说,这不正常,于是出现了冲突。有一次,此事引发了6名工人联合呼喊要去矿务局进行工资核算。我把他们留住了并带到矿井委员会,结果是冲突的解决有利于企业。第二次发生这样的冲突是在1927年夏季,十来名工人想放弃工作,离开企业。我向支部书记奥列伊尼克夫报告了此事。他找来矿井委员会主席马尔琴科调节冲突,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我们。克扣工人工资的事是经常的。这都发生在克拉辛掘进段。这里的掘进是由别连科管的。这是1927年的事。”

这个专家集团对待工人的情况难以启齿。根据证人的许多证词确定,在革命前,在白卫军时期,矿井上就毒打工人。加夫里申科毒打得更厉害。他用铁拳头打人。在夜间,他命令把犯有过错的被俘红军士兵关进工具箱。这种野蛮的、不能容忍的对工人的粗暴态度和对他们的殴打一直持续到苏维埃政权时期。

从工人Г. И. 波卢欣1927年12月1日所做的证词可以看到:

“……纳西沃奇尼科夫对待工人是野蛮的、侮辱性的,对此我亲身经历过。我妻子病得厉害,带着吃奶的孩子。1927年,在孩子出生以后,我向纳西沃奇尼

科夫要求了一个半月,希望给我一个暖和一点的住处,因为我是住在过道里,而且已经10月了。在这极其艰难的时候,纳西沃奇尼科夫应该帮助我,但他不但不给予关注,反而把我赶出了办公室。”

从2号矿井的铁匠莫罗佐夫1927年10月22日的证词可以看到:

“……1923年,加夫里申科殴打了2名前来领取工资的工人。这2名工人原本不是矿工,而是来自中央省份的农民。工资是以支付券的形式发放的,由加夫里申科从窗口里发放。工人到来以后,敲了敲窗口。加夫里申科打开了窗户,这时一名工人把头伸进了窗户,加夫里申科打了他的脸,把脸打出了血。我建议这名工人跟我一起去矿井委员会,他对我说:‘那里的权力是他们的(指加夫里申科)。如果我向他们告发,明天就会把我裁减掉。’

另一次是工人们在门外排着队,门是关着的。一名工人敲了敲门,想询问为什么停发他们的工资。加夫里申科从房间里跳出来,照那工人的胸口打去,那工人倒在了我的身上。加夫里申科扭头又把门关上了。工人们没有去矿井委员会。他们非常气愤,说,当局不保护他们,那些被他们赶到黑海里去的人又回来了,又当权了,又欺压工人了。”

雷科夫斯基作证说:

“……1927年,加夫里申科在派工房打了彼得罗夫,他边打边说:‘宝贝儿,1918年,1919年你们到哪里去了。要不是为了开心,我才不会这样收拾他们。要是在过去,你还不及时向反间谍机关报告,就让你这个坏蛋死在枪口上,让你摆上3天丧宴’。”

有几名工人作证说:

“……A.科洛杜布粗暴地对待工人,引起了工人们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责难和愤怒。有一名工人拿着枪埋伏起来想枪杀A.科洛杜布。但其他工人把他给劝住了。

别连科一贯用解雇威胁工人(工人苏尔科夫的证词)。这事发生在工人们因自己的物资待遇问题找别连科的时候。别连科威胁说:‘把工人们从矿井赶走。’他开口大骂起来。

别连科说:‘你们是主人,我们是给你们干活儿的’,于是嘲笑起来。别连科的这种态度惹怒了工人,他们三五成群地集合起来几次要写控告信。对此,托尔普采夫、戈尔巴托夫、布托夫、卡拉谢夫等工人可以证实。”

工人布托夫的证词说:

“……别连科什么都不想承认。曾经有过工人们因他的行为而哭泣的事

情。工人罗曼诺夫就哭过。别连科把他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因为他的钻工技能不好。别连科不只是撤掉他的钻工职位,而且不给他任何工作。这引起了全体工人的不满。由于别连科的粗暴,有技术的工人离开了掘进工段。我记得,离开的工人有蒙加罗夫、波波夫等人。”

从工人 M. Г. 彼得罗夫的证词可以证实:

“……1927年,我在沃罗夫卡矿井作割煤机手,大家都说我工作不错。这一年春天,有一次我去派工室,矿井主任加夫里申科和司机雷科夫斯基在那里。我还没有来得及走进派工室,加夫里申科不分青红皂白就向我扑来,抓住我的衣领,将我向门上撞,我倒在了地上。而加夫里申科关上派工室的房门,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我不敢吱声,怕丢掉工作。很快,我转到了‘彼得罗帕夫罗夫卡’矿井工作。再多的事情我说不出来,我同加夫里申科接触很少。”

殴打工人的事件还可以列举很多,这再一次证明专家们完全没有责任心,让人看透了他们所实行的那一套办法。

故意不维修工人住房,以致天长日久都毁坏。甚至不给工人们提供最起码的居住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许多人生病,出现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怨声载道和不满,所有这一切最终反映到了生产上。

工人 T. H. 斯库雷金 1927年12月7日作证说:

“……我住在‘无产阶级专政’矿井第4矿工宿舍区第10号住宅。在这个工人集体宿舍里住着四家人。集体宿舍是共享的,中间没有隔墙。每一家住在一个角落里。集体宿舍的一半位于地平面以下,窗户刚刚露出地面,所有的东西都破烂不堪,墙壁处处透风,到处塞着破布,钉着木板和铁片。门也是破破烂烂。墙上的裂缝可以让猫穿来穿去。宿舍的中央盘了一座炉子,用来给整个宿舍取暖,但这个炉子做得不好,老冒烟。还有一座炉子,根本不能用,生不着火。宿舍的房顶漏雨。下雨的时候,整个宿舍里都是水,所有的衣服、东西都是潮湿的。现在已经进入寒冬,宿舍里很冷,略微比街上暖和一点。宿舍里没有煤棚,煤运来以后就堆在宿舍里。煤都冻透了。煤在融化的时候,水蒸气从煤里蒸发出来,水就从煤里流出来。煤不融化的时候,宿舍里会因此冷上3—4天。”

我现在住在这个宿舍里已经是第二个冬天了。我不止一次找过纳西沃奇尼科夫。他不愿意意见我们,让我们去找‘克拉斯年卡亚’矿井,说什么宿舍是‘克拉斯年卡亚’矿井的。而‘克拉斯年卡亚’矿井的人对我们说,宿舍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矿井的职工宿舍区管。我认为,这是纳西沃奇尼科夫对我们的愚弄。他自己却住在豪华的房子里。”

证人,工人列夫琴科 1927 年 12 月 2 日作证说:

“……我在第 34 号集体宿舍住了三年。那里状况不好。房顶漏雨,宿舍内潮湿,窗户框、门框都快散了架。宿舍内寒冷,人们都在生病。我的儿子得了感冒,小女儿病了一年,就在那一年死了。我和其他人一样,都坚决要求修房子。但建筑科根本不管这个事。我去找过乌萨诺夫和巴斯涅夫本人。

住房问题、对住房修缮不管不问的态度使工人们感到愤怒。有时候也进行修理,但那是在寒冷的时候。很明显,这种修理除了无用的花费以外,不起任何作用。”

证人,工人波卢欣 1927 年 12 月 1 日提供证词说:

“……1926 年,我住在第 15 号集体宿舍里,这是很不好的集体宿舍。门框已经歪斜,门关不上,窗户框也歪斜,房顶下坠,几乎要塌下来。冬天房间里太冷,工人们因此感冒、生病。严寒对孩子影响特别大,他们老是生病。工人们对这样的条件非常不满。工人们强烈地不满,咒骂所有的人,说这是在折磨他们,他们交给矿长纳西沃奇尼科夫和建筑科科长乌萨诺夫很多住房修缮申请书。我本人就交了 2 次。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证人,工人哈里切夫 1927 年 12 月 1 日提供证词说:

“……我住在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 2 号矿井矿工宿舍区第 20 号集体宿舍。这是旧集体宿舍,快要倒塌,墙已经出现裂缝,房顶非常糟糕。没有进行过大修。2 号矿井的建筑科科长,我不知道他叫什么,答应过我们,到 1927 年春天要对这个宿舍进行大修,但是这样的大修却没有进行。在这样的宿舍里居住是危险的,但却住着 7 户人家。宿舍的墙是用柱子顶着的,要不然墙就该倒塌了。要是柱子腐烂了,那就必然会出现灾难。在我住的房子里,墙缝有 2 个指头宽。下雨的时候,所有房间到处是水。很多工人因此而得病。今年夏天没有换房顶,只给宿舍抹了抹灰。这样的宿舍不止这一处。这样的快要倒塌的集体宿舍还住着工人,却又不修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 6 处:第 9、20、22、23 和 24 等号宿舍。去年秋季,我不得不住进了第 9 号宿舍。宿舍是半地下室式的,以前用作面粉仓库,而后改为集体宿舍。”

从被告人 А. И. 乌萨诺夫工程师 1927 年 11 月 23 日所做的口供可以看到,10、13、14、15、16、17、18、19、20、21、23、26 号等主要集体宿舍都十分破旧,没有进行过修缮,如果说进行过修缮,也搞了一些新建筑的话,那也是故意不好好搞。恶劣的居住状况导致很多工人生病,造成了他们对党组织、工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怨声载道和不满。

最后,乌萨诺夫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清清楚楚地明白了,破旧不堪的状况是有意识造成的。我无力同他们进行斗争。我意识到了那里的工作是在破坏生产,我不由自主地成了所有这些事情的参与者。我感到,事情的结局将会不妙,这一切早晚都要被揭露出来。那年春天,我向莫斯平斯克、奇斯佳科夫斯克和鲁特钦科夫斯克矿务局提出申请,想离开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我在供词中所说的建筑科的工作状况过去和现在都给生产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这些情况工程师巴斯涅夫、科尔加诺夫和其他很多专家显然也早就知道。”

专家们的这种“活动”不只引起了工人对工会组织、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的怨言和不满,还导致不断发生大规模骚动,在许多情况下造成了罢工。

1922年,因为不发给口粮而爆发了大规模罢工。罢工是由加夫里申科组织的,他布置了纠察队不让工人们去矿井上工。

1924年,由于错误地制定出劳动定额,在很多专家的支持下发生了罢工。

1927年1月5日,因为让工人上了断裂了的升降机下井而发生了一天半的罢工,工程师韦格纳事先故意把升降机轴弄断了。

1927年3月22日,因为错误的开采定额而发生了两天的罢工。开采定额是库兹马故意不同有关单位进行协商就擅自决定的。

1927年1月,中央劳动研究所学生的罢工是极其典型的。从证人、前校长M. H. 格拉西莫夫1927年2月12日所做的证词可以看到:

“……1927年1月,中央劳动研究所的学生进行了罢工。罢工原因是:工作室陈旧,破烂不堪,时刻都有倒塌的危险,房顶和墙壁上的窟窿透风,房屋不供暖。眼下还算暖和,勉强可以冒险在里面工作,但随着寒冷季节的到来,就不能工作了,在这里干活如同在露天一样。修缮费已经发下来,科洛杜布像往常一样,任何有力的措施都没有采取。学生们罢工以后,中央劳动研究所的工作室改作了澡堂。”

工程师加夫里申科被捕以后,在1月29日接受审讯时承认,罢工是他故意发起的。

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制度,这就是这个工作制度造成的结果。

四、在国外采购不需要的机器,错误地使用设备

从巴什金和加夫里申科的供词可以看出,这一帮工程师在国外花巨资购买不需要的设备,给顿巴斯煤矿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在国外的订购工作是这样

进行的,完成订货的时间要早于或晚于必需的时间。大型机器甚至在临时厂房建好之前就从国外运来了。或者承诺为矿井提供新设备,就不怎么维护旧机器了,旧机器不能用,而新设备不能按时运到,甚至拖延的时间很久,致使矿务局处于毫无办法的境地。经常订购与需求不相符的设备,或者某些机器的部件不同时送来,或者购买不需要的机器部件,而需要的部件却又延误到货时间。常常是最需要的机器运来了,却又没有配件。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预算的巨大支出,最后形成大量资金积压。

巴什金工程师 1928 年 1 月 24 日的供词提到: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随着在国外、国内完成一系列大型设备的订购任务,随着蒸气管道、通风设备发动机、水泵和水泵马达、涡轮机安装用吊车等设备用在了戈尔洛夫斯克、鲁特钦科夫斯克矿井上,出现了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情。在鲁特钦科夫斯克矿井安装了新锅炉房,是最新的技术,6 个水管式锅炉已经完成组装,锅炉炉墙围砌完毕。部分锅炉已经可以准备点火送气了,但是很久以前就在国外订购好的蒸气输送管道却还没有运来。当时紧急需要大量的蒸气和电力。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仅仅在 2 个小时的时间里,电站就对 3 号、4 号和佩尔沃迈卡矿井停了好几次电。周围都是瓦斯矿井。那时,基里尔金主任同志真要发疯了,因为安装新涡轮机的厂房和基座都已准备好,而德国的涡轮机要在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之后才能发运,而吊车连点影子也没有。类似的事情我在戈尔洛夫卡也听说过。我了解了一下蒸气动力部门情况,得知 1 号和 8 号矿井电站没有备用涡轮机。至于说新锅炉房,那端安装了 4 个水管式锅炉,每个占地 400 平方米,用的都是列宁格勒机器制造厂生产的昂贵的机动炉排。这些锅炉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现在给涡轮机安装上的是临时蒸气管道,2 个锅炉已经投入使用。锅炉的设计方案是由莫斯科热工研究所完成的,烧的是无烟煤粉和小的焦炭小脚料(焦粉)等,安装是“暖力”公司承担的。结果是,热力技师用这种燃料从锅炉每平方米的受热面积中得到的蒸气不是 25 千克力,而是勉强才能得到 10—12 千克力,而且还是在增加了 50% 优质煤的情况下。更何况锅炉常常停止工作,因为昂贵的机动炉排损坏了,断裂了。”

至于在德国“A. E. I.”公司订购的特大型涡轮机,在 1928 年 1 月 31 日的审讯中,巴什金供述如下:

“……为了扩大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弗拉索夫卡电站,1926 年向柏林的‘A. E. I.’公司订购了一台发电量为 5000 千瓦的涡轮机,当时,又在柏林的同一家公司订购了 2 台发电量为 6000 千瓦的涡轮机,只是在一个月以后,或者说

几乎就是同时。除此之外,一年以后,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又在同一家公司订购了一台6000千瓦的涡轮机。我认为,为弗拉索夫卡电站订购涡轮机是故意搞错的。5000千瓦和6000千瓦的涡轮机的价格差别不大,它们是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为自己电站的同一个机组订购的同一种型号的涡轮机,这具有重大意义。比如,可以少储存备件,在发生事故或缺少配件时,可以很快从临近的矿井得到调剂。除此之外,用不着花费很多时间设计管道和其他许多部件的图纸和式样。而且,为弗拉索夫卡订购的发电量为5000千瓦的涡轮机并不是最新类型的。弗拉索夫卡安装的涡轮机的最大毛病有:第一,是双层冷凝器,也就是说可以在涡轮机运行中对冷凝器进行清洗。清洗冷凝器一般要用6—7天的时间。而新涡轮机由于安装了双层冷凝器,这个冷凝器的一半在进行清洗的时候,另一半仍可以继续工作。但是弗拉索夫卡、鲁特钦科夫卡和戈尔洛夫卡安装的涡轮机却不能在运行时进行清洗,要清洗冷凝器涡轮机总得停下来。我来解释为什么不能清洗涡轮机的冷凝器:必须通过冷凝器的清洗槽清洗冷凝器。冷凝器清洗槽是按一般结构安装的,这就像安装了一般冷凝器的涡轮机一样,在清洗冷凝器时,污水和脏东西从冷凝器里流出来必然要同泵入发电机(涡轮机的发电部件)的冷却空气相混合,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否则发电机会烧坏。在涡轮机运行过程当中从前面清洗冷凝器是极不方便的,因为泵妨碍进行这个工作,另外需要调整某种部件。对于水质不好的矿井,在涡轮机运行过程中清洗冷凝器是极其有利的。但在这个具体情况下,好像是第3号涡轮机,特别是戈尔洛夫卡、鲁特钦科夫卡两个矿井的涡轮机,冷却水是污浊的,订购这样的冷凝器就是犯罪。除此之外,弗拉索夫卡的涡轮机的导向叶片是用生铁铸成的,不是用铣刀铣成的。而所有新型涡轮机的导向叶片都是用铣刀铣成的。这样重大的缺点,为弗拉索夫卡到国外订购涡轮机的工程师是知道的,订购这样的涡轮机是故意的。”

在弗拉索夫卡不可能建造锅炉装置,却要在这里建设新电站,巴什金在1928年1月23日的供词里是这样说的:

“……这不是矿井让干的。这个任务来自中心。这是柏林中心和哈尔科夫中心下达的任务。当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得到许可证的时候,通过全俄合作社有限责任公司¹³⁸向伦敦著名的巴布科克和维尔科克斯公司订购了锅炉。订购这些锅炉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这些锅炉的炉排不能燃烧煤粉,没有验收保障。这里十分清楚,订购18—19台锅炉,不预先说明每台锅炉产生的热量,就是说,没有附加条款。锅炉运到以后,无烟煤不能燃烧,糟糕的事情出现

了。英国人想溜掉。经过多次调试,无烟煤终于能燃烧了。应当往炉排上投放煤粉,但烧不出蒸气来,任何工作都做不成。当时急需锅炉,但锅炉不能工作。3台锅炉被迫不使用煤粉而烧葵花子。这是在进行了一系列调试和改动之后才做成的。当工作调试好了以后,还是达不到标准——只能达到25年以前制定的标准。为了研究问题出在哪里,请来了索洛维约夫教授。既然没有任何保障,那么能找谁负责呢。”

对于您如何认为,有这种结构毛病的锅炉,是故意订购的,还是错误订购的这个问题,巴什金回答说:

“……我不认为在订购18台锅炉的情况下会犯这样的错误。应当能够推得动炉排的关键部件,不管是在佩尔沃迈卡矿井,还是在其他矿井,都没有。锅炉从佩尔沃迈卡矿井调到佩尔沃鲁奇卡,而后又调回来,调来调去,没完没了。”

我们不再继续列举例证了,这种例证太多了。我们认为就是这些例证也足以极其清楚地表明,在国外提交订货时发生了破坏活动。

割煤机的工作安排没有达到正确工作安排时应该产生的经济效果。把适于在硬煤层工作的割煤机安排去开采软煤层或者反之。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把不同类型、不同牌号的机器集中在同样的工作条件下进行工作,这就需要配备大量的条件和大量多余的技术熟练工人,导致开采量减少、修理费用大量增加。被告人C. A. 巴边科工程师在1927年12月20日的供词中列举了下列事实:

“……大约2年以前,给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送来了17台美国‘杰弗里’割煤机。送来机器的是机械化处,处长是H. H. 戈尔列茨基。他曾是格鲁谢夫斯克无烟煤股份公司执行经理,似乎是这个公司的股东。这些割煤机适用于开采软煤层。而我们这里是硬煤层。对此,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机械化处毫无疑问是知道的。结果是割煤机的生产效率很低,不断需要进行修理。我本人曾向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写过信,说机器不能用。大家都说过机器不能用,但是15台机器至今仍呆在矿务局,其中30%—50%已经损坏。一台机器价值一万卢布。与此同时在一些大矿井使用的是‘斯列’牌割煤机,而在那里是可以使用‘杰弗里’割煤机的。这些情况尼基申知道得很清楚。”

证人B. B. 雷科夫斯基是割煤机手。从他在1928年1月2日做的证词中可以判定,在“十月革命”矿井也实行类似的机器分派办法:

“……1926年,我当割煤机操作工长。矿井来了克纳普公司的代表——安装工巴德施基倍尔。他一下子就在加夫里申科家里住了2—3个星期。他带来

了两台克纳普公司的Д-3号割煤机。这是用于软煤层的机器,在沃罗夫卡矿井不产生任何效益,不断地出毛病,割煤机手们老是修理机器,完不成生产指标,不断出现磨洋工的情况。每台机器价值一万卢布。我一开始就对加夫里申科说:‘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机器不能用,在我们的矿井用不上。’加夫里申科回答我说:‘你少说废话,闭上你的嘴,会好的,这是活该。’而且德国的安装工本人也说,机器不好。但加夫里申科对我说,‘这没关系,应当为机器说好话,要让全区都用上克纳普的机器’。加夫里申科使劲吹捧这些机器。在这期间,一名德国工程师拜访了加夫里申科的家,也是那家公司的,在第一个国家矿井工作,是俄国专家中的一个,叫В. И. 别连科。克纳普的机器一直闲置到1927年。”

把不同类型的机器集中去做同一种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工程师巴什金在1928年1月21日的供词中相当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

“……我改做研究在阿尔乔姆矿井使用割煤机的方法问题。起初,在Л. Б. 库兹马来到矿井之前,有7台‘苏利万С-8’型机器。之后来了4台克纳普公司的机器,在这之后又来了15台苏利万的机器,2台‘沃拉’的机器,仓库里还放着一台‘杰伊蒙德’和一台克拉马托尔斯克厂生产的机器。阿尔乔姆矿井使用的割煤机有4—5个类型,可以称之为拼盘。每一个类型的机器需要自己的备件、自己的切割齿,还有受过训练的技师。除此之外,电力部分也是这类状况。因此,这种状况无法进行工作。切割齿总是不够,特别是克纳普公司的机器,这种机器要求的切割齿十分复杂,在我们的车间里费了好大的劲才制造出了这个类型的东西,要不就得用国外的切割齿——没有类似的备件。总工程师决定在迈利霍夫卡使用来自德国的克纳普公司的机器进行上层掘进。工作无论如何不能进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得不抛弃这个想法。适合弗拉索夫卡煤层的割煤机一台也挑选不出来,这不但大大降低了机器的生产效率,而且大大提高了开采成本。”

除了在掘进工作上不正确地分配割煤机、在技术上不合理地使用这些机器以外,参加这个组织的工程师还直接破坏机器。加夫里申科在1928年1月25日所做的证词中作证说,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给他下达了破坏割煤机的任务。证人И. П. 伦津是割煤机修理工,他在1928年1月3日的证词中列举了故意破坏机器的事实:

“……1926年,矿井得到了4台割煤机(‘杰弗里’)。我根据现行规则,长时间坚持要求加夫里申科检查机器,加夫里申科对我回答说:‘这不是您的事,把机器派下去吧,用不着检查。’我执行了加夫里申科的命令,机器不能用,过了

几个月,这些机器送到了其他矿井。我不止一次对他说过,机器要坏的。而他对我说:‘这很好。我们把机器弄坏,以后再把它修好。’事情还真是如此发生了。在第23号工段,‘杰弗里’割煤机运转得太慢了。我说:‘H. A. 加夫里申科,机器应当修理了,它要坏的。’他,加夫里申科还是那样回答我:‘让它坏吧,然后把它送去修理’。”

采矿工长加夫里申科在回答给他提的他和其他技师用什么办法破坏割煤机这一问题时供认:

“……对机器为什么停车的原因不进行及时检查;对机器的润滑油使用情况不进行检查,再好的割煤机,如果不及时上润滑油,也会很快磨损报废。使用能够产生热量、淤塞、停车和损害机器的润滑油;我们使用重油和其他对机器有害东西来替代公司推荐必须使用的润滑材料。”

根据加夫里申科的口供,机器因错误地选用备件而遭到破坏:

“……备件有从美国订购的,有俄罗斯生产的。由于规格不一样,它们是不能相互代替的,如果把美国的备件同俄罗斯生产的备件混合起来用,机器就会停车。”

在锅炉和电力部门,破坏活动不只是直接破坏机器,还有一个主要的破坏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地消耗燃料,尽可能多地使用劳动力和投入资金,尽可能少地产生效益,也就是说尽可能少地发电。巴什金在1928年1月23日供词中说,1925年在有他、科尔加诺夫、工程师戈尔列茨基、萨莫伊洛夫参加的会议上,向他提出了涉及整个锅炉部门的任务:不要让锅炉部门有很大发展,要让矿井得不到足够的电力,不要让矿井复活起来。巴什金在供词里还说,从文尼察省来了一个马丁纽克,他好像是总工程师库兹马的亲戚。按库兹马交代的任务,把他安排在弗拉索夫卡做热工技师并且下达了破坏供热技术的任务。破坏活动是:“在热力生产过程中要给锅炉工下达指示,锅炉要燃烧不好”。在这件事上,巴什金应当指导他。

巴什金还供认,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把输电方面的任务交给了他;要调整输电工作,造成供电不足、超负荷。为使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供电不足,把大量的电力输送到“罗皮特”矿井。对于弗拉索夫卡有没有足够的电力保障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正常工作这个问题,巴什金回答说:

“用科尔加诺夫的推行机械化工作的方法,电力供应是不够的。电力供应不准时,想给就给,想不给就不给。电力供应有很大的超负荷。如果割煤机在夜间工作,就有多余的电力,但割煤机是在白天工作,因此大量超负荷,严重超

负荷。”

五、生产合理化幌子下的破坏活动

在生产合理化的幌子下进行破坏活动,给矿井的煤炭开采带来巨大损失。最为典型的破坏活动是,在“阿尔乔姆”矿井建立电力机车运出轨道,在轨道上设立卸煤区和道岔,卸煤区和道岔的设立地点是总工程师兼矿井主任库兹马制定的。工程师巴什金在1928年1月26日的审讯中作证说:

“根据他们提出的任务,在东边的大斜坡附近铺设道岔。这样的结构设计有可能导致如下情况:在道岔打开的时候,整个满载煤炭的列车连同电力机车头有可能出乎意料地进入这个斜坡,对整个斜坡和机车造成大灾难。今年夏天就几乎出现这种事故,要不是车速偶然比较缓慢,机车司机十分机敏,整个运煤列车(电力机车、机车司机、40节满载煤炭的车斗和随车人员)都会冲下斜坡。一些并不显眼的破坏活动是,让用电力机车从各主要轨道运出煤炭的主巷道处于不良状态,在轨道的接口、水准度和展览等方面存在大量隐患。因此,电力机车经常出故障,在斜坡上脱轨,车轴断裂,砸出坑来。这不但要进行昂贵的、令人不快的维修,还要停工停产。”

还是在那些供词中,巴什金讲出了非同一般的煤炭运输合理化的真相。这类合理化导致运煤列车撞击、大量耗费资金和车辆状况不好。

“……总工程师自己和矿井主任按照他布置的任务进行的大量破坏活动,是通过矿车快速损坏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一切进行得一点都不显眼,但却造成了大量损失。在‘阿尔乔姆’矿井有一个斜坡,顺着这个斜坡,矿车应当自动地滑行到自己的位置。但是,由于错误地给斜坡规定的和没有排除的大角度,矿车产生了很大的加速度,用力量冲击到刚刚停在轨道末端的矿车上,矿车很快就被撞坏了。在‘阿尔乔姆’矿井内和矿井上面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开采量增多了,破坏也随着增多了。发明创造倒不少,但没有一个能解决问题,甚至取消了原有采用的制动装置,在两条铁轨之间装上一头略微抬起的木板,它虽然简陋,但还能减少矿车下行速度。由于矿车一昼夜来回要走不少于3次,每一次都要以很大的力量翻斗,将煤炭倒进中央运出轨道的矿用载货罐笼,因此这些装置磨损很快。虽然后来由于装上了把住矿车的装置,但矿车撞击的状况并没有改善。一般矿井的矿车是用3毫米的铁皮做成的,但这种矿车在‘阿尔乔姆’矿井不适用,因此只能在自己的车间里制做5—6毫米铁皮的矿车。就是这样的矿车

也用不了2年。为修复列车就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最近2年,‘阿尔乔姆’矿井每年为补充因撞击毁坏的矿车要买400—500辆矿车,耗资12.5万—15万卢布,这还不能保证车辆处于良好状况”。

证人C. A. 茹柯夫在2号矿井做工长,他作证说:“至于B. H. 萨莫伊洛夫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所搞的活动,应当指出,他的活动具有恶意的破坏性质,而且这种破坏是被萨莫伊洛夫所说的经济合理性掩盖的。在‘十月革命’矿井,在萨莫伊洛夫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完全用不着、完全没有道理的工作。下面,我们列举其中的部分活动来勾画一下他们是怎样从事一系列破坏活动的:

……1925年,我在采煤段正在新建的第27号绞车道做工长。绞车道建设得极其缓慢,一个月才进展2—3俄丈,而在正常情况下平均建设8俄丈。没有空车,挖出来的岩石运不走,一句话,绞车道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

19号通道的工作情况更糟。这个通道从1923年,或者是从1924年就开挖,一直挖到1926年,没有挖成,就扔掉不干了。每一个人都明白,挖这个通道纯粹是浪费资金,一点用处也没有。花在挖掘第19号通道上的巨额资金白白扔掉了,通道没有用上,扔掉了。

大概在6个月之前开始着手建设横坑道,按萨莫伊洛夫的话说,对这项工作拨款近10万卢布。如果在这项工作中使用电力机车,将能相当多地增加产出,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自然,必须在短期内完成这个工作,要充分使用机械化手段。尽管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但工作拖延了6个多月,据说,工程已经停了。而这项工作已经花费了4万—5万卢布。自然,这个项目不能搁置不管。从一方面来说,没有必要白白扔掉这么多钱,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工程以现在的速度进行,到石门建成时,其使用时间将很短,不超过一年,毫无疑问,那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在井下作业的班组只要有可能就经常制造堆积。在一般情况下,把工作面的梯段搞得过长,巷道内的支撑敷衍了事。在出现堆积时,又推说是由于顶板支撑不好和工人技术不高。被捕的加夫里申科被问到他是否曾下令经常制造堆积时,他做了准确无误的回答:

“……没有经常制造堆积,这样会引起理所当然的怀疑,只是在可能、方便的地方搞一下。支撑不好好搞是经常的。”

少运出多开采是破坏分子相当广泛使用的方法。每天有几千普特的煤留在井下,尽管这些煤可以及时运出。对于这个有意思的问题加夫里申科在证词里讲得相当充分:

“……科尔加诺夫确实交给我们这样的任务,运出的煤要少于采下的煤,把采下的煤留在矿井里。但是我们用这个办法没有能造成多大的危害,尽管这样已经使整个矿井出现了相当大的亏损。”

从工程师巴什金 1928 年 1 月 21 日所做的证词看,在采煤时通过采用美国的“叉件组合法”进行了大量的破坏活动。这种方法只能在顶板牢固、支撑良好的条件下进行。A 区不具备这些条件。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请看:花钱安装变压器室、耙煤机,购置变压器和电缆,安装、铺设电缆等等。结果是没有得到使用这种方法预期的生产劳动生产率,没有生产出 100 辆,而勉强才有 40 辆矿车的煤。尽管如此,这个工作仍在一直进行,使用的叉件在增多,设备从采空了的地方转移到新的采煤点。缆绳还没有来得及更换,耙煤机已经损坏,6—7 毫米厚的铁板锅炉支撑不住爆炸了。之所以发生这一切,是因为煤层条件不合适,因而这种工作方法在这里不中用。而在 A 区,就像在第 70 号斜坑一样,这种方法使用了好多年,直到下层地段的活儿干完了才停止。当然,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专家也能一下子弄明白”。

在沃罗夫卡矿井尽管制定出了正确的计划,但实际工作却不是正确地进行的。矿井主任只是在单向挖掘,而第一煤层的一个区被抛在了--边。就这些问题,他供述如下:

“……任务是科尔加诺夫给的。巷道加长了一倍,而煤炭运出量却减少了 1/2”。

这加大了产品成本。对于第一煤层的一个区,一年前本不需要让它转头回来:

“……而是应该开始同第二个区连接。矿务局没有这么做,似乎是因为没有订购牵引机。而实际上牵引机已经让给了‘彼得罗帕夫洛夫卡’矿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加大煤的成本”。

库兹马在弗拉索夫卡矿井(第 70 号斜坑)组织了大量破坏活动。他按运输烟煤的办法搞了无烟煤运输的机械化。从斜坑顺着坡度 20° 的铁篦子把无烟煤运出 200 俄丈。通到溜矿槽的是 4 个顺槽。每条顺槽上面安装着一架翻斗车。巴什金在 1928 年 1 月 21 日关于无烟煤运输的供词中供认:

“……一开始,很多技术人员对长达 200 俄丈的这种机械化运输方法持怀疑态度。很明显,这么大的倾斜度所得到的速度将是飞快的,从这个地段运出的大块无烟煤的百分比会大大降低,而且工人在这个地段工作很危险。结果是形成了无烟煤瀑布,无烟煤块四出飞溅。在这里伤了多少工人、耗费了多少铁板

呀,约莫有4000普特,修理溜矿槽的钱花掉了不少。铁板磨损得很快,当工作进行时,溜矿槽一节节的链条会蹦出来,要经常不断地进行修补。当这个地段的煤挖尽了的时候,大家都轻松地叹了一口气。对此,技师И.И.科斯基可以证明。这个地段煤的成本和质量是不言而喻的”。

这帮工程师、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就是这样打着我们生产合理化、机械化的幌子从事破坏活动,对顿涅茨克国营煤炭联合公司的矿业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六、故意向苏维埃政权隐藏大矿层和利润大的矿井

从被告人K.科洛杜布的话中可以看出,萨莫伊洛夫进行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主要矿层。他加强对一号矿层东斜坑的开采,同时对西斜坑的开采却微乎其微。所有数据都说明,应该强化对西斜坑的研究。西斜坑的条件比较好,煤层有很大的开采潜力。之后,科洛杜布供认说,他不能解释,“萨莫伊洛夫在这里遵循的是什么原则”,他继续说,萨莫伊洛夫十分了解“这两个斜坑的状况”。

从证人B.A.弗拉索夫1927年11月19日所做的供词可以看出,2号矿井的“B”区和“П”区已经被淹没。这几个区是矿井最好和最为有利的地段。工人们在各个会议上要求恢复这几个区。时任矿井主任的工程师C.A.巴边科坚决拒绝恢复这个矿区。他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没有正当的理由恢复这两个区,这需要大量资金,矿井维持不了多久,也就是5年、6年”。与此同时,巴边科却恢复了对已经被挖掘干净的5号斜坑的开采。斜坑恢复开采1个月之后,就被搁置不用了。对于2号矿井的“П”区和“B”区的被淹没,被告人巴边科供述说:

“‘П’区和‘B’区是1918、1919年白卫军撤退、苏维埃政权来的时候淹没的,加夫里申科没有对我说,他是用什么办法淹没的,但他在同白卫军一起逃跑时干了这件事。我已经说过,专家们多数对苏维埃政权是不服气的,在这件事上,加夫里申科也是这样。我想,淹没的时间,在布哈林掘进段工作的机械师A.T.普什卡尔斯基,在2号矿井工作的安装工C.И.费奥多罗夫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们。‘П’区好像也是通过提高水泵的位置,是按照H.A.加夫里申科或者扎瓦茨基的命令淹没的,我记不清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是一块干的,是故意的。

在‘B’区淹没的时候,柱塞泵和通风机也被水淹没。这个区是1924年1月淹没的。淹没之前,加夫里申科就在这个矿上。在1924年我到矿井来之前,这些人没有给这个矿区抽水,也就是说,抽水了,可后来又再次把它淹没了。在当

上矿井主任之后,我抽水抽了半年,而且加夫里申科从我这里被撤了职,过了没有多长时间之后,就被调到‘沃罗夫卡’去了。要说的是,我在这里的时候,破坏水泵的事停止了,而在加夫里申科在任的时候,水泵经常坏”。

被告人 H. A. 加夫里申科在 1928 年 1 月 25 日的供词中承认,他是按照别列佐夫斯基的命令淹没矿区的:

“淹没‘И’矿区的命令是从 H. H. 别列佐夫斯基那里得到的。禁止我清理管道,故意不订购支撑巷道所必需的长木料,据说是市场上没有货。已经研究好要把牵引蒸汽机改装为发电机了,这就是说,修复这个区是不可能的了。”

证人阿利克谢·伊万诺维奇·恰达耶夫 1928 年 1 月 25 日作证说:“帕拉莫诺夫在卡德莫夫卡河做过无烟煤矿勘探,我本人也在那里工作过。打好了 3 个矿井的基础,距阿尔乔姆矿井一俄里远。3 个矿井的勘探结果都很好,发现了 22—24 俄寸厚的煤层,煤的质量很好。一个平巷矿井开在了 200 米深处的煤层上,另一个矿井在 88 米深的松散煤层上,第三个是竖井,煤层距地面 48 米。这些矿井已经开始运营。但由于战争,出于帕拉莫诺夫的某种考虑,停办了,尽管已经掌握了这些矿井的所有丰富数据。了解这些矿井的人有:帕拉莫诺夫以前的技师韦诺库罗夫、A. E. 涅克拉索夫,后来有库兹马和奥夫恰列克,1925 年或者是 1926 年,库兹马把我叫去询问这 3 个矿井的事。我把所有好的结果都告诉给他,并建议他清理矿井。而他回答我说:‘我们看看再说吧。’他不但不清理矿井,反而在塔邦希克夫矿尾的对面开始钻探。在那些显然没有煤层的地方,在已经扔掉了几十万卢布的地方打起了‘斯捷潘诺夫卡’井,也就是说,库兹马在斯捷潘诺夫卡,在帕拉莫诺夫曾经在瑞典人的帮助下打过井但什么也没有找到的地方又打起了井。”

在卡德莫夫卡,所有的井筒由于没有看管好都填死了。库兹马掌握了卡德莫夫卡矿藏的所有资料,他除了在塔邦希克夫矿尾一线进行毫无意义的钻探以外,又开始对“布哈林”矿井进行掘进,已经干了快两年,浪费了近 50 万卢布,毫无结果,矿井水流很大。矿井在“斯塔罗—阿佐夫斯卡”和“格列马诺夫”矿井的旧掌子面之间。由此可见,如果“布哈林”矿井开始经营,那它的开采将是单向的,对矿井这一走向的支出就毫无意义。

被告人 C. A. 巴边科在 1927 年 12 月 13 日的供词里说:“革命前,曾打算在格鲁谢夫斯克河附近开辟一个大矿井,开发下面的地块。这个地块有两个矿层——格鲁谢夫斯克矿层和雷赫雷伊矿层,储量为 3 亿普特。如果开辟这个矿井,准确些说,如果让新矿井投产,就可以关闭昂贵的‘克雷连柯’矿井和 2 号矿

井。老的计划已经选好了这个矿的各个点。从苏维埃政权到来时起，一直到今天，知道这个计划的有我，有科尔加诺夫，还有其他一些人，但从苏维埃到来之日起，由于专家们有共同的想法，就没有再谈论过这个计划。因为谁都不指望这个政权能够稳固。”

A. Д. 波皮尼萨在 1928 年 1 月 23 日关于 5 号矿井的证词里说：“5 号矿井我了解得十分清楚。其中的松散矿层根本就没办法干活儿，深矿层的厚度有 24—28 俄寸，煤炭质量很好。矿井内已经标记出 20 个地段。在革命时期，矿井停工，当时我不在，我在军队里。怎样停的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苏维埃政权时期，井筒根本没有管理好，在 1923 年或者 1924 年倒塌了，把它填死了。我在的时候，矿井一昼夜出煤 25 000 普特，井筒一昼夜送下去 1000 辆矿车。这个矿井生产的煤被称之为银砖，主要是大块煤。

“1 号国家矿场的其他矿井也有类似的情况。

4 号矿井有很多煤，它几乎没有开采过。矿井保存完好，井筒被封闭。煤层的厚度和煤炭质量类似于 5 号矿井。矿井深 44 米”。

C. K. 热尔杰夫在 1928 年 1 月 25 日所做的关于 5 号和 1 号矿井的证词里说：“我十分了解 5 号和 1 号矿井。我在那里几乎干了一辈子。5 号矿井煤质很好，是被称为‘银砖’的大块煤。5 号矿井一昼夜出产煤 1000 辆矿车。1 号矿井一小时产煤 120 辆矿车，矿层丰富。苏维埃政权到来之前，这几个矿井被停工。让矿井停工的是工程师涅克拉西维伊。他曾是帕拉莫诺夫的职员。他关闭矿井时说：‘这不关你们的事。这是老板的事。’当苏维埃政权来到时，涅克拉西维伊带着矿井上所有的马同白卫军一起逃跑了。这个涅克拉西维伊是迫害工人阶级的刽子手。在白卫军时期，他在管理局下设立了关押工人的监狱。管理局就在现在的‘红角’所在的地方。为了这句话，他就把工人扔进监狱，在那里折磨他们。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到来，首先是涅克拉西维伊，之后是工程师库兹马，放弃了 5 号矿井的开采，井筒倒塌。我记得很清楚，井筒倒塌的时候，往里面扔了 100 来辆矿车，这是要把倒塌口封住。5 号和 1 号矿井不能采煤了，尽管那里是优质煤。1921 年帕拉莫诺夫的前职员、技师 C. E. 切尔诺克尼日尼科夫毁掉了升降机，毁掉了 1 号和 5 号矿井，破坏了 80 马力和 100 马力的蒸汽机。机器毁掉了，1 号矿井的 1 号机器的架子躺在烟囱旁边，仍在那里摆着。再多的证词我就没有了。”

在回答 5 号矿井是按照什么人的命令被填埋的时候，被告人巴什金供认说：

“问：5 号矿井是个什么样的矿井？”

答:是个非常好的六四层矿井。

问:在革命前一年的产量有多少?

答:1 000 万普特。

问:煤炭的成本如何?

答:煤炭埋藏不深,因而成本很低。

问:煤炭的藏量如何?

答:储藏量不大。储藏量大的采完了。用机械化方法采煤很方便。

问:这样做是不是为了破坏?

答:按别列佐夫斯基布置的任务,是有破坏目的。任务是帕拉莫诺夫留下的。”

在别谢尔格涅夫卡掘进的煤层被掩盖起来,没有让顿涅茨克国营煤炭联合公司管理局知道。1911年,矿井主布罗索夫在距彼得罗帕夫洛夫卡矿井不远的地方为别谢尔格涅夫卡的煤层打了个底子。对别谢尔格涅夫卡矿的勘探成果颇丰富。吸收意大利人来开矿,矿井建设得很坚固,做了很大的截面,井面浇灌了水泥。布罗索夫把开出来的矿井卖给了格鲁谢夫斯克无烟煤股份公司。管理这个公司的是叶梅利扬·科洛杜布。所有的资料都显示,别谢尔格涅夫卡区储藏着丰富的无烟煤。别谢尔格涅夫卡矿道已经掘进了几十俄丈,所有的流沙都装进了铁沉箱,井筒结结实实地浇灌了混凝土。国内战争的爆发妨碍了开出来的矿井的继续开采。关于这里的掘进情况,科洛杜布、科尔加诺夫、巴边科和其他技术人员都知道。但不知为什么开出来的矿井被遗弃,这个矿井没有列入矿务局的封存矿井名单中。从被告人巴边科的供词中搞明白了:

“……别谢尔格涅夫卡的掘进由意大利承包人进行了近100米,井筒用钢筋水泥做了加固。采掘工作没有到达煤层,储藏量起码同彼得罗帕夫洛夫卡一样,非常丰富。这里的掘进工作是由康·科洛杜布管理的格鲁谢夫斯克无烟煤公司承担的。令人奇怪的是,尽管E.科洛杜布、萨莫伊洛夫、加夫里申科等人对这里的丰富储量 and 良好状况都十分熟悉,可这个掘进地段仍然被遗弃了。而现在打算在科尔加诺夫家附近开一个新矿井,这里与别谢尔格涅夫卡矿是同一些煤层,但在这里干需要大量时间和资金,而在别谢尔格涅夫卡矿,所有的重要工作已经完成了75%,因此,开发新矿井没有意义,而应该是继续开发别谢尔格涅夫卡矿。这个掘进地段从其伸展幅度和储量丰富程度看,可以指望年开采量达到3 000万普特,再过些时间也不会比属于一级矿井的阿尔乔姆矿井差。计划和设计图纸都保存了下来。对此,巴边科、科洛杜布、科尔加诺夫和加夫里申科

都知道。但主管矿井的人和党组织不知道。不愿意开采别谢尔格涅夫卡掘进地段的所有前提都让我们有理由认为,保留这一掘进地段是有一定目的的。”

被告人康斯坦丁·科洛杜布的供词确认:

“……科尔加诺夫、加夫里申科等人知道,他们开采的是‘塔格罗’、‘克拉斯年卡亚’这样的一些小矿。像安东诺夫这样的矿山监督员也知道此事。与此同时,‘沃罗夫卡’矿井和‘十月革命’矿井有利的矿层的开采却在拖延着,别谢尔格涅夫卡掘进地段的开采也停了,我1915年曾在那里工作。矿井的基础打得很坚固,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处理了流沙。对于这个地段和它的效益,科尔加诺夫、加夫里申科、巴边科、我、萨莫伊洛夫都是知道的。如果不开采这个矿井,那就有目的的,逻辑本身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矿井应当投产。”

鉴定工作证实了别谢尔格涅夫卡掘进地段的价值,并确定,恢复掘进工作需要安装锅炉、井架、牵引绞车,这并不需要特别大的花费。鉴定委员会的结论确认,专家小组的领导对恢复和发展我们的工业持冷淡态度。

被告人巴什金在1928年1月23日的供词里指出,别列佐夫斯基下达了掩埋别谢尔格涅夫卡掘进地段并采取各种措施保存煤层的任务。从巴什金的供词可以看到,戈尔列茨基给科尔加诺夫和萨莫伊洛夫下达的任务可以归结为:

“……必须保留无烟煤工业公司的主要矿井,这些矿井可以保留下来,那里有很好的工业煤层。这些矿井不要去开采,只对它们进行准备工作就可以了,不要在地下开采。必须把矿藏保留住。正好在这时要对顿巴斯的财产进行登记,我考虑到戈尔列茨基的指示,参加了登记工作。”

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工程师戈尔列茨基和别列佐夫斯基下达的任务已经非常准确地完成了。

在隐藏具有经济意义的煤层的同时,破坏者们为执行从宝贵的矿井里开采劣质煤的任务,开采的是经济效益不好的煤层,开始为显然会亏损的掘进地段做准备。从证人、技术员A. A. 斯捷潘年科1927年11月16日所做的证词可以判定,“在萨莫伊洛夫的倡议下,‘十月革命’矿井开始开采松散煤层,松散煤层生产的煤掺杂着黄铁矿。在这里挖掘煤要比开采其他煤层的花费昂贵,因为煤层上方有6—7俄寸厚的岩石层,只能是用手工挖掘。煤层很薄,仅有12俄寸,上面还有一层黄铁矿。为恢复开采松散煤层已经用去了几十万卢布的巨额资金。后来又恢复了开采西侧和东侧的煤层,也就是说第11、12、13和14地段的松散煤层。西侧煤层由于全面亏损和无法进行工作而停工。东侧的两个地段继续进行开采。这两个地段现在产煤大约3000普特。这其中包括了5%—6%的黄铁

矿。煤炭中硫的成分很大。这种煤只是偶然有些销路,因此,这里的煤要同1号、2号煤层的煤掺合起来才能出售。我个人觉得,启封这个煤层是奇怪的,我本人永远不会启动这样的工作,我认为,把钱用在这里,显然是要亏本的。

我个人认为,萨莫伊洛夫经验十分丰富,他不会不懂得这一切,他所做的这一切,毫无疑问,是有目的的,或者是由于丢掉了他原来的资本而怀恨不满”。

这么大的挖掘量要占别谢尔格涅夫卡已经停工工段的3/4,以科尔加诺夫和安德烈·科洛杜布为代表的矿务局没有进行足够的论证便开始了新的掘进。“阿尤塔”掘进段也属于这种掘进段中的一个。启动“阿尤塔”掘进段时没有进行地质研究,这完全是根据前矿井主马尔琴科的指令干的。是在积水很多的沼泽地和泉水里开采,是在矿层已经变薄了的地段,技术条件也不允许,这在地质研究中本该是能确定的。当时,“阿尤塔”掘进段的工作由于打出的3个钻眼喷出了强大的水流而停工。尽管是这种情况,还是又打出了4个新眼,又爆发出强大的水流。“阿尤塔”掘进段被淹没。由工程师加兰吉、托皮林、总机械师安德烈耶夫、挖掘机械师佐洛塔列夫、工会全权代表鲁缅采夫和工人代表——安装工布勃诺夫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

“……1. 由于上述因素,1927年10月1日矿井开工的任务被中断了。

2. 只要详细地进行打眼钻探便可以确定是否存在水脉。十分明显,这项工作未曾进行过。

3. 没有备用锅炉造成的威胁是工段全面停止工作,因而各项工作停滞不前。弃之不用的第三号锅炉至少要在一个半月之后才能安装。”

应当指出,虽然具有足够的水泵和足够的生产能力,但没有及时投入工作。所以“阿尤塔”掘进段的被淹没完全是领导工作的工程师的错误造成的。

根据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生产科长阿巴库默夫的请求,因“阿尤塔”掘进段无利可图,决定将其关闭。

七、故意破坏机器

破坏集团既独立又根据来自国外的任务破坏机器。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和弗拉索夫卡的工程技术人员破坏割煤机的问题,我们这个概述里(见第19页概述)做了相当全面的介绍。为了对这些破坏活动提供例证,我们将列举破坏活动的几个具体事例。

根据技术鉴定委员会于1927年8月9日编制的文件,沃罗夫卡矿井2号升

降设备的状况是这样的：“机器是新的。滚筒上的部分齿轮已经毁坏，机座破损，轴承里的滚珠吱吱作响，地脚螺栓、制动带垫板破损。机器有可能破损得再重一些，那么矿井就得临时停工。新得到的齿轮搁置不用，放在升降机建筑物旁边，未涂漆，搁置了近一年，这有可能生锈而损坏齿轮，齿轮上已经有锈迹”。

加夫里申科主任有责任坚持更换升降机和齿轮。他在他的供词里指出，当他拿到齿轮，把齿轮放在窗台上的时候，科尔加诺夫进来了。他问：“你要新齿轮干什么？”当他知道是替换2号升降机上的齿轮时，立即派来机械师安德烈耶夫，并命令他不要用新齿轮更换旧齿轮。

那个文件表明，一年以前，安装了一台崭新的筛选机。“筛选机长期没有上润滑油，轴承因此而受到腐蚀。筛选机遭到了严重损害。顶棚毁坏，挖上机挖斗的上爪磨损严重，输送带上的圆板磨损得不能再用，需要换新的。筛选机的使用寿命当然就因此而缩短”。

这台筛选机是司机利托夫琴科让自己的助手涅特列勃斯基破坏的。利托夫琴科承认曾吩咐涅特列勃斯基干这件事，让他破坏筛选机，他还承认曾不断地破坏筛选机。矿井主任加夫里申科不但没有撤利托夫琴科的职，没有把他交给法庭，反而把他调到矿井做通风工作。利托夫琴科在当天夜里就烧坏了通风机的轴承，矿井因此停工一段时间。

那个文件还说，在一年多以前，矿井得到了一台新的西蒙诺夫卡卷扬机。这台卷扬机来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坏了。最大的一个齿轮毁掉了。卷扬机工作总共不到几个月就被送上了地面。卷扬机不能工作，因而耽误了2号煤层的掘进工作，后来换上了新机器。加夫里申科不应该把一个外行人（半大孩子）派去做卷扬机的工作。卷扬机现在还在修理。被告人加夫里申科在1928年1月29日的供词里，为解释这件事交代说：“机器是故意破坏的，我们让西蒙诺夫卡卷扬机超负荷工作，用非所用。这些机器没有提供应当产出的经济效益，它们毁坏了，送去修理了”。

那份文件在讲到电耙卷扬机时说：“1927年2月，安装了新卷扬机，替代了不能用的西蒙诺夫卡卷扬机。加夫里申科派在平台工作的工人基普去看管机器，这不合乎规矩。卷扬机的齿轮毁坏了4次。由于卷扬机出了毛病，2号煤层的开采停工3个月左右。被告人在接受审讯中，曾问到他自己，或者按照他交代的任务，破坏了什么样的机器。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说：‘我们故意破坏牵引机，使机器超负荷工作，这样，机器就常出毛病’。”

还是这份文件,提出了加夫里申科没有采取措施扑灭变压器失火的问题。变压器的情况是这样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变压器室被烧坏。建设这个变压器室,作为矿井主任的加夫里申科是知道的。变压器室被烧毁以后,部分地方用木板钉上了,这是不允许的。变压器配电盘的支架已经弯曲,变压器眼看就要坍塌。变压器已经烧坏过几次,原因是变压器内部的联接线安装得不对。变压器内有70—80普特燃油,在变压器着火的时候,有可能引发火灾、变压器爆炸,有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毫无疑问将会导致矿井几个月的大停工。加夫里申科不采取任何措施进行检查,不查出变压器3次失火的原因,那么就有根据认为,发生这个事故是由于加夫里申科丝毫不懂电器,或者说他存有恶意,要破坏企业。如果他不懂电器,那么在变压器着火的时候,他应当采取措施认真检查失火原因。

在这份文件中,确定的变电站状况是:3个自动装置被卡住,其工作状况就像简单的油开关,这个情况加夫里申科是知道的,这是割煤机超载运转,不符合割煤机保险器的要求和自动装置调节本身不当造成的。这种状况如果打上标记,就会造成机器常常停机、开采量下降和自动装置损坏。在自动装置被卡住的时候,割煤机会着火,软电缆、发动机和变压器有可能会燃烧。在波波夫卡矿井安装的自动装置不起作用,也造成了白花钱。被告人加夫里申科在1928年1月29日的审讯中被问到:在破坏沃罗夫卡矿井的变电站这件事上,交给你哪些任务,是谁交代的,你们做了哪些事?他交代说:

“……变电站的建设本身没有特别的毛病,机器运转有毛病,是按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交代的任务,错误地安装了机器的。”

根据加夫里申科的供词,卡住开关的命令是他下达给机械师克拉索夫的。规定的任务是破坏变电站。

“……在变电站建成的时候,没有检查仪表。旧变电站已经陈旧得不能用了,只能用新变电站进行工作。由于仪表还没有准备好,没有进行过检查,因此就有可能卡住开关。这么做的目的是烧毁变电站的所有设备从而使矿井全部停工”。

对破坏沃罗夫卡矿井机器的问题进行了鉴定。在手头上没有加夫里申科承认是他破坏机器的证词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是,“从所有引证的事实可以看出,对矿井的机器和设备进行了一系列破坏,这应该看成是加夫里申科和利托夫琴科恶意的经营不善,或者是对生产的恶意破坏”。

弗拉索夫卡矿井的升降机遭到了破坏,而且开口销被拿走了,如果工人在这

个情况下下井,就有可能发生灾难。灾难之所以没有发生,只是因为升降机机械师进行了检查。

被告人巴什金在1928年1月23日的审讯中交代说,“他,巴什金,得到了‘А. И. Г.’公司代表迈尔交代的破坏升降机和电站的任务。他没有对电站做什么,但破坏了升降机的制动器。破坏活动是工程师韦格纳干的,他化装成巴什金接近了机器”。

巴什金交代说,他根据库兹马交代的任务烧毁了6个通风机。

一名机械师根据巴什金交代的任务试图停止矿井的工作。为此,他翻倒了电动机,拧走了螺栓,切断了电线。如果有备用件,矿井也要停工6小时,如果没有备用件,那停工时间就会很长。还是根据巴什金的命令,让电线接了地,整个矿井停工几乎一昼夜。这样做还指望能造成人员伤亡。

1924年,“十月革命”矿井的机械师切尔诺克尼日尼科夫破坏了涡轮机。涡轮机是通过锅炉往里注水造成破坏的。水进入涡轮机,挤弯了7排叶片。机器的破坏可能是由于故意玩忽职守,也可能就是出于恶意。由于涡轮机停机,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所有的矿井都有可能被淹没。不得不把线路接到弗拉索夫卡矿井并停止有毛病的涡轮机的工作(证人安德烈耶夫的证词)。被告人巴什金工程师交代说,水从锅炉进入涡轮机的叶轮,这只能是人为的。在涡轮机出故障的那天夜里,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技术人员饮酒庆祝,仅为锅炉被破坏一项就差不多喝了一小桶葡萄酒。要破坏涡轮机就必须破坏锅炉。破坏涡轮机是按照科尔加诺夫下达的任务进行的。涡轮机一被破坏,就要酿成事故。灾难没有发生纯属偶然。巴什金交代说:

“……出了毛病的涡轮机被送去修理。工作正常的涡轮机被毁坏,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所有矿井就有可能都被淹没,幸运的是,凑巧一批新锅炉在弗拉索夫卡开始运转了,才没有发生事故。在交代任务的时候,别列佐夫斯基在场。”

被捕的加夫里申科交代说,涡轮机是按照别列佐夫斯基下达的任务被破坏的。对于破坏涡轮机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加夫里申科回答说:

“……不可能只用一台涡轮机连续不断地工作。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至少要拿出3—4天来清洗、修理涡轮机,况且第二台涡轮机有毛病,只能承担50%的负荷。”

安装涡轮机应当在1926年11—12月期间着手进行。在两台450匹马力的旧蒸汽机的底座上应当安上新的涡轮机,这项工作是在1926年8月开始动手

的。工作虽然是两班倒,但进度非常缓慢,因此,到了1927年的3月,新涡轮机的底座才安装完毕,也就是说,晚了3—4个月。

涡轮机安装迟误是下列原因造成的:

安装涡轮机要通过顿涅茨克国营煤炭联合公司哈尔科夫分部的各个部门。

起重机是4月从国外运到的,起重机下的柱式结构也是4月运到的。哈尔科夫根本就没有订购地面覆盖板。总工程师知道这个情况,但没有事先采取措施进行订购。不得不就地紧急制作。哈尔科夫订购了新涡轮机临时连接旧蒸汽管道的蒸汽管道,但是不得不在涡轮机安装即将结束和启动时就地制造。

由于哈尔科夫的破坏活动,涡轮机的组装工作只是在5月份才能着手进行,全部工作有可能要在9月1日才能结束。但在这时又出了和起重机同样的问题——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哈尔科夫的配电盘安装部门和该公司的水管厂没有及时完成工作。由于哈尔科夫的破坏活动,只是到了11月1日涡轮机的安装工作才告结束,比有可能完成的期限晚了6个月。由于总工程师Л. Б. 库兹马耽误了电站锅炉的扩建,影响了在这端安装3座新水管锅炉,使本该在1927年春季着手的工作推迟到了10月,不得不到11月份天冷的时候才结束混凝土部分的工作,厂房建设还是没有能完工。

被捕的加夫里申科交代说,涡轮机安装得不正确:

“……新安装的涡轮机应该可以产生15个工作气压和加热到350℃,可是为涡轮机服务的锅炉产生不到12个气压,只能加热到300℃,也就是说,比涡轮机正常的工作条件少3个气压,50℃温度。当负荷达到5万千瓦的时候,涡轮机的运转开始缓慢,气压开始降低。只要稍微降低1—2个气压,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因此,虽然安装了新涡轮机,但是没有达到应有的全部结果。涡轮机是在蒸汽不足的条件下工作的,因此,它磨损得很快。这台机器是在德国‘A. E. T.’公司订购的。”

巴什金也做了类似的供词。

但有意思的不仅是涡轮机安装得不正确,还有迈尔从国外带来的破坏刚刚安装起来的涡轮机的任务。巴什金交代说,迈尔带来了让最后一台的涡轮机立即失去工作能力的任务。

鉴于材料非常多,我们不再一一列举故意破坏机器的口供和证词了,但这样的材料是大量的。

八、故意爆炸、堵塞和淹没矿井

克雷连柯矿井是昔日的马卡尔^{*}，是这一地区最为知名的矿井之一。其煤炭质量在顿巴斯是最好的。在革命前，一昼夜产煤2万普特。矿井在1917年被淹没，一直没有排水，也可以说，排过水，但又被淹没了。1927年年末，对矿井进行了彻底排水。1927年12月21日，被捕的工程师巴边科供述如下：

“……克雷连柯矿井‘B’区(中央区)在1917年曾被淹过一次。格鲁谢夫卡河的水冲进了矿井，河水淹到了第58巷道。我不记得，在苏维埃政权到来之前矿井是不是被淹过。这件事矿井的安理工工长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应当记得。矿井的煤质量很好，在整个顿巴斯是最好的，被认为是世界级的，与‘卡尔吉富’齐名。我知道，这个矿区的水排出得很慢，有一段时间矿井完全停工。水有时候排出，有时候又灌进，这么进进出出花了不少钱。克雷连柯矿井总被舍弃，如果电力不够了，就掐断它的电，把它淹没。在1927—1928业务年做出决定，要彻底排出‘B’区的水。排水和恢复矿井大约需要相当于5000普特煤的资金，加上68号斜坑的掘进，一昼夜的采煤量可以增加至25000普特。现在矿井平均产煤15000普特。现在矿井的升降机负荷不满。上面所说的一切加大了产品的成本，采出的煤甚至比其他矿井深煤层开采的煤都贵，准确的数字我说不出，这可以通过会计科进行检查。

问：哪些人知道克雷连柯矿井有质量很好的煤炭，可以发展这个矿井的采煤工作？开采这个矿井比开采‘克拉斯年卡亚’矿井合算吗？要知道，恢复‘克拉斯年卡亚’矿井就花费了15.5万多卢布。

答：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每个专家、每个职工，例如博亚尔希诺夫、戈尔列茨基、别列佐夫斯基，都知道克雷连柯矿井的煤十分好，他们也知道，能够而且需要发展这个矿井的采煤工作。开采克雷连柯矿井要比开采其他矿井有利，利有多大，具体数字我不知道。如果更换功率更大的升降机和牵引绞车，我不知道别的矿井能增加多少利，但这个矿井一昼夜可产煤30000普特。

问：您如何评价开采分明是亏损的矿井、扔掉好矿井这件事？

答：是要打破任何计划性，这是科尔加诺夫、别列佐夫斯基都知道的，他们的政治面貌和活动，我已经说过了。”

* 原文如此。——编者注

填埋克拉辛掘进段,也就是原来的波波夫卡,这是破坏分子的组织要干的。掘进段由工程师别连科领导。当他同加夫里申科一起查看掘进段时,发现了大量冲积土和流沙,于是加夫里申科立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科尔加诺夫,他们决定要把这个矿井填埋掉,他们不是用砖或者水泥来加固,而是用木头。科尔加诺夫在1928年1月29日的审讯中,在回答对波波夫卡做了哪些破坏活动时说:

“……在流沙中不能用木料做支架,我们用木料做了支架,这是冒险。一般要用水泥,也就是用钢筋水泥或者砖来做支架。这是按照我的命令做的。”

这是一条犯罪的命令,以其经济合理性为掩护,导致矿井倒塌,但却被吹嘘成新的技术成就。叶梅利扬·科洛杜布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我们制服了流沙》的文章。文章内容如下:

“……在波波夫卡新发现的矿层里,在掘进过程中遇到了流沙(透水沙)。在深层的流沙中深挖是十分严肃的矿业工作,需要知识和经验。

我们格鲁谢夫斯克矿有过这样的事例,掘进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没有使用针对流沙条件应该采用的科技成就,导致新矿井在掘进中倒塌。

这些矿井中的工作是用通常方式进行的,在试图进行掘进时,矿井的防流沙墙倒塌,矿井随之坍塌。当年工程师奥托曾经成功地在今日以勃拉德列而著称的矿井里进行掘进工作:两个掘进地段因遇到了流沙黏土而倒塌,在到了第三个地点的时候获得成功。那时流沙的厚度不到一米。

在今年年初,在新掘进段(靠近波波夫卡村的克拉辛矿井)遇到的新煤层,在深度18米的地方遇到了透水沙,厚度大约有一米。

矿务局的技术人员曾制定出在掘进地段用楔入支柱的办法防流沙方案。技术员别连科成功地完成了这个方案。由于成功地完成了正确制订的方案,顺利地通过了矿井深层的危险地段,其防护流沙的可靠程度不比矿井其他深层部位的防护程度差。

在楔入支柱防沙的条件下完成掘进工作,是用廉价办法完成极其危险的采矿工作的罕见范例。”

用木料取代钢筋水泥固定“克拉辛”掘进段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此。想法很简单:木料支撑不住流沙的压力就会被压断,那么矿井就会倒塌。加夫里申科在1928年1月29日的供词里对这个问题做了十分详尽的回答:

“……在波波夫卡有大量泥沙和流沙。在我们的老矿井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用砌砖垛的办法来支撑矿井的。我看到有可能让矿井坍塌,就把这个情况报告了科尔加诺夫。而科尔加诺夫给我下达任务,要用木料支撑井筒,这样

的支撑是为了让矿井倒塌。对此,给别连科下达了准确的指示。别连科故意不把井筒固定工作做好,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能把井筒弄倒,只不过把它弄斜了一些。”

沃罗夫卡矿井是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主要矿井之一。它近来的采煤任务为1 000万普特。这个矿井在革命以前属于企业家萨莫伊洛夫。别列佐夫斯基在1920—1921年曾试图使这个矿井退出生产。他曾在有关机关游说,说是这个矿井对国家已经没有用处,不产生利润。这件事最终没有正式提出来是因为主要当事人——别列佐夫斯基、萨莫伊洛夫等人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B. H. 萨莫伊洛夫在1928年1月28日的供词中是这样说明这件事的:

“……大概是在1920—1921年,别列佐夫斯基在区管理局碰到我,让我晚上到他家去一趟。那时他家住‘克拉斯年卡亚’矿井附近(原来的信封厂,后来改作了区的大仓库),我很快就去了。我到他家拜访的时候,他说,苏维埃政权长久不了,国家的治理有可能发生变化。不管发生不发生变化,所有的矿井在最近的未来都要重新考虑,看看为国家开矿能有多大好处。说到这里,他让我出主意,如何做才能让国家对沃罗夫卡矿井失去兴趣,把它封存起来或者租出去。他说,如果把矿井出租出去,我和这个矿井原来的共有者要提出租赁矿井的申请书,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要记住,他是这件事的参与者,因为他想得到一份不错的工资。他说,他是这件事用得着的人,他联系广,同局里的人,同掌管技术、掌管材料的人,都很熟悉。

对于他的这个建议,我不能同他争论,因为他在当时是有势力的人物,虽然我当时也没有寻思要找一份企业家的的工作,但是也没有说不行,只是说,我会记住他的建议,同矿上原来的熟人谈一谈。

我把这段谈话告诉给E. K. 科洛杜布,对此,他对我说,眼下不要想什么经营企业,但不管如何,他劝我离别列佐夫斯基远一点,因为他这个人骗人不脸红,骗了之后就会把我们一脚蹬开。我想,E. K. 科洛杜布会记得这些话,不会不证实这些话。”

让“沃罗夫卡”矿井和“十月革命”矿井退出经营的问题,一直是破坏分子在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组织的工作安排。如果其中的一个不能封存或者不能出租出去,那就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开发另外的矿井制造障碍。于是最后决定要炸毁“十月革命”矿井。后来没有爆炸,这是因为:

“……炸药已经安放好,在爆炸之前,被工人偶然发现后拿走了。第二次也是这样的偶然性使矿井没有被炸掉。”

这帮专家淹没了诺沃—阿佐夫卡矿井。这个矿井以前属于阿佐夫卡公司。在革命前,对这个矿井的基本投资是1750万卢布。曾指望留下的这个矿井一年能够产煤1000万普特。煤炭质量很好。它曾属于弗拉索夫卡矿务局管理,后来转交给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转交工作进行了将近一年。矿井的设备拆散了,也就不能再生产了。通过对被告人的审讯和对证人的询问,还有调查这个问题的专家鉴定,可以确认,矿井装备精良,可以用于20年的开采。眼下只开采疏松矿层,深层矿层还没有动,因而扩大了矿井的储藏量。矿井未来的产量将会很大。工程师巴边科淹没了这个矿井。从他在1927年12月12日所做的供词里可以看到矿井的状况:

“……诺沃—阿佐夫卡矿井位于‘世界公社’矿井的东北方,在沙赫特站至弗拉索夫卡站铁路线上大约两俄里半的地方。新矿井属于阿佐夫卡煤炭公司。这个公司的资本持有人是俄罗斯—阿佐夫卡商业银行的参与人。诺沃—阿佐夫卡矿井的主要产煤区是两个工作煤层,第三个是疏松煤层,第一工作煤层的厚度有16俄寸,第二煤层的厚度有10—11俄寸,第三煤层为一俄丈。往西面去的煤炭质量较差,往东部和深处去的煤层越来越好。这里的煤炭可以令人满意,第三煤层的质量与弗拉索夫卡相同。矿井有两台割煤机在工作,安装了新的变电站,配置了变压器、单枢变流机(变流器),盖起了新的筛选机厂房,安上了筛选机,建立了机械车间,盖好了职工宿舍区。苏维埃政权到来的时候,矿井一直是这种状况,当时正在开采疏松煤层,一昼夜产煤2000—4000普特。而且如果排水,就可以开采深层煤,可以从弗拉索夫卡弄来水泵干这件事”。

尽管诺沃—阿佐夫卡矿井各个方面的状况不错,却被巴边科在别列佐夫斯基的建议下给淹没了。巴边科在1927年12月12日的供词里描述了这样的情景:

“……1921年春季,我被任命为诺沃—阿佐夫卡矿井的总技师,行使矿井主任的职能。是别列佐夫斯基工程师派到那里去的。我知道,别列佐夫斯基也知道,可以发展矿井的开采,矿井很有开采价值,经营前景十分看好。向别列佐夫斯基做了关于矿井状况的报告,在一次做了报告之后,这次报告的准确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是是在我转到了这个矿井之后不久。在那时,别列佐夫斯基在感情上就是反苏维埃的,他让我淹没这个矿井,以便减少煤炭产量,为的是破坏苏维埃政权。这正是共和国紧急需要煤炭的时候。当时我同别列佐夫斯基的想法是一

样的,我同他商议好,通过提高水泵位置的办法淹没第二井筒和第二煤层。这样矿井的生产就肯定要停止了,在对顿巴斯下达的消灭这个矿井的命令中有这项内容”。

除此之外,别列佐夫斯基交代了在统计中隐瞒可开采的深层矿层的任务,这样也就为别列佐夫斯基以后说这个矿井不产生利润提供了依据。

九、开采无利润矿井

“克拉斯年卡亚”矿井

从众多证人的证词、被告人的供词以及鉴定文件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克拉斯年卡亚”矿井的投产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为恢复这个矿井而投入的资金如果投入其他矿井,如投入诺沃—阿佐夫卡矿井或者别谢尔格涅夫卡的掘进段,就会有利得多。

从证人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博洛戈夫的证词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这个矿井过去属于瓦西里·尼基福罗维奇·萨莫伊洛夫和一家公司,谁在这家公司里工作,我说不准,但在私人掌管这个矿井的时候,工长安德烈·基里洛维奇·科洛杜布就开始了对这个矿井的开采,这是他自己亲自对我说的。克拉斯年卡亚矿井尚在革命前就对第一和第二煤层进行了工业开采,后来停工了。1920年,也就是在苏维埃政权到来的那一年,那个安德烈·科洛杜布又开始经营这个矿井,但在1922年年初,由于设备破旧、发生了粮食危机,矿井再次停工,部分服务部门,如锅炉、运输设备、滑轮装置都被撤散了,矿井也被扯散了*。当时疏松矿层的探明储量已经不多——90万普特,煤块很碎,质量不好,均为散煤。这让人完全清楚,继续开采这个矿井,恢复这个矿井,将会对国家造成明显的损失。1925年10月8日,在矿务局的工作日志上,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不顾这个情况,就签发命令,任命工长安德烈·基里洛维奇·科洛杜布为克拉斯年卡亚矿井主任,科洛杜布于是开始了恢复这个矿井的工作。恢复工作的结果是:矿井的井筒修复了5俄丈,安装上新井架,在井筒的其余部分,有32俄丈长,安装上管道、井筒梁以及其他必需的设施。竖起了崭新的井架,安装上滑轮装置、接送台和新的装卸台。在装卸台旁边按照A. K. 科洛杜布的设计方案

* 原文如此。——编者注

(所有其他设施也都是他设计的)安装上新的筛选机。筛选机为机械操作。这台筛选机自它安装上到现在就没有好好工作过。经过筛选机筛选的煤还必须经过手工筛选。我本人,还有其他工人,不止一次对科洛杜布说过,‘筛选机一点用处也没有’。科洛杜布回答说:‘没有一台筛选机是我制造的,像这样的筛选机都是在国外制造的。’筛选机没有用处的事,我亲自对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和工长巴边科说过。他们都同意我的说法,筛选机是没有用处。他们回答我说:我们将要制造新筛选机。”

“……为恢复矿井,安装设备,矿务局花了15.5万卢布。另外,随着矿井的恢复,矿务局不得不提前租赁,而后购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房屋,为此花了两万卢布”。

“开采出来的煤质量不好,卖不出去。1926年,大约两万多普特原煤变成了煤灰,煤灰堆至今仍然越堆越高”。

“……所有这些钱花得不值,这话我早就说过”。

我们不再谈论科洛杜布在恢复“克拉斯年卡亚”矿井时所做的计划和工作中的各种缺点了,而是引用鉴定文件,从这个文件中看到,恢复这个矿井是完全不合适的。

鉴定委员会由矿区主任、工程师若尔科夫斯基,专区技术检查处处长、工程师斯帕谢维奇,机器设备专家库切尔,矿井主任博洛戈夫,俄共(布)支部书记巴拉诺夫,矿山委员会主席希罗科夫,工人代表梅什科夫,波诺马连科、舒申科夫和割煤机检查员波诺马廖夫等人组成。鉴定委员会查明:

“……‘克拉斯年卡亚’矿井的所有有效煤层都已开采净尽,只有部分疏松煤层还在开采。1926年启动开采这个矿井的是安德烈·科洛杜布,他就是那个知道矿井有效矿层已经开采完结因而停止经营的人。矿井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提供经济效益。在经营期间所花费的资金是收不回来的。矿井产生的煤哪里都不要,质量太差。”

该委员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简直是经济反革命或者是恶意的无序经营,是有预谋的。

第二个鉴定是由矿区主任、工程师加兰吉,工程技术部主任、涅斯维塔耶夫斯克矿务管理局安全工程师莫勒,彼得罗夫斯克矿务局副总工程师、矿山工程师萨哈罗夫,专区技术检查员、矿山工程师托皮林,俄共(布)支部代表、“克拉斯年卡亚”矿井主任博洛戈夫,矿山委员会主席贡恰罗夫,工人代表特韦尔多赫列博夫做出的。鉴定文件确定:

“……恢复矿井无疑是在矿务局的总工程师和采矿科知道的情况下开始的。事先没有恢复矿井的方案,对这个问题没有从科学、商业和工业任务要求的角度进行过研究。附上的有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签字的文件和矿务局的证明都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矿务局的材料,曾给顿涅茨克国营煤炭托拉斯拨款 13 万卢布,用于恢复矿井和安装设备。在这件事上,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是按矿务局给它提出的建议行事的。矿务局为恢复‘克拉斯年卡亚’矿井实际上花费了 155 486 卢布。用于恢复‘克拉斯年卡亚’矿井的资金完全白花了。

1. 可以通过 2 号矿井来开采‘克拉斯年卡亚’矿井,那些掌握着图纸和曾在这些矿井工作过的矿务局工作人员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这样做用不了很多资金。

2. ‘克拉斯年卡亚’矿井在总开采量为 890 万普特的情况下是考虑开采 4 年半的。1925—1926 年和 1926—1927 年的计划任务是 232 万普特。实际开采量是 228.5 万普特。1925—1926 年的平均成本为离站价格每吨 9.48 卢布,1926—1927 年的平均成本为每吨 10.67 卢布,也就是说,成本加大了。

煤的平均出售价格每吨为 9.15 卢布,也就是说,出售煤要有一定的亏损。总的说来,煤的数量低于平均水平。煤风化得很快,由于太阳的照射变碎了。这样的煤是当地农民购买,数量不大,而且只是在极其需要的时候才买。工人在自己家里不用这样的煤取暖。1927 年 9 月的煤炭积存量为 387 万吨。大多数煤不具备商业价值。”

伏龙芝矿井——原斯拉京矿井

矿井的状况与“克拉斯年卡亚”矿井相似。曾调查过“克拉斯年卡亚”矿井的那个委员会调查了伏龙芝矿井,得出如下结论:

“……为恢复矿井花掉了 17.216 4 万卢布,而顿涅茨克国营煤炭联合公司给它的拨款为 14.4 万卢布,与给“克拉斯年卡亚”矿井的拨款数目差不多。恢复这个矿井没有任何意义,在任何情况下,耗费这么多资金都不合算。伏龙芝矿井像‘克拉斯年卡亚’矿井一样,过去亏本,现在照样亏本。煤的成本平均每吨 10.75 卢布,却按 9.15 卢布的价格出售,有一定的亏损。煤的质量不好,这从附上的分析资料可以看出。生产出来的煤大量积存,堆积得越来越多,因为卖不出去。”

“泽姆利亚奇卡”矿井

上面提到的调查“克拉斯年卡亚”矿井的那个委员会也调查了“泽姆利亚奇卡”矿井。调查结果如下：

“……恢复煤矿用去 92 344 卢布，资金用得不值得——矿井是亏损的，煤的质量不好，没有销路。截止到 1927 年 9 月，仓库的煤积存了 13 929 吨，越积越多，煤在升温并逐渐失去商业价值，也就是说，这里的一切情况类似于‘克拉斯年卡亚’矿井和‘伏龙芝’矿井。”

“塔戈罗”矿井

被告人、工程师 C. A. 巴边科 1927 年 12 月 13 日在关于开采“塔戈罗”矿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供词里做了如下交代：

“……塔戈罗 1 号矿井的第一和第二矿层在革命以前就已经挖掘净尽。这个矿井曾属于塔甘罗格公司。这个公司的股东之一是马克西莫夫，他是察里津的木材商人。最近一段时间，塔戈罗 1 号矿井是在开采疏松煤层，这个矿井在国内战争期间已经废弃不用。矿层煤层厚度有 10—11 俄寸，煤炭质量不好，块煤很快就会散开。1921 年，不顾煤炭质量，开始恢复矿井。是谁首先提出恢复矿井的，我不清楚，是利布金德，或者是科尔加诺夫，但不管怎么样，后者应该知道矿井的状况。恢复矿井当然要根据一定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已经表明，恢复矿井是不合适的，因为我知道，在是否开采矿井的问题上，矿务局是犹豫不决的。我是从谢科赞那里知道的这件事的。矿井恰好是在为发展我国煤炭工业首次拨出大量资金的时期恢复的。当我转到矿务局采矿科时，塔戈罗矿井已经开始了开采，一昼夜生产 3 000—5 000 普特。煤炭销售十分困难。我来到矿务局的时候，无烟原煤已经积存了 80 万普特，而且这个矿井生产的煤是全矿务局价格最贵的。恢复和开采这个矿井亏损太大，明显不合理，1927 年春季，矿务局不得不暂停塔戈罗矿井的开采工作。这个矿井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亏损，对此，我甚至很难估量，但矿务局的领导人不可能不知道。在恢复矿井的时候，所有的开采工作都转向了储量很少的西部，不能转向北部，因为那里都是旧巷道，而且矿井有可能被淹没。塔戈罗矿区的煤，可以而且需要通过伏龙芝矿井进行开采，这不需要特别的开支，不需要建立特殊的机构，因为，从伏龙芝矿井有一条

骨干巷道通往塔戈罗采矿区”。

上边所说的那个委员会在调查塔戈罗矿井时,发现如下情况:

“……恢复矿井花费了40 449卢布。由于矿井亏损,今年春季被矿务局关闭。支出的资金白费了。现在积存的煤炭数量很难估算,根据矿务局截至今年9月的数据,为9 310吨,已经没有价值”。

被告人巴边科、巴什金、加夫里申科都是工程师,他们就开采“克拉斯年卡亚”、“塔戈罗”、“伏龙芝”和“泽姆利亚奇卡”等没有赢利的矿井所做的供词说,开采这些矿井是荒唐的,只有在在一个条件下可以这样干,那就是给苏维埃经济造成损失。

巴什金交代说:

“……我知道,开采这些矿井显然是无利可图的,在有诺沃—阿佐夫卡、别谢尔格涅夫卡矿井的时候,开采这些矿井显然是荒唐的。”

巴边科交代说:

“……克拉斯年卡亚、塔戈罗、泽姆利亚奇卡矿井是在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和专家集团的经理别列佐夫斯基施加的压力下恢复的。但大家显然都知道,开采克拉斯年卡亚矿井和塔戈罗矿井不会产生利润。与此同时,在H. H. 别列佐夫斯基的直接参与下,硬是逼迫沿采石场方向为开发新矿井打基础,为什么没有为这些矿井打基础,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1927年对那里的勘探结果是否定的。在那里为矿井打基础纯粹是浪费金钱。明明知道克拉斯年卡亚、塔戈罗、泽姆利亚奇卡矿井是亏损的,还非要继续开采这些矿井。所有这些事情都是H. E. 科尔加诺夫批准的,他同戈尔列茨基、别列佐夫斯基有紧密的联系。戈尔列茨基到矿务局工作的时候,曾在科尔加诺夫那里住过。”

加夫里申科在1928年1月26日交代说:

“……前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的破坏工作表现在:1. 开采‘十月革命’矿井的疏松矿层,这里的煤除了没有销路以外,开采成本太高,减少了企业的利润。2. 开采克拉斯年卡亚矿井,同样是开采疏松矿层。3. 开采原斯拉京矿井,同样是开采疏松矿层。4. 开采原塔甘罗格公司的矿井,同样是开采疏松矿层。”

各种煤炭,在大块煤含量30%的情况下,售价为17戈比,而开采成本则不少于20戈比,如果开采500万普特,那么矿务局就要亏损15万卢布,绝不会少,更何况还要占用为电力装备服务的设备,而这些设备本来是可以加强那些能够开采质量更好,价格更低廉的煤的机械化的”。

加夫里申科1928年1月29日交代说:

“……问题是由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工程师戈尔列茨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拟订的。开采这些矿井的任务交给了科尔加诺夫,工程师别列佐夫斯基为执行这个任务专门来到了这里。矿井明显亏本,开采这些矿井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安装真正好的设备,合理地进行工作,才能提高这里煤的开采量。这种质量的煤炭哪里都用不上,无论如何也卖不出去。做这件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大量损害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经济。任务的另一个目的是,在完成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局提出的计划时,为过去的老板保留好煤层。”

委员会的结论很有意思,它指出,干的这些工作破坏了生产。委员会在做出这些结论的时候,对这里引证的被告人供词还没有概念(那时还没有这里引用的口供,因为被告人还没有招供)。

委员会得出结论说,安德烈·科洛杜布、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和矿务局采矿科在开采克拉斯年卡亚、伏龙芝、泽姆利亚奇卡和塔戈罗等矿的问题上是有罪的。所花费的这些资金可以用来恢复诺沃—阿佐夫卡矿井、发展“II”区“无产阶级专政”矿井和沃罗夫卡矿井第二煤层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好处,矿务局的领导人对此不会不了解。鉴定书说,克拉斯年卡亚、伏龙芝、泽姆利亚奇卡等小矿井虽然亏损,但工作还是可以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沃罗夫卡”、“克拉辛”等矿井,工作无计划、经营不得法,对生产造成了破坏。委员会的鉴定书确认,矿务局不顾克拉斯年卡亚、伏龙芝和泽姆利亚奇卡等矿井的明显亏损、煤炭的大量积压、无销路,还计划再开采这些矿井5年,也就是说一直到1933年。

十、被告人简况

1. 加夫里申科, H. A. 在白卫军统治时期,曾在反间谍局工作,他出卖的工人被枪杀。他经常殴打工人。有受贿行为。故意制造大量事故和进行各种破坏机器的活动。一贯进行破坏我们经济的活动。

H. A. 克拉季科, 沙赫特反间谍局的内线组长,在1927年10月27日的审讯中交代了加夫里申科的下述活动:“至于 H. A. 加夫里申科的人品,应当说他不止一次到我们的反间谍局,就像自己人一样。和马克斯有过长时间的交谈,马克斯是反间谍局的一名工作非常积极和有头脑的工作人员,他们常常乘坐加夫里申科的车出去。

“除了刚才说的马克斯以外,加夫里申科同反间谍局所有负责人、领导人,如

菲拉托夫、莫纳斯特尔斯基、阿维洛夫和反间局局长普鲁坚托夫本人都很熟”。

П. Ф. 普鲁坚托夫,是沙赫特反间局前局长,在1927年10月22日的审讯中讲了加夫里申科的如下情况:“我认识H. A. 加夫里申科,我是通过我在反间局的助手菲拉托夫的介绍同他认识的。我很了解H. A. 加夫里申科,他也应当知道。加夫里申科在我们反间局是自己人,他是我的助手菲拉托夫很要好的朋友,他们俩常在一起喝酒,对酒的嗜好使他们俩成了朋友,联在了一起。H. A. 加夫里申科不只一次到过我们反间局;来访就是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对于我们反间工作有价值的情报。毫无疑问,加夫里申科同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他到我们这里来,同我们交换关于工人群众状况、工人的思想情绪的印象和情报。加夫里申科是自愿工作的,他不是我们的秘密工作者,我不给他钱,他也不需要那些钱,因为他本身的职务工资就足够了。他是有知识的人,我从来没有和他谈过支付他劳务费的问题。例如,根据加夫里申科提供的情报,我们从二号矿井挖出了一名赤卫队员,根据对他的反间谍侦查,由军事法庭判处他枪决。还可以指出另外两个工人,一名是丘尔辛,一名是谢姆金,前者也已经被枪毙。还有一些其他的情报,我不记得了。我再多的证词没有了”。

2. 科尔加诺夫, H. E. 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总工程师,领导了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全部破坏工作。同哈尔科夫中心联系密切。接受国外的任务。根据加夫里申科的供词,他通过工程师库兹马向波兰传递情报。

П. Ф. 普鲁坚托夫,在1927年12月22日的审讯中就科尔加诺夫同反间局的关系提供如下情况:“在沙赫特反间局从亚力山德罗—格鲁谢夫斯克市撤走以后,我来到罗斯托夫整个东南地区反间局总部,所有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也就是呆了4天或者5天,一直呆到总部撤出罗斯托夫。当时来到罗斯托夫的还有诺沃切尔卡斯克反间局局长、海军准尉(之后为中尉)伊林斯基。他告诉我,他在1919年夏天,具体月份我没有记住,同反间局局长上校格拉佐夫出差到沙赫特区,然后沿着东南铁路寻找某些反革命分子(这一切似乎是在搞奸细行为)。在回来的路上,伊林斯基海军准尉认识了彼得罗帕夫洛夫卡矿井主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应邀到他家里做客。伊林斯基海军准尉嗓子很好,男低音,科尔加诺夫的妻子嗓子也不错,女高音。这样伊林斯基海军准尉就受到了科尔加诺夫一家的热情接待,在他那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后来不断到他那里去。工程师科尔加诺夫同诺沃切尔卡斯克反间局局长就这样建立起了联系。事情很明显,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伊林斯基海军准尉是科尔加诺夫妻子合适的

伙伴;还有伊林斯基海军准尉在侦查机构中的职务和科尔加诺夫不愿意让红军到来并掌管矿井,这才是把他们联系起来的主要原因,他们的联系是以此为基础的。还有,科尔加诺夫同沙赫特反间局有密切的联系,他的套着两匹带有深色圆斑点灰马的马车不止一次停在我们反间局的门前。他同沙赫特反间局建立联系又是因为他害怕红军的到来。每次到我们沙赫特反间局来,科尔加诺夫工程师都把彼得罗帕夫洛夫卡矿井工人的情绪告诉我们,指名道姓地讲那些比较突出的工人、宣传员和具有布尔什维克精神的人。当然,反间局要根据工程师科尔加诺夫提供的情报进行分析研究。我在波塔图耶夫工程师那里也不止一次遇到过科尔加诺夫工程师。波塔图耶夫工程师就住在反间局所在的院子里。”

3. 瓦西利耶夫,Ф. Т. 曾参加过孟什维克,曾是小矿产主,在白卫军时期是农村的匪首,还是匪帮首领库丘姆的助手。对工人极其粗暴,殴打工人,曾被一个矿井解职,因为工人们想把他用独轮手推车推走。现有共产党员Г. М. 杰尼索夫于1927年12月16日证明Ф. Т. 瓦西利耶夫是挑唆者的证词:

“我1903年在苏林工厂做工时认识了Ф. Т. 瓦西利耶夫。他是社会民主党地下组织的成员。1905年,他在苏林的革命运动中工作表现突出,因而被捕。之后,我于1909—1910年在沙赫特市见到过他。他在2号矿井工作。E. K. 科洛杜布在那里把他派往工长学习班学习。1914年我在弗拉索夫卡工作。按K. M. 切尔诺科佐夫的话说,动员入伍之前,Ф. Т. 瓦西利耶夫骑自行车来到弗拉索夫卡来找切尔诺科佐夫,同他进行了谈话,谈话的题目是,我们这些弗拉索夫卡矿井的人想要为被动员入伍的人搞个欢送,当时瓦西利耶夫同弗拉索夫卡矿井的人没有联系,根本就没有听到他参加过革命工作的事。在瓦西利耶夫到我们这里拜访之后,切尔诺科佐夫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就被保安逮捕了。按切尔诺科佐夫的话说,他被捕之后,警察所所长审问他的问题就是瓦西利耶夫同他谈话的那些问题。”

4. 科洛杜布,E. 白卫军统治时期曾在反间局工作,自己掏钱为反间局的办公地点安装设备。切尔涅佐夫是著名的白卫军游击队队员,曾在他家里住过,1919年被红军枪毙。叶梅利扬·科洛杜布在革命前曾经驱散过工会。他在当工厂技校校长的时候,曾导致了学校罢课。

K. H. 克拉季科,是沙赫特反间局的内线组长,在1927年10月27日的审讯中有下列供词:

“格鲁谢夫斯克无烟煤公司经理,也就是以前的矿产主叶梅利扬·基里洛维奇·科洛杜布,经常到反间局去。我知道,E. K. 科洛杜布给反间局局长、宪兵

大尉普某提供过房子,他的姓我记不得了,我记得好像是萨佐诺夫。我知道,E. K. 科洛杜布除了为萨佐诺夫提供房子以外,还为这所房子安置了必要的家具。科洛杜布常常到反间局,就像我们自己的人一样。反间局的所有负责人和领导人,从局长,那个宪兵大尉普鲁坚托夫到他的助手菲拉托夫和后来的莫纳斯特尔斯基,都很重视、尊重科洛杜布。反间局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很重视科洛杜布。很明显,这种关系是由于科洛杜布对于反间局特别有用处”。

沙赫特反间局局长 П. Ф. 普鲁坚托夫有下列证词:“有很多工程师和技术员到我们这里来过,向我们通报工人状况。我记得他们中间除了加夫里申科以外,常来的还有 E. 科洛杜布、A. 科洛杜布。我特别清楚地记得有叶梅利扬·科洛杜布。”

5. 巴边科, C. A. K. H. 克拉季科 1927 年 10 月 27 日提供了下列证词:“我在反间局不止一次见到 C. A. 巴边科。巴边科那时是马卡里耶夫斯克矿井主任,准确些说是萨莫伊洛夫所在的矿井的主任。C. A. 巴边科像科洛杜布一样,同反间局的所有领导人关系很好,毫无疑问,他向反间局提供了用得着的情报。”

П. Ф. 普鲁坚托夫, 1927 年 10 月 28 日在审讯中供认说,“埃利阿泽、古泽尔和巴边科”经常到反间局去。

除此而外,巴边科对在“无烟煤工业公司”矿井干活的被俘红军战士特别凶残。

6. 科洛杜布, A. “克拉斯年卡亚”矿井的前股东。在白卫军统治时期与反间局有联系。在革命前,参与过驱散革命群众的秘密集会和工会。在无烟煤工业公司的工人当中安插过使探。由于他对工人粗暴,引起工人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一名工人曾暗地里要枪杀他。他曾命令工人把悬挂在木杆上的苏维埃旗帜撤下来撕成碎片。在十月革命节时不让制作红五星。在庆祝十月革命节时,命令把悬挂起来的红旗撤下来,说:“把那块红布撤下来,别让它在那里飘动”。

K. H. 克拉季科和 П. Ф. 普鲁坚托夫证明说, A. 科洛杜布经常到他们的反间局去。

П. Я. 库普里亚诺夫, 在 1927 年 12 月 23 日的审讯中作证说:“1919 年,在白卫军统治时期,我在沙赫特反间局干了近 5 个月,一开始做内线,之后做武装看守。在这段时间内我看到 A. K. 科洛杜布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老往反间局跑。他到反间局有时同局长普鲁坚托夫谈话,有时同副局长莫纳斯特尔斯基谈话,或者同他的副官马克斯谈话。”

“A. 科洛杜布在 1917 年至 1918 年期间曾雇用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女仆。1918 年白卫军逃跑时,科洛杜布把女仆留下来给他看东西。女仆把他的东西藏在自己的亲戚家里,一直到白卫军后来掌管了矿井。A. 科洛杜布同白卫军回来以后,发现他妻子的一件连衣裙没有了。女仆被捕,被枪毙。她被迫害的主要原因是她当红军战士的弟弟随同红军撤走了。”

7. 别列佐夫斯基, H. H. 无烟煤工业公司的前股东。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破坏活动的领导人之一。淹没诺沃—阿佐夫卡矿井的发起人。企图炸毁沃罗夫卡矿井的发起人之一。

Д. Е. 科斯基, 沙赫特反间局的文书官, 1927 年 12 月 21 日作证如下: “我在反间局做文书官。我的房间挨着沙赫特反间局局长、宪兵大尉普鲁坚托夫, 他的助手莫纳斯特尔斯基、萨佐诺夫和菲拉托夫的办公室。来人到他们的办公室必然要经过我的房间, 因此, 我能看到谁到局长的办公室。这是 1919 年的事。我记得, 2 号矿井的采矿工长 H. A. 加夫里申科经常从彼得帕夫洛夫卡矿井到莫纳斯特尔斯基的办公室, H. H. 别列佐夫斯基工程师经常到局长那里去。我记得, 他们是骑马来的, 而加夫里申科好像是步行来的。这些人来过之后, 反间谍局总要从矿井抓走一批工人”。

П. Ф. 普鲁坚托夫, 沙赫特反间局局长, 1928 年 1 月 3 日作证说:

“我想起了别列佐夫斯基工程师, 他是彼得帕夫洛夫卡矿井主任, 身材高大魁梧, 大胡子, 我同他关系不是特别好, 因此他到我们侦查机关来, 要么是通告矿井发生的事情、工人中有什么样的情绪, 要么是我们叫他来, 想通过他了解我们感兴趣的情报。我们的情报机关按他提供的情报要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说搜查、逮捕等。”

在白卫军掌管矿井的时候, 向工人们发口粮, 这是矿场面包房制作的面包。面包质量太差。工人们闹事了。有一次形成了抗议。别列佐夫斯基向工人们宣布: “你们等着瞧吧, 以后这样的面包也不会给你们”。出现了骚动。人们要别列佐夫斯基离开矿井, 他就走了。

8. 萨莫伊洛夫, B. H. 曾为矿产主。试图爆炸沃罗夫卡矿井的组织者之一。他同科尔加诺夫一起领导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破坏活动。

П. Я. 库普里亚诺夫, 沙赫特反间局的内线, 1927 年 12 月 22 日作证说: “我在沙赫特反间局做了 5 个月的侦探和武装守卫。在这段时间内, 我看到原来的矿主瓦西里·尼基福罗维奇·萨莫伊洛夫常常在白天和晚上到反间局来, 或者同反间局局长普鲁坚托夫或者同他的助手莫纳斯特尔斯基或者同副官马克斯

谈话。”

9. 巴什金, А. Я. 弗拉索夫卡变电站站长助理。同国外有联系。从国外得到一系列破坏机器的任务。制造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故。

П. Ф. 普鲁坚托夫, 在 1928 年 1 月 3 日受审时供认说:“我记得还有两个人在 1919 年不止一次到我们情报局来, 这就是巴什金, 名字叫阿布拉姆。似乎记得他是彼得罗帕夫洛夫卡的机械师。他长着典型的犹太人的脸, 矮个, 大胡子, 对被俘的红军战士特别凶恶。”

10. 科洛杜布, К. 矿产主的儿子, 采矿工程师, 当过白卫军军官。他说过, 苏维埃政权不让他过安静生活, 苏维埃政权不会持久, 他不想为这个政权服务, 不想为这个政权工作。

П. М. 拉金, 1928 年 1 月 28 日作证说:“К. Е. 科洛杜布是煤矿工业主的儿子,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 1918 年秋, 他、科洛杜布, 是白卫军军队的军官, 好像是中尉或者是少尉, 与反间机关有联系, 抓捕过革命工人。我清楚地记得, К. Е. 科洛杜布同侦探一起到我们家里搜寻红军。在这一期间, К. Е. 科洛杜布抓走了我所认识的红军战士——帕尼科夫和伊格纳特·索罗维约夫。后来这些红军战士被枪杀了。К. Е. 科洛杜布是积极追捕红军战士的军官”。

11. 利托夫琴科, 参加过红军, 投靠过白卫军并把密令交给谢米列托夫将军。谢米列托夫的军队按照他的指引进攻并占领了沙赫特矿场, 在一个矿井砍死了 90 名工人, 在另一个矿井砍死了近 300 名工人。怀疑利托夫琴科曾在白卫军的反间机关工作过, 但尚未得出侦查结果。

12. 乌萨诺夫, 将军的儿子, 在白卫军时期曾在白卫军服役。在搜查时发现他有可疑地图和黑帮传单。他承认, 他没有能完成委托给他的工作。

其他被告人的情况与上述被告人的情况类似。

结 论

综上所述, 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 “格鲁谢夫斯克无烟煤公司”的前股东们, 他们的近亲, 忠于他们的、与他们有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专家们, 一系列小煤矿的前矿产主及其承租人, 几年来一直在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工作。这个集团的人在感情上是反苏维埃的, 是在顿巴斯工作的那个组织的一部分, 几年来一直从事破坏顿巴斯经济的活动。

2. 这个集团(组织)通过在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委员会工作的专家们(戈尔列茨基、卡扎里诺夫、杰捷尔等工程师)同原煤炭工业企业主——在波兰的德沃尔然奇克(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前股东)、在柏林的什卡夫(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前股份公司的董事长)以及帕拉莫诺夫、奥尔巴赫等人沆瀣一气。

原来的矿产主通过德国某些公司的代表(“А. И. Г.”公司的迈尔、韦格纳、奥托,“克纳帕”公司的科斯捷尔)向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和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专家们交代任务。

促使专家们完成其原来主子交代的命令和任务的动机既有思想上的也有物质上的。参加该组织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几乎每个月都能领取额外的酬金,这些酬金一般相当于他们的月薪,除此而外,还领取100—500卢布不等的完成任务的奖金。

曾经许诺,在将来发生政变时,主要参与人员可以成为各个企业的股东,次要参与人物将得到好的职位。现在,他们被领导头目安排在了好的职位上,通过发奖金、加班费和差旅费等办法,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

涉及本案的所有被捕人员,在白卫军统治时期,几乎都在反间机关工作过或者与它有联系。

3. 参加这个集团的原股东及其帮手实际上是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各个部门的主人,专家的招聘与解聘掌握在他们手里,这是因为技术工程部控制在他们手里。涉及工人的一系列问题(住宅建设、开采定额、工资等)几乎都是他们说了算,因为是他们支配贷款,他们负责制订计划,他们制定开采定额,他们雇用工人,他们解释集体劳动合同,等等,等等,他们就是用这些来损害苏维埃政权。统计矿产、制定矿藏开采计划,安排生产(生产合理化、生产机械化等)等工作都要取决于他们。

4. 上述集团将这个状况全部用来进行反对苏维埃的活动:

1)对各种机器和设备制造大量的大大小小的事故。
2)在大型设备(锅炉、涡轮机)的安装、割煤机的分配上,即便是外行人也能看出,工作的安排是混乱的,设备的使用是不合理的。

3)花掉了60万卢布用于恢复和投产很多得不到利润的矿井——“克拉斯年卡亚”、“伏龙芝”、“塔戈罗”、“泽姆利亚奇卡”,煤炭产量微乎其微(500万普特),质量极差,没有用处,没有销路,造成的损失每年在15万卢布以上,这还不算可以用在主要矿井上的人力和物力。

4)故意掩埋、堵塞一系列矿井,如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克拉辛掘进段,5号矿井,即弗拉索夫卡原来的斯塔罗—阿佐夫矿井以及很多其他矿井。

5)上述专家集团淹没了大量储藏量丰富、质量好的煤层和矿井(“诺沃—阿佐夫卡”矿井,1号矿井东侧、“十月革命”矿井2号煤层、沃罗夫卡矿井3号煤层、“世界公社”矿井深层煤层等),它们的排水工作就进行(更准确地说是拖延)了5—7年,其中只有沃罗夫卡矿井和“十月革命”矿井的煤层排完了水,但直到如今那里的工作也没有进行。这些现象说明工作安排得不正确或者是怀有恶意。

从这一系列现象(少算工人工资、错误制定定额、粗暴对待工人、某些人经常破坏集体合同、殴打工人、专家们不愿意修缮工人宿舍等)看出,专家与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十分不正常,暴露出了这帮专家在工人中间制造对党、对工会和苏维埃政权的不满、煽动工潮和罢工的一套做法。

从专家们的自身行动(试图有组织地退出工会、在技术工程部里分配津贴、把共产党员和有苏维埃倾向的工作人员从负责岗位上排挤走)可以看出这帮专家的反苏维埃情绪,看出他们反对苏维埃的程度和他们是有一组织的,等等。

尽管有上述情况,不能不承认:

1. 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委员会、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主管人、党组织、工会组织没有足够重视挑选专家,认真审查他们的政治面貌、他们过去的经历,考察他们的现实活动。

不管是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还是有关组织,几乎没有任何监督,没有进行主人的监督。

2. 矿山的统计工作做得不好,对矿山的开采潜力重视不够,对这一工作完全没有给予充分重视。

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几乎完全没有党的监督,在这个问题上太没有保留地和过分地信任专家。

3. 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和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委员会的主管人以及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对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的生产关心程度不够,结果让专家们不受监督地制订生产计划、安排矿井和个别矿层的投产和停产、实施生产机械化和生产合理化,不受监督地安排所有的技术工作,使生产脱离了党的领导。

4. 工会组织没有充分重视工人们的大量控诉,不够积极地弄清和改善工人

的生活状况,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在这些问题上对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行政领导施加的压力不够。放任反革命分子控制工程技术部等。

所有这一切说明,当前的形势要求党组织、工会组织,以及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局立即严肃过问如何排除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矿务局和弗拉索夫卡矿务局工作中的严重缺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558号全宗,11号目录,132号案卷,第3—18张,原件,印刷文本。)

3

И. В. 斯大林
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

(1928年4月13日在联共(布)莫斯科
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¹³⁹)

同志们！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具有一个和最近两年来举行的各次全会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这次全会完全是切实解决问题的会议，是没有党内争吵的会议，是没有党内紧张局面的会议。

排在议程上的都是最迫切的问题：粮食收购问题，沙赫特案件问题，以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工作计划问题。你们可以看出，这些问题都是相当重要的。虽然如此，全会上的讨论还是完全切实的，而决议也是一致通过的。

这是因为全会上已经没有反对派了。这是因为人们都以严格的切实的态度，不要派别手腕，不进行派别煽动。这是因为只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只是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党才有可能认真地和切实地处理实际问题。

这就是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我们所进入的这个发展阶段的好的方面，也可以说，无比有利的方面。

一、关于自我批评

全会工作的特点、全会讨论和全会决议的特点是：全会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极严厉的自我批评的精神下进行的。不仅如此，在全会的每一个问题上，在每

一次发言中,都对我们工作的缺点进行了批评,我们的组织都进行了自我批评。对我们缺点的批评,党、苏维埃和经济组织的真诚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这就是全会工作的总的精神。

我知道,党的队伍里有一些人一般不喜欢批评,尤其不喜欢自我批评。这些人,我想可以把他们叫做“涂了漆的”共产党员(笑声),他们逃避自我批评,经常发牢骚说:又是这该死的自我批评,又是揭发我们的缺点,——能不能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呢?显然,这些“涂了漆的”共产党员和我们党的精神,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既然人们有这种情绪,既然远不是热情地对待自我批评的人有这种情绪,那么请问:我们需不需要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从何而来?它有什么好处?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认为没有自我批评,我们的党就无法前进,就无法割开我们的脓疮,就无法消灭我们的缺点。而我们的缺点是很多的。这一点必须公开老实地承认。

自我批评口号不是一个新口号。它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基础。既然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领导专政的是一个党,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共产党,那么,我们要前进,我们自己就应当揭露和纠正这些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此外不会再有人来揭露和纠正这些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同志们,自我批评应当成为推动我们向前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力量,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自我批评口号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特别有力地贯彻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党内形成了一种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新情况。

这种新情况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我们这里再也没有或者几乎再也没有反对派了。表现在我们党内由于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派(这个胜利本身对党非常有利)而可能产生一种高枕无忧、安然自得,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熟视无睹的危险。

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派,这对我们党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个胜利本身包含着特别不利的方面,那就是党内可能滋长自满自足、自以为是的情绪而安于既得的成就。而安于既得的成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再不用前进了。为了不使这种情形发生,我们就需要自我批评,但不是反对派所进行的那种恶意的、实质上是反革命的批评,而是真诚的公开的批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

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估计到这种情况,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从那时起,自我批评的浪潮就日益高涨,它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会议的工作上也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如果怕我们的敌人(国内的敌人和国外的敌人)利用我们对缺点的批评来叫嚣:嘿,他们布尔什维克那里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利呵,——那就奇怪了。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怕这一点,那就奇怪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正是在于它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让党,让布尔什维克,让我国一切诚实的工人和劳动者来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我们建设中的缺点;让他们指出消灭我们这些缺点的途径,使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建设不会有保守、停滞和腐败的现象,使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日益改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主要的就是这一点。至于我们的敌人,那就让他们去乱谈我们的缺点吧,——这种无聊的事情是不会也不应当使布尔什维克不安的。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推动我们去进行自我批评。我指的是关于群众和领袖的问题。最近我们这里领袖和群众之间开始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这里出现了、历史地形成了一批领导者,他们的威信越来越高,他们几乎成了群众所无法接近的人物。另一方面,一般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群众,却上升得非常慢,他们开始眯着眼睛从下面向上望领袖,并且往往怕批评自己的领袖。

当然,我们这里形成了一批上升得非常高并且有很高的威信的领导者,这个事实本身是我们党的巨大的成就。显然,没有这样一批有威信的领导者,要领导一个大国是不可设想的。但是,领袖上升的时候逐渐离开群众,而群众开始从下面向上望他们,不敢批评他们,这个事实就不会不产生领袖脱离群众、群众离开领袖的某种危险。

这种危险会使领袖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十全十美。而领导上层骄傲自大,开始从上面向下看群众,这会有什么好处呢?显然,除了党遭到毁灭以外,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可是,我们要的是前进,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毁灭党。正是为了前进并改善群众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就应当时时刻刻敞开自我批评的大门,应当使苏维埃人有可能“责骂”自己的领袖,批评他们的错误,使领袖不会骄傲自大,而群众也不会离开领袖。

有时人们把群众和领袖的间距同提拔的问题混为一谈。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虽然提拔新的领袖一事值得党的严重注意,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保存已经提拔起来而且极有威信的领袖,并在他们和群众之间建立经常的牢不

可破的联系。问题在于要通过对我们缺点的自我批评和批评来组织党内的广泛的舆论,来组织工人阶级的广泛的舆论,使之成为生动敏锐的道义上的监督;极有威信的领导如果要保持党和工人阶级对他们的信任,就应当倾听这种监督的呼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报刊的作用,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的作用,的确是不可估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不欢迎《真理报》创办《工农检察院专页》来经常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不过,批评必须力求严肃深刻,不应该流于表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应当欢迎《共青团真理报》发起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展开猛烈而热情的进攻。

有时人们骂批评者,说他们的批评不全面,说批评有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人们往往要求批评的每一点都是正确的;如果批评不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对批评就加以指摘和谩骂。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误看法。你们只要提出这种要求,就会把成千上万愿意纠正我们的缺点但是有时不善于正确表达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的嘴巴堵住。这是坟墓,不是自我批评。

你们应当知道,工人有时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有点怕说实话。他们害怕,不只是因为怕说了会“挨整”,而且也是因为怕批评得不全面会遭到“嘲笑”。普通工人或普通农民虽然亲身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计划有缺点,但他们哪里能够头头是道地论证自己的批评呢?如果你们要求他们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你们就会取消任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评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即使批评只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真理,也应该表示欢迎,细心听取,看到它有好的地方。再说一遍,否则你们就一定会把成千上万忠实于苏维埃事业的人们的嘴巴堵住;他们虽然还不大善于批评,但他们说的却是真理。

正是为了发扬自我批评而不是扼杀自我批评,正是为了这一点,必须细心听取苏维埃人的一切批评,即使批评有时不完全正确或者不是各方面都正确。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确信:他们不会因批评不全面而“挨整”,也不会因批评有某些错误而遭到“嘲笑”。只有这样,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具有群众性,才能真正得到群众的响应。

不言而喻,这里指的不是“任何”批评。反革命分子的批评也是批评。但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威信,摧残我们的工业,瓦解我们党的工作。显然,我们指的不是这样的批评。我说的不是这样的批评,而是那种来自苏

维埃人的批评,是为了改善苏维埃政权机关、改进我们的工业、改进我们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而进行的批评。我们需要批评是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而不是为了削弱它。正是为了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正是为了这一点,党才宣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

我们期待于自我批评口号的首先是什么呢?如果自我批评口号得到正确的和诚实的执行,那么它会给我们产生什么结果呢?它至少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加强他们对我们缺点的注意,使这些缺点容易纠正,使我们的建设工作不至于发生任何“意外”。第二,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水平,增强他们的国家主人翁感,使他们容易学会管理国家。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不仅沙赫特案件,而且1927年年底的收购危机,对我们很多人都是“意外”呢?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沙赫特案件。一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家按照国际资本反苏组织的指示活动了五年。五年来我们的组织草拟并分发了各种各样的决议和决定。当然,我们的煤矿工业总还是上升的,因为苏维埃经济制度如此富有生命力,如此强大,尽管我们不用脑子而且有了错误,尽管专家们进行破坏活动,它还是占了上风。五年来,这批反革命专家在我们工业中进行暗害活动,炸毁锅炉,毁坏涡轮机等等。而我们却视而不见。“突然间”,好似晴天霹雳,——沙赫特案件发生了。

同志们,这是正常的吗?我认为极不正常。掌着舵,睁着眼,但是当某种灾难临头之前,竟什么也看不到,——这不能算是领导。布尔什维主义不是这样理解领导的。要领导就应当有预见。而预见,同志们,不是什么时候都容易做到的。

一种情况是:十来个领导同志注意和发现我们工作的缺点,而工人群众却不愿意或不能够注意和发现缺点。这里一定会忽略一些缺点,不能把所有的缺点都发现出来。另一种情况是:千百万工人和十来个领导同志一起来注意和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揭露我们的错误,承担起共同的建设事业,并指出改进工作的途径。这里就更能保证不会发生意外,保证及时发现不良现象并及时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些现象。

我们必须使工人阶级的警惕性不断提高,而不要使它丧失;我们必须使千百万工人都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我们不仅必须使十来个领导者,而且必须使千百万工人和农民都来十分关注我国建设的进程,指出我们的错误,揭露我们的错误。只有这样,我们这里才不会发生“意外”。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缺点展开来自下面的批评,我们必须使批评成为群众性的批评,

我们必须领会并贯彻自我批评的口号。

最后,谈一谈和实行自我批评口号有关的问题,就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力量,培养他们管理国家的技能的问题。列宁说过:

“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¹⁴⁰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

不发挥工人的力量和才能,不发挥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力量和才能来批评我们的错误,指出我们的缺点并推进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培养工人阶级的这种技能和本领呢?显然不能。

为了发挥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力量和才能,并使他们能够获得管理国家的技能,需要做些什么呢?这首先需要真诚地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进行自我批评,真诚地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展开来自下面的批评。工人们能够公开和直接地批评工作中的缺点,改进和推动我们的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工人积极参与了国家、经济和工业的领导工作。而这就不会不增强工人的国家主人翁感,不会不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警惕性和文化水平。

工人阶级的文化力量问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统治阶级中,工人阶级这一统治阶级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是有点特殊和不十分有利的。所有以前的统治阶级——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同时又是富有阶级。他们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学到管理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工人阶级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贫穷阶级,它过去没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学到管理的知识和技能,只有现在,在取得政权以后,才得到了这种可能。

我国文化革命问题的迫切性也就在于此。固然,苏联工人阶级在其统治的十年内,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比地主和资本家在几百年内所获得的要大得多。但是,从国际和国内情况来看,我们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因此,凡是能够提高工人阶级文化力量的发展水平的手段,凡是能够有助于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的手段,我们都应当尽量利用。

根据上面所说的应当得出结论说:自我批评口号是用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力量、培养工人阶级管理技能的极重要手段之一。由此又得到一个根据,证明贯

彻自我批评口号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要求我们把自我批评口号作为当前口号的根据大体上就是如此。

因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在自我批评的精神下进行是毫不奇怪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粮食收购问题吧。

二、关于粮食收购问题

首先,我来略为谈谈去年年底在我国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的实质。实际情况是这样:从去年10月起,我们的收购量开始下降,12月降到最低点,到去年年底,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有了1.3亿普特的缺额。我们本年度的收成大概不比上年度坏,也可能比上年度稍差一点。过去积存的粮食本年度比上年度多,一般认为本年度我国的商品粮食不比上年度少而比上年度多。

根据这种情况,本年度的收购计划订得比上年度稍微高了些。尽管如此,收购量却下降了,到1927年年底,我们缺粮1.3亿普特。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国内粮食很多,而粮食收购量却在下降,使城市和红军受到饥饿的威胁。

这种“奇特的”现象该怎么解释呢?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偶然性呢?有许多人喜欢这样解释,说我们打瞌睡了,说我们忙于对付反对派了,因而忽略了一些事情。说我们真的打瞌睡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这里拿打瞌睡来解释一切,那就大错特错了。更不能把收购危机说成是偶然的。这样的事情不会是偶然的。这种解释未免太不值钱了。

那么,造成收购危机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里至少有三个条件。

第一,在我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有困难的。首先,我指的是发展城市工业的困难。本来应当拿各种各样的商品投放农村,以便从农村取得最大数量的农产品。为此就必须比现在更迅速地发展我国工业。但是要加紧发展工业,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积累的速度。可是,同志们,要达到这样的积累速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由此就产生了农村商品供应不足的现象。

其次,我指的是我们在农村建设方面的困难。同志们,农业增长得很慢。本来农业应当一日千里地发展,粮食应当愈来愈便宜,收成应当不断提高,肥料应

当尽量使用,粮食生产的机械化应当迅速发展。但是,同志们,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没有出现,而且也不会很快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农业是小农经济,很难接受重大的改进。统计数字说明,战前我们全国约有1600万个体农户,现在我们约有2500万个体农户。这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小农经济国家。小农经济是什么呢?这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提供商品最少的经济。同志们,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肥料、机器、农学知识以及其他改进办法,这都是些在大农场中可以有效地采用,而在小农经济中没有采用或者几乎没有采用的东西。这就是小农经济的弱点。这也就是它竞争不过富农的大农场的原由。

一般说来,我们农村中是不是有采用机器、肥料、农学知识等等的大农场呢?是的,是有的。1)这就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是,同志们,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很少。2)这就是富农的大农场(资本主义农场)。这种农场在我国并不算少,它们在农业中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我们在农村中能不能走鼓励私人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呢?显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要加紧在农村中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类型的大农场,努力把它们变成国家的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粮食工厂。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全力展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口号。

如果以为集体农庄只能由贫农阶层组成,那就错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我们的集体农庄应当是贫农和中农的农庄,即,这不是只包括一批人,而是包括整个村子的农庄。应当给中农指出前途,告诉他们:通过集体农庄,他们能够最顺利最迅速地发展经济。既然中农不能上升成为富农,而下降为贫农又是不合理的,那就应当给他们指出前途:他们可以通过集体农庄建设来改善经济。

但是,目前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很少,少得不像话。由此就产生了我们在农村建设方面的困难。由此就产生了我们粮食生产不足的现象。

第二,由此可见,我们在城市 and 农村建设中的困难就是收购危机得以爆发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说,收购危机正应当在本年度爆发。大家知道,这些困难不仅本年度有,上年度也有。可是,为什么正是在本年度爆发了收购危机呢?秘密何在呢?

秘密在于富农在本年度已经有可能利用这些困难来抬高粮价,进攻苏维埃价格政策,从而阻挠我们的收购工作。而他们所以能够利用这些困难,至少有两

个原因：

一是三年的丰收起了作用，富农在这个时期内成长起来了，整个农村，特别是富农，在这个时期内都积下了粮食，因此，富农就有试图操纵粮价的可能了；

二是富农得到城市投机分子的支持，这些投机分子哄抬粮价，使价格上涨。

当然，这还不是说，富农是粮食的主要持有者。持有大部分粮食的主要和基本的群众是中农。但是富农在农村中有一定的经济权威，所以在价格问题上有时能使中农跟着他们走。因此，农村富农分子就有可能利用我们建设中的困难来进行投机，抬高粮价。

如果像富农和投机分子所做的那样，把粮价抬高40%—50%，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就是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假定说，那时我们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得不提高工业品的价格，从而即使工人阶级也使贫农和中农在物质生活方面受到打击。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无疑意味着直接破坏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

但是问题还不限于此。假定说，我们在今年1月或今年春季即准备播种之前把粮价提高40%—50%。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那时我们的工业原料基地就会遭到破坏。棉农就会不种棉花而改种粮食，因为种粮食更有利。麻农就会不种亚麻，也改种粮食。种甜菜的农民也会这样做。以此类推。简单说来：我们的工业原料基地就会由于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投机野心而遭到破坏，但是还不仅如此。假如我们在今年春季提高了粮价，那么我们一定会害了贫农，因为贫农在春天既需要买口粮也需要买种子。贫农和下中农也就有充分权利对我们说：你们欺骗了我们，因为去年秋天我们按低价把粮食卖给你们，可是你们现在却要我们按高价来买粮食，——苏维埃人先生们，你们到底保护谁？保护穷人还是保护富农？

正因为如此，党对富农抬高粮价这一投机进攻必须予以回击，以便打破富农和投机分子拿饥饿来威胁工人阶级和我们红军的妄想。

第三，毫无疑问，假如没有另一种情况帮助农村资本主义分子，他们就不可能把我们建设中的困难利用到他们在事实上所利用到的这种程度，而收购危机也不会这样严重。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收购机关松懈现象，彼此之间没有统一战线，相互竞争，不愿意对哄抬粮价的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再就是我们粮食收购区的党组织消极懈怠，不愿意以应有的态度来过问粮食收购运动，不愿意过问这件事情和消除收购战线上普遍的松懈现象。

我们的收购机关和党组织陶醉于上年度收购运动的成就,认为本年度收购工作可以听其自流,让一切都听从“上帝的意志”,这样就为富农和投机分子扫清了活动场所。而富农所期待的也正是这个。几乎用不着怀疑,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收购危机是不会这样严重的。

不应当忘记,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收购机关和其他组织,在供应农村工业品方面差不多掌握了80%,在农村中的收购方面差不多掌握了90%。不用说,这种情况使我们有可能在农村中控制住富农,只要我们的组织善于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可是我们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一切都听其自流,这样就便利了(当然是无意的)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同志们,造成去年年底收购危机的条件就是如此。

这样,你们可以看出,收购危机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你们可以看出,收购危机反映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即粮食收购问题上,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

同志们,这就是粮食收购危机的阶级背景。

你们知道,为了消除收购危机和制止富农的投机野心,党和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实际行动。关于这些措施,我们的报刊上已经讲得很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议中也讲得相当详细。因此,我想不必在这里重复了。

我只想谈一谈由于非常情况而采取的一些非常措施。当然,只要这种非常情况不再存在,这些措施也就会取消。我指的是使用对付投机活动的第107条法律。这条法律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6年通过的。这条法律我们在上年度没有使用。为什么呢?因为正如大家所说的,粮食收购工作进行得正常,所以没有理由使用这一条。只是在本年度,1928年年初,才想起了这一条。所以想起了这一条,是因为富农的投机勾当在我们这里造成了一些非常情况,使我们受到饥饿的威胁。显然,假如下一个收购年度不再发生非常情况,收购工作进行得很正常,那么第107条也就不会使用了。相反地,假如发生非常情况,资本主义分子又开始“捣鬼”,那就又得用上第107条了。

如果根据这一点便说要“取消”新经济政策、“恢复”余粮收集制等等,那就愚蠢了。现在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才会想到取消新经济政策。现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比对任何人都有利。但是,有些人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意味着加强对包括富农在内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以战胜他们,而是意味着停止同富

农及其他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不用说,这种人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们党内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人的位置。

党和苏维埃政权为了消除粮食危机而采取的一些措施所产生的结果,你们也都是知道的。简单说来,有下面几点:

一是我们弥补了亏空,收购了粮食,赶上甚至有些地方超过了上年度的收购速度。大家知道,在1—3月这三个月期间,我们已经收购了2.7亿多普特粮食。当然,我们所需要的不止这一些。我们还需要收购一亿多普特。但这毕竟是一种必要的成绩,它使我们有可能消除收购危机。现在我们有充分权利说,党和苏维埃政权在这条战线上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就。

二是我们整顿了,多多少少整顿了我们各地的收购机关和党组织,在实践中考查了它们的战斗准备,清除了它们中间那些不承认农村中有阶级并且不愿意同富农“吵嘴”的显然已经腐化的分子。

三是我们改进了农村工作,孤立了富农,稍微得罪了富裕的中农上层,使贫农更加靠近我们,使绝大多数中农跟着我们走。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列宁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老口号:依靠贫农,善于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

我知道有些同志不大乐意接受这个口号。如果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工农联盟就是工人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联盟,那就奇怪了。同志们,不是的,我们不主张也不能主张这样的联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在工人阶级政权已经巩固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谁认为在我们的情况下同农民联盟就是同富农联盟,谁就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谁想在农村中实行一种使富人和穷人皆大欢喜的政策,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因为,同志们,世上是没有这种政策的。(笑声,鼓掌)我们的政策是阶级的政策。

我们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措施所产生的结果大体上就是如此。

毫无疑问,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过许多过火行为和歪曲党的路线的事实。大家都知道,在许多场合由于我们不用脑子,歪曲了我们的政策,首先打击了贫农和中农,不正确地运用了第107条等等。我们现在严惩并且将来还要严惩犯了这些歪曲行为的人。但是,如果因为有这种歪曲行为就看不到党采取的措施(不采取这些措施我们就不能摆脱收购危机)所获得的良好和真正重大的结果,那就奇怪了。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主要的东西,而把个别的和偶然的的东西提到首位。这样做就是用我们路线遭到歪曲的个别现象这

一勺水淹没收购运动极其重大的成绩,其实这些个别现象完全不是从党所采取的那些措施中产生的。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些情况使我们的收购运动容易获得成功,并使我们容易对付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进攻呢?

是的,是有的。这样的情况至少可以指出两种:

第一,我们是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在党消灭了党内敌人而达到了最高度的统一之后,我们党干预收购运动并打击富农和投机分子的。不能认为对富农进行斗争是轻而易举的事。要粉碎富农和投机分子的诡计而又不致在国内引起任何混乱,就必须有绝对团结的党、绝对巩固的后方和十分巩固的政权。几乎用不着怀疑,这些条件的存在,在迫使富农立刻退却这一点上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第二,我们做到了把压制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实际措施同工人阶级、红军和农村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富农投机分子使城乡劳动群众遭受饥饿的威胁,同时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第107条),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我们在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得到农村大多数人的拥护。富农伤天害理地进行粮食投机,给城乡造成极大的困难,同时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法律,也就是违反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意志,——这种情况一定会便于我们孤立富农,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发生了1921年发生过的那种情形(当然是有一定的附带条件的)。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党鉴于国内发生饥荒,就提出了没收教会贵重物品用以购买粮食救济灾区的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了极广泛的反宗教运动;当时神父们抓住贵重物品不放,实际上就是反对挨饿的群众,因而激起了群众对整个教会、也对宗教偏见,尤其对神父及其领导者的愤怒。那时在我们党内有一些怪人,他们以为列宁只是在1921年才懂得同教会作斗争的必要性(笑声),在这以前,好像他并不懂得这一点。同志们,这当然是荒谬的。列宁在1921年以前当然也懂得同教会作斗争的必要性。但是问题完全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把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宗教运动和争取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并且要做到使这个运动为群众所了解,为群众所支持。

关于今年年初党因粮食收购运动而采取的措施也必须这样说。有些人以为党只是到现在才懂得同富农危险作斗争的必要性。同志们,这当然是荒谬的。党向来就懂得这种斗争的必要性,并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进行了这个

斗争。今年年初党所采取的措施的特点是：党在今年已经有可能把反对农村富农投机分子的坚决斗争同争取广大劳动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因为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党就做到了使农村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跟着自己走而使富农陷于孤立。

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艺术决不在于不考虑时间和地点，不考虑群众支持领导上这些或那些措施的决心，不加选择地在各个战线上用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艺术在于善于选择时间和地点并估计各种情况，以便把火力集中到那个最可能获得最大战果的战线上。

三年以前，我们还没有得到中农的拥护，中农满怀仇恨并攻击我们的乡执行委员会主席，贫农对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感到困惑不解，我们的播种面积只有战前的75%，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在农村中扩大粮食和原料的生产，我们还没有为工业建立可靠的粮食和原料基地。如果我们那时给富农极严重的打击，事实上我们现在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我不怀疑，这样做我们就会失败，就不能把播种面积扩大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就会破坏为工业建立粮食和原料基地的可能性，就会使富农容易壮大，就会使中农脱离我们；也许现在国内就会发生极严重的政治混乱。

今年年初我们农村中的情况怎样呢？播种面积扩大到了战前规模，为工业建立了巩固的原料和粮食基地，大多数中农拥护苏维埃政权，贫农多少是组织起来了，农村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已经改善并巩固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对富农投机分子的打击才能指望得到巨大的成就，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害神经病的人才不能了解在组织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方面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全部差别，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这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不考虑时间和地点，不考虑斗争力量的对比，不加选择地在各个战线上用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是多么愚蠢。

同志们，关于粮食收购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谈沙赫特案件吧。

三、沙赫特案件

沙赫特案件的阶级背景怎样？沙赫特案件的根源何在？这个经济反革命事件是在怎样的阶级基础上发生的？

有些同志认为沙赫特案件是偶然的。他们一般都说，我们在这里打瞌睡打

得太厉害了,疏忽大意了;如果我们不打瞌睡,那我们这里是不会发生任何沙赫特案件的。这里有人在打瞌睡而且打得很厉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拿打瞌睡来解释一切,那就是不了解问题的实质。

事实说明了什么呢?沙赫特案件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

事实说明:沙赫特案件是一部分以前掌管煤矿工业的资产阶级专家所制造的经济反革命事件。

其次,事实说明:这些结成秘密集团的专家,是从现在流亡国外的旧主人那里和从西方资本主义反苏反革命组织那里取得经费来进行暗害活动的。

最后,事实说明:这个资产阶级专家集团是遵照西方资本主义组织的指示进行活动,破坏我国工业的。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反苏组织对我国工业的经济干涉。有一个时期发生了军事政治干涉,这种干涉被我们用胜利的国内战争粉碎了。现在我们遇到的是经济干涉的尝试;要粉碎它,我们并不需要进行国内战争,但是我们还是必须粉碎它,而且我们正在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来粉碎它。

如果以为国际资本会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从前国际资本想用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企图没有成功。现在国际资本竭力设法而且今后还会竭力设法用隐蔽的、不总是可以察觉的、但是相当强大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国的经济实力;它组织暗害活动,在这些或那些工业部门中制造种种“危机”,从而使将来的军事干涉更有可能实现。这里的一切都和国际资本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阶级斗争密切相连,根本谈不到什么偶然性。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前进;

或者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若干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和善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有人认为我们可以既执行以解放为使命的对外政策,同时又能博得欧美资本家的赞扬。我不想来证明,这些天真的人和我们党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

共同之处的。^① 正因为我们不能做诸如此类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所以我们必须估计到国际资本今后将继续给我们制造各种各样的祸害,不管是沙赫特案件还是其他类似的什么事件,反正都是一样。

这就是沙赫特案件的阶级根源。

为什么当时国际资本能够对我国进行军事干涉呢?因为在我国国内有整批整批的军事专家、将军和军官,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他们时刻准备着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在财政上、军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支持,这些军官和将军能不能对苏维埃政权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呢?当然不能。如果没有这批白卫军官和将军的帮助,国际资本能不能发动大规模的干涉呢?我认为不能。

当时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军事干涉是偶然的,如果我们不把克拉斯诺夫和马蒙托夫等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那就不会发生干涉了。这当然是不对的。释放马蒙托夫、克拉斯诺夫等白卫将军,在国内战争的发展上起过作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军事干涉的根源不在这里,而在于苏维埃政权和国际资本及其俄国走狗将军们之间的阶级矛盾,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某些资产阶级专家,从前的矿主,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在财政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如果不是指望国际资本会来帮助他们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能不能在我们这里制造沙赫特案件呢?当然不能。如果在我国没有资产阶级,其中包括我国一批恨不得用一勺水淹死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专家,国际资本能不能对我国发动像沙赫特案件这样的经济干涉呢?显然不能。一般说来,我国有没有这样一

^① 该卷收入这篇报告时,删去了《斯大林全集》俄文版中的以下文字:

“比如说,英国要求我们和它在某些地方,如波斯、阿富汗或土耳其划分侵略性的势力范围,同时它保证,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它就同意和我们建立“友谊”。怎么样,同志们,我们也许要做这种让步吧?”

全场高喊:不能!

斯大林:美国要求我们根本放弃支持别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那么一切都好办。怎么样,同志们,我们也许要做这种让步吧?”

全场高喊:不能!

斯大林:如果我们同意和日本瓜分满洲,我们就可以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我们能做这种让步吗?”

全场高喊:不能!

斯大林:或者,比如说,有人要求我们“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并且同意偿付战时和战前的一切债务。同志们,我们也许要同意这样做吧?”

全场高喊:不能!”——译者注

些决心进行经济干涉、破坏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专家呢？我认为有的。我认为这些人不会很多。但是，我国有数目不大的比军事干涉时期少得多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对苏联进行经济干涉的基础。

这就是沙赫特案件的阶级背景。

现在来谈一谈从沙赫特案件得出的实际结论。

列宁说过，挑选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之一。沙赫特案件表明，我们的经济干部挑选得不好，不但挑选得不好，而且使这些干部处于难以发展的条件下。人们提到第33号命令，特别是随这个命令颁布的《标准条例》。这个标准条例的特点就是：它几乎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了技术厂长，正厂长的权限只是调解纠纷，“代表”本厂，弹弹三弦琴而已。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经济干部是不能充分发展的。

这个命令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那时我们根本还没有自己的经济干部，我们还不会管理工业，因而不得不把主要的权力交给技术厂长。但是现在这个命令已经变成了桎梏。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有经验的、能够发展成为我国工业真正领导者的经济干部。正因为如此，现在已经到了废除过时的标准条例而代之以新条例的时候了。

有人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工人共产党员，不可能掌握化学公式和一般技术知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世界上没有劳动人民和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鼓掌）我们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攻下了更难攻的堡垒。全部问题在于：要有掌握技术知识，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布尔什维克坚忍不拔的精神来武装自己的愿望。可是为了改变我们经济干部的工作条件，帮助他们成为真正的、有充分权力的管理者，就必须废除旧的标准条例，拿新的来代替它。否则，我们就会有毁坏我们的人才的危险。

难道我们那些堕落的经济工作人员本来就比我们中间任何人都要坏吗？为什么这一类的同志堕落腐化起来，在生活上和资产阶级专家混在一起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经济方面的实际工作中有不正确的地方，我们挑选经济工作人员的条件以及他们的工作条件阻碍了他们的发展，把他们变成资产阶级专家的尾巴。同志们，必须消灭这种现象。

沙赫特案件提供给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我们在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里没有把干部训练好，没有把我们的红色专家培养好。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结论。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许多年轻专家不适合于工作，对工业没有用处呢？因

为他们学的是书本上的东西、他们是书本上的专家,没有实际经验,和生产脱节,他们自然会遭到失败。难道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专家吗?不,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专家,即使他们是非常年轻的专家我们也不需要。我们需要的专家,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必须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经验上,在和生产的联系上都是很强的。

那些没有见过矿井也不愿意下矿井的年轻专家,那些没有见过工厂也不愿意在工厂里弄脏自己的年轻专家,是永远不能战胜旧的、经过实际工作锻炼的、但是仇视我们事业的专家的。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不仅旧的专家,不仅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就连工人也往往很不欢迎这种年轻专家。但是为了不再发生这种意料不到的事情,必须改变对他们的教育,并且必须这样改变:使年轻专家从进入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头两年起就和生产、工厂、矿井等有密切的联系。

第三个结论是关于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管理工业的问题。从沙赫特案件的材料来看,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很坏。坏得不像话,同志们。事实证明:劳动法规遭到破坏,地下6小时工作制并不经常遵守,劳动保护条例遭到践踏。但是工人忍受着,工会默不作声,党组织也不设法消灭这种不像话的现象。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到过顿巴斯,他下到矿井里去,向矿工了解他们的工作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矿工认为对工作条件有发牢骚的必要。这位同志问他们:“同志们,你们的生活怎么样?”矿工们回答他说:“同志,没有什么,生活不错。”这位同志说:“我要到莫斯科去,你们有什么话要我转达中央?”矿工们回答他说:“你到那里就说我们的生活不错。”这位同志对矿工们说,“同志们,听我说,我又不是外国人,我是俄国人,我到这里来就是要向你们了解真实情况。”矿工们回答他说:“同志,我们对谁都一样,不管对外国人或者对自己人我们都只说真实情况。”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矿工的面貌。这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英雄。我们已经在工人心中积累的精神资本的宝藏也正是在这里。真难以设想:我们竟像挥霍十月革命极其伟大遗产的败家子一样,如此肆无忌惮地、罪恶地糟蹋这种无比珍贵的精神资本!同志们,长久地依靠原有的精神资本,任意糟蹋这种资本是不行的。已经到了消灭这种现象的时候了。早已是时候了!

最后,第四个结论是关于检查执行情况的问题。沙赫特案件表明:一切管理部门,不管是党的,还是工业的和工会的,在检查执行情况方面都糟透了。只是

写决议,发指示,但是谁也不想问问自己:这些决议和指示执行得怎样了?是确实执行了还是束之高阁了?

伊里奇说过,管理国家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检查执行情况的问题。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搞得糟透了。领导——这并不等于写决议和发指示。领导——这就是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不仅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从生动的实际工作的观点来检查这些指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我们所有的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那就可笑了。同志们,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检查执行情况正是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实践的烈火中,不仅检查我们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是否正确。因此,这方面有缺陷,也就是我们的整个领导有缺陷。

例如,就拿纯粹党的系统的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来说吧。我们通常都是叫专区委员会和省委员会的书记到中央来汇报工作,以便检查中央指示的执行情况。书记们作了报告,也承认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中央就指责他们,通过老一套的决议,指示说,要深入工作,要展开工作,要强调这点那点,要着重注意这点那点等等。书记们带着这种决议回到各地,以后又叫他们来,同样又是深入、展开等等一套。我不是说,所有这一套没有一点好处。不,同志们,从教育和督促各级组织的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有它好的一面。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检查执行情况的方法已经不够了。应当承认,这种方法必须拿另一种方法来补充,那就是把我们党和苏维埃上层人员派去做地方工作。(有人喊道:“这个办法好!”)我说的是派我们的领导同志暂时到地方上去工作,不是去做指挥员而是去做听从地方组织指挥的普通工作人员。我认为这个办法很有前途,如果老老实实在地诚心诚意地加以执行,它可以改进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

如果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正副人民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各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经常到地方上去,在那里进行工作,以便了解工作情况,研究一切困难、一切缺点和优点,那么你们可以确信,这将对执行情况的最切实有效的检查。这将是丰富我们可敬的领导者的经验的最好方法。如果这个方法成了一种制度(而这是必须成为制度的),那么你们可以确信,我们这里拟定的法律,我们制定的指示,就会比日前的要切合实际和正确得多了。

同志们,关于沙赫特案件的问题就是如此。

四、总 结

我们有国内敌人,也有国外敌人。同志们,这一点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

我们有过收购危机,现在已经消除了。收购危机标志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

我们有沙赫特案件,现在已在清理,而且无疑一定会清理好。沙赫特案件标志着国际资本及其在我国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一次严重进攻。这是对我国内政的经济干涉。

不用说,无论从内部来的或外部来的诸如此类的进攻,是可能重演而且看来是会重演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有最高度的警惕,时刻戒备。同志们,如果我们警惕起来,我们将来也一定会打败我们的敌人,正像我们现在和过去打败了他们一样。(长时间热烈鼓掌)

《真理报》1928年4月18日(90号)

4

H. H. 布哈林

粮食收购工作和沙赫特案件的教训与党 为落实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结论承担的任务

(1928年4月13日在列宁格勒组织
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4])

同志们!

在粉碎了反对派以后,我们全党自然就要挽起袖子来着手进行务实的工作了。全会的工作是在务实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下进行的。这是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会议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全会讨论了两个问题:粮食收购及其教训和沙赫特案件。在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上,全会自然地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我们某些重大的内部政策问题。其实,粮食收购和粮食收购运动的教训所提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党对富农的政策的专业性问题。

同样,沙赫特案件也使我们涉及一些重大的问题,这就是工人阶级对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党同工会、党同非党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一事件又重新使我们触及党内民主和党内纪律等等问题。

因此,我不能仅限于单纯地传达全会的情况,我还要尽力对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加以分析。

一、粮食收购运动的教训

经济和阶级

我先从一个差不多是理论的问题谈起,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关于我国经济中

的生产和市场的比例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我们国家的社会阶级力量问题。这一点必须首先弄清楚,因为每一个党员都会自问:为什么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碰到了非常大的困难?这些困难的原因何在?这些困难是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些困难是不是意味着力量的很大优势在我们的敌人——富农,私商等方面?这些困难是不是我们本身的错误的结果?或者说,这些困难是不是由我们的错误和我们阶级敌人的进攻在某种程度上共同促成的?如果后一种说法是对的,那么,我们的错误和我们阶级敌人的力量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呢?

关于我们经济困难产生的原因问题,我首先想指出两种可能的、在我看来是不正确的提法。

第一种不正确的、片面的、从一定角度看来是“极端的”提法认为,一切过错在于破坏了主要的市场比例:工业品生产少了,农村的需求扩大了,分析到此为止。这是一种看法,一种态度。

另一种态度也同样是不正确的、同样是错误的,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工业品生产是不是能满足农村的需求,不在于我们的市场是不是出现了比例失调,而在于在我们这里,富农富了,富农在农村中的阵地增强了,同中农或者同某一部分中农抱成了团。

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一种不正确的、片面的态度在于只看到经济比例、经济形式、市场关系、市场的商品流动情况,但是看不到阶级;

另一种同样不正确的和片面的态度在于只看到阶级,看到富农的力量,但是看不到阶级斗争据以展开的一般经济基础,看不到市场关系,看不到城市和农村相互间的商品流动情况,没有考虑到市场比例,没有提出比例失调问题,等等。

一种看法只看到经济形式和市场关系,但是看不到阶级;另一种看法只看到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看不到市场关系和经济比例,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各阶级通过经济形式,通过市场,通过商品量,通过对这些商品量的调节,通过对这些商品量的占有,通过生产关系以及通过市场关系展开斗争。不能把一个方面和另一个方面割裂开来,即不能把阶级和经济,把经济 and 阶级割裂开来。

如果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关于机构即关于我们国家的计划领导的问题具有怎样的意义,就十分清楚了。如果我们的计划领导机关由于某些失误而破坏了必要的经济比例,那么,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造成一种可以被我们的敌人——富农、私商和一般资产阶级轻而易举地加以利用的局面:我们的坏事和损失成为阶级敌人的好事和益处。

如果我们能做到把国民经济的诸因素正确地加以平衡,使它们保持一定的均势,我们的阶级敌人在反对我们的斗争中就会被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他们反对我们的斗争当然没有消灭,没有停止,它继续着,然而是在对我们敌人远非有利的情势下进行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计划、管理和领导机关破坏了某一个重要的经济比例,由此出现市场的比例失调,那我们的阶级敌人就会更加神气起来。他们就能够利用局势。只要把水稍微搅混浊一些,我们的敌人就会更加起劲、更加巧妙和更加成功地利用这种已形成的局势,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来反对我们。他们力量的比重开始上升,因为计划和管理的领导方面的过错,使他们得以利用已形成的经济局势。

计划工作和领导工作的错误。一般说来,或者是政策的总路线上的错误,政治路线的错误,或者是日常领导上的错误,暂时的错误。如果我们犯的是第一类错误,那么,这就是说,我们的敌人会长期利用这种状态,他们将长期打击我们。这样的错误,在我们这里,至少到目前是不存在的。可是,我们常常有相当严重的暂时的错误。暂时的错误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但是它们可以在一定的、比较短的一段时间内起很大的作用。

现在我来谈一谈我们碰到过的,但还没有根除其后果的一些具体困难。

计划领导的错误,比例失调、阶级和粮食收购期间的困难

首先应当指出,我们存在的并且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开的困难决不具有必然的性质。关于这些困难,不能说,它们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是无法防止的。它们是由于我们经济政策的许多措施实行过迟,由于计划领导的失误,由于我们党组织陷入党内争论和同反对派的反党和反苏维埃活动的斗争而脱离经济领导所造成的。

在我们这里,经济管理和党的生活之间有着最紧密的联系。我们的经济不能被看做是离开由党所领导的国家的经济政策而独立存在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鼓吹的那种使我们的经济脱离经济政策的理论是不正确的。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家勾心斗角,而托拉斯巨头和国家机构照常做自己的事情。与资产阶级国家相比,在我们这里,党内斗争在国家的整个经济机体上发生强烈得多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与众不同的特点说明,为什么我们党的动荡*也在我们的经

* 原文如此。——编者注

济生活中反映出来。

计划领导的错误很尖锐地在我们的经济中反映出来,还因为我们是竭尽全力,我们的经济计划高度紧张,我们的国家预算和我们的资金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向前迈进的,我们极力保持经济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以便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这种紧张状态,为了向前迈进,我们就不得不克服最大的障碍和困难。¹⁴²

因此,计划和调节在某些方面的各种失算十分严重地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央委员会关于粮食收购的决议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已遇到的困难不是不可避免的困难。这些困难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的行动迟缓,计划领导上的错误,党的争论。当然,即便是最出色的计划也消除不了我们经济发展和我们工作的客观困难:国家的落后,积累的高速度,“百分之百”的计划工作的不可能(存在2400万农户¹⁴³)——这一切依然存在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在经济战线的不同领域中出现这种或那种困难。在正确的计划领导的情况下,这些困难会减少;几乎在每一次发生比较大的对局势的失算的情况下,这些困难就尖锐起来。

首先我想谈一谈困难的经济方面,由于发生这些困难,我们差一点儿陷入全面的经济危机。

必须指出,在我国一般说来,在农业和工业的再生产周期之间存在脱节现象,在我国,农产品的出售时间不是在工业充分开工的时候,相反地,而是在工业刚刚发生某种季节性下降的时候。这当然是可以纠正的,只要在收获季节前,我们能有充分的机动后备,我们能有相应数量的商品储备。在本年度,我们没有后备。当我们进入农业秋收工作的时候,我们工业没有足够数量的后备可以投放出去,以满足来自农村的需求¹⁴⁴。

可见,我们没有能够及时积累起我们工业的一定后备,——这是市场的平衡遭到破坏的一个原因。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后备,问题还在于,我们在这一年度,生产季节性缩减的程度比上一年度厉害。

在夏季期间即在上一经济年度的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生产急剧下降和生产不足(同1927—1928年度第一季度的计划相比),在我们工业品零售价格降低的情况下,相对地减少了工业品的供应。

在这段期间,我们看到农村的需求增长了。农村的这种需求,是在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上层分子即富农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这里还应

当指出两种现象,它们对了解我们所碰到的那些困难的全部内情是极其重要的。

第一,技术作物(获得大丰收)和畜产品的价格高。出售技术作物产品和畜产品,使农村特别是农村上层分子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额外货币收入(同去年相比),使我们可以对这笔收入课以必要的赋税等等。第二,由于我们在基本建设方面投资很多,由于有各种辅助性的和其他的工作,同去年相比有数额多得很多的货币流入农村。多多少呢?这里有一些非常粗略的计算数字。一些人认为多几个亿,另外一些人说数目还要大得多。至少不应当有任何怀疑,在最近一年,农民经济的这种副业收入大大超过了上一经济年度。需求(包括富农经济的需求)的这种增长没有以相应提高赋税来保持平衡。结果,所谓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就是说,城市投入农村的工业品的数量没有能够同体现农民需求的货币量相适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我们在秋季能够供应农村的工业品的数量比以前相对地减少了。

在城市中,工人数目和工资基金均有增加,因而城市的需求也增加了。这样,需求和供应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曾经多次试图计算出商品的缺额,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些数字是极不稳定的,例如,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在前一经济年度第四季度和本经济年度第一季度,商品短缺数额约为5亿卢布。后来又出来另一些数字,提出的数额小得多。但是,我可以在这一方面向你们提起几件人人皆知的事实。大家都知道,在秋季,我们为了满足城市而停止了农村市场的商品供应,——我们指的是工业品。我们把商品拨到城市去,为的是满足城市的需求。而到冬季,当感觉到粮食收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为了填充农村市场而停止了城市的商品供应。我们不得不把工业品调拨到农村去。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停止城市的商品,而把商品调拨到农村去,这样做是不是对呢?

是做得对的。这样做是为了使粮食收购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但是,既然把大批商品先是不顾农村而急忙调拨到城市,后来又急忙从城市调拨到农村,那就意味着商品缺少。在城市中,这一点即使从过去和现在买东西排队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来,不仅买农产品要排队,就是买工业品也要排队。对这件事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说这是不重要的,在我看来,那是不行的,因为这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农村,应当补充说一句,农村的商品供应量绝对减少(与去年相比)的事实也是有的,——这样一来,在经济方面即在城乡交流方面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现象是:农村对商品的需求增长了,而商品供应却落后了。

为什么这一点首先正是反映在粮食收购上面呢?

这一点首先反映在粮食上是有一系列原因的。

首先,在最近期间,谷物同畜产品和技术作物的比价悬殊太大。这种悬殊对粮食很不利,以致农民宁愿把粮食留下来,用出卖畜产品和技术作物换来的钱缴纳税款和购买工业品。

农民有时宁愿用粮食饲养牲畜,然后再出卖牲畜。这主要是因为谷物同畜产品和技术作物的比价继续保持悬殊,这种悬殊在近几年来急剧地扩大了。从1924—1925,1925—1926和1926—1927三个实际经济年度和1927—1928年度的第一季度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下列指数(以战前价格为100):1924—1925年度,谷物产品的指数为129,畜产品和技术作物产品的指数为135。差距是不大的。在1925—1926年度,谷物的指数下降,过去为129,现在为123,而技术作物和畜产品却上升了,过去为135,现在为140。谷物下降了,畜产品和技术作物上升了。1926年,谷物的价格指数从123降到106。畜产品和技术作物产品从140提高到145。在1927—1928年度的第一季度,谷物为109,——同1926—1927年度相比,差不多是同样的数字,增加不多,而技术作物却由145增加到151。你们看,在最近几年,谷物产品同畜产品和技术作物比价上的剪刀差不断扩大了。粮食在农民可能出卖的一切物品中成为最无利可图的东西了。

但是,我应当指出,谷物的不利地位不仅表现在市场关系上,而且也表现在课税上。在课税方面,谷物的地位也是最不利的。我手里没有足够的数字来专门说明谷物,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举出一些数目字,这些数字只能十分概略地说明我想强调指出的情况。我们拿农民经济的两大类相对纯收入来看看吧。这两大类是“大田作物”和“非农业收入”,其中包括富农经济的非农业收入。

大田作物在农民的全部相对纯收入的总额中占39.5%,而非农业收入(其中包括富农经济的非劳动收入)占27.8%。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别还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我们拿对两类收入的课税来看看,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数字:大田作物在赋税中所占份额为66.59%,而非农业收入仅占5.2%。这里当然应当考虑到建筑工人的工资和其他不予课税的收入,但是,尽管这样,悬殊终究是太大了。

还有一种情况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的平衡。我在前面指出过,在我们这里,农业生产的周期和工业生产的进程是不同的。农民在秋季卖出自己的产品而得到一定数目的货币,而工业到这个时期(如果它没有专门的后备)却不能及时投放

足够数量的商品。但是,究竟为什么农民不愿拿着这些货币等待,比如说等上几个月,而要立即把这些货币用掉呢?

这是由于我们的货币还没有稳固到可以作为积累手段的地步。农民把货币看做是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而还没有充分把它看做是积累手段。我们的农民宁肯用货币购买商品,而不愿把货币存入储蓄银行。我们的信贷系统还不稳固。如果它是比较稳固的,如果我们的储蓄银行是稳固的,如果这些信贷杠杆是强有力的,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但是,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只要农民手里有一定数目的货币,或者说只要扣除前一时期的经济周转费用后农民手里还剩有货币,农民就把它直接投入市场。这些货币不是流入储蓄银行和信贷的渠道,而是直接开始压到市场上去。

由于这些原因,粮食供应缩减了。上一年度7月到12月,我们收购了42 800万普特,而本年度同期只收购了3亿普特,而且本年度的12月仅仅收购了上一经济年度12月收购量的59%。不言而喻,要是这种粮食收购危机继续发展下去,我们的整个经济计划就会遭到破坏,城市的供应就会遭到破坏,实际工资就会遭到破坏,就会发生一系列其他更重大的经济灾祸。同志们,这就是从纯经济方面考察所得出的情况。我有意地在我的报告中一开始先指出,问题的经济方面不可能离开社会阶级方面,反之,因为社会阶级方面也不可能离开经济方面。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经济情况,基本的市场比例遭到了破坏,正是因为这样,使手里掌握一大批粮食(尽管决不是数量最多的粮食)的富农有可能更方便地进行投机来反对我们的价格政策。

富农无疑利用了局势,同时我们的收购机关又没有做好工作。我们的收购机关在客观上,不依它们的意志为转移,帮助了我们的敌人,因为它们没有组成统一的收购战线,因为它们不是联合成紧密的队伍,而是相互竞争,有时简直是激烈的竞争。

这样一来,从经济方面来说,我们看到了基本经济比例遭到破坏,并在这个基础上,富农方面表现出相当的、比以前大得多的经济积极性,他们企图在固定的价格政策的基础上,在相互竞争的收购机关的纵容下,在党组织进行争论的条件下以及在地方组织不大懂得用它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回击我们经济敌人的必要性的情况下,同中农联合起来。

这些就是引起了有造成严重国民经济后果的粮食收购危机的那些经济困难的原因。

反对派和对我们困难的分析

在转入谈论关于中央为解除粮食收购危机而采取的措施的问题之前,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央所做的分析是不是同我们反对派所讲过的话有些相似呢?它是不是实质上证实了加米涅夫曾经提出过的著名论点,也就是证实富农“调节了”我们的经济呢?¹⁴⁵

同志们,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我在这里所做的分析同反对派的观点是有天壤之别的。

反对派是怎样看待富农危险的呢?是这样的:在我国,资本主义因素比社会主义因素发展得更快,耐普曼和富农不断地而且胜利地向我们进攻,而我们则在他们面前节节后退;其深刻的根源在于我们国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落后。这同一个人人皆知的论点是异曲同工的,这个论点就是,如果没有组织成为国家的西欧无产阶级来帮助我们,我们将不得不继续退却,这就是反对派“哲学”的含义和根源。

而我们知道,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经济影响的一些最大杠杆掌握在我们手中,只要我们将来不犯大错误,占有这些杠杆就会使我们在国内关系方面是不可战胜的。富农首先是当它能利用我们的错误的时候才是一支危险的力量。因此主要之点在于我们的政策要正确,首先是要确定正确的经济比例。只要我们保证在我国经济的主要因素之间保持正确的比例,富农反攻的领域就大大缩小,当然还不是完全不再存在。相反地,重大的失算,不管它们是由什么表现出来的,是由简单的算术错误,还是由我们统计的缺点,或是由党内生活的事件(争论)表现出来的,都会使富农成为危险的阶级敌人。

中央全会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它的决议写道:

“可见已经形成的经济情况,富农对这种情况的利用,在执行实际的工业品分配计划中的错误(工业品运送迟缓)。整个计划工作的错误(对农村上层分子课税太轻,粮食价格和其他农产品价格相差过大等等),工业品的增长的暂时落后,以及机关(包括党的机关在内)的组织性和积极性不强(这点起极重要的作用),——这一切引起了极大的经济困难,这种困难是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成分巨大增长的情况下显示出来的,如果及时地和正确地使主要的经济因素保持平衡和消除经济机关与党的机关中的缺点,那么这种困难是不至于发生的。”¹⁴⁶

可见,中央在其决议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我们及时地和不迟缓地计划好

了主要的经济因素,正确地 and 适时地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我们所遭到的困难是不至于发生的,富农就不能够破坏我们的粮食收购政策。

我们不透过于人,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机关”的过错,不是狭义的机关(某一个苏维埃机关犯了这样的错误),而是广义的机关,就是说,是计划经济的机关的过错。我们的计划编制得不太好。我们被争论缠住,造成了许多错误,误了事,这也就使得我们的敌人(他们在其他条件下干不出任何反对我们的大事)有可能获得若干(暂时的)胜利,这些胜利已被党的坚决措施化为乌有。

反对派断言,没有西欧的援助,我们就会毁灭。而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肯定说,我们有为胜利前进“所必需的和足够的一切”。反对派说,我们节节后退。实际上,我们日益壮大并步步进攻。反对派说,我们的阶级敌人日益壮大,我们需要外来的援助,以便想个办法摆脱困难局面。实际上,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的错误和失算。在于我们还不善于很好地作计划,我们失策,我们行动迟缓一些,——部分原因是我们还不善于及时防止像争论这类事情,——从而把几张王牌交给我们的敌人。

是富农“调节了”我们吗?

应该说是我们自己调节了自己,计划作得不好,从而,我重说一次,把某些王牌交到自己敌人的手中,他们不放过我们的每一个过错,利用任何一个失算,在我们没有筑起足够高的壁垒的那段战线上转入反攻。

党中央的措施

在我们党处置了反对派,消除了内部疾病而把自己的精力转到实际工作方面以后,在粮食收购方面暴露出来危急现象;警告我们必须采取紧急的和非常的措施。

中央被置于这样的境地,即需要千方百计地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来解决粮食收购任务,因为粮食收购工作的破坏会使人人都感觉得到,并且最后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动荡,需要采取紧急的措施。十分自然地,从我谈过的对粮食收购危机原因的分析中产生了中央为整顿粮食收购战线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既然困难的基本原因是市场的比例失调,中央就必须追加一批工业品赶快地运往农村,哪怕工业中心暂时没有工业品。

此外,我们必须采取许多措施来缓和农村方面的过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我们加重对农村上层阶层的课税,这是对农村上层分子的直接的社会阶级压力。¹⁴⁷

我们发行加强农民经济的公债,在农村按生产能力配销,我们实施关于捐献的法律,其目的是满足农村需要。¹⁴⁸我们打击组织反对我们的斗争的敌对的阶级力量,即打击富农和投机商。这里可以运用第107条。¹⁴⁹然后从没收的粮食中抽出25%(在另外一些地方有另外一种比例)发给贫农。¹⁵⁰其次的措施是建立粮食收购机关的统一战线,然后实行非常措施来检查苏维埃机关,把那些同农村中的富农阶层结合在一起或半结合在一起或和睦相处的分子清洗出去,等等。我们把党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使整个党的机关行动起来,这归根到底对粮食收购进程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极端的和非常的措施在历史上证明是正确的:粮食收购的速度加快了,结果收购的粮食数量超过上一年度同一时期的收购量。

在1928年1月以后,我们开始施加一定的压力,粮食收购量立即就迅速增加上去。在9月和10月,粮食收购工作正常,比去年同两个月略有超过。到11月开始下降,到12月就大大下降,大约减少一半。在这以后开始有所好转,到4月终于赶上了去年的数字。

应当注意到,我们必须在余下的几个月中也以比较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粮食收购运动,以便在全年的总平衡表中获得必要的经济效果。

所谓的“过火行为”和向富农的进一步进攻

不用说,在每一个党员面前,除了这个问题,还摆着关于这些措施的政治后果以及关于下一收购年度的实际准备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准备下一次的粮食收购运动呢?我们的方针是不是应当再一次重复这一次粮食收购运动的经验呢?这一次粮食收购运动和我们已采取的非常措施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党的路线对比一下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当然是有莫大意义的。

根据各地方同志的报告来看,我们可以指出,在粮食收购期间,农村的党和苏维埃机关改进了,富农的阵地被削弱了,在许多地方被严重地粉碎了,农村贫农的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贫农和中农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可以说,我们摆脱了困难而没有使同中农阶层基本群众的关系复杂化,但是同中农的上层部分的关系多少尖锐化了。在政治方面总括起来看,我们是赢多于亏。由此应当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出一定的政治结论。第一,我们必须了解我们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路线的意义;第二,我们必须了解为十分特殊的、极其紧张的经

济形势所迫而采取的非常措施的作用和地位;第三,我们必须了解同各种过火行为,对歪曲我们的政治路线和我们的非常措施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对于这些歪曲行为,有时候对某些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的地方工作人员不仅要予以谴责,而且要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这些过火行为有哪些呢?关于这些过火行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中也谈到了:“必须绝对制止某些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这种歪曲和过火行为,党有责任同它们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歪曲和过火行为会造成长期的、不良的经济和政治后果。”从政治实质方面来看,这种过火行为可以肯定为这样一些做法,它们不仅打击了富农,而且也打击了中农,它们常常滚到余粮收集制的轨道上去。在许许多多地方都发生过这种过火行为。虽然中央委员会一再发出有关指示,警告各级党组织防止过火行为,直到现在这种过火行为还没有根除。属于这种过火行为的是这样一些做法:不按照司法手续没收余粮或者一概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取缔粮食自由市场,为查清余粮而进行各种搜查,在许多地点建立阻截队,强行摊派公债以及地方工作人员想出来的其他“狡计”,例如,在农村付汇款时,一部分付现款,而另一部分以公债券支付。

这些过火行为无论如何应当制止。在某些地方,我们看到了真正的违法乱纪和强制措施,为此在某些地方甚至不得不把某些人枪毙。

中央委员会指出,上述一类近似余粮收集制方法的政治过火行为必然造成“长期的不良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¹⁵¹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会破坏我们经济发展的基础本身。例如,有这样的事例:实行产品直接交换,也就是用钱不卖给工业品,只有用粮食才换给工业品。这意味着什么呢?很清楚,这破坏我们的通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货币一半不是货币。

不错,如果我们强行摊派公债,国家从这里会得到一些好处。但是,如果从前景来看一看这件事情,那么当你强销这一种或另一种公债的时候,在这样的基础上能建立起什么样的信用呢?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把小额积蓄吸入储蓄银行或存入合作社,或者要求人们把积蓄存入银行,这是绝对荒谬的。而我们总是说,我们应该实行这样一种结果是把农民的小额积蓄会吸入我们的信用机关的政策。

在这里回想一下我在前面提到的事实是十分适当的:在我们这里,货币作为积累手段,作为储蓄手段的作用是很不发达的。同时,破坏我们信用制度的各种做法更加缩小并破坏了货币的这种作用。而这又意味着,货币不断被抛入市场,

并使市场比例失调现象更加尖锐起来。由此看来,我们破坏信用制度(用各种“大小过火行为”),目前的困难到明年就会扩大再现。

可见,信用制度和我们经济的商品率本身遭到过火行为的破坏。如果采取余粮收集制的方法,那么中农群众就失掉扩大自己的生产和向市场抛售大量商品的动力,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额就会缩减,也就是说,从发展前景来看,我们必定吃亏。

不过,我在这里也应当同时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与过去年代相比,有某种崭新的东西。我们应当认真地分析这个新东西,我想首先谈谈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当我们“认真地和长期地”转入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以及后来当我们同反对派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一直是:新经济政策无论如何不应当取消。现在这个论点仍旧不变,新经济政策无论如何不应当取消。

但是,我们应当不是“一般地”提出问题,而是根据现时提出问题。我们当然从来也没有把新经济政策想象成我们放弃对市场自发势力的影响。我们大家都记得列宁的论点:我们在一定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但是我们对它加以调节,而调节的限度和深度由我们即由苏维埃国家确定。我们同样知道,新经济政策本身包含着自我克服的根源,即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源。因此,既然我们是这样认识我们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只是重复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或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呢?不,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前夜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实行加紧向富农进攻的政策,坚决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成分的政策,因为我们巩固了同中农的联盟,我们巩固了经济命脉,等等。¹⁵²而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既明确地指出了具体经济形式,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个斗争的做法。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什么新东西吗?是的,提出了。可以怎样表述这个新东西呢?不在于政策本身的基础,不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是一种政策,而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是完全另外一种政策。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向我们的经济政策提出的新东西,大致地,约略概括地(我强调这个附带条件)应当表述如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朝着加强直接调节的方法,加紧反富农斗争,加紧农业集体化方面迈出了一定的、相当大的一步。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了使农民经济在生产上合作化的必要性,特别强调指出了预购合同制对农业集体化的意义,特别强调指出了根据阶级原则分配机器的必要性,限制租佃及许多其他东西的必要性。在我国最近几年的进展中,在加强了社会主义阵地(顺便说说,我们的已寿终正寝的反对派正是不了解这一点)的进展中,这一切都被证实是合理的。

但是,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当然没有取消下述论点:城乡关系的基础,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现在还是农业的商品化。商品化问题当然还没有被取消。我们应当说,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的增长是一个积极因素,理应得到我们的支持。

或者说,像关于农业中的个体劳动积累的问题是不是被取消了呢?不,还没有被取消。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没有取消它,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完结,这些决议没有说我们现在反对个体劳动农民经济中的积累,这完全是胡说。但是,现在,当我们掌握着一系列在我国日益增长的杠杆时,我们就应该比以前更坚实地,比以前更有力地、更大量地投放资金、人力、物力和一切其他东西,执行向农村的集体生产联合组织过渡的路线。

两种倾向

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我们现在可以觉察到两种可能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机关的保守倾向,它看不到新东西,认为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完全一样,例如1928年同1925年完全一样。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某种飞越倾向,忽视限度的倾向,某种跳越我们必须经过的那些必要阶段的倾向。我称之为保守倾向即抵触新事物的倾向的东西,实质上是想还停留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的事物的范围之内。有这种倾向的人看不到新经济政策本身发展的新阶段,看不到和不了解经济发展的新的可能的形式,看不到促进一下中农和贫农经济的生产合作化的必要性,看不到加紧向富农进攻的必要性,不相信在这种进攻方面取得真正胜利的可能性。粮食收购工作暴露出我们机关中有一部分人丧失了阶级嗅觉,不愿意同富农吵嘴。这是一种半庸人的思想。

另一方面,我们有时候还看到飞越某些必经阶段的现象,这一点例如表现在不了解非常措施的过渡的、有条件的性质。有些人认为,这些措施差不多是正常的,有一种否认个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趋向,或者一般过高估计行政命令的方法,有时候忘记必须永远记住的各种好东西,例如忘记了中农。某些人对加强集体化的了解太简单,结果“集体组织”几乎是用征集的办法组织起来的。有材料说,人们得到一点钱以后,就把它们投入假集体组织,不加选择地把什么人都收入集体组织,连富农也混进去了。这种飞越是一件大坏事,应当彻底铲除。

我们应该前进,我们也必将前进,但是应当经常有一些好值班人,能发出危

险信号,并及时地采取措施来消除危险,因为每一个混乱状态——党内性质的或者经济方面的——都得付出昂贵的代价,都会造成不良的——经济的和一般政治的——后果。

不应当这样平衡

现在来谈谈关于我们党在这方面的当前任务的问题。从我讲过的话来看,这些任务基本上已经应当说是清楚的。

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之点和基本之点是,在确定我们的最近实际经济年度的计划时,我们应该站在我们急于要办的事情的中心,这个问题是怎样平衡主要的经济因素。

实际上究竟怎样来平衡这些主要的经济因素呢?

在我们国家里有一个我们从四面八方加以批判的流派,这个流派是由民粹派类型的有学问的专家——康德拉季耶夫,魏因施泰因¹⁵³及其他人组成的,他们掌握了财政人民委员部附属的市场情况研究所的杂志。¹⁵⁴

这个市场情况研究所的公报是这样估计情况的,他们说,我们国家的一切灾祸都是来自工业化方针,因为国家工业化的速度过快,根据这些专家的看法,这种速度没有考虑到全国和农民经济的实际积累速度,这个方针是一切灾祸和不幸的罪魁。他们从这一切做出的直接结论是必须把国家工业化的总方针抵挡回去,加以重新审查。

在最近一期《市场情况研究所公报》中刊载了康德拉季耶夫和魏因施泰因以及许多其他人署名的几篇文章,他们从不同方面论证了这种分析和相应的政治经济结论。我从乌特茨的文章中摘录一段话:“它(指我们的工业。——И. Б.)从健全国民经济的主导因素日益成为新的麻烦和困难的主导因素。”可见,一切灾祸都来自工业化政策。这就是说,他们得出结论,应当坚决地缩减工业化的速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提议修改提高工资的方针。他说,应当减少首先来自城市工业人口的需求,因此不可以使工资基金膨胀,应当削减工资。

另一个作者魏因施泰因说,应当提高粮食价格并对自己提出发展独立农庄的土地使用制度的任务。用独立农庄的土地使用制度取代集体组织!

取消工业化方针,取消提高工资的方针,实行降低工资的方针和提高粮价(首先是为了独立农庄)的方针,——这就是他们的“路线”。如果把平衡各个经济因素的任务看成是数学任务,那么,可以按照不同方法平衡。但是康德拉季耶

夫、乌特茨和其他人所提出的那种平衡方法只不过是取消国家工业化而坚决向国家富农化方面发展。这是一目了然的。而从社会阶级角度来看,这就是削弱工人阶级的阵地,因为工人阶级既在自己的工业基础方面又在以工资形式取得的直接的物资数量方面遭到削减,与此同时却增强我们农村中的上层的最富裕的阶层的经济实力。这是十分露骨的富农纲领,结果有关的科学机关就“完蛋了”。不用说,这种“平衡方法”决不能成为我们党的争论的題目,它完全被我们党的争论抛开。我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出现了无疑代表我们农村的上层、富农阶层利益的知识分子集团的思想立场。

可以提出关于反对派的、为摆脱我说过的那些困难而提出的平衡我国经济的方法问题,我指的是提高工业品价格。这也是一种可能的平衡方法,因为如果我们转而实行工业品高价政策,那么,我们在短暂的时间内就会增加我们的收入,即增加积累,会缩减另一方面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反对派有非常大的分歧;在这里也有一道把我们同反对派分割开的最主要的分水岭。虽然我们经济困难,我们也必须摒弃这种平衡方法,即通过提高工业品价格实现平衡的方法。我们必须摒弃它,因为不然我们就会走上我国工业独自腐烂的道路,我们就会促使实际工资下降而置工人阶级于困难境地。这种方法不仅不是前进,而且是在某一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退回到战时共产主义时代。这样我们就会减少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毁掉促进我国工业降低成本等等的推动力,更不用说我们会加强农村富裕阶层的境况,恶化贫农和中农阶层的境况。就是说,根据我们在代表大会以前的争论期间充分谈过的这一切原因,我们也必须摒弃这种平衡方法。

正确的道路

我们的平衡计划首先在于提高对上层阶层的课税,抓到我们迄今很少抓到的非农业收入。在我们面前摆着增加工业品产量的任务。不管这个任务加在我们身上的困难多大,我们必须扩大工业品的供应,要注意到,我们农村现在需要的不仅是细平布,还要其他商品,其中包括并非列入第二部类即日用消费品生产部类,而是列入生产资料部类的商品。因此,必须扩大拨往农村的工业品的定额,并转到(如果谈的是广泛的商品市场)供应另一种品种的轨道上去,因为农村方面的需求的构成不同于从前。

必须做到提高我们基建投资的利用率并在短期内取得大效果。应当指出,

根据工农检察院对基本建设的调查可以看出,在我们这里,有很大数额的基建投资远不是有效地加以使用。加强它们的使用效率,缩短新工业企业的建设期限并从而使它们提前投入生产,合理地并及时地使用外国设备,是我们最重大的任务。

最后,我们还必须从使谷物同技术作物和畜产品之间在生产上和市场上保持比较正确的对比关系方面,来平衡我们经济的基本因素。这是一般性的任务,但其实是极其重要的任务。在我们这里,统计工作极其薄弱,它在短暂的、比较不长的一段时间内会提出不同的数字。我们迫切需要提高水平,以便得到比较可靠的材料和比较可靠的数字,尤其是在工业品方面特别需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设法做到,在夏季不减少工业产品的产量,在收割以前我们蓄积起一定的商品后备供粮食收购运动时期机动使用。

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决定

下一经济年度的概算给予我们很大的希望,这种平衡是能够做到的。做到这一点的客观根据是存在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准备未来的粮食收购运动方面采取许多组织上的措施。关于这个问题的明确决定包含在决议中。那里指出的主要措施是成立统一的国家收购机关。建立相应的组织,它把各种共和国组织和以前的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一个大组织——“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其他的次要的组织同这个全国性的粮食收购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正确地建立起来。这里问题的主要之点是:用组织统一的中心的办法,用统一收购工作的办法,消除在目前的粮食收购运动中明显表现出来的那些消极方面(主要是收购机关战线的分散性和它们之间的竞争)。

粮食收购运动无疑地搅扰了农村。它改善了我们同贫农的关系,削弱了富农,整个说来使我们保持了同中农的巩固联盟,但是中农的上层分子现在无疑对我们有一定程度的不满。我们应当彻底调整我们同中农的关系。我们应当利用农村贫农和中农阶层的已经发动起来的积极性,以便继续进行我们对富农的进攻。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加强我们的群众工作。我们必须巩固贫农的阵地并向前推进。必须继续巩固我们同中农的联盟。

正如中央委员会全会所通过的决议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懂得,随着本年度粮食收购运动的困难的消除,“非常”措施应该废除。不言而喻,如果我们又处

在这种状态,那么我们是不会拒不采取非常措施的。可是,粮食收购工作重心在于,使我们在最好的一般经济情况下进入下一实际经济年度。如果真正取得这些最好的条件并做到使国民经济诸因素保持正确的平衡(我们有根据期待这种成功),那么我们就不会像目前的实际经济年度那样需要“非常”措施。

这样说来,政治结果和最近的任务是什么呢?是我们使农村受到震动,是我们正在加紧组织贫农,是压制了富农,是目前在比这以前大得多的程度上开始建立农村的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是我们现在必须竭尽全力继续进行播种运动,必须竭尽全力进行农村的建设工作并百般设法加强它。同中农的联盟决没有失去它以前所具有的巨大意义,特别要注意到,我们不仅在另一方面必须重复过去的做法,而且必须逐渐向前迈出新的步骤,以便逐渐地、适当地,按照物力和人力,按照目前的集体经济的示范,也把中农引上生产合作的轨道,更不用说建设一般合作社(不论是消费合作社或农业合作社)的日益增长的必要性。

同志们,这就是从粮食收购工作的教训得出的和一般说来摆在中央面前并由中央解决了的任务。

现在我们来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第二个问题。

二、沙赫特案件¹⁵⁵

当然,沙赫特案件不仅对顿巴斯有意义,而且这是一件具有全苏规模和全苏意义的事件。从粮食收购问题中的具体事实出发,中央不能不讨论我们国内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同样,从沙赫特案件出发,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我们的工人政策、我们的技术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的党内政策和我们的工会政策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顿巴斯发生了什么?

我着重谈一些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情况。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在普通工人的协助下在顿巴斯破获了一个破坏组织。这个组织通过一些中间环节同外国资本,大的外国资本主义组织、国外侨民以及某些大国的参谋部建立了联系。它的成员主要是一些原先的矿产主,其中有一些人有过非常丑恶的反革命经历,以专家的身份在我们的机关里工作,它的成员中有的白卫军的工程技术人员,其中不少人都是原先的邓尼金分子,还有一些人是邓尼金原先的反间谍工作人员。

这个组织有自己的总部，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和许多别的城市都有自己的人。它通过某些外国工程师同国外联系，这些工程师中有些人是法西斯组织的成员，例如德国“钢盔”团的成员。¹⁵⁶

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包括把顿涅茨交给原来的矿产主。他们近期的任务就是利用战争和利用新的外来干涉大肆进行活动。大家从某些在押的所谓专家和工程师的供词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这批被捕的工程师中有人说他们的组织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关系到由某几个资本主义大国来给苏联以压力。从这时起，推翻苏维埃政权已几乎成为这一组织的正式纲领。

这一组织的活动和手段最多种多样：各种形式的怠工；按照行不通的计划定购完全不适用的设备；生产不需要的设备；重新布局设备，把机床从一个工厂搬到另一个工厂，结果使这些机床在那里根本用不上，关闭带来很大好处的赢利矿井和开设不赢利的矿井，胡乱支配资源、设备、劳动和技术等等。所有这一切可以说是最温和的形式。还有更为凶狠的形式：故意把矿井毁坏和放水淹掉，破坏工厂，进行直接的破坏活动，甚至把发电机炸掉，对工人进行虐待和挑衅，破坏劳动法规及其他法典，而且还直接施行政治手腕来制造纠纷。

这就是说，在新的建设、计划、机器设备以及在对工人的待遇上，即在一切可能对苏维埃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的地方，都在进行隐蔽的破坏“工作”，而且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所谓同共产党员的“良好关系”作掩护的，也就是说，常常是同经济工作人员、同那些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丧失阶级警惕性的上层工会工作者和共产党员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工会工作者及其上层分子是真正在被这些人牵着鼻子走。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什么

我已经说过，在其他方面也不排除存在这类组织的可能性，保不住在军事或化学工业中也会有这种卑鄙活动，尽管没有直接材料来证实这种假设，至少排除不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有一件非常令人吃惊的事，这就是，尽管存在这样的组织，但是顿涅茨矿区最近时期的产量却增长得很快，达到了自己产量的创纪录数字。就是说，虽然工人们处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虽然上层行政管理和技术领导人员（至少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站在敌人阵营一边，但是处在生产阶级斗争战线的工人做了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顿涅茨矿区得到了

成长,它作为我国一个巨大的生产单位,意义越来越大,在自己的生产效率上提供了创纪录的数字。这是第一个情况,这个情况说明无产阶级蕴藏着雄厚的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

第二个(消极的、完全消极的)情况表明,这伙人很多年来就在进行活动,而我们的经济和工会机构许多年来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一组织的存在。更有甚者,工人,即最普通的工人上万次地报告党、工会和苏维埃组织说,情况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尽管工人上千次地敲起警钟,但一切都等于白费,党、苏维埃和工会组织以及经济工作人员闭目塞听,对指出这一危险的工人采取不屑一顾的犯罪态度。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两种一目了然的情况。

沙赫特案件提出的问题是什么?

我曾说过,这一事件提出了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首先提出的是关于党同非党群众的关系问题,关于非党工人群众同工会组织的关系问题、关于工会组织同经济工作人员的关系、党同工会和经济工作人员的关系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更不用说专门问题即对待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实际上如果“从根子上看”,沙赫特案件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整个传送带系统——群众、阶级、工会、苏维埃、党——遭到了破坏。党组织脱离了工人群众,工会组织脱离了非党工人群众,经济工作人员脱离了这些工人群众。要知道,除非真正完全脱离了工人的生活,否则那就会看不到我们由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组成的工作委员会在中央全会前夕在那里工作期间所发现的那些乌七八糟的情况。从这些同志的报告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为了承受不得不承受的一切,必须要有顿涅茨矿区工人那样的英雄气概。

我先从党开始谈起。在一系列视察过的地方,党的机构对技术知识分子丧失了阶级嗅觉。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党员同专家们勾结或半勾结在一起,有些地方在党组织的内部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压力。这一点可以从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报告提到的下列事实中得到说明:

“在3月22日斯拉维扬斯克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当讨论梅什金同志就联共(布)中央关于阿尔季奥莫夫斯克组织的决议所作的报告时,有人向主席团递了一张纸条,提问在发言中可不可以涉及个别支部和经济工作人员。接着有一位同志站出来当着大伙说:‘我们现在才说,为什么早先默不作声?’所有500多人回答说:‘从前不让讲话,嘴被捂住了’。”

谈论任何一个经济工作人员或任何一个支部都不行。阿尔季奥莫夫斯克组织的领导被一小撮蜕化变质的共产党员把持着,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违法乱纪的事情,从酗酒到强奸妇女!这叫什么组织!如果在党组织内部存在这样的现象,那它很自然地就会继续蔓延下去。在非党工人群众和在工会组织的群众中,像这样的党组织能有威信吗?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里还讲了第二个例子:通常党的会议开得还不及非党群众的会议活跃和丰富多彩。在党的会议上使人感到很大的压力。党员还未从阿尔季奥莫夫斯克党组织的上层分子长期统治造成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非党会议不仅开得很活跃,而且表现了非党工人对我们的建设任务的极大关心,真诚地希望改正缺点。这些会议表明,非党群众对党组织的消极的一面知道得非常清楚,而对党组织的积极的一面却知道得非常少!

既然在党组织内部形成了这样的结构,那很自然地就要对非党群众产生相应的消极影响。但是,用托姆斯基同志的话来说,沙赫特案件和我们组织的各种错误并没有损坏党和苏维埃在矿工眼里的威信。他们热情和自觉地爱护生产,他们真诚地和无限地信任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人们多年来的生活就是建立在这种对中央、对整个党的信任的基础上的。

下面谈谈工会。我们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在各地视察中无论在破坏活动方面还是在工人阶级的待遇方面,都发现不少触目惊心的事实。调节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些标准,其中包括工作日、工资、直接的生活和劳动保护等等规定,已被废弃。试问,工会到哪里去了?显然,既然党组织处在那样的水平上,那么工会也就会照此办理,它们也僵化了,大大脱离了群众,它们得到蜕化了的上级党组织的支持,发挥不出应有的积极性。至于那些党内经济工作人员,从调查中可见,他们完全成了专家一破坏分子的俘虏。

沙赫特案件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

斯大林同志在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策略原理,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牢牢记住自我批评的必要性,即使对不周全的批评也不应该实行压制,因为在不周全的批评里往往也有好的东西,而如果要求所有的批评都百分之百的正确,那就意味着扼杀任何批评。必须大力开展批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机关某些环节上存在的僵化现象克服掉,否则它会继续为我们带来巨大的危害,离间我们同广大群众的关系。应该非常重视工会和它们的工作。为了解

决沙赫特案件,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一点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因为大家从报纸上已经看到。

只是有一点应当特别加以强调。需要最大限度地注意我们的工会,因为这是最广泛的工人组织。现在工会正在改组。不久前调查了乌克兰的钢铁厂。发现了什么呢?发现工人的流动性有时比率达到了50%,甚至达到了80%。这就是说,在我们这里,即使在那些大的和稳固的生产单位里,也在出现新的工人阶层,这是由一系列的原因造成的,关于这一点我就不打算在这里说了。有些人对1905年以前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的人数表示吃惊,对他们的比例的减少有些感叹。但是,既然人不能永远活着,他们的人数又怎能不减少。工人阶级也同样如此。不能想象工人阶级的成分还会和30年前一样,否则那就是地道的白痴。工人阶级将从农民、职员和失业者那里招募自己的成员。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在这里设置障碍。我们的任务不在这里。不能说这是工人阶级中的“走狗”和“败类”,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我们的任务不在于把自己同人隔离开和安于现状,而在于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和按照自己的样子来改造新的工人阶级阶层。尽管我们直到现在还在大力宣传这一任务,但是工会并未使这一任务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要注意,如果在基本工人同党或工会或自身组织的上层之间存在着隔阂,那么,新的工人阶级阶层同上层之间的隔阂就会要加大10倍。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为了粉碎我们工会的官僚主义恶习和促使它们更积极地行动起来,这里需要作一番非常特别的努力。应该说,这里需要把自我批评稍微扩大一些。要靠我们广开批评言路,促使工会的工作人员行动起来。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这样做,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为自己带来损害,并且自己也变成苏维埃共和国工人事业的卑鄙破坏者的尾巴。

经济工作人员。通过我们所作的全部考察,从各机关所提供的综合材料中可以得出结论,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经济工作人员已沦为资产阶级专家的附庸。这样,中央便作了两个方面的指示:第一个方面是,扩大经济工作人员对技术经理的权限;第二个方面是,提高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的熟练程度。在提高技术熟练程度方面,中央认为必须指示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要求他们熟悉他们所在单位的生产,丰富自己的实践,努力加强自修。此外,中央还作出指示,要通过高等学校和出国考察等等加快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人员和我们自己的专家。关于这一问题的细节大家可以从中央通过的关于沙赫特案件的决议中看到。

加强无产阶级民主

相应决议充满的一个精神在于发扬无产阶级民主,举行生产会议,加强注意工人的发明创造事业,消除一些破坏我们的准则和我们的劳动法规等等行为,关心各种细小问题,使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工人化。¹⁵⁷这是中央决议所依据的基础。

同志们,沙赫特案件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事件。它之所以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事件,特别是因为这里搀和进了外国资本。大家知道,自从我们逮捕了几个外国工程师¹⁵⁸以后,西欧开始对我们进行了极为凶猛的攻击。我们同德国的关系大大地恶化了。国外加剧了反对我们的猖狂活动,加强了财政经济上的封锁等等。但是,同志们,我还必须指出沙赫特案件的另一个方面。一颗星星,沙赫特案件的卑鄙星星是坐落在整个卑鄙勾当的星座上的,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认真地想一想,我们这里发生过“梁赞”事件,莫洛托夫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讲过这一点¹⁵⁹,我指出过我们这里发生过的“阿尔季奥莫夫斯克”事件,那里的个别党的工作人员强奸妇女、酗酒等等。不久前我们这里揭发出了“索契”事件,那里有一些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在带头做坏事(我本人就曾见过一个在国内战争中失去了一只腿的人,他和其他酒友在一起坏到如此地步,一个团支部书记为逢迎长官而招拢一些女团员供他寻欢作乐)。我们还发生过“沃罗涅什”事件,那里有一个秘密的盗窃股份公司,进行着名副其实的盗窃国家财产的活动,东西“脱手”后就元现金存入共同的金库成为股份,同时这个集团还同党的组织保持着联系。

我再说一遍,如果多一些自我批评,如果党内多一些真正的民主,那么这些坏蛋就藏不了多久。因此,从整个形势看,迫切需要开展自我批评,大大发扬党内民主,少搞一些委派制。同时,形势还要求我们坚决把党组织的方向扭转过来,即大力做好在广大群众中的工作,不仅要发扬党内民主,而且要发扬工会民主,特别是要挑选和提拔新人,从而制止官僚主义弊病的发展。必须做到这一点。为此,中央委员会作出专门决议,决定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各级党委会委员以及苏维埃政权中的主要工作人员每年分别派到地方工作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这不是一般口头上说一说,而是中央全会的正式决议,因此,我想这一决议的实现是有足够保证的。

不管在粮食收购工作上,还是在沙赫特案件中,令人快慰的事情不多。但是,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我们在粮食收购上的困难和我们在沙赫特案件上所表

现出来的那类困难是在迅速的、目前公认的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不是说明倒退,或不可能胜利前进,或在某种程度上是注定的,不是说明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帮助等等就不可能生存下去。我们手中掌握着强大的进一步建设和影响广大群众的杠杆。我们手中掌握着建设我国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极为有力的手段。仅仅是由于我们文化普遍太低和由于我们本身机体中存在一系列不协调的现象,所以我们时而跑得过快,时而倒向这一方面,时而在自己身边发现巨大的失策。但无论如何我们是在前进!

如果党组织在中央的领导下能坚决纠正两大事件所暴露出的缺点,那就毫无疑问,我们党一定会在经济建设、团结工人阶级力量、加强我们同贫农的联盟、组织贫农和无情地同富农斗争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真理报》1928年4月19日(91号)

注 释

- 1 《苏联土地安排和土地使用的基本原则法》草案是1928年4月3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9月3日提交第四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80号案卷,第2张)。
- 2 1927年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确定了1927—1928年度粮食收购的“控制数字”为7.4亿普特粮食(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51号案卷,第3张)。10月3日,在商业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上,A.И.米高扬坚持“不少于7亿普特”的计划。他的副手И.Я.魏采尔建议提出6.1亿普特(详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莫斯科1999年版,第88页)。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了1927—1928年度收购粮食6.95亿普特的计划(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5号案卷,第95张)。
- 3 见补充材料1。
- 4 指的是1925—1927年稳定的粮食收成,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分别收上了0.724亿、0.766亿、0.717亿吨粮食。这些数字和现代研究成果中的最多估量是一致的(例如,可参见C.维特科罗夫特,P.戴维斯著;《苏联的农业危机》,在“农业发展的当代观念”理论讨论会上的报告。《本国历史》,1998年第6期,第97页)。
- 5 在1927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A.И.米高扬是这样描述“粮食问题”的:“如果说整个农业播种面积提高到了战前的97%的话,那么粮食的播种面积只提高到了87%,而同时技术作物的面积却超出了战前水平。在说到扩大粮食作物耕作面积时,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最重要的国家产粮地区上:乌克兰南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沿岸地区、乌拉尔、黑土州、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些粮食地区在用自己的余粮一直喂养着国家并提供出口的粮食”(《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莫斯科1962年版,第二部分,第1097页)。过了半年,1928年5月17日,在为联共(布)政治局会议准备的《关于加强出口的措施报告》里,A.И.米高扬对1927年粮食播种面积举出了另外的数字——战前(1913年前)播种面积的95.6%。根据同一个报告,苏联出口中最落后的是在出口商品作物中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的商品——小麦和大麦。而且尚未恢复的战前的粮食作物面积(4.4%)使得粮食作物的产量比战前水平少了大约2亿普特。同时,苏联人口比1913年增多了1400万,引起国内粮食消费比战前增长了2.5亿普特(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5号案卷,第184—188张)。
- 6 订购——是合作组织或者国家组织为一方,农民为另一方之间的合同,它规定向生产者订购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农产品并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交付。合同组织有义务按事

先规定的价格收购产品并向农民预支贷款,种子和生产工具,向他们提供农艺帮助。关于确定订购的合同既可和集体经营单位也可和个体经营单位签订。在苏联,这种订购从1922年起就开始采用了,但是作为基本的收购形式,是在1928—1929年度时开始采用的。

- 7 1928年3月30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下调供应充足的和紧缺的商品的出厂价格,这包括了布料,呢毛料,皮革商品,火柴,烟草,袋子(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6号案卷,第1张)。
- 8 商品卢布——为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确定成本和衡量商品价格而采用的稳定的计算单位的计算方法。
- 9 质量抬价(来自法文的 *hijfication*)指商品质量高于合同规定的价格时的加价。质量压价(来自法文的 *réfaction*)指商品质量低于合同规定的价格时的压价。
- 10 1927—1928年苏联的出口接近于战前的一半,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是落后的。
- 11 这里说的是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开始大举采用的粮食收购的暴力和没收方法。揭示“非常的”或者“不寻常的”粮食收购措施的基本文件已经公布了(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
- 12 1927年12月30日,乌克兰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提出了补充进口农业机器“加强在乌克兰的粮食收购”问题,得到B. M. 莫洛托夫支持的请求由A. И. 米高扬于1928年1月5日提交给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审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5号案卷,第51—53张)。政治局决定“接受联共(布)中央的建议,补充进口500万卢布的拖拉机作为对发展粮食收购的鼓励……在乌克兰百分之百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的条件下,补充进口在秋季播种季节之前完成(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1772号案卷,第2张)。
- 13 这里指的是1928年1月18日至2月4日И. В. 斯大林的西伯利亚之行,在这次出行期间,当局开始采用刑典上的条款作为在粮食收购过程中进行迫害的法律保障。为了在西伯利亚的粮食收购中推行非常措施,又向农村增派了大约4000人。
另见注61。
- 14 俄罗斯刑事法典第107条称:“通过打折扣、隐藏或者不生产商品来恶意抬高其价格者——判1年以监禁并没收或不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同样行为且在商人之间确有契约者——判监禁3年以下并没收全部财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莫斯科1929年版,第64—65页)1926年通过的刑事法典是针对投机者和倒卖者的。1928年1月,И. В. 斯大林建议对“把持粮食者”,其中包括拒绝按“固定的”、压低了的、对农民不利的价格向收购人员缴出粮食的农民生产者采用它。政治局委员们支持了斯大林的这种把上述条款变成对农村施压来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的立场。根据第107条判刑的不仅是余粮户,而且有那些拥有粮食保险储备的中农。而A. И. 李可夫引用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数据指出,

- 1928年4月,在根据第107条追究法律责任的人中间,富农和商人占有的比例没有超过三分之二(1928年7月15日《真理报》)。
- 15 捐献是吸收农业人口资金自愿在农村向经济和文化建设投资的形式之一。《捐献法》是1924年8月29日通过的(《苏联法令汇编》,1924年第6期,第69页)。该法后来被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1927年8月24日的决议取代(《苏联法令汇编》,1927年第51期,第509页),在此基础上通过了俄联邦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议《关于居民捐献的办法》,1928年1月8日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关于推行捐献的决定在全体会议上以多数票通过,该村的所有居民都必须执行。为以简单多数通过决定,需要有不少于总数一半的该村拥有选举权的公民出席会议。如果由于没有出席而没有开成会议,第二次开会时无论有多少公民参加,均认为是有效的。捐献可以采用货币形式和实物形式,也可以是参加劳动的形式,但不应该超出统一的农业税的35%。集会的决议要确定可以使用通过捐献收购来的资金的项目,地方政权机关的权利和义务(《苏联法令汇编》,第8期,第73页)。
- 16 发行《加强农民经济的国内有奖公债》的条件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27年12月30日的决议确定的。公债以面值10卢布的持有者证券的形式发行了1亿卢布,期限是1928年2月1日到1931年2月1日,支付的年息为6%。规定要有6次开奖(从1928年10月开始,在每年的1月和10月)。获奖者有权不排队购买奖金数额的农具。每个区或者镇的债款的10%要转交给区的或镇的预算,用于满足地方上的农业和文化需求(《苏联法令汇编》,1928年第3期,第24页)。1928年2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再发行0.5亿卢布的债券(《苏联法令汇编》,1928年第14期,第118页)。当时第一期曾从1928年10月挪到了当年的6月(《苏联法令汇编》,1928年第14期,第117页)。1928年4月第一期又挪到了5月中旬(《苏联法律汇编》,1928年第22期,第192页)。
- 17 概述农民写给他们红军应征服役的儿子们的信件的材料是散发给国家最高领导的,作为一种对基本上是在农村生活的土壤上形成的红军战士心情的通报。1928年1月—3月从国家的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村来了一股抱怨:“新经济政策在被消灭”,“要回到1920年的粮食征集制去了”,“把所有的粮食都挖走了”,等等(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第43页)。
- 18 1928年2月18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掌权人的载体》,结尾是这样的:“不明事理和没有头脑的,用大喊大叫的命令破坏粮食收购的行政管理人员是苏维埃的粮食敌人,并不比吞噬粮食的蛀虫的危险小。”
- 19 指的是1928年2月13日的指令《收购运动的最初结果和党在今后的任务。致联共(布)的所有组织》,该指令曾以“秘密。不供报刊发表”的密级发到地方。但是1928年2月15日《真理报》的社论全部阐述了它的内容。
- 20 “和平喘息”的提法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引进来的(《列宁全集》中

- 文第2版,第34卷,第150—188页)。
- 21 1928—1929年度的农业税收总额比1927—1928年度增加了0.9亿卢布。同时预计可以有35%的贫农农户完全免税,可以实现向累计征收所得税过渡,也就是说对财产少的贫农农户降低征税,对中农农户略微提高征税,把大部分税收负担转移到富裕农户和富农身上(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第390—391页)。
 - 22 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是1923年5月14日登记注册的股份制公司。公司的职权包括收购,在国内运出和销售农产品。到1926年时,固定资本是0.33亿卢布(见《全苏联》,1926年查询和地址手册,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16页)。在粮食收购组织系统中,与该公司一起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有大型的面粉磨制托拉斯——在乌克兰的乌克兰粮食和饲料产品加工贸易联合公司和在北高加索的高加索粮食收购股份公司。
 - 23 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归属于商业人民委员部管辖。根据1928年四月全会的决定,由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乌克兰粮食和饲料产品加工贸易联合公司、萨马尔磨面托拉斯、鞑靼自治共和国磨面托拉斯、斯大林格勒磨面托拉斯、阿穆尔磨面托拉斯和萨拉托夫各工业联合企业的商品磨坊合并建立的。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担负的责任是在苏联领土上进行粮食收购,由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组织提供粮食和粮食制品,向各生产、消费和工业中心地区供应粮食(见《全苏联》,1928年查询和地址手册,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46页;另见第3卷注171)。
 - 24 根据1927年12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为了观察中央关于加强粮食收购的指令贯彻的情况,向地方上派遣了中央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负责人员的全权代表,他们有权撤销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在粮食收购领域里做出的违背中央指令的决定,有权下达地方政权当局必须执行的相应指令(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第113—114页)。
 - 25 劳动国防委员会1927年2月25日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规定,采用各个共和国农业合作社联社和相应的国家企业之间签订总合同的制度,把收购和销售农产品的业务移交给它,以此来加强它,逐渐减少了消费合作社的原料收购(《苏联法令汇编》,1927年第14期,第156页)。
 - 26 指的是题为《关于巩固农业合作社的措施》的社论(《真理报》1927年3月25日)。
 - 27 引用的这段话来自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关于对〈劳动国防委员会1927年4月29日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措施〉决议的修改》(《苏联法令汇编》,1927年第32期,第337页)。
 - 28 农业合作社中央蛋品家禽联社,是1926年从农业合作社联社中分离出来的。它负责按合作社原则组织家禽业产品的销售,促进了行业性的家禽同行会和劳动组合以及野味收购的劳动组合的出现,组织了工业企业、示范实验单位和站所,向居民供应组织家禽生产

- 单位需要的良种材料、饲料和工具,保存和销售家禽业产品(《苏联的所有合作社》,莫斯科1928年版,第421—427页)。
- 29 1927年12月31日,A.И.米高扬从坦波夫发出的指令电报说,“粮食收购的进程缓慢得不能容忍”,基本原因是:“基层粮食收购机构的工作软弱”,国营农场对拖欠和延迟上缴的追究不能令人满意。为了加快粮食收购的速度,指令要求向上缴粮食者保障紧缺商品,无论他们是不是合作社社员;立即征收欠债,直至查封财产;对不交付的富裕户主施加社会压力,让国营农场和“苏维埃、党和合作社的积极分子”缴粮。1928年1月14日接着来了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公文电报,对“坦波夫”指令和一系列其他指令做了修正和解释。(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第148—149,778页)。
- 30 全乌克兰农业合作社联社是乌克兰整个农业合作社系统的中央机关,同时农业合作社的专门领域还有自己单独的销售供应中心。全乌克兰农业合作社联社直接领导信贷和普通合作社联社,但是信贷合作社联社同时还服从乌克兰农业银行领导,那是乌克兰的农业信贷中心。全乌克兰农业合作社联社向农村供应生产资料和经营生产性的商品,从事农业信贷工作和推行农业技术措施,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工作:建设粮仓、农产品加工厂,等等。它还组织下发一些指示,开办合作社工作人员培训班,举行讲座,散发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材料。1928年时,全乌克兰农业合作社联社包括42个信贷和普通联社,还有7个专门合作中心,联合了2700个信贷的,4798个专门的和5028个机器拖拉机的联合组织,6316个农业集体,联合的农户总共有91万个(《苏联的所有合作社》,莫斯科1929年版,第194—200页)。
- 31 鲁勃措夫专区——西伯利亚最大的产粮区。
- 32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指出,应该借助组织贫农对富农的斗争和通过“加强无产阶级和贫农与中农的联盟,把中农和富农分开,孤立富农”来进行(《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文件汇编》第3卷,莫斯科1984年第9版,第430页)。
- 33 这里指的是苏联中央统计局下属的专家委员会。
- 34 指的是1927年12月14日和24日,1928年1月5日和2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粮食收购的指令(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第113—114页,136—137页);另见注19。
- 35 土地社是苏联法律承认的传统的农民社团机构。1922年的俄联邦土地法典、1926年的《土地社规范章程》和1928年的《土地使用和土地规划总原则》,从立法上保障了这种社团的存在。土地社是农户的地域联合,它可以直接领导土地的使用和调节自己成员的土地关系,解决进行土地规划、轮作制度问题,进行土地的重新划分和分配,直接支配公用的、不可分割使用的耕地,规定和改变使用这些土地的规则,监督对土地的使用。土地社的最高指挥机关是正式社员大会,18岁以上的所有土地使用者都被承认是社员。1928

- 年,在苏维埃选举中被取消了选举权的人同时也被取消了在大会上的发言权(见B. П. 达尼洛夫著《集体农庄前的苏联农村:居民,土地使用,经营》,莫斯科1977年版,第95—106页)。
- 36 联共(布)十五大通过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合作社和国家机关之间建立能够在无条件地保障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和领导的条件下进一步扩大合作社的工作领域这样的相互关系”(《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文件汇编》第4卷,莫斯科1984年版,第306页)。
- 37 1927年12月24日,政治局派莫洛托夫作为粮食收购的全权代表到了乌克兰,1928年1月12日带了同样的目的到了乌拉尔(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66号案卷,第7张。)
- 38 在1925年10月10日联共(布)中央《关于党在农村贫农中的工作的决议》,1925年10月23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在中央农业银行的资金中拨出专门的基金、向贫农人口提供优惠贷款的决议》基础上,1926年3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全苏贫农贷款基金条例(见《苏联法令汇编》,1926年第27期,第171页)。基金设在中央农业银行名下,目的是向合作化的农村贫苦人口和单独的贫农农户提供优惠贷款,由专门的预算拨款、中央农业银行的利润提成和其他来源构成。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26年10月29日《关于农村贫农贷款基金的决议》,这种基金已经在各加盟共和国的所有农业银行里组建(见《苏联法令汇编》,1926年第72期第568页)。根据1927年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联席全会《关于1927—1928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决议》,规定国家和地方预算都要扩大帮助贫农的基金。1927年9月30日颁布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提高合作社社员费,实现贫农合作化的决议》。贫农合作化基金要靠基层合作社和它们的联社利润提成,地方预算拨款以及农民社会互助委员会的资金形成(见《1927年党的工作人员手册》第5册,第一部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413、659页)。
- 39 指的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五大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说到农产品出口和战前的水平相比不高,原因之一是苏联不能按照资产阶级的“自己吃不饱,也得要输出”公式进行贸易(《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52页)。
- 40 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成立于1926年。根据它的章程,它的建立是为了把加入的合作社联合起来。它的任务包括促进合理地 and 文明地安置大田农民的劳动经营;促进组织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合作社、劳动组合和联盟,参与建设粮仓、粮库、磨坊等;组织产品的销售,向居民供应机器设备、种子、材料,等等。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建立了实验室和实验站,研究谷类作物有油料作物的种子和由它们加工出来的产品。
- 41 1927年9月初,商业人民委员部降低了收购价格。大麦的价格确定为一普特78戈比,燕麦—68戈比,“粮食产品质量不好则进一步降价”。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材料,“粮食收购运动最初时的改价”既对农民的情绪产生了不良影响,也使得各种议论有了

- 可能(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第91页)。
- 42 康特米洛夫卡是一个村子,沃罗涅日州的一个区中心。1933年村里有1.29万人口,主要是乌克兰人,有皮革制鞋工业和缝纫工业,面粉磨制业,机器拖拉机站。
- 43 关于农民写到红军的五花八门的各种信件的情报是由军队里代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系统的特别科以及军队的政治部整理的。
- 44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经常向党的各级组织通报农村中,其中也包括在乌克兰的反苏维埃情绪(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第195—196页)。
- 45 指的是联共(布)中央1926年四月全会《关于在1926—1927年度的运动中组织粮食收购机构的决议》,它确定了基本的集中于中央的粮食收购机构的结构,建立的目的是“和由于计划外的和私人的粮食收购单位的涌现造成的粮食市场的非组织状态作斗争”。做粮食生意不是其直接职能的国家组织的粮食交易作业被认为是不能允许的。除合作社外,基本的收购单位——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全乌克兰合作社联社,农业合作社联社和全乌克兰农业合作社联社——应该给生产地区的地方预算提成一部分由于收购活动得到的利润(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1925—1935年,莫斯科1936年版,第100—103页)。
- 46 1928年2月7日在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鲁特科夫斯克矿业局科拉斯诺特沃尔切斯克矿区发生了保存在矿区办公室的炸药爆炸。12人死亡,8人受伤。2月12日《真理报》发表了评论,认为责任在于打通通道的德国《蒂森》公司的专家身上。但是4月7日在《真理报》上出现了一个报道,说工人不止一次地抱怨说,炸药放在了不适合的房间里,但是矿区的领导没有对这些意见做出反应。
- 47 见注25。
- 48 插秧是两三个农户(通常是最穷的)一起耕种土地,是劳动组合的最简单的形式。
- 49 磨坊价格是一种出售的条件,根据它,买主可以免去装载、运输货物的开支,这些开支都计算到商品价格里去了。
- 50 这里指的是加米涅夫在联共(布)十四大上的发言中谈到的关于从1925年的收成中进行粮食收购的那些提得过高的计划:“我们曾试图在1925年调节已经拿到手的好收成的结果。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我们没有能在1925年‘调整了’老乡,而是小小的老乡‘调整了’我们……为我们调整了2亿普特”。从上下文可以清楚地看出,加米涅夫说的“老乡”指的是富农(《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25年12月18—31日),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263—264页)。
- 51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有一批乌克兰活动家在乌克兰反对联共(布)的民族政策,其中包括的人有:A. Я. 舒姆斯基——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作家 M. 赫维列维伊和经济学家 M. K. 沃洛布耶夫。在乌共(布)十大(1927年11月)和后来的几次乌共(布)中央全会上,这些人的观点受到了谴责。舒姆斯基被撤销了人民委员职务。赫维列维伊和沃洛布

耶夫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 52 关于战争的议论——在当时的苏维埃报刊上和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言论中,极度强调了“帝国主义分子”正在准备对苏联作战的提法。加剧战争心理的一个直接任务就是发动大规模的迫害。
- 53 1927年12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给粮食收购地区的党组织的指令指出,10月和11月的粮食收购减少了很多,威胁到的不仅是完成出口计划和形成粮食储备,而且还有对两个首都以及消费地区的供应。指令认为,摆脱这种状况的措施之一是从城市的市场上向粮食收购地区投放工业商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2月24日的指令指出,必须“靠抽空非粮产区和城市的办法把绝大部分工业商品投放到粮食产区去”(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第108,113页);另见注29。
- 54 1928年3月30日召开了第八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1927—1928年度俄罗斯联邦国家预算。就在那个时候,可以从中央和地方的报纸上得知,1928年4月10日将召开第四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1928—1929年度的统一农业税方案。
- 55 红色教授大学是为高等学院培养社会科学教师以及为党和国家的中央机关培养工作人员的专门的高等学校。1928年时,学校有历史、党史、经济、哲学、法律、自然科学、文学和预备班分部。
- 56 1927年5月13日,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组织1927—1928年度粮食收购运动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国家银行的粮食收购工作被取消了。投入粮食作业的国家银行资本和财产转为了收购组织的基本周转资本(《真理报》1927年5月24日)。
- 57 指的是1918—1921年乌克兰的民族独立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其组织者和思想家C. B. 彼得留拉(1879—1926)的名字命名的。
- 58 见注19。
- 59 李可夫致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边疆区、州和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信发表在1928年4月1日的《真理报》上,题目是《和强制摊派加强农户公债的现象作斗争》。信里写到农民对强行摊派公债、利用警察机关、消费和农业合作社对有公债的农民提供优惠和恶化没有购买公债的人的状况等等方面的抱怨。李可夫声明说,所有的抱怨都将转交给检察院机关审议,号召“采取紧急措施消除强制摊派公债的现象”。
- 60 西伯利亚粮食收购计划——1月18日在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和斯大林一起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指令,边疆区必须提供8200万普特粮食。计划完成了96%,但是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除其他一些消极后果外,从新经济政策开始以来,1928年春夏第一次出现了城市和工业村落粮食供应严重中断的情况。
- 61 谷类加工费——这里的俄升是从18世纪末开始在俄国采用的散装物品,特别是粮食的容量单位,1俄升相当于3.28升。谷类加工费是磨坊征收的粮食磨制费。
- 62 指的是1928年3月15—24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的筹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苏

联代表团提出了全面、完全和立即裁军公约草案。西方国家代表团拒绝讨论它。苏联的中央报纸广泛报道了这次会议的过程。

63 见注 29。

64 引自 1928 年 1 月 14 日联共(布)政治局关于组织工业商品和粮食交换的公文(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 1 卷,第 148 页。)

65 1927 年 10 月 21—23 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指出了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倾向斗争”为特点的“农村分化过程”(《苏共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4 卷,第 236 页)。

66 米高扬引用的决议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的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文件中没有发现。

67 本卷第 12、13 页,以及补充材料 2。

68 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克雷连柯领导的检察院两部门之间的矛盾。

69 1928 年 3 月,波兰驻苏联大使 C. 帕捷克访问了顿巴斯,此间他会见了国营顿涅茨克石煤和无烟煤生产销售托拉斯的专家们。

70 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营顿涅茨克石煤和无烟煤生产销售托拉斯,成立于 1920 年,固定资产为 1.58 亿卢布。1927 年,托拉斯共有 27 个矿务局、12 个工厂,6 个贸易办事处和代表处,共有工人和职员 17.8 万人。国营顿涅茨克石煤和无烟煤生产销售托拉斯的中央机关设在哈尔科夫市。顿涅茨克—格鲁谢夫斯克和涅斯维塔耶夫斯克矿业局设在北高加索边疆区的沙赫特市(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87 号目录,126 号案卷;亦见注 91)。

71 在国营顿涅茨克石煤和无烟煤生产销售托拉斯的总部里有技术经理部、相当一个处,其职能是制订和汇总各项计划、预算、生产财务计划,估价、核算和分配预算经费以及做出经济分析。发言人在全会上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材料谈到,国营顿涅茨克石煤和无烟煤生产销售托拉斯的“技术委员会”是由“著名的教授、重要的矿业专家们”组成的(亦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1 号全宗,3 号目录,127 号案卷,第 86—87 张)。同时,从 1918 年—1932 年,在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有一个科学技术处,它领导全国的科技政策、应用性调查,根据国民经济计划分配任务。有数百名教授、工程师和专家作为专家,按照各个学科在那里工作,其中包括矿产业。

72 劳动军——1920—1922 年间在国民经济中采用的红军军事组织。在军事方面服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而在经济方面由工农国防委员会(自 1920 年 4 月起为劳动国防委员会)领导。劳动军的活动由来自军队司令部、劳动国防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个人民委员部和部委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领导。从采用新经济政策开始,1921 年 12 月 30 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做出了解散劳动军的决议(《苏联的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莫斯科百科全书社出版 1983 年版,第 599 页)。

73 1928 年 3 月 15 日,苏联驻德国的全权代表得到德国政府的通知,说参与沙赫特案件的德

- 国工程师和技术员被捕引起了德国实业界的“强烈反对和对同苏联的整个经济关系失去信心”。德国政府就此决定停止同苏联的经济会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1卷,莫斯科1966年版,第161—162、166—167、707页)。
- 74 1926年3月29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批准《关于工业企业管理组织的通告》的同时,还批准了《关于冶金和电力工业部门的工厂技术经理的权利与义务总条例》。A. И. 李可夫在全会上的报告和B. B. 古比雪夫的发言对这些文件的内容做了全面披露。
- 75 上海——指“租界”,中国某些大城市中外国人租界中的专门住宅区。根据1842年的《南京条约》,上海对外国商界开放。在市里成立了美(1848)、英和法(1849)租界,它们拥有治外法权并得到外国武装力量的保护。租界不受中国的司法管辖。占租界人口95%—97%的中国人无权拥有租界地的不动产。在上海,1925年5月30日英国警察对游行队伍开枪之后,开始了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苏联报界对这一事件作了广泛的报道。
- 76 1927年6月29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关于国家工业托拉斯的条例》,其中对“在由托拉斯理事会确定的职权范围内实施一长制”的企业经理的权力做了规定(《苏联法令汇编》,1927年第39期,第391页)。
- 77 B. И.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11页。
- 78 B. И. 列宁:《关于党纲的报告(3月19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51页。
- 79 B. И. 列宁:《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3月18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28页。
- 80 B. И. 列宁:《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242页。
- 81 A. И. 李可夫引自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M. П. 托姆斯基的报告《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与任务》作出的决议(《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卷,第49页)(《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61页,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 82 “策略中心”是一个反布尔什维组织,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核准,它在1919年3—4月联合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各种政治力量,其目的是促进海军上将高尔察克部队的胜利。案件诉讼程序是在1920年8月进行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红皮书》第2卷,莫斯科1989年版,第21—59页)。
- 83 “塔甘采夫阴谋”是根据圣彼得堡大学和矿业学院的地理学家、教授B. H. 塔甘采夫(1890—1921)的姓名命名的。1921年6月,他作为所谓的“彼得格勒战斗组织”的领导人被捕,其罪名是与“喀琅施塔得暴乱分子”会谈,筹备恐怖活动,与侨民联系,进行政治与经济讹诈。被逮捕的超过了200人。1921年8月24日夜至25日,塔甘采夫与其他60

- 人被枪决。其余的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彼得格勒真理报》1921年9月1日)。
- 84 路标转换派是主要由侨居的知识分子掀起的俄罗斯运动,其思想是希望由于推行新经济政策而改变共产主义制度。“路标转换派”的主导思想是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唯一的国家的俄罗斯政权”,认为布尔什维克作为“俄罗斯的国家现象”,能够恢复“俄罗斯精神”(M.阿古尔斯基:《民族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巴黎1980年版)。
- 85 巴拉赫纳发电站(使用泥炭燃料)位于下诺夫哥罗德省巴拉赫纳市。
- 86 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执行按行政处分驱逐的权力,禁止居住在以下6个地区:莫斯科州、列宁格勒州、基辅专区、敖德萨专区、哈尔科夫专区、北高加索边疆区和达吉斯坦。
- 87 工程技术部——工会为吸引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参加生产部门的社会工作而成立的社会组织。
- 88 哈尔科夫地区电站,即丘古耶夫电站,1928年2月12日,《真理报》发表了《哈尔科夫电站建筑工程的缺陷》的简讯,据称,由于不现实的建筑计划和拖延提供设备,电站可能推迟两年开始工作。建筑工程的总预算不得不增加95%,而工程质量差以及“无系统地采购建筑材料”造成超支90万卢布。
- 89 指1928年被捕的两个专家,他们准备了一份关于发展乌克兰南部冶金企业的方案。国家领导人认为这个计划是具有“破坏性”的,并要求大大增加企业的生产设备。
- 90 指所谓的“阿尔乔莫夫斯克事件”。1928年2月27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听取了联共(布)阿尔乔莫夫斯克州委代表拉维奇的报告和联共(布)中央巡视员梅什金的副报告。在决议中指出了“州委同工人群众联系不够和州委同组织中的积极分子中存在的病态现象(司法调查机关、警察局的瓦解、亚罗修克事件等)斗争方面的软弱”。州委的工作被认为是不称职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602号案卷,第1,14—21张)。组织局确认了联共(布)中央1928年2月11日《关于解除阿尔乔莫夫斯克州委书记Д. А.米赫年科职务的决议》。1928年3月7日的《真理报》刊登了联共(布)中央的决议。可见注99。
- 91 1920年石炭和无烟煤企业联合成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位于哈尔科夫。1920年末该局转移到巴赫穆特市(阿尔乔莫夫斯克)。1921年末该总局改名为国家煤炭工业局。1924年5月该局转移到哈尔科夫,自1924年11月起,在它的基础上组建了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另见注70。
- 92 这是指H. M.扬松领导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工资委员会的活动,劳动经济部副部长И. А.克拉瓦利的活动以及对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科技部的改组。
- 93 在莫斯科市联共(布)中央和地方机关的档案里没有发现这里提到的文件。
- 94 诺沃契尔卡斯克综合技术学院是国家最大的大学之一。它建于1907年,当时名为顿河综合技术学院。
- 95 A. A.安德烈耶夫任主席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委员会是在1927年10月7日通过的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决议的基础上成立的。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委员会举行了几

- 次会议(委员会的最后阶段是由 C. B. 柯秀尔领导的),并在 1928 年 3 月将关于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及其实习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组织局讨论。1928 年 3 月 19 日,组织局授权委员会修改草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113 号目录,607 号案卷,第 44—49 张)。此后该问题在政府机关中得到解决。1928 年 8 月 29 日,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培养新专家及其分配和使用问题的决定》。决定规定了一系列用工程师来加强工业的措施。还规定了大学和技术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应该由相关业务的人民委员部来进行,而且根据相关业务部门的指示规定了必须参加生产工作的期限为三年(《法令汇编》,1928 年,第 58 期,第 513 页;安德烈耶夫—柯秀尔委员会材料,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164 号目录,74 号、75 号案卷)。
- 96 中学——1918 年的统一劳动学校规则和宣言规定了五年制的小学和四年制的中学。1921 年初,中小学的体制进行了改组:采用了普及的小学——四年制;在城市和大型工业中心——七年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四年制的技术学校。由于广泛的技术学校网需要有生产基地和培训教师,1921 年秋决定保留中学,同时发展技术学校和工人系网(《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62 卷,莫斯科 1933 年第 1 版,第 454 页)。1927 年末,莫斯科工农检察院调查了经过这样改组的中学状况,七年制成为中学的主要类型,八年级和九年级被分出来作为专科。莫斯科工农检察院院委向俄联邦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请求,提出了明确改组了的中学的培养目标问题,让中学的教学大纲和高等院校的教学大纲的要求相一致,把中学的学习年限延长一年(《真理报》,1928 年 2 月 11 日)。
- 97 1924—1925 年军队改革的结果使军队得到了精简,开始实行干部和地方民兵混合的武装力量配置并集中了管理机构。
- 98 在顿巴斯康斯坦丁诺夫卡镇曾有过用进口设备建成的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玻璃厂和细瓶颈玻璃厂。在其中的一次检查后,1927 年 11 月 19 日《真理报》刊登了题为《建设中不能容忍的疏忽大意》的文章,谈到了关于上述二厂在建设中的疏忽大意和经营不善。
- 99 亚罗修克是阿尔乔莫夫斯克专区法院院长,因徇私和搞私人交情行为被指控“违反法庭审讯和侦查规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113 号目录,600 号案卷,第 16 张)。参见注 90。
- 100 1927 年 3 月 28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斯大林诺组织的状况和工作的决定》,承认该组织“总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党的工作人员手册》,第 6 期,第 2 册,莫斯科 1928 年版,第 269 页)。
- 101 劳动集体与企业行政领导重新签订合同的运动是根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指令进行的,运动指出了必须“在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取得劳动生产率增长比工资增长快的较为明显的转变”(《真理报》1927 年 11 月 1 日)。
- 102 柳别尔齐教训——指 1927 年 12 月底至 1928 年 1 月初莫斯科州的柳别尔齐工厂的罢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8 年 1 月 5 日成立了以 M. П. 托姆斯基为主席的委员会,目的是弄清引起罢工的情况并就此采取防范措施(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档案馆,17 号全

- 宗,3号目录,1772号案卷,第4张)。在1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了托姆斯基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承认,柳别尔齐厂发生罢工和科洛姆纳厂的部分人罢工的原因是“错误地把重新签订集体合同的运动同修改定额和计件工资额以及进行税制改革结合在一起”(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1744号案卷,第17—20张)。
- 103 1926年,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工业中央管理局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监察委员会主席H.乌曼斯基向联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呈递了《关于对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在其管理的组织形式方面进行的活动的活动的评价报告》。报告指出,“集中化和全面保护”是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矿业局管理下属的矿业局的基本原则。乌曼斯基通报说,曾试图让企业有某些自主权,但这些试图“都不是能始终坚持下去的,尽管就此已经议论了3年多,可是事情至今没有进展”(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87号目录,126号案卷,第56—61张)。
- 104 1927年秋天,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专家组对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矿工们进行了调查,弄清了“工人问题”和基础建设的状况。1927年11月4日《真理报》对该专家组的工作作了报道。1928年3月31日,卡冈诺维奇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工作的报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1号全宗,2号目录,316号案卷。)
- 105 列宁:《在1922年3月27日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第110页。
- 106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中文1995年版,第3卷,第482—483页。
- 107 在涅斯维塔伊的“斯卡钦斯基”是指在沙赫特市的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涅斯维塔伊矿业局,1916年就开始在那里开凿由斯卡钦斯基设计的矿井。1926年恢复开凿。矿井由其设计人的名字命名。建设这个持续开凿一年半的矿井花费了1000亿卢布。1927年12月1日该矿井举行了开业典礼。
- 108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了属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是与留在党内不兼容的,并把反对派的所有著名的活动家开除出党。
- 109 从1928年3月15日至1933年11月28日,《工农检察院专页》定期刊登在《真理报》上,其目的是吸引广大群众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 110 于1917年11月被捕的进攻彼得格勒的领导人们在发誓不再与苏维埃政权作对后被释放。
- 111 1927年3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组织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属的为工业部门培训高层领导工作人员的学院。
- 112 《轨道在轰鸣》是苏联剧作家B. M. 基尔维(1902—1938)写的话剧。
- 113 指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联共(布)纲领中关于国民教育的部分:“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06—107页)。

- 114 1928年2月底至3月初,在塔什干就中亚水利经济管理局工作人员涉嫌破坏、在无经济根据的前提下确定项目、怠工和管理混乱等一事进行了法庭审讯。审讯过程曾在报刊上披露(《真理报》1928年3月1日)。1928年2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其中指出:“法庭应该看到,审判过程继续下去就要询问更多的人士并让他们承担司法责任,甚至不惜侦查肩负最重要责任的专家和苏维埃活动家,不管其职位有多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1776号案卷,第3张)。
- 115 佐洛托—托什科沃矿业管理局和戈尔诺—伊万诺沃矿区位于阿尔乔莫夫斯克专区马里耶夫卡镇。
- 116 1923年10月,沙赫特区的5000名矿工举行罢工。曾经是党员的卡普斯京在罢工者中间进行了反政府的宣传。卡普斯京被捕。一批工人拥向市监狱要求释放卡普斯京,但被冲天开枪的警察驱散(Н. 库罗米亚:《顿巴斯的自由和恐怖》,剑桥1998年版,第130—131页)。1923年11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向顿巴斯派遣雅罗斯拉夫斯基任主席的委员会调查工人状况以及地方党的、工会的和经济部门的活动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391号案卷,第6—7张)。委员会发现了矿工们艰苦的生活条件,但谴责了这次工潮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1924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通过了《关于顿巴斯管理机关在有关工人状况方面的工作》的决定,其中规定了改善顿巴斯财政状况,工人生活和住房问题的措施(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1501号案卷,第6—10页)。
- 117 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共(布)倡议成立的,有着多年会龄(1922—1935年)的全苏组织。参加协会的是持续党龄不少于18年的党员。协会的宗旨是利用老布尔什维克们的经验来培养青年的革命传统、收集历史—革命资料、组织协会会员们的生活,等等。
- 118 见注103。
- 119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决议》。——《苏共决议……》第3卷,第444页。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未通过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
- 120 居民专业教育局——1919年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了专业技术教育处,后成为专业教育总委员会。它所管辖的有:工厂艺徒学校、专业训练班、技术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大学、工人进修班。
- 121 米尔和梅里利兹——莫斯科的商行和许多商店。该楼是1906—1908年间由建筑师P. И. 克莱因建成的。自1922年起为中央百货商店。
- 122 1920年11月5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批准Л. Д. 托洛茨基的建议建立跨部门委员会,“研究顿涅茨克省全方面工作情况”。(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1213号案卷,第3张。)
- 123 В. В. 丹契奇,制定恢复顿涅茨克矿区石煤和无烟煤工业计划特别委员会主席。这里系

- 指 1923 年在哈尔科夫公布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124 1923 年 5 月 7 日,政治局成立了顿巴斯财政燃料状况调查委员会。5 月 31 日,任命 B. B. 古比雪夫为该委员会主席,代替 A. Д. 瞿鲁巴。(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1443 号案卷,第 3 张;1450 案卷,第 4 张。)
- 125 指美国的“苏利万”牌矿山掘进机,取名于加拿大一个蕴藏量和开采量都很大的多金属矿苏利万(sullivan)。沙皇俄国时期没有生产矿山机械的机器制造企业。设备由国外进口。苏维埃政权初期仍继续进口矿山设备。苏联煤炭机器制造业出现于 1924 年,当时,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建成了辅助企业管理局。
- 126 这里说的是定期调查省里各个党政机关的情况。调查结果和根据调查结果通过的决议刊登在《真理报》、《党的工作者手册》和地方报刊上。可参见关于《布良斯克党组织的现状和工作》的报道(《真理报》1927 年 9 月 10 日);另见注 90 和注 100。
- 127 阿尔乔莫夫斯克(1924 年以前名为巴赫穆特)为纪念苏维埃国家和党的活动家 Ф. А. 谢尔盖耶夫(假名阿尔乔姆)(1883—1921 年)而得名。
- 128 见苏联人民委员会于 1920 年 6 月 4 日颁布的《关于高等技术教育学校的决定》。载《苏维埃政权命令汇编》第 9 卷,莫斯科 1978 年版,第 22—24 页。
- 129 指 C. B. 柯秀尔《论经济干部的工作条件》,载《真理报》1928 年 4 月 7—8 日。
- 130 大概是指《工业基本建设》一书(莫斯科 1928 年版)。鉴于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和南方钢铁托拉斯效益不好,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不得不研究了这两个企业的基本建设问题。1928 年 1 月 12 日,政治局决定,“委托工农检察院详细研究进口设备的使用问题,消除已经出现的缺点,解除责任人的职务并指出消除缺点的途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1773 号案卷,第 3 张。)
- 131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3 卷,第 104 页。
- 132 指美国工程师 Ф. У. 泰勒(1856—1915 年)的《劳动的科学组织》一书。列宁推荐使用“泰勒制”,这对研究制定苏联的科学组织劳动的原则起了重大作用。
- 133 “易卜拉伊莫夫案件”,易卜拉伊莫夫(易卜拉欣莫夫)·韦利(1889—1928 年),联共(布)党员,1918 年入党。1917 年以后担任过克里米亚选举产生的领导职务,1924 年起任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 年 3 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组因易卜拉伊莫夫“不正确地贯彻联共(布)组织委员会的指示,不负责任地在报刊上发表关于犹太殖民化问题的言论和酒醉状态出现在公共场所”,对他给予处分,之后,中央监察委员会三人小组因他不对明显的罪犯给予处罚而给予处分。6 月,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审理了控告易卜拉伊莫夫庇护富农分子的案件。1928 年 1 月 6 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易卜拉伊莫夫案件成立了委员会。1 月 20 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组决定把易卜拉伊莫夫开除出党,之后,易卜拉伊莫夫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予以逮捕。1928 年 3 月,缅任斯基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报告,称结束了易卜拉伊莫夫案件的侦讯工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

- 治历史档案馆,589号全宗,2号目录,5250号案卷)。审讯易卜拉伊莫夫的记录分发给苏维埃国家的领导成员(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46全宗,55号目录,1744案卷,第1—6张)。1928年4月,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在辛菲罗波尔巡回审判开庭期审理了控告易卜拉伊莫夫杀害证人的案件,该证人威胁揭发易卜拉伊莫夫同前白匪分子和匪徒的联系。法庭判处易卜拉伊莫夫死刑。
- 134 指苏联代表团团长李维诺夫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的发言(见注71)。这个发言刊登在1928年3月21日的《真理报》上。
- 135 见注19。
- 136 现在公布的这本小册子是在1999年从总统档案馆移交给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那部分斯大林个人档案中发现的。这些材料于1928年3月发放给了地方上的党和苏维埃机关阅读,参加联共(布)四月全会的人手里也有。
- 137 联共(布)1928年3月7日的通函曾被斯大林用来编写3月10日《真理报》的社论。斯大林着重强调了最后几段,而把前两段改写为:“李可夫在莫斯科委员会昨天的会议上关于某些资产阶级专家企图破坏顿涅茨克国营煤炭托拉斯工作的反革命阴谋的讲话,以及最高法院检察官在今天的《真理报》上发表的关于那个阴谋的声明,对每个工人、每个党员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132号案卷,第11张。)
- 138 全俄合作社有限责任公司(All Russian Cooperative Society Limited,1922年起改为 Arcos limited)是股份贸易公司。由苏联合作社代表团于1920年6月11日在伦敦成立,注册为私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苏联对外贸易组织的代表进行活动,实施进出口业务,在很多国家设有办事处和分公司。1927年年初,其周转额超过一亿英镑。1927年5月12日,英国警察搜查了全俄合作社有限责任公司在伦敦的办事处和苏联商务处,之后英国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全俄合作社有限责任公司暂时停止了活动。外交关系恢复(1929年)后,全俄合作社有限责任公司也恢复了活动。
- 139 首次于1928年4月18日在《真理报》发表。准备出版自己的11卷选集时,斯大林恢复了报告中当年没有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些段落(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1025号案卷,第27—45张;《斯大林选集》中文1979年版,下卷,第6—32页)。
- 140 列宁:《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提纲致B. M. 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63页。
- 141 首次发表在1928年4月19日《真理报》上。
- 142 关于“预算紧张”,可以根据反映靠国家贷款的对国民经济的拨款比例的材料判断(1924—1925年为21.9%,1926—1927年上升到了32.4%)。见《苏联财政》第2册,莫斯科1933年版,第75页。
- 143 在1927—1928年时,党的领导人采用的都是大体上能够估计到的国内农户数字。1928

- 年末布哈林在向工农通讯员发表演说时说大体上是 2500 万农户(见布哈林:《时局和当前党的任务》,1928 年 11 月 28 日和 30 日在工农通讯员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和闭幕词,布哈林选集《通往社会主义之路》,新西伯利亚 1990 年版,第 375 页)。斯大林在 1928 年 5 月的说法是 2400 万—2500 万(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国家图书杂志和出版公司 1939 年第 9 版,第 185 页)。根据 1927 年的税务统计资料,全国有 2500 万户,但是实际上当时不到 2400 万。1928—1929 年度可以看到农户的数量有减少(В. П. 达尼洛夫:《集体农庄以前的苏联农村:居民,经济,土地使用》,莫斯科 1977 年版,第 210—212 页)。
- 144 苏联著名党务和经济活动家 Г. Я. 索柯里尼柯夫对 20 年代中期起的若干年里苏联国民经济的农业再生产周期和工业再生产周期之间出现的脱节和后果做了详尽的理论经济分析(见 Г. Я. 索柯里尼柯夫著:《市场行情问题》,载《计划经济》杂志,1928 年第 2 期,第 24—27 页)。可能布哈林在自己的议论中也依据了这些材料。
- 145 见注 50。
- 146 《苏共决议和决定》第 4 卷,第 317 页(着重点是布哈林划出的)。
- 147 1926—1927 经济年度对富农农户的农业征税就已经平均比 1925—1926 年度提高了 58%,几乎比对贫农农户的征税超出了 100 多倍,比对中农的征税超出了几乎 5 倍。在后来的年份里,税收还有了更大的提高。
- 148 20 年代时,捐献是吸收农村人口的资金满足农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需要的极其重要的形式。1927 年前,捐献的收费是平均的,从 1927 年 8 月起,收费开始根据所缴的农业税多少确定。另见注 15。
- 149 见注 14。
- 150 苏维埃机关把法院没收的各种类型的农户粮食的 25% 作为长期贷款转给贫农,以此提高贫农对挖掘粮食储藏的兴趣。
- 151 《苏共决议和决定》第 4 卷,第 319 页。
- 152 十五大前夕,正是布哈林论证了向富农进攻的必要性(布哈林:《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总结》。1927 年 10 月 26 日在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真理报》1927 年 11 月 4 日)。在代表大会上,这个口号不是偶然地和“布哈林提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 2 卷,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1229—1231 页)。
- 153 魏因施泰因,А. Л. (1892—1970)——苏联经济学家。20 年代时曾采用数学方法和在农村的优选计算法分析经济动态。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俄罗斯和苏联的人民收入》(莫斯科 1999 年版)。
- 154 市场情况研究所建于 1920 年,属季米里亚夫斯基科学院,后来转交给了财政人民委员会。从 1928 年起,该所归中央统计局管理。在准备审判所谓的劳动农民党的时候,把 Н. Д. 康德拉季耶夫算是它的领导人,研究所被关闭(1930)。研究所发行《市场情况

- 问题》杂志,它的文章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
- 155 通过沙赫特案件,实际上制定出了后来1936—1938年种种案件的审理办法。在审理过程开始之前,在党的决定里和在报刊上已经对指控的各点形成了措辞,就像是已经没有任何余地地得到了证明一样。布哈林和大部分党的高级领导一样,已经不可能得到关于侦查和进程是如何组织的真实消息了,侦查都是在斯大林的控制下进行的。布哈林和斯大林对沙赫特案件的解释是不同的。前者的着重点是已经在顿巴斯揭发出来的弊病和党的、国家的和工会的机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歪曲。后者瞄准的是在技术知识分子中间挖掘出危害分子,从而渲染生产中敌视非党专家的情绪。
- 156 “钢盔”团是一些军人在大工业家的支持下,于1918年11月在德国建立的前线人员的无政府主义的军事化联盟。在30年代初时大约有50万成员。
- 157 在20年代时,政治体制各个环节的“工人化”是通过推举先进的、培训得最好的工人(和农民)主要是到行政和经济的领导工作上去。根据1923—1927年的资料,在全国37个省里,有2.56万工人被推上了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的领导岗位。1927年时,在400万国家机构的职员中,有20万工人党员;在国家机构中工作的工人中,有4/5是担任领导工作的。
- 158 在沙赫特案件中受到指控的,有3名外国专家——巴特施基倍尔、迈尔和奥托(德国人)。法庭确认迈尔和奥托受到了诬告,他们以及苏联专家波将金和施特里波利格被宣告无罪。在德国方面几次提出抗议后,巴特施基倍尔被判一年监外执行。
- 159 莫洛托夫在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里提到了所谓的“梁赞”事件。在梁赞省里亚格县的波列茨克镇,好多年盘踞着对农民搞恐怖活动的匪徒。根据调查,它的成员和县里以及省里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个别工作人员有联系(《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2卷,莫斯科1962年版,第1040—1050页)。

人物简介*

阿巴库莫夫, Г. П. (Абакумов Г. П.)——1905 年入党。1926—1928 年任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沃兹涅先斯克、穆什盖托夫斯克矿业局经理。

阿尔秋希娜, А. В. (Артюхина А. В., 1889—1969)——1910 年入党。1924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30—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 1925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 同时兼任《女工》杂志编辑。1931—1932 年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工作。

阿法纳西耶夫, Н. А. (Афанасьев Н. А., 1890—?)——1910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 1927 年起任北高加索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阿库洛夫, И. А. (Акулов И. А., 1888—1937)——1907 年入党。1923—1925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 1927 年起任全乌克兰工会理事会主席。1929 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和主席团成员。

阿列克谢耶夫, П. А. (Алексеев П. А., 1893—1939)——1914 年入党。自 1927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 年任列宁格勒州工会理事会主席。

阿列克谢耶娃, Ф. Я. (Алексеева Ф. Я.)——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埃赫, Р. И. (Эйхе Р. И., 1890—1940)——1905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 1930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 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25—1929 年任主席。自 1929 年起任西伯

* 简历材料基本上限于本卷涉及的年限范围。1928—1929 年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多数参加者均死于恐怖年代。——编者注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 4 卷的生卒年代为 1890—1963 年。——译者注

利亚边疆区委和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

埃利亚瓦, Ш. З. (Элиава Ш. З., 1883—1937)——1904年入党。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1927年起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自1931年起任苏联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埃斯蒙特, Н. Б. (Эйсмонг Н. Б., 1891—1935)——1907年入党。1923—1924年任俄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5年任北高加索执行委员会主席。自1926年起任俄联邦贸易人民委员和苏联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自1930年起任俄联邦供应人民委员、苏联供应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安采洛维奇, Н. М. (Анцелович Н. М., 1888—1952)——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农林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30—1931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

安德烈耶夫, А. А. (Андреев А. А., 1895—1971)——1914年入党。1926—1930年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0—1927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铁路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书记。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安东诺夫, В. Г. (Антонов В. Г., 1893—?) 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塔什干州监察委员会委员。铁路修配厂铸工。

安东诺夫, П. Г. (Антонов П. Г., 1878—?) 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① 铸工车间副主任。

安季波夫, Н. К. (Антипов Н. К., 1894—1938)——1912年入党。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俄共(布)中央部长。1928—1931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1931—1934年任工农检察院副人民委员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 Г. К.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Серго] Г. К., 1886—1937)——1903年入党。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30年起任政治局委员。1922—1925年任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联共(布)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4卷任此职的时间为1925—1930年。——译者注

-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苏联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以及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1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 奥拉赫拉什维利, М. Д. (Орахелашвили М. Д., 1881—1937)——1903年入党。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27—1930年任苏联大百科全书主编委员会委员。1930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31年任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而后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 奥什温采夫, М. К. (Ошвинцев М. К., 1889—1941)——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4—1937年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8年任乌拉尔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9年任乌拉尔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30—1933年任乌拉尔州执行委员会主席。
- 奥斯特洛夫斯基, С. Ю. (Островский С. Ю., 1895—?)——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为制模工人,敖德萨市铁路修配厂党支部委员会委员。
- 奥西莫夫, Н. М. (Осьмов Н. М., 1891—1962)——1907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9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1929—1932年任下诺夫哥罗德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1932—1933年任俄联邦工农检察院副人民委员。
- 奥新斯基(奥博连斯基), В. В. (Осинский [Оболенский] В. В.), 1887—1938)——1907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8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局长。
- 巴达耶夫, А. Е. (Бадаев А. Е., 1883—1951)——1904年入党。1925—195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29年任彼得格勒消费合作社主席。自1930年起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主席,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副主席。
- 巴尔马舍娃, С. Ф. (Бармашева С. Ф., 1896—?)——1917年入党。自1927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阿尔乔莫夫斯克区保险储备金库主任。
- 巴赫京娜, Е. Я. (Бахтина Е. Я., 1888—?)——1917年入党。自1927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厂女工。

巴拉诺夫, П. И. (Баранов П. И., 1872—1933)——1912年入党。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24—1931年任工农红军空军司令。

巴里诺夫, М. В. (Баринов М. В., 1888—?)——1907年入党。1926—1933年任国营阿塞拜疆石油工业联合公司负责人。自1933年12月起任石油工业总局负责人。

巴斯金(Баскин)——来自萨马拉的统计学家。

巴祖林, В. И. (Базулин В. И., 1895—?)——1917年入党。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县委新闻处处长。1925年任斯大林诺市国营南方冶金托拉斯联合公司经理。1928—1930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黑色冶金管理局副局长。1930—1933年任北高加索铁路管理局局长。

邦达连科(Бондаренко)——康斯坦丁诺夫斯克细颈玻璃瓶厂厂长。

鲍尔, Я. Я. (Бауэр Я. Я., 1885—1958)——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6年起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自1927年起任俄联邦工农检察院贸易检查局主管。

鲍曼, К. Я. (Бауман К. Я., 1892—1937)——1907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二、第一书记。1931—1934年任中央中亚局第一书记。

贝金, Я. Б. (Быкин Я. Б., 1888—1938)——1912年入党。自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4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自1922年起任俄共(布)沃罗涅日省委书记, 1927—1930年任雅罗斯拉夫尔省委书记。自1930年2月起任联共(布)巴什基尔州委书记。

彼得罗夫, Ф. С. (Петров Ф. С., 1888—1934)——1906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曾在远东共和国政府任农业部长。1924年任远东边疆区(党)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1928—1930年任北高加索(党)监察委员会书记。

彼得罗夫斯基, Г. И. (Петровский Г. И., 1878—1958)——1897年入党。1921—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9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19—1938年任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同时自1922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

彼得斯, Я. Х. (Петерс Я. Х., 1886—1938)——1904年入党。自1923年起任中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30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1934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党)监察委员会主席。

别连基, З. М. (Беленький З. М., 1888—1940)——1905年入党。1928—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工会理事会主席。1927—1928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部长。1928—1931年任工农检察院部务委员, 1931—1934年任副人民委员。自1934年起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副主席。

波德沃伊斯基, Н. И. (Подвойский Н. И., 1880—1948)——1901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19—1923年任乌克兰海军事务人民委员。自1924年起在党史研究所工作。

波格丹诺夫, И. А. (Богданов И. А.)——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①

波格丹诺夫, П. А. (Богданов П. А., 1882—1939^②)——1905年入党。1919—1925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负责人。1926—1929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

波科, С. И. (Покко С. И., 1882—1953)——1905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1年起在监察机关工作,任乌克兰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专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波克罗夫斯基, 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1868—1932)——1905年入党。1927—1932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苏联科学院院士。自1921年起任共产主义学院、历史研究所、红色教授学院领导人,若干历史杂志的编辑。

波林, К. М. (Полин К. М., 1881—?)——1918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4年起先后在达吉斯坦、卡累利阿做党的工作。1928年任卡累利阿州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主席。

波隆斯基, В. И. (Полонский В. И., 1893—1937)——1912年入党。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1928年起任莫斯科委员会书记。自1930年起任阿塞拜疆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北高加索边疆区区委书记。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4卷、第5卷的生卒年代为1891—1966年, 1914年入党, 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3卷、第4卷、第5卷的生卒年代为1882—1938年。——译者注

- 波斯特舍夫, П. П. (Постышев П. П., 1887—1939)——1904年入党。1927—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1938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同时任联共(布)中央部长。1926—1930年任联共(布)哈尔科夫专区区委和市委书记。自1933年起任乌克兰联共(布)中央第二书记、哈尔科夫专区区委和市委以及基辅专区区委第一书记。
- 波泽恩, Б. П. (Позери Б. П., 1882—1939)——1902年入党。自1930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6年起任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校长。自1929年起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部长,后任列宁格勒州检察官。
- 博良, Б. А. (Борьян Б. А., 1882—1938)——1903年入党。1928—1935年在农业人民委员部、亚美尼亚贸易股份公司俄罗斯分公司工作,任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委员、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布勃诺夫, А. С. (Бубнов А. С., 1883—1938^①)——1903年入党。192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9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红星报》责任编辑。1929—1937年任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
- 布哈林, Н. И. (Бухарин Н. И., 1888—1938)——1906年入党。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1929年任《真理报》主编。同时(1924—1929年)任《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1919—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自1929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部门负责人。
- 布林, А. С. (Булин А. С., 1894—1938)——1914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30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1924年起任莫斯科军区政治部主任。1928—1934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副主任、白俄罗斯军区政治部主任。
- 布留哈诺夫, Н. П. (Брюханов Н. П., 1878—1938)——1902年入党。自1923年起任苏联粮食人民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1931—1933年任苏联副供应人民委员,自1933年2月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测定单位面积产量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 布谢, К. Ю. (Буссе К. Ю., 1891—1940)——1908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3卷、第4卷、第5卷的生卒年代为1884—1938年。——译者注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3年起先后任下诺夫哥罗德省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主席。自1930年起任伊万诺沃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茨韦特科夫, Н. Г. (Цветков Н. Г., 1890—?)——1911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年任泰尔斯克专区委员会主席。1930年任中央黑土专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丹契奇, В. В. (Данчич В. В.)——工程师, 1922年任制定恢复石煤和无烟煤工业计划委员会领导人。

德沃莱茨基, Ш. М. (Дволайцкий Ш. М., 1893—1937)——1917年入党。1921—1924年任莫斯科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教授。1925年任外贸银行处长, 1926年任该行副行长。1926—1930年任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局局长。

多加多夫, А. И. (Догадов А. И., 1888—1937)——1905年入党。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1年起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书记。自1929年起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自1931年起任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和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多利泽, А. Г. (Долідзе А. Г., 1878—1938)——1905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年任格鲁吉亚共(布)中央党组书记, 后在工农检察院工作, 任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执行委员会秘书。1927—1930年任格鲁吉亚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和格鲁吉亚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自1930年起任格鲁吉亚财政人民委员。

法布里齐乌斯, Я. Ф. (Фабрициус Я. Ф., 1877—1929)——1903年入党。自1927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18年2月起担任红军指挥员。四次获得红旗勋章。

法捷耶夫, Н. А. (Фатеев Н. А., 1879—?)——1912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4年起为兹拉托乌斯特市米尼亚尔斯克工厂轧钢工、技师。

菲加特纳, Ю. П. (Фигагнер Ю. П., 1889—1937)——1903年入党。1924—1934年^①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6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3卷、第4卷任此职的时间为1925—1934年。——译者注

- 会检查总部负责人和主席团成员。1927—1928年^①任苏联商业企业职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菲勒, С. И. (Филлер С. И., 1882—1954)**——1910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俄共(布)摩尔曼斯克省委书记。自1927年起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巡视处书记。
- 费奥多罗维奇(Феодорович)**——1928年先后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工作人员。
- 费克捷尔, А. Я. (Фектер А. Я., 1892—?)**——1913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图拉省监察委员会主席。
- 弗拉基米尔斯基, М. Ф.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 М. Ф., 1874—1951)**——1895年入党。1925—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27—1951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2—1925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乌共(布)中央书记、乌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乌克兰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1926—1929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农业合作社协会联合会主席。
- 弗拉索夫, В. Я. (Власов В. Я.)**——1922年入党。1928年任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别洛—卡里特温斯克矿业管理局局长。
- 伏罗希洛夫, К. Е. (Ворошилов К. Е., 1881—1969)**——1903年入党。自1921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60年任联共(布)、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193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
- 戈尔茨曼, А. З. (Гольцман А. З., 1894—1933)**——1917年入党。1927—1933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家动力资源管理总局局长。1926—1930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自1930年起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
- 戈尔恰耶夫, М. Д. (Горчаев М. Д., 1886—1960)**——1914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克里米亚州监察委员会主席。1929—1931年任阿塞拜疆共(布)中央检察院主席。1933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戈尔什科夫, И. И. (Горшков И. И., 1885—1966)**——1904年入党。1924—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3卷、第4卷、第5卷任此职的时间为1927—1929年。——译者注

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1927年先后任联共(布)叶戈里耶夫斯克县委书记、德米特罗夫斯克县委书记。自1928年1月任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1930年任莫斯科工农检察院委员。自1930年起任联共(布)韦列斯克区委书记。

格拉西莫夫, А. Г. (Герасимов А. Г., 1883—1962)——1906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0—1930年先后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中央投诉局局长、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区联共(布)区监察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库尔斯克铁路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1927—1930年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检查机构主任。

格列恰内, В. М. (Гречаный В. М., 1876—?)——1905年入党。^①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为斯大林格勒“红色十月”厂拣选工。

格里戈里耶娃, М. П. (Григорьева М. П., 1884—?)——1924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8年起任联共(布)卡累利阿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格里亚斯基, Ф. П. (Грядинский Ф. П., 1893—1938)——1912年入党。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28年任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列宁格勒州特派员。1928—1929年任中央黑土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苏联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

格里亚泽夫, А. М. (Грязев А. М., 1880—?)——1911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格里亚泽夫, И. Я. (Грязев И. Я., 1882—?)——1905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乌克兰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

格林科, Е. Л. (Гринько Е. Л.)——1924年入党。1928年任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格里申斯克矿业局局长。

格鲁姆—格尔日迈洛, В. Е. (Грум—Гржимайло В. Е., 1864—1928)——冶金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7年)。1885年从圣彼得堡矿业学院毕业后在乌拉尔钢铁厂工作。自1907年起为副教授。1911—1918年任圣彼得堡工学院正式教授。1924年之前任乌拉尔矿业学院教授。自1924年起从事冶金等其他工厂的各种工业用炉的设计工作,在莫斯科成立了冶金和热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4卷的入党时间为1918年。——译者注

力工程设计局。

格鲁泽里, В. П. (Грузель В. П., 1884—1937)——1906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6年任白俄罗斯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自1927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巡视员。

格罗斯曼, В. Я. (Гроссман В. Я., 1895—1971)——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工作。自1934年起任党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戈洛谢金, Ф. И. (Голощекин Ф. И., 1876—1941)——1903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3年任联共(布)哈萨克斯坦边疆区委书记。自1933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首席国家仲裁。

格伊, Я. Б. (Гей Я. Б., 1896—1939)——1916年入党。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任俄共(布)彼尔姆专区区委书记。1925—1926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部长。自1926年8月起任乌拉尔州委书记。1927年任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

贡恰连科, В. А. (Гончаренко В. А.)——1905年入党。1928年任顿巴斯五一矿业局局长。

贡恰罗夫, Н. К. (Гончаров Н. К., 1886—1970)——1904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4年起任制革辛迪加主席。1927年任苏联工农检察院巡视员。1931—1934年在日本从事外交工作。

古比雪夫, В. В. (Куйбышев В. В., 1888—1935)——1904年入党。1922—1923年、1927—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27—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古布金, И. М. (Губкин И. М., 1871—1939)——1921年入党。地质石油专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副院长。1920—1925年任研究库尔斯克地磁异常特别委员会主席。自1930年起任莫斯科石油学院院长。自1931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地质勘探局局长。

古列维奇, А. И. (Гуревич А. И., 1896—1937)——1916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自

1932年起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冶金工业总局局长。

古谢夫, А. Н. (Гусев А. Н., 1891—?)——1920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1935年先后任联共(布)中央文化宣传部出版处处长和该部副部长。

哈斯曼, С. А. (Хасман С. А., 1886—?)——1904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4年起任北高加索州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5—1928年任顿河州委组织部部长。1927—1928年任顿河(党)监察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车臣专区委书记、边疆区(党)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自1932年起任列宁格勒纳尔瓦(党)监察委员会主席。

哈塔耶维奇, М. М. (Хатаевич М. М., 1893—1937)——1913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7年任中央委员。自1928年起任中伏尔加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赫洛普良金, М. И. (Хлопьякин М. И., 1892—1937)——1914年入党。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25年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5—1926年任驻英国商务代表。1927年任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主席。1928—1930年任下伏尔加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自1930年起任苏联供应副人民委员。

亨金, Е. Б. (Генкин Е. Б.)——1928年为乌克兰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霍多罗夫斯基, И. И. (Ходоровский И. И., 1885—1940)——1903年入党。1922—1928年任俄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1928—1932年先后任驻意大利、土耳其商务代表。

加里宁, М. И. (Калинин М. И., 1875—1946)——1898年入党。自1919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1年起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46年任政治局委员。1919—193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加列耶夫, Г. Г. (Галеев Г. Г., 1894—1938)——1919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①先后任喀山市联共(布)上城区委书记、鞑靼自治共和国州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1930年先后任鞑靼自治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俄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部门负责人。

加利耶娃, М. И. (Гальева М. И., 1884—?)——1918年入党。1927—1930年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4卷、第5卷任此职的时间为1929年。——译者注

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为莫斯科州奥列霍沃—祖耶沃第一纺织厂纺织女工。

加卢什金, И. И. (Галушкин И. И.)——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加马尔尼克, Я. Б. (Гамарник Я. Б., 1894—1937)——1916年入党。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3年起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第一书记。1927—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远东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1928—1929年任白俄罗斯共(布)中央第一书记。1929—1937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1930—1934年任陆海军第一副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加米涅夫(罗森菲尔德), Л. Б. (Каменев [Розенфельд] Л. Б., 1883—1936)——1901年入党。1919—1925年任政治局委员。1919—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2年起任俄联邦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学院院长。1926年任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而后任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1928—1929年^①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和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

杰捷尔丁格, 亨利(Детердинг Генри, 1866—1939)——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总经理。

杰索夫, Г. А. (Десов Г. А., 1884—1937)——1902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9年任列宁格勒州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主席。

基尔基日, К. О. (Киркиж К. О., 1888—1932)——1910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1932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年任乌克兰共(布)中央组织部部长。1926—1927年任乌克兰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1927—1929年先后任乌兹别克斯坦共(布)中央书记、苏联商业企业职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基洛夫, С. М. (Киров С. М., 1886—1934)——1904年入党。自1923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6年起任政治局候补委员。自1930年起任政治局委员。自1926年起任列宁格勒省委、市委和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同时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2卷,第3卷,第4卷,第5卷的任职为:1927—1929年任科学技术管理局局长。1929—1932年任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在1934年任中央书记。

基谢廖夫, А. С. (Киселев А. С., 1879—1937)——1898年入党。1917—1919年, 1921—1923年, 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0, 1924—1937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1927—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基谢廖夫(Киселев)——1922年入党。1928年任博科夫斯克矿业局局长, 而后任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管理局机械化处处长。

季里克, К. Я. (Дирик К. Я., 1882—1957)——1904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6年起任克里米亚州监察委员会主席。1928年任弗拉基米尔省监察委员会主席, 自1929年起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州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成员。

佳格尼贝达, А. Я. (Тягнибеда А. Я.)——1928年任谢格洛夫斯克矿业局负责人。

捷尔皮戈列夫, А. М. (Терпигорев А. М., 1873—1959)——1922—1959年任莫斯科矿业学院教授。1938—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矿业研究所所长。1922—1929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捷连斯基, И. А. (Зеленский И. А., 1890—1938)——1906年入党。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2—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4年10月起任中央中亚局书记。

捷列霍夫, Р. Я. (Терехов Р. Я., 1889—?)——1912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任乌克兰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1930年为阿尔乔莫夫斯克区委书记。

久热夫, А. П. (Дюжев А. П., 1886—1956)——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1956年先后任库尔斯克地磁异常区负责人、利佩茨克锡尔矿区负责人、尼科利斯克村苏维埃主席。

卡巴科夫, И. Д. (Кабакوف И. Д., 1891—1937)——1914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2年起任雅罗斯拉夫尔省委书记。1924—1927年任图拉省委第一书记。1928—1929年任乌拉尔州监察委员会主席。自1929年起任乌拉尔州委第一书记。自1934年起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

卡尔波夫, В. З. (Карнов В. З.)——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卡尔马诺维奇, М. И. (Калманович М. И., 1888—1937)——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30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27年任苏联工业银行理事会主席。1928—1930年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理事会主席和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自1930年起任苏联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和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
- 卡尔马诺维奇(Калманович)——1928年任“奇斯佳科沃”矿井总工程师。
- 卡尔嫩, П. Э. (Калны П. Э., 1878—?)——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矿业局总工程师。1928年因“沙赫特事件”遭审判。
- 卡尔宁, А. Я. (Калнин А. Я., 1889—?)——1913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在白俄罗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自1927年起任白俄罗斯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 卡冈诺维奇, Л. М. (Каганович Л. М., 1893—1991)——1911年入党。1924—195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1957年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25年4月至1928年7月任乌克兰共(布)中央总书记。1928—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30—1935年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 卡拉什尼科夫, В. С. (Калашников В. С., 1890—1970)——1906年入党。1923—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①1923—1925年任托木斯克省委书记。1925—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
- 卡拉什尼科夫, М. И. (Калашников М. И., 1894—?)——1918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在苏联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
- 卡拉瓦耶夫, П. Н. (Каравеев П. Н., 1894—1952)——1903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8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部巡视员和党组成员。自1928年起任莫斯科市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
- 卡拉耶夫, А. Г. (Караев А. Г., 1896—1938)——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2年起任特种部队指挥员,晚些时候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书记。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4卷、第5卷任此职的时间为1925—1930年。——译者注

- 卡里莫夫, А. К. (Каримов А. К., 1881—1941)——1918年入党。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0年在乌恰林斯克乡执行委员会工作。1930—1931年任乌恰林斯克区集体农庄主席。
- 卡雷金娜, А. С. (Калыгина А. С., 1895—1937)——1915年入党。自192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工农妇女部副部长。^① 1930—1935年任加里宁市委书记。
- 卡雷·库利耶夫(Кары Кулиев, 1887—?)——1918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任土库曼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
- 卡明斯基, Г. Н. (Каминский Г. Н., 1895—1938)——1913年入党。1925—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8年任“农业合作社联社”副主席,“全苏农林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农业合作社协会联合会副主席,全俄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和群众运动部部长,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
- 康德拉季耶夫, Д. И. (Кондратьев Д. И., 1890—?)——1918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年在萨马拉铁路工作,而后在萨马拉工农检察院工作。1927—1930年任省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萨马拉市苏维埃委员。
- 康德拉季耶夫, Н. Д. (Кондратьев Н. Д., 1892—1938)——农业经济学家。1917年参加制订土地改革方案。曾任第三届联合临时政府粮食部副部长。而后任季米里亚泽夫农科院教授、行情研究所所长。创造苏联前景计划方法论的先驱之一。在20年代下半期的争论中,他捍卫了深化新经济政策的原则。
- 康德拉季耶夫, Т. К. (Кондратьев Т. К., 1892—?)——1913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任列宁格勒省城市公用事业联合会主席。1927年任沃洛达尔斯克区委书记、列宁格勒州委和州执行委员会委员。
- 柯秀尔, И. В. (Косиор И. В., 1893—1937)——1908年入党。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7年任中央委员。自1927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副重工业人民委员,而后任苏联人民委员会驻远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2卷、第3卷、第5卷任此职的时间为1924—1930年。——译者注

东边疆区全权代表。

柯秀尔, С. В. (Косиор С. В., 1889—1939)——1907 年入党。自 1924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28 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6—1928 年任乌克兰共(布)中央书记。1928—1938 年任乌克兰共(布)中央总(第一)书记。

科贝林, В. Н. (Кобылин В. Н., 1893—?)——1918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 年为图拉兵工厂钳工。

科达茨基, И. Ф. (Кодацкий И. Ф., 1893—1937)——1914 年入党。自 1925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7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7 年先后任列宁格勒莫斯科—纳尔瓦和维堡区委书记。1928—1929 年先后任列宁格勒州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主席。自 1930 年起任列宁格勒州执行委员会和列宁格勒代表苏维埃主席。

科尔古什金, Ф. Т. (Колгушкин Ф. Т., 1887—?)——1905 年入党。1928 年任列宁格勒州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8 年 3 月 14 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组 3 月 10 日关于开除科尔古什金出党的决定。

科科维欣, М. Н. (Коковихин М. Н., 1883—1965)——1903 年入党。1923—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①自 1925 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4 年任乌拉尔州监察委员会主席。自 1925 年起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工作。1927 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基层苏维埃机关组组长。自 1928 年起任中央黑土区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科罗斯捷列夫, А. А. (Коростелев А. А., 1887—1938)——1905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1929 年任教育工作者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29 年任全苏工会理事会组织部部长,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1930 年任俄联邦金属加工工业联合公司主席。

科罗斯捷列夫, Г. А. (Коростелев Г. А., 1885—1932)——1905 年入党。1924—1932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1922 年任俄共(布)吉尔吉斯州委责任秘书和吉尔吉斯局中央委员会委员。自 1924 年起任莫斯科党的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主席,而后任俄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 2 卷、第 4 卷、第 5 卷任此职的时间为 1924—1934 年。——译者注

务委员。

科罗特科夫, И. И. (Коротков И. И., 1885—1949)——1905 年入党。1924—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 1921 年起任俄共(布)捷伊科沃县委书记,而后任舒亚市县执行委员会主席,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委组织指导部部长和省委书记。1923—1939 年在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工作,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成员。

科洛博夫, Н. Д. (Колобов Н. Д., 1899—?)——1919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 年为工会国际工厂钳工。

科洛季洛夫, Н. Н. (Кологиллов Н. Н., 1885—1937)——1903 年入党。1924—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 年任伊万诺沃省委书记。

科马罗夫, Н. П. (索比诺夫, Ф. Е.) (Комаров Н. П. [Собинов, Ф. Е.], 1886—1937)——1909 年入党。1921 年, 1923—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 年任列宁格勒市和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0—1931 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科米萨罗夫, С. И. (Комиссаров С. И., 1890—1965)——1914 年入党。1923—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进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自 1923 年起任北高加索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而后任边疆区委书记之一。1927 年任农业合作社联社副主席。30 年代初任北方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

科诺年科, В. П. (Конonenko В. П., 1895—?)——1917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科潘, А. Л. (Копань А. Л., 1887—?)——1917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 1920 年起任驻西西伯利亚乡军事委员,而后任西伯利亚边疆区斯拉夫戈罗德区委委员。

科皮耶夫, А. К. (Копьев А. К., 1890—?)——1917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0 年任布良斯克省监察委员会主席。

科热夫尼科夫, И. Ф. (Кожевников И. Ф., 1889—?)——1912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 1927 年起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专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科萨列夫, А. В. (Косарев А. В., 1903—1939)——1919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1934 年任组织局候补委员。1921—1929 年在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工作,任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鲍曼区委书记,列宁格勒市莫斯科—纳尔瓦区团委书记,奔萨省团委

- 书记,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部长。1927—1929 年任共青团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1929—1938 年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
- 科托夫,В. А. (Котов В. А., 1895—1937)——1915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8 年任莫斯科委员会书记。自 1929 年起任俄联邦劳动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部门负责人。
- 科瓦廖夫,М. И. (Ковалев М. И., 1887—1965)——1905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4 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党的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
- 科兹洛夫,С. К. (Козлов С. К., 1886—?)——1904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克拉斯诺夫,П. Н. (Краснов П. Н., 1869—1947)——俄罗斯军队中将,国内战争时期白卫军部队司令员。1919 年移民德国。
- 克拉瓦利,И. А. (Краваль И. А., 1897—1938)——1919 年入党。1928—1930 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1932 年任苏联副劳动人民委员。
- 克里茨曼,Л. Н. (Крицман Л. Н., 1890—1938)——1918 年入党。1925—1931^① 年先后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副局长、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自 1926 年起任《在农业战线上》杂志责任编辑、《经济问题》杂志编委。自 1928 年起任农业学院院长和农业革命研究委员会副主席。
- 克里尼茨基,А. И. (Криницкий А. И., 1894—1937)——1915 年入党。1924—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4—1937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 年任白俄罗斯共(布)中央第一书记。1926—1928 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29 年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自 1930 年起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 克利缅科,И. Е. (Клименко И. Е., 1891—1937)——1912 年入党。1925—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 年任俄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1929 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各中心机器拖拉机站联合管理部主席。1930 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中亚铁路局局长。
- 克利诺夫,Я. И. (Клинов Я. И., 1882—?)——1905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 年任列宁格勒“劳动红旗”工厂托拉斯负责人。
- 克列斯廷斯基,Н. Н. (Крестинский Н. Н., 1883—1938)——1903 年入党。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 2 卷、第 4 卷任此职的时间为 1925—1929 年。——译者注

1919—1921年任政治局委员。自1922年起从事外交工作,曾任驻德国全权代表。自1930年起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克雷连柯, Н. В. (Крыленко Н. В. , 1885—1938)——1904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18—1931年在司法机关工作,曾担任重大政治诉讼案的公诉人。自1922年起任俄联邦副司法人民委员、俄联邦第一副检察长,而后任俄联邦检察长。自1931年起任俄联邦司法人民委员。

克柳耶夫, П. Н. (Клюев П. Н. , 1891—?)——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先后任巴什基尔制呢厂负责人、巴什基尔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

克鲁普斯卡娅, Н. К. (Крупская Н. К. , 1869—1939)——1898年入党。自1924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0年起领导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自1929年起任俄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

克尼加, М. А. (Книга М. А. , 1890—?)——1918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为北高加索边疆区基莫舍夫斯克区农民。

克诺林, В. Г. (Кнорин В. Г. , 1890—1938)——1910年入党。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2—1927年在联共(布)中央和莫斯科市委机关工作。1927—1928年任白俄罗斯共(布)中央书记。1928—1935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Г. М.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 Г. М. , 1888—1928)——新建设管理局项目部主任工程师。由于“沙赫特事件”被判极刑。

克维林, Э. И. (Квининг Э. И. , 1888—1937)——1912年入党。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8年任第聂伯国家建设工程局局长。1930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任副交通人民委员。

库比亚克, Н. А. (Кубяк Н. А. , 1881—1937)——1898年入党。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和远东边疆区委书记。1927—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8—1931年任俄联邦农业人民委员。1931—1933年任伊万诺沃州执行委员会主席。

库利科夫, Е. Ф. (Куликов Е. Ф. , 1891—1937?^①)——1910年入党。1925—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2卷、第3卷的生卒年代为1891—1943年。——译者注

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8年任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委责任书记。1929年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理事会理事。

库兹明, П. К. (Кузьмин П. К., 1881—?)——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普斯科夫州奥斯特罗夫斯基区公社主任。

库兹米娜, А. П. (Кузьмина А. П., 1888—?)——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伊万诺沃州阿列克谢耶夫斯克区“第三国际”厂纺织女工。

拉比诺维奇, Л. Г. (Рабинович Л. Г., 1860—?)——矿业工程师, 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技术委员会主席。1928年因“沙赫特案件”被判刑。

拉杜斯—津科维奇, В. А. (Радус - Зенькович В. А., 1878—1967^①)——1898年入党。1923—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② 1920—1922年任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俄共(布)吉尔吉斯州委书记。1925—1929年任白俄罗斯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30—1933年任俄联邦副劳动人民委员。

拉多申, Г. И. (Ладощин Г. И., 1892—1973)——1917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为十月铁路电气装配工。

拉里切夫, А. И. (Ларичев А. И., 1892—?)——1911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乌拉尔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而后在沙德林斯克从事党的工作。1929年任乌拉尔州委组织部部长。1929年年底—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责任巡视员。

拉林, В. Ф. (Ларин В. Ф., 1895—1937)——1914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4年起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小组负责人。

拉姆津, Л. К. (Рамзин Л. К., 1887—1948)——1928年任全苏工学院院长。1930年因“工业党事件”被判刑。

赖因瓦尔德, Г. О. (Рейнвальд Г. О., 1886—?)——1908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为“红霞”工厂技师。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4卷、第5卷的生卒年代为1877—1967年。——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2卷任此职的时间为1925—1929年;在第3卷、第4卷、第5卷任此职的时间为1926—1930年。——译者注

- 雷夫金, О. Л. (Рывкин О. Л., 1899—?)^①——1917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李可夫, А. И. (Рыков А. И., 1881—1938)——1898 年入党。^② 1920—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30 年任政治局委员。自 1934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0 年任苏联和俄联邦(1929 年前)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于 1926—1930 年任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自 1931 年起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
- 李维诺夫, М. М. (Литвинов М. М., 1876—1951)——1898 年入党。1934—1941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9 年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自 1930 年起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 里亚比宁, Е. И. (Рябинин Е. И., 1892—1941)——1917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自 1918 年起在下诺夫哥罗德和梁赞从事苏维埃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联共(布)坦波夫省委书记、沃罗涅日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和沃罗涅日州委书记。
- 里亚博夫, А. Н. (Рябов А. Н., 1888—1939)——1906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自 1922 年起先后在布良斯克、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
- 利西岑, Н. В. (Лисицын Н. В., 1891—1939)——1910 年入党。1923—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17—1929 年任莫斯科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联共(布)中央新闻部部长。1927—1929 年任俄联邦工农检察院副人民委员。自 1930 年起先后任俄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
- 利亚多夫(曼德尔施塔姆), М. Н. (Лядов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М. Н., 1872—1947)——1893 年入党。1922 年在莫斯科燃料管理总局工作。1923—1929 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7—1930 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30 年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科学机构、博物馆和艺术科学部门管理总局局长。
- 利亚克苏特金, Ф. Ф. (Лякуткин Ф. Ф., 1896—?)——1913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高级巡视员。1926—1928 年任联共(布)马里乌波尔区委书记。1929—1930 年任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 2 卷的生卒年代为 1899—1937 年。——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 3 卷、第 4 卷、第 5 卷的入党时间为 1899 年。——译者注

- 西伯利亚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1931—1933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投诉处处长和收购工作小组领导人。
- 列昂诺夫,Ф. Г. (Леонов Ф. Г., 1892—1938)——1914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任莫斯科市联共(布)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1929—1930年任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30—1933年任东西伯利亚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 列别德,Д. Э. (Лебедь Д. Э., 1893—1937)——1909年入党。1922—1923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1930年任工农检查院副人民委员。
- 列别杰夫,П. Н. (Лебедев П. Н., 1879—?)——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中央黑土区公社管理委员会主席。
- 列夫琴科,Н. И. (Левченко Н. И.)——1920年入党。1928年先后任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卡季耶夫卡、戈尔洛夫卡矿业局局长。
- 列坚斯,С. Ф. (Реденс С. Ф., 1892—1940)——1914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6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助理。自1926年起任工农检查院—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民委员部部务秘书。自1928年11月起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权代表,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 列帕,А. К. (Лепя А. К., 1896—1938)——1914年入党。自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29年任联共(布)库尔斯克市委书记。1927—1934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 列普谢,И. И. (Лепсе И. И., 1889—1929)——1904年入党。自192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1年起任冶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成员。
- 列维京,К. Ф. (Левитин К. Ф., 1895—1939)——1913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4年起在西伯利亚契卡机关工作。1928—1930年任中伏尔加边疆区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 列扎瓦,А. М. (Лежава А. М., 1870—1937)——1904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1922年任俄联邦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俄联邦国内贸易人民委员。1924—1930年任俄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 林格尼克, Ф. В. (Ленгиник Ф. В., 1873—1936)——1893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 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自 1926 年 1 月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交通和邮电检查院主任。1927—1928 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8—1929 年任标准化委员会领导人。
- 留京, М. Н. (Рютин М. Н., 1890—1937)——1914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8 年任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1928—1930 年任《红星报》副主编。自 1930 年起任摄影电影工业管理局局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柳比莫夫, А. В. (Любимов А. В., 1898—1967)——1924 年入党。自 1925 年起为莫斯科市“自由”工厂工人、技师、党组织书记。
- 柳比莫夫, И. Е. (Любимов И. Е., 1882—1937)——1902 年入党。1925—1927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7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 年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理事会主席。1930—1931 年任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和驻德国商务代表。
- 洛巴切夫, И. С. (Лобачев И. С., 1879—1933)——1917 年入党。1923 年任苏联副粮食人民委员。1924 年任俄联邦国内贸易人民委员。1925—1929 年先后任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理事会主席、全苏国营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理事会主席。1930 年任苏联副贸易人民委员。1932 年任全苏制粉业联合公司董事长。
- 洛博夫, С. С. (Лобов С. С., 1888—1937)——1913 年入党。1922—1923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24—1937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 年任俄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国内动力资源管理总局局长。^① 自 1930 年 12 月起任苏联副供应人民委员。
- 洛卡茨科夫, Ф. И. (Локацков Ф. И., 1881—1937)——1904 年入党。1925—1927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 1927 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1 年任俄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洛米纳泽, В. В. (Ломинадзе В. В., 1897—1935)——1917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9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8—1930 年任马克思—恩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 3 卷时为电机工业总局局长。——译者注

格斯研究院副院长。1930年起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洛莫夫(奥波科夫), Г. И. (Ломов [Опоков] Г. И., 1888—1938)——1903年入党。自192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乌克兰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自1929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1—1933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洛佐夫斯基, А. (德里佐, С. А.) (Лозовский А. [Дридзо С. А.], 1878—1952)——1901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37年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

罗济特, Д. П. (Розит Д. П., 1895—1937)——1917年入党。1924—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6年先后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农业检查处副处长、处长。1927年任俄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农业检查局局长。1928—1929年任俄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自1930年起任乌兹别克斯坦氮肥联合公司和水电站建设工程主任。

罗曼诺夫, А. Р. (Романов А. Р., 1892—?)——1919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罗森霍尔茨, А. П. (Розенгольц А. П., 1889—1938)——1905年入党。自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2年起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8—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自1930年起任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罗森塔尔, Я. Д. (Розенталь Я. Д.)——1917年入党。1928年任乌拉尔食品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先后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重工业处副处长、处长。1930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而后任“煤炭”联合公司理事会副主席。

罗伊津曼, Б. А. (Ройзенман Б. А., 1878—1938)——1902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2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自1934年起任国内贸易和合作化小组副组长、领导人。

罗兹米罗维奇, Е. Ф. (Розмирович Е. Ф., 1886—1953)——1904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① 1922—1930年任工农检查人民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2卷、第4卷、第5卷任此职的时间为1927—1930年。——译者注

- 委员部部务委员和该部司法局局长。自1931年起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卢那察尔斯基,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1875—1933)——1895年入党。1917—1929年任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苏联科学院院士。
- 鲁缅采夫, К. А. (Румянцев К. А., 1891—1932)——1916年入党。1925—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20世纪20年代先后任阿塞拜疆国营石油联合公司副主席、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委员、阿塞拜疆共(布)中央委员。1930年任乌拉尔石油联合公司负责人。193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2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鲁缅采夫, И. П. (Румянцев И. П., 1886—1937)——1905年入党。1923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6年任俄共(布)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区委书记。1927—1928年任联共(布)弗拉基米尔省委书记。自1929年起任联共(布)西部(斯摩棱斯克)州委第一书记。
- 鲁希莫维奇, М. Л. (Рухимович М. Л., 1889—1938)——1913年入党。192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1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
- 鲁祖塔克, Я. Э. (Рудзутац Я. Э., 1887—1938)——1905年入党。192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2年任政治局委员。1931—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
- 伦金, К. В. (Рындкин К. В., 1893—1938)——1915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候补委员, 1930—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7年起任乌拉尔斯克州委第二书记。1928—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巡视员, 莫斯科委员会第二书记。
- 马格尔, М. П. (Магер М. П.)——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马尔科夫, А. Т. (Марков А. Т., 1877—?)——1898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① 1926—1929年任纺织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马尔采夫, Н. В. (Мальцев Н. В., 1891—?)——1908年入党。1927—1934年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2卷、第4卷、第5卷此时任职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译者注

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会务委员。1925—1930年任疗养地管理总局巡视员。

马哈拉泽,Ф. И. (Махарадзе Ф. И., 1868—1941)——1898年入党。^① 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年任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

马曼托夫,К. К. (Мамонтов К. К., 1869—1920)——俄国旧军队中将。国内战争期间任克拉斯诺夫集团军、邓尼金军队第四顿河骑兵旅指挥员。

马托夫,Ю. Н. (Матов Ю. Н.)——工程师。1928年任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新建设管理局局长。因“沙赫特事件”被判刑。

马约罗夫,М. М. (Майоров М. М., 1890—1938)——1906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先后任阿斯特拉罕、托木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乌克兰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乌克兰供应人民委员。

马祖罗夫,С. С. (Мазуров С. С., 1892—?)——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为沙赫特市第一国营矿场锅炉工。

曼扎拉,Д. И. (Манжара Д. И., 1885—?)——1917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驻中亚全权代表、乌兹别克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梅德韦杰夫,А. В. (Медведев А. В., 1884—1937)——1904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乌克兰共(布)中央书记。1930—1934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梅德韦杰夫,Т. И. (Медведев Т. И., 1885—?)——1919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为第一模范印刷厂车间技师。

梅德韦杰夫,Ф. Д. (Медведев Ф. Д., 1890—1937)——1907年入党。1920年任金属工人工会中央委员,后在劳动人民委员部工作。1928—1929年任全俄有色金属开采和加工股份联合公司辛迪加主席。1930—1933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待分配。

美尔尼昌斯基,Г. Н. (Мельничанский Г. Н., 1886—1937)——1902年入党。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4卷、第5卷的入党时间为1891年。——译者注

- 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26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组织部部长。1926—1929年任纺织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29—1931年任全苏纺织联合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梅日劳克, В. И. (Межлаук В. И., 1893—1938)——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31年任金属工业总局局长、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梅什金, Ю. С. (Мышкин Ю. С.)——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巡视员。
- 缅任斯基, В. Р. (Менжинский В. Р., 1874—1934)——1902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3年起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自1926年起任局长。
- 米尔佐扬, Л. И. (Мирзоян Л. И., 1897—1939)——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候补委员。自1934年起任中央委员。1925—1929年任阿塞拜疆共(布)书记。自1928年起任联共(布)巴库市委书记。自1933年起任哥萨克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 米高扬, А. И. (Микоян А. И., 1895—1978)——1915年入党。自1923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6年起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1966年任政治局(主席团)委员。自1926年起任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自1930年起任苏联供应人民委员。
- 米哈伊洛夫, В. М. (Михайлов В. М., 1894—1937)——1915年入党。1923—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3—1924年任莫斯科河南岸区委书记。1925—1929年任莫斯科市委书记。1929—1932年任第聂伯列宁水电站建设工程副主任。
- 米哈伊洛夫—伊万诺夫, М. С. (Михайлов—Иванов М. С., 1894—1931)——1913年入党。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列宁格勒机器制造托拉斯总经理。1931年任全苏汽车拖拉机制造联合公司主席、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米利恰科夫, А. И. (Мильчаков А. И., 1903—1973)——1919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1925年任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中央东南局书记。1925—1926年任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1928年任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1928—1929年在苏联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

- 米柳亭, В. П. (Милютин В. П., 1884—1937)——1903年入党。^① 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8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自1928年起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而后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 米特罗法诺夫, А. Х. (Митрофанов А. Х., 1879—1941)——1903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1924年先后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全俄农业合作社联社理事会工作。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建设问题研究小组领导人。
- 莫罗兹, Г. С. (Мороз Г. С., 1893—1940)——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年任国家贸易和合作社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25—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党)监察委员会书记。自1929年起任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贸易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 В. М. (Молотов [Скрябин] В. М., 1890—1986)——1906年入党。1921—195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1年起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57年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28—1929年任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自1930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 莫斯科温, И. М. (Москвин И. М., 1890—1937)——1911年入党。1923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部长。自1930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干部处处长。
- 穆采涅克, Я. Я. (Муценек Я. Я., 1892—1941)——1909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3年起任乌克兰共(布)中央监察委员,而后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专区监察委员会主席。1927年先后任基辅专区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察院院长、专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0年任乌克兰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穆萨别科夫, Г. М. (Мусабеков Г. М., 1888—1938)——1918年入党。自192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8年任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主席。1929—1931年任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自1931年起任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3卷的入党时间为1910年。——译者注

- 纳西罗夫, X. (Насиров Хайдулла)——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纳扎列强, A. M. (Назаретян А. М., 1889—1937)——1905年入党。自1924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4—1932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纳扎罗夫, С. И. (Назаров С. И., 1879—1944)——1903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小组领导人。1930年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处长。
- 奈马克(Неймарк)——1928年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粮食管理局副局长。
- 尼古拉耶娃, К. И. (Николаева К. И., 1893—1944)——1909年入党。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26年任联共(布)中央女工部部长。1928—1930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宣传鼓动部和党的教育部部长。自1934年起任联共(布)伊万诺沃州委第二书记。
- 尼基京, И. М. (Никитин И. М., 1890—?)——1917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为巴库市国营阿塞拜疆石油工业联合公司修理场车工。
- 尼科诺罗夫, А. Ф. (Никаноров А. Ф., 1887—?)——1917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30年任俄联邦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组织指导局局长。
- 诺索夫, И. П. (Носов И. П., 1888—1937)——1905年入党。192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30年任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1年任联共(布)特维尔省委书记。自1932年起任伊万诺沃专区委第一书记。
- 诺沃肖洛夫, С. А. (Новоселов С. А., 1882—1953)——1905年入党。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任乌拉尔下列省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彼尔姆、秋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而后在北高加索的一些负责岗位上工作。自1930年起任俄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工业劳动检察院领导人。
- 帕夫卢诺夫斯基, И. П. (Павлуновский И. П., 1888—1937^①)——1905年入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2卷、第3卷的生卒年代为1888—1940年。——译者注

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自1930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自1932年起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

帕捷克, Ст. (Патек Ст., 1866—1945)——1919—1920年任波兰外交部长。自1926年起任波兰驻苏联大使。

帕斯图霍夫, М. Д. (Пастухов М. Д., 1892—1964)——1908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任俄联邦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30—1931年任俄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帕谢奇尼克 (Пасечник)——1928年任顿涅茨克技术学校校长。

佩列卡托夫, И. Г. (Перекатов И. Г.)——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苏联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行动小组领导人。

皮达可夫, Г. Л. (Пятаков Г. Л., 1890—1937)^①——1910年入党。1923—1927年、1930—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3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1928年任苏联驻法国商务代表。自1928年11月起任国家银行副行长,自1929年起任行长。

皮亚特尼茨基, О. А. (Пятницкий О. А., 1882—1938)——1898年入党。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1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自1923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彭加勒, 莱蒙 (Пуанкаре Раймон, 1860—1934)——法国政治活动家。历任教育部部长、财政部部长、总理、外交部部长。1913—1920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普列沙科夫, М. Г. (Плешаков М. Г., 1886—1938)——1904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19—1929年任巴库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委员,而后任巴库革命委员会委员、巴库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阿塞拜疆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齐洪, А. М. (Цихон А. М., 1887—1939)——1906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4年任中央委员。1924—1928年任莫斯科鲍曼区委书记。1928—1930年和自1933年起任建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

① 原文如此,即皮达可夫, Ю. Л.。——译者注

席。1930—1933年任苏联劳动人民委员。

齐利科, Ф. А. (Цылько Ф. А., 1894—1937)——1919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1935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

奇纳卡洛什, Н. А. (Чинакалош Н. А.)——顿涅茨克煤炭工业联合公司技术部副部长。1928年因“沙赫特案件”被判刑。

契切林, Г. В. (Чичерин Г. В., 1872—1936)——1918年入党。1918—1922年任俄联邦外交人民委员。1923—1930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恰普林, Н. П. (Чаплин Н. П., 1902—1938)——1919年入党。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1928年从事共青团工作:先后任斯摩棱斯克市团委主席,秋明和斯穆棱斯克省团委部长和书记,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部长、书记,外高加索边疆区团委书记。1924—1928年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1930年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

切尔诺夫, М. А. (Чернов М. А., 1891—1938)——1920年入党。自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年任乌克兰贸易人民委员,而后任苏联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农产品收购委员会主席。

丘巴尔, В. Я. (Чубарь В. Я., 1891—1939)——1907年入党。1926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1938年任政治局委员。1923—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自1934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丘茨卡耶夫, С. Е. (Чуцкаев С. Е., 1876—1946)——1903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1927年任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7—1929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远东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9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主席。

丘多夫, М. С. (Чудов М. С., 1893—1937)——1913年入党。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37年任中央委员。1927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1928—193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而后任全苏工艺合作社理事会主席。

丘赫里塔, Г. В. (Чухрига Г. В., 1895—1937)——1918年入党。1920—1925年任奥伦堡省粮食委员,土耳其斯坦战线供应全权代表,库尔斯克、克拉斯诺达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粮食委员。1925—1930年先后任苏联供给人民

委员部部长、副人民委员。

丘维林, М. Е. (Чувьрин М. Е., 1883—1947)——1903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1922年起在乌克兰工作:任乌克兰共(布)科别利亚基县委书记,而后任红卫军区委书记。1927年^①任卢甘斯克区委员会书记。1931年任全乌克兰工会委员会主席,乌克兰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

瞿鲁巴, А. Д. (Цюрупа А. Д., 1870—1928)——1898年入党。自1921年起任俄联邦(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192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自1925年起任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

日丹诺夫, А. А. (Жданов А. А., 1896—1948)——1915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1930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34年先后任下诺夫哥罗德省委部长,第一书记、高尔基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日丹诺夫, Г. М. (Жданов Г. М., 1876—1944)——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为彼尔姆州雷西瓦钢厂平炉工人。

茹柯夫, И. П. (Жуков И. П., 1889—1937)——1909年入党。1925—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年任列宁格勒电力托拉斯总经理、联共(布)州委和市委委员。1928—1929年任列宁格勒州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自1930年起任全苏电工器材托拉斯总经理。

萨哈罗娃, П. Ф. (Сахарова П. Ф., 1890—1969)——1912年入党。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成员。自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萨莫伊洛夫, В. Н. (Самойлов В. Н., 1880—?)——矿业技师。1928年因“沙赫特案件”被判刑。

萨希亚诺娃, М. М. (Сахьянова М. М., 1896—1981)——1916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0年任联共(布)布里亚特—蒙古州委书记。

瑟尔佐夫, С. И. (Сырцов С. И., 1893—1937)——1913年入党。自192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2卷、第4卷、第5卷任此职的时间为1923年。——译者注

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1929—1930年任俄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自1931年起从事行政管理领导工作。

沙茨金, Л. А. (Шацкий Л. А., 1902—1937)——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任少共国际书记。

舍博尔达耶夫, Б. П. (Шеболдаев Б. П., 1895—1937)——1914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8年起任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①

舍伊金, Л. А. (Шейкин Л. А.)——1922年入党。涅斯维塔耶夫斯克矿业局局长。

什基里亚托夫, М. Ф. (Шкирятов М. Ф., 1883—1954)——1906年入党。1922—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1年起在俄共(布)中央机关工作。1923—1926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书记。1927—1934年任苏联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施米特, В. В. (Шмидт В. В., 1886—1938)——1905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34年任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自1930年起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自1931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总仲裁员。自1933年起任远东“全苏煤业”托拉斯负责人、滨海州计划委员会主席。

施特劳赫, Э. М. (Штраух Э. М., 1896—1937)——1912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8年任奥廖尔省(党)监察委员会主席。1928—1929年任沃罗涅日州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副主席。自1930年起任俄联邦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施瓦茨, И. И. (Шварц И. И., 1879—1951)——1899年入党。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0年起在顿河从事管理工作,而后任苏联煤炭工业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自1930年起任全苏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和全苏页岩工业联合公司主席。

施韦泽, В. Л. (Швейцер В. Л., 1887—1950)——经济学家。1905年入党。自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2卷、第3卷、第4卷、第5卷此时的任职为联共(布)下伏尔加边疆区委书记。——译者注

1927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1923年任奔萨铁路局局长。自1926年起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工作。

什基里奇, Н. Р. (Шкирич Н. Р., 1895—?)——1918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为制革厂工人。

什洛克, Ф. И. (Шлок Ф. И., 1895—?)——1919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6年起为戈梅利市工厂钳工。

什维尔尼克, Н. М. (Шверник Н. М., 1888—1970)——1905年入党。1925—197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4年起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俄联邦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1925—192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和联共(布)西北局书记。1926—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7—1929年任乌拉尔州委书记。1929年任五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30—1944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舒什科夫, П. С. (Шушков П. С., 1889—?)——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1931—1933年任副交通人民委员。

斯大林, И. В. (Сталин И. В., 1878—1953)——1898年入党。1917年10月和自1919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自1922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总书记。

斯卡钦斯基(斯科钦斯基), А. А. (Скачинский [Скочинский] А. А., 1874—1960)——煤矿矿井高空气象学和安全技术领域专家, 苏联科学院院士(1935),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54)。

斯捷波瓦内, И. М. (Степованый И. М., 1892—?)——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6年起为哈尔科夫蒸汽机车机务段钳工。

斯捷茨基, А. И. (Стецкий А. И., 1896—1938)——1915年入党。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1926年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机关工作。同时, 自1925年起任《共青团真理报》编辑。自1926年起任列宁格勒省委宣传鼓动部部长。

斯捷潘诺夫, С. И. (Степанов С. И., 1876—?)——1898年入党。^① 1925—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2卷、第4卷、第5卷的出生年为1876—1935年, 入党年份为1895年。——译者注

1930年任图拉省执行委员会(地专区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斯克雷普尼克, Н. А. (Скрышник Н. А., 1872—1933)——1897年入党。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7年任司法人民委员、乌克兰总检察长。1927—1932年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 И. И.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 И. И., 1870—1928)——1904年入党^①。自192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25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党的政论家。自1917年起任《社会民主党人报》、《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编辑。自1925年起任《消息报》编辑、《真理报》助理编辑。自1927年起任列宁学院院长。

斯米多维奇 С. Н. (Смидович С. Н., 1872—1934)——1898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成员。

斯米尔加, И. Т. (Смилга И. Т., 1892—1937)——1907年入党。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3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6年任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因参加反对派被开除出党。

斯米尔诺夫 А. И. (Смирнов А. И., 1888—1945)——生物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43)。1928年任库班农业学院教授和同时任克拉斯诺达尔中央烟草工业研究所所长。

斯米尔诺夫, А. П. (Смирнов А. П., 1878—1938)——1896年入党。1922—193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8年任俄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同时任农民国际总书记。1928—1930年任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自1930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斯塔兰尼科夫, В. П. (Стараников В. П., 1893—?)——1911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海军检查院副院长。

斯塔罗斯京, П. И. (Старостин П. И., 1885—?)——1917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6年在莫斯科特列赫戈尔内纺织作坊当杂工。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5卷的入党时间为1896年。——译者注

- 斯特列利佐夫, Г. М. (Стрельцов Г. М., 1901—?)——1918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9 年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自 1931 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全权代表。
- 斯特里耶夫斯基, К. К. (Стриевский К. К., 1885—1938)——1902 年入党。1925—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 1934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 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自 1929 年 6 月起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组织局局长。自 1932 年起任俄联邦轻工业人民委员。
- 斯特罗加诺夫, В. А. (Строганов В. А., 1888—1941)——1905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 1924 年起任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夫斯克(党)监察委员会主席。1927—1930 年任斯大林诺地区委员会书记。20 世纪 30 年代先后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区委书记、托木斯克和雅罗斯拉夫尔省委书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乌拉尔州委书记。
- 斯腾, Я. Э. (Стэн Я. Э., 1899—1938)——1914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8 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和出版部副部长。1928—1930 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自 1931 年起任动力研究所方法论处处长。
- 斯图季托夫, П. И. (Студитов П. И., 1888—1969)——1914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1923 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非常委员会工作。1924 年任库尔斯克省(党)监察委员会主席。自 1927 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驻中伏尔加州全权代表。1931 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苏联国家机床和工具供应管理总局”领导成员。
- 斯图鲁阿, И. Ф. (Стуруа И. Ф., 1870—1931)——1896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 年任外高加索边疆区监察委员会党委主席。1922—1924 年任格鲁吉亚农业人民委员。自 1924 年起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委员。1927 年任外高加索监察委员会主席。
- 斯维岑, Т. (Свицын Т., 1878—1938)——1928 年前任国营南方冶金托拉斯理事会委员。
- 苏霍姆林, К. В. (Сухомлин К. В., 1886—1938)——1905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 年任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自 1932 年起任乌克兰常驻苏联政府代表。

- 苏利莫夫, Д. Е. (Сулимов Д. Е. , 1890—1937)——1905 年入党。1921—1923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7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7 年任乌拉尔州执行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乌拉尔州委书记。1927—1930 年任苏联第一副交通人民委员。自 1930 年起任俄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
- 苏谢夫斯基, Д. М. (Сушевский Д. М. , 1881—?)——矿业工程师, 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新建设工程副主任。1928 年因“沙赫特案件”被判刑。
- 索博列夫, С. М. (Соколов С. М. , 1900—1939)——1918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 1927 年起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西北局书记。20 世纪 30 年代初任列宁格勒市彼得格勒区委书记。
- 索尔茨, А. А. (Сольц А. А. , 1872—1945)——1898 年入党。1923—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在苏联检察院的负责岗位上工作。
- 索尔达涅科, А. Г. (Солдатенко А. Г.)——1921 年入党。谢尔比诺夫斯克矿业局局长。
- 索柯里尼柯夫(勃里连特) Г. Я.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Бриллиант] Г. Я. , 1888—1939)——1905 年入党。1922—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 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1926—1928 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8—1929 年任苏联石油辛迪加总经理。1929—1932 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
- 塔尔贝格, П. Я. (Тальберг П. Я. , 1888—1928)——1904 年入党。1924—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 1927 年起为莫斯科“飞毛腿”制鞋厂工人。
- 特里利谢尔, М. А. (Трилиссер М. А. , 1883—1940)——1901 年入党。自 1930 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1925 年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工作。1926—1930 年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事局局长、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自 1930 年起任俄联邦工农检察院副人民委员, 然后在苏联监察委员会工作。
- 特鲁舍奇金, В. А. (Трущечкин В. А. , 1881—?)——1905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6 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托拉斯检查委员会主席, 然后在省监察机关工作。1927 年任萨拉托夫市监察委员会主席。
- 特先科(Тыщенко)——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托夫斯图哈, И. П. (Товстуха И. П., 1889—1935)——1913年入党。1934—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4年和1926—1930年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任机要处处长。自1931年起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副院长。
- 托洛茨基(勃朗施坦), Л. Д. (Троцкий [Бронштейн] Л. Д., 1879—1940)——1917年入党。1919—1926年任政治局委员。1918—1925年任陆海军事务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自1925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租让委员会和工业科学技术管理局主席。1928—1929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
- 托洛孔采夫, А. Ф. (Толоконцев А. Ф., 1889—1937)——1914年入党。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通用机器制造联合公司主席、军事工业总局局长。而后担任军事工业领导职务:制炮工厂中央管理委员会委员、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管理总局局长、全苏重型机器制造工业联合公司负责人、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厂长。
- 托姆斯基(叶夫列莫夫), М. П. (Томский [Ефремов] М. П., 1880—1936)——1904年入党。1919—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30年任政治局委员。自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1921年和1922—1929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自1929年起任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瓦雷基斯, И. М. (Варейкис И. М., 1894—1938)——1913年入党。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8年任萨拉托夫省委书记。1928—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黑土区州委第一书记。
- 瓦西里耶夫, С. В. (Васильев С. В., 1898—?)——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为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1934年任有色金属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维克曼, П. М. (Викман П. М., 1890—?)——1906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30年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工作。1927年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小组领导人。
- 维克斯宁, С. О. (Виксин С. О., 1887—1968)——1912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8年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机关工作。1928—1931年先后任联共(布)萨拉托夫州委、斯大林格勒州

委书记、下伏尔加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维什尼亚科娃, П. И. (Вишнякова П. И., 1887—1967)——1903 年入党。

1925—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1928 年在顿河专区监察委员会工作。自 1928 年起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工作。

魏采尔, И. Я. (Вейцер И. Я., 1889—1938)——1914 年入党。自 1924 年 7 月

起任苏联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和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原料采购和粮食、饲料管理局局长。1929—1930 年任乌克兰副国内贸易人民委员。1931—1932 年任苏联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温伯格, Г. Д. (Вейнберг Г. Д., 1891—1946)——1906 年入党。1925—1930 年

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 1927 年起任列宁格勒省工会理事会书记。1929—1937 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

温什里希特, И. С. (Уншлихт И. С., 1879—1938)——1900 年入党。1925—

1937 年任中央候补委员。1925—1930 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苏联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30—1933 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沃热夫, А. А. (Вожжев А. А., 1879—?)——1920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

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 1927 年起为格罗兹尼采油场助理机械师。

乌格拉诺夫, Н. А. (Угланов Н. А., 1886—1937)——1907 年入党。1923—

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 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8 年任中央书记兼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1928—1930 年任苏联劳动人民委员。1930—1932 年任阿斯特拉罕国营渔业托拉斯主席。

乌加洛夫, Ф. Я. (Угаров Ф. Я., 1885—1932)——1905 年入党。1927—1930 年

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9 年任列宁格勒州工会联合会主席。

乌雷瓦耶夫, М. Е. (Урываев М. Е., 1887—?)——1917 年入党。1925—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 1924 年起任火炮机枪军械联合公司领导。1930 年任军事工厂联合公司领导。自 1931 年起任全苏装备托拉斯领导人。

乌里扬诺娃, М. И. (Ульянова М. И., 1878—1937)——1898 年入党。自 1925

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 1934 年起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1917—1929 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和责任秘书。

西罗托夫, Ф. Н. (Сиротов Ф. Н., 1874—1957)——1917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 年任赤塔省委委员。自 1922 年起任赤塔省(党)监察委员会委员。

- 西蒙奇克, Ф. В. (Симончик Ф. В., 1885—1966)——1904年入党。自1919年起先后任帕里奇斯克镇执行委员会主席、博布鲁伊斯克区执行委员会副处长。自1926年起在苏联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工作。
- 谢尔古舍夫, М. С. (Сергушев М. С., 1887—1930)——1904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谢尔加宁, М. М. (Серганин М. М., 1889—?)——1912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6年起任列宁格勒市彼得格勒区委书记。
- 谢苗诺夫, Б. А. (Семенов Б. А., 1890—1940)——1907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年曾被派往阿尔丹矿。1925—1927年任卢甘斯克区委书记。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区委书记。
- 谢姆科夫, С. М. (Семков С. М., 1885—1928)——1902年入党。1925—1928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2年起先后任莫斯科工会委员会书记、外高加索工会主席。自1927年起任莫斯科市委小组领导人。
- 叶夫列伊诺夫, Н. Н. (Евреннов Н. Н., 1892—1941)——1912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8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29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自1930年起任纺织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叶戈罗夫, Я. Г. (Егоров Я. Г., 1892—1957)——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20年代在戈梅里斯克、雅罗斯拉夫尔、布梁斯克省担任党的工作。1927年任苏联工农检察院巡视员。
- 叶利扎罗夫, В. П. (Елизаров В. П., 1887—1939)——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铁路修配厂技工。
- 叶努基泽, А. С. (Енукидзе А. С., 1877—1937)——1898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4—1935年任中央委员。1922—1935年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和主席团成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矿泉管理小组特派员,而后任公路、土路和汽车运输中央管理局哈尔科夫办事处主任。
- 伊克拉莫夫, А. И. (Икрамов А. И., 1898—1938)——1918年入党。1925—1937年任中央候补委员。自1925年3月起任乌兹别克斯坦共(布)中央书记。1929—1937年任乌兹别克共(布)中央和塔什干市委第一书记。
- 伊利英, Н. И. (Ильин Н. И., 1884—1957)——1910年入党。1925—1934年任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7—1930年任俄联邦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

伊万诺夫, В. И. (Иванов В. И., 1893—1938)——1915年入党。192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任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1924—1927年任乌兹别克共(布)中央书记。1927—1931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

易卜拉欣莫夫, 韦利(Ибрагимов Вели, 1889—1928)——1918年入党。自1924年起任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

雅科夫列夫, А. И. (Яковлев А. И., 1900—1937)——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年任外高加索监察委员会主席。

雅科夫列夫(爱泼斯坦), Я. А. (Яковлев [Эпштейн] Я. А., 1896—1938)——1913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①自1926年9月起任苏联工农检察院副人民委员。自1929年12月起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

雅罗斯拉夫斯基, Е. М. (古别尔曼, М. И.)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Е. М. [Губельман М. И.], 1878—1943)——1898年入党。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0—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②, 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雅罗修克(Ярошук)——1918年入党。1928年任阿尔乔莫夫斯克专区法院院长。

亚戈达, Г. Г. (Ягода Г. Г., 1891—1938)——1907年入党。1920—1923年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4—1934年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自1934年起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扬松, Н. М. (Янсов Н. М., 1882—1938)——1905年入党。自1923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苏联工农检察院副人民委员。1927—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1928—1929年任俄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30年任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副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2卷、第3卷、第4卷、第5卷任此职的时间为1924—1930年。——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此人在本书第2卷、第4卷、第5卷任此职的时间为1924—1934年。——译者注

主席。

尤尔金, Т. А. (Юркин Т. А., 1898—1986)——1919年入党。1928—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28年任阿尔马维尔市“庄园”国营农场领导人。1928—1930年任“巨人”国营谷物农场场长。

尤尔岑, М. И. (Юрцен М. И., 1880—?)——1903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俄联邦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小组领导人。

尤列维奇, Э. И. (Юревич Э. И., 1888—1937^①)——1913年入党。1922—1926年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而后在1929年之前任巴什基尔州委书记。自1930年起任化学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尤诺索夫, К. А. (Юносов К. А., 1884—1937)——1905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列宁格勒州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赞格维尔, З. Г. (Зангвиль З. Г., 1895—1981)——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1930年在苏联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财政检查局工作。自1932年起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财务司长、仲裁委员。

泽姆利亚奇卡, Р. С. (Землячка Р. С., 1876—1947)——1896年入党。自1924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5—1926年任彼尔姆省莫托维利新斯克区委书记。1926—1931年任苏联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巡视员、部务委员。

扎东斯基, В. П. (Затонский В. П., 1888—1938)——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7—1933年任乌克兰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自1933年起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乌克兰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扎格列别利内, М. Н. (Загребельный М. Н., 1883—?)——1917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在尼古拉耶夫市“安德烈·马尔蒂厂”做钳工。

扎维茨基, Г. М. (Завицкий Г. М., 1882—1959)——1905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0年先后任乌拉尔电气公司副主席、电气工

① 原文如此。此人在第2卷,第4卷,第5卷的生卒年代为1888—1958。——译者注

业托拉斯理事会委员。自1924年起做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自1927年起任哈里科夫区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主席、乌克兰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9—1933年任乌克兰最高法院院长。

扎伊采夫, Г. А. (Зайцев Г. А., 1884—?)——1906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年起任乌拉尔斯克州党的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

扎伊采夫, Г. М. (Зайцев Г. М.)——1918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为下诺夫哥罗德“红色艾特纳”工厂钳工。

扎伊采夫, Ф. И. (Зайцев Ф. И., 1894—1960)——1915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乌克兰共(布)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1936年任联共(布)卢甘斯克区委和市委书记。

兹洛宾, А. Н. (Злобин А. Н., 1896—1950)——1917年入党。1928年任收购委员会全权代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委员。